血紅的土地

—— 中共土改採訪錄

譚松 / 著

中國農民的命運，
在中共誕生的那一刻起，
已經被註定了。

★ 中共統治幾十年的歷史真相 ★

中共為了自己穩坐天下，據一切財富、資源於自己一身，不惜冤殺數百萬生靈，迫害數千萬他們的子孫，並且至今還讓他們背負著「殘酷剝削壓迫農民」的罪名，與此同時，它自己打扮成「解放」眾生的救世主。

它一方面編造地主剝削壓迫的理論、編造劉文彩《收租院》之類的罪惡，一方面實施剝削壓迫的統治，在謊言的欺騙和暴政的淫威下進行瘋狂的掠奪，這，就是中共統治幾十年的歷史真相……

被中國官方指控「收集社會黑暗面」、「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採訪實錄！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 ——— 出版

血紅的土地

—— 中共土改採訪錄

譚松 / 著

中國農民的命運，
在中共誕生的那一刻起，
已經被註定了。

天蒼野茫，鐵血刀槍，演繹了多少亂石崩雲驚濤裂岸的千古大戲!

1921年，一個幽靈——一個外來的幽靈——悄然降臨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
九十多年前，沒有人預計到，弱小的它含蓄著一種中國五千年之未有的巨大能量——一種高超地利用、駕馭、強暴土地和人民的巨大能量。

幾十年後，它成功了，它君臨天下，成了這塊土地的唯一地主和絕對主宰。
只是——不到一百年，從打出一個「新中國」的土地革命，到「一舉改變兩千年土地制度」的土地改革，再到賣地、「強拆」的土地財政，一波又一波血雨腥風，使這塊古老的土地，浸透了華夏五千年未有之血紅。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 ——— 出版

在中共專制下的中國，有一個群體：他們最早遭受迫害，受迫害所持續的時間最長，受害的人數最多，程度最深；至今沒有得到平反，更沒有得到任何補償；他們的苦難也被遺忘得最徹底——這個群體就是地主和富農。

地主富農是中共專制下最大的受害群體，估計總人數至少有兩千萬以上。

1979 年，中共宣布給地富「摘帽」，此時距土改已有三十年，絕大部分地富都已經死掉。據《北京週報》報導，被摘帽的地富還多達 400 萬。土改中一共殺了多少地主富農？保守的估計也在 200 萬以上。

胡平（《北京之春》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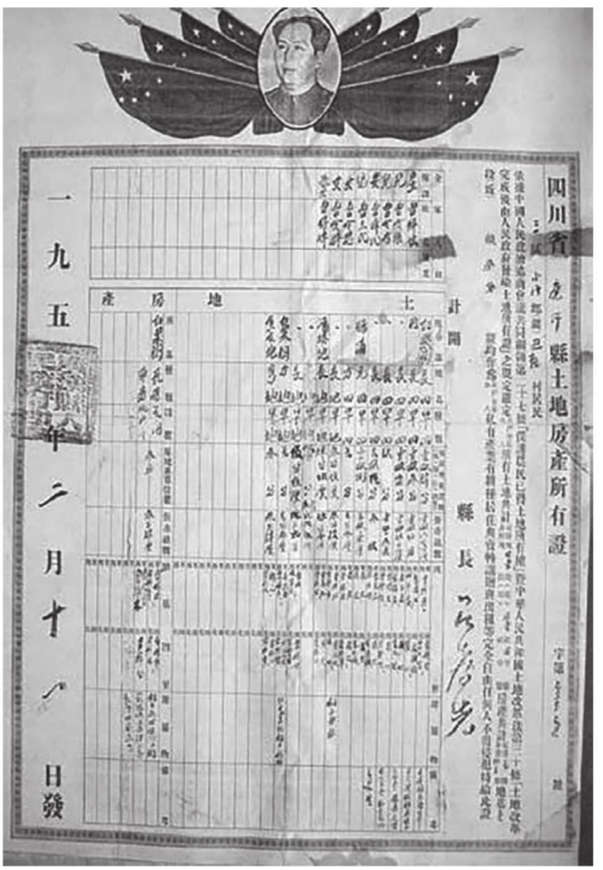
土改過去半個多世紀，地主屍骨早已灰飛煙滅，悲慘的記憶漸漸淡漠……土改的罪惡將隨著人世滄桑而湮滅。人類的良知呼喚正義，呼喚歷史的真實，倖存者有責任把當時的真相告訴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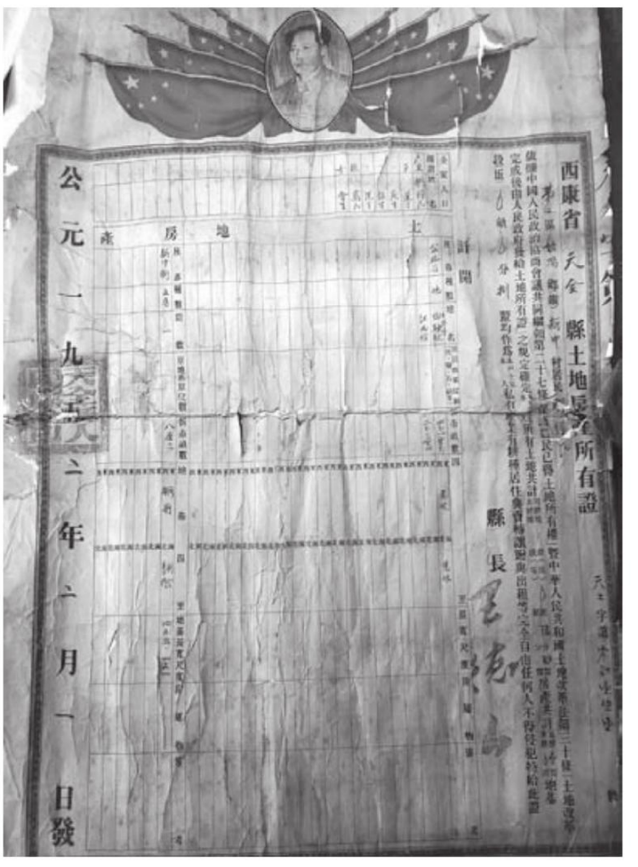
陳沅森（旅加中國作家）

土改是我所知道的最血腥的運動，它採用最下流最殘暴最野蠻的手段去侮辱與迫害一些沒有任何罪過也完全沒有反抗能力的人。一個普通的民兵可以任意剝奪別人的生命。在人類朝著文明社會前進的過程中，出現如此黑暗如此野蠻如此殘暴的迫害是不可思議的。

胡永安（土改酷刑目睹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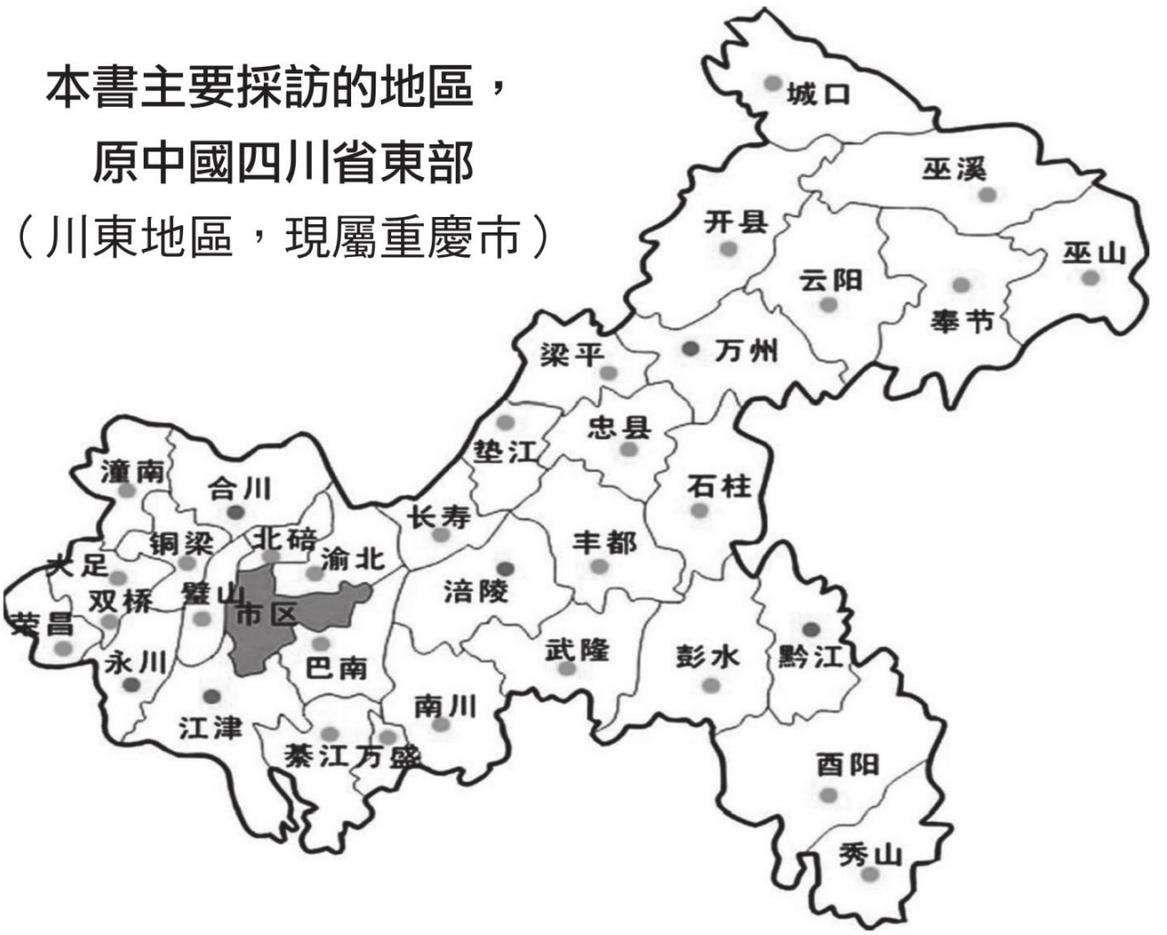
鎮反、土改時殺人現場





土改時四川廣漢縣和天全縣農民分到的「勝利果實」——一張土地證

本書主要採訪的地區，
原中國四川省東部
（川東地區，現屬重慶市）



川東丰都縣

蜀人何以得譚君？

——譚松教授新作《血紅的土地》序

辛灝年

一、同是神州亡命人，相逢相惜在金山

我第一次見到譚松先生，是在舊金山。

我不是一個喜歡趕場的人。今年的「六四」，我卻因路過舊金山而趕上了這裡的紀念會。遇上了，就不能不參加，因為這是紀念「六四」的死難烈士們。過去，但逢此日，我都是在家裡「默然一天」。

可是，這一次卻是躬逢盛會——舊金山參會的就是多。在聽了許多的發言，特別是聽了那些年輕人激越的「革命言辭」之後，我原來和大家一樣有些壓抑的心情，顯然鬆快了許多。

正在我因為一個又一個年輕的發言人而感到難得的興奮時，一個名字忽然被主持人趙昕先生喊了出來。我心裡不覺一動——是他。

他走到了臺上，我看到了他那張毫不見老的臉——一條「漢子」的臉，雖然嚴肅，卻含著幾分笑容，作派也是落落大方，既不失一個知識人的斯文勁，又顯然讓人感到他身上藏著股「定力」。尤其是他那雙黑黑的劍眉下，那一對目光銳利的眼睛滿透著堅毅之情；還有那寬闊厚實的胸膛，會立即讓人感覺到他是一個有氣勢、有力量、想擋也擋不住的人。

「他就是譚松。」我在心裡輕輕地、卻不無欣喜地叫了一聲。

他講的我全聽進去了，他講的我全部同意。我從他講的那些話裡，感到他正是我孜孜難求的那種人——而今一個有理想、有人格、有膽量和令人欽佩的知識分子。在千千萬萬陷落在「民主自困」中的當代中國知識人裡，他毫無疑問地可以稱做一個「出類拔萃」者。尤其是在我聽到他敢於在安裝著攝像頭的大學教室裡，公然告訴「無知」的新一代，「中共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那一天，對北京的學生和市民施行了大屠殺」時，我不能不從心底裡對他湧出一個真正的「敬」字來。在海外，能夠喚起我如此這般激情的機會，實在是太少了。雖然他曾七次失去了工作，也曾因寫作被中共當局抓捕關押，但是他矢志不渝，絕不似海外一些因「名利之誘」便極易「變節」的所謂民運文化人。

會議結束時，他發現了我，便客氣地喊著「辛老師」，穿過人群急急地走了過來，拉著我的手大聲地說：「今天沒想到能見到你，真是太高興了！」他那一口爽利的四川話，帶著四川話特有的起伏節奏，還有那股子川味，聽起來讓人感到十分真誠。我打小就喜歡聽四川人說話，抗戰的整個歲月，我的父母和兄姐們都是在陪都重慶度過的，雖然那個時候還沒有我，但是後來哥哥姐姐們在家裡常常要說幾句四川話的興頭，還是讓我從小就喜歡上了四川話那種特有的韻味。

我為他的熱情所感染，緊緊地握住他的手，開心地說：「我可是一直在關注著你！」

當天晚上，因著名報人陳凱兄「強行」宴請，我們幾個人便在唐人街的一家中餐館邊吃邊談，我不時地為他的豪情所感染，也為他「自找」的命運所感嘆，更因為海外來了一個真正的戰友而欣喜，因為這樣的戰友實在是太少了。

他還向我介紹了一位曾不畏凶險地製作土改紀錄片，挽救「血史」的年輕女大學生丁然。譚松是在擔心中共會對她下手時，匆匆叫她出走美國的。可是，沒想到剛跑掉了學生，他這個老師又因為「為地主翻案」而被學校開除了……。聽著他們那些驚心動魄的故事，我心中不覺暗暗感慨「真是有什麼樣的老師，就有什麼樣的學生啊！」。這個晚上我很開心，因為我見到了一對勇敢的師生。

我沒有想到的是，後來，譚松教授卻要我為他的一本新作寫序。這本新作的沉重和重要，還有它對我們時代所必將產生的重要影響，使我無法推卻，何況我們本應「相逢相惜」。

二、山河變色民血濺，枉殺地主為哪般？

這本書的名字，叫做《血紅的土地》，是譚松用十多年時間主要在川東地區跋山涉水採訪之後寫作的，更是譚松為搶救歷史，在那片曾被人血所浸透的土地深處發掘出來的一塊又一塊、一堆又一堆的「血化石」。歲月和土地無聲地凝化了它們，為不讓這個無情的世界忘卻千千萬萬被共產黨殺害在這片土地上的無辜地主們，譚松的書，就是這一塊塊一堆堆「血化石」的精靈，並且它就要化形人間，向世人揭示那一段被掩蓋塵封的歷史。

我是在旅途中讀完這部書稿的。在旅途中，我懷著憐惜、痛苦和種種恐怖的心理，在手中、更在心裡，撫摸把看著這一塊塊透涼的「血化石」。淚水曾一次次滲進了我的眼眶。我的家族中也不乏受害的冤魂們。我在昏矇的淚水裡，彷彿又看見了共產黨的刑場：那血紅色的標語、那高舉起的拳頭、那冒著血煙的槍口、那一

陣陣的喊殺聲、那轟響著的槍聲、那地主們腦漿四濺的頭顱和他們還在抽搐著的血身……這曾是我少年時曾不止一次親眼見過的可怕景象，未想到，它們竟因譚松的書稿，一次又一次地重新閃過我的腦海，錐子一般地扎痛在我的心頭。

這是一本鮮血淋漓的真實史書，是一次血的鋪陳、血的祭奠、血的控訴和血的反思。它記錄了「中華民國大陸淪陷區——毛管區」的川東地主們，是怎樣在共產黨的「新中國」剛剛登場時，就被血流成河的土改奪去了生命；它更記錄了「毛管區」的人民又是怎樣在土改和幾乎同時進行的鎮壓「反革命」殺人潮中，被迅速地奪走了魂魄的。作者的採寫是那樣地艱難，不僅有被跟蹤、被追捕、被開除和被判刑的危險，更有採寫的結果被收繳、被毀滅的可能，但是，作者冒著種種風險，堅持多年，挖掘了一段被塵封的流血歷史，記錄了一幅真實的土改畫面，這既是還原歷史真相，也為中共土改的研究提供了極其寶貴的第一手史料。

作者不僅採訪了轉眼就會謝世的幾個老地主、採訪了地主後代——「一個龐大受難群體」中的尚存者們，還著重採訪了那些本鄉本土的土改經歷者，去「聽他們講那過去的故事」。此外，還有當年站在土改舞臺上的各色人物——他們中自然不缺土改時期的作惡者。雖然年代久遠，存者稀稀，但這樣的採訪也就在「廣泛性」甚至「全面性」上無可挑剔。同時，如此採訪所呈現出來的真實性，也就難以質疑。因為無論是從主觀面而言，還是從客觀面而論，他都不是「一家之言」，而是「眾口一詞」，作者採寫這段歷史沉冤的嚴肅性也因此可見一斑。譚松在土改問題研究上的建樹，已經成為照耀著他全部採訪記錄的理論之光，當然這也是在他廣泛調查、普遍採寫的感性基礎上昇華凝練而成的。換言之，這本書正是在感性認知和理性認識的高度結合中，還原了土改血史和認識了土改血史，並因感性和理性二者兼備而達到了很高的「審美」境界。雖然，這一由鮮血凝結而成的「美」（指認識的真切深刻而言），卻蘊藏著歷史所絕不該有的那一幕幕曠古悲劇。

由是，譚松明確地指出了，中共的所謂「土地革命」，不僅是中共「奪得天下的法寶」，還是「中共坐穩天下的絕招」，更是中共統治集團在「土地財政」中「享樂天下的盛宴」。他從共產黨「土地革命」、「土地革命目的」和「土地革命方式」之從何而來，為中共殺人土改提供了歷史的動機和源頭。要在中國發動「土地革命」，是史達林早在 1926 年就欽命予中國共產黨的（註 1）；「土地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殺光地主豪紳」，這是同年由蘇共代表羅馬拉茲為中共起草的兩個決議確立的（註 2）；「土地革命的先鋒隊和主力軍就是農村的流氓地痞」，則是毛澤東早在 1927 年初就為中國共產黨公開指明和實踐至今的（註 3）。所以，中共篡國建政之後的大規模殺人土改才有了他歷史的來路、現實的目的和慣用的手段。

所謂現實的目的，一是為了穩固政權，二是經濟面臨破產。

就前者而言，作者說得很清楚，篡國建政之後，中共心中明白，只有穩固了農村，才能夠真正穩固到手的權力，才能真正地坐穩大陸江山。怎樣穩固？就是發動他們早已諳熟的殺人土改。而且也正是中共殺人土改的「圓滿」成功——即「恐怖統治」的形成，才造就了中國農村的長期穩定。20 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根據中共中央『將土改中打擊面規定在新解放區農民總戶數的百分之八，農民總人口的百分之十』的指示精神，至少有三千萬農民遭到批判鬥爭和非刑折磨，至少有二百萬以上的地主遭到鎮壓並被剝奪所有財產。特別是當鎮壓反革命運動接踵而至時，中共在農村對地主大開殺戒而建立專制新秩序的願望，遂迅即得以實現。……土改後，許多地方單幹的農民一聽說要重新劃成分，就立即哀求入社，這只能證明農村的極權專制秩序確已建立無疑。」

悲慘的歷史事實是，中共極權統治 69 年，殺得最多的是農民，勞改最多的是農民，討飯最多的是農民，最苦最窮的是農民，做了奴隸的是農民，餓死的幾乎全是農民！同時，被「戶藉」封死了人身自由的是農民、被壓迫在最底層的還是農民、被今日之共產黨視為「盲流、農民工和「低端人口」（即「賤民」）的，更是農民！當代中國農民所遭受的苦難，是他們在數千年中國歷史上所遭遇的苦難加起來都不能相比的。但是，共產黨時代的農民，卻無法像歷史上的中國農民那樣，既出不了陳勝、吳廣，也出現了不了張獻忠和李自成……為什麼？就是從土改起，中國的農民便被共產黨殺怕了！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蔣介石在向「國民會議」遞交的「剿滅赤匪報告」中，曾描述三十年代中共在農村中的暴行：「受赤匪荼毒最烈而最慘者——厥唯江西和湖南……凡是過去在村莊上有體面的乃至地主或是做過保甲長的人，皆連同親屬被殺害，到處可以看見一個坑裡埋著十人，或者百人。在死的恐懼面前，人民除了聽從，還有什麼辦法？」（註 5）

就後者而論，中共在大陸篡國建政伊始，整個社會幣值大跌，物價猛漲，各地商品滯銷，處處廠家倒閉，北京政權的年稅收，居然超過「九一八」事變之前南京政府年稅收的三倍。再加上幾與土改同時發動的所謂「抗美援朝」戰爭，需要戰費一百萬億，這對中共造成的壓力可想而知（註 6）。於是，毛澤東遂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發表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報告，也就是說，中共要「動手」了！而動手的第一個大動作，就是藉口土改而大殺地主，大劫其財。動手的第二個大動作，就是鎮壓反革命。鎮壓反革命運動剛剛發動起來，中共就立即發布了「關於沒收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財產的指

示」。因為，面臨經濟就要破產的中共和還要「抗美援朝」的中共，只好沿用他慣使的「匪徒」手法，同樣要藉「鎮壓反革命」這個大好機會來進一步殺人斂財。

在譚松的這部採訪錄中，處處都展現了中共公開屠戮無辜地主，並對之進行「殘殺」、「姦殺」和「逼財而殺」的種種情景。整個殺人土改，都是由中共流氓領袖們親自指揮各地農村裡的流氓地痞全面發動的。所以，中共土改的「殘暴性」、「創造性」、「對人性及人類良知的滅絕性」，以及對所有地主子孫們造成的可怕命運和痛苦人生，在中國的歷史上堪稱絕唱！在世界歷史上，也只有蘇聯的列寧、史達林和柬埔寨的波爾布特等共產黨殺人政權才能與之相比。

在中國的史書上，兩千多年前，就有人說出了「君子不虐幼賤，畏於天地」的話。但是，在這本採訪錄中，那個遠遠超過「垢莫大於宮刑」，卻同樣被「催折了陽根」的老地主李曼的血淚控訴、那些被土改民兵們輪姦致死的地主女兒們的悲苦冤魂、那個「丈夫被槍殺 / 女兒被餓死」的「地主婆」的悲慘人生、那要專門槍擊地主「天靈蓋」的惡毒用心以及對地主們使用「炮烙之刑，開膛挖心，點天燈……」等各種各樣的非人酷刑，無一不讓我們再一次深刻地體會到毛澤東那句「流氓地痞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的「革命真諦」！

必須一問的是，中共當真是想通過土改，將剝奪的地主土地分給農民嗎？當然不是，因為轉眼之間，共產黨就用種種辦法強迫農民交出了土地。從此，中國廣大農民被迫走向了所謂「集體化」，即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現身的「農奴制」。書中所引用的董時進先生在 1951 年所說的話，實在是妙不可言。簡言之，中共是將他人的土地和財產分配給農民的，但很快中共就用所謂「合作化、集體化和公社化」將農民手中的財產變成了「國產」——實際上的「黨產」，以至今日才有「黨賣國土，民無私田」這樣一個史所未有之離奇景象的出現。

正如作者所說，中共層層統治集團正是因為擁有了「賣不完的國土，鬧不完的血撤」，才有了今日那一桌桌似乎是「享樂不完的天下盛宴」。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就是中共發明的所謂「土地財政」。本書後面作者對於中共「土地財政」的研究所得，委實應該認真一讀。

同時，作者還徹底和深刻地批判和否定了中共的所謂「社會主義公有製」。這使我想起，1986 年 11 月 11 日，在武漢大學的千人講演會上，當在座的師生有人問我應該怎樣看待中共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時，我未暇思索便一口答道：「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就是中國層層統治集團中人最完美無缺的私有制！」一時掌聲大嘩。

但是，三十多年之後，當我在海外讀到譚松先生對中共「公有制度」的詮釋和

譴責時，我則不能不心悅誠服。因為譚先生正是從對土改的研究開始，將共產黨的公有制的建立和發展，解剖得淋漓盡致。而殺人土改，就是中共奪權後實施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開始。因為，只要中共在消滅了農村地主階級的私有制，又迅速地強迫人們走上了集體化和公社化之後，中共就牢牢地將農民的「生命線」攥在手心裡了！共產黨「革命」時曾說：是農民養活了地主，工人養活了資本家。可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共產黨一直在說：「是共產黨養活了全中國的人民。」要知道，中共是在「消滅私有制」的大旗下發動殺人革命的，而社會主義公有制，就是在這杆大旗下用血淋淋的槍彈和刺刀來實現的。

中共從土改發明「土地財政」便已經開始了的「享樂天下的盛宴」，就是這樣地一直擺到了今天。而今，其鋪張之宏麗，饕餮之大觀，實為當今世界之最。然而，在他們那朱華無比的流水宴裡，是不是早已噴射著中國千千萬萬地主們潑地的鮮血，更流淌著當今中國億萬人民的膏血呢？

它們還要「潑流」到哪一天？

三、九州本是堯舜國，何來馬列奪魂魄？

有必要說明的是，就算中共發動土改有其「不得不為之」的政治、經濟和戰爭等原因，中共也不必非要將土改搞成一個可怕的、甚至是瘋狂的殺人運動和酷刑運動。中國歷朝歷代的開國皇帝和新登基的帝王們，其首要之策，都是「大赦天下」而不是「大殺天下」。敗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幾乎是同時發動了台灣的「和平土改」，非但不曾殺害一人，卻在政治、經濟、特別是民生等各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如果一定要追溯中共非要進行殺人土改不可的思想政治和歷史文化緣由，那麼，譚先生的這本《血紅的土地》倒是為我們提供了極為深刻的認知。

一個嚴峻的世界性的事實是，近代以來，在歐洲民主革命的大浪潮之間，出現了一家新的、被稱作「馬克思主義」的「共產教」。它誕生在十九世紀，卻處處與十九世紀歐洲的民主大潮反向而行。它不僅攻擊由民主革命所創立的各民主國家為「資產階級共和國」，而且還要在「消滅私有制」的旗幟下，發動世界革命，以推翻這些「資產階級共和國」，建立「無產階級的專政國家」。其手段，就是通過發動階級鬥爭，換言之，就是發動大規模的殺人革命，以進行血腥的「階級制裁」。制裁的對象，就是資本家、地主和富農。還有，任何一位被認為是反對他們「革命」的人，即被他們裁定為「反革命」。

半個多世紀後，有著特殊歷史基礎和社會基礎的俄國人，終於根據馬克思的階

級革命理論，推翻了本國剛剛因爆發民主革命而建立的「二月民主政府」，剿滅了剛剛拉開民主憲政帷幕的國民大會，消滅了剛剛創立的「俄羅斯共和國」。從此，列寧和史達林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階級鬥爭，施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階級大屠殺。其慘烈和血腥，竟遠遠超過了中世歐洲「為教殺人」的千年宗教統治時期，並終於重新建立了歐洲歷史上最殘酷的「靈肉雙治」的「宗教極權統治」。

本書作者正是因為看透了這個至關重大的歷史、政治和文化癥結，所以，他才在該書中，揭示了中共發動殺人土改的根本緣由，實際上就是中共公開「為教殺人」的一個血腥大開端。當然，這個「教」，就是中共自一九二零年八月起（註 7）就已經正式信仰的「共產教」及其「馬列神」。其殺人方式和手段，也與蘇俄當年一模一樣，乃有一個統一的「宗教殺人模式」。

本書作者是用他的採訪錄和他的土改理論研究，來說明中共殺人土改的外來性質和馬列「惡教」行徑的。共產黨派遣的土改工作隊下鄉後，首先就給那些主要由流氓地痞組成的「土改積極分子」灌輸馬列的階級鬥爭理論，簡言之，就是灌輸馬列教的「殺人教義」，即為什麼要殺地主的政治理由。然後在這個「殺人教義」的指導下，按照中共「階級鬥爭是可以調節的」（毛語）的「靈活」政策，結合當地的情形，開始對本地農民劃分階級。階級成份一經劃定，便立即將該「革命教義」與共產黨及當地流氓地痞的「革命要求」相結合，召開群眾大會，公開批鬥地主，逼迫地主交出土地和錢財，並公開使用各種酷刑折磨他們，最後將他們公開處死，甚至還要他們死得「很難看，很恐怖」——這就是共產黨領導下，大陸各地流氓地痞對地主階級進行殘酷階級鬥爭和實行殘暴專政的「勝利」過程。

所以，殺人土改是由外來的「洋教階級鬥爭和洋教階級專政的教義」所支撐的、是以蘇共如何在俄國農村大殺富農、奪命搶財的野獸行為作為榜樣的。誠如書中所記述的那樣，當有農民同情某個地主時，一位土改民兵隊長竟然會用一句極粗野的話罵出了「共產教」的殺人真理：「狗雞巴你不懂階級鬥爭嗦！」這個殺人的「洋教教義」就是這麼簡單和迅速地通過中共的土改，滲透進了所有中國人的靈魂。此其一。

其二，中共利用殺人土改來實行「為教滅族」。滅誰的族，當然是中華民族。彼時的中共確信自己已經消滅了「資產階級的共和國——中華民國」，接著，就要根據「共產教」的教義和史達林的旨意，來讓中華民族「脫胎換族」了！

譚先生揭露的手段之一，就是中共利用土改大殺中國鄉村地主，以此來摧毀中華傳統社會和現代民國社會在中國廣大農村的社會政治基礎。在傳統中國和民國社會，通常都是縣以下不設政權。中國廣大農村社會，除卻非正常時期以外，都由農

村中的地主鄉紳們來從事管理。作者在書中說得好，中國農村中的地主鄉紳主要從事的社會公共事務，就是「興辦教育；興辦公益慈善事業；調解糾紛，主持公道」。他們在相當程度上不僅頂替了政府的一部分職能，而且比政府更能夠「善解鄉情，普及公義」，甚至更方便和更能夠減少與化解農村社會階層間、團體間和個人間的不應有對抗。在完備的民主法治時代還沒有到來之前，它曾在數千年中，成為中國農村社會管理的主要方法；在民國建立以後，它同樣是農村民主法治建立過程中的主要協助力量。民國開元，孫中山和宋教仁等赴農村舉辦選舉，協辦者均為本地的鄉紳地主。中華民國在傳統上與中國的歷史一脈相承，中華民國的農村地主們也都是接受和贊成民國的。

但是，中共奪權篡政之後，其重大的「開台大戲」之一，就是發動土改殺盡地主鄉紳，扶之以流氓地痞所建立的共產黨農村政權，這就不單是將中國的民間社會徹底毀棄，而且將中華民國農村社會的政治基礎全部地毀滅了。其結果，就是中共的所謂「新中國」，從根本上脫離了中國五千年的社會傳統，脫離了民國的共和國統和法統，而用前蘇俄的社會體制，明確地取代了我們民族自身的社會政治體制，造成了我們民族之整個社會生存環境的徹底改變。從此之後，大陸的「中國」還是中國嗎？

手段之二，就是中共用大殺中國鄉村地主來「摧毀中華傳統社會和現代民國社會在農村的文化基礎」。因為在「舊」中國的農村，誠如作者所愷切指出的那樣：「地主和鄉紳們大都是農村中的文化人士，是當時鄉村的文化精英，具有較好的道德素養，儒家忠孝仁愛禮義廉恥的薰陶在他們身上體現得最深也最普遍。」同時，「地主大多是農村中最有經濟頭腦而且善於經營的人，其中大多都是省吃儉用不事奢華的人。」他們不僅是傳統中國社會的繼承者，而且是傳統中國文化的傳承者。孔子說「道失，問於野」，就指的是他們。

歷史上，中國的道統即便遭遇劫難，也不會斷絕在中國鄉野文化文明之中。五胡亂華，宋明失國，雖然亂了中國，甚至亡了中國，但是正因為「道失，問於野」，也就是「野之尚存」，所以「道之不失」，進而還能夠用中國的道統文化，最終地同化了外來的侵略者和顛覆者，甚至使他們成了我們民族的一部分。而「地主在農村興辦教育，興辦公益慈善事業，和調解糾紛，主持公道」，恰恰是「道失，問於野」的前提。民國的道統、國統、法統，和兼濟中國傳統文化和外來進步文明的民國文化，又恰恰是通過他們才在「舊中國」農村社會日漸興起和逐漸普及的。當然這就更是中共非鋤之而不甘的了。其結果，自然是中國傳統文化和民國文化之根被中共一刀

截斷。從此之後，大陸的「中華民族」還是中華民族嗎？

所以，中共土改一旦殺害了數百萬地主鄉紳，就改變了中國傳統社會和民國進步社會的本相。用作者的話來說，就是：土改破壞了中國鄉村的和諧，使殘暴和血腥在中國鄉村大行其道；土改改變了農村貧富價值觀——以窮為榮，以富為惡；土改把不勞而獲、搶劫瓜分別人財物的土匪行為，當作反剝削反壓迫的革命行動；土改建立了惡質的鄉村政權；土改摧毀了鄉村莊園的文化藝術……。

由此可知，中共的「破四舊」絕不是從「文革」開始的，而是從「殺人土改」時開始的，是從中國最廣大的農村社會開始的。作者在書中所記述的川東農村幾大地主「莊園」的被徹底毀滅，實際上就是中國文化在廣大鄉村的被消滅，是「道失，問於野」的真正毀棄。

手段之三，就是篡改和摧毀中國的歷史。中共本著馬列教義，以所謂封建社會乃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必然歷史階段」為由，將秦後二千餘年的中國歷史一概指斥為「萬惡的封建社會」，所以，他們才要和整個中國以往的歷史作最徹底的決裂和否定，並把 1949 年之前稱作「萬惡的舊社會」。

如此汙衊自己民族的歷史，毀棄自己民族的文化，侮辱中國人民「走向共和」的艱難歷程，將一部五千年的中國歷史當作為「馬列教義」作證的一部反面教材，這不僅是對我們整個民族及其歷史的侮辱，也是對我們幾代大陸人長達近七十年的反動「洗腦」。

可貴的是，本書作者在《血紅的土地——從土地革命到土地改革到土地財政》一文中，從感性和理性兩個方面，將中共對中國歷史的公然篡改進行了批判。作者尤其針對中共將殺人越貨的暴力土改，當作是「為了消滅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基礎」予以了徹底的否定。他用自己對中共土改的研究成果，證明瞭中國的地主和農民的關係根本就不是「封建的對立關係」。同時，作者還藉用其他歷史學者的研究，從中國封建社會和歐洲封建社會的對比上，進一步證明中共移植馬克思關於「封建社會」教義的可笑。我對此不僅十分贊成，而且相當讚賞。

我還想稍稍說一說的是：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就不存在一個「獨立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社會」，更沒有存在過一個「整齊劃一的世界封建社會」。所謂「封建社會」這個不完整的政治歷史概念，在中國不過是「君主制度和君主社會」在其第一大歷史階段（即「大周朝」）因施行「封候建國」而出現，它完整的名稱應是「君主封建社會」。因為，若無「君封」，何以「建國」？封者為誰？周天子也！建者為誰？

諸侯也！在秦以後，也就是在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即廢了大周朝君主制度下的封建貴族政治和封建等級政治之後，中國的君主社會就進入了他的第二大歷史階段，即：「君主集權制度和君主集權社會」。所以，馬列子孫們指罵秦以後的二千餘年仍然是「萬惡的封建社會」，實在是背祖忘宗，甘為馬列思想的奴才。

至於中世紀的歐洲社會，則不論稱之為「封建」社會也好，「封領」社會也好，就不能一概而論了。因為整個歐洲中世紀社會狀態的複雜性，不是用「封建或封領」幾個字可以概括得了的。馬克思的錯誤，不僅是「以偏概全」——相信地中海沿岸的歷史就是整個世界的歷史；而且是「以點帶面」——甚至將他不承認的「德意志祖國」的歷史，也當作了整個世界的歷史。

但是，馬克思的「社會發展階段理論」，卻成了「共產教」的著名教義，不僅被血腥地實踐在俄國，而且被俄人通過中共之手更加血腥地實踐在中國，為此不知枉殺了多少無辜的中華兒女和中國地主，尤不知扭曲了多少中國知識者的人格和靈魂。

2003 至 2005 年間，我在美國和英國的一些名校系列講演「驅除馬列，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時，也講到了上述的內容。至今仍然不能讓我忘懷的，是每當我講到「要做中華兒女，不做馬列子孫」之時，都像是戳通了一層窗戶紙那樣，引發了在座中國留學生們真正的「民族之情和民族之恨」。當年講堂上年輕人眼睛裡那滿含著激情的清澈之淚，我終生不會忘卻。

今日回顧往事，只能使我迫切地感覺到，是時候了，是到了我們敞開「驅除馬列，恢復中華」之「民族解放情懷」的時候了！我想這也是《血紅的土地》這本書的另一個重大意義所在。因為，正是這本書告訴我們，今天我們所面臨的「民族危機」，是一場中國歷史上從未遭遇過的危機。因為，中共自「清匪反霸、土改、鎮反」開始的一連串對大陸人民的大屠殺、大迫害和大整肅，無非是「西方共產教」規定的對「革命對象」的屠殺、迫害和整肅；反對或不信仰馬列教者，也要被整肅、迫害和殺害。究其本質，就是對中國人的「宗教屠殺」和對中華民族的「民族鎮壓」！由此所造成的最惡劣後果，就是馬列文化之「奪我魂魄」已經成為極其痛苦的歷史和現實，並且早已使我們「族已非族」、「國已非國」，使大多數大陸人被「自絕」在中華文化的文明花苑之外，從而成為馬列文化可憐的和驚恐的傳承者及應聲蟲。

四、哭罷血土寫血書，蜀人何以得譚君？

書已讀了，淚亦流了，此刻該說一說譚君了。

譚松教授，是我的新知，也是我神交已久的「舊知」。多年前，我已經知道他主編了《抗戰陪都》專集；參與了廣受歡迎的紀錄片《重慶大轟炸》的採訪工作；他還寫過一本為右派鳴冤的書《長壽湖》，也是血淚史。其他的著作，我雖然讀得很少，卻知道他著述良多。

可是，他的這些採訪和寫作，注定不會為中共當局所容。他不僅一次又次失去工作，而且還被抄家、抓捕。他不僅在文章裡，更在大學的講堂上說領導中國人抗戰的「中心」在重慶，而不是延安；說反右運動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獨立和思想自由的大屠殺；說土改殺地主鄉紳就是屠殺中國農村的精英，是毀滅我們傳統的政治和文化；特別是他一再在課堂上展示 29 年前那場天安門大屠殺，讓年輕的大學生們瞭解歷史真相；更有甚者，他竟敢在被關押後的「取保候審」期間，開始調查採寫中共的土改真相……。

譚松何以如此？為什麼當今中國那許多甘心於「民主自困」的知識分子們，竟都不敢如此，甚至「不屑如此」呢？

那是因為譚松心中滿盛著「天下『苦共』久矣」的良知，胸中滿懷著一個「敢於直面人生」者的正義之情。他還天生就是一個有勇氣的人，有著敢於「為民伐罪」的「英雄心性」和「匹夫之責」——這在當代中國的知識人中也真是「鳳毛麟角」。但他卻是一個「紅二代」，他的父母都是「老革命」，他父親曾是中共重慶市委的宣傳部副部長，做的就是要管他兒子這類人腦袋的事情。然而，他的兒子居然成了四川大地屈指可數的著名異議人士，也就是反共人士。

譚松教授的這種真德行，使我聯想到了七十多年前重慶某些國民黨達官貴人的兒女們。當然，那時他們要比今日的譚松年輕許多，但是，除卻他們在當年所表現出來的幼稚、單純和容易受騙——特別是容易受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騙之外，他們在奔向「錯誤道路」時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正直，勇敢和英雄心性」，同樣是值得嘉許的。因為他們是真地背叛了「家門」，投入到「共產革命」中去了，而這個「革命」還是蓄意要顛覆「屬於他們的天下」的。此後，他們非但不怕坐牢，甚至為共產黨奪權打天下立下了難以磨滅的「歷史功勳」，比如陳布雷和傅作義等人的「逆女」們。（可他們最終也被共產黨清除了，他們是否悔悟，不得而知。）

我說這些話，不是要拿現在的譚松和過去的他們相比。要知道，他們走的是錯路，譚先生走的是正路；他們是受騙，譚先生則是自覺；他們是因為無知而錯識迷途，譚先生則是在感同身受和苦思苦索之後，才走上正義之途的真正民主戰士。可問題本不在這裡，而在於：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奈何「進步青年」竟有那麼多？而今天，在共產黨的「血腥統治」下，奈何「進步的知識者」居然這樣少？從中共

權貴的紅漆大門裡面晃蕩出來的，怎麼盡是些「中共血腥統治的接班人」呢？怎麼數來數去，也就是譚松，羅點點和他的一個哥哥——或許還有幾個我們不知道的吧。但是，他們和譚松先生還是不一樣的。因為譚松先生是對共產主義，共產黨和共產黨政權的徹底背叛，是對自由和民主的堅定追求，更是與 1949 年後中國千千萬萬受難者心心相連的。換言之，用共產黨的一種說法來講，在「紅二代」譚先生身上，體現了深深的和堅定不移的「人民性」；用我的話來說，就是「民主性」。他是為人民而背叛了共產黨，更為民主而背叛了專制。而在其他也有了些覺醒的「紅二代」、「官二代」身上，那最後一道背叛的門檻，是否能夠跨得過去，恐怕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在這個眼看著「大變革」就要來臨的「革命時代」，你們是否也能和譚君一樣，勇敢地跨出那道標誌著最後背叛的門檻，走向民間，走向人民，走向真正的民主革命？你們是否也能和譚先生，也和我們一道，去掀翻你們曾「棲身享樂」的專制大廈，去共同迎接我們民族的明天？如此，你們將一樣功不可沒。

其實，在任何時代，像譚君這樣的勇士、鬥士，都是不可多得的。但是，一旦有了一個，幾個，或整整一個隊伍參加了進來，那麼，我們民族和人民離他們真正獲得解放的日子，就不遠了。譚君將自己的心緊貼在川東的土地上，不，是我中華民族的整個大地上，將千千萬萬無辜地主的鮮血凝就的「血化石」緊緊抱在胸前，更用自己的情和淚將他們描畫出來，端到世人的眼前，讓他們看到昨日的「汪汪鮮血」和今日的「應有抱負」，這該是何等難得的「志業」。所以，我才會說：在譚君，雖是「哭罷血土寫血書」；但在蜀人，特別是川東的地主冤魂們，一定已在涕泗橫流地感慨著：「蜀人何以得譚君」了……

譚君難得。

民國 107 年 9 月 27 日於華盛頓鄉下

註釋：

1. 史達林在 1926 年 12 月 26 日曾指示中共說：「中共革命的性質就是農民戰爭。」
2. 1927 年 11 月，由蘇俄派來的第三國際代表羅明拉茲所主持的「中共上海政治擴大會議」上，就已經在「中國現狀和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和「關於土地問題黨綱草案的決議」中，開始命令「對於豪紳 / 工賊及一切反動派，應當採取毫不顧惜的消滅政策，努力使農民暴動有民眾式的性質，要極端嚴厲地無顧惜地殺盡豪紳反革命派」。（辛灝年：「以血的手段建立極權專制」，《開放》雜誌社 1996 年發表，1999 年《中共五十年》一書收集出版）
3. 1927 年 3 月，毛澤東在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道：「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
4. 1948 年「中共中央對新解放區土改的指示」，引自辛灝年「以血的手段建立極權專制」一文。
5. 引自辛灝年「以血的手段建立極權專制」一文。
6. 引自辛灝年「以血的手段建立極權專制」一文。
7. 1920 年 8 月，蘇俄已經派人在上海為各地共產黨小組成員成立了「臨時中共中央」。

前言

譚　松

在「新中國」，有一個被強大國家機器徹底妖魔化了的形象——地主。長期以來，地主已成了貪婪、殘暴、奸詐、懶惰、剝削、壓迫、甚至「毒蛇」、「豺狼」的同義詞。在中共劃定的階級敵人「黑五類」（地、富、反、壞、右）中，地主名列榜首，是為「首犯」。

電影《白毛女》中，地主黃世仁是毒辣、兇殘的化身；

小說《高玉寶》中，地主周扒皮是貪婪、奸詐的象徵；

泥塑《收租院》中，地主劉文彩是暴虐、淫逸的代表；

歌劇《紅色娘子軍》中，地主南霸天是惡霸、搶劫的標記；

還有那煽起仇恨的歌曲〈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

還有那數不清的「憶苦思甜」；

還有那數不清的「階級教育」；

還有那數不清的「血淚控訴」；

還有……

我，和我們這一代生長在「新中國」的人，大口大口吸著「黨媽媽」提供的這種狼奶，終於被培養成億萬嗜血而又瘋狂的「毛主席的紅衛兵、紅小兵」。

多年來，我們從來沒有用自己的頭腦去想過地主究竟是怎麼一個群體，更沒有想過去了解一下土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們任由歷史的真相、殷紅的鮮血、民族的不幸掩埋在統治者層層疊疊的謊言、標語、口號和文學家、藝術家們編造的各類作品中。

我是怎麼想到去做這部採訪錄的呢？

我的祖輩是當年川東萬縣農村的貧苦農民，父母是投奔了共產黨的「革命幹部」，我本人是飽受「妖魔化」狼奶餵養的「紅小兵」，推敲起來，彷彿沒有要為地富們「鳴冤叫屈」的「階級根源」。

我只能說，這是上帝的安排。

是上帝，把一種「不分階級」的同情心和「路見不平想要吼」的男兒血性安放在我心中。

在「文革」期間，大約是 1969 年，剛復課不久的我們被組織到附近的一個生產

隊接受「階級教育」——參加批鬥地主富農大會。

先是唱那煽情的歌曲〈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接著是聲情並茂地宣講地主的罪惡，然後是義憤填膺的口號：「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

待人們的情緒充分調動起來之後，主持人一聲斷喝：「把地富分子押上臺來！」

六、七個衣著破爛的中老年人被推上臺來。他們立足未穩，一群人衝上去就是一陣暴打！

歌曲、口號所煽起的仇恨立馬找到了一個宣洩口。

幾個地富被打得東倒西歪、血流滿面。

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目睹暴打地主，我並不清楚那幾個人是不是十惡不赦的壞人，雖然共產黨的宣傳也讓我心中充滿了仇恨。

但是，坐在前排的我卻清清楚楚看到了他們臉上和眼眸中的痛苦——一種極其無助和淒涼的痛苦。

他們頭破血流但卻不敢叫喊，一個個只是低聲呻吟。

那種痛苦的神情和目光深深觸動了我，我突然產生深深的同情。年僅 13 歲的我還不能明辨是非，但是，我總覺得我從那痛苦的神情中看到了一種無辜。

幾年後，1974 年，我做為「知識青年」下鄉到四川省鄰水縣。我們剛到，生產隊長就給我們介紹隊裡的階級成分情況，他重點提到了隊裡的一個廖姓地主，並要我們提高警惕並同他保持距離。我於是注意觀察，發現廖地主真是隊裡最底層的人：卑微、屈辱、幹最苦最累最髒的活，而且，從不敢高聲說話，連他的女兒，都畏畏縮縮，像個小老鼠。

看到他們那個樣子，不知為什麼，我又產生那種同情。

一天，我路過他住的那個破草棚房，站在門口向裡望去。一個女人，一個穿得很破爛的瘦弱女人，正在灶台前燒火。半晌，她才發現有人在看她。她抬起頭來，看見是我，眼中露出有些驚慌和羞怯的神色。

我衝著她笑了一下。

我永遠記得她的反應——她慌慌張張站起來，既手足無措又彷彿受寵若驚！

她的那種卑微讓我心裡突然覺得很難受——一個生活在最低層的人——廖地主的老婆。

地主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我向生產隊的老會計問起廖地主的事。老會計說，他完全是冤枉，最初他的成分是貧農，還同大家一塊分了「勝利果實」。可是，土改複查時（後來我專門調查過土改的這個階段），為了分他家的財產，就說他小時曾經抱給一個地主當過乾兒

子，因此，就把他劃成了地主。

廖地主是冤枉的，那麼，其他地主呢？

老會計經歷了土改的全部過程，在同他建立了良好關係後，他講給我大量的真實故事和土改血淚，他是第一個給我還原土改歷史真相的人，那種血腥、殘暴、下流、荒誕……我在農村待了近三年，在同農民們相處好了之後，他們給我講了心裡話，讓我很震驚的是：他們情願過當年給地主幹活的生活而不願意當人民公社的社員。他們還說，當年地主對他們很不錯，吃得也好。這同我受的教育剛好相反，而我感覺到，他們說的是實話。

我覺得，我受騙了，受了中共教育的欺騙。

我由此開始思索，並隱隱產生了要揭示土改和地主真相的念頭。

可惜，後來考大學、評職稱、謀生計，一直未將此念頭付諸實施，錯失了調查採訪的最佳時機。

第一次產生採寫地主的衝動是 1997 年又一次失業之後。然而，真正付諸實施是 2003 年 3 月。

那一天，我在雲陽縣彭氏莊園偶然聽說，土改時，一個地主老婆被四個民兵凌辱後用鐵條捅下身，導致她子宮破裂而死。當時我一下子情緒極其波動，感到非常痛苦，而以前埋藏心底的念頭徒然變作按捺不住的衝動。

記得當天晚上，雲陽突然傾盆大雨！

我曾在《長壽湖》的後記中寫道：「遺忘，讓被扼殺的生命又遭受一次不幸——一種比肉體生命消亡更深刻的不幸。」然而，面對地主的苦難，豈只是生命的虐殺和虐殺之後的遺忘？地富們在付出了財產和生命之後，還要背負著「罪該萬死」的罵名，被貼上「遺臭萬年」的標記，這才是更深刻的不幸，最大的不幸。

人世間的大不公，莫過於此！

於是，我決定不顧一切進行採訪。（說「不顧一切」是因為當時我還處在「取保候審」的「服刑期」）

然而，一進入，便發現這是比採寫長壽湖右派更為艱難的工作。

首先是缺乏線索。

雖然我知道地富們是一個龐大的受難群體，雖然我清楚就在我所在的重慶地區，一定有不少受難者和親歷者。可是，如何把他們一個個找出來呢？

我不願此事又被當局扼殺在搖籃中（如兩年前調查重慶「紅衛兵」墓）。況且，像我這種已有「前科」的人，稍有不慎，便會前功盡棄。這只能是一項偷偷摸摸的地下活動。偷偷摸摸雖然有利於安全，但卻不利於尋找線索。因此，採訪的進展緩

慢而又艱難。

其次是年代久遠。

土改是中共當政後的第二年（1950 年 12 月）就開展的運動。幾十年後，當年經歷最完整、最豐厚、也最悲慘的當事人——老地主們，眼下已寥若晨星。即便費盡心力找到一個，也不是當年（1949 年前）真正出租土地的地主。想來，要指望地主們穿過幾十年腥風血雨，仍然生龍活虎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是不現實的奢望。這也說明，這項調查採訪工作做得太遲了！對此，我既感到遺憾，更感到內疚。

第三是恐懼。

2002 年我因採寫長壽湖右派，被中共國家安全局抓捕、關押，深深領受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功力。採訪地主，這種「領受」有過之而無不及。找到一個線索原本不容易，但當事人的恐懼常常使採訪的「含金量」大減，甚至還無功而返。地主如此，地主子女如此，不少參與者也如此。恐懼，已內化為個體內在的自動控制程式，一提到那段歷史，無論是在窮鄉僻壤，還是在都市密室，程式自動啟用防「洩密」功能，讓陌生的訪問者無機可乘。（地富和其後代們不僅財富被搶奪了，肉體被摧殘了，精神也被打垮和征服了。另一方面，也看出中共黨國功力的「偉大」——把財產搶了，人殺了之後還要讓對方子子孫孫長期生活在恐懼中！）正是由於恐懼的原因，使得本書的不少採訪，都只能以擺「龍門陣」（閒聊）、拉家常的方式獲取資訊。

這種恐懼也發生在採訪者身上。

2005 年 10 月，我曾採訪了一位家族中有不少是地主的人（也是我的朋友），感覺到他有不少線索，這對正苦於找不到線索的我來說很重要。此外，他不僅有採訪和寫作的經驗，而且對地主的認識同我完全一樣。於是，我邀他加入這項調查工作。他同意後我們一塊作了 20 餘人的採訪，我很懷念我們那兩年多共同採訪的經歷。可是，由於當局的高壓，由於土改調查是一個高危的禁區，他一直處於恐懼不安中。近幾年來，尤其是在中共 19 大前後，當局對言論的打壓愈加猛烈。如果本書的內容流傳出去或出版此書，肯定有很大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他表示退出。他帶走了他獨自採寫的文字和一半我們共同採寫的內容，不再與本書發生聯繫。我感到很遺憾，因為那些篇章也飽含著無辜冤魂的悲慘血淚。但是，我也能理解，平安的日子是每個人的基本渴求。

願他能安全、自由地公布那些篇章的日子早日到來！

2017 年 7 月，我因為作土改調查，被我所任教的學校開除，在擔心又一次被抓

捕的恐懼中，我被迫決定流亡美國，土改調查採訪工作中止。

從 2003 年 3 月開始調查，到 2017 年 11 月 6 日我採訪最後一名地主後代為止，共採訪了 100 多人，勉強記錄了那場驚心動魄運動的一些真相。

為什麼說是勉強呢？因為，面對土改這場改變了中國整個「生態」的全國性運動，本書所揭示的只是很小的一個局部，而且，也未能按我設想的模式完成。

一是「量」未達標。

一部以親歷者、受難者的口述來反映中華歷史上那場驚天動地運動的文本，應當有相當的面的廣度：即應當含有不同的地區、不同的階層和較多的人數。可惜，由於種種原因（甚至還有經濟上的困難），採訪調查只集中在我的家鄉川東地區（現重慶地區），採訪物件（對象）也只有 100 多人。而這 100 多人中，尤其缺少「貨真價實」的老地主，缺少他們當初如何發家、如何經營、如何一夜間家破人亡、如何渡過數十年漫長黑夜的真實經歷和心路歷程。我相信，雖然歲月無情迫害殘酷，總還會有一些「珍稀動物」沒有滅絕。在紀念「七七事變」70 周年時，全國還找到了 9 個當年盧溝橋之戰的老兵。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土改後，存活下來的老地主一定不只 9 個。可是，怎麼找到他們呢？難道能像尋找老兵一樣透過互聯網和報紙、電臺？

二是「點」未深入。

1949 年之前，在中國鄉村，有不少氣勢不凡、規模龐大的地主莊園。這些莊園往往集建築藝術、手工雕刻、傳統民俗、儒家文化於一身。1949 年土改之後，這些莊園不是灰飛煙滅就是被五馬分屍。（我所見的最大也是毀得最徹底的是四川隆昌縣內占地千多畝的雲頂寨地主莊園。）這些莊園的主人們和他們眾多的後代，在 1949 年之後的命運一定是一部亂石穿雲驚濤裂岸的「百科全書」！如果能選一家深入下去長期採訪，輔之莊園本身所蘊含的文化、民俗、歷史、藝術等內涵，一層一層寫下去，定能以點帶面，比較深刻地展示那個年代和那段歷史。我所到過的陳萬寶莊園、大水井莊園、彭氏莊園、雲頂寨莊園等都具有這種可供耕耘的深厚土壤。可惜，又是由於種種原因，我一個也沒能深入下去。

三是「圖」的放棄。

這個「圖」不是一般照片。

當年的「土地改革」運動，實際上是一場最野蠻、最殘酷、最血腥、甚至最下流的土匪搶劫。在這個搶劫過程中，有大規模的殺人；有暗地的強姦；有公開的輪姦；

更有千奇百怪的種種酷刑。我在這些聞所未聞、難以想像的酷刑面前目瞪口呆大汗淋漓！五千年的中華文明，一頭撞上 60 多年前那些驚心動魄的殘酷，將如何面對？如何思考？如何書寫？我產生一種衝動，或者說想法，把那些酷刑一一列出，請人作畫，展示在此書的後部。《收租院》的泥塑雕像同《白毛女》、《半夜雞叫》一樣，是編造的故事，而「土改酷刑大觀」的圖畫，是無數無辜生命和悲慘血淚凝聚的真實。

但是，我放棄了。

除了冷血的強權和變態的心性，沒人願意觀看血腥，咀嚼殘忍。書中的不少酷刑，僅僅讀文字就讓人噁心，再配圖畫，豈不讓人更加難受？更何況，有些酷刑實在下流，如何「圖文並茂」？我僅僅在統計本書中提到的被虐殺的人數和姓名（已列在書後）時，心中就感到一陣又一陣的擠壓，一次又一次地想扭頭而去。

思索再三，我還是決定放棄「圖說」（除了個別作說明性的圖），雖然我清楚，避免血腥的前提是直面血腥，為了天空不再黑暗的前提是先揭露黑暗。

四是「力」度不足。

在採訪期間，我簡單地探討了土改造成的一些惡果。如：一是土改在政治上經濟上摧毀了中國農村的精英階層，而這個階層的人大多是有經營頭腦、勤勞能幹而又深受傳統文化薰陶的鄉紳。二是煽起仇恨仇殺，破壞了中國鄉村的和諧，人與人的關係。三是把一些地痞、流氓、懶漢做為「革命的依靠對象」，在土改殺人搶劫之後，讓他們進入政權，成為了各級領導幹部。四是破壞了農村的經濟發展，人們不再（也不敢）辛勤耕耘，發家致富。五是它一方面樹立起共產黨尤其是毛澤東本人在農民中大救星、大恩人的權威，一方面通過血腥屠殺讓人恐懼，為中共後來隨意整治農民、折騰農村奠定了基礎。六是……

另外，中共搞土改的手段、方法、計謀、程式、目的等等，也頗值探討。在調查採訪及一些書籍（如《革命與鄉村——解放區土地改革研究》）中，我瞭解到，中共的土改是一個精心策劃的「佳作」：宣傳煽動、挑起仇恨，殺人鎮壓、劃分成分、鬥爭奪財、徵糧參軍、建立政權……一環扣一環，一波接一波，完全是高屋建瓴的大手筆！說土改僅僅是土匪搶劫實在是貶低它了。「搶劫」只是「土地改革」精妙過程中的一個「手段現象」，而其以大奸大偽大惡大暴為內核的「大智慧」，內涵深厚得很。

還有，土改中的不少作惡者或幫兇都是同地主同村的村民，他們原本並非心狠手辣之人，但共產黨一挑動，或者說一旦他們獲得了可以公然作惡而又不受懲處的特權時，道德的約束便蕩然無存，人性中的惡便洶湧澎湃，看得見的，是一個個爭先恐後撲向同類，比野獸更兇殘。中華民族以儒家為主的文化傳統為什麼對突如其

來的惡如此沒有抵禦力？樸素的老百姓為什麼這麼容易就轉變為兇手和幫兇？（在土改之後共產黨發動的每一場政治運動中都是如此。）面對謊言欺騙、暴力鎮壓和利益誘惑，人性只有扭曲、敗退？

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下去研討，應當有學者來專門研究。

我不是土改研究的專家學者，只是調查土改真相的「民間記者」。雖然後來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查到了一些資料，回來後寫了兩萬多字的「理論探討」文章（見後面《血紅的土地——從土地革命到土地改革到土地財政》），但是，面對土改運動這樣厚重的歷史和複雜的背景，我感到自己力度不夠。本書的主要內容，只是展示了一些現象、一些場景，一些即將被歲月淹沒的個體不幸與歷史真相。我希望這部採訪錄，既為人們展示當年那真實的一幕，也為有關專家學者們的研究提供一部血肉文本和相關資料。現在對土改真相的研究還是禁區中的禁區，但一定要有人來做！否則我們既愧對那場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的「天翻地覆」，更愧對那無數祭獻在土改血腥祭壇上的千萬冤魂！

感到欣慰的是，在這些年的採訪中，我設法把絕大部分被採訪者錄了像，雖然工具只是一個不起眼的小數碼相機（帶錄相功能），效果欠佳，但總能看到聽到當事人的鮮活形象和生動講述。更有幸的是，幾年前我遇到了一個很有正義感的學生——懂一些視頻製作的丁然同學。在她一年多的艱辛勞作下（甚至冒著被抓捕的風險），九集紀錄片《血紅的土地》在 2017 年 4 月製作完成，從而使人們能感受到比文字更真切、更有衝擊力的歷史畫面。

還要說明的是，此書的前言早在 10 年前我就寫好了，當時是為了以防不測，現在重寫，保留了部分當時的文字。

此時，本書中的受訪者絕大多數都已經不在人世，他們永遠無法看到紀錄他們苦難的文字和視頻了。而且，即便他們還健在，他們又怎麼能看到？十多年過去了，天，不僅依然黑暗，而且更加黑暗。因此，在這片苦難深重的土地上，眼下還沒有出版此書和傳播視頻的可能。

面對那無數消殞在土改血腥祭壇上的冤魂，面對那留下了珍貴講述但卻已然作古的受訪者，我目前唯一能做的，是點一排紅燭，灑一杯老酒，仰望蒼天，祭奠衷腸——

讓那些無聲的名字，在民族苦難的記憶裡燃燒！

2018 年 4 月 18 日

祭奠六十多年前消殞在土改血腥祭壇上的冤魂

2017 年清明於川東農村

目錄

序　蜀人何以得譚君？——辛灝年 …… 07
作者前言 …… 21

第一章
殘存的幾個老地主

一、一個被摧折了「陽根」的老主 …… 38
　一〉我本人的遭遇 …… 38
　二〉我的親眼目睹 …… 42
　三〉我的爺爺李孟洋 …… 47
二、這是人做的事嗎 …… 52
三、丈夫，槍殺！女兒，餓死 …… 58

第二章
「聽他們講那過去的故事」

一、一個當年地主放牛娃的講述 …… 68
二、這幾十年的日子 …… 72
三、世上沒有這個道理 …… 75
四、好些事，我都不敢給娃兒講 …… 77
五、天靈蓋上一槍及其他 …… 79
　一〉魏廉周之死 …… 79
　二〉魏律民夫婦之死 …… 80
　三〉朱化成之死 …… 82
六、土改和反右我都遇上了 …… 84
七、從小學校長到死緩囚犯 …… 89
　一〉1951 年 6 月，走向深淵 …… 89
　二〉從死緩到 20 年勞改 …… 93
　三〉悲歡 14 年，從「反面教員」到代課教師 …… 97
八、家鄉勤勞苦幹的地主 …… 100

一〉我的家鄉 …… 100
二〉我的爸爸和二叔 …… 100
三〉我的創業 …… 102
四〉我去當教師 …… 103
五〉我目睹土改 …… 104
六〉我的一點看法 …… 107
九、我親眼目睹開膛挖心 …… 110
十、槍斃啦槍斃啦！ …… 116
十一、我參加革命，家人被「革命」 …… 118
十二、一對夫妻生離死別的故事 …… 121
一〉她一點點撿起丈夫的頭骨 …… 123
二〉我帶她去看，早已沒有墳了 …… 124

第三章
在土改舞臺上的各色人物

一、我沒有參與 …… 128
二、貧下中農硬是發明家 …… 132
三、我曾經是個傻子、瘋子 …… 135
四、土改時，我曾寫過殺人布告 …… 142
五、羊角古鎮：地主殺了，環境毀了 …… 148
六、淇灘古鎮：「你得也好，最好你忘掉」 …… 151
七、那時殺人十分隨便 …… 154
檔案上記載的重慶市南岸區徵糧和土改情況 …… 158
八、從「地主婆娘」到「右派分子」 …… 162
一〉打腰鼓，槍殺人的前奏曲 …… 162
二〉打鑼鼓，鬥打我的開場白 …… 163
九、太血腥，我想逃脫，結果—— …… 166
十、鬥打地主很殘暴 …… 169
十一、「先轟開，後深入」 …… 170
十二、讓農民過苦日子 …… 172
十三、我看到的土改和經歷的大饑荒 …… 174
十四、錯辦（案）三、五百（件）不追究 …… 177

十五、一個土改民兵隊長的述說 …… 182

第四章
地主後代，一個龐大的受難群體

一、那些年遭的孽說不完 …… 186
一〉36 歲的父親，12 個彈孔 …… 186
二〉爺爺之死和二叔之死 …… 188
三〉媽媽，遭遇土匪搶劫與「土改」搶劫 …… 190
四〉我隱瞞了出身的婚姻 …… 191
二、何年昭雪這塵封的奇冤 …… 194
一〉我的家園和家人 …… 194
二〉我聰慧的母親 …… 195
三〉我一家的噩夢 …… 197
四〉我母親之死 …… 198
五〉我美麗的姐姐 …… 199
六〉我姐姐之死 …… 201
七〉我的《思鄉曲》 …… 202
八〉我老師的一家 …… 203
九〉成守義之死 …… 205
十〉恐怖集中營 …… 206
三、樹，砍光了，人，整死了 …… 209
四、一個小心謹慎的翰林後代 …… 212
五、顯赫施家最後一個守墓人 …… 216
一〉共產黨來了，拆公館、挖祖墳 …… 216
二〉扶養了三代「地主子孫」的貧農婦女 …… 217
六、慘叫聲中的自刎 …… 220
七、他吞下了他爹的腦水 …… 222
八、一個地主孫女的自敘 …… 225
九、漂亮的地主女兒——黃二妹 …… 233
十、死裡逃生的 11 歲小地主 …… 239
十一、土改，我家五死一殘 …… 245
十二、這是商紂的炮烙之刑 …… 250

十三、從沒講過的家史 …… 256
一〉那段家史我不願對任何人講 …… 257
二〉那一天，我的姨媽 …… 259
三〉我在鍾家隱姓埋名幾十年 …… 259
十四、父親還是被殺了 …… 264
十五、我覺得最慘的就是 …… 267
十六、我們夫婦的母親都是自殺身亡的 …… 270
十七、一張收條救了我爺爺 …… 274
十八、「解放」幾年後，我就成了孤兒 …… 276
十九、我家是怎麼評為地主的 …… 281
二十、一無所有後的萬幸 …… 283
二十一、土改複查——從中農到地主 …… 286
二十二、徐氏家族，人亡家破 …… 289
一〉孝悌大家庭 …… 289
二〉血紅新社會 …… 290
二十三、爸爸和四爸之死 …… 294
二十四、地主子女，打死就打死 …… 300
二十五、我在幾十年的恐怖中成長 …… 302
一〉我一家的命運 …… 303
二〉我的親眼目睹 …… 306
三〉我對地主的一點看法 …… 308
四〉我的右派生涯 …… 309
二十六、古宅，強奪賤賣；書香，斷弦滅音 …… 314
二十七、地主，槍殺；工商業者，綁票 …… 326
二十八、我們徐家的興衰滄桑 …… 328
一〉我的家族 …… 328
二〉我的父母 …… 329
三〉我的奶奶 …… 331
四〉我的感歎 …… 332
二十九、一個敢怒敢罵地主後代的講述 …… 335
一〉「解放前」我胡家的家史 …… 335
二〉土改來了！人，殺了；財產，分了 …… 337
三〉堂嫂一家「絕門」 …… 339

四〉專門用地痞流氓 …… 340
五〉關押地主家屬的「集中營」 …… 342
六〉一個積善之家的「滅門」 …… 347
七〉魯家大院的故事 …… 350
八〉土改之後的不幸 …… 351
九〉一家貧下中農的「滅門」 …… 353
三十、也把我家關進「集中營」 …… 357
三十一、從兒童團大隊長到地主子女 …… 360
三十二、三哥的「狠毒」害了我一生 …… 362
三十三、殺千分之三 …… 364
三十四、我兩個父親，同一天遇難 …… 368
三十五、「打倒封建勢力要憑良心！」 …… 370
三十六、土改後，楊家唯一倖存者的遭遇 …… 372
一〉暴風驟雨，家破人亡 …… 372
二〉姐妹分離，乞討為生 …… 373
三〉滿娘下毒，死裡逃生 …… 374
四〉美夢破碎，乞討回鄉 …… 375
五〉逃荒貴州，賣作人婦 …… 376
三十七、無題 …… 379
三十八、他節儉持家，死於非命 …… 381
三十九、他死於「收買人心罪」 …… 383
一〉奶奶李家，人亡家破 …… 383
二〉爺爺王家，灰飛煙滅 …… 384
四十、「我們當年為什麼不跑嘛？！」 …… 388
一〉先輩艱苦創業 …… 388
二〉土改遭遇滅頂 …… 390
三〉父親遺恨終身 …… 393
四十一、劉文彩孫子的講述——祖母之死 …… 396
四十二、我為啥終身獨身 …… 401
四十三、一個被打殘的地主孫兒 …… 405
四十四、抗日將領劉湘侄孫的悲喜人生 …… 408
一〉我的家史和父母們的遭遇 …… 408
二〉我被收養和被遺棄的經歷 …… 410

三〉外出乞討，九死一生 …… 412
四〉地主子女，生存這麼艱難 …… 413
五〉捆綁吊打，逼我走上絕路 …… 416
六〉艱辛的尋親之路 …… 417
七〉山上遇險和大哥之死 …… 419
八〉我的婚姻和「翻身」的日子 …… 421

第五章
幾個殘存的地主莊園及其人物命運

一、血紅的彭氏古祠 …… 424
一〉西風殘照彭氏古祠 …… 424
二〉烈日高懸玉殞香消 …… 426
三〉「毛主席來了，好哇，分東西！」 …… 428
四〉「黃姑娘」遇難記 …… 428
五〉「狗雞巴你不懂階級鬥爭嗦！」 …… 430
六〉「就是這樣整死的」 …… 431
七〉「算了，莫說了」 …… 432
二、陳氏莊園，殘照悲烈——重慶市涪陵青羊鎮陳氏大莊園的藝術雕刻及人物命運 …… 435
一〉陳氏家族唯一殘存的莊園 …… 436
二〉二聲槍響，一道奇冤 …… 441
三〉一張年曆，四條人命 …… 442
四〉共產黨，你看不清楚 …… 447
五〉陳萬寶後裔座談會摘錄 …… 449
三、焚火之後的大水井地主莊園 …… 451
一〉傷痕累累的古建築 …… 451
二〉血淚斑斑的土改史 …… 454
（1）李亮清後人的命運 …… 455
（2）李氏家族最後一任族長的命運 …… 457
（3）共產黨區長李金鬥的命運 …… 460
三〉大水井，我所知道的故事 …… 463
（1）我們李家的家史 …… 463

（2）我父親的經歷 …… 464
（3）我和媽媽的經歷 …… 466
（4）我大伯、三伯和族長之死 …… 468
四、「世外桃源」魚木寨 …… 471
一〉「世外桃源」內的藝術遺存 …… 471
二〉「世外桃源」內的人物命運 …… 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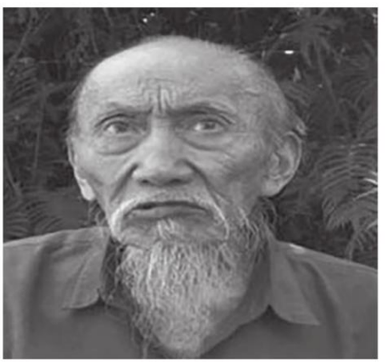
血紅的土地——從土地革命到土地改革到土地財政 …… 479
一〉土地革命，奪得天下的法寶 …… 479
二〉土地改革，坐穩天下的絕招 …… 482
三〉土地財政，享樂天下的盛宴 …… 502
四〉遠沒結束的結束語 …… 505

無聲的冤魂——本書記述的土改死難者名單 …… 507

第一章
殘存的幾個老地主

土改已經過去了 60 多年，當年貨真價實的老地主不是被殺了就是被歲月淘汰了。下面這幾位年齡在 80 歲以上的老地主，土改時也只有 20 多歲。還有，他們並沒有真正放過租、收過押，沒有「剝削過貧下中農」。

但是，一頂「地主」帽子，讓他們一輩子生活在「新中國」人間地獄裡。



一、一個被摧折了「陽根」的老地主

講述人：李曼

倖存地主，1929 年生

我是横石村洋沱壩的人，以前我們這兒屬於川東奉節縣，1952 年才劃歸湖北，四川土改搞得比湖北厲害。我的經歷豐富呀，我先說我自己，再說我看到和聽到的。

我 13 歲就離開家鄉到了萬縣的柏土壩，土改時我 21 歲多，在柏土壩教書，我當過教導主任，訓育主任等等。

我家是地主，土改時不准我留在學校，要回家鄉接受清算，我只得回到洋沱壩（當時叫横石村）。

我們李氏家族是一個大家族，但我們家已經破產，原因是父親抽大煙，敗了家，搬到高梁村去了。土改時他被評為破產地主。我同爺爺李孟洋住，家只有 12 擔課（注：一「課」包穀和米是五百斤，穀子是四百斤）。爺爺也被評為破產地主，我被評成地主。

問：你家沒什麼田地了怎麼要評你地主？

李：滿了 18 歲就要評地主，他們說我解放前在教書，沒有勞動，是剝削。當時有個說法叫「說理鬥爭劃地主，互相評地劃農民。」

我回來後自己耕種那點土地，算不上什麼地主，問題出在農會追「浮財」。他們說我家裡藏有 3000 斤黃金，於是我被抓到村上關起來，天天拷打，追逼金銀。

我哪兒交得出來，3000 斤？ 3 兩我都沒有看到！他們說：「金子銀子！你是個地主，怎麼會沒得金銀？要拿出來！」交不出來，那就用刑！

一〉、我本人的遭遇

（一）、我土改時所遭受的刑罰

在關押的那兩、三個月，我遭受了幾十種不同的刑罰，我講一些給你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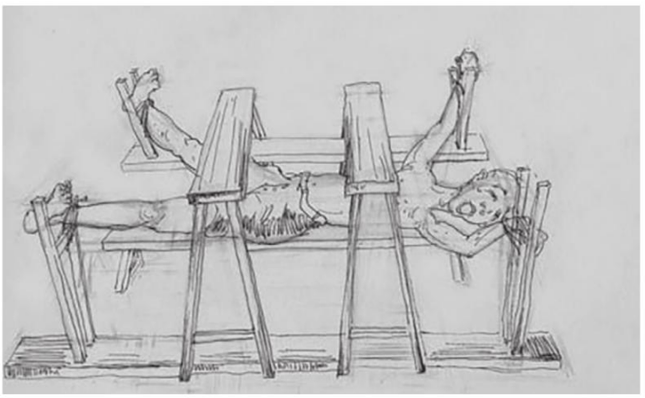
1、「蘇秦背劍」

「蘇秦背劍」是土改時經常使用的一種刑罰，一隻手這麼（從肩上）扭下去，一隻手從這兒（腰下）扯上來，還把手扭翻過來，這個手這麼扭，這個手這樣扭，扭過來後把兩個手使勁一拉，用繩子把幾根手指捆在一起。哪受得了呀？這種刑罰在我身上用了幾十次。一捆就是幾個小時，那幾個小時硬是受不了。

「蘇秦背劍」

2、「飛機下蛋」

「飛機下蛋」就是把人捆在五根板凳中搖晃。手放在下面捆起，腳放在上面捆起，捆好後搖晃板凳，板凳是活動的，把人一搖，扯得人所有骨頭要散架。這種刑罰我也受了好多次，它整不死人，只是痛得過火。



「飛機下蛋」

3、「背磚」

先把人面朝下睡在板凳上，手扭到背後把一雙大拇指捆在一起，再把兩個腳的大拇指用麻繩捆得緊緊的，然後把板凳豎立起來，把捆手和腳的繩子從板凳頭上掛下來，捆在板凳腳上。這一掛就受不了，人有那麼重呀。這還不說，他還在背心上加磚，一塊一塊的加。我曾經被加過 12 塊磚！我的媽呀，受不了。這種刑受一次後兩三天都吃不下飯。

「背磚」

4、「猴兒扳樁」（有的地方叫「吃咂酒」）

猴兒扳樁就是用麻繩把兩個大拇指捆在一根木樁上，木樁上破一條縫，加一個木楔子，再用錘子砸木楔，你受得了？當場把指頭整斷了的都有。

但是，在所有刑罰中，這個刑罰我沒有吃大苦，原因就是那個婦聯主任同情我，她把一捲陳腐的麻繩交給行刑的民兵，捆上後，捶了幾捶，麻繩就斷了，再捆，再錘，又斷。他們說我會使法，我會使什麼法？是那個

婦聯主任良心。所以這一關我躲過去了。

5，「秤桿」

土改時幾十種刑罰我都熬過去了，最後有一種差點讓我送了命。

我永遠記得那一天——我 22 歲的生日。

他們把我脫光，手和腳反捆在一根棒棒上，再用一根麻繩把我生殖器捆起。

棒棒就當作一把秤的秤桿，生殖器就作為秤鎬（秤桿上提桿的鐵環）。另外，在腳那一頭還掛一塊石頭，做為秤砣。捆我生殖器的麻繩上再接上棕繩，然後吊在樹上。我全身加石頭的重量就吊在我的生殖器上，那個吊上去得了呀！我肚臍眼上的血喲，直往上噴。

問：怎麼從肚臍眼上出血？

李：我被吊起後，肚子裡面的隔膜全部扯破了，肚子裡的血就從肚臍眼上噴出來。

（李曼眼看性命不保）

全靠那個農會主任，他說：「這是個才出林的筍子呀（即：一個年輕人呀），不應該把他搞死了。」

他一手托住我的身子，一刀割斷了繩子。把我救下來後，這個主任還把我送到一個 80 多歲的老醫生那兒。老醫生說：「嘿，你們注意喲，他肚臍眼上的血不要回進去了，讓它儘量流出來。」他說，我肚子裡面的隔膜被扯爛了。我不知道流了多少血，我性命保住了，但是，促使生殖器勃起的附睾被扯爛了，從 22 歲我生日那天

起，我就「殘廢」了，所以現在我是一個「淨人」（沒有生殖能力的人）。

就這樣把我吊在樹上

李曼講完這段經歷後精疲力盡，癱倒在椅子上

注：李曼從此獨身，現在，年近九旬的他做為孤寡老人住在利川市社會福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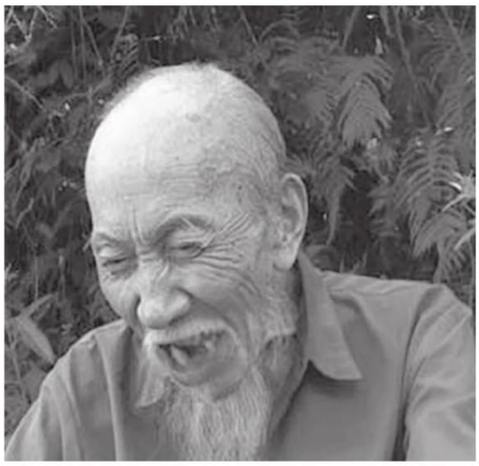
（二）、我文革時所遭受的刑罰

抓進村農會的11個人中，只有我一個人活出來，其他人全部整死了。在文革時，又把我抓出來整，他們問我：「你怎麼沒死呢？」我說：「我當時想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就這麼一句話，差點又讓我送了命，他們說：「你留得青山在，你是還想來造反吶？」

一頓暴打！我被打得昏死過去，他們把我丟在地壩，我躺在地上沒有知覺了。

這時，他們唆使村裡兩個傻乎乎的人來整我，他們一個拿一把柏樹皮，捆成這麼粗的火把，來燒我的眼睛。他們說我土改時沒有整死，文革中就要把我打死。

我眼睛當時是燒瞎了，什麼都看不見了。我在地壩上躺了一夜，天要亮時才有兩個人把我拖回去。



李曼講述時

同院子住的一個姓周的人去請青龍口醫院的院長羅遠明和大水井的一個眼科醫生冉玉清來救我，羅院長看到我眼睛燒到那個程度，腫起多大，就說我的眼睛沒有救了。冉玉清說，你先把人救活，我來治眼睛。

結果我人被救活，眼睛也保住了。冉玉清說，那個眼睛有個自動保護，火一燒那個眼珠子就扯到後面去了，外面燒傷，裡面還有救。她用了藥，把我眼睛包紮起。最後那幾天，眼睛癢得很，他們把

我手捆起，不准我去抓。對了，他們兩個都沒收錢，我也沒錢。原因是冉玉清曾是我的同班同學，羅院長曾是我的學生。我又一次大難不死。

（李曼眼睛雖然救下了，但從此他只有在一、兩尺之內才能辨清人和物。）

二〉、我的親眼目睹

土改時我耳聞目睹的刑罰和死亡多得很，死的人中大多數都是我們李氏家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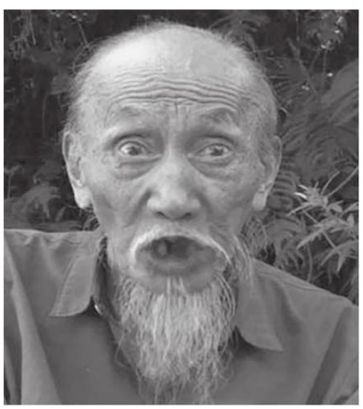
（一）、李斗寅之死

李斗寅是我祖父一輩的，他畢業於北京大學，曾經擔任龍門中心小學校長。

他家多少租嘛？五擔租，只有五擔租子！他被抓來鬥打是為了逼要金銀和花紗布匹。

他們給他定一個數字在他頭上，要他按那個數字交納。他哪裡有嘛。他交不出來，就把他抓去整。

我們關押在一起，給他用的刑叫「裁肢」，這是我親眼見到的！他們用一種叫做「腳拿子」（音）的鋼夾子來夾他手指，「腳拿子」用腳踩，鋼夾子就是用來扭鐵、扭鋼的那個夾子。他們把李斗寅的手指夾在鋼夾子裡，只有幾分鐘，手指先夾扁，骨頭都夾斷了，最後只剩一張皮了。人皮不容易夾斷。



李曼講述時

他們把第一節夾了又夾第二節，手指夾了兩節才夾完。把這隻手整殘了後，再整另一隻手。不光是手，把兩隻手裁斷了後再裁兩隻腳。你想，夾那個肉和骨頭，慢慢絞，一直把它絞斷，要好久的時間，要痛好久。

一節一節地裁，裁斷，所以，這種刑罰叫「裁肢」。

李斗寅當時沒有死，他的消化器官、呼吸器官還是完好的，不容易一下子死。

他們把他丟在一個豬圈裡，有些農民看到活活把一個人整死還是不忍心，給他點水喝，有的餵他點稀飯，他又活了幾天才死的。他死時 68 歲，比我爺爺大幾個月。

（二）、李載承之死

李載承是我堂兄，比我大三歲，同我關在一起。那天，土改民兵把他抓出來，脫光他褲子，把他手扭在後面，往上提起，就像刑罰吊「鴨兒凫水」一樣。然後他們抓來地主家的 10 個女人，哪 10 個呢？他的親姐姐、親妹妹，嫂嫂、族裡的嬸娘、

甚至還有族裡的奶奶。民兵們在李載承大腿前放一排板凳，把這 10 個女人抓來趴在板凳上，把褲子脫了，脫個光屁股，頭髮綁在板凳上。民兵對李載承說，今天這些都是你的人，全是你家裡的人，你喜歡不？你看到這一串白屁股你喜歡哪一個？李載承一聲不吭，民兵說：「你不說呀？你不說喜歡哪個呀？那不要緊，我們今天來整。」怎麼整呢？他們用竹刷子朝他的生殖器抽打。那生殖器怎麼經受得起打喲。

問：這是當眾進行的嗎？

李：是呀！有些怕來看，有良心的人不願意來看。但是，強迫動員，強迫他們來看。

一陣抽打後，女人們被民兵拖出去各打 50 板屁股。李載承被打得撒不出來尿了。他父親李先昭來幫他，用嘴吸，還吸出來了，吸出來的尿中有一半是鮮血。

可是，李載承下身損傷了，一直撒不出來尿，他要斷氣的時候我去餵他幾片洋芋（土豆），我餵他嘴裡，他已經不吃了。民兵說：「把他拖出去把腳給他砍了！」他被拖出去就在那個火坑石頭上，用砸草那個錘子，榔錘，這麼大，砰砰幾下就把他腳桿砸斷了，兩隻腳都砸斷了。

（李載承遇難時 25 歲，未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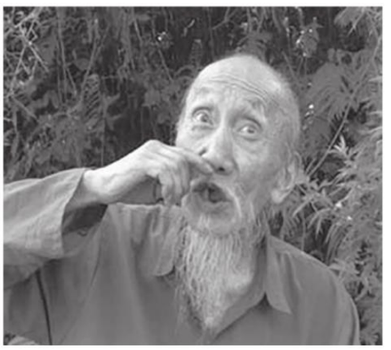
（三）、李先昭之死

李先昭是我叔叔，他是怎麼被整死的呢？也用了十幾種刑罰，我記不到那麼多。印象深的一種叫「卵彈琴」另一種叫「灌水葫蘆」。

「卵彈琴」就是用麻繩把睾丸捆起，麻繩接在一根棕繩上面，另一頭叫人使勁拉直，繃緊之後就拿錘子，像彈匠彈棉花一樣，在繩子上一刮，「嘣」的一聲，這邊拉得緊緊的，那邊一彈，受不了，慘叫。人又是捆起的。

「灌水葫蘆」就是把他吊在雪地壩上。怎麼吊呢？倒吊，一吊就是一晚上。人倒吊起後，鼻孔是朝天的。土改民兵用壺裝了 80 度的開水，灌他的鼻孔。我叔叔先噴出來的是開水，後來噴出來的就是血了。

天天整，晝夜不停換班整，我叔叔被折磨了一個多月才死。



李曼：開水灌鼻孔

在採訪時李曼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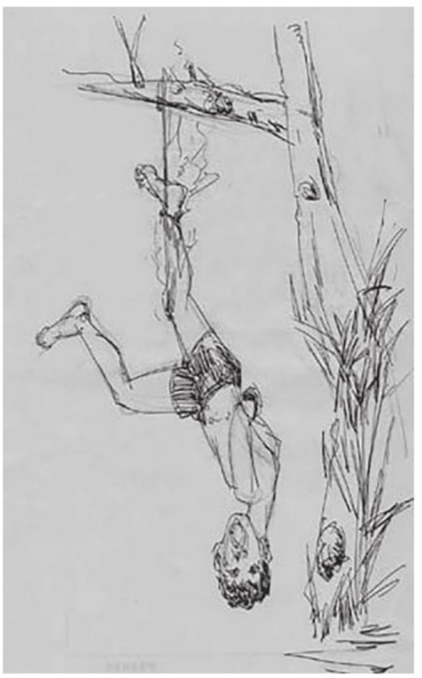
憤地說：

這些千奇百怪的刑罰在土改時公開地四下交流，幹部、民兵們互相學習，交流經驗。發明一種整人的辦法就給予獎勵。是他（毛澤東）下的這個令，毛澤東硬是要把地主全部要消滅乾淨！

毛澤東硬是要把地主全部消滅乾淨！

（四）、李懷清之死

我們家族有一個叫李懷清（音）的人，他一隻腿有毛病，走路一拐一拐的，外號叫「三瘸子」。土改民兵把他抓來，用鐵絲捆扭在他那隻病腳上，倒吊起來後，再捆一坨棉花在腳桿上，先用汽油引燃，然後把煤油桐油淋在上面燒。那腳燒得吱吱吱地響。油往下流，火就從腳一直燒到膝蓋。李懷清死時 57 歲。



對了，李懷清的兒子也全部整死完了，其中有一個叫李柏聯。他還有個女兒叫李先 X——名字記不全了，只知道她在萬縣省師範讀書，才十六、七歲。

兩天就把她整死了。不僅是輪姦，還用了各種下流殘酷的刑罰。

李懷清的哥哥叫李伯清，土改時也整死了，但怎麼整死的我沒有看到，他死時 62 歲，他就住在我家後面五里路的地方。現在他的房子已經全部毀完了。李伯清的兒子叫李先藩，被槍斃了。

問：你還知道其他被槍斃的嗎？

李：還有李汶舟、李沛東、李沛承、鄭少鼎（音）、李鴻鈞。李鴻鈞開的染房，又開了藥鋪。他是我們李家輩數最大的，但他才 30 多歲，那硬是把他腦殼打得沒得了。

（五）、李蓋五之死

李蓋五是我的堂祖父，比我祖父（李孟洋）小九個月。他是我們李氏家族最後一任族長，解放後他還立了功，在奉節縣當了統戰部長，土改時也把他抓來整，用鉗子把鐵絲捆在他頭上，還捆上一些爛棉花，然後淋上煤油來燒。整了好幾天，他最後是餓死的。

（注：關於李蓋五之死詳見本書〈焚火之後的大水井地主莊園〉中「李氏家族最後一任族長的命運」和李宗農的講述。）

（六），李盛槲妻子之死

火馬草

李盛槲也是橫石村我們李氏家族的人，但他「解放前」（1949 年前）已經死了。他的老婆姓劉，是嫁到李家屋的媳婦。土改時她 50 多歲，把她抓來鬥打。民兵問她想睡「軟鋪」還是睡「硬鋪」，她想到自己瘦，就回答說睡軟鋪。

農村有一種植物叫「火馬草」，這種草一碰到皮膚就火燒火燎地痛。於是，他們去割了幾背篼「火馬草」來，然後把她脫光，幾叉叉子把她叉到「火馬草」上去，她痛得在上面打滾，那一滾後全身就胖了，腫起來了。接下來他們把她綁起，手腳都綁起，用火鉗夾起「火馬草」，一束一束地往她陰道裡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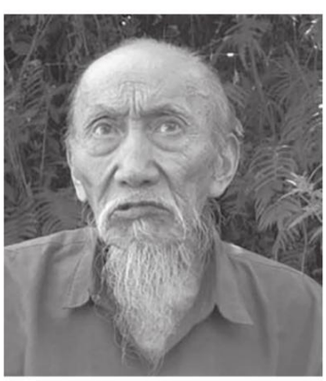
當時沒整死，但是那個鮮血直流。她有一個過繼（抱養）的孫孫，有十七、八歲了，是貧農出身。民兵叫他把她揹回去。在揹回去的路上，她說「我想喝水喲」，她孫孫用角樹葉給她捧了一捧水，她喝了就斷氣了。

（七）、王大湜之死

王大湜是我媽媽王明淑娘家那邊的人，在土祥鎮梅魁鄉。那兒有一個王家大莊（園），那是一個文化集中的大家庭。大莊王家有十弟兄，是兩個媽生的。

大媽是我們李家的子女，是我們的高祖母，嫁過去的。十弟兄中前五弟兄老大，老二、老三都是舉人、老四是拔貢（半個舉人），老五是秀才。

後面五個，老六、老七、老八、老九我記不到名字了，他們都在土改前去世了。土改時只有老么還活著，已經是 70 多歲的人了。他叫王大湜，又叫湜老爺、么老爺。土改時也把他抓來整，那也是用了各種刑罰，一整幾個月呀。他要死之前是這樣折磨的。


李曼講述時

先把他家裡的女人捆好，睡在地上，然後把他捆起，嘴就放在女人的生殖器上。女人撒尿時就要他喝，喝尿。最後把他翻過來，他躺在地上，把他的曾孫媳婦綁起放在他面上。他曾孫媳婦正好來了月經，一股一股的，他們強迫他喝。他喝女人的尿和月經，還多活了幾天。

湜老爺的後人，不知道有幾個，全部整死完了，只剩下一個，跑到黑龍江去了。

對了，就在那個王家大院裡，前後整死了幾百人，好像是 389 人，我寫的書上記得有。書記錄的是我們李家如何發家，土改如何敗下去，有 20 萬字。書被我兄弟拿去了，你現在看不到。

（關於大莊王家，參見本書「他死於『收買人心罪』」一文。）

（八）、母子倆之死

我們這兒，整死的人多，有的一家一家的整死完。就我們洋沱壩，就有一對母子被整死。

「他想喝口奶」

有個小娃娃，把他媽抓來吊起，吊起後，他們把她才滿月的小娃娃抱來，用矛杆子從他肛門戳進去，那矛杆子有這麼長，戳進肚子裡面！這麼小的娃兒，他有什麼過錯？他們把戳在矛杆子上的奶娃舉到他媽胸前，說：「妳看喲，妳兒子來親熱妳了，他想喝口奶。」

他媽也死了，兩個都死了。

問：媽叫什麼名字？

李：媽姓彭，我一下想不起了。

（九）、李先昭全家的遭遇

我叔叔李先昭住在離洋沱壩約 30 里的梅子園，當時與我們洋沱壩同屬一個村——橫石村（現在不是了）。土改時他家收多少擔租？嘿，收 8 擔租！他家還是有好大一壩田，為什麼只收 8 擔呢？因為李先昭也是工商業者，他開得有酒廠，收入不靠田地，所以，農民種他的田最划算，農民交一擔租，自己要得十擔甚至十幾擔。土改時主要是逼他家的金銀。他全家有九口人，除了剛才講的李先昭和他大兒子李載承，還有 6 口人死於土改，他的二兒李宗列也是整死的，但我想不起他的死因了。特別是他的三個女兒，被整得最慘。

（當問到那幾個女兒，也是李曼的表姐妹是被怎樣折磨的，老人不願意談。最後，李曼老人終於開口說了一點。）

那些民兵實際上都是些流氓！共產黨就用這種人，土改時讓他們當了民兵，當了幹部。

他們把他女兒面朝下綁在板凳上，說金子就藏在她陰道裡，他們用手去挖她陰道裡面的金子。幹部也去，民兵也去，一個個跑去輪姦。姦了之後，他們說，這一

下正好來打她的屁股嘛，就派兩個民兵站在兩邊掄起板子打她兩個大腿，把兩個大腿打得稀爛鮮血長流。打了後一看，地上有好大一灘從她陰道裡流出來的精液。

李曼講述時

李先昭的三個女兒中有兩個（李載承的妹妹，李曼記不起名字了）在土改中被折磨死了，那些折磨的手法我就沒有看到了，是在屋裡整的。有一個才 16 歲，是個中學生。李載承的姐姐整殘了，神經失常了，她那年 26 歲。她也沒活多久，一年多後就死了。

他家九口人只剩下一個，就是李先昭最小的兒子，叫李宗沛，當時只有 3 歲。是同情他的人給他一口飯吃這樣他才活下來。李宗沛現在還在，而且還有後代。當年地主子女找不到老婆，他又想傳香火（傳宗接代），後來他找了一個瞎子女人，那個女人給他生了兩女一兒，靠他一個遠房表姐的幫助，他們都上了大學，有兩個還留學國外，有一個還是個博士。

三〉、我的爺爺李孟洋

我曾祖父發家是靠開鐵廠和煤廠，挖煤，此外還搞鹽運，雲陽縣產鹽，他把雲陽的鹽運到下江去。他有四個兒子，我爺爺李孟洋是老大，他分了 90 多擔穀。

爺爺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同秋瑾等人在一起。他畢業以後回來，到成都熊克武手下做事，當時熊克武是四川省的都督。他幹了一段時間，覺得不適應官場，就告病還鄉回到洋沱壩。

李孟洋花屋遺存

我爺爺酷愛書畫，一輩子收藏書畫。他回鄉後修了一幢房子，農民叫花屋，有三層共九間，其中四大間全部用來藏書。他的藏書有七個方面的來源，我一時講不了。我們李家祖傳的書籍主要也在他這兒。他離開成都時，熊克武送他五千銀元，他的同事（也是熊克武的幕僚）又湊錢送了他五千多，軍政府又發給他一萬。他回來後，僅在奉節把他的上萬幅字畫拿去裱，就花了整整一萬銀元。

我曾經給那些書籍編目錄，僅目錄就編了四大本，每本有兩指厚。

他的藏書中很有些大部頭，記得僅《佩文韻府》就有 1800 本。《佩文韻府》是講詞性的，那一個「月」字就占了三本，收集了古人用這個「月」字的情況。《佩文韻府》的序是乾隆皇帝親筆寫的。

字畫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條七、八丈長的白繪綾。白繪綾是日本產的絲織品，完全是真絲。那是我祖父留學日本的一個紀念品，上面有幾百人的題字，最前面的一首就是秋瑾寫的。她的字比其他人的字大。我很喜歡她那個字，所以背下來了，現在我還背得到一部分：

地球面積為舞臺，五色民族各一派，
太素元素作帷幕，精神腦力為器械，
鬥智鬥慧鬥新奇，刁鑽狡獪眾稱快，
或和或戰或悲歡，意態分明演百般，
但知日日登場好，那曉天公冷眼看。
……

問：其他題字的是哪些人你曉得嗎？

李：曉得，以前我全部背得，現在一下背不到了。

當年燒書的地方（洋沱壩），
現利川柏楊鎮水井村

土改的時候，工作組的人，裡面只有一個人識字，說這些書畫是封建毒素，要徹底粉碎封建毒素，因此，天天派人來揹書去燒。

我很心痛，想阻止，結果被抓去鬥打，他們衝我吼：「這些舊意識的東西，這些反動的東西你為什麼要珍藏起來？」所有的書畫都燒乾淨了，前後燒了五、六個月，光紙灰都挑了幾百挑，挑去肥田了。

白繪綾沒有燒，農民沒見過，以為是布。他們把它撕來分了，拿回去縫成褲子，女的穿起來開會我還看到的。

我爺爺死在燒書之後。土改時我家裡已經沒有什麼財產了，爺爺是個讀書人，不善經管，修房子又花了些錢。我爸爸李仲達抽大煙，敗了家，分家到另一個村去了。當時家裡還有一擔包穀，幾擔黃豆，那一年的黃豆好得很。結果把我祖母抓出去吊，他們就把黃豆挑走了，黃豆我一粒都沒吃成。包穀也被拿走了。

他們把我們抓去整主要是追逼金銀。所有的地主都是逼金銀、花紗布匹——棉

花和棉花紡成的紗線。

問：追出些金銀了嗎？

李：哪裡有喲？沒得呀，只是從挖墳裡挖到一小點。但是玉多，都是從墳裡挖出來的。我們家族被挖了幾百座墳，全部挖完。

李家殘存的院子

他們挖苦說，李家墳埋得好喲，請風水先生看喲，結果挖得一個不剩。

土改那年（1951 年）雨多，雪也大。我爺爺被關在一個石房子裡，又凍又餓，餓了兩三天，最後把他丟在一個石頭壘的巷子裡，他就死在那兒了。那是 1951 年的冬天，他 68 歲。

當時我已經被關押在村上的農會裡，爺爺在屋裡躺了幾天後，他們把我放回來埋他。

埋的地方就在我身後那個灣灣裡，叫強盜灣——因為那個灣灣裡的包穀年年都被偷，所以說叫強盜灣。

你想去看？看不到了。他的墳被人挖了。我們這兒認為，母豬病了，要用人骨頭燒成灰來餵，小豬要餵得肥，也要人骨頭去餵。於是有一個人（他的後人現在還在）就把我爺爺的骨頭挖出來去賣錢，治母豬的病。

補記：

洋沱壩地主莊園遺跡

田赤、方國劍、孫孺寫了一本書《大水井古建築群》，其中有關於李孟洋的部分——大水井著名學士李孟洋的命運

李孟洋，1884 年生於李氏八大莊園之一的洋沱壩莊園。1904 年，他自費到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醫學，並一度參加了同盟會，結識了秋瑾、熊克武等著名人士。

李孟洋回國後，曾在好友熊克武（曾任四川督軍）的力邀下出任四川省第一屆議員，但他很快厭倦了官場，棄官歸隱。李孟洋回鄉後，詩書自娛，著有《扶桑求學記》、《嬰育學》、《廉溪詩鈔》、《廉溪雜議》等。

洋沱壩地主莊園遺跡

李孟洋極富同情心，為當地人辦了不少好事。據說，有一年春節，大雪紛飛，李孟洋發現屋前有一個女乞丐躺在樹下，即將臨盆。他急忙吩咐家人打掃房間，生起火爐，然後親自把乞丐請入屋內，為其接生。這一下在族內引起風波，因為當地風俗，不能讓別人在屋裡生小孩，否則會帶走主人的財運，何況那人還是一個髒兮兮的乞丐。族中很多人都來勸阻。李孟洋大為生氣，對他們說：要敗家就敗我這一家，要死人就死我一個人！決不牽連你們。

在李孟洋的精心護理下，女乞丐順利產下一子，滿月後，乞丐執意要走，李孟洋又送了她許多衣物、食品。

九・一八事件後，李孟洋對日本極其痛恨，兒孫輩有想從他學日語的，他即大聲喝斥。

李孟洋曾四處收集珍本善本，收藏有大量的各種書畫，每年夏天，他都要請 20 多個人幫他曬書。他結交的夔州府中學堂洋教習豐田少太朗（日本人，曾在中國生活 30 多年）曾為李孟洋書齋題寫：「櫥有中西百萬卷奇書」。

1951 年土改時，這些書被收繳起來，找來 10 個人專門焚燒，每天燒幾個小時，燒了半年才燒完。焚燒後的書灰，堆滿了一塊田，農民都說書灰是肥田的上等肥料。

據李孟洋後人介紹，李孟洋留學歸來時，篋中有一幅 20 多丈長的白繪綾書畫長卷，上面全是當時留學日本的近百名友好的詩文，第一首詩就是秋瑾親筆書寫的古風作品。這幅珍貴的書畫長卷也在土改時被毀了。

土改時，李孟洋的家業已敗，但有人說李孟洋從日本回來時帶有 70 箱金子，於是逼他交出來，天天組織鬥爭，李孟洋不久就在鬥爭中去世。李孟洋死於 1951 年，享年 66 歲。

採訪時間：2016 年 8 月 11 日、8 月 13 日

地點：湖北省利川市柏楊壩鎮水井鄉水井村

（原奉節縣橫石村洋沱壩）

採訪後記

2006 年 8 月，我到湖北利川採訪當年李氏莊園的土改幹事向賢早先生時，就聽他說，在李氏八大莊園建築中，洋沱壩的雕飾最為豐富。他還告訴我，李氏家族有個著名學士叫李孟洋，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醫學博士，他有很多書，土改時全部被農民燒了。當時，由於向老先生馬上要動手術，只得匆匆結束了採訪，對李孟洋未能詳盡瞭解。

他等了 65 年

十年後，2016 年 8 月，我在製作土改紀錄片《血紅的土地》時，專程到洋沱壩去拍攝外景。

洋沱壩在著名的大水井李氏宗祠下面十多里的地方，比較偏僻，路也很爛。

到達一條小河邊時，我向橋邊一個小屋裡的老人問路。沒想到，這位 88 歲多的老人就是李孟洋的長孫李曼！

老人一直住在利川社會福利院，當天剛好被家鄉的一位朋友接回老家小住。他只比我先到達兩個小時。

我一直覺得，冥冥中一定有神靈的安排。

他彷彿是專程回來等我的到來。他等了 65 年！

於是，——在我早已完成了土改一書的編排，並已經「金盆洗手」之後，我遇到了本書中唯一的一個受盡酷刑而活下來的老地主。

他在他孤寡人生的遲暮之日，用清晰的語言，講述了六十多年前那驚心動魄的一幕！

注一：李曼老人在我採訪他之後 9 個月（2017 年 5 月）去世；

注二：李曼的講述錄影已經編入譚松、丁然製作的九集紀錄片《血紅的土地》。

李曼的老家洋沱壩，也是燒書和上述一些悲劇發生的地方

二、這是人做的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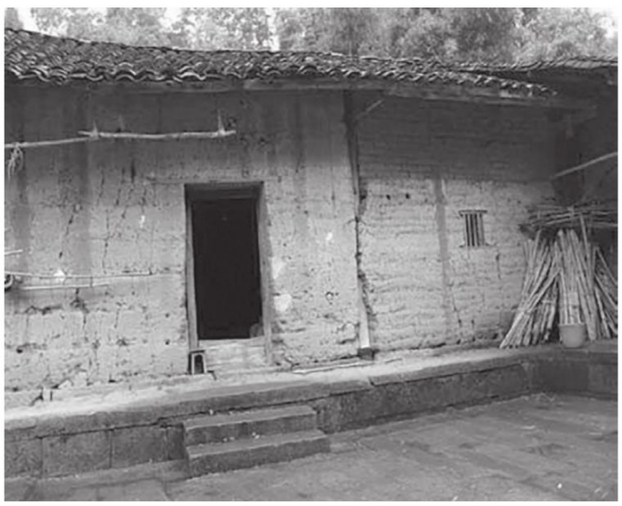
講述人：顏恩統

忠縣花橋鎮魚箭 7 社農民，80 歲

我今年 80 歲，是忠縣縣立中學四班的學生，畢業於 1942 年。縣立中學就是現在的忠州中學。中學畢業後我回到家鄉，那時叫顯周鄉，當時在鄉裡我算是文化比較高的，所以，老鄉們就推選我當了保長，那年我才 16 歲。要是知道後來會發生那麼多可怕的事情，我是絕不會去當這個保長的，其實我當保長的時間很短，沒多久我就去鄉中心校當老師了。

我家有四口人，父親顏洪星，母親王氏，沒有名字，我有一個哥哥，抗戰時上戰場打日本人，去了就沒有回來，死在前線了，這樣我就成了獨子。

我們家田產不多，只有 300 丈，折合不到 3 石糧，其中自耕一半多，出租不到一半。為什麼出租？哥哥死在前線，我又在教書，家裡缺少勞動力，就出租了一部分給人家種。土改時評成分硬是把我們評成地主，活天冤枉啊！按照當時共產黨的政策，要 25 石租才可以評地主，我家就算全部出租也不到 3 石，怎麼是地主呢？但是哪個讓你申辯？他們想怎樣整就怎樣整，說什麼就是什麼。只要有一個人說你是，沒有另外的人反對就行了。我就是這樣成了地主。當時工作隊是西南工作團——從部隊轉業的，對政策搞不清楚，反正聽群眾的。想申辯？你敢！我常常在想，如果真正照共產黨的政策辦事，我們鄉只有韓茂生一個人夠地主資格，其餘一個也不夠，但是我們鄉被評為地主的太多了，槍斃的槍斃，判刑的判刑，管制的管制，連子孫都受盡了迫害，迫害了就迫害了，幾十年過去了，還不是算了。



顏恩統的土屋

我除了被評為地主外，由於 16 歲時當過保長，又被劃為歷史反革命分子，於 1951 年 2 月被逮捕，判刑 5 年，

押送阿垻藏族自治州勞改，刑滿後我留場勞動到 1962 年才回鄉。

土改時的那些恐怖場面不堪回首，提起就難過。

老龍三隊王石泉和王萬木父子二人同時在魚箭灘河邊被槍斃，我被押去「受教育」，其實就是陪殺場。王石泉的罪名是「幹惡霸」，什麼「幹惡霸」，亂栽的。王萬木最冤枉，被槍斃時只有 19 歲，好年輕的一個小夥子喲，他的罪名是反革命。說來太荒唐，他連什麼是革命什麼是反革命都搞不清楚，一個山區的娃娃，哪裡都沒去過，知道什麼革命反革命？鄉裡的工作組把他關起來，問他是不是反革命，他以為「反革命」是個很光榮的名字，就滿口答應是反革命，哪曉得這就要了他的命。等到他知道問題的嚴重性時已經沒辦法了。拔山區的領導對他是不是反革命有些懷疑，派人送信到顯周來，叫暫時不要槍斃他。送信的人走了 20 里山路趕到顯周場，有些累了，就在場上歇了一會，抽一桿煙再趕去魚箭灘刑場，就在慢慢抽完煙走出場口時，聽到魚箭灘上的槍響了，顯周到魚箭灘很近，如果不是抽那一桿煙，王萬木就不會死。

土改、鎮反時殺人宣判

那一次殺了七個人，是何世新主持的，除了王石泉和王萬木父子二人還有王在新（鄉長）；陳俊峰（音）在縣府當過幾天兵，給他安個兵痞的罪名殺了；周定芬是解放前鄉公所煮飯的炊事員，吳家場人，也殺了。當時槍斃人沒有標準，你要喊冤，一句話就把你打回去：「群眾還會把你冤枉了。」「群眾」太可怕了！你要再不服，吊起就打。不倔強「犟」（「jiang」是川東土語，意思是「不服氣」、「對抗」）（不喊冤），還少受點皮肉之苦。

仁和村的顏桂軒在土改時已經 80 高齡了。顏桂軒民國時在縣政府當了 30 多年

的科員，一生清正廉潔，沒有買過田地，只有祖上傳下的幾石租，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什麼劣跡。他寫得一手好書法，經常在縣城獅子壩一家裱褙鋪幫人寫字，人緣很好，人們見到他都友好地給他一支煙。他在城裡謀職，家裡無人種田，就租給別人種，就這樣，土改時也被評為地主。由於他 30 多年都在城裡，家鄉實在找不到他什麼「罪證」，就說他在城裡每天吃人家的煙是嚴重的貪污，30 年算下來就貪污了不少。80 歲的老人，身體已經很衰弱了，還是要弄來反復鬥。

土改酷刑之一：「吊木腦殼」

落雪的寒冷天氣，把他拉來「坐水盆」——就是脫掉褲子按進冰冷的水盆裡受凍受辱。每天沒完沒了的鬥爭，他那麼大一把年紀的人，好痛苦哦。他妻子比他年齡小一些，還勉強能撐住，看見他每天那麼受苦，妻子實在於心不忍，就在一天晚上和他大哭一場後，狠著心把他卡死在床上，好讓他得到解脫，不再受活罪。放哨的民兵發現後趕緊堵住他的屁眼（農民認為人死時氣往下落，堵住肛門就可以不落氣），不要他落氣，還想再鬥他，但是他已經死了。死了好些，少受活罪，當時真是生不如死。

韓茂生是被槍斃的，他妻子何代群被民兵們在光天化日下脫光衣褲按在地上分開兩腿，把一個「包穀球球」（脫粒後粗糙不堪的玉米棒）插進她的下身去反復捅反復轉動，何代群當場昏死過去。這是人做的事嗎？不忍聽聞！把人家男人槍斃了，家產沒收了，還要做啥子嘛？她沒有死，手被吊打整爪（殘廢）了。周武燦的手也是被整爪的，捆的時間長了血脈不通，手怎麼不爪呢。

拔山鄉五星村是冉澤民主持鬥爭大會，他把地主十多歲的女兒褲子紮緊再把黃鱔放進下身去亂鑽，哪個不怕？他還扒光她褲子雙腿分開站在兩個馬凳（木工用具）上用火燒下身，還美其名曰「燒飛機洞」。簡直慘無人道！地主的女兒還沒成年，有什麼罪？這是人做的事嗎！就是那個冉澤民搞的，他是八德鄉人，當時是土改工作隊的幹部。

我被捕後關在拔山區監獄，和我同一個牢房的有一個叫李光榮的人，他是縣中三班學生，比我高一班，任八德鄉小學校長。我看見他腋下有一個很大的傷口，已經潰爛化膿，膿血發出的惡臭我都能聞到。他每天疼痛難忍，當膿血流出時，他就拿碗去接，嚇人啦，膿血多得用碗接。從來沒有人給他哪怕一點點藥，他只有聽任

傷口潰爛。他的罪名也是反革命，這事也非常荒唐。土改高潮時，一個積極分子在他家牆外聽見他和妻子商量：「是綁起來殺？還是不綁就殺？」積極分子據此認定他要殺民兵，就把他劃定為反革命關了起來。而事實的真相是，他和妻子是在商量殺雞，他是個知識分子，不會殺雞，想綁起來再殺可能容易些。事後李光榮百般申辯都毫無用處，那些人對他進行了殘酷鬥爭，李光榮腋下的傷口就是在批鬥會上被他們打的。李光榮居然活了下來，現在還健在。

（關於李光榮的遭遇詳見本書「從小學校長到死緩囚犯」）

那時給地主餵狗屎餵尿是常事。張仁強（顯周醫院退休醫生）給我講過，他的一個親戚，是黃埔軍校畢業的，給他餵狗屎他規規矩矩地吃了，做什麼都忍受了，最後還是把他槍斃了。

我去勞改後，父母沒了兒子妻子沒了丈夫，他們在家受盡了折磨！莫提我父親，不能提，提起我就痛心……父親一輩子什麼壞事都沒做過，也沒當過保長甲長之類，他一輩子就是種田。因為我的關係，1957 年反右運動時，他被活活毒打致死。反右運動是在城市裡針對知識分子展開的，我父親是一個偏僻山區的農民，按理說無論如何也不是鬥爭的對象。但是，自從解放以來，我家鄉歷次政治運動都有一個規矩，就是不論怎樣總要找幾個人來鬥爭才算有成績。找什麼人呢，當然是地主囉，所以我父親每次運動都難逃劫難，反正說他不老實，「老實」已經沒有界限了。反右那年的八月初三，是令我傷心一輩子的日子，那天我父親和妻子同時被拉到大河壩去鬥爭，就在魚箭灘上面的一個竹林旁。所謂鬥爭只不過是一個政治術語，其真正的內容就是毒打，每次如此。你問是哪個動手打死的？群眾啊！是的，「群眾」兩個字太可怕了。負責主持鬥爭大會的是村黨支部副書記顏光普，我本來是他的恩人，他被拉壯丁，跑到我家來躲，我當時是保長，他們家的人給他送飯，我說：「送啥子飯嘛，和我們一起吃就是。」就這樣他才逃脫了拉壯丁。我怎麼不是他的恩人呢，要知道，我親哥哥都是拉壯丁出去死在抗日前線的呀。誰知道「解放」後顏光普翻臉不認人，講起階級對立關係來，把我家往死裡整。他對打手們說：「年輕的還要幹活，顏洪星那個老傢伙留著也沒什麼用了。」意思就是要打死我父親。打手們得到了書記的指示，打

土改酷刑之一：『燒八筒花』——用點燃的香燒地主赤裸的後背

起來就毫無顧忌了，木棒柴塊一起亂打，我父親被打得滿地滾，後來連滾都滾不動了。顏光普看見我父親已經差不多了，才叫我妻子去挽起來。我妻子挽著父親往回走，才走出十幾步，父親說要喝水，水還沒喝完就一頭栽下去，再也沒起來。父親的屍體草草地埋在魚箭灘河邊，沒多久就被山水沖得不見蹤影。

母親和我妻子一起艱難度日，苦不堪言。他們白天勞累，晚上民兵隨時都可以來查哨，讓你無法睡覺。到了秋收好不容易有了點救命的糧食，貧下中農們可以隨時闖到我們家來把糧食搶走，就因為我們是地主，真不知那是什麼世道。三年大饑荒時，母親和妻子什麼野菜都吃，連稻草都磨爛了吃，母親還是沒熬過來，餓死了。

我是 1962 年從勞改隊回來才知道父親和母親慘死的經過，我去找父親的墓地，已經白茫茫一片什麼也沒有了。我放聲痛哭，我對不起父親，身為獨子，連他的屍骨都找不到了。可是，除了痛哭，我還能做什麼？我仍然是一個被管制的地主加歷史反革命，人們依然可以隨時鬥爭我。

聽到妻子說起我去勞改後家裡十多年來的苦難，我真的慶幸我去勞改了，如果我沒去勞改，在家不被打死也要被餓死，總之絕對活不出來，我真的萬分感謝勞改隊，是勞改隊救了我。

同家中那些地獄般的日子相比，勞改隊算得上天堂，我摸著心窩子說句大實話，在勞改隊的 10 多年，是我「解放」（1949 年）後最幸福的日子。

附帶講講勞改隊的故事吧。

我們先是在重慶北碚勞動，後來遠走阿壩州去修成阿公路，我們修的路段在著名的鷓鴣山，海拔 4000 多米，終年飛雪，自然條件非常惡劣。那條公路可能是五十年代我國修築的最艱難的公路，其艱苦程度難以形容。但是，我卻很高興，第一是吃得飽，還有犛牛肉吃；第二是每年都要發冬夏衣服，冬天的棉衣很暖和。就這兩點，在家裡是絕對沒有的。更重要的是，只要好好勞動遵規守紀，就沒有人來鬥爭你，這就少了許多恐怖。勞改隊的指導員是四川達縣人（今達州市），叫張文強（音），那真是個好人，他平常對我們很和氣，從來不對我們耍威風，時間長了彼此熟悉了，我們經常在一起聊天，有時還大膽說些真心話。他總是很善良地提醒我們：「這些話跟我說沒關係，千萬不要去對另外的幹部說，說了要惹麻煩喲！」他工資不算低，但是卻不給

老人在破敗陰暗的土房裡，
守候著生命的最後殘光。

家裡寄錢，說家裡錢多了不好，要窮才光榮。我們缺錢時，他總是主動借錢給我們，我現在都記得，他把手攤開，叫我們自己拿錢，一元兩元隨便，等有了錢再還他。那時一元錢是很值錢的喲。犯人家裡寄錢來都要先由他審查，他從來不趁審查的時候先扣回所借的錢，而是把錢如數交給犯人。犯人去給他還錢時，他卻從來不收，一律免了，說：「我不缺錢，你們的錢來得不容易，自己用就是。」這種人要不是我親眼見了，還真不相信。通過他我明白了一個道理，不論在多麼殘暴的年代，人性中最美好的東西依然會在一些人身上表現出來。後來，張文強調走了，他離開時，我們所有的勞改犯都流了淚。勞改犯都是些經歷過大悲大痛心如死灰絕不輕易流淚的特殊人群，為什麼會一起流淚呢？就是他太令我們感動了，直到現在，我還記著他的恩情。

我老了，身體又不好，我已經預先寫好了自己的悼詞。我討厭現在的風氣，不論生前做了多少壞事的人，悼詞都把他說得很好，從來不說壞。我的悼詞把自己的罪過也寫了進去，我是有罪的人，我的罪不是別的，就是對不起我的父親，

他生前我沒有盡到孝道，他死後我沒有保護好他的屍骨。我有罪呀。

採訪時間：2006 年 5 月 4 日

地點：忠縣花橋鎮魚箭 7 社

採訪後記

80 歲的顏恩統老人住在一間破敗陰暗的土牆房子裡，同妻子默默無語地「守候」著生命的最後殘光。老人受過良好教育，容顏雖蒼老，但眉宇間不乏儒雅之氣。

老人在講述往事時，他妻子一直默默不語地坐在旁邊。從外表上可看出，那是一個受盡了侮辱與艱辛的女人。由於多年的折磨，她雙手已經曲扭，每天穿脫衣服都要丈夫代勞。顏恩統老人說，妻子都是為他才受了這麼多苦，所以，他一定要好好照顧妻子，直到生命的終結。

顏恩統夫婦

補記：顏恩統老人於 2013 年去世；朋友陳先生為本篇採訪出力不少並提供老照片。

三、丈夫，槍殺！女兒，餓死……

講述人：冉德瑜

土改時在四川涪陵清溪場被劃為地主

1922 年生

聽說你在採訪，我外孫女叫我千萬不要說，這輩子整苦了，受了幾十年的罪，還連累了她，不要又惹禍。我練法輪功，他們堅決不准我練，要惹禍，我沒練了。

五十年代的事，我親身經歷不是編造，說幾句又啷個嘛，又把我弄成個啥子派？又把那兩個帽子（地主分子、右派分子）還給我？

我是涪陵礁岩鄉人，出生才 4 個月爸爸就去世了。我讀書讀到初中畢業，在涪陵女中。畢業後我結了婚，父母從小給我們訂的婚，丈夫叫楊澤勳，比我小 1 歲，在涪陵省立中學讀書。

結婚後 10 天，我離開家，到了丈夫家——涪陵清溪場。我在清溪場的南沱中心小學教書。

到 1951 年土改時，我有了四個娃兒，老大 7 歲，最小的半歲，正在吃奶。那個暑假，農會的人要我和丈夫集中學習，丈夫當時也在教書。他們把他弄到區上去，沒要我去，因為我拖 4 個娃兒。丈夫走的時候對我說，我沒得啥子問題，我沒田沒地，肯定不會評成地主。

農會組織開會，先把我評成自由人，第二天叫我站到中農那一堆，第三天又說，妳站到那邊去。「那邊」就是地主成分和地主出身的人。我說，我又升級了，三天升三級。我說這話的時候還沒意識到當地主的可怕。我想，我一無田、二無地，娘屋雖然有幾畝地，但我早就離家了，媽媽在我結婚後幾個月也死了，我一個乾人，算那門子地主！

農民協會劃階級成分，選自《中南土地改革的偉大勝利》中南人民藝術出版社 1953 年 12 月

農會說：「你教書就是不勞動，是剝削階級。」他們來抄家，半夜突然來的，先把我們母子五個從床上趕起來，趕到外面站起，他們在裡面翻箱倒櫃，稍微好一點的東西都要。有一床被蓋，棉絮不好，面子還可以，他們就把面子拆下來拿走。我幾個娃兒衣服都沒穿，冷得哭。我不要命地衝進去，把娃兒穿的那身衣服搶出來。農會那些人挑了滿滿幾擔東西走了。

最缺德的是他們還把屋鎖了不准我們進，我們母子幾個只好鑽到灶房旁邊搭的一個偏棚裡。

（毛澤東早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盛讚了農會的這種「痞子精神」。）

那床農會沒看上眼的破棉絮，是我們那個冬天唯一的被蓋，我給四個娃兒蓋，我晚上不脫衣服，蜷在穀草堆上。棉絮很快就更破了，到處是洞，我連繩線都沒有，用穀草把洞扯攏來。

其實，冷還可以挺過去，肚皮餓才叫惱火。丈夫弄走沒得消息，不准我教書，也不准我外出——農會的武裝人員說，為了防止敵人破壞土改，進出都要通行證。我是地主，不准我出去，一家人沒得經濟來源，我的三女兒就是這個時候餓死的。

那天晚上，她「媽呀媽的」哭叫了一夜。「媽呀，我要吃飯喲，我要吃飯喲。妳去煮飯給我吃嘛。」我說，哪點來米嘛，灶也封了的。她的哥哥姐姐餓了，紅苕藤、糠粑粑都吃，最小的一個還有奶吊倒（即一點人奶吃），只有這個老三，倒大不小，非要吃飯，一晚上都在哭叫，最後她說：「媽，你到奶奶那裡去給我舀瓢水喝嘛。」我說，「恁個晚了，別人門都閂了。」女兒沒有再叫了。天亮前，她死在那個偏棚裡，死時還不到 3 歲。

（這是我第二次聽冉德瑜談到她三女兒的死。第一次是 2001 年 11 月 25 日在長壽湖獅子灘一家飯店裡。那次，當著許多人冉德瑜聲淚俱下，泣不成聲。這一次，她只是默默地抹了抹眼淚。）

我去給人幹活，找的丈夫家一個親戚，我喊她五媽，她家評的是中農。我在她家推磨，天天推到深夜 12 點。她給我半升包穀，我要米，她不給，每天都是包穀。

農會分給我一塊地，叫我種，我不要，我腰無分文，買種子的錢都沒得。農會說，嘿，妳這個人怪，別人翻身，分田分土高興得很，你還不要。所以我說我是個「翻身地主」。（「翻身」指獲得解放，當了主人的意思。）

我們母子幾個身上只有那天夜裡從農會手頭搶出來的這身衣服，沒換的，穿了半年，又髒又爛又臭。說起來不怕你笑，我們全家一身都是蝨子，密密麻麻。咬得沒辦法，我燒一鍋水，關起門，脫光，把衣服放到鍋裡煮，水面浮起一層虱子，我大兒子抓了滿滿一把。我不是亂說，不是加鹽加醋，我只有說漏了的。

有個人看我艱難，悄悄說：「妳出去借點錢來把地種了嘛。」我說：「不給我

辦通行證，我不敢走。」他說：「妳不走大路，晚上走小路。」我照他話做，悄悄跑到清溪場找我三姑。她給了我兩升米，3 塊錢。我拿這 3 塊錢買了蕎子，胡亂種在土裡，咦，長得好得很。我收回來，娃兒不吃，說黑糊糊的是貓屎。我吃給他們看，他們才勉強跟著吃了。

我每天出去幫工，讓兒子照看小的。兒子要出去打柴，妹妹弟弟沒人管。有一天我回來，發現二女兒不見了——被人偷了！我又氣又急又哭，農會不開通行證，我走不出去，到哪點去找嘛！你問娃兒爸爸？他已經不在了！（19）50 年那個暑假他被弄到區上去，我就再也沒見到他。後來我聽我那個妹說，她親眼看見了的——農會把他抓來鬥，說他是反革命。叫一個人上去鬥他，那個人說，楊澤勳嘛，鄉壩頭看到長大的娃兒，從小讀書，平時對人又好，斯斯文文，客客氣氣的。農會不要那個人說了，換一個人上來，新來的人還是這樣說，一連三個人都說楊澤勳是個好人。農會只好不鬥了，乾脆判他死刑。那天殺了好些人。楊澤勳跪在地上，五花大綁，武裝（人員）對著他後腦扣扳機，連扣三槍都不響。楊澤勳扭回頭來看，他們說，他還以為自己只是陪殺場。那個武裝慌了，連連說：「楊澤勳，不是我要你的命喲，不是我要你的命喲。」

農會換了個人上來，還是把他打死了。

（說到這兒，冉德瑜老人突然提高聲音，異常激憤。）

冉德瑜異常激憤

他死時才 28 歲，沒有做過一丁點壞事喲！他從小讀書，後來當個小學教師，說他是反革命就是因為他中學畢業後在涪陵地政科當了幾個月小科員，抄抄寫寫，學校出來的一個學生娃兒，找點事幹就把人當反革命殺了！

我最艱難的日子是那一年春節。哪一年？記不清了。是二女被偷走後的那個春節，大概是 1952 年，大年三十那天，他們派人來通知我，春節 10 天不准出去幹活。我立馬慌了神，家裡一貧如洗，啥子吃的都沒得。晚上我抱了一抱柴、砍成條，大兒子幫我撿，我對他說，明天早上你起來去給別個送柴（即送財的意思），別人肯定會給你點吃的。兒子答應了。

第二天兒子揹起柴，腳剛要跨出門，不幹了。他說：「媽，我不去，別個會說我是叫花子（要飯的）。」我說：「不是去要飯，你去找五媽、三姑他們，他們是親戚。」兒子又往門口走，一到門檻，他腳就抬不起，硬是邁不出去。

扯了四、五次，他哭起來，要我去。我說，你娃兒去要好些，我是個大人。他

還是不去，我氣不過，一把抱過柴來說：「好，好，我去！我去！我出去就不回來了。」兒子一聽，駭得大哭，他撲過來把我吊倒，「媽！媽！你一定要回來！」

（冉德瑜老淚縱橫，邊哭邊說。）

我對兒子說：「你看到家裡沒吃的，要想餓死呀？那個老頭子叫我嫁給他，有飯吃，你要不要媽嫁？」兒子說不要，但他還是邁不出去，最後還是我去的。五媽他們給了糖、湯元和糍粑，把柴也還給我了。

那 10 天是我一生中最恐慌的日子，我一輩子的苦難加起來都不抵那 10 天，兩個女兒已經沒了，剩下兩個兒子不能再餓死。快點過呀，快點過呀，過了年好出去做活。到第 10 天的晚上，我扯起喉嚨對著外面喊：「你們想把我們母子餓死，不得行！我們活過來了，沒有死！」

孫女叫我不要說，我給你說了，這是我的親身經歷，我沒說一句冤枉話，沒有冤枉共產黨，我只有少說了的，說漏了的。

打死我丈夫的那幫農會的武裝（人員）中，有一個叫彭癩子的人，這個人以前不務正業，遊手好閒，乾聊子（窮光蛋）一個，討不到媳婦。進了農會後，他神氣了，揹桿槍到處走。他看上了我，託人來說。我氣得發昏，吼起來：「把我男人整死了還想來要我？！」有一次開會，別人又說這事。彭癩子嘻皮笑臉地說：「咦，我有這個福氣呀！」我霍地一下站起來，當場衝著他說：「你看好了，你是貧下中農，我是地主，你站在啥子立場？」

他後來把田分來靠到我的田，揹桿槍走來走去想欺負我。人到這份上心也橫了，我不怕他，跳起來和他鬥，我說你敢一槍把我嘣了？他沒有占到便宜。

我種不出來糧食，交不了公糧，上面來的工作組找我問原因，我把情況原原本本給他們說了。我要求出去找工作，求他們幫忙開通行證。工作組的人同意了。彭癩子還想卡我，想強迫我嫁給他，但工作組的人點了頭的，他攔不住我了。

我打算到重慶一中去找冉淑芳，她是我姑姑，又是我女中的同學，她讀了大學，在一中教體育。我沒得錢，一個親戚給我買了張船票。我把小兒子託付給我表嫂，她也是個地主，大兒子交給祖外婆。大兒子非要跟我走，他說他去幫人帶娃兒。我說，多一個人要路費，媽的路費都是別個給的。我硬把他留下來，他哭得傷心得很。

我坐船到了重慶，不曉得沙坪壩在哪點，有好遠，邊問路邊往沙坪壩走，走到化龍橋的時候天黑了。我覺得前面迷迷茫茫，走一段，看到前面是山，沒人，我又折回來。走投無路的感覺啊。後來我寫了一首詞，讀給你聽：「涪山青，渝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鄉情。娘淚盈，兒淚盈，骨肉分離娘斷魂，淚海心難平。」

我身無分文，在化龍橋找了一家理髮店，問他們要不要打工的。那個老闆打量

了我一陣，把我收下了。我在那家理髮店幹了半個月，老闆看上我了，他死了老婆，想娶我。我不願意，想到在鄉下的娃兒。離開的時候，老闆給了我一個月的工錢，還說，要是沒辦法，可以再回去。

我在一中找到姑姑冉淑芳，我住在她那點，去報考了速成師範學校。等通知的時候，我想娃兒想得要命，忍不住要回去看。姑姑說，你走了，通知來了啷個辦？先把娃兒放一下。我說，不得行，放不下。

再說說我大兒子。我走後他失魂落魄，經常跑出去漫無目地找我。有一次他走了很遠，到了一個親戚家，要他們幫著找媽媽。那家親戚沒有理他，只給了他兩個燒紅苕就叫他走，他哪裡還走得回去？他一個人在外面一個草堆堆裡過了一夜，他一個娃兒，不怕？他肯定要哭嘛。

大兒子開始發昏病，路也走不動了，一個多月時間，身子垮下來。

我回到鄉下，大兒子一看見我，高興得不得了！他說：「媽，你回來了？」

我說：「我來接你，帶你出去。」他立馬活起來，病也好了。我本來找了個人揹他，講好揹到河邊兩塊工錢，結果路上他不要人背，活蹦亂跳走得上好。早曉得我不花那兩塊錢，但別人跟倒走了一趟。

在船上我給兒子買了一碗飯，兒子說：「媽，妳呢？妳也買一碗。」我說我心頭不好，不想吃。我哪裡是不想吃嘛，我餓得發慌，沒得錢哪！5 塊錢還是女中的同學楊昌仁（音）給的，已經用了兩塊了。

（冉德瑜淚水又滴下來）

我帶兒子到了一中，兒子破破爛爛，長一頭癩子。姑姑說，這是學校，別人看得你這個癩子兒哪？她拿 6 塊錢，叫他到外面去住。

兒子到段上去錘石子，每月 5 塊錢，段上補助一塊，總算有了口飯吃。

這個時候，我聽人帶信來說，我寄放在表嫂家的小兒子滾到茅廁（廁所）裡去了，幸虧茅廁是新修的，糞不多，他在裡面叫，才把他撈上來。

我一聽，又往涪陵趕，我已經丟了兩個女兒，兒子不能再出差錯。我回到鄉下，把小兒子揹到重慶。姑姑吵我：「妳工作都沒得，慌慌張張把娃兒一個個弄上來，找些包袱。」我說：「妳那些娃兒生下來又是親爹媽，又是請奶媽，我們都是當媽的。」

這個時候，速成師範的通知來了。姑姑說：「妳看嘛，妳啷個辦？」我沒得辦法，只好又把小兒子送回去。在涪陵的時候，遇到一個親戚，她說，妳不要回去，送回去娃兒可憐，河邊有個船工沒得娃兒，一直想收養一個，把兒子給他算了。

我猶豫了半天，同意了。那個船工姓張，兩口子很喜歡娃兒，立馬給娃兒做了兩套新衣服，還親親熱熱地抱他。他們要我寫個手續，還要我去把兒子的戶口辦來。

同兒子分手時候，他哭著對我說：「媽媽，你要來接我喲。」送了小兒子，我回到重慶，進速成師範讀書，師範是供給制，吃飯不要錢，還發點生活用品。原先說讀一年就工作，後來說太快了，再讀一年。我找校長要求工作，我說我有娃兒，經濟困難。校長不同意，我只好又讀，這一讀，就讀到（19）57 年鳴放。

鳴放我一句話都沒說，到尾聲了，積極分子非要我發言，他們說：「妳不幫助黨整風呀？妳不發言，政治上想得 2 分？」我說我沒得啥子說的，他們引導我：「妳從農村來，經歷過土改，妳是啷個出來的，妳看到的聽到的都可以說。」

我於是說了我土改時聽說的一件事：有個富農後來評成地主，他害怕，上吊自殺了。有人去找他開會，推開門，看到死人，駭慘了。他們還要我說，我就說到我三女兒，一提到她我就哭了，我邊哭邊說，她土改期間餓死了。

他們批鬥我，說解放後新社會哪有餓死人的？妳污蔑造謠！我哭著說：「是真的嘛，我的親生女兒，不信你們去瞭解嘛，又不遠。」

給我定了個罪——「攻擊黨的土改運動」，又給我戴了一頂帽子——「右派分子」。

在去南桐農村勞動改造的路上，我邊走邊哭，身上一分錢都沒得，別個還可以買些生活用品，我走這麼遠，又擔心娃兒。帶隊的人問我為啥子這麼傷心，我說沒得經濟，生活啷個辦，還有娃兒。他說，沒得關係，有組織，要我依靠組織。

我在南桐農村，老老實實地勞動。一中有個姓高的老師也來了，他說我大兒子在他家裡帶娃兒，現在不需要了，是不是把兒子送到南桐來。我趕忙求他：「高老師，你幫人幫到底。你看我這種情況，這個大山坡坡，娃兒來做啥？」

高老師找人把我大兒子介紹到 8 中校辦工廠去做活。後來他一直在那點幹，直到前幾年退休。

1961 年我們全體轉到長壽湖，在長壽湖遇到李長文，我們結了婚，這些你都曉得。

我說說找我二女兒的事，就是被偷走的那個，她被偷時才 4 歲多，我去找時已經過了快 20 年。長壽湖漁場給我打了個證明，我出去沒走多遠證明和錢都被小偷摸了。第二次又去。我女兒就是我們那一帶的人偷的，這我曉得，有人給我說，那家人姓夏，他們偷了後還在清溪場住了一個星期，看我找不找。

我從那個溝溝問進去，挨家挨戶的問起走，我只曉得那家人姓夏，住哪點不曉得。最後有個人說，夏家當年是弄了個小女娃回來，現在那女娃都結婚了，就在對門斜坡坡對面。呃，那不是，田頭幹活那個就是你女婿！

我趕忙走上去，對他說，我是他女人的親媽。女婿聽了，叫人去喊我女兒。不

一會，來了一群女人。有人喊:「夏渝碧，你親媽來了。」我認不出她，她也認不出我，我二女叫楊雲霞。我喊「雲霞，雲霞。」

女人堆有一個大肚子孕婦走上來，我看她長得像我大兒子。她叫我一聲「媽」。我們兩個抱頭痛哭。

隔壁一個女的跟著哭，她也是被偷來的，她邊哭邊說：「我還不曉得我親媽姓啥子。」

有的人說：「你找到女兒就把她弄走嘛。」我當然想，我要弄走有理由，是他們硬給我偷走的。但是她已經不是一個人，正懷二胎，當月就要生。她幾兄妹東一個西一個，死的死，送的送，苦得很。她再苦嘛丈夫娃兒在一堆，何必再把她家扯散。農民就農民，幹活吃飯平平安安就好，何必非弄個城市戶口。別人說我開通，我說我嚐夠了分離的苦，再說她沒讀過書，出去怎麼辦？

其實，我二女小時候特別聰明，兩歲多就能認 300 多個字。她被偷到夏家後，那個男人另外娶了老婆。她跟夏家的奶奶生活，從小就幹活，去給別個帶娃兒，挨了好多打，她命苦得很。不過，後來她的兩個娃兒都從農村弄出來了。

（叫冉德瑜不要接受我採訪的就是其中一個女兒。）

二女兒送我到長江邊，我們在船上又抱頭痛哭一場。

對了，還有我小兒子，七十年代他帶著女朋友來長壽湖找我。別人給他說長壽湖是個勞改農場，他以為有鐵絲網，有哨兵。我見到他，一眼就認出來——他同他死去的爸爸長得一模一樣。

在長壽湖，我也差點被整死。盧蘊伯就死在我眼前，我只差一點就步她的後塵。回想這一輩子，我不曉得啷個活到今天的。幾十年都在罵自己「我是地主、我是右派，我要好好改造」、「我有罪」、「我有罪」。

我說給你聽的都是我的親身經歷，沒亂編一句，你看，我的罪在哪點？回想這一輩子，我寫了首打油詩，算是總結：

兩口小教無寸土，錯劃成分成地主。
夫含冤死子女散，我落荒村思骨肉。
地雨右風廿七年，廿七於我一家苦。
忍認他鄉作故鄉，青絲紅顏老江湖。

注：①「兩口小教」指冉、楊兩個小學教師

②「地雨右風」指地主、右派

採訪時間：2002 年 6 月 13 日

地點：長壽湖農場子弟中學

採訪後記

冉德瑜老人是我在採訪重慶長壽湖右派時採訪的一個「雙料分子」——即地主分子和右派分子。

做為前者，她被整得家破人亡；做為後者，她被發配勞改 20 年。

做為地主，她是一個沒有一寸土地的「剝削階級」；做為右派，她的罪狀是說了：「女兒在土改時餓死。」她的經歷，我已經收在了長壽湖右派採訪錄中，此書本不應再次收入。但老人的苦難集中在土改，她和她一家的全部不幸主要是因為土改。

想來也是，再加上眼下實在是難以找到還活著的老地主，於是，只得冒重複之嫌，將她收錄在此。

與冉德瑜有間接關係的幾名土改受難者：

一，**熊異能**——重慶北碚區回龍壩人，地主，1949 年前擁有一座雕龍砌鳳的大莊園。1950 年減租退押時，農會要他交出「金煙桿」（黃金做的煙桿）等黃金製品。熊異能交不出來，農會將一個鐵皮爐子裡面裝上燒紅的炭火，捆在熊異能的背上，名曰「揹火背兜」。待熊的背烤爛後，又用楠竹抽打，熊異能被打死。

二，**熊異能的母親**（姓名不詳）遭受同樣刑罰，與兒子同時遇難。

三，**李德珍**——熊異能的妻子，她也遭受「揹火背兜」刑罰，但未遭楠竹抽打，因此得以死裡逃生。

土改酷刑之一：『揹火背兜』

注：「揹火背兜」的刑罰在川東土改中大量使用。

補記一：冉德瑜的講述錄音被重慶市國家安全局抄家時搜繳（2002年7月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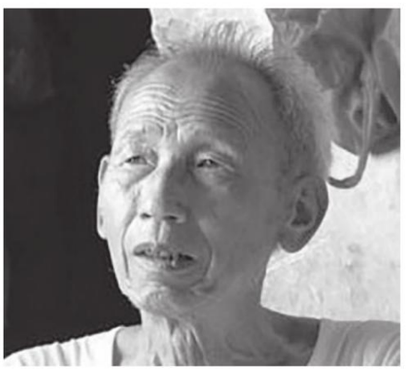
補記二：冉德瑜老人於 2013 年去世。

第二章

「聽他們講那過去的故事」

他們不是共產黨豢養的作家、藝術家，他們不會創作，更不會編造。

他們是平均年齡在 80 歲以上的老人。他們在生命殘留的最後時光裡，講述了各自所親身經歷的一段往事。



一、一個當年地主放牛娃的講述

講述人： 古昭永

奉節縣吐祥鎮農民，1936 年生

我父母都死得很早，父親死時我才 7 歲，母親死時我才 12 歲。我成了孤兒，於是到一個地主家去放牛。土改時劃成分，地主家的長工劃為雇農，我本來也應當劃為雇農，因為我也在地主家幹長工，但我年齡小，於是給我劃的成分是孤兒，也給我分了土地。

我分的是地主王當福（音）的土地，王當福是我們吐祥鎮的一個大地主，有 800 多擔（穀子），而且他還有很多金銀。土改時沒槍斃他，原因是他早早地就把所有財產全部交出來了。我記得當時專門找人抬起他的金銀、金磚、金馬兒，在吐祥鎮遊街展示。他因此被評為開明地主。

土改時工作組來動員，就說：「他這麼大的地主，沒有挖苦（剝削）你呀？你種了糧往他屋裡挑，他吃你的血汗，你還沒得仇恨呀？」假如你沒去鬥爭，就來一些人強迫你去揭發，否則你就走不脫。那個時候又不講什麼實事求是。

問：你給地主當長工，恨不恨他？

古：我一個孤兒，他收留了我，讓我肚子吃飽了，我還恨他？我恨他幹什麼？根本就不恨。

還有，我在地主家幹過幾年活，親眼看到他們的生活。那時地主生活沒有現在一般人生活好，很難找到吃白米飯的地主。比如，我們對面山樑子上有一個姓謝的地主，我們去挑他賣的包穀，在他家吃飯，要把紅苕吃完了才能吃面面飯（碎米飯）。我在他家看到，吃紅苕他家不削皮、不削苕蒂，如果你把皮子和苕蒂放在桌子上，他來看到了，一把抓起就吃了。很多地主都省吃儉用，要存錢買田。

鬥地主我也看到的，那個時候把地主、富農整得很慘，比如跪在碎瓷渣上，膝蓋鮮血長流，如果地主想輕鬆一點把屁股坐在腿上，那些「二杆子」就上來在他們屁股後面塞皂角刺，刺得他屁股血直流。

問：什麼是「二杆子」？

古：「二杆子」就是當時農村那種「爛人」，這種人大多是地痞流氓，他們下

得了手。土改主要就用這種人，叫作「積極分子」，工作組就發動這些「積極分子」鬥地主。

當時我們這兒有個叫王必輝的人，40 多歲，給他劃的成分是破落地主，我很清楚他的情況，家裡實際上很窮。土改時就在現在我們旁邊那個大屋裡鬥他。怎麼鬥呢，受刑，「猴兒搬樁」。在地上立一個樁，木樁上面破開，把他抓來跪起，兩個大拇指緊緊捆在木樁上，捆緊後就在破開的木樁上加楔子，然後用錘子砸楔子，你拇指受得了？這就叫「猴兒搬樁」。

「猴兒搬樁」，又叫「吃咂酒」

王必輝是個很善良的人，我不忍心，跑去問：為什麼要這麼整他，他是個「天良」人（大好人）。整他的人說，聽說他有兩條槍。其實他根本就沒有槍，被冤枉整。王必輝後來又被抓去勞改，勞改回來後就死了。

當然，地主中也有仗勢欺人的人，舉個例子，官家灣（音）有家地主，他家的馬到坡上吃你的包穀、麥子，你不敢趕，趕了你就要挨打，這種地主就惡劣。

土改時他家三弟兄都被槍斃了。

也有好地主，比如，我們這兒有個地主，看到他附近的農民家裡困難，叫大師傅把飯煮起叫他們來吃。

問：槍斃人你看到過沒有？

古：看到過的，多的是！

朝陽鄉的陳可全（音），他娃兒叫陳光武（音），在縣裡讀高中，土改把他抓回來在朝陽鬥爭，群眾呼口號：打倒惡霸地主陳某某。陳光武說，他只是一個學生，不是惡霸地主。他還說了句：「農協會才是惡霸地主。」硬是把他槍斃了喲！槍斃時他才 18 歲。

剛解放時，錯槍斃了好多人，把名望大一點的基本上都殺了。那時有個口號是這樣提的：「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漏掉一個！」那時整得過火，我沒文化，不曉得這是毛主席的政策還是下面亂整。

從那個時候起我就覺得，很多事都不講實事求是。

就說劃成分吧。

地主有大地主，惡霸地主，破落地主。大地主就是你的田地多，但人有天良（善良），惡霸地主主要是為人惡劣，不在於田地多少。我們這兒上了四、五十擔穀的、或者出租 25 擔的就劃為地主。當時十斗一擔，穀子一擔是 350 斤，包穀一擔是 500 斤。

富農有自耕富農和佃富農，自耕富農就是自己有田地，自己耕種，劃成地主又差一點；佃富農是自己沒得田土，佃（租）種別人的田地。我們這兒像姚文昌（音）他們，就是佃（租）別人的土地，也劃成富農。

如果田土不多，佃（租）給人家耕種，就叫小土地出租。

租了人家地，租得不多的，劃為貧農，貧農還分自耕貧農，成分比租種人家地的貧農高（「高」，就是成分是沒有後者好）。

租種了二、三十擔的，劃為下中農，如果租種了四、五十擔穀的，生活比較好的，就叫上中農。上中農後來又劃成富裕中農，富裕中農後來又都劃成了富農，叫漏劃富農。漏劃富農就是說，當年劃成分的時候，沒劃成富農，劃成了富裕中農，後來給他補劃成富農。

為這事還逼死好些人，我們這兒好幾個都是這樣。富農遭罪呀。土改後，人們都看到劃成地主富農後的可怕，政治上，每個運動都逃不掉。我們這個大隊（楊柳大隊）的段世明（音），土改時給他劃的是富裕中農，後來要劃他為富農，他嚇得自殺了。白蘭園的劉慶輝（音），就是劉志和的父親，要把他打成富裕中農，他一刀割了脖子很大一個口子，但沒割到氣管，他沒死，變癡呆了。

毛澤東的政策哪有你漏掉的，沒得一個逃得掉。一個地主富農都逃不掉。

我馬上到 80 歲了，體會最深的就是那些年不能說實話，你要實事求是，就要搞你的右傾。比如，有個人把牛的舌頭割了一截煮來吃了。這還得了！「新橋大隊殺活牛吃！」吳芝國副支書去調查後說，不是活牛，他割的是死牛。他說的是實話，結果區委書記下令差點把他打死。

辦公社食堂那年我是生產隊長，「反右傾、鼓幹勁」在我們大隊開會，一共開了七天，我六天沒有說一句話，後來工作組、大隊的幹部問我為什麼不發表意見，不發表意見就脫不了身，要向我頭上開刀。最後我只得對搞大伙食團還是搞小伙食團發表了一點看法。

毛主席大搞人民公社伙食團時餓死的人很多，我們這兒的留蘭大隊有個石兒坑，只是那個坑就埋了四十多個人，餓死了的人埋都沒人去埋，因為活著的人都沒得力氣，自己都性命不保了。當時用條繩子栓住脖子，拖到那兒推在坑裡就完了。我們那邊龍泉壩子就餓死了三、四百人，我啷個曉得？我那個時候就在這兒當生產隊長。我們家就餓死兩個，我奶奶和我二伯伯。我前面講的那個把所有財產都交出來的開明地主王當福也沒活出來，他在公社伙食團時餓死了。

當時搞人民公社集體食堂，不准任何人自己煮飯。家裡鍋灶都毀了。我大舅母餓得不行，扯點野蔥，撿了幾個小洋芋，撿一個罐罐子，用幾塊磚和石頭架起煮。

煙子冒起來，被人看到了，大隊書記王物生跑來，兩腳就把罐罐子踢翻了。

那個年代，提心吊膽，就是貧下中農說話不小心也危險。我舉個例，我們吐祥鎮的冉須龍（音）是個老長工，在吐祥軍委會當代表，他同我一樣，也是一字不識。大鳴大放開會，發表意見，冉須龍說：「我們這個吐祥壩不叫吐祥壩，應當叫豬屎壩。往年（解放前）區政府、鄉政府還管一下衛生，解放了街上到處都是豬屎。現在的政府只是坐著拿錢，不管事。現在看來，這個管理上，還不及國民黨。」

他說了實在話，街上確實到處都是豬屎。結果把他判了五年徒刑。

這就是說，在毛主席手上，實在話不能說，只能說他好。

採訪時間：2016 年 8 月 1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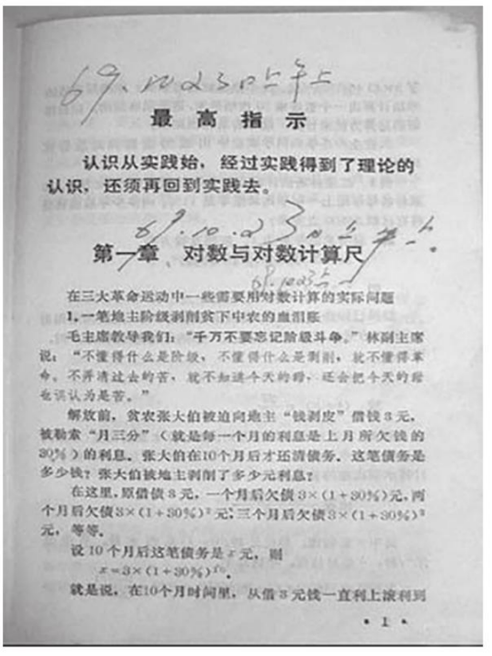
地點：奉節縣吐祥鎮

採訪後記

在製作土改紀錄片《血紅的土地》時，到三峽庫區拍攝外景，行到奉節吐祥鎮時，經一位朋友介紹，見到了古昭永老人。

老人曾經在「舊社會」給地主放過牛，又在「新社會」當過人民公社的生產隊長。這一輩子，他體會最深的不是「地主剝削壓迫」（他至今根本沒這個意識），而是在「毛澤東時代」不敢說一丁點實話（否則就將大禍臨頭）。他說，那些年他看得多，也聽得多，他自己也因為說了一句實話被撤銷了隊長的職務。

「幸虧我出身好，沒被抓去勞改。」他說。



最 高 指 示

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

第一章 对数与对数计算尺

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一些需要用对数计算的实际问题

1.一笔地主阶级剥削贫下中农的血泪账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林副主席说："不懂得什么是阶级，不懂得什么是剥削，就不懂得革命，不弄清过去的苦，就不知道今天的甜，还会把今天的甜也误认为是苦。"

解放前，贫农张大伯被迫向地主"钱剥皮"借钱3元，被勒索"月三分"（就是每一个月的利息是上月所欠钱的30%）的利息。张大伯在10个月后才还清债务。这笔债务是多少钱？张大伯被地主剥削了多少元利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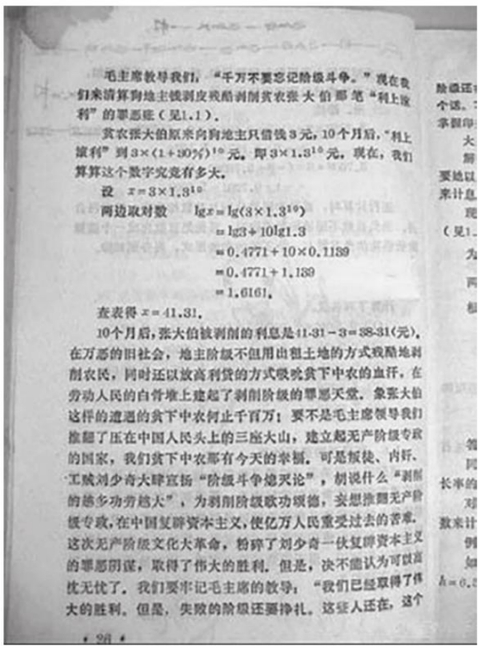
在这里，原借债3元，一个月后欠债3×(1+30%)元，两个月后欠债3×(1+30%)²元；三个月后欠债3×(1+30%)³元，等等。

设10个月后这笔债务是 x 元，则

$$x=3\times(1+30\%)^{10}.$$

就是说，在10个月时间里，从借3元钱一直利上滚利到

• 1 •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现在我们来清算狗地主钱剥皮残酷剥削贫农张大伯那笔"利上滚利"的罪恶账（见1.1）。

贫农张大伯原来向狗地主只借钱3元，10个月后，"利上滚利"到$3\times(1+30\%)^{10}$元，即3×1.3^{10}元，现在，我们算算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

设 $x=3\times1.3^{10}$

两边取对数 $\lg x=\lg(3\times1.3^{10})$

$=\lg3+10\lg1.3$

$=0.4771+10\times0.1139$

$=0.4771+1.139$

$=1.6161.$

查表得 $x=41.31.$

10个月后，张大伯被剥削的利息是41.31－3＝38.31(元)，在万恶的旧社会，地主阶级不但用出租土地的方式残酷地剥削农民，同时还以放高利贷的方式吸吮贫下中农的血汗，在劳动人民的白骨堆上建起了剥削阶级的罪恶天堂。象张大伯这样的遭遇的贫下中农何止千百万；要不是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贫下中农那有今天的幸福。可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大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为剥削阶级歌功颂德，妄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使亿万人民重受过去的苦难。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一伙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决不能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

• 28 •

当年我們的數學課本

二、這幾十年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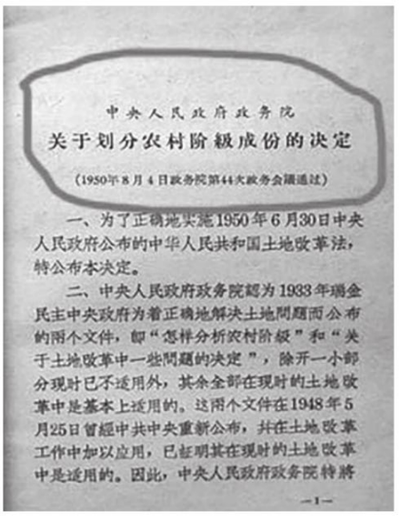
講述人：黎民書

1932 年生

在我老家的那個鄉，僅我知道的就有近 10 個地主、鄉長、保長被殺了，其中包括我哥哥黎定鎬。

我是重慶巫山縣大昌鎮白果鄉人。解放前家裡總共有十來畝田土，一年下來，除了吃飯，只有一點點剩餘。記得那時不能頓頓吃米，還得吃很多雜糧。

我父親黎華章是個非常重視教育的人，對兒女管教很嚴，我 5 歲時他就勒令我雞一叫就起床讀書。我哥哥和我都先後外出讀書。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关于划分农村阶級成份的决定

（1950年8月4日政务院第44次政务会議通过）

一、为了正确地实施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特公布本决定。

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認为1933年瑞金民主中央政府为着正确地解决土地問題而公布的兩个文件，即"怎样分析农村阶級"和"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問題的决定"，除开一小部分現时已不适用外，其余全部在現时的土地改革中是基本上适用的。这兩个文件在1948年5月25日曾經中共中央重新公布，并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加以应用，已証明其在現时的土地改革中是适用的。因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特將

—1—

家裡缺勞力，父親請了兩個幫工，其中一個是我們的親戚。由於我家田土不多，日子也過得清貧，因此土改時最初給我們評的「階級成分」是中農。

沒過多久，給我們評為富農，緊接著又評成地主，待那個幫工揭發說我父親脾氣不好時，又把我家評為惡霸地主。

慶幸的是，我爸在 1949 年 10 月去世了（媽去世得更早），否則，他肯定要被共產黨槍斃。

但是，我哥哥沒有逃脫。

我哥哥是我們鄉裡有名的「秀才」，奉節縣中學當時是屬於省管的四川省第四中學，他在那兒讀完了初中。我家鄉位於小三峽深處，十分偏僻落後，出一個讀過省府學堂的初中生就是鄉裡的大知識分子了。哥哥畢業後先當小學教師，後當小學校長。由於鄉裡缺文化，鄉政府裡的人常常讀不通上面來的公文，於是把哥哥找去當了鄉長。

當時的鄉政府機構很小，一個鄉長，一個副鄉長，兩個幹事，兩個鄉丁，一個炊事員，總共七個人。還有，那時沒有多少人想當鄉長，不像現在，人們也不把鄉長當成一個什麼官員，任期也比較隨意，幹幾天，不願幹走人就是。我哥哥沒幹多久就離開了。幾年之內，先後有何瓚、鄭度之、盧增輝、陳子明等人當過白果鄉的

鄉長。

共產黨來了，不分青紅皂白，凡是當過鄉長的，殺！我哥哥、連同前面提到的那幾位，全部被殺了。那個鄉政府的炊事員黎定武，後來當了白果鄉第八保保長，也抓來殺了。他們那一批五個人，押到白果鄉那個大樹林下槍殺。最冤的可能是陳子明，他是巫山縣中學的學生，畢業回鄉教書，1949 年快「解放」了才當幾天鄉長，他被抓到大昌鎮殺害。

白果鄉唯一倖存的是副鄉長馬少元，他沒有什麼文化，平時又不愛說話，這使他得以倖免於難。

其實，當時的鄉長權力並不大，不像現在的鄉長，飛揚跋扈，威霸一方。還有，當時當鄉長的都有些文化，是當地的文化人。我比較兩個社會，兩個政府，那時的鄉長不像現在的鄉長，吃喝嫖賭，草菅人命。我哥哥沒幹過任何壞事，更沒有殺人放火，殺他只有一個理由：當過國民黨的鄉長。所以，哥哥死前很不服氣，說：如果共產黨早一點來，如果也需要找個文化人來當鄉長，那我就會是共產黨的鄉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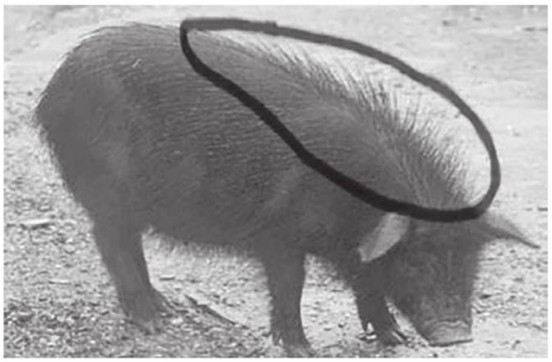
我沒有目睹哥哥遇難，當時我在重慶讀書。幾年後我回鄉，哥哥的女兒黎淑林告訴我說，哥哥死得很豪氣。關押期間，何瓚他們幾個已經駭得吃不下飯，只有哥哥照吃照睡，還叫女兒送點肉來吃。行刑那天，那幾個人渾身打抖，盧增輝嚇得癱在地上，哥哥面不改色，堅決不跪，只盤腿坐在地上，還扭頭對殺他的人說：「夥計，照顧點，今後我們還要見面。」

我是因為在外面讀書逃過一難，否則，做為惡霸地主的兒子，又有文化，我肯定要遭殺頭。那時，殺個人簡單得很，共產黨的鄉政府就可以隨便定一個人的生死。

我逃脫了，但留在家裡的姐姐黎瓊瑤就遭罪了。土改隊的人強迫她交出「洋錢」——大洋。姐姐交不出，一次一次的暴打。姐姐忍受了一切，包括吊起來灌辣椒水。

但是，最後她終於忍受不住了。怎麼忍不住？我姐姐才 20 出頭，還沒結婚，他們把她衣服扒光，用豬鬃從她乳頭的細孔裡扎進去……姐姐當天就跳了堰塘。

（注：我後來在一篇談酷刑的文章中讀到關於用豬鬃戳乳頭的情況：「豬鬃戳乳頭這種中國特有的酷刑則不同，豬鬃刺入受難女性的乳頭後，因特殊的彈性使其能夠順著乳管彎曲，並不真正刺傷神經叢，而是靠撥動神經來給受難女性造成劇痛和難耐的神經刺激（與鋼絲刷刷腳心類似），這樣乳房內的神經叢在產生劇痛時卻未沒有永久性損傷，受難女性的乳房不會因多次受刑而降低



其敏感度，她在這種酷刑下要忍受複合性的痛苦而難以昏迷。」——《酷刑綜述》作者：李尋）

但她沒死，被人發現救了起來。1956 年她結了婚，丈夫姓吳。沒幾年，大饑荒來了，姐夫餓死，姐姐活不下去，揹著幼子逃往神龍架的大山，住在岩洞裡。

她後來餓死在那兒。

再談談其他人的情況。

黎華舉是我們鄉裡的一個私塾先生，也是我的一個遠房叔叔，靠教書為生。

我從小受他影響，最喜歡聽他講《三國演義》和《封神榜》。他只有很少一點土地，自己耕種。我們那地方窮，黎華舉也窮，根本請不起幫工。就因為那一點土地，就把他劃為地主。他 50 多歲的人了，眼見那個殺地主的恐怖，嚇破了膽，自己上吊死了。

另外被殺的兩個所謂地主叫黎心安和黎華敬，他們是兩兄弟。兩人被抓到大昌鎮槍斃。1981 年我右派平反後，專程回鄉，見到了這兩兄弟的遺孀，60 多歲的老太婆了。我叫她們陪我出去走走，她們不敢，心驚膽顫，說自己是地主家屬。

我看她們那個樣子，心中很感歎，土改都過去幾十年了……

還有一個叫黎華之的人，他是我的一個親戚。此人講義氣，豪爽、心腸也好，愛打抱不平，人們有糾紛都找他調解。解放後本準備把他當惡霸殺了，不料他曾救助過一個窮愁潦倒的人，這個人是個地下黨，解放後當了共產黨巫山縣的官員，他報黎華之的救命之恩，叫他躲在家裡絕不要出門，更不要多說話。

黎華之於是幾十年不出門！

1981 年我去看他時他已 80 多歲了，他看見陌生人上門叫他名字，驚得說不出話，那副恐懼的面孔給我很深的印象。後來，聽到我用家鄉話報出我的小名，他撲通一聲跪倒在我面前，涕淚滂沱地說：「我這幾十年的日子呀……」

採訪時間：2005 年 5 月 26 日

地點：重慶大坪九坑子

採訪後記

黎民書 1957 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重慶長壽湖勞動改造近 20 年。筆者在採訪長壽湖右派時，第一個就採訪了他。後來，聽他說起他家在土改時家破人亡，於是，又一次去採訪了他，便有了上述這篇採訪錄。

三、世上沒有這個道理

講述人： 劉志雄

1930 年生

土改殺人、整人，沒得道理呀！土地要收就收吧，如果地主不幹，要反抗，你再鎮壓、再殺人。不！不僅把土地、財產全部收繳，還要殺人！不僅殺地主，還要整他們的子孫後代，一整幾十年。世上沒得這個道理。

——劉志雄

我是四川鄰水縣豐禾鄉人。我們家是從我爺爺劉大寶開始發起來的。爺爺是個非常勤勞樸實的農民，他勤儉持家，日夜操勞，慢慢積累了錢財，購置了田土。

小時候，我最喜歡爺爺，他對人非常和善、寬厚。我記得木匠到我家幹活，他怕木匠勞累，把他們的推板、鋸子藏起來，要他們休息。遇到天旱缺水，爺爺出錢出力為村民打井、引水。我還親眼見到爺爺不時蒸幾大蒸籠米飯抬出去免費供那些饑寒的人食用。至於修橋補路之類的善事，爺爺就做得更多了。那時地主同農民的關係，並不是你死我活，像共產黨說的那樣有不共戴天的階級仇恨。《白毛女》中的惡霸地主黃世仁是共產黨編造的。

我爺爺雖然發家當了地主，但一輩子都保持農民的本色，仍然天天下地勞動。

舉個例子，爺爺富起來之後，引得土匪「慕名」前來打劫。他們在村外遇到一個正在放牛的老農，問他：「劉大寶住在哪兒？」他們做夢都沒想到，眼前這個衣著破舊的老農正是我爺爺。

我爸爸劉玉章沒有繼承我爺爺的勤勞儉樸，他抽上了大煙，成天不理事。好在家境殷實，到解放時，家還沒敗在他手裡。土改的時候，爺爺已經去世，他們把我爸爸抓來鬥，我爸沒見過這種場面，駭得屁滾尿流，在一次鬥爭大會後，回家的路上，他一頭栽下去，嚇死了。

土改時我正在鄰水縣讀高中，我聽了一些共產黨的宣傳，思想還很「進步」。

家裡的田地、財產、房屋全部被收繳了，我還安慰爸爸，告訴他，共產黨說要建立一個嶄新的社會，老人要進敬老院，過幸福生活……根本沒想到緊跟著就是打人、殺人！最初，鬥爭會還比較文明，地主只是站在臺上交待哪些事做得不對，農

民也沒有過激的行為。工作組（即共產黨的土改工作組）覺得太溫和，他們發動群眾，給他們講：你們為什麼窮？是因為你們受地主的剝削和壓迫。地主都是壞人……農民沒有文化，很快就被「發動」起來，頭腦開始發熱。復盛（即鄰水縣復盛鄉）有一個貧協主任，受共產黨的煽動，走火入魔，腦子裡灌滿了「受壓迫」、「階級仇」等東西，在土改運動中神經失常了。

那時殺人很隨便，農會說要殺誰就殺誰。豐禾鄉殺得多，有地主，也有前國民黨政權的人。我知道的有這些人：

劉玉雙，地主，豐禾鄉大屋嘴人——，他是我的叔伯哥哥，與妻子（姓甘，大石鄉人）先後被槍斃。

甘世伯，地主，——豐禾鄉河壩灣人，槍斃。

劉仁山，地主，豐禾鄉複利人，槍斃。

王潤民，地主，豐禾鄉場上人，在驚恐中上吊自殺。

劉丹貴，豐禾鄉鄉長，槍斃。

劉丹陽，國民黨空軍退職人員，豐禾鄉古房子人，槍斃。

劉丹陽並不是地主，只是在國民黨空軍幹過，已回鄉務農好幾年，我經常見到他，對人很不錯，也被殺了。

土改殺人，沒得道理呀！土地要收就收吧，如果地主不幹，要反抗，你再鎮壓、再殺人。不！不僅把土地、財產全部收繳，還要殺人！不僅殺地主，還要整他們的子孫後代，一整幾十年。世上沒得這個道理。

周淑珍（劉志雄之妻）：這不是黑社會的行為，這是政府行為！就是黑社會劫財，也往往得財後放人。

劉志雄：不過我相信善有善報，我們那些年雖然受了不少苦，但我的子女一個個都很有出息。我想這是我爺爺當年一輩子做善事積了德的回報。

注：劉志雄的四個子女全部考上了大學，其中老大、老二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現分別是大學教授和美國科研人員。

採訪時間：2006 年 1 月 14 日

地點：四川大學教師宿舍

四、好些事，我都不敢給娃兒講

講述人： 周淑珍

1933 年生

我是鄰水縣袁市區雙河鄉的人，父親叫周相鄉，是鄉裡的地主。土改時我 17 歲，那一年，農會的人把父親抓走，捆綁起來關在穀倉裡。這一捆就捆了大約 10 來天，不給他鬆綁……手腫了，接著手腕開始爛，一直爛到骨頭。我去送飯，一口一口餵他……捆綁的雙手都長蛆了……

（周淑珍泣不成聲）

但他們沒殺我爸（「據說是當時殺人太多，上面來了政策，因此放鬆了一下。」——劉志雄插話），而是把他抓進監牢，關在鄰水縣北門。1959 年，父親餓死在監牢裡。他在監牢時，我們都不敢去看他，他死後我妹妹去收回了幾根骨頭……那些年的日子……我們全家被攆出來，住在一個破廟裡，沒有飯吃，4 歲和 10 歲的妹妹出去討飯。媽媽叫她們找當初的佃戶討，我們家曾經多次接濟過那些佃戶，彼此關係融洽。妹妹去討飯，他們都給，我們沒餓死，全靠那些佃戶。

其實，彼此哪有什麼深仇大恨嘛，農民租種我們的土地，按三、七或四、六分成，比現在出去打工都強……

那個破廟子，住了好多年……好些事，我都不敢給娃兒講……

採訪時間：2006 年 1 月 14 日

地點：四川大學教師宿舍

採訪後記

提到 50 多年前的往事，周淑珍老人很悲傷，一開始就哽哽咽咽，斷斷續續說不下去。老人現在身體很不好，我不忍心在她傷口上挖掘，因此，採訪剛剛開始就匆匆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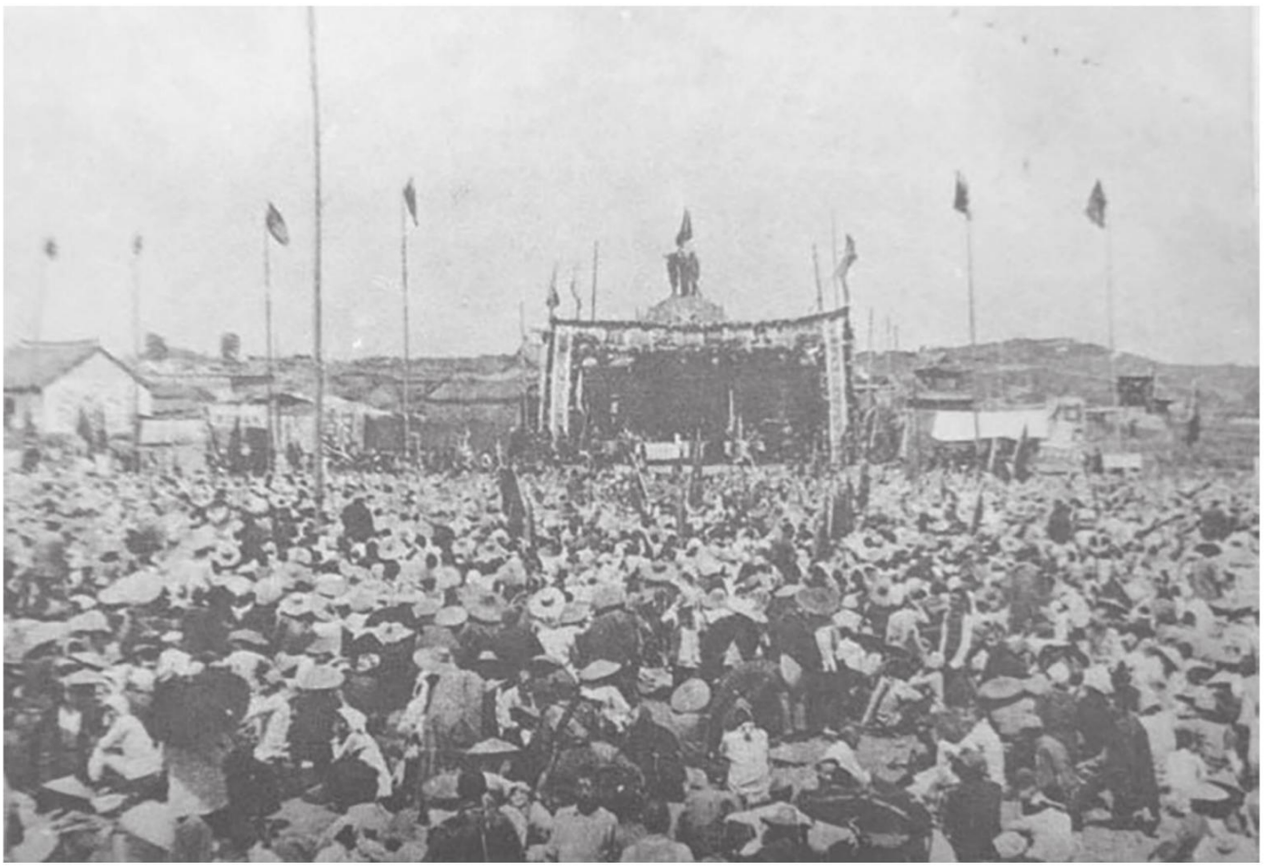
另外，老人仍然心懷恐懼。做為地主子女，幾十年殘酷的階級鬥爭和政治迫害

已讓她患上了驚恐症。中午我們在廚房提起土改，她丈夫劉志雄聲音大了一點，她慌忙阻止——廚房臨近隔壁鄰居的窗戶。

然而，悲傷和恐懼並不能驅除她心中埋藏幾十年的憤怒。在關得嚴實的客廳裡，她不由自主地說：「毛澤東，壞得很。」只是，那聲音小得我幾乎聽不清。

「共產風」不是從大躍進、人民公社時才刮起來的。土改就是共產風，是充滿血腥的一場共產風。共產黨的土改是暴力土改，不但奪走了地主富農的土地，而且還要對被剝奪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其唯一的罪名就是他們曾經擁有過較多的土地。

——胡平



湖北省鐘祥縣三萬人參加公審大會
選自《中南土地改革的偉大勝利》中南人民藝術出版社 1953 年

五、天靈蓋上一槍及其他

講述人： 魏蘇民

1934 年生

一〉、魏廉周之死

我是雲陽縣南溪鎮青山鄉人（1949 年前叫二台鄉）。我父親魏廉周在當地是個有影響的人物。家裡有幾十畝田土，是父親從我爺爺那裡繼承下來的。爺爺我沒印象了，只知道人們叫他魏三爺，我見過他一張照片，穿著清朝的官服，我想他在清朝當過官。在我爸爸幾兄弟中，我爸爸最能幹，又有文化，到解放時（指 1949 年共產黨奪得政權），家裡除了田地，還開得有酒廠、鹽廠（熬鹽）和做麵的作坊。爸爸有個侄子，叫魏炳全（音），他早年加入了共產黨，快解放時，他勸我爸爸要認清形勢，不要死守那份財產等等。其實我爸爸很看得開，錢財身外之物，要拿去就拿去。所以共產黨一來，爸爸主動把所有田土家產統統上繳。上繳時怕路上不安全，還把金銀財寶捆在我的身上，走幾十里路送到雲安鎮去。爸爸繳得徹底呀，連他嫁出去的女兒陪嫁的金首飾都追回來繳給了政府，同時還積極為新政權徵糧。另外，他還動員他的大哥（也是一個地主）把所有的財產交出來。由於爸爸繳得主動、積極、徹底，共產黨把他評為開明地主，還讓他到縣城開「先進」會，我就親自陪他去過兩次。所以，從 1949 年 10 月雲陽解放到 1950 年秋，爸爸人還算平安。

1950 年秋後，上面派了一個工作組來到南溪，我記得帶隊的姓馮。他們突然把爸爸抓來關起，關了一個多月，給他安了三條罪名：一、砍伐樹林；二、轉移財產；三、欠一條人命。這三條罪名都是不實之辭。首先，家裡的田土、山林都做為果實分給了農民，農民去砍樹與我家無關；第二，我們把家裡做麵的機器搬到雲安鎮做麵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搬的，當時共產黨主要搞土改，對工商業還是保護，並沒有說要收繳機器，如果當時要，拿去就是了，不存在轉移。最後一條最可笑！在批鬥會上，他們動員了一個農民上來控訴我爸爸逼死他老婆。為什麼可笑？因為鄉裡大家都清楚，那個女人是因為家裡吵架鬧矛盾，一時想不開，尋了短。農民還是樸實，逼他當眾說謊相當困難。當著我爸爸的面，他在批鬥會上很狼狽，結結巴巴話都說不清楚。

但是，他們還是把我爸爸殺了，用槍打的頭。

我當時很想不通，財產全部繳了，總該免災吧，但還是要殺！不過後來我想通了：如果他們想通過殺人來鎮住其他人，不殺我爸爸殺誰？我爸爸在當地是最有影響的地主兼工商業主呀。

收我爸爸屍的是一家姓彭的農民，收得很仔細，把打出來的腦漿都捧起來入了棺。

魏蘇民的母親，她在 1949 年前去世免遭了她丈夫的命運。

(陳沅森在〈談談「土改」「殺地主」〉一文中寫道：「殺地主，沒有任何標準。每個村子都要殺，不殺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規定：「戶戶（地主家）冒煙，村村見紅」。假設那個村子裡沒有人夠資格評上地主，就將富農提升為地主；假設連富農都沒有，就「矮子裡面拔將軍」，把某位倒楣的富裕中農提上去……總之，至少要殺一個，殺一儆百嘛！當年殺地主是用槍頂著後腦勺，從背後斜著向上開槍。一聲槍響，天靈蓋便被打飛了，紅色的鮮血、白色的腦髓，撒滿一地……血腥、殘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渾身顫慄，甚至嚇得好幾個夜晚從惡夢裡尖叫著醒來，掩面而泣……殺多了，嚇怕了，反抗者都縮頭了，新生的紅色政權便鞏固了。《大參考》2005.03.17）

其實當時農民和地主並沒有深仇大恨，並不是像所宣傳的那樣。比如我大伯，他對佃戶非常好，哪一家夫妻吵架，他都請到家來，招待吃一頓飯，好言好語相勸。所以後來工作組發動農民鬥他，總鬥不起來。最後他們找些不懂事的年輕人把他壓倒，跪在地上，但是年紀大一點的主動跑上去把他從地上拉起來，如此反復好幾次。在鬥完回家路上，我大伯自嘲地說，我都六十多歲的人了，今天還拜了堂（注：舊時結婚時要跪拜三次）。

我爸的墳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因修學校搬遷過一次，後來修公路被壓在了公路下，再也看不見了。

二〉、魏律民夫婦之死

爸爸死後，農協會和工作組的人把我們全家趕到我家大院後面的舊房子裡，農協的人則占據了大院的新房。這本無所謂，要命的是他們把我們所有的被蓋都收繳了。緊接著就是冬天，我們一家十幾個人怎麼過？救我們命的是一個叫袁培君的農

協會員，他看上我的一個妹妹，晚上悄悄從唯一的視窗塞了幾床棉絮。如果不是這般「愛情」，我們活不過那個冬天。

後來他們認為舊屋也要收繳，又把我們趕出來，驅到山上，我們無家可歸，在山上住岩洞。

實在活不下去了！我年輕，無家無室，於是獨自離家出走到奉節縣當了個小學教師，後來又調到一個劇團。

魏蘇民五十年後重返當年的老宅，在那個塞進了幾床棉絮的、救了他們全家命的窗口前留了一張影。現老宅已被拆毀

我說說留在鄉下的我的大哥魏律民夫婦的事。

我共有兄弟姐妹 11 人，其中兄弟 5 人，除我以外，4 個哥哥全部讀了大學。大哥畢業於上海黃埔軍校，因為婚姻回到鄉下。新婚期間，蚊帳上的鐵絲刺傷了他的眼睛，他因此留在鄉下照看田產，沒有再外出。解放時，我把他的中山劍等黃埔軍校的東西統統沉到河裡，怕惹禍。

解放後，他在鄉下的日子很難過，實在過不去時，就走路到奉節來找我要點錢。記得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1956年，他又來奉節，我給他30元錢，我當時月工資28元，還借了 2 元。我對他說，這樣下去不是個辦法，你把大兒（魏京宇）送出來，在奉節找個事做，減輕一點家裡的壓力。於是，魏京宇來到了奉節。

（注：魏京宇後來成了三峽地區有名的文物專家，2003 年筆者為出版三峽專刊曾在奉節採訪過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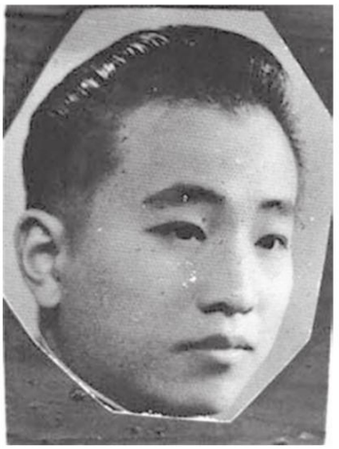
1958 年到 1959 年，大哥被叫到山上去砍樹煉鐵，勞動強度很大，他是地主子女，更得拼命幹，又吃不飽。1959 年，他實在活不下去了，外逃到雲安鎮。逃走前，他偷了一件雨衣。在雲安鎮時，他去賣雨衣討個飯吃，人家看他戴個眼鏡，舉止斯文不該像個落難的。追問他，大哥畢竟是個讀書人，人家一追問，自個兒就慌了神。人們把他扭到派出所。在派出所，大哥一一招認了。你想，地主出身，又偷了雨衣，就這樣，他被送進監牢，不久就死在裡面。

再說我大嫂。1960 年，她在鄉下活不下去，走到奉節來找兒子魏京宇。當時我已調到了劇團，外出演出去了，沒見到她。大嫂在奉節，把親戚給她的幾件衣服和一點錢全部留給了兒子，然後獨自沿著梅溪河往上走。在這個時候她已經萬念俱灰了。

她跳進了梅溪河……

三〉、朱化成之死

朱化成是我姐夫，是一個很有文化、很有修養的人。他解放前擔任了雲陽縣江口鄉（現江口鎮）的鄉長。雖然是個小小的鄉長，但是他竭力造福百姓，在當地口碑很好。解放後，凡當過舊政權鄉長的都要殺。我姐夫也被抓起來，前後陪了兩次殺場。那時一殺就是十多個、二十多個。比如，殺縣長張之甫（音）那次就殺了 21 個人。為什麼沒殺他？說來你不信，當地幾百農民，包括鎮街上的人，都聯名上書保他，為他求情。在這種情況下，姐夫逃過一劫。死罪可免，活罪難逃，姐夫被抓進了勞改隊。



朱化成遺像

我姐夫練過武功，身體很好，在勞改隊他拼命動，多次被評為積極分子。但是，他的身體因此拖垮了。大約在（19）70 年，姐夫死在勞改隊。

採訪時間：2005 年元月 30 日

地點：重慶萬州南通賓館

採訪後記

偶然聽一個朋友說，她一個好友的祖輩，在土改時被槍殺了，我便請她幫我聯繫，說我想去找她聊聊。她的好友很爽快地答應了。於是我從重慶趕到萬州，在賓館裡先同她溝通之後再請出了她父親魏蘇民。

我們在飯館裡邊吃邊聊，老先生盯著我直截了當地問，為什麼要來瞭解土改和地主的事。我支支吾吾地說，我打算寫一部關於三峽地區的小說，想收集一些素材。

土改是個非常敏感的話題，我知道魏先生心有顧忌，我既不便筆錄，更不敢錄音，只得以擺「龍門陣」（聊天）的方式瞭解那一段往事。遇到關鍵的人名地名時，便藉上衛生間匆匆記在小本子上。

外面，因修建三峽大壩，江水正一步步逼來，把一段段歷史永沉水底……

魏家老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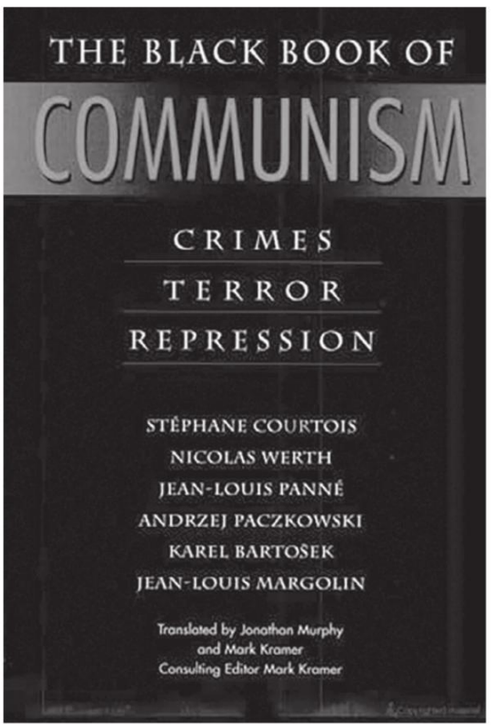
土改時，魏蘇民一家人死的死，逃的逃，離開了家鄉，從此數十年不敢回鄉。二十一世紀初，魏蘇民（右二）等人才返回家鄉，他們在當年棲身的山上留影。背後山下是他們當年的舊居和田土。

本篇圖片由魏蘇民提供

十一位法國知名歷史學家，歷經三年的調查，在 1997 年 11 月出版了一本專著，叫做《共產主義黑皮書：罪行、恐怖、鎮壓》」(Black Book of Communism)。本著作長達 846 頁，出版後立即引起轟動，登上法國暢銷書榜首。

該書講述了共產主義政權實施政治迫害的歷史，為世界範圍內的共產主義社會中被迫害至死的受難者總人數算了一筆帳。

書中關於中國大陸 1949 年以來的受難者死亡人數，其統計結果是四千五百萬至七千兩百萬。這個數字居世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受難者死亡人數之首。



六、土改和反右我都遇上了

講述人：劉雨濤

1923 年生

我出身在四川省崇慶縣（今崇州）一個耕讀傳家的知識分子家庭。

明末清初，我的祖輩從湖北麻城縣孝感鄉遷來四川（注：古麻城的孝感鄉在如今湖北省麻城市的鄰縣紅安縣城關鎮一帶）。我的高祖父——爺爺的爺爺——年輕時是打長年（長工）出身。他在一個姓高的地主家幹活，地主看上了他，把女兒嫁給他。我高祖這個人很勤奮，也很老實。

我們沾高家的光，就這樣起家，以前家裡瓷碗上面還有「高」字。到我曾祖父和祖父時，家裡就有點錢了，但是，祖輩們一直都保持勤勞的本色，我爺爺就打長年，到 80 歲了還在操田——放水灌田。

解放前我沒有待在家裡，在外面讀書。1940 年春，我考上了四川省成都中學高中部。那時，課外我很喜歡讀文史哲方面的書籍。我認為，現代中國，很需要具有哲學思想和愛國熱情的知識分子。我以北宋理學大師張橫渠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做為自己的座右銘。1943 年秋，我考上了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系，指導我的教授是赫赫有名的方東美先生、宗白華先生、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還有著名的國學大師蒙文通先生。蒙先生後來很不幸，文革時他是四川大學的教授，紅衛兵把他鬍子剪了，鬥打他，我見他臉上被打得青一塊紅一塊，身上有沒有傷就不知道了，他很快就被折磨死了。

土改時我在崇慶縣中學教書。我父母被抓起來關到大隊部，說我們家做了很多違背農民利益的事，要賠償——賠 20 擔米。當時一擔米是 320 斤，值 200 元，20 擔米就是 6400 斤，4000 元錢，父母賠不起。我被從學校叫去，我剛說一句「農民弟兄們」，他們馬上就打斷我：「不准喊『農民弟兄』！要喊『農民老輩子』。過去你喝農民的血汗，農民供養你上了大學，農民是你的老輩子！」

我只得喊「老輩子」並答應賠錢。當時教師工資是 200 斤米一個月，我根本賠不起。我妻子很好呀，她把她的 100 多個銀元，還有金戒指、金項鍊等等全拿出來折成價，再加上親友們寄來的錢，才把這 4000 元錢交清。

國學大師蒙文通

但是，他們還不滿足，還要壓榨錢。他們把父親吊起來打，雙手吊爪了（即扭曲變殘）。母親也被吊打，她的右手膀遭吊脫臼了。土改工作隊挑動農民鬥地主，鼓勵農民動手打，工作隊的那些人，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農民就是他們的幫兇。

我有個妹妹高中畢業後在崇慶縣料場（音）小學教書。那天，農民武裝隊揹著步槍，押著我母親到料場小學找我妹妹拿錢。她的手是被吊斷了的，一路走一路呻喚（呻吟）。剛到那兒，農民就喊：「打地主！打地主！」母親怕得不得了，受了很大的刺激。妹妹沒得錢給她，母親又被押回來。回來後，她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絕望，已經沒得錢了，交不出還要吊，還要打，怎麼辦？

我父親關在大隊部，每天是我妻子提個篼篼（籃子）去給他送飯。解放前我們家鄉老人婆喊媳婦是喊「女」。那天母親說：「二女，今天你不要給爸爸送飯，我去送。」

天快黑的時候，母親提著篼篼出去了。

她穿過幾塊胡豆田，到了小河邊放牛吃水的地方，用事先準備好的一根繩子把自己的手腕綁住，另一頭繫在樹枝上，然後身子翻過來，將頭埋在水裡，強迫自己嗆水而死。

她用繩綁住手腕，是怕水把屍體沖走。

後來他們放了父親，我們全家被趕出來，遷到河邊上一個曾經當過長年的農民家裡。

再說個事，是我親眼目睹的。

曾國藩當年有一個弟子叫黎庶昌，曾有四大弟子，黎庶昌是其中之一。黎庶昌曾在多個國家擔任公使和參贊，比如英國、法國、義大利、日本等。黎這個人特別喜歡書，也特別喜歡買書。他在海外十分注意搜集已在中國絕版或失傳的中國古代典籍。他一生搜集了善本書共 6000 多冊。

黎庶昌後來曾任重慶道台，相當於今天的重慶市市委書記兼市長，最後他終老於成都。

黎庶昌去世後，他的子孫打算將他的藏書出售。他們找到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彭舉（雲生）、歷史系教授蒙文通和葉秉誠等人商談。蒙文通他們到黎庶昌的寓所參觀了全部藏書，認為很有學術價值，書又很完整，但是，以他們的財力，最多只

能購買十多二十部。這樣就會使這套書殘缺不全，喪失了它完整的學術價值。蒙文通提議，物色一位家庭富有的藏書家，將這套書全部買下來。

不久，崇慶縣一位大紳龔澤浦到成都旅遊。龔既是崇慶縣擁有一千多畝田的大地主，也是酷愛藏書的文化人，他與彭舉和蒙文通教授都有交往。經彭、蒙、葉三人的說合，龔澤浦以3000個大洋買下了這套書籍，並搬運到崇慶縣中南街他的家裡。

這套書我見到過一次，那是1947年7月。當時彭雲生、蒙文通等著名學者到崇慶縣講學，他們就住在龔澤浦家裡。我在聆聽了蒙先生對經學的講解之後，又到龔澤浦家向蒙先生進一步請教。在那兒，有客來拜訪蒙先生，說到某一部書，龔澤浦就從書庫中取來一個長方形木匣，其中藏有十多冊書。這正是黎庶昌從日本帶回來的一部善本書，每冊書上都有明清兩代名人鑒定的印記，十分珍貴。

解放後搞土改，龔澤浦被抓起來，要他交錢退押，龔澤浦交不起，說錢都花銷了。交不起就打，打了後他回家用藥酒擦身，第二天又打，又用藥酒擦。龔沒辦法，只得賣書。華西大學故意卡他，只出150擔米的錢。太便宜了，正常情況至少要值500擔。龔澤浦捨不得，不願意賣。這下好了，土改工作隊的人乾脆給他定個罪名——「惡霸地主」，並以這個罪名一槍把他打死了。

龔澤浦死時50多歲。我記得清楚，那是1951年冬天。

他死後，他的全部財產被沒收，其中，那批十分珍貴的藏書被四川省圖書館用幾輛大卡車拉走了。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丈夫無罪，懷璧有罪」。這句話說，你本來沒罪，但如果你身上揣了一塊璧玉（璧是玉中最好的），你就有罪了。

龔澤浦之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呀！

問：還有沒有哪個受害？

有呀，我的伯父被槍殺了——，他也是地主，同我們住一個院子。

問：啥名字？

劉祖宣。唉呀，這些事你不要管算了，往事不堪回首，我都不想給家人講這些事。共產黨掌權，冤枉死了好多人。

四川省土改中冤死了幾十萬人，這個帳嚴格說來應當算在鄧小平門下，因為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正是在整個土改時期，鄧小平主政西南，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在他的過左政策下，四川土改搞

時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在批閱文件（網路圖片）

得很血腥，那幾十萬冤魂，債主就是鄧小平。1997 年他去世後，美國之音說鄧小平一生有八大罪惡。早年（1949 年前）的四個我記不清了，1949 年後的四個中第一就是土改。第二是積極搞反右鬥爭，當然，毛澤東是第一罪魁。第三是提出四項基本原則，鎮壓要求民主自由的人，如關押魏京生。第四是 1989 年他以軍委主席的身分下令用坦克機槍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總之，他繼承了毛澤東的專制獨裁。

1957 年反右運動，在會上叫我們幫助共產黨整風，給共產黨提意見。我根本沒敢提母親自殺、伯父被槍斃的事，半點都沒提，我只對黨要反的「宗派主義」表示了贊同。

我 1950 年到 1952 年 10 月在崇慶縣中學教書時，學校對教師在政治上分好幾個等級，等級低的，不管他們業務水準如何，都受排擠。學校有民主同盟的教師，這些人都非常有能力，但只因為他們是民盟成員，就把他們統統調走了。1957 年我提出，當年不該這樣做，把這些有本領的人擠走是教育的損失，也是崇慶縣的損失。

我因此被劃為右派，說我要分裂共產黨。我說，我一個書生，關心教育，我咋個分裂得了共產黨？幸好我沒提土改的事，如果提了，我就會被劃成極右，以後那幾十年的日子，就會更悲慘了。

採訪時間：2007 年 12 月

地點：四川省廣漢縣

採訪後記

半年前，從劉雨濤先生的兒子劉紹坤那兒讀到《劉雨濤文存》和他的專著《山海經與三星堆文化研究》，同時也聽說了他家在土改時的不幸。

半年後到廣漢，去拜望劉先生，見他比書上的相片蒼老了許多，也虛弱了許多。

不過，老人思緒仍然很清晰，記憶力也好，尤其是擺談中流露出很深厚的史學功底。

《劉雨濤文存》書中的劉雨濤

他談起自己這一生，情緒很低沉。1957 年當右派後，劉雨濤先生被從講臺上趕下來，不是到食堂勞動，就是下放勞改，當年的寒窗苦讀，數十年的寶貴光陰，統統都被「改造」完了。他在《劉雨濤文存》的前言中很酸楚地寫道：「我是一位沒有出息的人，沒有多大成就，辜負了唐君毅先生、蒙文通先生、彭雲生先生等老師和前輩對我的殷切期望。五、六十年來，我僅僅存留幾十篇詩文和一部專著而已，實在是愧對師友了！」

其實，也許正是因為學哲史的劉先生那些年少寫了很多文章，他才活了下來。

晚上，同劉紹坤一塊吃飯，他提起他一家幾代人的不幸，憤憤不平：「我十來歲就被趕出學校，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

一家三代，土改奶奶被逼死，反右父親被勞改，文革本人被逐出校園，與「共和國」幾乎同齡的劉紹坤，想起這幾十年，情緒激動，很自然。

我在採訪時，傳來他兒子劉棟獲得碩士學位，並赴美攻讀博士學位的消息。

看來，劉家被強行打斷了的「書香」，又有希望續下去了。

補記：劉雨濤先生於 2012 年 1 月 13 日去世，終年 89 歲。

武昌中華大學師生下鄉搞土改前宣誓。《中南土地改革的偉大勝利》中南人民藝術出版社 1953 年

七、從小學校長到死緩囚犯

講述人：李光榮

82 歲

我這一生，與「教員」結下不解之緣。解放前，我走上講臺，當了一名教員，解放後，我被誣為「反革命」，入獄、勞改，當了幾十年毛澤東命名的「反面教員」。

一〉、1951 年 6 月，走向深淵

1946 年我高中畢業，本準備參加高考進入大學，但由於種種原因我沒能如願，而當了一名小學教員。

1949 年 11 月拔山解放時，我在拔山小學教書，並擔任教導主任。1950 年暑假，全縣教師集中在忠縣精忠中學培訓，培訓結束後，忠縣人民政府任命我為八德鄉中心小學校長。我既不是中共黨員，也不是團員，在政府裡也沒有任何關係，任命我當校長是他們看我工作比較出色。另外，我還有個頭銜——「第五區文教界代表」，在八德鄉開公審大會時，我還因這個頭銜被請上主席臺就座。

這個頭銜如何而來我也不清楚，現在記得清楚是當時教員每月大米最多的是 180 斤，我當校長的每月 210 斤。那時我認為，這個人民政府是任人唯賢的，厚待教師的，我要拼命地工作，報答人民政府的知遇之恩。

但是，很快，我就大難臨頭！我祖父是一個貧苦農民，他有三個兒子，三個兒子中我父親最聰明，小學畢業時全縣會考，他名列第三。當時宣導實業救國，忠縣在發展蠶桑業，父親於是輟學去學習有關技術，學成後他便從事養蠶植桑；此外，還兼營釀酒。父親很勤勞，一點一點地掙了一些錢，家境開始好起來。但是父親認為，要長久脫貧，應當置田產，於是他就把養蠶釀酒掙的錢拿來買了一些田地。這就為我們全家種下了禍患。

由於有這點田土，我父親被評為地主，土地沒有了，還成了被專政的「壞人」。土改的前奏是「減租退押運動」，我為了表示「開明」，主動把我帶到學校的蚊帳、床單、被蓋拿回家交給農會，算是「退押」。

可是，我沒有逃脫劫難。一個搞土改的革命幹部由於對我私人的恨怨，藉土改運動將我置於了死地。

他叫冉澤民，解放前參加了共產黨的周邊組織新青社，解放後擔任拔山區政府文書。冉這個人個人品質很差，還是個色鬼，我原本同他沒有往來，他恨我是因為我處分了他的一個親戚陶倩麗（音）。

陶倩麗在學校領工資，但長期不上課。剛解放時有兩大中心任務，一是剿匪，二是徵糧。徵糧抽調了不少老師，學校開課困難。我於是去找陶倩麗，叫她出來上課。她說她上不來課。我說，拿了工資就該上課。她耍橫，說看我拿她怎麼辦。我那時年輕，才 24 歲多，既不懂什麼是「階級鬥爭」，也不懂社會關係複雜和人心險惡，沒有考慮她身後的背景。我把她的情況寫了一個報告交到縣文教科。文教科也很乾脆，出了個條子就把她辭退了。冉澤民認為這是我裝怪，同他過不去。

他先是出一個條子，叫我去徵糧，我是校長，走了學校怎麼辦。但我不敢違抗，只得動身去區上。不料走到半路，遇上區裡另一個文書葉世宣（音），他說，「你去徵糧的事我怎麼不知道？」我這才明白這是冉個人的主意，他想先把我從學校調出來再下手整我。葉文書叫我回去繼續管理學校，因為這不是區上的決定。

不久，區上傳來決定，叫我以學校工作為主，協助徵糧工作。這次，冉沒能得手。

在減租退押運動時，冉犯了錯誤：貪污、腐化、通姦。縣裡原本要抓他，但當時的拔山區區長王善博同他關係很好，他們在經濟上也扯不清。他說，他還年輕，要允許犯錯誤，也要允許改正錯誤。他把冉保了下來，只撤銷文書職務，下放到農村當駐村幹部搞土改。

他恰好就下放到我老家——楊柳村！我在劫難逃了！

1951 年 6 月 X 日上午九點，我村裡兩個民兵突然來到學校，拿出冉寫的條子，上面寫著：「你必須回村，協助減租退押。」我一看條子就明白了，冉又要找我的麻煩。我先安排兩個民兵吃飯，然後去找八德鄉公所的的幹事黎萬古，我同他關係很好。我對他說，我要回鄉幾天，你抽時間幫我看管一下學校，幾天後我就回來。那時我好天真，以為還能回來。當然，後來還是又回到學校，但那是 30 多年之後。

我同兩個民兵走到楊柳村蕭家大院時，正好遇到王區長和他的警衛員出來。

我說：「王區長，你要我回來？」他說：「是呀，你家裡有多少封建財物？你回來動員你父母把隱藏的封建財物交出來。」

我很瞭解家裡的情況，有多少財產我心裡清楚。父親掙那點錢，我讀書和幾個姐妹婚嫁已經用得差不多了。我想到王區長原本對我印象不錯，對我工作也很滿意，於是我大膽地對他說：「王區長，我可不可以說幾句？」他同意後我說，拔山是 1949 年舊曆 10 月中旬解放的，我家在 10 月初三被土匪搶劫，這事眾所周知……

我話沒說完，王區長馬上厲聲說：「你是不是說這次退押比土匪搶得更凶？」我趕緊說，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被土匪搶了財物只會減少不會增加。王區長說：「你沒這個意思就好。回去動員你父母。」說完他就走了，也叫那兩民兵各自回去。

當晚我回到家，向家人說起交金銀財寶的事，家裡根本交不出來，家裡人哭了一夜。第二天我去村幹部處。哪知那位幹部正是冉澤民。冉看到我，不由分說，把桌子一拍：「你堅持反動立場，先給我捆起來！」那個時候，土改工作隊的人說一句話比聖旨還有威力。我立馬被捆起來押往我家。到我家後，冉大叫：「你們交不交金銀財寶？！」我父母苦苦哀告：「的確沒有呀，村裡人都清楚呀。」冉澤民於是指揮民兵把我吊在我家堂屋的穿枋上。我痛得直叫，我是家裡唯一的兒子，父母在一旁看著，心裡更痛，但是，確實沒有金銀財寶。不久我就痛昏過去了。後來，村裡的另一位幹部——他瞭解我家的情況——把冉叫到一邊耳語了一番，冉才把我放下來。但是他把我和我父親抓到蕭家倉裡關起來。

那一天正遇到八德鄉趕場，他們去趕場時遇到八德小學的一個叫黎道暉的教師，他說我磨過刀，準備要殺民兵，磨的什麼刀呢？說來好笑，裁紙刀。冉得知這個說法，非常高興，當天下午就組織開批鬥大會。我被押到蕭家大院的壩子裡。我在途中暗想，你們又能給我加個什麼罪名呢？我看你們怎麼鬥我？總得有個說法呀。我那時還那麼天真，以為自己無罪便心安理得。太天真了，欲加之罪，何患「無罪」！

一進大壩，就聽到有人大喊：「打倒大特務李光榮！」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開批鬥會事先要培養一群積極分子，在會上喊口號、揭發、批鬥、打人。

一個民兵上來指著我說：「好哇，你還想殺我們！」我當即回答，沒那個事！這是冉澤民、冉同志要報復我！那個民兵聽了這話，聯想起頭一天押我回來的過程，也覺得不像那回事，於是他便問：「他為什麼要報復你？」我準備把辭退他親戚的事說出來。剛開口，冉澤民一下子從那間大屋裡衝出來——最初他沒露面——一聲大吼：「不准他亂說亂動！給我打！」

這頓打是我一生中遭受的最慘重的一次！那些土改積極分子們湧上來，劈頭蓋臉，腳尖拳頭，有一個叫盛家然的人，竟然拿舂米的木碓下死勁打，根本沒把人當人。我轉眼就遍體鱗傷，昏了過去。

村裡打我那些人，我都認識，他們對我根本沒得仇恨。他們只是一群沒得腦子的傻瓜，一切聽上面的，折磨起人來甚至變本加厲，工作組喊聲罵，他們就打，工作組喊打，他們就殺。這是當時的普遍現象。

不知過了多久，恍惚間有人拖著我去按指印。後來我就被關進了拔山區監獄（即原禹王宮，現拔山小學幹部宿舍）。

我在拔山區監獄關了半年。這兒倒沒像村裡那麼亂打，我想「寧可官刑，不可

私刑」。牢房很小，關了 30 多個人，只能側著身子睡，夏天奇熱，冬天又冷得慘。

（李光榮妻子插話：他直接睡在石地板上，穀草都沒有，所以他留下了後遺症——氣管炎。）

當時差點把我折磨死的是身上的傷口。批鬥會上我右胸側被打了一個洞，在監獄裡感染了，流膿不止（參見本書〈這是人做的事嗎？〉），我發高燒，吃不下飯了。家裡人送飯來，見我幾天都不吃，就去哀求看管人員，求他們同意送藥給我敷治。看管員同意了，家人便找了草藥送進來，也算我命賤或者說命大，我竟然活了下來。

在區監獄關押的半年時間裡，從未提審，也沒有叫我寫過任何「殺民兵」的交待材料，只是有時被武裝民兵押到區政府服勞役——給區政府伙房挑水。有一天中午，我正在伙房門後休息時，一個約 10 來歲的賣糍粑塊的孩子，見四下無人，突然快步走到我面前，把一塊糍粑塞給我，說：「您快吃吧，李老師，我們都知道您是被冤枉的。」

孩子那樸實純真的模樣讓我非常感動，我眼淚當場就流出來了。孩子的舉動給我精神上極大的安慰和鼓舞，我堅信終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可惜，如今我已獲得平反 20 多年了，我四下打聽，一直沒能找到當年給我糍粑的那個孩子，更內疚的是，連他的名字也沒記住。

1951 年 12 月 29 日，又是一個拔山趕場的日子。拔山區人民政府在大操場召開公審大會。會上槍斃了莫明道，同時宣判我和唐明安等人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強迫勞動改造，以觀後效。

我真的是到了鬼門關前！我的罪名是「企圖持刀砍殺民兵」。

到這時我終於清醒：冉澤民從叫我回家「協助減租退押」起，一步步早就為我安排好了一切！

唐明安的罪名是「投毒」。揭發他的人又是那個揭發我「磨刀殺人」的黎道暉。黎道暉的父親是國民黨的鄉長，被共產黨殺了。他為了保住他在學校的工作，便積極地參加「鎮反」運動，要立功。他先是說學校外的水井裡有人投毒，後又說學校內的水缸裡的魚也被毒死了。他是教三年級的，於是就在三年級的學生中逐一搜身檢查，果然在一個姓潘的學生身上搜出了一包白色粉末。這當然是毒藥了！他馬上跑到區上去作「立功」彙報，並親自對該學生審問。那小孩似乎早知如此，招供說是他表哥叫他投毒，先投水井後投魚缸。

他的表哥就是唐明安——凌雲鄉小學教師。

唐明安馬上被捆綁到八德鄉政府。他莫名其妙，大呼冤枉。結果，他因「抗拒交待」被一陣暴打，關進區監獄，做為「反革命分子」與我同判死緩。

那些年，毛澤東和那些積極分子們整人有一個「三子法寶」——抓辮子、戴帽

子、打棍子。凡是他們想整的人，先「抓辮子」——給你找個罪名，押到會上批鬥，然後給你戴個「帽子」，地、富、反、壞、右、叛徒、等等。「帽子」一戴上，你就成了罪人，緊接著就是「棍子」伺候。「棍子」有兩種，一是刑杖，二是法杖。刑杖是捆綁吊打，施以刑罰，法杖是打完後由施暴者決定是否再送入監獄判處徒刑。我的冤案過程完全是「三子法寶」的演練。這種手法他們用了幾十年，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共產黨才在報上正式說，今後「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了。

二〉、從死緩到 20 年勞改

公審會後的第二天，我和唐明安等便被押到忠縣看守所關押。在那兒，我大開眼界——裡面關押著忠縣各行各業的各種人物，有政界的，也有商界的，有不少還是忠縣的頭面人物。一進看守所，組長（官方指定的犯人）就給我們講監規：不准談案情、不准串倉 (監舍)、不准……總之，不准亂說亂動。管理幹部則給我們講：「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他還說：「判死緩的，改造得好，可以改判無期或有期徒刑。」等等。

我心裡明白自己是受人迫害，但是，這個冤屈不是看守所造成的，我必須服從看守所的監規，否則就只有死路一條。我當時想，我們判了死緩的犯人，就像已經選定了的肥豬，隨時可以拖出去殺。

據說，是勞動使猿變成了人，勞動創造了世界，勞動創造了文明，人沒有勞動的觀念，就會走上犯罪。犯了罪的人就要通過勞動來贖罪，共產黨叫做「勞動改造」，簡稱為「勞改」。

我進看守所一周後，就開始勞改。我先是到草鞋組編草鞋，後來到機房組織布。我學得很快，沒多久就織得又快又好。另外，我在報上看到有把單布機改為雙布機的報導，我也想做這樣的改進。我把這事報告給周所長，他很高興地批准了。我自己設計方案和圖紙，經過多次試驗，終於成功了，雙織布機比單織布機提高了 50% 的效率。

在看守所，我因表現突出，多次受到表揚，我後來的改判，就是我的這種「勞動改造」換來的。

1954 年元月的一天，改判下來了。當時看守所有 60 個死緩犯人，其中 55 個改為無期徒刑，押到位於南充的四川省第二監獄服刑，5 個改為有期徒刑 20 年。我是 5 個中之一。改判的人中沒有唐明安，他已經在 1953 年 12 月被釋放了。看守所裡人人都在猜測他為什麼會被釋放。公安局一位姓秦的幹事對我們說，唐明安是因為表現好被政府寬大了。看守所裡沒人相信他是因為表現好被「寬大處理」的。多年後

我才得知，他有一個堂兄叫唐明邦，是重慶某報的記者，唐明邦回家探親時得知了他堂弟的事，他對整個事件作了一番調查，回去後直接向西南軍政委員會作了反映。他的反映引起了重視，上面責成萬縣地區專署組成專案調查組調查。調查的結果是唐明安無故受冤，於是人民政府把他「寬大釋放」了。

那次調查奇怪的是，對於平白無故誣陷唐明安的黎道暉等人，沒追究任何責任。黎道暉是在 1951 年那場由黨中央領導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揭發唐明安和我的。當時風聲鶴唳，似乎到處都有殺人放火的特務和要推翻新生政權的反革命。黎道暉想立功，同冉澤民一起製造了我的「殺人」冤案後又製造了唐明安的「投毒」冤案。可是，我就沒有唐明安那種福氣了，我要等到 30 年後才被證明也是無故受冤。

本來，判 20 年的人要押到新疆的偏遠地區去勞改，不料正好周所長來到看守所，當時他已經調到奉節縣一個勞改單位——奉節青龍硫磺礦廠。他看到我，就把我要到了硫磺礦廠。

去硫磺礦廠的路非常爛，我當時身體很差，周所長叫其他犯人扶著我，一步步走到了我要勞改 20 年的地方。是 20 年，因為 20 年徒刑從改判之日算起，以前在忠縣看守所關押的兩年和在區上關押的半年不算刑期。

到青龍硫磺廠後我被安排下洞拖硫磺礦，那個勞動強度很大，條件又惡劣，我身體不好，幹了一年，實在受不了了。我寫了個報告，說，按政府的政策，舊社會是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是把鬼改造成人。你們要改造的是我的思想，而不是改造我的肉體。我說我實在不行了，請你們考慮給我換個工作。

也算我運氣好，當時勞改大隊正要改為車間，需要一個有文化的人搞宣傳，那個年代運動多，經常要討論，要發言，要記錄，要辦壁報，因此，我被選出搞宣傳工作。我還是在看守所的那個態度，我的冤案不是監獄造成的，我要服從勞改地的法規。但是我知道自己沒有罪，因此，我是「伏法，但不認罪。」搞宣傳工作，雖然比下井輕鬆，但必須萬分小心，稍不注意就要惹禍。

我們勞改隊裡有一位原萬縣地區醫院的王醫生，他在勞改隊仍分配搞醫護工作。一天晚上值班時，也許是由於無聊，他用筆在紙上塗塗寫寫。第二天早飯後，有人發現，他把「毛主席萬歲」幾個字寫在《病犯入院登記花名冊》的封底上。這還了得，毛主席成了「病犯」。他立馬被押到廠部關押，後來被加刑兩年。

硫磺廠一車間春節期間出壁報，刊頭畫背景是天安門，因沒有彩色顏料，作畫的犯人就用淡墨水烘托天空雲彩。壁報貼出，一管教幹部認為這是借題發揮，蓄意在「天安門」上布滿烏雲，他馬上追查思想根源和立場問題，作畫的犯人因此被加刑一年。

二車間有一個勞改犯叫羅模楷，他原來是國民黨青年遠征軍的指導員，很有文

化。有一次，他寫了一首詩〈萬花筒〉：「萬花筒裡看不完，綠柳紅桃碧牡丹。分明只有兩寸遠，眼界不闊看不寬。」這首詩被人舉報，開會追查思想根源，「分明只有兩寸遠」一句被認為有問題，是影射文化大革命。羅模楷因此被加刑兩年。

勞改礦裡我親眼目睹了大量的死人。

1959 年，我在二車間當廣播員，那一年「病人」大量湧現，接著就是大量死人。我常常奉命送「病人」到廠醫院去，所以經常看到醫院掩埋死人。最初，死人還有四塊板棺，由幾個人抬到山邊挖坑掩埋，然後再在坑前插一塊木板，上寫 XXX 之墓。後來死人越來越多，只得用竹席裹屍。再後來，死的人太多，竹席都沒有了，於是用繩子栓在屍體身上，由兩、三個「病犯」拖到山邊墳地，埋與不埋，根本沒人管了。這些慘象，當時無人外傳，後來也無人得知。但我是親眼目睹，過了幾十年，我每一想起青龍硫磺廠裡的那種慘狀，仍然覺得心驚肉跳。

（注：青龍硫磺廠位於奉節縣城到那後來發現的著名的天坑的路上，1998 年，我路過該礦區，那被硫磺腐蝕得寸草不生的山崖看上去十分恐怖，有一種地獄的景象——譚松注）

那些年，偷吃的人也多，有一天晚上，我們二車間的炊事員在廚房先後抓到了七個偷飯的人。按當時隊部的規定，白天抓的人馬上押送隊部，晚上抓的先由我看管，天明後再送隊部。我是車間廣播員，在大飯堂兼會堂後面有一個單間，所以那一晚七個人都捆在我的房間裡。

由於饑餓難忍，一些犯人乾脆就尋死解脫，他們通常都選擇上吊。每當有人上吊，管教幹部就命令我去放吊和安埋。最初我膽小怕鬼，那些吊死的人一個個都脖子歪扭，雙眼外凸，舌頭伸出，模樣十分可怕。但幹部的命令又不敢違抗，只得硬著頭皮去幹。記得 1960 年冬天，我就親手埋了七個上吊的人，其中一個是我的同鄉謝寶璋。1970 年我刑滿出獄後，謝的兒子專程到我家來瞭解他父親的情況，我如實告訴了他。

1961 年春，管教葉幹事遞給我一封信，說：「看後不要揹思想包袱。」我猜想一定是家裡出了事。果然，信中說，我父親和我岳父在一個月內先後餓死了。

岳父是在回家途中，走到一個叫石豬槽的坡上時倒下去的。他死後，衣服被人扒掉，他赤裸裸地橫屍在路邊……我看了這封信，眼中沒有一滴淚水，只長長地歎了一口氣。

多年後，即父親餓死 48 周年時我寫了一篇〈祭父文〉，我在文中說，父親沒餓死於萬惡的舊社會，而餓死於偉大天才、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澤東主席親政了十一年的「大好形勢」下！

不過，當時我家所在的拔山五星村餓死了一半的人，所以我又說，有眾多的餓殍陪伴，父親不是孤魂野鬼。

認真想來，那些年我如果不是在勞改隊，反而活不出來，勞改隊裡的幹部，還比較講道理，你只要老老實實地勞動，就相安無事，不像農村那些人，隨便找個藉口亂整亂打。

我在硫磺廠勞改時，一般都老老實實，絕不「亂說亂動」。

不過，我也喊過一次冤。

在舊社會，蒙冤的草民可以到衙門「擊鼓鳴冤」，還可以在大街上攔轎喊冤。可是，1949 年「解放」後，像我們這樣的「分子」及其家屬是無處鳴冤和不准喊冤的。不過，那一年毛澤東為了幫助黨整風，搞了一場「大鳴大放」。監獄裡和勞改隊也設立了「申訴信箱」，讓犯人申訴自己的冤情。

我望著那個「申訴信箱」，內心翻騰！我一連幾個夜晚睡不著覺，想申訴，又怕被扣上「不認罪伏法」的罪名，反而罪加一等。最後，我想了個辦法。我先找到那個比較正直的管教幹部齊幹事，向他談了我的冤屈，並請教他，我能否申訴。他回答說：「這事你自己決定，我既不阻攔，也不鼓勵。」

又經過幾天的猶豫，我橫了心，要申訴！大不了又把「死緩」給我加上來。

我向忠縣法院寄了申訴信。

幾個月都沒有回音。

這時，社會上開始「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了。原來，毛澤東的「鳴放」並不是要大家幫助共產黨整風，而是他要整人。監獄和勞改隊裡「反翻案」運動也開始了。那些申訴過的人一個個都有了回應，我記得那些天接二連三的宣布是：「查 XXX 原係重罪輕判，仍不認罪伏法接受改造，現予加刑 X 年。」

我心裡七上八下，不知法院會怎樣處置我。不過我心想，難道死緩也是「輕判」嗎？一天，王幹事把我叫去，一臉嚴肅地把一份檔交給我，說：「這是忠縣法院給你的回答，你自己看。」忠縣法院的答覆是：「李光榮，你來信收悉。一，據群眾檢舉，你分散封建財物到學校。二，對你隱藏槍枝問題，你必須徹底交待清楚，你要安心接受改造，把自己改造成社會主義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我看了這個答覆，真是哭笑不得。我申訴的是要求複查「企圖持刀砍殺民兵」一事，法院答非所問。不過，總算沒因此給我加刑，勞改隊裡的管教幹部也沒有因此抓我的「辮子」，我算是幸運的了。

三〉、悲歡 14 年，從「反面教員」到代課教師

李光榮夫婦

1970 年，我在關押、勞改了 19 年之後獲得釋放。家裡人準備到忠縣碼頭來接我，妻子叫我女兒來。我女兒說，我不認識爸爸，怎麼接他。我被抓時，女兒才兩歲，「爸爸」在她的概念中，只是給她帶來無窮苦難的人。

（李光榮講到此處，熱淚盈眶）

只好我妻子來接。我同她 21 歲時結婚，24 歲多時分離，再見時我們倆都已經 44 歲了。

回到農村後我開始學習幹一切農活，勞累辛苦都沒什麼，痛苦的是一搞運動就把我們「分子」抓去整一通。那時運動多，大運動套小運動，每次運動都是先拿我們這種「分子」們開刀。還有就是幹沒有任何報酬的「義務勞動」。農民們都是靠工分吃飯，10 個工分是一個「勞動日」，值二、三角錢。地富分子和其家屬們，活幹得不少，但不是被出「義務工」盤剝，就是被種種藉口剋扣。回到農村那些年的艱辛，也是一言難盡。

值得高興的是 1972 年我和我妻子在 46 歲時生了個兒子。給他取名費了些心思。那時還是文革時期，我們當然不敢給他取名為「衛東」、「向紅」、「衛彪」之類的革命名字，也不敢取名為「榮華富貴」之類——怕那些積極分子們又來「抓辮子、戴帽子、打棍子」。最後我們給他取名叫李余——把我和我妻子（余朝英）的姓組合起來。

1979 年是我人生中的轉捩點。這一年我摘掉了「分子」的帽子，結束了當了近 30 年的「反面教員」——這是毛澤東整階級敵人的語言。

由於國家開始實施「科教興國」的戰略，教育又受到重視，各地急需教師。

9 月 2 號那天，我正在撻穀子，突然被公社分管文教的黃主任喊上田坎。他說，經公社研究決定，由我和張官勝在五星村小學開辦一個「初中畢業生補習班」，當時的名字叫「回收班」，意思是「廢品回收加工」。

我又驚又喜又憂！驚喜的是，剛摘了「帽子」，又回到講臺；憂的是，從 1951 年入獄，已經 28 年，自己是否還能勝任教師工作？

但是，機不可失，我立馬答應下來，當了一名不入正規編制的「野教員」——頭銜是「民辦代課教師」。

從 1980 年起，小兒李余到五星小學讀書，每天我們都一同往返。那段日子，是

我一生中最最快樂的時光。我在一首〈放學歸途〉中寫道：「學罷尋歸徑，小陽春意融。游魚樂水暖，落日戀山紅……」

1984 年，是我人生中的又一個喜慶年。這一年，我教的班上有兩名學生考上了重點中學——拔山中學，其中一名是我兒子。

更大的喜事是，在我蒙冤 33 年之後，忠縣法院正式宣判我無罪！判決書全文如下：

忠縣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84）法刑字第 306 號

李光榮，男，57 歲，漢族，高中文化，忠縣拔山鄉楊柳村人，判前係忠縣八德鄉中心小學校長。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院以反革命罪，判處李光榮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改判為有期徒刑二十年，一九五五年減刑兩年，後刑滿回家。本人對原判不服，提出申訴。

現經本院複審查明：原判認定李光榮反革命罪不能成立。判處不當。據此，本院決定，依法撤銷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對李光榮的刑事判決，宣告無罪。

（公章）一九八四年十月八日

最後要說的就是那位冉澤民。1953 年，這位革命幹部也進了忠縣看守所，我在看守所裡與他窄路相逢。我說：「你也來了？」他點點頭，「嗯嗯」哼了兩句。他為什麼被抓進來？因為姦污女民兵的事東窗事發，加上其他一些罪行，他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後來他的老上級王善博當了忠縣公安局長，給他搞了一個保外就醫放回了八德家中。他便在拔山街上三角鋪擺攤賣草藥。

他的活動能力很強，後來他通過種種關係，也「落實了政策」，現在享受「離休待遇」。

採訪時間：2008 年 8 月 6 日

地點：忠縣拔山鎮五星村

採訪後記

李光榮老人住在鄉下一幢很破舊的土房裡，從外面看，它同四周的農舍沒有兩樣，室內也顯得十分貧寒。可李光榮和他妻子都是文化人，李光榮還是重慶市詩詞學會的會員，因此，與四周農舍不一樣的是，室內有詩詞字畫的儒雅氣氛。

老人對當年的遭遇，記憶十分清晰，時間，地點，人名，毫不含糊。他逐一道來，像是打開一本歷史書。除了講到 21 歲的女兒還不認識父親時掉下眼淚外，整個講述他都比較平靜。

可是，感覺得到，他對陷害他、造成他和他一家災難的人仍難以釋懷，對這種故意作惡而不受到任何追究的現象更是有些不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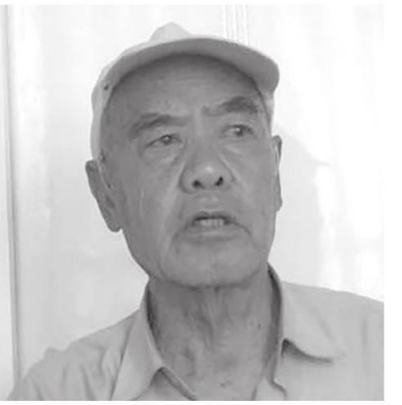
他只有在詩詞的寫作中找到晚年的慰藉和平靜。

採訪快結束時老人的女兒從田裡勞動回來了。已 60 歲的她身材苗條，步履輕盈，不像勞動了一輩子的農家婦女。她告訴我們，由於父親的問題，她這輩子吃了太多太多的苦，讀書、婚姻……她邊說邊聲聲歎氣。我們感覺到，她和她那滿面滄桑的母親一定也有令人迴腸蕩氣的故事，可惜，天色已晚，我們匆匆合了影就告辭了。

李光榮夫婦和他們的女兒在家門前
（2008 年 8 月）

補記：李光榮老人大約於 2014 年去世

八、家鄉勤勞苦幹的地主



講述人： 胡開雲

土改時雲南巧家縣小學教師

1929 年生

一〉、我的家鄉

我的故鄉原名叫雲南省巧家縣中五甲渭潔溝。當年渭潔溝有兩個家族，即胡氏家族和岳氏家族。據傳，這兩個家族的先人都是從湖廣遷來的。湖廣在什麼地方？是不是古時對兩湖兩廣的合稱？兩個家族的《家譜》都毀於火災無法考查。

這兩個家族稱自己的父親叫「呀」，稱父親的哥哥叫「大爹」，稱父親的弟弟叫「滿」。兩個家族互通婚姻、互相幫助、和睦相處，民風極為純樸。

那時巧家縣還有土司制，這家彝族土司姓祿，土司老爺的名號叫祿群英，老百姓稱他「祿統帶」。五甲的老百姓只知道祿家土司，不知道另有國家政府。整個上、中、下五甲約有三千來戶人家，都只向土司交納租稅。那時租稅較輕，一個五口之家自耕三、五畝地可收二、三石糧食，交土司官租一、二斗就可以了。

一石是十斗，一斗為十升，一升重量為現在的七斤。那時的土地可以買賣，買了土地的人按原來官租多少接著交就行了。

土司制度的歷史起源何時，這祿姓土司從何時開始，到祿統帶傳了幾代，老五甲人都說不清，只知道它的銜名是「拖車阿朵戶候司祿」。拖車是地名，「阿朵」是什麼不知道，「戶候」應是皇帝封給的一種爵位。早年的五甲人有土司這把保護傘支撐著，外面的風浪一般捲不進來，如滿清到民國發生的戰爭都未波及到此。那時的五甲人每年交納官租後還可以培植一些經濟林木，飼養一些家禽家畜，這些全歸自己所有，生活還是很充裕的。可惜後來龍雲的兒子龍三這個黑煞星闖進土司莊園後，這種世外桃源的祥和就被打破了。

二〉、我的爸爸和二叔

我出生在四世同堂的胡家，三房人在一起共有近四十人。家族的生活來源以農

耕為主，林牧為輔，兼收一部份地租，我們自耕地大約三十畝左右。地租（出租土地收的租）分兩種、一種是河谷區的水稻，另一種是高山的燕麥蕎子。林業主要以核桃、油桐為主，放牧主要以羊群為主。

我父親胡喜賢生於 1898 年，他文化不高，只能閱讀一般信函，不能提筆寫字。

父親對於理財興家付出了大量心血。他早年做臘蟲生意，趕過馬幫，運山貨土產到昆明出售，賺錢之後就買田地。他在六家村買了一塊水田，這塊水田每年可收稻穀租七石。他認為田地是農家的根本，有了田地就有衣食保障，子孫後代都不會受窮。他還買了山地，有經濟林木，主要以核桃、油桐樹為主。

大約在我五歲時，縣政府在老五甲建立區鄉政權，把老五甲署名為「巧家縣第七區」，我的故鄉叫「仁倫鄉」，父親被選拔到縣城培訓了幾個月，被任命為仁倫鄉的鄉長。鄉以下轄四個保，即渭潔溝、大青山、撕栗坪、三道坪。保以下又轄甲，每甲有十幾戶或二十幾戶不等。保裡有什麼民事糾紛，保長都有權調解。

那時的鄉政權沒有辦公地點，誰當鄉長誰的家就是鄉公所。從那以後我們家雞犬不寧，從早到晚人來人往。

那個時候郵遞沒有普及到農村，凡是上級的公文都是派人送達，這些人一來，不僅要吃飯，還要索取小錢（又叫草鞋錢）。我母親非常反對我爸當這個鄉長。鄉保長有多少薪水我不清楚。當時使用鎳幣，最多月薪幾十元鎳幣，還不夠那點小菜錢。

鎳幣

抗戰暴發以後，徵兵派款的事繁多。老百姓都不願當兵，每當公文下達徵兵名額，鄉保長都很頭疼。雖然抓兵是區團局派人持搶協助，但提名抓誰是由鄉保兩級決定，因此這是結怨於民的事。我母親多次勸父親辭職，但沒人願意接替，都不願幹這又賠錢又招怨的事，直到後來父親遇到幾場橫禍他才擺脫這個差事。

我二叔胡喜忠生於 1903 年，他略有文化，能書寫一般應用文。二叔對農業很內行，也很能吃苦，下雨天都要外出幹活。他的玉米地是坡地，他全部改造成梯地。二叔雇了兩個長工，這兩個長工對家務農活非常主動，從來不用主人安排。一個姓劉的長工訂的合同是十年，二叔為他娶了親，到合同滿時，又為他準備了生產和生活資料讓他去過獨立生活。但這長工不願離去，又多待了幾年直到 1949 年「解放」。劉長工「翻了身」，分了地，可是，不到兩年，搞合作化他又失去了土地，三年大饑荒時他沒能活出來。

二叔早年跟父親一樣，把辛苦積攢下來的錢買了好幾處田地，在家鄉他是很受

人羨慕的。但這為他後來當地主受苦受難埋下了伏筆。土改時，二叔背上剝削農民壓迫農民的罪名，挨鬥挨打，差一點把命都丟掉。他的家產被收繳，全家被趕出，在一個岩洞裡住了好幾年。他的子女成了賤民，處處受歧視，不能讀書、參軍、當工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雖然摘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但他已風燭殘年，還沒來得及過點正常人的生活就去世了。二叔就是上個世紀中國農村千千萬萬個中小地主的縮影。

三〉、我的創業

1947 年我結了婚，要做點男人的樣子給老婆看。那時吃飯不成問題，缺的是錢。父親掌管家產大權。開支都要經他同意。我決定自己創業，先編竹扇到城裡去賣。編竹器是我的專長，我重在美觀和精緻，如在扇子上編漢字、在簸箕上編詩句等。那次我編了一百多把扇子到昭通去賣，可惜沒掙到錢。後來，我又沿著牛欄江岸直上，因牛欄江岸盛產花椒、吳芋、木瓜子等山貨和藥材。我錢少只買了一些吳芋（一種中藥）揹到昭通去賣，結果賺了將近一倍。從此我不固定在一種產品上，見哪種行情好我就做哪種。我做過桐油生意，買桐油到昭通去賣。那時的昭通交道不便，都是崎嶇的羊腸小徑，往來很艱辛。昭通和我家鄉有牛欄江相阻隔，牛欄江灘多水急，全靠溜索相通。

溜索是用竹篾編成茶杯粗的長繩，選擇江岸較窄又有岩石的地方，將篾繩繃緊在兩岸的崖石上。溜殼是把碗粗的木頭剖成兩半，將中間挖空，像一筒竹子剖成兩半一樣。人要過江時，用溜殼夾住篾繩，再以粗繩捆緊，下面繫一根橫木供人乘坐，人坐在橫木上，左臂緊抱溜殼，右手一把一把地拉住篾繩向對岸移動。這種溜渡每次只能渡一個人，相當費時費力。若是笨重的貨物就把它捆在溜殼上，溜殼上繫有長繩，由對岸的人牽挽長繩，使溜殼滑動。若是對岸無人那就休想過江了。過江後 20 多里的路程全在江岸的陡壁上，最寬的地方不到 50 公分，有的甚至只有 30 公分，一不小心就會滑到翻騰的江裡。這一段路不能肩挑、只能背負，而且沒有歇腳的地方。揹運桐油更費力，因為桐油是液體，要把口封嚴後才能揹運。做這種生意特別辛苦。

我幹了近兩年時間，掙的錢並不多，深深體會到諺語說的「找錢如同針挑土」。

那個時代的山裡人要想不受饑寒的困擾，誰家不是這樣的苦拼苦磨才致富的呢？

我們家鄉根本找不到哪一家是靠天落餡餅而成為地主富農的。我想，若是遲「解放」五到十年，我這樣打拼下去也會像父親和二叔一樣，掙錢買地，成為一個地主

或者富農。

四〉、我去當教師

1948 年秋，一天我去陡灘口趕集，看到一張招生廣告：在拖車勳民小學另設了一個鄉村師範班，上面還有報名時間和考試的科目。我唯讀過私塾，沒學過新學，很感興趣，於是我去報名參加了考試，交卷後我被錄取。師範班的學員沒有一個初中生，大多數是小學生，像我這樣唯讀過私塾的不少。年紀最大的有三十出頭。後來我得知，這個鄉村師範班，是巧家縣中共地下黨辦的，目的是為了培植一批革命知識青年，以便在五甲地區開展革命工作。我對當時的政治形勢完全不清楚，我的家鄉恰如死水一潭。在師範班就大不一樣了。比如語文課有一篇教材叫〈中秋雜感〉，它的主題思想是：中華民族世世代代追求的是安居樂業、闔家團圓共享天倫，抗戰勝利後人們都認為這個願望可以實現了。誰知有人挑起內戰。是誰？是蔣介石。這課文當然是挑起民眾對蔣介石的怨恨。還有一支歌曲叫〈朱警察查戶口〉，歌詞反映老百姓對蔣政權鉗制人民自由的反感。還有一支歌曲〈農家苦〉，揭示了下層人民的現實生活。我在那兒讀了半個學年就又回到家。

1950 年秋，巧家縣被共產黨接管，新政權除了召開了一次全縣各界代表會外，其他政策均未出臺，政治氣氛顯得很沉寂，就像暴風雨前的那種沉寂。人們依舊像往常那樣忙著過年。正月初三，二叔的大女婿陽家譜來拜年，他長我兩歲，是昭通一中的初中畢業生。一天我和他談到今後的政治形勢時他說，我們兩家的家境都一樣，今後必然會劃為地主。與我們同齡的好多青年都奔赴了革命，只恨我們行動慢了未跟上，若不出去找點事做，待在地主家庭裡是不安全的。這個觀點我們一拍即合。他又說，他的三叔陽傳仁是新政權第五區的區長，他曾對他說：「巧家要大辦教育，要把原來的舊老師召集起來訓練，還要充實壯大教師隊伍。

他說，我們兩個都可以選擇當教師。

母親非常贊成我跳出去。於是，元宵節後，我動身去了縣城，找到新成立的文教局，交了一份〈自傳〉。兩個小時後，一位同志就領我到了教師訓練班，讓我參加訓練。這時訓練班已經快結束了。兩天後，訓練結束，晚上開聯歡晚會，訓練班裡的人上臺表演。我第一次聽到演唱〈東方紅〉，聽了後精神十分振奮，認為毛澤東確實是當之無愧的大救星。演唱者都是年輕的男女教師，我和他們相比土頭土腦，很是自卑。

第三天上午分配工作，我的心像打鼓一樣跳個不停，如果不要我怎麼辦？念到五十多名後才念到我的名字。我被分配到巧家縣第五區固紅山小學。

五〉、我目睹土改

到了固紅山後，發現那裡已經有教師了。這時，五區的文教助理顧若霖，還有農民幹部蒲志高等組成了一個工作組，要去黑鐵鄉搞土改，我便與他們一塊去了黑鐵鄉。

在黑鐵鄉，我們住在「惡霸地主」羅銀洲的家。一年前羅銀洲和他的兩個兒子加入了龍三的殘部，被解放軍殲滅。羅家只剩下羅銀洲八十多歲的母親、他五十多歲的妻子、兩個兒媳、一個女兒，一家全是寡婦。我們把辦公和住地設在羅家，把她們遷在耳廂裡去住。

第二天就召開群眾大會，顧若霖在大會上講了關於創辦學校的問題，然後就開始報名上課。開學後陸續來了二十多個學生，大的十五、六歲，小的七、八歲。學校是一個破舊的走廊，裡面只有幾條長櫈、條桌。沒有教材怎麼辦？訓練班根本沒有講到這些，顧認為主要以識字為主，可以自編一些以新生活為主的教材。就這樣我糊糊塗塗地混了一個學期。

第一個月，吃飯和工作組在一起。有幾天工作組不在鄉上。羅大媽一見我，黃豆大的淚珠就滾出來。她說：「胡老師，我一看見你，就想起我兒子羅楊裡，他和你一樣，才出山的太陽啊，他死得好慘啊！」我強裝正經說：「人已死了，哭有何用。」其實我家也和她一樣，我的眼淚也在肚裡流。她又說：「胡老師，你多推點豆花吃，把豆子拿給我兒媳推，讓我們找點野菜和著豆渣煮了吊吊命。」這話又讓我一陣心痛。我知道，羅家的糧食都被農會搬走了。我說：「我一個人的豆渣有多少呢？這不單是你一家的災難，慢慢熬罷。」

胡開雲

黑鐵鄉距區上約五、六十里，距我的家有一百多里，一天突然傳來消息，距區上不遠的小河街一下子殺了43人！

殺人像十級颱風席捲大地，每一個鄉村都在殺，幾十人、成百人地殺。我看到心裡震動很大。

一些未被殺的地主就像趕豬羊一樣，一串串的綁著送到縣城關起來，稱為「入食」。（我後來才知道我父親就是在此時被抓進縣城監獄的。）這次殺人狂潮不僅讓地主們心驚膽顫，就是普通農民也嚇壞了。黑鐵鄉也大開殺戒。殺人，對某些人來說如嚐新桃一樣，他們都想搶先試一試。

有一個姓唐的被抓來關在羅銀洲家的一間土屋裡。他抓來之前被打得遍體鱗傷，和另外兩個據說是土匪的關在一起。在一個深夜，那兩人刨牆逃走，姓唐的動彈不得，在土屋裡哀聲慘叫。蒲志高開門見唐還躺在土屋裡，就和顧若霖耳語一陣，然後把唐拉出土屋一百步遠的地方一槍打死。殺人後他們向區上寫報告，說姓唐的也要逃跑，因跑得慢被他們開槍擊斃了。

那些日子裡，我像落了魂一樣，心驚膽顫夢寢不安。每天放學回來，看到的都是捆人審人，聽到的都是慘叫呻吟。一天放學回來，見羅家滿院都是人，遍地擺滿亂七八糟的箱籠雜物，羅家五十多歲的老媽被捆了跪在地上。工作組和農會在追她的餘財餘物。

羅家老媽被關在我寢室隔壁的一間土屋裡。土屋一人高的地方有一個五寸見方的小孔，真像一間囚室。老媽不時發出斷斷續續的呻吟。我一夜輾轉反側不能入睡。約十二點後聽到土屋裡叫了幾聲「胡哥哥」。我佯裝未聽見，因隔壁就是顧若霖和蒲志高。後來她又叫兩聲「胡老師」。我輕聲問：「怎麼啦？」她有氣無力地說：「我口乾得很！請你給我點水喝。」我起來將陶壺裡的涼茶倒了半口缸從小孔遞進去。她喝完，又問：「還有嗎？」我把剩下的全部倒了遞進去，並叫她堅持，安慰她不會有大危險。

一天晚上，幾個民兵將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女人抓來，說她隱藏了浮財。這個女人也是地主，她丈夫已經被殺，她還揹著一個一歲左右的奶娃娃。蒲志高審問她，她說沒有金銀。蒲志高找來幾條細麻繩將婦人的雙手捆在一條長凳上，再用細麻繩將她兩手的五個手指捆在一起，然後把長約一寸多的子彈一顆顆插入捆緊的手指間。女人疼得渾身大汗，慘叫不止。那晚上折磨好幾個小時，還是沒有追出金銀。

後來，我在六區的綿紗彎鄉也目睹了土改的殘暴。綿紗彎鄉在金沙江右岸，左岸和四川金陽的新場相望，這裡江岸狹窄，兩岸高峰入雲。綿紗彎鄉場不大，有三十多戶人家，工作隊辦公處設在一個劉姓地主家裡，負責的幹部叫楊森珍，我被派去搞人口統計和田畝調查，歸楊森珍領導。楊森珍二十多歲，一身肥肉，臉如圓盆。她的「階級立場」很堅定，鬥地主時兩眼圓瞪，唾沫橫飛，指揮打手捆人打人時面不改色。她常常在夜裡和一些婦女長談，教她們如何在批鬥會上訴苦，如何假裝哭泣，如何才能流出眼淚。

每次開鬥爭會，都把地主五花大綁一排排地跪在主席臺下，家屬子女跪著陪鬥。大會一開始，口號聲如雷震天，單憑這個氣氛就把地主們嚇得魂飛天外。接著是安排的打手們上場，他們一上來就抓頭髮、撕胸脯、甩耳光，並像狼嚎一樣地吼：「你的家產是不是剝削來的？！」識趣的、有經驗的地主都一一順著回答。

那些沒經驗沒嚐過苦頭的還想申辯，只要一申辯就招來一頓暴打。

劉地主有個兒子在縣城讀初中，放暑假回家來，農會說他回家是來破壞土改運動，楊森珍叫人把這孩子捆起來吊在屋簷上，要他交待破壞土改的罪行。這個學生娃才十三、四歲，他知道什麼？他被吊得一聲聲的哀嚎慘叫，我不敢聽，也不敢看。

那些日子，我親眼目睹了野獸般的殘忍。

1951 年放暑假後，我匆匆趕回老家。一看，家已面目全非，各個門上都貼著封條，一大家人擠在兩間又暗又潮的屋裡。父親已經被抓走，母親滿面驚恐。

我勉強住了兩天就到縣城去了。縣文教科指示暑假裡教師到縣城集中。

縣城成立了臨時法庭，開群眾大會，把地主拉出來，衣服剝得一絲不掛，用一種叫作火馬草的來抽打。火馬草是一種草酸，那種草一沾在身上就痛。還用這麼長的一把竹條子來打。鬥打一番之後，就拖出去槍殺。我看到太害怕了。

我父親被關在縣城江西廟裡，裡裡外外布了幾道崗哨。一天中午我去看他，把事先寫好的紙條遞給崗警，崗警叫我站在原地等。約半小時他出來對我說：「你父親現在病了，叫你不要見他（其實是監規不准探望）。他叫你買一副豬小腸和一斤草煙送來給他就是了。」

那正是大熱天，幾百號人關在一所廟堂裡，就是鐵漢也熬不住，何況五十多歲的父親。

我買了東西送去，以為父親病了是要豬小腸治病。但他為什麼要抽葉子煙呢？父親從不抽煙也不喝酒。後來我自己當了囚徒才體會到，在苦悶和絕望中特別渴望抽煙。

幾天後，我到街上散步，走到坪正街小水溝時，見牆上貼著好多張布告。我上前一看，在一張布告上突然看到我父親的名字，名字上用紅筆打了一個叉。我一看他的罪行，頓時天旋地轉！布告上說他是惡霸地主，橫行鄉裡，欺壓農民，當過營長，勾結土匪，有兩條血債等等。我一直在家鄉同父親在一起，對他的情況很瞭解，比如，他從沒當過兵，怎麼就成了「營長」。那全都是不實之詞！

只是，他的確是個地主。父親一生勞碌奔波，又十分節儉，一年四季都穿土織的粗羊毛衫，冬天時他才穿布鞋，其他日子都穿草鞋。他一點一點地掙錢買地，當了一個地主。

我們最後一面是半年前我去黑鐵鄉時。在縣城那天我沒能再見他一面，一副豬小腸和一斤葉子煙就了結了我們父子的情份。我後悔當時為什麼沒再買些吃的給他。父親地下有知，六十多年來，我的心是何等的不平靜！

六〉、我的一點看法

地主究竟犯了什麼彌天大罪？不僅要殺人越貨還要禍及子孫！毛澤東曾說：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和地主階級的矛盾。他把地主說成是封建剝削和封建壓迫的代表，這完全是胡說八道。地主將土地出租給農民耕種，是平等的租賃關係，不存在壓迫和被壓迫的問題。如果哪一方的要求過高，協約就不能成立，雙方是平等的也是自由的。這就如今天的計程車一樣，車主出錢買車，乘客坐車不付錢行嗎？房主將多餘的房子出租給人住而收房租這是剝削嗎？而且，地主並不永遠都是地主，農民也不永遠都是農民。地主可以變成農民，農民也可以變為地主，這種轉變的關鍵是勤勞還是懶惰。我出生於農家，那些年常聽長輩們說：某家日子好過都是勤勞的結果，某家日子艱難都是懶惰所致。據我自己在農村時的觀察也是如此，那些勤耕苦作的人家，掙點錢置幾畝地，一步步發家。這種例子在我故鄉太多了。我二叔多年披星戴月地苦幹才買了地當了地主；另一方面，就算有家產，但遊手好閒，甚至還吸鴉片賭錢，幾年工夫就把家產消耗殆盡，比如我大爺爺的幾個兒子都曾擁有肥沃的土地，但由於抽鴉片把田地賣光了，土改時則成了貧農。我在故鄉看到，沒有一成不變的地主，也沒有一成不變的貧農。

毛澤東為了製造階級矛盾，挑起階級鬥爭，把地主妖魔化。當局利用無恥文人，編造了《白毛女》、《南霸天》、《收租院》、《半夜雞叫》等烏有之事來挑起對地主的仇恨。他們利用毫無人性的痞子向地主施酷刑逼浮財，把地主活活打死、逼死。我家鄉裡被劃為地主的，不是被槍殺就是活活被關死、整死。這是圖財害命，比強盜殘忍百倍。其實，兩千多年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並不是毛澤東說的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而是民主和封建專制體制的矛盾，是下層老百姓和專制王朝的各級官吏的矛盾。這些大小官吏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人民有冤無處伸，這才是舊中國的主要社會矛盾。

毛澤東搞土改使用暴力，用謀財害命的方式搶奪。他為了給自己的這種做法找理由，不惜製造大量慌言，說中國農民和地主的矛盾，是封建剝削和被剝削者之間你死我活的階級矛盾。這個定義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沒人質疑，甚至被奉為金科玉律。著名教授丁弘先生在他去世前（2013 年 7 月）寫下一篇石破驚天的文章〈江河常照經霜月——漫談中國農村地主經濟的命運〉。他指出：把地主做為剝削階級、做為階級敵人是一個「偽命題」。消滅地主實行共產，造成生靈塗炭，生產力受到嚴重破壞。為地主經濟正名，是歷史演進中的重大課題；是一個道德淪喪和道德回歸的過程。

我當年如果按照我父親和二叔的路一步步走下去，也會掙錢買地成為地主。

新政權的到來改變了我的人生之路。可是，我雖然沒有成為地主分子，但幾年後當了右派分子，與地主、富農並列為「階級敵人」。

我為什麼當右派，因為他們一定要我給黨提意見。他們說，我父親被共產黨鎮壓了，怎麼會對黨沒有意見。在他們的一再逼迫下，我說，當年給我父親列的罪狀不實，他根本沒當過營長，更沒有什麼血債。結果我被打成右派。21 年後給我改正時，認為我當年沒有說錯。

但是，我因此被「專政」了 21 年，婚也離了。

那是另一部血淚史。

採訪時間：2015 年 5 月

地點：重慶市江北區

採訪後記

胡開雲，趙正榮等是雲南昭通地區很有骨氣的右派，他們曾聯名上書中央，要求罷免當時的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我在 2015 年採訪了他們。後來，我又讀到了胡開雲老人寫的自傳，從他的文字中，進一步瞭解了他的家史和經歷。以上這些文字，主要就來自老人的自傳。

1949 年後，中國的歷史有一種獨特的「精彩」：一個奇冤之後往往又引出一串奇冤。原因就是，你居然敢喊冤！

1957 年，胡開雲因為說父親的冤枉被打成了右派，入勞改營長達 21 年。

這似乎已經夠冤枉的了，其實還不是。

最冤枉的是，他本來因為害怕，不敢說父親冤枉，共產黨非要他說，一邊強迫，一邊信誓旦旦向他保證「言者無罪」！胡開雲只得說了。

這一下大禍臨頭——長達 21 年的人間冤獄是他人生的血淚行程！胡開雲如此，本書中的冉德玉如此，這片苦難深重的大地上，千千萬萬像胡、冉一樣的人也是這樣！我不知人類文明史中，是否還有超過這種奇冤的現象。

晚年的胡開雲，一字一句寫下十多萬字的自傳，記錄了他的一生。他在自傳中說：「如果我對所經歷的社會不秉筆實錄，對毛澤東犯下的罪行輕易放過，那麼我就無顏對歷史，無顏對良知，也就是對歷史犯罪。」

可是，製造浩浩沉冤的當局最害怕的就是揭露歷史真相。

不知他們是怎麼得知胡開雲寫了這些文字，也不知他們是怎麼瞭解到他把這些

文字託付給了重慶的朋友，知道的是，老人為這些文字，又遭當局打壓，年近九旬的他被幾個公安從雲南押到重慶，強迫他和他的朋友，交出手稿！

據說，他從重慶返回雲南昭通時萬念俱灰。

我於是看到一條完整的「冤枉鏈」——1951 年，胡開雲父親被冤殺；1957 年，胡開雲因喊冤被勞改 21 年；2018 年，胡開雲又因記錄這一冤屈被迫害。

這真是一部精彩的歷史，也是中共統治幾十年的真實歷史。

為了抹殺真實歷史，當局費盡移山心力，不惜花費巨額「維穩經費」。

可是，抹殺得掉嗎？

九、我親眼目睹開膛挖心

講述人：張彧

1942 年生

我是酉陽縣龍潭鎮人，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叫張觀泉，是個教師，也是酉陽有名的書法家和畫家。

我家就住在龍潭鎮街上。龍潭是個有名的古鎮，以前很漂亮，一條清澈的河流從鎮中穿過。1958 年大煉鋼鐵前，我們那兒生態很好，鎮的兩邊都是森林，到處是魚蝦。

共產黨是 1949 年 12 月到龍潭的，龍潭兩邊是山，共產黨打來後，人們跑到山上去躲起來，士兵到山裡把這些人抓回來，只要是家境好一點的，就說他是土匪，不是槍斃就是判刑。這些事情要是去調查都能調查得到。

現在龍潭街上的龍潭全景宣傳照

我的一個堂伯叫張少清，他是龍潭的一個知名人士，是個很好的人。他被抓來砍了頭，說他是國民黨一個什麼青年組織的成員。砍頭後，他們把他的頭掛在龍潭中山公園的一棵松樹上，掛了六、七天，後來人頭掉下來被野狗吃了。那幾天，我天天看到他的頭，那張臉很慈祥，沒有一點恐懼。他被殺時好像才三十多歲。

土改時我八、九歲，在龍潭讀小學，我家沒有田土，因此不是土改的對象。但是，我親眼目睹的那一幕幕慘劇終身難忘！我家有個親戚叫張行書，是龍潭三村的人，

前排左一是張彧，攝於龍潭河東岸邊，背景是萬壽宮圍牆及樓門

他家在街上開了個磁器店，因此比一般人要富一點，因此就要批鬥他。

但是他已經生病了，病得很重，走不動路，話都說不出。他們把他抬到天府宮去批鬥，他在批鬥會場上當場斷了氣，他的家屬哭都不敢哭。

龍潭有幾個大家族，一個張家，一個王家，他們都被整得很慘，其實那些人都很和善，包括那些保長，不像現在居委會那些共產黨的幹部。

記得是 1951 年，好幾個月龍潭街上三天兩頭殺人。龍潭是山區，那些地主有好點土地嘛？殺人後他們去剮地主的衣服，都是些土布衣服，藍布、黑布，上面還打得有補丁，衣服剮了後，我看到大多地主都沒有內褲，那算個什麼地主嘛？一條內褲都沒有，他們只不過比一般老百姓生活稍微好一點。我看了大約六次殺人，每次都剮了衣服，屍體赤裸裸地躺在那裡。

殺人後，有的家屬不敢去收屍，到半夜時，就聽見豺狼在叫，豺狼爭搶屍體，叫得很凶！那些屍體都被豺狼啃吃了。對了，1951 年時龍潭的森林還很好，有豺狼出沒，龍潭的生態是在 1958 大躍進時毀壞的。

土改殺人我去看過六次，我從小膽子大，不怕；現在我也敢說敢做，不怕，因此成了他們（中共）的「維穩對象」。

我給你講一次讓我終身難忘的殺人現場。

那天他們在天府宮開了大會後，推出去槍斃七、八個人，我記不清是七個還是八個了。為首的是一個保長，叫徐國武，這個人我認得，他是龍潭二村的人。地點在龍潭河大眾橋的對岸，叫龍潭東，那裡就是當年共產黨殺人的地方。我有張照片，是 1958 年 7 月同一群朋友在那兒照的，我們的背後就是龍潭鎮大眾橋頭，就是土改時中共殺人的地方。人像背後就是龍潭鎮，那個亭子叫望江亭，是民國時中山公園的一景。張少清的人頭，就掛在公園內的一棵松樹上。現在中山公園、望江亭、大眾橋等都被中共拆毀了。

左一是張彧，背後就是當年的殺人現場

龍潭古鎮殘房

這七、八個人被五花大綁押到龍潭東，兩個民兵殺一個，打的腦殼。打了後，人的手腳還在抽搐時，行刑的民兵一湧而上，用匕首把綁繩割斷，把衣服剮了，然後開膛剖肚——用刀在屍體的胸口上割開一個十字口。我看到那個肉是白的，帶有紅色。

這些民兵挽起袖子，伸手進去把心臟掏出來，那個心臟還在滴血水。我聞到很大一股血腥味，我現在都記得那股血腥味。地下全是血。有的民兵把胃裡的飯都掏出來了。還有的人把打出來的腦水從地下捧起來，裝在一個土碗裡。我只離幾米遠，看得很清楚，那個腦水是白色的，上面還沾得有沙石。

他們怎麼吃的我沒看到，我聽我父輩和老師說，他們把心子拿回去爆炒後下酒吃，但是腦子是怎麼吃的沒聽他們說，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中國人迷信，認為吃啥就補（養）啥。

掏心、吃人心肝的事人們只是在書上讀過，而我是親眼目睹！我沒說假話，這段歷史在龍潭還能調查到，還有人在，這些被殺的人的家屬還在，我都可以給你提供名單，比如徐國武保長的兒子現在還在，叫徐朝陽（音），他在龍潭供銷社退休了。只是我想他們可能不願意談這事。

你問那些民兵？他們名字我想不起，但我深深記得他們那種醜惡的嘴臉。這些人都是社會上的地痞流氓，一個個好逸惡勞，滿嘴的粗話髒話，身上還有蝨子。現在的流氓地痞還穿得比較乾淨，那時的痞子民兵一個個髒兮兮的。他們成天酗酒，大吃大喝，看到女人就去挑逗。

龍潭古鎮

他們晚上巡夜，吃喝玩樂，提著刀槍打狗吃，幾個月下來，居然把龍潭鎮上的狗吃光了。龍潭是個比較大的鎮，在抗戰時，龍潭人口達到十萬。以前龍潭人家家都要養狗，土改僅幾個月，龍潭街上居然沒有狗了！

我家有條大黑狗，他們一刀砍下去，砍了近二十公分的口子，但是大黑狗居然掙扎跑回來了。那一刀砍在牠肚子上，腸子都露出來了。牠天天去

舔牠的傷口。但我們不敢吭聲，只有一聲聲地叫牠：「大黑，大黑！」我奶奶看牠那個慘狀，不停地說：「喪德呀（缺德，沒天良），喪德呀。」最後那條狗還是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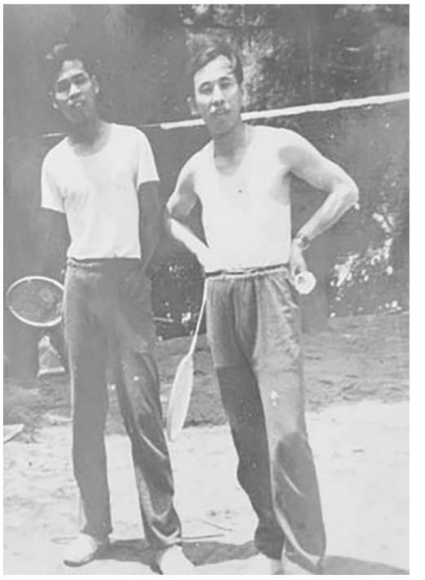
那些地痞流氓有人支持，是叫什麼軍管會的人，共產黨來了一個指導員，成立了臨時政府，他們支持民兵亂搞，很醜陋。

我記得那段時間龍潭萬馬齊喑，人們臉上看不到一點笑容，我的老師和一些長輩說：「共產黨太可怕、太惡毒了，我們這些人要遭殃了。」

土改時我家雖然沒有受到迫害，但我看到的那一幕幕慘景，刻骨銘心！我給你講的，都是我的親眼目睹，我是個老知識分子，一輩子沒說假話。我講的你可以去調查，必要時我可以出來作證。

講那段血腥歷史我也不是不害怕，那些年我也是苟且偷生，否則早就死了。我父親一直對我說：「兒哪，不要講，講了要遭殃。」我姐姐她知道不少事，但就是不敢講。現在如果我出了事，家裡肯定會受影響，首先是經濟上的。但是我想，我都 76 歲了，我死了誰來講？誰來揭露那段黑暗歷史？

所以，我主動找你，哪怕因此坐牢我都要說。



張彧（右）攝於文革

採訪時間：2018 年 6 月 8 號

地點：美國洛杉磯——中國貴陽市

採訪後記

這是一次極其獨特的採訪——通過微信跨國採訪。

張先生前些日子看到了關於我作土改調查的報導，千辛萬苦設法找到了我，他說，他瞭解一段土改時他的親眼目睹，希望我去採訪。

搞土改調查這麼多年來，極少有人主動「請纓」，極少有人敢說「哪怕坐牢我都要講」，因此，一旦遇上，我自然是滿心歡喜，立馬出動。可是，這次我遠在異國他鄉，而眼下又沒有回去的可能。為了不失去一位老人珍貴的歷史見證，我同他做了視頻交流。以上的內容，便是跨越萬里重洋後的記錄。

僥倖保存下來的萬壽宮

龍潭曾是川東一個美麗的古鎮，我早就聽說過它，並在 2017 年 5 月前往拜訪。

雖說由於環境的破壞和「現代化」的開發，龍潭與中國絕大多數古鎮一樣，已經沒有多少古樸的韻味，但那殘存的萬壽宮、王家大院等仍然可以讓人追思它當年的風韻。

我曾走進王家大院，當時我就想到，這座豪華宅院一定有豐富動人的故事，在土改到來時，這兒也一定驚心動魄。可惜，這座宅院早已人去樓空，眼下，偌大的院落空蕩蕩地任幾個孤客注視它啞然無聲的存在。

我想向張先生瞭解大院的歷史和人物的命運，可惜他也所知甚微。不過，他說，我如果去，他可以提供一些人的名單供我採訪。

我又一次怦然心動。

我多麼渴望前去採訪，多麼渴望踏上那生我養我的故土、那讓人魂牽夢縈的山川！我的人生、情感、事業等等與那片土地緊緊相連。

前些日子，在好萊塢的山坡上，望著蒼穹下連綿的群山，我感歎地說，它有一種蒼茫的美，可是，它沒有讓我產生一種惆悵和沉思，一種透徹心靈的感動，一種長河落日、大漠孤煙的悲壯和深沉。

也許，是這片美麗的新大陸缺失了數千年旌旗獵獵、悲風浩浩的壯烈；缺少了黃土地那悲歡離合、烽火狼煙的厚重。

尤其是，它沒有我曾耳聞目睹的那一幕幕鮮血加鮮血、苦難加苦難、屍體加屍體的人間悲劇！

2017 年 10 月 7 日，我採訪完秀山縣 (離龍潭鎮不遠) 一位老人胡祖暖後，獨自前往湖北，尋找他當年同他戀人最後分別的地方——咸豐縣看守所。

從秀山到黔江，從黔江到咸豐，一路上雲霧繚繞，峰巒疊嶂。當年，1963 年，胡祖暖就是同他 19 歲的戀人楊姑娘，沿著這條山路徒步走向他們悲壯的永別。

我注視著沿途的群峰山巒田野村莊，想到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愛恨情仇悲歡離合，一種由苦難催生的深沉和山川喚起的熱愛，交織奔湧，排山倒海湧上心頭。

中華民族百年的血淚滄桑啊，我不幸看到了你喧囂下面沉默的真實，我有幸讀到了你遺忘後面苦難的記憶。

2003年，我在《長壽湖》後記中寫道：我感到一種強烈的感召——苦難的感召，彷彿苦難催生了一種深沉悲壯的情懷，喚起了內心金戈鐵馬般的衝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個荒唐人的夢》中說：「正是由於這裡出現了不幸，我才更加熱愛這片土地。」茨威格在《昨天的世界》裡說：「如果我們能以自己的見證為下一代留下我們那個時代分崩離析的真實情況，哪怕只是一點半星，也算我們沒有完全枉度一生。」

可是，面對張先生要提供給我的採訪名單（線索），我卻束手無策，心中悲憤，如太平洋萬頃波濤！無奈中，唯有寫下這段文字，一吐心中千重塊壘。

酉陽縣龍潭王家大院，無人知曉的故事？

注：本篇圖片由張彧提供和譚松攝影

十、槍斃啦槍斃啦！

講述人： 關德仁

我親眼看見了李鎮宇被槍斃。

李鎮宇解放前是縣中（今忠縣中學）的訓育主任，是我們村的人。他是在中壩子——甘井河中的一個小島上被槍斃的，那時我在甘井讀小學，有 9 歲了，坐在會場前面。那天到處都架起機槍。聽說打他的那個人，執行槍決的軍人，是他的學生，他看了人情，沒有把腦袋打開花。另一個被槍斃的人叫楊天香，他為人要討嫌些，行刑的人就把子彈磨了再打，一打就開花了。聽說把子彈磨了再打就能打開花。被槍斃的不止一個，多喲。我那時膽子大，走攏去看，楊天香的腦髓被人挑了出來，我回來一天都噁心，吃不下飯。

槍斃李鎮宇前有 600 多人聯名來保他，說他不該殺。區土改工作團說，解放後他還有這麼大的勢力，解放前不知有多大的勢力呀，槍斃啦槍斃啦！材料報到忠縣城，縣裡一看，槍斃不得，這個人還是共產黨的朋友呢，槍斃了怎麼行，馬上派人送信來叫刀下留人。結果來人還在會通橋時（甘井場邊的小橋，離刑場很近），這邊的槍就響了。

李鎮宇幾十年後平反了，那有啥子意思嘛。我在忠州中學的一份材料上曾經看見過對李鎮宇的介紹，說他是有貢獻的人。

李鎮宇有個隔房的嫂嫂叫馮國翠，丈夫死得早，守寡多年，人稱「興興大少娘」。鐵山那些民兵們把她整得慘啊！往她褲襠裡放黃鱔，放蛇，讓黃鱔和蛇往下身鑽，又捆起來吊，還在背上壓石頭再吊。又把柴燒起烤她的下身，皮肉都烤得發臭，後來起碼爛了一兩年，好多人都看到的，皮肉都爛掉了，一些人還說她下面是個光板子，毛都沒有一根。

馮國翠被折磨死了，她有個兒子叫李剛，還小，趕去鮑家灣（巴營場）和黃家場賣洋火（火柴）謀生，他發奮讀書考進了忠縣師範學校，沒有錢，經常餓著肚子讀書，畢業後分到雲陽縣教書。2000 年，他的一個同學調到甘井中學工作，受委託來給他母親修墳，哪裡還找得到屍骨？最後勉強修了個墳，根本就不是他母親埋葬的地方。

採訪時間：2006 年 6 月 1 日
地點：重慶市渝中區袁家崗

採訪後記

中共的洗腦，特別注重從娃娃抓起。當年的血腥屠殺，也要讓娃娃們前去接受「教育」。鎮反和土改時，每遇殺人，學校便停課，組織學生前去觀看。我採訪的當年的小學生張美軒、初中生謝成陶等都談到這一點。

中共有意要把恐懼植入人們的心中，連小學生都不放過。

它又成功了。幾十年後，關德仁談起他看到被打出的人腦時，近乎聲嘶力竭；張美軒則說，他幾十年來，一回想起那個殺人的地壩，就不寒而慄。

人們對中共強權的恐懼，隨著一次又一次，一波又一波殺人的槍聲，已經深深融入了國民的血液中。

注：因故隱去關德仁的採訪照片。

天津，1951 年 3 月 31 日殺人現場，人們鼓掌歡呼。
小孩站在前排。（網路圖片）

十一、我參加革命，家人被「革命」

講述人： 鄔錫昌

雲陽縣黃石鄉人，1923 年生

我出生在雲陽縣黃石鄉，後來合併到雙江鄉，我們村叫鳳凰村，後來改為東風村。我們村的地勢很好，山樑環抱，像一條龍圍著我們村莊。

我們鄔姓在雲陽是一個大家族，明末清初張獻忠殺四川，下川東殺得只剩下冉家、柏家等幾姓。我們鄔姓是由湖南填四川來的。1723 年，我們鄔家的始祖鄔玉石由長沙來到雲陽，雲陽出鹽，又有煤，祖輩們靠熬鹽和挖煤一步步發起家來，曾經買了七千多擔穀。後來，五大房人分財產，一代一代分下來，到我父親這一代已經是第十代了，他只分到了 20 多擔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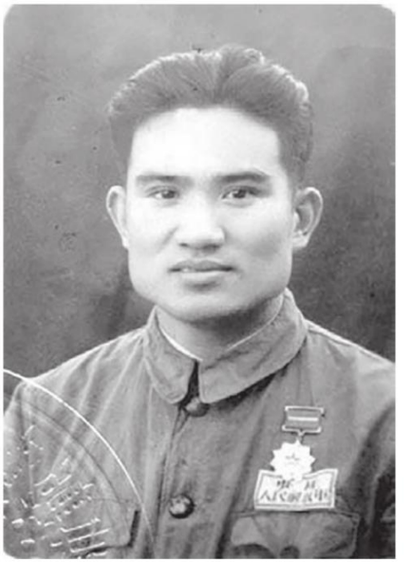
所以，我家的土地是祖傳下來的。家族裡的人有經營得好的，也有敗家的，好的可以再買土地，差的就賣地。當時買賣土地先是由雙方簽字劃押，有中間人作保，要有證人，證人也要蓋章，沒得章的要寫「親筆簽押」的字，還要由當地的保長蓋章。然後到雲陽縣的田糧管理處蓋章，蓋章還要交稅，大概要交相當於現在的兩千來塊錢。這樣買賣才能生效。

我先說說我的經歷吧。

我 8 歲時（1931 年）到當地雲峰小學上學。小學是我們鄔氏宗祠創辦的，教師都是高薪聘請，一日三餐都有葷菜，而且免費。寒暑假教師去來的行李費（挑夫力費）都報銷。當時聘任的校長是吳銳菁，她是個民主人士，解放後任四川省政協委員。我在雲峰小學讀了 7 年，早晚升降旗時，四個小銅鼓、一個大銅鼓、一把大號、兩把小號，全體高唱義勇軍進行曲，氣氛熱烈。雲峰小學還聘任了多名中共地下黨黨員教師任教，如劉志大（解放後第一任巫溪縣縣長，後任湖北省恩施黨校校長）、溫載南、陳夕襲（解放後雲陽縣第一任人民銀行行長）等，他們在學校傳播革命思想。那時正值抗日戰爭時期，在地下黨老師的影響下，我不知不覺就產生了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抗日救國思想。而且，我認為共產黨是抗日救國的。

1939 年秋我考入萬縣致遠中學。史地老師方惠田一直教育我們說，學好史地就知道愛國的道理，歷史地理就是愛國主義的好教材，這使我對歷史特別喜愛，以致

後來我選擇了史地專業。1943 年秋，我轉到重慶唐家沱載英中學讀書，校長就是大名鼎鼎的數學家何魯。他曾坐轎子去拜望四川省主席劉湘，轎子前後打著燈籠，別人問為什麼，他說天太黑暗看不見路。下轎後他又說，川西壩子天高了三尺，劉湘秘書問他此話怎講，他說貪官污吏把地皮刮去了三尺，所以天高了三尺。我就是慕名去讀他的載英中學的。1945 年，我考入在萬縣的上海法學院專科，後又在輔成法學院學完本科。1949 年 12 月 8 號萬縣解放，我參加了輔成法學院迎接解放軍入城。1950 年，我參了軍，先在西南軍政大學學習，後在第二高級步兵學校任教員。



鄔錫昌在部隊留影

家鄉土改時，我在部隊裡，沒有親眼見到那些場面，不過，我家人的遭遇和我們鄔氏家族一些人的遭遇我是瞭解清楚了的。

先說我的家人：我父親叫鄔筱藩，排行老八。土改時把他抓到黃石鄉易家寨子批鬥，那是一個保的公用地。一個叫劉 XX 的農民（易家寨子人）控訴我父親當年打過他一耳光，於是就把他抓到黃石鄉關押起來。當時整個鄉的地主都關在那兒。

我父親雖是地主，但只是一個很小的地主。他關在黃石時，那個劉姓農民又跑到黃石，告發我父親霸氣，說這個人應當槍斃。就這樣，我父親被鎮壓了。

與我父親同時遇難的還有我哥哥鄔錫榮（同父異母，他在黃石鄉當了一個什麼幹部），那一天他同我父親共赴黃泉。

我母親叫鄔柏氏，有一次，地主們被集中在黃石鄉易家寨子開鬥爭會，那是六月的天氣，他們先把地主們一陣曝曬，然後開鬥爭會。會上，一個姓王的土改民兵衝上來，一棒把我母親打倒在地。這一棒打得狠，我母親沒能再站起來，她被當場打死了。

所以，土改我家死了三口人。

再說我瞭解到的我們鄔氏家族一些在鎮反和土改中被鎮壓的人：

1、鄔百僚（畢業於四川大學，文筆很好，在雲陽公報任主筆）；

2、鄔月丹（黃石鄉小學教師，因當過黃石鄉鄉長被槍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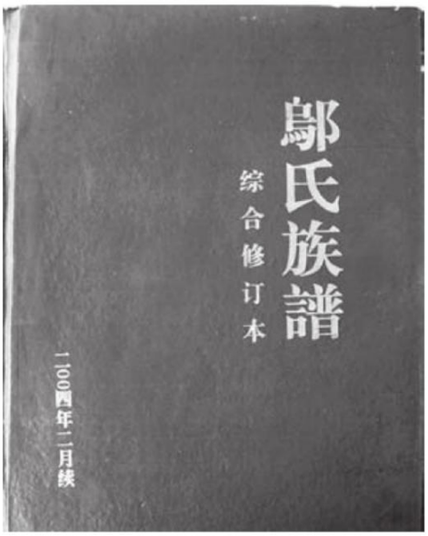
3、鄔秉文（他文筆也很好，因當過黃石鄉鄉長被槍斃）；

4、鄔仲明（因在黃石鄉當過保長被槍斃）；

5、鄔錫雅（他思想很進步，想去陝北延安，但走到西安就被阻攔，被強迫入了國民黨軍校 14 期，國民黨快垮臺時他回到雲陽）；

6、鄔子赤（黃石鄉龔家灣人，收千擔租）；

7、鄔孟生（土豪，當過國民黨團總）；
8、鄔輯光；
9、鄔河光；
10、鄔錫純。
以上這些都是我們鄔家的，我們是第二房。



鄔氏族譜

最後再說說我和我家人的情況：

我 1954 年 8 月從部隊轉業，當了一名中學教師，1957 年被打成右派，下放重慶長壽湖勞改。1963 年 7 月我又被放回我的出生地——雲陽農村。我在那兒勞動了整整 15 年，直到 1979 年「改正」才回到學校。

我媽被打死時，我的小妹妹鄔錫蘭才十來歲，她獨自一人，嚇得跑到外面去躲藏了一段時間。當時我在部隊裡有收入，是我寄錢給她讀書。她讀書很行，後來當了山西大學環保系副主任，現在她 70 多歲，退休了。

我弟弟鄔錫根在高中時就參了軍，抗美援朝，在部隊當衛生員，他們那一排人守山頭，一仗打下來只剩三人，其中就有他，他因此立了三等功。80 年代我右派改正後才同他聯繫上。他現在還在，在雲陽，84 歲了。

採訪時間：2014 年 2 月 6 日
地點：重慶棗子嵐垭

採訪後記

12 年前，我在採訪重慶長壽湖右派時曾經採訪過鄔錫昌老人，那時，記錄下了他當右派的經歷和他十分不幸但卻萬分感人的婚姻。沒想到 12 年後，我會又走進他的家，聽到另一段遠逝的歷史。鄔錫昌老人雖然已經 90 高齡，但卻對當年的那些人名地名記得非常清楚，採訪時，他脫口而出，彷彿說的就是昨天的人和事。分手時，他借給我一本厚厚的鄔氏族譜，這本長達 464 頁的族譜讓我感到：

1、雲陽鄔家的確是一個「氣勢磅礴」的大家族；
2、這個家族近 300 年的發展演變一定「絲絲入畫」；
3、1949 年的到來一定讓這個龐大的家族「亂石崩雲」。

十二、一對夫妻生離死別的故事

講述人：胡祖暖

1940 年生

三年前，2014 年，我遇到了我的一個的表嫂，她已經 90 餘歲，帶著她的兩個兒子和兩個孫子從上海來搬遷她丈夫的屍骨，她丈夫是我的表兄魯世洋。她對我講了她的經歷，我把她的經歷寫下來了。

上海抗戰時，學校停課，組織戰地服務團，到醫院去救護傷兵，當時醫院人手少，送來的傷員很多。那個醫院是一個臨時搭的棚子，我在那兒幹洗傷口、換藥、包紮的工作，每天很累，因為傷員太多，一批接一批的送來。

由於傷員多，麻藥緊缺，無法動手術。有的傷兵非常勇敢，要求醫生沒有麻藥也開刀。他們說，沒關係，敵人的槍炮我們都不怕，還怕你一把小小的手術刀。

我在現場看到，子彈已經傷到你表哥腿上的骨頭了，要劃開很大一個口子才能取出。醫生有些猶豫。你表哥一再要求，醫生終於動手。唉呀，那個血直流，他痛得滿頭大汗，但他一聲不吭。子彈取出來放到托盤裡，當時我就端著那個托盤。

他的那種英勇深深打動了我，給他包紮後我用毛巾給他擦汗，心裡有了一種感情。接下來，每天再忙我都要拐到他的病床前去看看他，同他說幾句話。每天要是看不到他兩次，心裡就很失落。其他同學看出來了，開玩笑地說：「妳是不是愛上了？」這時我明白，我真的是愛上他了。

他在醫院住了兩個月，這期間他幾次要求出院，他說他是個軍人，現在國家這麼危難，他要早日再上前線。記得他終於出院時，非常高興。我約他走前到我家聚聚。他來了，對我父母彬彬有禮，向我父母表示感謝，感謝我對他的護理。

父母看到這樣愛國、勇敢的青年，十分讚賞，做了幾個好菜招待他。同時，父母也看出我愛上他了。我父母都是教師，知書達理，他們對世洋說，你放心上前線，等戰爭結束了，同我女兒成親。我沒想到父親會陡然這樣說，我還是個少女，一下子滿面通紅，我捂著臉趕緊跑進了我的房間。其實我心裡很高興，很激動。

父母叫我送他。我們一起走，到江邊河堤邊時，天下雨了，我打開傘，我們兩人站在傘下，貼得很近。

他擁抱我了！我的胸脯貼著他的胸脯。這是我第一次被一個男人擁抱，那種男人的氣息讓我心一陣狂跳。我很害羞，江邊人很多，傷兵、難民，幸虧沒有認識的人。

船開了，我們一直揮手。

戰爭結束後，我們如約結婚，但是當時上海飽受戰爭的創傷，父母就同意我們到他家鄉去。這時世洋已經是連長了，部隊上留他，準備提升他為營長。他謝絕了，他說，打了八年，國家要休養生息，我們士兵也要回鄉了。所以他就帶著我回到他的家鄉，就是秀山中寨。

到土改前，我已經有兩個小孩，過的是相夫教子的生活。共產黨來的時候，有人組織了「九路軍」，叫世洋加入去打解放軍，世洋不願去，我也不准他去。他抗戰之後就回鄉務農，從沒同共產黨對抗過，也沒做過任何惡事，過的是小老百姓生活，我們就認為自己會是平安無事的。沒想到有一天，四、五個民兵突然闖進家來，把世洋捆起就走。我趕快喊：「他犯了什麼罪？」一個民兵說：「什麼罪？反革命！國民黨軍官！」我說他是抗戰打日本呀。一個民兵轉身一腳把我踢倒在地上。兩個娃娃也大哭，鄰居圍著看，沒有一個敢出聲。

幾天之後，幾個民兵來把我和兩個兒子關在一間小房子裡，惡狠狠地說：「老老實實待在這兒，不准亂動，否則一槍打死你！」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把我們關起來。接下來聽到外面喧鬧，呼口號：打倒反革命分子！打倒某某某！喊了一串名字，其中我聽到有「打倒魯世洋！」聲音大得很。我從門縫裡看，每個被捆綁的人後面都有三個民兵推著在走，往山坡上的公路走。

魯世洋妻子當年奔跑上來的地方

不一會，從山坡上傳來「啪啪啪」的槍聲，我渾身一震：完了！世洋完了！我從窗子破窗跳出去拼命往山坡上跑。那是一大坡，我跑上去時，地上躺了十多個人，我看到了世洋，他的頭打爛了。我撲到他身上哭：「世洋啊，我們不該回來呀，你說家鄉好，山青水秀。」哭了一陣，我把他的頭皮一點一點的撿起來。

（此情景被一個 15 歲的孩子看到，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下面是魯澤慶的講述）

一〉、她一點點撿起丈夫的頭骨

講述人： 魯澤慶

1936 年生

土改時我 15 歲。在我的記憶中，有一件事是最慘的，那就是在中平鄉目睹殺人後的一幕。

我有個舅叫楊炳蘭（音），是中平鄉人，那天，我叔叔帶信來，說我舅當天要被槍斃，叫我家去個人最後看他一眼，我媽不願去，叫我去，我就去了。

那天在中平街山坡上的一個平壩裡殺了 13 個人，我記得有個姓羅的，一個姓劉的，還有茶園周家的。我們魯家殺了魯世洋和魯世駿，魯世駿還很年輕。我講的「最慘」就是魯世洋被槍殺後他妻子的哭聲。他妻子是上海人，我叫她大娘。殺魯世洋之前，大娘就被關起來了。槍響之後，她從街上跑上來，那是好陡好大的一坡！她跑到刑場，到處看，找到了，魯世洋的腦殼被打得粉碎。她一下撲在他身上：「世洋呀世洋呀……」唉呀，那個哭聲好悲慘！「他們把我關起，不准我來看你呀……」她痛哭了一陣，然後去一點一點地把他頭骨撿起來合起。合起後，又把他的腦水一捧一捧地捧起來放好，最後用布把他的頭裹起。你看，那是真正的夫妻呀，其他人誰敢去做這事？我在現場就駭得渾身發抖。她的舉動我們魯家再也找不到第二個。

胡祖暖：

下午，世洋的父母來了，這時其他人的屍體都被家屬抬走了，他們叫我回去，我不走，我說我要最後陪世洋一夜，就是要埋也要等到明天。我讓他們回去照看我的兩個小孩。那一夜我趴在他身上，一點不覺得害怕，就像是平常他睡在我身邊我靠在他身上的那種感覺。

我一會哭，一會又迷迷糊糊，一直到天亮。世洋的父母帶著幾個親戚來了，還帶來了一個木板釘的匣匣，我們就在刑場邊上的山坡旁挖了個坑，然後把山壁上的泥土挖下來掩蓋，算是做了個墳。

一個星期後，有一天，一個民兵闖進來，說：「妳不准再哭了！」他說著一把抱住我。娃娃以為他要打我，大哭起來。公婆趕快出來，這個民兵才放了手。

沒多久，公婆相繼去世，這一下，他們三天兩頭來騷擾，民兵也來，農會的人也來。我態度很堅決，我說，世洋雖然死了，但我們是一輩子的夫妻，我要守他一輩子！我當時非常剛烈，還把褲腰帶打成死結。他們沒能得手。但是，我知道他們不會死心，不被他們強暴，就要被他們毒打，這是早遲的事。我於是決定返回上海。我還有點私房錢，藏在一塊樓板下沒被他們發現。一個晚上，我帶著兩個小孩，沒往秀山走，是往湖南方向走的。走了一個多星期，我回到了上海。上海是大城市，不像農村那樣野蠻。

父母給我找了個工作。有人想給我找個男人，我不幹，我從此一輩子獨身。

我父母很理解我，什麼都沒說。我小孩在上海長大，後來在工廠工作，現在也退休了。

我 90 多歲了，身體雖然還好，但知道來日不多了。我對孩子說，我最後的要求就是要回秀山，去把你們爸爸的遺骨帶回來，今後清明好紀念。兩個兒子不同意，說我年齡太大了，路又遠，路上不安全。我堅持要回來，說這是我最後的願望，我提出由孫子開車，路上若身體不適好上醫院。我說，這是母親對於你們最後的要求，如果你們不同意，我死不瞑目。

我回來看到，當年的舊房子全部沒有了，墳也早沒有了，找鋤頭來挖，什麼都沒有挖到，只好在當年埋他的地方包了一包土，準備帶回去放在買好的骨灰盒裡……

胡祖暖：那頓飯我們吃了兩個多小時，她還想去走訪一下當年的親戚，住一段時間再走，可是她的兩個孫孫催著回去。她也沒辦法，雖然知道這是最後一次回來，但還是不得不匆匆走了。

（下面是魯世洋堂侄的講述）

二〉、我帶她去看，早已沒有墳了

講述人： 魯澤愛

1944 年生

我們魯家以前是個大家族，家譜算下來我家是第三房，魯世洋屬第二房，高我一輩，我叫他叔叔。我爸爸

魯世福在江西當連長，我媽去看過他，她對我說，爸爸是抗日部隊，還當抗日游擊大隊的大隊長。她還拿回來了一張照片，我爸騎在一匹大馬上，挎一把洋刀。可惜這照片失落了。

魯世洋就在我爸爸手下當兵。抗戰結束後他就回鄉了。但是，我爸爸沒有回來，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是死是活至今沒消息。

魯世洋帶了個愛人回來，是個上海人，我叫她嬸娘。他們回鄉後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叫魯澤文，一個叫魯澤武。

土改時魯世洋被抓去殺了，就在上面公路旁。他的罪名是土匪。其實他根本沒參加土匪，是土匪自己給他安個中隊長的名。我們魯家還有一個也是這樣被殺的，他叫魯世俊，是大房的，他原本是個學生，剛從學校出來，土匪把他拉去給他安個書記官，他也是根本沒去，但也把他槍斃了。

魯世洋被殺後，他愛人帶著兩個小孩回上海了。十年前她獨自一人回來過，那時她都是 80 多歲的人了，但頭腦清楚得很。三年前她又回來了，帶著她的兩個兒子回來的，這時她都 90 多歲了，耳朵聽不大到了。她還想看她當年的老房子，我對她說，已經沒有了，老房子全部拆完了。她還回憶她老屋後面那一片竹山。我帶她去看她老公被槍斃的地方，我說，後來開路，墳都被挖了。其實，也說不上是墳，當時是挖點土掩蓋到就完了。他家的情況我媽媽最清楚，她也給我說了不少，她已經過世了。

土改時，二房除了魯世洋，其他幾個：魯世蒸、魯世蔭、魯世全都被槍斃了。大房的魯柏濤是中平的鄉長，但他沒被槍斃，動員兩個鄉的農民來鬥他都鬥不起來，為啥？因為他是個好好先生，一個善人，群眾對他沒得意見。沒有殺他，只把他判了個勞改，他勞改幾年後回來，活到前幾年才死。

我們是魯家的第三房，也是較窮的一房，沒什麼財產和勢力。按我家的田土和人口算，我們劃為中農，所以，土改我家沒挨整，不像大房和二房，遭得慘。

大房、二房的人被槍斃，財產被收繳後，他們的兒女們都流落出去了。他們沒得飯吃，家也抄完了，只得跑出去。比如魯世凡家的魯澤川，他爹媽死時，他才幾歲，他討飯到秀山，後來抱給人家了。魯世儀家的魯澤富，也是抱給別人的。多年來我們都不知道他們在哪兒，直到前些年他們長大成家了回來認祖大家才聯繫上。三房中只有我們這房還沒得出去討飯的。

但是，在土改複查時，又把我家評成了地主！原因是，我家有一個親戚叫魯平（音），他爹媽死得早，死時兩個小孩才幾歲，於是我們就幫他家經營。土改複查時，農會把他家的田也算在我家頭上，於是把我家也評成了地主。

就是這頂地主帽子把我壓住了，否則我哪裡還在這兒待著！

採訪時間：2017 年 7 月 6 日；7 月 9 日
地點：秀山縣石耶鎮半邊街；中平鄉中寨

採訪後記

剛到秀山不久，胡祖暖就帶我去看一個當年的刑場——離他家約 20 里的中平鄉中寨刑場。刑場就在公路邊，是山坡裡一塊不大的平地。胡老人說，當年這兒一次槍斃了 13 個人，他專門趕來看到了那一幕。他還走到刑場草叢中說，有一個上海女人在這兒包了一包土回去，因為她丈夫被槍殺在這兒。

當時，我因為不知道這個故事，因此沒有特別在意。後來得知了這場生死之戀，感動之餘，我又專程來到中寨，查看當年她奔跑到刑場的那一坡山路，尋找魯家後代的知情者。

還算幸運，找到了魯世洋的表親魯澤愛，不僅得知了一些有關資訊，而且還看到了族譜上關於魯世洋的記載（由於他是被做為反革命槍殺的，至今沒有獲得平反，因此族譜上沒有寫他的死因，甚至連死亡日期都沒有記載。）

採訪完魯澤愛之後，我又來到那片刑場，此時，我的感受同幾天前完全不同了。

66 年前的一個夜晚，一個年輕女人，在這兒抱著一具破碎的遺體，與他度過了最後一夜……

3 年前的一個白天，一個蒼老婦人，在這兒挖起一捧泥土，帶走了她永恆的遺恨和思念……

第一次剛到這兒時，天，突然落下大滴大滴的雨點；第二次來時，雲淡風清，四周一片寂靜，刑場上的淒淒芳草，在風中悄無聲息地隨風搖曳……

魯世洋遇難地（中平鄉中寨刑場舊地）。他生於 1918 年，遇難時 33 歲

第三章

在土改舞臺上的各色人物

他們曾經是土改時的民兵隊長、工作隊員、土改積極分子，或是旁觀者、見證人、親歷者。

他們穿過半個世紀的歷史迷瘴，揭示了「共和國」天空下那一段血紅的真相。

當年，在忠縣西山公園附小，有一個叫梁文華的年輕女教師，她的父親梁樹棻是忠縣的紳士，縣銀行經理，也是有土地的地主。土改工作組和民兵們在鬥打梁樹棻追逼財物時，決定把梁文華也抓來鬥。

十多個民兵前去執行任務。

但是，梁文華未能解押到鬥爭會場，她死於途中一個山坡上。

梁文華是當時忠縣城裡一大美女，見過她的人都讚歎她的美貌。那天晚上，美麗的梁姑娘落入那群如虎如狼的土改民兵之手（猶如「花姑娘」落入日本鬼子之手）。那十多個民兵將梁文華押到一個山坡上，將她輪姦致死。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們聽說，當年參與的民兵中還有一個人健在（那十多個土改民兵沒有任何人受到任何懲罰），我們便決心找到他。經過了許多周折，我們終於同他見了面。

一、「我沒有參與」

講述人： 李朝庚

土改時的民兵連長

土改的時候我當民兵連長，站哨、防空降特務、掌握（鬥爭）會場。鬥爭地主的時候把梁樹棻弄來鬥，要他的錢。其實那時他已經沒得錢了，他雖然是銀行經理，但是銀行已經被共產黨接管了。還是鬥，他沒法，就說錢在他女兒那裡，於是就去抓他女兒……只有一晚上（他女兒）就莫得事了（就沒命了）……是輪姦，不是 20 多個人，是 10 多個人，10 多個人把她弄去，一晚上就莫得事（命）了……

問：李師傅，據有人說你也參與了（輪姦）的。

李朝庚：沒有，我沒有參與，我沒有做那個事。人民政府成立了，缺人手，我進去做事，送信，每天掙六斤米。當時我是掌握會場，他們去抓人。人呢？沒見到，第二天早上才發現她死了。我是在事情出了之後去瞭解情況，事情出在官家院子，就是現在的污水處理廠後面那個山坡上。她躺在沙溝溝裡，仰天躺的，身上有血，頭髮散在地上，根本不成人樣了……不過，衣服還是好好的……叫她站她就得

站，叫她躺倒她就得躺倒，否則她遭不住打。喊救命？她敢！喊了就要挨打……不准她翻身就要死，有種說法叫「過七不過八」，就是說七個人（輪姦她）還可以活，八個人就不行了。如果讓她翻身起來走一下，只是人吃虧，不會丟命……我怎麼懂這些事？我十一、二歲就上重慶，在棧房裡男女的事聽得多。

「男女的事我聽得多」

用槓子壓她肚子排污？那不是她，那是另外的事……梁文華我見過，相貌是很不錯，那時她還沒結婚……說啷個她就得啷個……過火了……當時找床席子就在那個坡上把她埋了。

受處分？那時有個啥子處分，只不過事沒有辦好不受信任了。

現在啷個看？說不清楚，龜兒毛澤東的事情說不清楚。那雜種，說不清楚……這個運動沒把你打倒下個運動就把你打倒。同志之間自己整自己也扎實（「扎實」，忠縣方言，意思是「厲害」），想不出的法子都想出來。三反五反時，你把我吊起來打，然後我又吊你，互相整。一個單位 10 個人，兩個人在臺子上互相打耳光，下面 8 個人參加批鬥，其中有幾個積極分子，要想往上爬、想升官就得積極整人。經過這麼多運動，那些離休、退休的，沒有被整過的稀少得很。現在說毛澤東好，那是嘴上說說，你不說他好脫不到手，怕一個運動來你跑不脫……

啷個看土改？過火了。我在縣政府幹事，送信，看到的、聽到的多，還看到一些材料。城關鎮裡打（這兒指「殺」）的人多，打了幾十個，張大柱（音）、孫達X（音）那些人都是在這兒打的。一般在河壩打，畫個圈圈，人跪在裡面。有的偏不跪，就強迫他跪。毛澤東要殺人，不殺人他坐不穩。土改也是這樣，毛澤東把地主的土地和財產全部收了，地主沒勢力了，只有去討口要飯，一切都是他說了算，毛澤東才坐得穩。

土改打人？是的，我見得多，幾句話不對頭就開始打，一般用棍子打。刑罰？刑罰就多了。就拿梁樹棻家的親戚方長輝（音）來說，方長輝是個 40 來歲的女人，破產地主。在黃金

「吃啞酒」

點「天燈」

灘 100 多人的鬥爭會上，當眾把她褲子脫光，用「火馬草」（一種刺激皮膚、產生火辣辣灼痛的植物）再加上柑子（「柑」指「柑橘」）刺在她下身來回拉。不過她沒被弄死，後來還嫁了人。另一種刑罰就活不出來了。那叫「點天燈」——用黃泥巴在地主頭頂上圍一圈，中間倒上油，點「天燈」。我看見就這樣把人整死的。還有「吃咂酒」——把兩個大拇指用麻繩捆起，中間用木棍往下打，當場把指頭整斷了的都有。

我打過沒有？沒有，我沒有打過人……幹革命？啥子革命！老子跟著跑一輩子，一分錢沒得！現在飯都沒得吃的！說打倒了地主富農過好日子，那是嘴上說。一個生產隊，20 多個公社社員，才一雙膠鞋。我一沒得飯吃就回想起當年那些事，過火了……梁文華那個妹子，樣子長得可以……

採訪時間：2006 年 9 月 22 日

地點：忠縣香山賓館

採訪後記

2006 年 5 月，通過忠縣周康傑先生，我們（我與朋友陳先生）找到了李朝庚的家，從那時起，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試圖同他談談，但李朝庚心存戒備，一次又一次地拒絕。2006 年 9 月，在周康傑先生的大力協助下，經過一番曲折，我們終於從大街上把他「攔截」到了我們下榻的旅館。

採訪是很艱難的，尤其是提到那位美麗少女的死。在我們直截了當的追問下，李朝庚要嘛矢口否認，要嘛顧左右而言他。

他究竟參與沒有呢？與他有交往的周炳昌老人十分肯定地告訴我們，當年李朝庚曾親口對他說過，他參與了，幾十年來他還多次夢到過那個女娃。周康傑告訴我們，他在河邊曾問過李朝庚有沒有這回事。李朝庚點點頭，以一種很得意的心態說，他還很年輕時就搞過漂亮的地主小姐。

李朝庚的否認在我們的意料之中。

其實，我們又有什麼資格去追問他呢？當時和後來的幾十年，沒有任何人去追究那一群強姦犯的罪責。土改殺人劫財是毛澤東、共產黨發動的一場「國家行為」，那些土改積極分子和民兵們後來都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材」。（但是李朝庚有些不幸，他現在吃著「低保」，過著如他所說的「飯都吃不飽」的貧困日子。）

現在，已無法證實李朝庚到底參與沒有，其實，這一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個無辜的、如花似玉的鮮活生命，在那一個漆黑的夜晚，被宰殺在「土地改革」

的血腥祭壇上。我們希望歷史不要忘記梁文華這個無辜的少女，不要忘記民族苦難史上的那一幕罪惡。這是我們堅持要找到李朝庚的主要原因。

梁文華遇難處——忠縣長江邊的關家院子——現汙水處理廠

梁文華全家在土改中的遭遇：

父親（槍斃）、母親（整死）、祖父（整死）、外婆（餓死）、弟弟（失蹤）、妹妹（失蹤）

補記：

採訪李朝庚非常艱難，除了周康傑先生外，朋友陳先生為這次採訪出力不少。

二、「貧下中農硬是發明家」

講述人：周文謙

忠縣城關鎮人，80 歲

我解放後的成分是貧民，那時我還是個沒結婚的小夥子。1951 年正月十八，派出所把我抓來關起，那屋裡就關有地主——那時還不知道什麼叫地主，反正是一些有錢人，什麼朱光清等等。半天後把我解到公安局，就是朱耀庭的院子裡，那裡關了 50 多人，有張國錦、馬劍秋、伯永梁，還有冉良臣的夫人朱惠卿等等，其中有一貫道十幾個人。公安局的說我是參加過反動會道門一貫道的，要審查。關了 50 天，等到把張國錦、馬劍秋、伯永梁、朱惠卿等都槍斃後就把我放出來了，也不說我們有罪無罪，也不判個什麼，抓抓放放很隨便。

一貫道被槍斃了 11 個，有趙西千（音）、馮啟全、高化東、石大軍、趙洪儒、趙洪烈等，他們不是忠縣人，都是外地人。張國錦的罪名是特務。

槍斃羅介仙我親眼見的，槍斃另外的人時我已經被關起了。我父親說，槍斃一貫道時還點名要他去控訴發言。父親還說，槍斃伯永梁那一批，只有伯永梁膽子最小，嚇得打抖，馬劍秋就膽子大，還說他曾經為共產黨做了什麼什麼，包庇（掩護）過地下黨員李鎮宇。張國錦則大聲說：「我不是特務，我是 125 師留下來的……」

我放出來後擺了一個煙攤為生。我有文化，會寫字，居委會——那時叫「段」，找我幫他們抄寫一些東西，我表現很積極。

1952 年找一些積極分子下鄉徵糧，我又去幹了一段時間，主要是填一些證和表格。當時正是土改時期，耳聞目睹了一些事。

田地怎麼分？先分成上中下三等，插上標，按人口分，大人該多少，小孩該多少，該分多少好田地、多少不好的田地，我負責填證。

城裡的貧民怎麼分勝利果實？分房屋分財產啊，不是農村的財產，是在城裡的這點財產。像秦月浦啊，梁伯仙啊，梁樹棻啊，吳澤山啊，財產都被分了，什麼羅漢椅子啊，床鋪啊，箱櫃啊，都拿來分，房子也拿來分。工商兼地主就是把屬於地主的那一部分財產拿來分，屬於工商聯的財產一點不動——暫時不動，到公私合營時再來整。如果是地主兼工商聯，所有財產就全部分了。

土改搞得慘啦，不光是我說，你現在問那些老人，哪個不曉得嘛。當時農會的人來要地主，城關鎮都積極支持。只要弄到鄉下去就沒得輕鬆了的，那些刑罰沒得鬆活的。

鬥爭地主熊實之我是親眼見的。熊實之這個人長得比較胖，喜歡說點趣話。鬥他的人把一個糞桶掛在他頸子上，裡面裝上大半桶糞，叫他跪倒，頭俯在糞桶上聞臭。熊實之這個時候還要說趣話，他說：「聞一會就行了嘛，不要老搞。」

一些農民們對他有好感，恨不起來。鬥爭會上有工作組的幹部掌握會場，他們專門看哪些人鬥地主不積極，不積極的記下來，積極的也記下來。他們看見群眾不積極，就吼叫著說：「你們階級覺悟不高呀！地主剝削壓迫你們……」等等。

運動一直沒歇氣，減租退押、清匪反霸、鎮壓反革命、土改、三反……一直沒歇氣，共產黨奪了政權，要使出各種手段保他的權，你不服從我就要殺，要你死，農民們還是怕。雖然一般農民沒得生命之憂，但是你得了他（黨）的好處，得了土地，你就要聽他（黨）的話。你要不聽他的話，一樣是反革命。

會場上，被發動起來的積極分子上去打熊實之的耳光。這還不夠，當時正是六月火燒般的大熱天，給他穿上皮衫子再拿棉絮來裹起，放到太陽底下曬，還在周圍燒杠炭火烤，那啷個不死嘛，捂也要捂死。熊實之大汗淋淋，出不了氣，活活憋死了。

秦月浦是大地主，忠縣的公永（音）茶樓、鴻賓旅館是他開的，他兒子是徵收局長秦思明——我父親的學生。秦月浦被弄到鄉裡去鬥爭，除了打以外，還不准吃飯。又挨餓又挨打，他實在受不了，就在關他的柴屋裡吊死了。其實他在忠縣城裡算得上是一個著名的開明紳士。

鬥爭秦桂雲（音）我也是親眼見到的。她是秦漢山的女兒，女中畢業在忠師當老師。秦桂雲被四肢分開，吊在一個大八仙桌的桌底，四肢綁在桌子的四角，背又不能挨地，就像農村濾豆花。哎呀，好造孽喲。想不出來的法子貧下中農都想得出來。秦桂雲的丈夫饒順照是地下黨員、忠師校長，也照樣鬥，地下黨員還要支持鬥打才行。秦桂雲吊得受不了，就說，房子、家具拿去分就是，當時叫「分勝利果實」。

聽說過的刑罰就多得很了，比如把女的弄來鬥爭，把褲腳紮緊後往褲檔裡放進黃鱔、癩蛤蟆等等，唉呀，難得過日子呀，男人都受不了。還有「抱火柱頭」——把鋼管燒紅了強迫地主去抱，那個都抱得？不燒個皮開肉爛！不去？不去就烙你！

……我雖然讀書不多，還是讀過《酷吏傳》，小說也看了不少，也沒有看到過那麼多刑罰。對了，「抱火柱頭」在《聊齋》裡見過，書中描寫的陰間地獄裡的刑罰很多，習方平就受過這種刑。不過，比起來都不如土改，土改時，貧下中農硬是發明家，任何折磨人的東西都想得出來。

當時沒有鬥爭死的後來也苦死了，像蔡捷三呀、熊德國呀、州屏山的陶中華呀，等等。

採訪時間：2006 年 5 月 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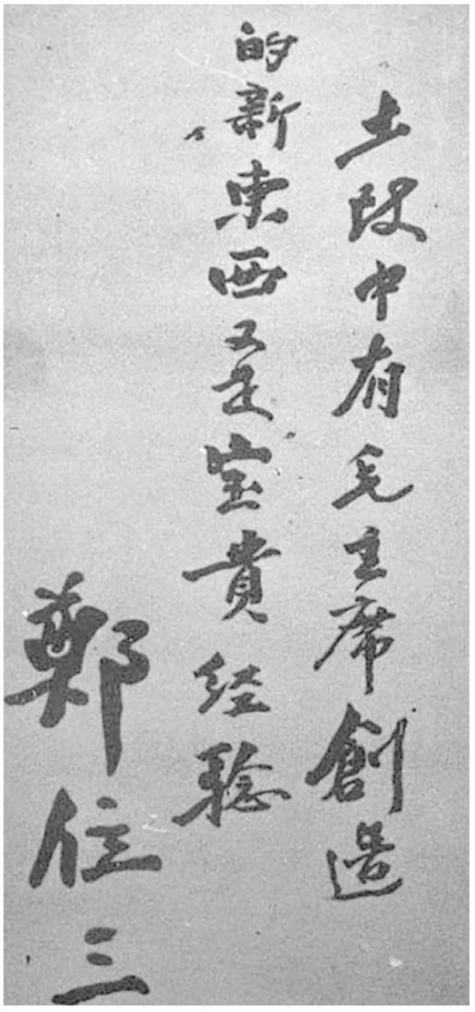
地點：忠縣百姓廚房酒樓

採訪後記

周文謙老人是在酒席上即興說到土改的，他講述得很零碎，幾乎沒有完整的故事。土改時，周文謙先生是貧民成分，按當時的政策是屬於無產階級，他在土改中一度還是積極分子，參加了分果實的運動，但是，說到當時的種種刑罰，他突然說：貧下中農硬是發明家！是誰讓「貧下中農」一夜間突然成了「發明家」？而那些創造發明的刑罰可能讓歷史上任何一個酷吏為之遜色。

周文謙老人說：只有《聊齋》裡描述的地獄才有那些刑罰。

事實上，在「土改偉大勝利」的時代，那些恐怖的刑罰已經是《聊齋》裡地獄的情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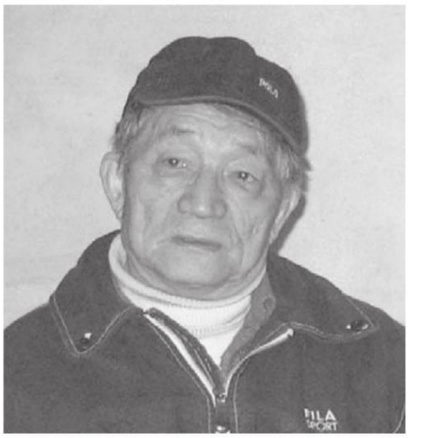
補記：周文謙老人已去世，具體時間不詳。

中共官員的題詞：

「土改中有毛主席創造的新東西又是寶貴經驗。」

選自《中南土地改革的偉大勝利》

三、我曾經是個傻子、瘋子.....



講述人： 張先癡

土改工作隊成員

1934 年生

我出身在一個國民黨將軍的家庭，父親是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警察總署副署長。我讀高中的時候，受我酷愛的文學作品的影響，成為一個比較激進的學生，像絕大多數舊社會的青年學生一樣，反對黑暗嚮往光明。1948 年我剛滿十四歲就參加了進步的武漢學生聯合劇團，劇團裡教唱的歌曲解放後我才知道都是共產黨的歌曲。1949 年武漢解放前夕，我做為未成年人隨父母來到重慶，在江北中學讀高中二年級。我是學運的積極分子，我參加罷課，宣言都是我起草。在學校裡我邀約幾位同學組織了一個「號角」文藝社，我任社長，胡俊德（長壽縣渡舟鄉人）任文字編輯，項廷柱（湖南人）任美術編輯，在我們不定期編出的壁報上，不論文字和漫畫都對國民黨統治下的腐朽現象盡情嘲諷。比如，項廷柱畫了一幅漫畫「青天白日滿地紅」，畫面上天空一片漆黑，一個小小的白太陽，地上滿是殺害的進步人士的鮮血。校長拿我很頭痛，因為我父親是國民黨的大官，他不便處理。後來我進入黃埔軍校 24 期，那時，24 期的總隊長早已和地下黨取得了聯繫，1949 年 12 月 20 日，我們在大邑縣蘇場起義，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三兵團十二軍隨營學校。

參軍半年後我在軍政大學參加了青年團，並一直擔任了好幾年的團支部副書記。

土改時我在西南軍區土改工作團，我們這支小分隊由戰旗文工團、西南軍區警衛團等幾個單位的幹部和戰士組成，工作隊的隊長叫武覺（音）。我們最初在重慶嘉陵新村——那是西南軍區招待所——在那兒集中起來學習土改政策，由西南軍區政治部主任王新庭（音）來給我們作報告。當時的口號是：「秀才三年一考，土改千載難逢。」這就是說，土改對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是一個很好的改造機會。

我共參加了兩期土改，第一期是在四川省合江縣先市區，村子我記不起來了，是在一個山裡面，第二期在四川省敘永縣。這兩個地方都緊靠貴州的赤水縣，當地老百姓趕場就要到赤水去。

唉呀，我去的那幾個村都是最窮的地方，窮到什麼地步？村子裡要找一個富農都難，有個中農就了不起了。但還是要劃地主。我們到地主家收浮財，看到那些所

謂的地主可憐得很，衣服破破爛爛，家徒四壁，根本說不上是有錢人。現在想起來，那時劃出的一些地主實在可憐得很。

土改分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宣傳、教育、發動窮人訴苦——也就是挑撥離間。

第二階段清理、劃分成分。第三階段分浮財、分土地。第四階段成立基層組織。

50 年代在部隊時的張先癡

其實農民對地主不是像共產黨說的那樣仇恨萬分，有很多農民當面鬥了地主，私下又去給他們道歉。我們工作組就要去煽動農民，先集中起來訴苦。有個歌叫〈乾人歌〉，據說是個民間的歌，主要是述說生活苦難，以前我還把歌詞抄下來，現在忘了，記得有什麼：「正月是新年哪，乾（窮人）人要過年哪……沒得錢買鹽哪……」我們就用這個歌來讓農民想到在過去——中共建政之前——那所謂的「萬惡的舊社會」裡受的苦難，以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歌唱起來很悲慘，唱得那些貧下中農都哭。

鬥地主一般先訴苦，然後再鬥。那時認為對一個人的最大侮辱是「摸屁眼屎」——把下身摸一把然後打他一耳光。在當時當地，在那個貧窮的山鄉，這種侮辱就被認為是頂點了。所以對地主也用了這種手法。

為了發動群眾，還要殺人。

當地有個地主叫賈欲雄（音），那個地方姓賈的比較多。區委書記是個南下幹部，大概是個江浙人。那一天他去了之後為了打地主的威風就要殺人，那天要槍斃哪幾個我記不清了，但是其中沒有賈欲雄。在會上，區委書記說了一句：「賈欲雄，到了這個地方你還要強辯！」「強辯」就是辯解，不聽話的意思。

民兵聽錯了，把那個江浙話「強辯」聽成「槍斃」。書記話音一落，民兵把賈欲雄拖起就往那個預定的場所（即刑場）跑，那只有 50 到 100 米遠。後面的人覺得不對勁，喊：「轉（回）來，轉（回）來！」那些民兵哪裡想到什麼轉來不轉來，一槍就把賈欲雄打死了。

那時連判決書之類的東西都沒有，假如有個法律程序，就是走走過場，賈欲雄也不會被冤殺。當時我就想，殺個人怎麼這麼草率？

印象最深的是那次殺一個土匪，他叫張國華，同西藏軍區司令員同樣的名字。我為什麼印象這麼深，因為那次是我當的審判長，我去宣判的。當時我才十多歲，看起來都不像。我看我兒子十五、六歲那個樣子，好笑。我去當審判長是上級指定我去，我不認識這個人，對他一無所知。上級給我送個判決書來，讓我在這兒把他

槍斃了就完了。

我們那是山區，要找一個像樣的壩子都難，記得我們是在一個窪地裡開的會。張國華被押來，所有的人都不認識他，但是，也得找幾個「苦主」來訴說他搶劫的事。其實一看他那個樣子，十分普通，個子也不高，簡直不像土匪。我一讀完「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他馬上給我跪倒，說：「放我一條生路，我還有一個老母親。」

我們當時沒得一點惻隱之心，而且，有惻隱之心也不行。我們西南軍區土改工作團裡有一個女娃娃，她比我也只大兩、三歲，她家裡也是地主。她看到把地主整成那個樣子，悄悄地哭。我們內部過不了多久就要整頓一次，整風呀，工作人員集中起來總結。那次總結時，就把那個女娃當場開除軍籍，罪名是同情地主。所以說，對我們內部，也要殺雞嚇猴，起警示作用。當時我們並沒有覺得這樣做有啥不對，是嘛，對地主你哭啥子呢？地主這麼壞。

我喊：「拖下去！」剛喊完，他態度立馬就變了，沒得希望之後，他非常勇敢地站起來。

我們原先準備把他押到一個預定的地點槍斃，路上，有一個兩米寬的空地，在兩個田埂的中間。他看到這個地方，覺得這個地方好，就要求就在這兒打。他跪下去，喊行刑者開槍。那個執行的人是個「二杆子」，即不務正業、有些痞氣的人，這種人在土改鬥地主時都是最積極的人。他把子彈在鞋底下磨，彈頭有了毛刺，打進腦殼就要炸，他要以此來表現他的鬥爭性。我們同意了張國華的要求，他被打死在他看中的那個地方。

在兩期土改中，我只有這次參與了殺人，而且是當審判長，好笑。

土改期間，有些地主遭整得受不了，自殺的不少，但我們那個村好像沒得地主自殺，那些人一個個看上去都像叫花子（ㄎㄞˇ）。我們到一些地主家抄家時看到，全家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一件破蚊帳到處都是補丁。浮財，根本找不到。

還有所謂的反革命集團，也遭殺。有一次，上面說，有一個反革命集團，我們那個村的一個積極分子也是這個反革命集團的成員。上面布置下來，我去找他談話，要他坦白交待。這個老幾（人）回去就上吊自殺了。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天天剛濛濛亮，他的老母親衝進我們工作組住的那個院壩裡來，一衝進來就呼天搶地地大哭，像發瘋一樣。那次對我的震驚很大。我記不起他的名字了，現在想起來他是絕對的老實農民，老實得難以想像，這種農民也說他參加了反革命。

我還做了一件缺德事。有一次鬥地主，開大會，把那一帶的地主富農都押來，捆起來跪一壩，要他們接受農民的教育，農會的主席要講話。我們工作組的每個人都配有一支槍，我有一支二十響的駁殼槍。有一個地主，不，是個富農，姓賴，留個山羊鬍子，他動了幾下，我用駁殼槍在他額頭上戳，說：「你不規矩你看我今天

收拾你！」敲了幾下血就從他頭上流下來。我想，馬上要進會場了，血流起不大好。他頭上圍得有帕子，四川農民以前都是圍帕子。我把他的帕子蓋住他的傷口，然後一推他的頭，說：「你老實一點。」

我後來挨冤枉，被共產黨整得很慘時，反省自己的錯誤：人家是個老人，又沒有傷害我，又沒有觸犯什麼，只不過動了幾下，或者那個姿勢我看不順眼，真的沒有什麼。我一個十幾歲的娃兒，拿槍在他頭上敲打，他怕不怕？萬一走火不就是把他打死了？我覺得自己很惡劣，像個……像個……簡直沒得人性，只因看不順眼，就下手。那個時候自己認為自己有無上的權威——我就是代表共產黨來鎮壓你們這些壞人的，所以無論怎麼做都不過分。

「望蔣台」

我們當時搞土改還算比較文明的——比在解放戰爭時期文明。我在部隊裡有個很要好的朋友，叫王箭元，河北人。他私下悄悄對我說，在解放區鬥地主時，設一個「望蔣台」，把地主吊起來升到旗桿上，然後問地主：「看到蔣介石沒有？」地主說「看到」或「沒看到」結果都一樣，一刀把繩子砍斷，地主從旗桿上栽下來摔死。他還說，奶娃娃——沒滿周歲的奶娃娃——就提著腳在石頭上摔死。解放戰爭時期就是這樣整的。

我們搞土改時全國已經解放——所謂「解放」，但是仍然發生很多地主受不了，被迫自殺的事。還有很多地主看到自己省吃儉用，勤勞一生積累的財產一夜間全部被奪光，絕望了，因這種情況自殺的也不少。

清匪反霸比土改還血腥，抓到土匪就把頭割下來，高高吊起，讓趕場的農民看。

你問現在怎麼看中共的土改？我想，首先，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就算地主對農民有剝削、有壓榨，這也是幾千年積累下來的制度上的毛病。1949 年共產黨掌權一統天下之後，讓一代地主來償還他們祖輩的債，這是很不公平的。其次，據我所知，中國的地主在沒有發展到相當規模之前，都是非常勤勞，生活非常節儉的。坐享其成就當地主，中國的傳統道德都不允許。因此，這些地主，勤勞苦幹，捨不得吃捨不得穿，慢慢掙一點田土。我做為一個公子哥兒出身的人，我看到那些地主比我家當年的傭人生活都差得多。土改時我去那些地主家，發現他們生活寒酸得很，可憐得很，啥子地主嘛。

還有，在舊社會，一個地主對農民的殘暴一定是有限的，絕不會像共產黨的權

力一樣無止境。為什麼？因為當時的輿論，還有傳統道德對這些地主是有約束的。另外還有一些民間組織也可以制約地主，平衡一些社會矛盾。例如，如果一個地主的雇工是哥老會成員，地主對雇工刻薄了，哥老會的大爺、二爺會出面來譴責他。如果一個地主做得過分，其他地主也要指責他。遇到災荒年，地主都要減租，這已經成為不成法的規則。真正吃不起飯的時候，地主都要施捨糧食，很慷慨的，不是像共產黨宣傳的那麼殘酷無情，不是那種情況呀。如果真是像共產黨所說的那樣，社會早就無法維持了。退一萬步說，農民真正沒法生活了，他還可以離鄉背井出去逃荒嘛。只有在共產黨統治下，逃荒都不行，那是「盲流」，要受處理。

此外，以前遇到社會不公，還有發洩的渠道，也還有人敢於出來主持正義，新聞界呀、知識界呀也還有良心，現在同「舊社會」根本無法相比。這幾十年共產黨徹底摧毀了以前的一切人文基礎，一切都是共產黨說了算，根本沒有老百姓申辯的途徑。

共產黨利用土改，就是為了煽動階級仇恨，把其他個別地主的罪惡，說成所有地主都是這樣。共產黨說：「地主本質都是一樣的。」我看本質並不一樣。土改實際上是對地主非常殘酷的掠奪，整得人家家破人亡，很慘的呀。很多地主家徒四壁，所有東西都被掃光，你說這些地主難過不難過。如果這些地主真正是剝削，是偷來的搶來的，他都要好過一點。人家是勤勞儉省一輩子積下來的呀。電影裡像黃世仁那種地主，我一個都沒有見到，那種地主即便有，也一定是極其個別。那種典型，絕不是中國，特別是四川農村具有代表性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土改做為一個煽動階級仇恨的過程和手段，是相當卑劣的。

我對自己那段時期的所作所為，充滿了懺悔之情。我曾經想寫一篇文章，中國之所以成為現在這種狀況，中國的知識分子要負很大的責任，包括我。正因為我們的愚昧，所以被共產黨利用。共產黨宣傳共產主義人人平等，我們出於年輕人的一種正義感，也希望人類走向這種美好的狀況，共產黨就利用這些來欺騙我們。實際上他不僅做不到這一點，反而反其道而行之。共產黨這幾十年的實踐告訴我們，這個政權是人類有史以來最腐朽、最反動、最殘忍、最不講信義的一個騙子集團。這個定義是一點不過分的。

說到不講信義，就以土改為例。我們走時，農民捨不得，拉著我們的手，哭。很感激呀，因為我們把土地給他們了。後來我們工作團團長，他是西南軍區政治部的一個官，叫張宜（音），給我們作報告時說，美國的國務卿赫爾 (Cordell Hull) 在

國會說過，共產黨現在把土地分給農民，但他們很快就會把土地收回去。當領導給我們作這個報告時，我覺得美國人太卑鄙了！我親自參加的土改，土地證是我親手交給農民的，怎麼可能把土地拿回去？美國人造謠生事，真是壞得很！

農民喜領「土地證」。選自《中南土地改革的偉大勝利》
中南人民藝術出版社 1953 年

嘿，過了不幾年，互助組、合作化，共產黨硬是把土地收回去了！

美國人說的是對的！

就我個人而言，共產黨把我利用完了，然後一腳把我踢到勞改隊去受折磨。我應當說是罪有應得。

不過，我當右派被發配勞教時，我還認為是下面的人壞，毛主席是好的。我對一個同勞教的原地下黨的右派說：「老肖，我不相信這一切是毛澤東幹的，把我們整來勞教，肯定是下面的人亂搞，毛主席咋個會幹這種事嘛。」他眼淚一下子就湧出來：「就是他！」唉呀，他一呼那三個字，嗨！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我開始想，是呀，不是他，哪個有這個能耐做這種事呢？就這樣，又隨著大饑荒的到來，我慢慢對這個「主義」有了認識。現在當然徹底認清了，回頭看自己的當年，真的是傻得可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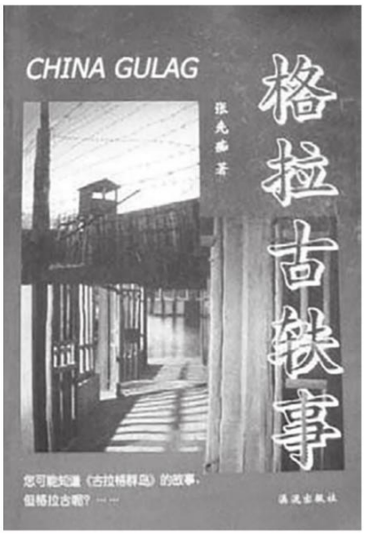
如果有人再來審訊我，我一定這樣回答：「我想問問你，一個要死的老人，他有沒有權力知道他這一輩子究竟是咋個活過來的？一個臨死的人都沒得這點權力，你這個叫做什麼政府？叫什麼政權？叫什麼政體？」

我這一生正如我在名片上印的：是傻子、是瘋子、是回頭浪子。傻子是被共產黨騙，瘋子是被騙之後像瘋狗一樣到處去咬人、整人。最後我醒悟了，是回頭浪子。

採訪時間：2007 年 2 月 4 日

地點：成都雙林中橫路

採訪後記



2006 年 8 月，從朋友處得到一份 30 多萬字的打印稿《格拉古軼事》，展開一讀，立即被深深吸引。在我所讀到的記述右派遭遇的文字中，《格拉古軼事》無論是經歷的曲折慘烈、思想的獨到深刻、情感的迴腸蕩氣、文字的生動活潑諸方面，都堪稱一流。

作者張先癡，1957 年被打成極右，抓捕入獄，他在書中寫道：「從在天津市公安局看守所開始當犯人到雷馬屏農場結束，我先後蹲過的看守所、勞教和勞改廠礦企業農場等總計 11 個，時間共計 22 年另 7 個月加 13 天，它幾乎占用了我全部充滿活力的青壯年時期。」

背叛家庭，為追求光明而全身心投向共黨革命的人在獄中耗盡了「充滿活力的青壯年時期」。

我當即給他打電話，表示希望拜訪他。老人欣然同意。

半年後我到成都，兩次登門與張先生長談。老人雖然在獄中 20 多年，受盡磨難，九死一生，但依然腰身直挺，聲音硬朗，言辭直率，不僅頗有軍人的氣度，而且不乏知識分子的良知。更難得的是他毫不隱諱地談起自己在土改中的所作所為，並為此充滿了懺悔之情。

我在這樣的老人面前脫帽致敬。

《格拉古軼事》即將在美國出版，這是張先癡老人幾十年血淚經歷的凝結，更是他對那段歷史的珍貴貢獻。

如此，真心地為張先生祝福。

川東忠縣土地房產所有證

依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二十七條「保護農民已得土地所有權」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條「土地改革完成後由人民政府發給土地所證」之規定，本戶農家（本人）所有土地共計……轉讓贈予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特給此證。（1952 年）

四、土改時，我曾寫過殺人布告

講述人： 曾真

忠縣石寶寨中心鄉土改工作隊政治幹事

1933 年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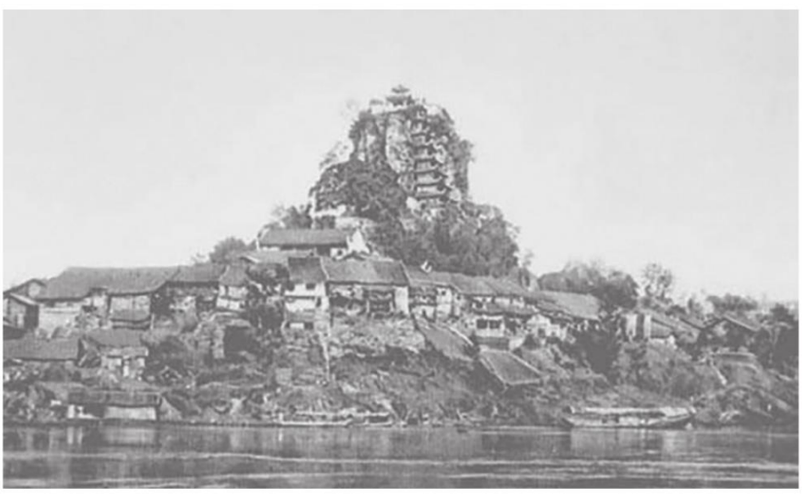
我進入土改工作隊是因為我有文化，我畢業於忠縣師範，土改時我 18 歲，在工作隊裡搞統計和文字工作，也起草殺人的布告。同一個隊的還有謝寶桃（音）、王運生（音），都是年輕人，我是政治幹事，此外還有財務幹事、總務幹事等。

石寶寨（長江上的一個著名景點）與萬縣相鄰，同屬於川東地區。當時在川東負責土改工作的是閻紅彥（川西是李井泉，川北是胡耀邦，川南是李大章）。

萬縣要搞得早一點，1950 年肅反、殺人、土改一起上，忠縣晚一步，人殺得沒有萬縣多。我們先是搞徵糧剿匪，主要是徵糧，沒得匪剿，還發了長槍，那個槍重得很，像是漢陽造。

忠縣的土改在 1951 年的秋收時開始，主要是搞地主的財產，什麼都要，有好多拿好多，搜刮乾淨為原則，反正把他們整光、整窮。我記得當時整得地主衣服都沒得穿的，趕場只得披件蓑衣出門。

吊、打地主主要是為了逼財，殺得並不多，中心鄉殺了兩個，我記得很清楚。一個叫江遠璋，說他是惡霸地主，另一個叫胡德武（音）。



石寶寨舊景（1909 年）選自《老忠州》陳儲德主編

我後來在區上搞統計，各個鄉彙報上來，有多少金銀、死了多少人，我作記錄，然後向縣上彙報。我記不得具體數字了，只記得石寶寨自殺的多，投井、上吊……那個 12 層的石寶寨寨樓每一層都吊死過人。

為啥自殺？怕呀，挨整不過呀。中心鄉有個叫王朝忠（音）的人，這個人是農村的二流子，或者叫「流氓無產階級」吧，他最喜歡打人，成了土改積極分子。記得有一次我看見他把一個地主婆反吊起來，拉到屋樑上，一鬆繩放下來，又拉上去，又放，還打，黑起心整。我看不下去，扭頭走了。

有一種整人的辦法是這樣：先把人打傷，再用竹涼棍（細竹棍編成的竹床）和穀草把人裹起來，用繩索捆緊，晚上放到外面，淋上水，寒冬臘月，你活得出來？第二天人已經凍得硬邦邦的。曾朝如（音）的兒子曾庭玉（音）就是這樣被整死的。

整女的還有另一種方法。把碎瓦塊、碗渣滓和刺鋪在地上，把女人的衣服褲子脫光，睡在上面打。你痛？翻滾？怎麼滾？到處是刺！活生生把人整死。我們那兒有個叫曾長天（音）的，他當過鄉長，他的女人（妻子）就是這樣被打死的。

我家那兒，大家都姓曾，鄉裡鄉親，但土改要「翻身」，要「分勝利果實」，管他姓不姓曾囉，整！整死的人多得很。曾朝軒哥哥的兒子叫曾庭定，還是個十多歲的娃娃，說他偷了別人的包穀，不分青紅皂白，也不由他分辯，活活把他打死了！

青年時的曾真

我見的殺人最多的是 1951 年 2 月，在石寶寨對面那個河壩開公審大會。那個地方夏天被水淹，是個水沱，冬天水退後就是一個壩子。那次一共槍斃了 30 多個人，有地主，也有國民政府的區長、鄉長、保長。著名作家馬識途的父親馬玉芝當過縣長，但他 1950 年春乘船到石寶寨趕場時翻船淹死了，否則他肯定跑不脫。我為什麼清楚地記得是 30 多個人，因為那時殺人要貼布告，一人一張，30 多人就是 30 多張，而我正是寫布告的人。寫些啥內容？某人，出身，解放前有啥罪行，解放後做了些啥。罪行？罪行隨便羅列幾條就是。什麼「一貫欺壓群眾」、「霸占土地」、「搶占民妻」等等，抗糧不交也是殺人的理由。殺保長的理由是他們派過款、拉過壯丁。其實這冤得很，拉壯丁是為了抗日、派款還不是為了支援抗日。國民黨抗日有錯喲？最後是驗明正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此布。然後打個紅勾勾。

我記不起 30 多人的名字了，記得的有吳持恒，他當過國民黨的區長，把他家的財產弄乾淨之後殺的他。記得最清楚的是鄭必夏。他是川東地下黨的，當時有人說

他是國民黨，有人說他是共產黨，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幹脆就把他當國民黨殺了。刑場上他使勁吼：「共產黨萬歲！」民兵們上去打他，不准他喊。二十多年後，終於弄清楚了，他真是共產黨！怎麼弄清的？說來是個偶然。鄭的家當年已經被抄得一乾二淨，像水洗過，但是，有一張大床沒有被搬走，因為它太大了。那是張六柱床——就是有六根柱頭的床。那張床有踏板、兩邊還有櫃子。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有人想把床拿去賣，床太大，只得拆散了搬出去，在拆除時，從床欄裡掉出一張紙。是啥子喲？讀後才知道，原來鄭必夏是真正的共產黨。一層層彙報上去，喲，殺錯了。這才正式給他平了反。有啥用？人都死了二十多年了，共產黨殺了共產黨。

那次殺人我就在現場，一人畫一個圈圈，人跪在圈裡，後面槍對準腦殼。槍響之後人倒了一壩，江風吹來那個血腥味濃得很。對了，有一個人第一槍沒被打中，子彈從他耳邊劃過，他還扭過頭對打他的人說：「你對準了打。」

有些人沒人去收屍，農民不敢去，怕別人說是同情地主，脫不到手。於是晚上就發生了割死人的事——有人去把死者的心臟、肝臟、睾丸等器官割下來。割去幹啥？我沒看見，反正是拿去餵狗——兩隻腳的狗！

人吃不得？三年「自然災害」就有人吃人的呀！區委裡有個當兵的，姓毛，毛澤東的毛，毛什麼記不起了，這個人毛森森的，他去割死人的睾丸。人死之後睾丸看不見，縮進去了。他踩死人的肚子，把睾丸擠出來，割下，切成片，貼在腿上。民間有種說法，把睾丸切成片，用人的體溫烤幹，磨成粉吃，可以治陽痿。

當時殺人全在區上，由區法庭判決死刑，但區長、區委書記是南下來的幹部，對當地情況不瞭解，鄉裡面要殺哪些人全憑一個姓秦的公安員（他是當地人）整材料，他整出的材料認為該殺誰就殺誰。那個人二衝二衝的（方言，指得意洋洋，不可一世）。

中年的曾真

我讀了點書，認得字，去幫共產黨寫殺人布告，相當於幫了共產黨殺人。殺人那個過程，少了張布告怎麼行呢？我這一生，就是土改這樁罪惡，所以我後來該去勞改。

我為啥勞改？1957 年，我已經對這個社會有了相當的認識，我同一個大學生通信，談了我對這個社會、對這個黨的一些看法。那個大學生當了右派，把我供出來，抄我的家（當時我已經在重慶長安廠工作），搜出八個筆記本和 300 多封信，以我信和筆記本中所記的話做為罪狀，說我是反革命，妄想資本主義復辟，以此判了我 12 年徒刑。

土改時需要用我，反右時需要整我，管你那麼多，劉少奇、彭德懷還為共產黨打天下，要整就整，我算什麼？我 1958 年初開始服刑，1981 年才回來，共 23 年，為什麼這麼長？因為刑滿後他們不准我走，繼續在煤礦幹活。那個煤礦位於宜賓南面的珙縣，叫芙蓉煤礦，裡面幹活的全是犯人。共產黨說國民黨的監獄怎麼怎麼壞，有沒有人來寫共產黨的監獄？那裡面壞得很，可以活生生整死人，整死了就整死了。他上報，說你畏罪自殺。哪個來證明不是？哪個來揭露是他整死的？

我下礦 15 年，挨鬥挨打是經常的事，我還坐過 3 個月的水牢。那些年九死一生，裡面的事可以寫出一本書來。

我爸爸就死在勞改隊，他的罪名是反對「統購統銷」。他先在奉節縣勞改，煉硫磺，後來轉到永川新生茶場（勞改農場），1960 年 2 月餓死在那兒。我一直不知道父親的情況，1981 年我出獄後向全國各地的公安機關發了上百封信，只有東北回了信，說名字相同，但不是我父親。最後查到，原來父親就死在永川新生茶場。

我們那個煤礦死人多得很，僅在自然災害——什麼「自然災害」？毛澤東的「三面紅旗」害死了幾千萬人——礦上最保守的數字是餓死了 380 多人。為什麼這麼說？因為死了人要做個匣匣（即幾塊木板拼成的薄棺材），就用井下的木頭，叫附近的農民做。農民共做了 380 多個，全部用完了的。

死人埋得很淺，因為埋的人沒得力氣，挖點土掩上就完事。埋的人可以吃一點稀飯。埋一個人挖了土旁邊就有一個槽槽，又死了人就放在槽槽裡，旁邊再挖土，又留下槽槽，又埋，一個一個埋下去，都埋得淺，好多屍體都被狗掏出來吃了。後來在那塊地上種南瓜，嘿，那個南瓜才叫長得好，又多又大。但是不好吃，水垮垮的，不像其他南瓜又甜又麵（麵：方言，指口感很好）。

現在聽到有人說毛澤東好我就來氣：這幾年吃了點飽飯就忘了？忘了餓死幾千萬人了？他要不死，再來一次、二次「文化大革命」，早就把你整死了！

再回到土改上說，說個實話，土改那些做法就是土匪搶劫，只不過口號喊得響：「你為什麼窮？是因為地主剝削壓迫。走！去整地主，挖他的財！分他的地，翻身得解放！」

哪個農民翻了身的嘛？共產黨的政策就是欺騙，他說話不算數的。我記得很清楚，土改還沒結束，還沒有到複查階段，就開始辦合作幹部訓練班，當時簡稱「合幹班」，就準備要搞合作社了。我調到萬縣地委，就是去參加準備收回土地的合作幹部訓練班。分土地那是假的呀，騙農民的，是為了把農民發動起來幫共產黨打江山、奪政權。農民為了得土地，為共產黨打天下，命都不顧，結果哪個得了土地？

同樣的，說把資本家打倒，工人當家做主。哪個工人當了家做了主？共產黨說

地主是剝削階級，要消滅，把農村的地主消滅了；城市裡做生意的、開工廠的，是資本家，也消滅了。那麼財富到哪去了？到那些權貴們手中去了！那些人大把大把地把國家的錢撈到包包裡，他們既不叫地主，也不叫資本家，但他們財富多得驚人！不是幾百萬、幾千萬，而是幾億、幾十億、上百億，據說，那些最有權勢的家族，已經是上千億了！

將來不清算呀？就這樣算了？恐怕不可能吧。

剛解放時，石寶寨有個幹部，他一個兒子加入了國民黨，一個兒子加入了共產黨，國民黨說共產黨是共匪，共產黨說國民黨是蔣匪，共產黨親蘇（聯），國民黨親美（國），他據此寫了個對子：蔣匪共匪誰是匪，親美親蘇孰親民？

現在幾十年過去了，回頭看，誰是匪？

土改尚在進行的 1952 年，
中共已經開始了收回土地的工作
選自《中南土地改革的偉大勝利》
中南人民藝術出版社 1953 年

採訪時間：2007 年 3 月 20 日、2007 年 7 月 3 日
地點：重慶市渝中區七星崗、重慶市江北區長安廠宿舍

採訪後記

偶然與曾真老人相識，提到過去的事，老人說，他有很多親身經歷。

第一次採訪很不順利，老人突然身體不適，折騰大半天下來，只拍了幾張照片。

第二次來到老人的家已經是幾個月後。

老人孤身一人住在一套陳舊而狹窄的房子裡，他這輩子沒有成家，漫長的牢獄之災後，老人已年近半百，從此他與書法字畫為伴，獨自度過孤單的「自由時光」。

採訪時，老人拿出了當年（1958 年）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判他 12 年徒刑的判

決書，那上面的「罪行」全是他私人信件和筆記本上的言論，其中有「橫加污蔑我社會主義是『中華民族沉浸在苦難中，蒙受著精神奴役，自由民主平等遭到不幸。』」和「將我勞動教養條例污蔑為『打人的鞭子，到處打人』」等等。

老年的曾真

老人說，這的確是他當年的看法。看來，早在50年前，老人對這個社會、這個政黨就頗有認識了。

只是，他為這種認識付出的代價太慘重。

1981年，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同樣一個鮮紅的印章表明，那23年是整錯了。（該判決書寫道：「原判以反革命定罪判刑不當，應予糾正，特依法判決如下：一，撤銷本院（58）刑字375號刑事判決書。二，對曾真宣告無罪。」

中共國營長安機器廠委員會給他的改正結論上寫道：「按照中央（79）65號和川委發（79）98號文件的有關精神，應恢復政治名譽，恢復公職安排工作……其工資不補發。」

整了就整了，整錯了就算了，一個人的青春、20多年的自由、一輩子的苦難，在暴虐的專政機器面前實在是輕如鴻毛。

曾老人自嘲地說：「我土改時幫共產黨寫了殺人布告，所以後來該去勞改。」不管怎樣，曾老人活出來了，雖然孤身一人，但總比他死在獄中的父親幸運。

1951年9月9日，在土改僅僅進行了大半年時，中共中央就召開了由毛澤東主持的全國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在接下來的三年裡，中共年年召開這種會議，緊鑼密鼓地收回了土地。

五、羊角古鎮：地主殺了，環境毀了

講述人： 李世芬

78 歲

烏江是長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全長 1030 公里。2005 年春，我走訪了沿江的幾個古鎮，採訪到了一點即將被江水或歲月淹沒的「歷史刻痕」。

羊角與龔灘、新灘、潮砥是烏江下游的四大斷航險灘。有險灘便有古鎮，有古鎮便有古蹟。然而，走了一回下來，兩條凹陷的青石板，幾乎是這個著名古鎮的全部遺跡。

從峽谷口的公路下去，迎面是一座破落的小橋。站在橋上，面前是猙獰灘石、滔滔江水，兩邊是曲折的石板小路和沿街而建的平房。

羊角鎮曾是一個熱鬧的大鎮，由於江邊石多水急，灘長數里，貨船不得不在此易船通行，羊角鎮因此繁榮起來。但現在，老街冷冷清清不見人蹤。順著石板街走去，一間破舊的木板房前，臥著一隻慵懶的花貓。花貓「咪嗚」一聲，驚動了一個老婆婆。看到陌生面孔，她稍稍有些意外，但有人來同她說話，婆婆十分高興，主動提出要陪我走走。她說：「難得有人下來看看，造孽哦。當初這裡也是個繁華的地方，今天落到這個樣子也沒人曉得。」

婆婆名叫李世芬，今年已經 78 歲。她家百餘年的木板房如今也是老街上唯一的一間了。李婆婆說，當年羊角鎮興旺得很，每天都有好幾條船從這兒過，一條空船拉過灘要兩個多小時，貨在這兒上岸，用人拉車在岸上拉過灘，這兩條青石板就是鋪來拉車的。

我問鎮上還有沒有以前留下來的文化遺址，李婆婆搖搖頭：「沒得了，沒得了。你剛才過來的那座石橋，原來很好看，雕得有龍鳳，活靈活現的，可惜在文革時把它打爛了。」

問起地主的情況，李婆婆說，羊角鎮主要是下力人聚集的地方，大家都窮，日子都苦，一天搬幾條船的工錢也不過剛剛夠買斤把米，一天不幹活就沒飯吃。

解放後（1950 年）要抓地主，打「剝削階級」，於是就從矮子群中找高子，抓

了幾個「地主」。

「其實那幾個地主日子過得也苦，」李婆婆說。「地主也不一定有田地，也不一定有好多錢，他們同我們的區別就是他們不下苦力有口飯吃，跟我們搬灘的比起來就算是地主了，日子還不是緊巴巴的，比現在一般人都窮。比如，有一個叫李本芬的人，一輩子靠揀（拾）狗糞攢了點錢，置了幾畝地，也把他劃成地主，幸好他在解放前一年淹死了，沒遭槍斃。只是地主成分讓他後人遭了罪。」

古鎮上唯有當年鹽車的石板路還殘存

「羊角鎮有沒有被槍斃的地主？」我問。

「有哇，我記得名字的有三個：曹盡成、張盡如、高占田（由於李婆婆不識字，名字只記下了發音），都是抓到下面河灘上去打的。我還記得曹盡成的兒子在解放前寫信回來，叫他爸爸不要聚財，把家產分給窮人。他兒子現在還在。」

說起那段紅紅火火的日子，李婆婆思緒清晰，精神亢奮。她說：「那時，上面組織我們開大會，唱腰鼓歌，我還記得唱詞：

一想朱司令，領導鬧革命。二想劉伯承，他是四川人。
三想毛澤東，他是大英雄，全國成了功，人人有田種。
四想解放軍，人人把糧徵，徵糧為我們，解放臺灣省……還有：
本場有個王保長，做起事來像狗狼……」

不過，提到現在的日子，李婆婆黯然神傷，一是她的幾個子女都失了業，二是羊角古鎮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環境污染。

在石板街靠近河灘處的一條小路上，看到一個古老的水井，上刻「清泉井」三個字。井邊有個石刻神龕，右邊鐫刻著「宣統三年秋月立」幾個小字，還有一副石刻對聯：「井水同三官謹備，泉源養萬民全生。」神龕裡供奉的菩薩早已不知所終，李婆婆說，以前每月初一來井裡挑水前，都要恭恭敬敬地給菩薩上香，以保甘甜的清泉不斷。

我想掬一把清泉嚐嚐，李婆婆大驚：「喝不得！喝不得！」

原來，這「清泉」已經有毒了！

在「清泉井」上方，有一個磷肥廠，它日日夜夜向著古鎮、向著烏江傾吐著它的威力，在它經過的路上，寸草不生。李婆婆說，連百把年的石頭都受不了，老街下面原來還有幾十級梯坎的，都叫污水廢氣腐蝕垮了。

採訪時，不時有粉塵飄飄揚揚灑下，瞇著眼抬頭望去，一個氣勢不凡的水泥廠巍然聳立在古鎮右上方，巨大的煙囪正滾滾滔滔向天空傾吐著滿肚子的濃煙。風從峽谷口吹來，濃煙遮天蔽日，映襯著烏江峭陡的峽壁，頗有悲壯的氣勢，真是古鎮一道現代風景。

在煙塵籠罩下的李婆婆

1950 年，在羊角磧河灘上，張盡如、高占田、曹盡成三個地主血染烏江。

「井水不能吃了還能換自來水，但空氣怎麼換？每天都聞著嗆人的味道，肯定要少活好幾年。現在老街上年輕人全都搬走了，只剩幾戶老年人……向上面反映？反映有什麼用，要掙錢吶。還有，工作不好找，全鎮的人都指望著進廠打工掙點錢呢，哪個敢叫政府把廠停了治理？」

採訪時，正是 4 月「春半」時節，河灘上和河對岸，油菜花在春風中輕搖，但空中沒有清香和清新。只有江水，依依還有幾分舊時模樣。它翻滾過灘，嘩嘩訴說著人們不願聽的語言，沖洗盡被殺掉的地主們的血跡，忍受著傾泄給它的毒水和煙塵，伴著頹敗古鎮和古鎮裡仍在堅守的幾戶寂寞人家。

採訪時間：2005 年 4 月 12 日

地點：重慶市武隆縣羊角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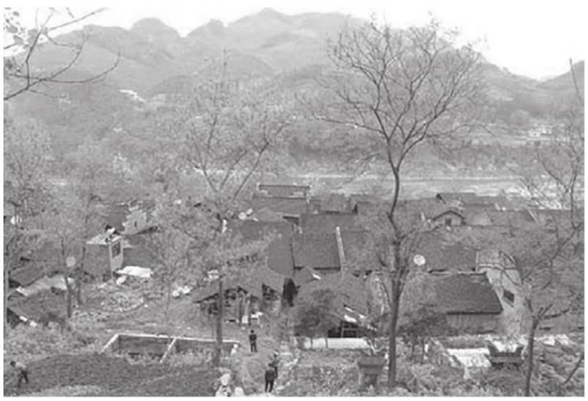
六、淇灘古鎮，「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

講述人： 崔照豐

72 歲

網上（2004 年 8 月）說：貴州沿河縣淇灘鎮發現一個保存完整風格獨特的四合院建築群，這一建築群最早修建於清代道光年間。

網上沒說，這個養在深閨人未識的清代閨女，剛出閨房就面對她的葬禮——兩公里外的沙沱電站將把她深深埋葬。



即將被淹沒的淇灘古鎮

汽車駛過橫跨烏江的一座大橋，拐上一條破爛不堪的沿江土路。剛下了一場大雨，車在坑坑窪窪中蹦跳，把污泥和濁水濺向雨後江邊清新的天空。

插入一條更窄更爛的小路，斜刺下去，遠遠便見一群層疊的老宅。

它依山臨水，靜靜躺臥在青山綠樹的掩映中，陳舊的黑青色房屋，雜亂的木石街巷，展示出它的古老與破敗。來前曾讀到介紹，說淇灘保存了獨特的自然人文景觀，無論從建築風格、建築工藝，還是實用功能來看，淇灘集烏江土家族文化特有的精華，成為千里「烏江畫廊」上獨特的風景。還有，淇灘自古就是沿河南部片區以及毗鄰縣的水陸交通要道和貨物商運的集散地，有「江面上船隻如梭，商賈集市繁榮」之說。

一位叫崔照豐的 72 歲老人，指著一條冷寂的通往河灘的石板路說：「當年，這兒熱鬧得很，是方圓百里著名的水碼頭，鹽巴、桐油、集市、商貿，興旺得很……」

既然是商貿集散地，水運大碼頭，便一定要生出些富裕人家；生出了富裕人家，便一定要修高宅大院；修起高宅大院，便要請匠人雕刻些文化藝術。在千年古鎮裡，一座富家古宅，便是一段歷史，一件建築藝術。

崔照豐老人為我指點了四座古宅。

張布月舊宅

王永濤舊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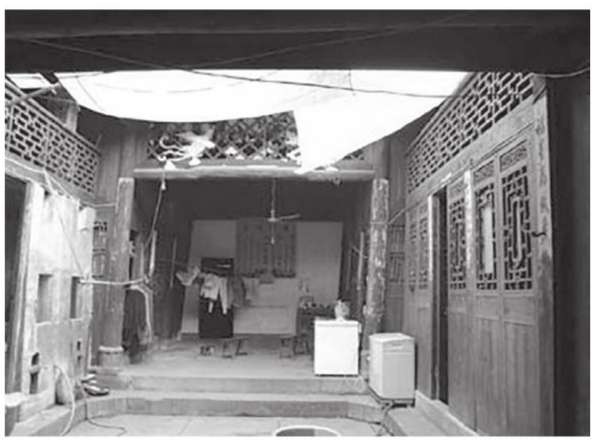
楊光寶的舊居是一個古老的四合院，百年風雨如晦，新、舊社會滄桑，它竟然還保存完好，尤其是木窗上的雕刻，倒懸的蝙蝠，盛開的花果，一個個生動而完整。張布月（音）的舊宅也是如此，雖朱顏已改，但雕樑畫棟尤在。

崔老人說，古宅中最有氣勢的是肖達輝（音）家，雕刻得最好的是王永濤（音）家。可惜，這兩家大門緊閉，主人不在，未能進門一睹芳容。

其實，現在這幾家大院的住戶早已不是房子的主人。楊、張、王、肖都是地主，1951 年初的一天，楊光寶、肖達輝兩人，被押到淇灘河壩上，槍聲響後，楊、肖二人魂斷烏江，從此再沒回到他們祖傳的大院；王永濤要幸運一些，沒有死在淇灘河壩，他被抓進大牢，後來死在獄中。最幸運的是張布月，崔照豐老人說，她是個女人，土改時還很年輕，「剝削」不大，農會於是貴手高抬，張布月於是棄宅飛奔，後來在貴陽城裡去世，算是善終。

幾個地主的古宅大院作為「果實」分給了農戶，但不久又被收回作為「國家財產」。張家成了食品站，肖家成了稅務所，王家做了銀行，楊家作為收購站。

肖達輝舊宅



楊光寶舊宅

近年來，某些單位（企業）效益不好，於是，散夥賣房（這次不是無償的分「果實」了），古院老宅又被「國家」作為自己的財產賣給了私人（如張家大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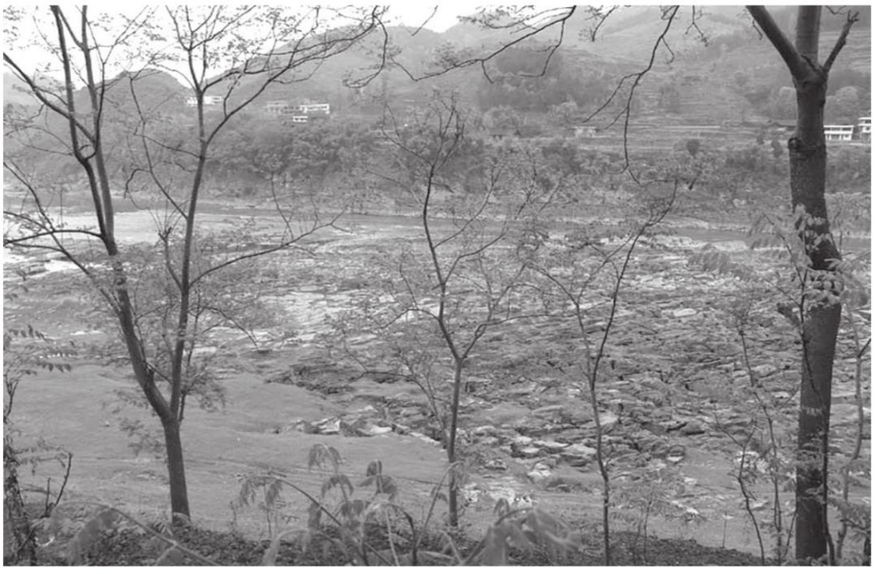
如今好了，下游幾公里處要修 100 萬千瓦的水電站，到時大水一來，一了百了。

地主們早已被「政府」殺光滅光了，院宅群是被「國家」分光賣光了，歷史的記憶，河灘的血斑，連同大量埋藏在地下的文物，一起水葬——「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徐志摩詩句）

採訪時間 :2005 年 4 月 10 日

地點 : 貴州省沿河縣淇灘鎮

這是淇灘古鎮後面山坡上一座古墓的雕刻，他們的下面，
便是肖達輝、楊光寶兩地主被槍殺的河灘。



河灘

七、那時殺人十分隨便

講述人：譚竟平

1950 年萬縣專區軍事管制委員會軍事代表

1918 年生

我是萬縣高梁鄉人，到成都讀書時，剛好遇上「一二·九」運動，那時我滿腔愛國激情，「九一八」事變對我們這些關心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年輕人刺激很大。我立馬投身革命，並在 1938 年 1 月加入了共產黨。為什麼沒跟隨國民黨？原因很簡單，我覺得它專橫腐敗。

我擔任了川康特委的聯絡員，跑川西十幾個縣，幹送黨的文件，收集情報等工作。邛崍縣的黨組織散了之後是我去清理的，後來我擔任了邛崍縣的縣委書記。沒多久我暴露了，要抓我，我跑到仁壽縣，那時仁壽、彭山、華陽三縣成立了一個特區，我擔任特區書記，組織了一支 700 多人的游擊隊，有 300 多條槍，搞武裝鬥爭。但敵強我弱，打不贏，我準備撤到邛崍山區，省委沒同意，把我調回成都。這時我被國民黨通緝，省委又把我派回萬縣，給我的任務是做統一戰線和收集敵特情報工作。

我們譚家是個大家族，出了很多能人，其中我的堂兄譚顯熾就非常能幹。當時他在萬縣很有名氣，是一個有錢又有地位的企業家，我到他開的永運錢莊去任職，通過他的關係結交了不少達官貴人，也因此收集到很多敵特情報。說來好笑，我結婚時的證婚人就是一個特務頭子——國民黨萬梁警備司令部緝查組的組長唐伯均（音）。

萬縣解放時，我擔任軍事管制委員會的軍事代表、接管研究領導小組組長，參加接管萬縣。後來我負責財經方面的工作，成立了萬縣人民銀行，擔任了川東畜產公司經理。

土改時我沒有下鄉，但我知道搞得很血腥。那時把殺人權下放到區上，沒有法院，也沒有什麼逮捕、審判，一個區委書記就可以定一個人的生死。殺人沒有標準，說誰是惡霸地主，不調查、不核實，抓來就殺。有錢的，殺；得罪過農民的，殺；當過鄉長、保長的，殺……我們高梁鄉我知道的殺了地主譚迅如和譚堯父子倆。另外我的姑爺馮宗山（音）自殺了。馮宗山只有 20 多畝田土，一個小地主，鬥他，他害怕，投堰塘死了。我們譚氏家族裡戴地主帽子的就多了，當時沒被殺的後來日子

都過得很慘，他們被趕出來住在爛棚棚裡，很多人都在六十年代初那場大饑荒裡餓死了，比如同我一輩的譚顯碧。譚顯碧其實很冤，她是萬縣中學的高中畢業生，我二伯的女兒。解放前兩年她同賀家的賀啟坤（音）結了婚。

賀家是地主，土改時把她也劃成地主。賀啟坤被抓進監獄，後來死在勞改隊。土改雖然沒殺她，但後來那個悲慘……我去看過，她住在一個茅草棚棚裡，一張破床，上面睡她，下面睡豬。唉，受了好多折磨，真的是非人的生活。1961 年大饑荒時，她餓死了，她死時才 30 多歲。

我那個堂兄譚顯熾也沒跑脫，他本來屬於民主人士，又掩護過地下黨，解放後擔任了資訊委員會委員，資訊委員會是政協的前身。但「三反」運動時把他判了兩年徒刑，後來又開除了他的公職，他生活沒著落，大饑荒結束後一年多他就死了。他是個很能幹的企業家，20 多歲辦企業就很有名氣。

我見到殺人最多的是與土改同步的「清匪反霸」運動，也就是「鎮壓反革命」。萬縣專區殺了幾千人，開縣一個區就槍斃了 100 多，奉節縣殺得也多。1951 年有一天我親眼見到，就在下面河壩上，一口氣槍斃了 30 多人，其中還有一個 17、8 歲的姑娘，她姓王，說她是一貫道成員（一貫道當時被定為是反動幫會組織）。資訊委員會的人因此提意見，說還是應當刀下留人，不該把十幾歲的妹子都殺了。

那時不像現在，還有個審判，那時捉來說殺就殺，完全亂搞，所以，錯殺的不少。我們單位的劉志齊（音）就不該殺，他沒什麼罪惡，無非是解放前耍了幾個女人。當時我不在，等我開會回來，人已經槍斃了……其他不說了，就連我們地下黨的人也錯殺，陳太侯就是那時冤死的。

你知道江姐（江竹筠）的丈夫彭詠梧吧？陳太侯就是同彭詠梧一塊打仗的。

1947 年底，彭詠梧、江姐等在奉節縣組建了川東游擊隊奉大巫支隊，「奉」指奉節，「大」指大寧，即現在的巫溪，「巫」指巫山。彭詠梧任支隊政委，陳太侯任支隊司令員，蔣仁風任參謀長。1948 年 1 月，他們從奉節的竹園鎮走到與巫溪交界的鞍子山，在一個叫十王殿的小廟吃飯，飯後敵人追上來，彭詠梧在突圍時，為救他的警衛員中彈犧牲了。陳太侯則逃脫了。解放後陳太侯在奉節縣公安局二科搞偵查工作。1951 年鎮反時說他通土匪，不由申辯，抓起來就槍斃了。他的冤案直到 1985 年才平反，給他恢復了黨籍。有啥用？人都殺了幾十年了！

還有梁平縣的雷夏殿（音），他是 1927 年的老黨員，鎮反時也被槍斃了。後來他在成都工作的女兒還來找我瞭解他爸爸的情況。雲陽縣的姚達九（音）雖沒被槍斃，但被抓去陪殺場，又勞改好多年。有一個整得最慘，他是巫溪的廖迪生（音）。地下黨派他打入國民黨，他在國民黨裡當了縣參議長。他利用他的權力，出錢又出力，救了不少共產黨人，比如前面說到的奉大巫支隊的參謀長蔣仁風就是他救的。

在彭詠梧犧牲的那場戰鬥中，蔣仁風被俘了。廖迪生設法把他弄到巫溪來審理。蔣仁風說他不是共產黨，是個草藥先生，上山採藥時被游擊隊強迫留下來為他們治病。廖迪生借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把蔣仁風放了。

解放後廖迪生擔任了百貨公司和糧食公司經理，鎮反時說他是混入黨內的敵特分子，判他 15 年徒刑，押到新疆去勞改。刑滿時正好遇到文化大革命爆發，上上下下沒人管他，他只得繼續在牢裡待著，一直到華國鋒當公安部長釋放國民黨縣團級幹部時，才把他當作國民黨縣團級幹部釋放出獄。他出獄後，家早已沒有了，妻離子散，一個侄兒收養了他，沒幾年他就死了。後來給他落實政策，定了一個「17 級幹部」。

你也聽說過我的事了，「三反」運動時我就被掀下來，後來又當右派，挨整幾十年。為啥？這也是黨內搞宗派。當時萬縣掌權的是山東來的南下幹部，他們文化不高，業務不熟悉，對地方情況不瞭解，但他們有權。他們排斥地下黨的幹部，藉一個又一個運動把我們這批人整下去。

（注：在一篇標題為〈紅岩英雄悲喜人生：游擊縱隊 40 多人解放後被處死〉的文章中，有這麼一段文字：「接著而來的便是『減租退押』、『清匪反霸』和『三反』運動。在這些運動中，在『宗派主義者』和『左傾頑症患者』的指導下，原川東游擊縱隊指戰員受到極不公正的待遇與處理：以『土匪』、『惡霸』、『反壞分子』等罪名判刑的有 100 多人，其中被判處死刑的有 40 多人，142 人被開除黨籍，460 人被開除公職，製造出大量冤假錯案。更叫人痛心疾首的是，原奉大巫支隊司令員陳太侯，在 1951 年『清匪反霸』中被人誣告為『土匪』、『反革命分子』，竟不由他申訴，便被判處死刑。陳太侯慣使雙槍，槍法極準，是小說《紅岩》中雙槍老太婆的原型人物之一。有關部門、人員知道他的厲害，先把他的槍卸下，再由人左右前後的架著，押回老家槍決，當眾宣布的罪狀是『土匪』、『惡霸一方』等等。川東游擊縱隊司令員後又兼任縱隊政委的趙唯，在『反右』期間也被打成『大右派』，被監督勞動改造。」——打扁阿扁發表於 2006 年 4 月 20 日）

我們這批地下黨的人當年都是提著腦袋在幹革命，說不準哪天就沒命了。我這條命算是江姐救下的。1948 年，江姐因叛徒出賣在萬縣被捕，關在國民黨第十八保安司令部，她在被押到重慶去時，從電報路走下來，一路高喊：「我是良家婦女，不是共產黨，你們冤枉我。」她這樣高喊，就是要給我們這些還沒被抓的人放信，讓我們知道大事不好。我一得到這個消息，當天就跑到武漢躲起來。我算是 1948 年萬縣大逮捕中的「漏網之魚」，否則，我也會同江姐一樣死在渣滓洞。

可解放後，川東地下黨像我這樣的「漏網之魚」，被共產黨一網打盡了。

現在，在萬縣地區，紅軍時期的川東地下黨員只剩我一個了。前些年他們找我寫回憶錄，我寫了 7000 多字，發表出來只有一半，後面蒙冤部分被砍掉了。我在看反映潘漢年的電視劇時很有感觸，因為我當年也是在敵區搞情報工作。我寫了一首詩，其中有這麼幾句：「是非顛倒千秋恨，皂白不分萬載冤。一片丹心耀日月，招魂何處問蒼天？」

你問回想這場革命的感想？怎麼說……那時國民黨的官員嫖娼賭博還是自己掏腰包，現在共產黨的一些官員嫖娼賭博花公款……算了！我已是垂暮之年，一切都無能為力，不關心了！每月拿二、三千元的養老金過最後一點日子。

採訪時間：2007 年 3 月 9 日
地點：萬州兒童醫院老幹科

採訪後記

「老革命」譚竟平已經 89 歲高齡，是我到目前為止採訪的年歲最大的。

採訪時，他躺在病床上輸液，護士不時進進出出，他也講得斷斷續續。但是，感覺得到，老人一生經歷的和積累的東西很豐富，可惜的是，由於身體和時間等原因，我只採訪到冰山一角。

「我已是垂暮之年，一切都無能為力，不關心了！」

譚竟平老人從「三反」運動時就蒙受冤屈，並被判了幾年徒刑，1957 年又劃為右派。由於他是我的大伯，我知道那幾十年的日子他和他全家過得十分艱難，他妻子因為他而失去工作，全家 8 口人每月只有 30 多元收入。那些年，政治上的壓迫不說，僅經濟上就讓他全家長年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但是，採訪時，他一點不提自己的冤屈和苦難。

同那些冤死的戰友相比，同他所目睹的那些慘烈相比，他認為自己是幸運的。

當我問他現在對他參加的這場革命有何看法時，老人突然顯得很煩躁，匆匆說了兩句就不作聲了。

補記：譚竟平老人於 2012 年 2 月去世，終年 94 歲。

附：檔案上記載的重慶市南岸區徵糧和土改情況

第二節徵糧反霸，鎮壓反革命

南岸解放，百廢待興。新政權首先面臨的是上級下達的公糧徵收、減租、退押，清匪反霸和鎮壓反革命等一系列鬥爭任務。特別是徵糧工作是當務之急，早在 1949 年 9 月 20 日，鄧小平在南京給西南服務團的幹部作報告時就說過：「這次到西南，遭到的頭一個問題，就是吃飯問題，不僅我們進去的幾十萬部隊要供應，而且，國民黨的軍政人員有的還要暫時養起來，還有國營企業的 20 多萬職工也要吃飯，能不能把西南搞好，首先就看我們能不能養活這批人。」（參見《西南服務廳團史》第三章・走向大西南・第二節・徵糧剿匪）

……

（一）、舉辦農訓班，教育農民，整頓農會

南岸各區公所按派出所轄區組織派出了工作組，在農村進行政治宣傳，物色農村積極分子，教育農民當家作主人，成立農民協會。通過動員、學習《減租條例》《農協組織通則》、聽領導作報告、看電影《踏上生路》、召開訴苦會等形式，對首批農訓班 77 名學員（男 60、女 17）進行階級教育……通過大力組織開展訴苦活動，學員的階級覺悟普遍提高，雞冠石王新榮說：「我們窮不是命不好，不是菩薩降的罪，原來是惡霸地主把我們整窮了的。」大興場闕利源說：「我們回去也召集大家來訴苦，使他們認清哪個是我們敵人。」汪山蔡正常說：「回去不單要整頓農協會（的階級成分），還要把婦女組織起來大家共同鬥爭。」42 歲的婦女劉天福經教育提高了認識說：「過去我還認為我的老闆厚道，因為他常給我小東小西，現在才曉得他剝削我們的多得多呢！過去認為窮是命，現在找到窮根了。」

第二期農訓班 9 月 25 日開班，學習 11 天，學員 119 人（男 78 人、女 41 人）。第三期農訓班 12 月 8 日至 12 月 18 日，學員 104 人（男 68 人，女 36 人），學習 10 天。儘管學員中三分之二的人不識字，但經過啟發教育，提高了階級覺悟後，加深了對地主的仇恨和回去開展對敵鬥爭的積極性。

六區共舉辦了四期農訓班，培訓學員 650 人（男 515 人，女 135 人），組織了 27 場訴苦會，動員了 40 ～ 50 人上臺訴苦，舉辦了 15 次座談會，召開了 14 場鬥爭地主會，有 21000 多人參加了鬥爭，鬥爭中對不法地主採用了捆、吊、跪煤炭花（煤渣）等形式，讓地主低頭。六區農會會員後來發展到 5229 人（男 3327 人，女 1902

人）。

（二）、公糧徵收任務繁重

南岸地處郊區，地少人多土地不夠耕種，種一石或兩石，甚至幾斗地的農民占的比例相當大。由於建國初期糧食緊張，公糧徵收任務大，西南地區中央規定農民每戶年產 150 市斤糧食為公糧徵收起徵點，所有農產品產量都要折合成糧食評定，以石為單位，折合標準是：麥子每石折合黃穀一石四斗；高粱、大麥每石折合黃穀五斗；包穀、胡豆每石折合黃穀一石；白菜、四季豆每百斤折合黃穀九升；韭菜每百斤折合黃穀一斗八升；青菜蘿蔔每百斤折合黃穀一斗四升。儘管如此，當時幹部的任務觀點強，實際徵收量與上級下達的任務數字差之太遠，缺口大，徵糧工作組不得不突破中央公糧徵收起徵點的規定。如南岸六區玄壇廟工作組把每戶 150 斤的起徵點降至 100 斤，甚至 80 斤以下。農民呂海章全家 5 口人，農作物收入共折合糧食 3.57 石（386 斤），人均 77 斤，調整公糧 0.178 石（19 斤）。農民生活很苦，只有販菜、下苦力，或兼做其他事情，以維持全家最簡單的生活。

……

南岸農村各階級承擔公糧比例，地主承擔公糧大半都達到政策規定的 60%（上級規定超過而已繳齊者不返還），餘者由其他各階層承擔。

……

南岸六區各階層公糧負擔情況如下表：

南岸六 S 區各階級公糧負擔情況

成分	戶數	人數	負擔公糧數（石）	負擔公糧百分比	負擔占總收入百分比
地主	289	1253	1370.835	52%	72.6%
富農	107	678	1051.722	39%	17%
中農	14	94	377.442	16%	8.6%
貧農	191	1017	200.381	16%	1.6%
佃富	135	731	146.7	24%	17%
佃中	369	2615	707.4	11%	8.6%
佃貧	1490	6843	27.9	0.7%	1.6%
合計	2748				

（三）、減租、退押與鬥爭地主

1950 年下半年，根據［重慶市委字 1950 第 042 號文件］《關於郊區工作幾項具體工作的決定》第二條：「減租與退押應分開，同時應連續進行（但不要劃分階段）。反霸鬥爭一般與減租退押結合進行，而鬥爭的廣泛展開將在退押時期內。」的指示，

南岸地區的減租、退押基本上是按市委指示安排的。工作組首先組織各村幹部和農民積極分子，學習減租退押法令檔，依靠農訓班學員為骨幹，發動群眾廣泛收集地主剝削農民的材料，做好退押與鬥爭地主的準備。農村減租工作全面完成後，鬥爭的重點主要放在了退押時期，在工作組的領導下，以各鄉農民協會為單位，下設講理、立約、算帳、監察四個組具體開展工作，在各鄉各保充分宣傳發動的基礎上，開展訴苦教育提高農民覺悟，並組織召開群眾大會鬥爭地主。當選擇的鬥爭物件（對象）被鬥倒以後，其他地主便紛紛表示願意遵守法令退押，如黃桷埡鬥爭了惡霸地主謝頤若後，海棠溪、南坪場和四公里等地的地主說「不帶押金去開會要受氣，倒不如先交押金免得受綁」。

至減租結束時，五、六區共退押金 4830982850 元，減租 133024.58 市石，另外還有黃金、銀元、白銀、寶石、金戒、布匹、棉紗、肥豬等若干，平均減低了原地租的 25%，將土地所有者所收押金退還給了佃農。在減租退押的基礎上，成立了村一級的基層農民協會和民兵組織，同時，著手籌備土地改革。退押的工作步驟是：

1、工作組依靠農協召開富農會，指出富農應該站在怎樣的立場，動員他們自己起來開展退押鬥爭，要求他們自覺自願先拿出一部分押金作調濟；2、幹部開展退押學習，瞭解押金材料，聽取群眾對退押的反應，作出下一步工作安排；3、召開鬥爭地主會，對群眾進行教育，講明人民政府對退押的態度，對不法地主是不會放鬆的，令其準備押金，同時組織人民武裝自衛隊對不法地主進行鎮壓。

具體退押時，選出保管組、算帳組，召開鬥爭地主退押群眾大會。鬥爭地主退押大會規模一般在 1000 人以上，如汪山鬥爭地主丁爾康、丁易輝，會場約 1000 人；大興場鬥爭地主張伯函，會場有 3000 人，苦主 20 人～ 30 人；雞冠石鬥爭地主江聚原、曾道成，會場各 1000 人；大石壩鬥爭了地主聶秋湯、吳華廷等。鬥爭之後，其中一些地主人民法庭當場宣布執行槍決，以增加震懾力量。地主都在地上跪成一排，苦主現場訴苦後，馬上進行算帳，如果地主搗蛋，農民就當場將其捆起來，或關押，或找人取保限期繳清押金，收到的金錢暫時保管在農民手裡，增強了農民的積極性。大石壩工作組一夜就關了 20 幾個人。對不法地主工作組放手讓群眾自己處理，如：55 段地主童炳然應退押金 2000 多萬元，十幾天一錢不交，農民就將其捆起吊在樹上令其受凍，見此情況，20 段地主莫家玉第二天繳來 1000 多萬元，農會限她三天之內全部繳清。退押主要是發動佃戶自己去搞，幹部旁邊協助，如果佃戶有顧慮，就由幹部代為處理。南岸六區共鬥爭了 16 個地主，執行槍斃 7 人（張伯函、吳華廷、曾道成、江聚原、丁爾康、唐紹林父子），參加鬥爭會的農民達到 21000 多人。

鬥爭地主退還押金使貧困農民得到好處，因此情緒很高，如南岸六區共應退押金 2627673906 元，截至 1951 年 2 月，退押金 1882806619 元（其中，富農退出

1222382430 元，中農退出 376561323 元，貧農和其他成分退出 282420992 元，共調劑數為 563103366 元），還追出銀元 4937 元，黃金 10 兩。中貧農、富農調劑外的押金都發給農民自己使用，農民獲得調濟平均數 30 萬元左右。1951 年元旦，六區大石壩工作組舉行慶祝元旦大會，農民 1000 多人參加，他們製作了犀牛、獅子、連槍等上街遊行，慶祝鬥爭翻身得到勝利果實，參加遊行的婦女也占到總人數的五分之二。

雕塑「翻身」——中共掀翻壓在農民身上的地主，
讓農民翻身做國家的主人。

八、從「地主婆娘」到「右派分子」

講述人：戴廷珍

1950 年土改工作隊員

1930 年生

一〉、打腰鼓，槍殺人的前奏曲

涪陵剛解放不久，地委宣傳部的一位負責人就對我說：「妳到武隆縣去鍛煉一年就讓妳入黨。」

武隆是大山區，生活條件比涪陵艱苦得多，但是，我很想入黨，就答應了。

1950 年，我帶著一幫學生到了武隆鄉下，協助搞清匪反霸和土改。那時，每一個鄉鎮都建有一個廟子，我們就住在廟子裡，打地鋪睡在地上。批鬥會、公判會都在廟前的地壩裡舉行。每到一個鄉鎮，我就率領學生隊伍把腰鼓打得震天響。對了，我在涪陵活躍得很，是打腰鼓的好手，涪陵七個區的人都來找我學。武隆那個偏僻貧窮的山區，對腰鼓很是稀奇，我們到一個地方打腰鼓就是為了把農民聚集起來。

聚集起來幹啥？開批鬥會呀。農民被鼓聲吸引來後，就開批鬥和公審大會。要鬥要殺的人早就捆綁好了立在廟前。唉呀，那個捆綁才嚇人，用鐵絲從胳膊肉裡穿進去捆綁！我一輩子都記得，血淋淋的。我不敢看，只有皺眉頭，還不敢公開皺。

批鬥完後就是槍斃，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都要殺人，我記得最少殺了 3 個，最多的有 20 多個。保長都殺，地主當然也殺。共產黨要這樣做才嚇得住人。武隆縣窮得很，一家人褲子沒多的，出門得輪流穿。有的人家一床棉絮都沒有，睡覺蓋包穀殼。那些地主，是不是地主我也不清楚，看上去也窮得很，有些地主，一身破破爛爛，像啥子地主嘛。我們演劇，要用地主、地主婆的衣服，去借來穿了，一身都是蝨子！

但是，為了入黨，我咬著牙堅持。

那時殺人隨便得很，我有個叔伯叫戴紀奎，他在涪陵當個小科員，娶了個漂亮的鄉下姑娘，解放前夕他回到鄉下他妻子那兒（他要是不回去就好了），結果被農會抓起來槍斃了！他一點罪行都沒有，平白無故把他殺了。他妻子後來嫁給了重慶法院的一個炊事員。評地主也隨意得很，我父母在 1958 年還被劃成地主！為啥？為

了打我右派，就把家庭出身給你搞成階級敵人。由此可見當時劃地主多麼隨意。

殺完人後就該我們上場演劇了，劇在黃昏時分上演，點起煤油燈，就在廟前。

永遠只演一部劇——《窮人恨》。劇的內容有些像《白毛女》，講地主、地主婆如何兇殘，如何剝削壓榨農民。本來該收 10 擔租的非要收 20 擔。農民交不起就去拖人家的牛……反正亂編，要煽起農民的仇恨。我在劇裡演地主婆，手拿錐子（就是扎鞋用的有一個把柄的長針）去扎像白毛女那樣的丫頭。

演完劇後，我們就在廟裡過夜，這是我最痛苦最恐怖的時候。為啥？為那些死屍！

當時有個規定，被槍斃的人要曝屍三天以展示震懾力。他們專門把屍體拖到廟前，還要專門以此考查我們的階級立場，檢驗我們的態度。我進進出出都要看到那些恐怖的屍體，我怕得很，夜裡尤其害怕，一閉上眼睛就是血淋淋的一片，幾乎通宵不能入睡。當時還有人把死屍的睾丸割下來拿去吃，說是吃了治咳嗽。我走過屍體時，閉著眼睛進閉著眼睛出。我們學生中有的人也嚇得驚喳喳地叫。這些都是沒有經受住考驗的表現。

武隆縣

殺人的場面我也不敢看，但是，不去看就是階級立場有問題。我只得撒謊，一會要拉肚子，一會要去撒尿，頻頻躲開那種場面。但是，這又瞞得了多久呢？所以，他們給我的結論是沒有經受住階級鬥爭的考驗。就這樣，我沒能入成黨。

演地主那個演員就很會表演——臺上台下都會表演。他本人就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他表現出很仇恨地主的樣子，還積極地參與鬥爭地主，對地上的死屍也表現出仇恨。所以，他經受住了「考驗」，入黨當了官——武隆政協主席。多年後有人說，當年《窮人恨》中的地主和地主婆，一個當了大官，一個掙了大錢。

二〉、打鑼鼓，鬥打我的開場白

1957 年大鳴大放時，我在重棉七廠中學教書，我說了三句話：一、儲安平的「黨天下」說得好——因為我覺得一切都是黨說了算；二、「老牛吃嫩草」——我們黨委書記 60 歲了，娶了一個 20 歲的漂漂亮亮的地主女兒；三、「十麻九怪當不到癩兒打呵欠」——我們有個領導是個癩子（即頭上有癩疤，無毛），我諷刺他。這三句話給我換來三頂「帽子」：一、右派分子；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三、反領導的

壞分子。這三頂「帽子」壓我幾十年，整得我死去活來。不僅整我，還整我在涪陵的父母。1958 年，在我被打成右派後，他們重新劃成分，把我父母劃為地主分子！1979 年我右派改正後，才給我父母平了反，但這時我父親早已被迫害死了。

我沒有被送到川西的峨邊去勞改是因為我有幾個親戚在共產黨內當大官，其中一個是我么爸，他是 1927 年參加革命的老黨員，解放後擔任了北京空軍的宣傳部長。那個軍屬證就是寄到我家的。

我沒被押到峨邊勞改，算是撿了條命，峨邊艱苦得很，好多右派都死在那兒。

由於我當大官的親戚的原因，我 1961 年就解除了勞教。工作沒了，我自謀生路，在朝天門賣歌單，5 分錢一張，我一邊賣一邊唱，沿著那石梯走上走下地唱賣，一天要賣 400 張，也就是 20 元錢，那是一筆很大的收入。後來我在文化宮中門租到一間爛棚子，做為洗相片和給相片著色的門面。我的生意好得很，很掙了些錢。

文革期間，是我被鬥打得最慘的歲月。我曾戴過 10 頂高帽子遊街，衣服、裙子被撕成條條，屁股被錐子錐得鮮血直流。說來好笑，土改時我演地主婆，用錐子去錐丫頭，以展示地主階級的兇殘，但那是演戲。文革時，「革命群眾」用錐子錐我這個右派分子就不是演戲了，我屁股上從此留下了終生不退的血疤。那些撕爛的血衣我一直保留了多年，可惜我女兒不懂事，把那些「文革證物」全部拿去丟了。

我為什麼被鬥打得慘，因為我不認罪。鬥爭我時，要我交待犯罪的原因，我說，我交待，我之所以犯罪就是聽了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誡。」結果一說到這兒他們就拿錐子扎我屁股。鬥我時，他們強迫我站在疊起的兩條板凳上打鑼，為啥？為了把人們吸引過來觀看鬥爭我。

我心中不服，使勁打，把鑼都打爛了。

在生我小兒子的那天下午，我還被抓出去鬥。鬥完後我跑到市委，那是 1969 年，已經有軍代表了，我把軍屬證拿給他看。對了，文革抄家，我家被抄得精光，但軍屬證沒有被抄走。那個軍代表親自把我送到了第三人民醫院。那時，「黑五類」（即共產黨劃的「地、富、反、壞、右」）不准住醫院，軍代表對醫院說：「你們把這個人收了，我擔保。」當天晚上我就生下了我的小兒子——後來他考上了北京大學，現在是西南大學的副教授。所以，我一輩子都記得那個救了我一命，不，救了兩條命的軍代表，他叫王建中。

那個軍屬證還成了救我媽的救生符。文革時，三天兩頭戒嚴，一戒嚴就把我媽抓去關起，為啥？為她是「地主婆」、是「階級敵人」。每次我都是拿著軍屬證到各個拘留所、收容所、派出所去找她，找到後用軍屬證把她領出來。文革時我么爸還在部隊裡，他們打電話證實後就把我媽放了，但下一次戒嚴又抓。記得有一次，那是 1969 年，我小兒子才 8 個月，我揹著兒子，從一個派出所到另一個派出所找我

媽……我丈夫？唉，他也是右派，在川西勞改。他當右派是因為出身不好，父親是地主——雲南江川縣的地主。土改時他父親看到天天殺人，嚇得上吊自殺了。我沒工作，成天要在外面掙錢，小孩沒人帶，只好把媽媽接來帶孩子，結果弄得她三天兩頭被關押。

那些日子，不是人過的日子，所以，我曾經 8 次上北京告狀。

當然，那些日子也極大地鍛煉了我，上訪、申冤這一套我搞得車輕路熟，現在重棉七廠的下崗工人上訪都是我領頭，政府信訪辦的人一見到我就頭痛。

採訪時間：2009 年 12 月 28 日

地點：重慶枇杷山公園

採訪後記

我已多次在右派們的聚會上遇見過戴廷珍，但從沒想過要採訪她。因為前些年我主要採訪重慶長壽湖右派，沒打算再採寫其他右派群體。決定採訪她是因為偶然聽她說起她曾經參加過土改，在餐桌上她描述那個「鐵絲穿肉」的表情深深「打動」了我。於是，我當即記下她的電話和家庭位址，並請她一定約我談談。

2009 年歲末，重慶江北農場的右派們在重慶枇杷山公園聚會，我藉此機會採訪了她，並錄下了她的全部講述。

補記：戴廷珍於 2011 年去世

在國共內戰時中共以土改來動員農民投向中共，參軍打仗，此為中共土改宣傳畫

九、太血腥，我想逃脱，結果——

講述人： 楊正秋

原合川龍市鎮土改工作隊員

受不了土改血腥殺人，我想逃脱，但什麼叫在劫難逃，我就是在劫難逃……

我是四川合川龍市鎮人，我外公粟和林是個獸醫，我父親是個醫生，他中西醫都不錯。

我十多歲時，去讀合川師範學校，當時讀師範一分錢都不收，吃飯都是國家拿錢。我正是因為沒錢才去讀的師範，揹個箱箱就去了。培養老師應當國家拿錢，解放前都這樣，現在收錢沒得道理。

1950 年 2 月 1 號，我在合川龍市區（也叫第九區）人民政府當了脫產幹部，做恢復農村村小（學）和組建農會的工作。那是減租退押、清匪反霸的時期，是土改的前奏。

我組織宣傳，作記錄，作記錄就是公審大會上他們講地主的罪行，我負責記錄下來。審判長宣判「罪大惡極，宣判槍決」之後，我就在「判處槍決」上打個勾勾。這就像舊時戲裡的判官一樣，閻王在上面宣布，要把哪個打下去，判官就勾個布子。殺一個人我就勾一下，我就是那個角色。

我當判官角色的時候，有一次，在龍市小學鎮壓所謂反革命，實際上是殺地主。那一次一下就殺了十幾個。殺了之後我們還要一個個去把耳朵提起看，是不是殺死了。當時我就覺得太殘酷，那些人並沒有什麼罪惡，哪能這麼幹？而且，那些殺人的打手都是些地痞流氓。當時組建民兵，選哪些人呢？要選膽子大的、會用槍的、成分好的。什麼叫「成分好」？叫花子（乞丐）成分就最好。當時講成分，貧農是沒有田地的，而叫花子更窮。其實這種人都是些好吃懶做、地痞流氓之輩。他們一無所有，亂整亂搞，中共就信任這種人，就利用這種人，因為這種人才下得了手，這是共產黨的一慣傳統。現在電視上都看得到，共產黨起家，就是把什麼土匪武裝呀、地痞流氓等組織起來搞革命。打國民黨時就把土匪、地痞流氓組織起來對抗。

這些地痞流氓民兵，他們殺人前把子彈在石頭上磨，然後衝著人腦打。子彈是銅殼殼，裡面是鉛，銅殼殼一磨薄了，子彈打進人腦就會把腦殼打開花，當時叫「敲沙罐」——把人腦殼像沙罐一樣地敲得稀爛。有個叫任篤青的地主，他是我的鄰居，他的腦殼被打開了花，只剩一點山羊鬍子吊在下巴上。他的後人就是憑這點山羊鬍子來認的屍。我看到這個場面，覺得這樣殺人要不得，這樣搞下去要不得，太殘忍了！

殺地主（網路圖片）

還有，我的一個堂叔楊希伯，他雖然有點地，但他只是一個教書先生，他也被抓到殺場。他在下面眼巴巴地把我盯著，那個眼神是問我能不能救他。我怎麼救他嘛。我看到那雙眼睛，難受呀！那天沒有殺他，他是被抓去陪殺場。那個陪殺場被殺頭還可怕，殺死了就算了，但陪殺場的人目睹和經歷的一切會深深印在腦子裡，可怕得很。我堂叔陪了殺場回去，當天就瘋了。

當時，凡是有點知識、有點財產的，都逃不脫那場劫難。我的兩個舅公（我外公的兩個兄弟），都是醫生（中醫），他們被抓到倉裡關起來。在倉裡，他們相互勒對方頸子，雙雙勒死了。

土改那個血腥場面我看不下去，覺得這個地方不是久留之地，這就是為什麼我要離開合川的原因。

我給領導提出，我想出去深造。

那個區長還不錯，覺得我在這個地方埋沒了，他開了條子，讓我去重慶市幹部招生委員會。

（注：楊正秋到重慶後，進入重慶市總工會並擔任了四川電業工人報的編輯。1957 年為採寫一篇文章被劃為右派下放長壽湖勞動改造，他後面的 22 年人生充滿艱辛。）

回想這一輩子，我為了逃避土改的血腥，來到重慶，結果當了右派。什麼叫在劫難逃，我就是在劫難逃。長壽湖 6 年，重棉六廠 16 年，我總共勞動改造 22 年。

採訪時間：2015 年 2 月 5 日

地點：重慶市渝中區美專校街

採訪後記

我第一次知道長壽湖右派楊正秋，是2000年看到他的長篇小說《陪都夜話》，而正式採訪他，已經是在14年之後，這個時候《長壽湖》一書已經出版三年多了。

在一次聚會時，我偶然聽他說，他當年參加過土改，正是因為受不了那種殘酷血腥，他才離開農村到了重慶。想到土改的經歷者已經十分稀少，我當即表示想去拜訪他，由於彼此已經很熟悉，他馬上就同意了。十多天後，我走進了他的家門。

老人是作家，有思想、有見解，他在講完他的經歷後，還發表了一些「評論」，比如他說：「共產黨一直搞殘酷無情的階級鬥爭，從建國初期起都這樣，清匪反霸，過分了。土改為什麼不可以用和平手段來處理？殺地主，那麼殘酷，完全是人為地製造階級矛盾，硬是非要製造一個敵對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不可。共產黨人為地搞階級鬥爭，結果是傷到自己。還有當初對資本家的「對資改造」，為什麼要那麼整所謂的資本家？現在不斷在發展個體經濟，發展經濟還要依靠他們。

如果那時不把人家的財產收了，讓他發展，現在會怎樣？是當時錯了還是現在錯了？」

採訪結束時，老人說：「我們這個國家，中國人民苦難深重，中國知識分子苦難深重，我希望歷史不要忘記我們，希望永遠不要忘記那些年的苦難，我希望終有一天會還原那段歷史。」

湖北省鐘祥縣群眾大會上人民法庭宣布判處地主曾憲成死刑
選自《中南土地改革的偉大勝利》中南人民藝術出版社1953年

十、鬥打地主很殘暴

講述人： 江書城

原忠縣土改工作隊員

土改時我參加了土改工作組，組長是譚平攸（音），我主要是作記錄。我們下去，與農民同吃同住，發動群眾，鬥爭地主。

問：當時很多貧下中農可能還沒得這種思想準備？

江：沒得沒得，很多還為地主說話。有的農民說，沒得某某老爺租給我們土地，我們活不出來。我們就要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那時教我們唱〈誰養活誰〉的歌，我還記得到幾句：「大家來看一看，修房子、種田地，到頭沒得衣服穿……」

群眾發動起來後，鬥打地主就很殘暴了。群眾中有些「勇敢」分子，下得了手。我曉得的有「燒燈碗」，「燒燈碗」就是把手捆在板板上，固定好，然後在手心裡倒桐油，再放一根燈芯點燃，那個燒起好痛苦。還有就是把褲腳紮緊，把螃蟹呀、妹仔（貓）呀放進去。城裡十字街那個地主，他家裡是開藥鋪的，叫肖躍傑（音），他老婆就遭螃蟹把下身抓爛了，還把妹仔（貓）放在她褲襠裡。

當時有個積極分子，吊人、打人很凶，還把他評了個「吊打模範」。這個人在「三反運動」時也評了「吊打模範」，他把肖 X 從百貨公司那個三樓上一腳踢下去。

我還是不主張這樣搞，有一次我看到民兵連長把一個地主捆起打，我還阻止了。

土改搞得過火，群眾還是有看法，我們又去講政策，這樣反反復復好多次。

採訪時間：2006 年 5 月

地點：忠縣縣城

十一、「先轟開，後深入」

講述人： 趙正榮

原雲南鹽津縣土改工作負責人

我搞過三批土改，先在昭通搞試點，魯甸和西江是昭通地區的典型，後來我到鹽津縣，在鹽津縣兩碗點當點長和法庭的庭長。點長就是負責兩個鄉的土改。

當時農民的確是很迫切地想要土地，但是，中國這個土改是暴力的土改。我們的工作步驟是：先轟開，後深入——扎根、串聯、訪苦、問貧（先去找受地主剝削壓迫的農民），發動群眾，鬥地主、分地主的財產。

問：什麼叫「先轟開」？

趙：所謂「先轟開」就是在發動農民前先把所謂的地主、惡霸抓起來，槍斃的槍斃、判刑的判刑。農民呢，當時都不願意鬥地主。我們這樣「轟開」後，農民才敢起來鬥地主。「先轟開、後深入」就是要通過鬥爭，不能和平土改。如果不通過鬥爭地主，把土地分了，那就是說你有地富思想，你沒有搞鬥爭，就要撤消你的職務。

我負責的那兩個鄉，不准工作組打人。在別處就不同了，說理鬥爭，實際上不是說理鬥爭，是打，而且不是一般的打，特別是在追財產這個階段。當時不僅打地主，地主的家屬子女都抓來鬥打。比如上次來的那個吳之柏，他的母親、叔叔等，都是鬥爭會上被打傷後回去死了的。他家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有七個，是打死的，相當殘忍。他為此還寫了本書。

劃地主我是執行政策的，只劃那些不勞動、占有大量土地、靠剝削吃飯的人。

有的地方就不是這樣了。那個山區地方，有好些都不算什麼地主呀，只是稍微有點土地，但財產、浮財都很少。有的根本不是地主，他根本沒有剝削。還有，你年輕不知道，大多數地主的土地都是自己辛勤勞動，省吃儉用買來的。

問：土改後期不是有一個複查嗎？看是不是該劃為地主。

趙：是有一個複查階段，但複查不是說劃出來的地主有錯劃的，不是！是看有沒有漏劃的，複查是針對漏劃的地主。

（注：土改後期的所謂複查，最重要的就是查成分有沒有劃錯或漏劃的。從理

論上講，這個複查看上去有道理，但實際上它又為整個土改增加了醜陋的一筆。原因很簡單，為了錢財。即便是錯劃為地主，也不可能改正，因為已經把人家的財產瓜分和吞噬了，不願也不可能吐出來，甚至有的人都被整死了。而增劃所謂漏網的地主，則馬上又可以去分他的財產。所以，在土改的這個複查階段，又補劃了一些所謂的地主。）

採訪時間：2015 年 5 月

地點：重慶市江北區觀音橋

採訪後記

1957 年，趙正榮在鹽津縣工交局局長的職位上被打成了右派，這導致他家破人亡。22 年後他獲得改正，擔任了昭通市紀委書記。2012 年，他發起昭通 16 個老黨員，上書中共黨中央，要求撤消周永康政法委書記職務，這事在海內外引起巨大反響。

2015 年，他第二次來重慶拜望重慶的老右派，並希望我幫他整理他的自傳。

上述文字，便是他人生經歷中與土改有關的記錄。

廣東農民鬥地主。

選自《中南土地改革的偉大勝利》中南人民藝術出版社 1953 年

十二、「讓農民過苦日子」

講述人： 蔣澤英

重慶市南川市大觀鎮騰龍村農民

1932 年生

土改時我只有十八、九歲。那時，工作組的人給我們說，你們婦女，受了幾千年的壓迫，現在要翻身。黨員會、團員會，天天宣傳，我們做活路（勞動）時也宣傳。他們說，地主剝削我們農民，欠了農民的血汗錢，讓農民過苦日子。

我小時窮，沒讀過書，解放後說要辦識字班，我積極得很，打起火把就去。還有，說我們是包辦婚姻，應當離婚，我差點就離了。

鬥地主時我們一般先唱歌，再開會。我那時積極得很哪，記性也好。我還記得工作組教我們的那支歌：

「你我婦女們哪，唱的就一條心喲，大家都勞動嘛，把產生嘞哆哪嗦。今年好參軍哪，好個劉秀英喲，帶起個解放軍哪，上重慶哪哆哪嗦。一條馬路行哪，到了個臺灣去喲，臺灣解放了嚟，轉回城嘞哆哪嗦。樣樣清算你（地主）呀，你要坦白些喲，若或不坦白嚟，槍決你喲哆哪嗦。你是個大生聊（大約是「為富不仁」的意思）嘛，你買田就富鄉當喲，你抱倒肚子嘔嚟，溜達光咽唉呀喲。今年就把租減了，明年就把地分了嘍。地主才無法嚟，窮人就滿了心唉呀喲。」

那時，我經常參加鬥地主，但我沒動手打，我是女娃嘛。整地主那些刑罰惱火（厲害）得很，我看到的有這些手法：用海椒（辣椒）粉嗆地主、吹他們的水風車、下雪天叫他們下田去摸魚鰍、冬天裡把他們的衣服褲子脫光，推到炮樓（當時村裡有一座碉樓）上讓他們光著身子受寒風吹、民兵把兩三個鐵角抬起來壓在地主肩上……

槍斃的地主的名字我忘記了，只記得有個地主死之前對民兵說：「你好生打，不要把我的腦殼打爛了。」

我見到死人最多的是那幾年饑荒年。沒得吃的呀，我去把糯米藤那個腦殼挖起來推粑吃；還有芭蕉頭。我還到巴縣那邊去揹白善泥（觀音土），揹回來給娃兒吃。我哥哥說，那個蔣澤英，娃兒才兩三歲，那個泥巴吃了拉不出屎，啷個辦？

不吃泥巴有啥子辦法？那些日子苦得很哪！記得有一次我背娃兒到石嘴醫院去看病，在車上，那個司機說：「你看嘛，這兒死了一個。」轉眼他又說：「那兒又

死了一個。」一路上，我看那些死人，有的衣服褲子都被人脫光了，沒被脫的都是些破爛衣服，那些餓死的人看上去慘得很。活著的人不管什麼都弄來吃，那時，坡上能吃到生包穀（玉米）、生胡豆就好得很了。看到地上有一粒糧食，撿起來就吃了。

我哥哥一家餓得慘，他娘屋的那個，一天叫：「要吃飯哪，要喝米湯呀。」他們沒得吃的，把那個衣服、那個爛棉花都撕了來吃。哥哥他們還是餓死了。我的老漢（父親）餓死了，我的母（母親）餓死了，我的公公婆婆也餓死了。

採訪時間：2011 年 12 月 31 日

地點：重慶市南川市大觀鎮騰龍村

採訪後記

應朋友之邀來到南川鄉下，飯後到山坡上閒逛，偶見一破破爛爛的農舍，一個老婆婆孤零零地坐在門檻後，冬日的夕陽灑在她瘦削蒼白的臉上。

見有人來，婆婆趕緊站起身，萬分熱情地把我們請到她那幾乎家徒四壁的房間裡。老婆婆太孤寂了，不速之客的到來讓她十分高興，她衝著我們嘰嘰呱呱地說個不停。

蔣澤英的危房

我突然想到，她這個年齡應當對當年的土改有所瞭解，便開口詢問。我話音剛落，蔣婆婆更來了精神，衝口就說：「我當然參加了，我還記得當年唱的歌。」說罷她張口就唱起來。唱完，她又興奮地說起那一段往事。看得出來，那是她生命中一段充滿了激情、歡樂和希望的「燃燒的歲月」。

「叫我幹啥我就幹啥，饑荒年走出去到處碰到死人我都不怕，揹起娃兒就去！為人民服務嘛。」蔣婆婆說。

可惜，眼下她日子很不好過，貧窮是一目了然的，用她的話說，「過的是苦日子。」但這還不是她的憂心所在，她最憂心的是她住的這個破房子已經是危房，隨時有垮塌的可能。「我沒有錢修。」蔣婆神情黯然地說。「我找了政府好多次，沒人理。我現在成天擔心，哪一天我要被埋在這屋裡。」

我們走出蔣婆婆的危房後，蔣婆婆一路送行。「你們到鎮上幫我給政府說一下，我這個房子真的要垮了……」

蔣婆婆把我們當作城裡來的幹部，殷殷地又一次囑託。

十三、我看到的土改和經歷的大饑荒

講述人： 陳世惠

涪陵李渡區大柏樹鄉人

1941 年生

我從小就很活躍，上過小學，在農村能說會唱。我聲音很好，十來歲就去搞宣傳，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朗的天」。我還參加腰鼓隊，四處去打腰鼓，只是我人太小，揹不動鼓，是他們幫我揹。後來我還當了婦女隊長。

當時我覺得解放前後真是不一樣，國民黨那些逃兵，逮老百姓的雞，把農民的豬抓來就殺，連小豬都殺來吃了。解放軍來了很客氣，還給我們倒開水。他們說：「我們同他們（國民黨）不一樣，我們有紀律，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土改時我還小，那些鬥爭場面我見得不多，但我曉得地主挨打，我們那兒打死好多人，不過我親眼見到被整死的只有我們那條街上的兩個地主婆。我們當時住在大柏樹鄉的街上，街很小，只有一條，四周都是農田。我們街上有一家姓陳的地主，是幾兄弟，男的我沒有見到，只有女的在家，我們叫她們二太太、三太太和么太太。她們是妯娌關係。

么太太長得高高大大，很壯實，她身體好得很，頭髮也很好，鬥她時，把她的頭髮全部扯完。他們用棍子打她，冬天裡，潑冷水，再用風車對著她吹。當時她沒死，是抬回來後死的，我親眼看到她躺在那兒，好大個人喲，躺在那兒一大堆，她死時大約近 50 歲。

另一個是陳德木的媽，我們喊她胖三嫂，她很胖。把她鬥狠了，也是用棒棒打，用風車吹，還要淋水。押她回來的路上，在那個水塘轉拐的地方，她一下子撲到水塘裡。把她撈起來時她還沒死，她是死在屋裡。

三太太是她女兒把她救了。三太太有文化，對人很客氣，她女兒叫陳世華（音），是成都音樂學院的老師。減租退押時要她退 300 塊錢，她就同一個長年（長工）到成都去找她女兒，她女兒給了 300 塊，還寫了封信，說，如果錢不夠的話就再去要，同時她問可不可以把她媽留下來。這邊同意了，於是她媽就留在了成都。

不過後來還是把她弄回來了。最後她女兒又來把她接走了。

二太太的土地是老一輩傳下來的，土地在很偏遠的地方，她一直都不曉得那塊

土地在哪兒，只曉得收租吃飯過日子。減租退押時叫她去找錢來退押。二太太身體不好，又吃鴉片煙，以前她到涪陵去都是坐滑竿，現在不行了，得自己走路去，而且要她今天去明天就得回來。從我們大柏樹到涪陵有一百多里路。她走路到涪陵去找三親六戚借錢，因為她娘屋在涪陵。她一個地主，哪個借給她？她偏偏倒倒的又走回來。那晚上，她的屋已經被封了，她進不去，就到她侄媳婦陳章實（音）家討歇（借宿），陳章實家也是地主，不准她討歇。她只好蹲在她家的灶門前。第二天早上，發現她死在那兒。她有個兒子叫陳世松（音），他在外面讀書時加入了地下黨，一直在外面搞革命。土改時二太太不知他在哪兒，他也不敢回來，算是同他媽劃清了（界線）。不過前幾年他回來了，來找他媽的墳，他問我們，我們也找不到。後來找到當年專埋死人的袁大惠——她還沒死，她說：「我埋的人就在這一條溝裡，具體哪點我也不曉得。」她兒子於是就在那兒放了鞭炮，燒了紙錢，還辦了兩桌酒席請街上的親朋。

那些年我們家死了兩口人，都是上吊，但他們不是地主。

我父親叫陳林表，他是個有文化的人，以前是教書的，能說會講。土改時，要利用他，需要他這種人來辦事，就讓他當了農會主任。土地分完後搞複查，說他解放前當過三個月的保長，就把他開除了。其實他不是真正的保長，是幫他哥哥代理了三個月。就這樣，把他當壞人整，宣布對他進行管制，不准隨便走動，更不准隨便外出。冬天，叫他下堰塘去把水葫蘆撈起來。不過他沒挨打。他很是苦惱，一點自由都沒有了，他想不開，上吊自殺了。

另一個是我婆婆。當時在公社食堂吃飯，按幹活和不幹活一兩、二兩糧地分配。婆婆走不動，每天是我妹子從食堂給她打飯。有一天沒人端飯給她吃，她說，啷個今天沒得飯，我妹回答說，沒得了，伙食團都撤了。那時家裡又不能開伙食，她感到絕望，自己走到在樓梯下，在樓梯上吊了。他們把我叫回來，我摸她胸口，還在跳，但是，她沒活過來。我婆婆叫陳胡氏，因為她娘屋姓胡。

中共土改時的宣傳
選自《中南土地改革的偉大勝利》

我見到死人最多的是饑荒年，出去走路，到處都遇到死人。我們那條街，一天

死十幾個，通街男人，除了年輕一點外出逃荒的（像我後來的老公李乾定），幾乎全部死完。當時整條街只剩三個男人。這三個為啥沒餓死？他們是在單位或飯館裡幹活。其中一個是我二伯陳佳駒（音），他在醫院幹活。另外兩個，一個叫羅海州（音），一個叫劉吉武（音），他們是在飯館幫工，是個公私合營的餐館。女的要經（耐）餓一點，男的體質大，抗不住。當時埋死人的是一個叫袁大惠的女地主，她身體很好，人又能幹，成天挖野菜吃，還有點力氣。不過，她也搬不動，只得拿根繩子，一頭把死人的頸子栓住，一頭搭在肩上，拖著走，一個坑裡丟好幾個死人。

對了，我還曉得有個人是脹死的。他叫夏雲方，是街上榨桐油的。涪陵餓死人多，後來每個人國家撥了半斤糧，他去揹糧食，在路上他忍不住一陣猛吃，當天晚上就脹死了。

饑荒年我家雖沒餓死人，但那個日子好難！那時我媽沒得辦法，離家出走了。

我家有七姊妹，大哥跑出去逃荒了，二姐去給人帶娃娃，我是老三，是剩下的老大了。我就領著下面幾個小的過日子。我只有棄學，老師留我，他覺得我讀書很好，願意為我交學費。我說沒得辦法，要吃飯吶。那時的日子好難！一個月沒得一分錢的收入，只靠種莊稼。每次分飯，包穀羹、紅苕羹，我把碗擺起，他們端剩了的才是我的。現在我在電視上看到那些沒得大人，十幾歲就當家的故事，我看到就哭，我就是這樣過來的。

採訪時間：2014 年 2 月 6 日

地點：重慶棗子嵐垭

採訪後記

四川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大饑荒的重災區，據楊繼繩《墓碑》和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的統計，在那三年中，四川共有 1200 餘萬人餓死，為全國之冠。

在四川這個重災區中，又有兩個重災區，一個是川西的雅安地區，一個就是川東的涪陵地區。現在，已經有人（童梓平、阿寧）對川西雅安滎經縣的大饑荒，寫了一本紀實作品《大劫難》，該書真實地記錄了那一幕驚心動魄的劫難。可惜，對同是重災區的涪陵，至今卻鮮有詳盡真實的記錄。

我的母親和外婆都是涪陵人，我的外婆胡傳芳 1962 年 7 月死於那場大饑荒（我曾寫過〈1962，我的外婆〉一文並在海外發表）。於是，涪陵，在我心中有一種沉甸甸的觸痛感。2014 年春節期間，我到長壽湖右派鄔錫昌家拜訪，偶遇在他家作客的陳世惠老人，當我得知她來自涪陵時，便同她聊了起來，於是，就有了這一篇採訪錄。

十四、錯辦(案)三、五百(件)不追究

講述人： 楊通恩

原秀山縣石耶鄉余慶村農會巡查大隊長

1929 年生

我們家以前很窮，我爸爸楊正安娶的是一個從貴州苗寨逃荒來的女人。他後來去給石耶鄉的地主胡傳宗家當長年（長工）。土改時我被招到秀山，培訓了兩個多月，培訓的主要內容是講階級、劃成分。劃成分板點（條框）多得很，有大地主、地主、二地主、富農、小土地出租、小土地經營（小土地經營就是你沒多少田地，但是你做點生意，有些錢，日子還過得可以的人）、中農、佃（下）中農、小商小販、貧農、雇農等等，各種成分有十多個。記得劃地主有幾個標準：一是田多；二是有勢力；三是有錢。

其實後來在劃地主的時候標準很混亂，比如，人平超出 5 挑田（一挑田約產 3 ～ 4 百斤穀子）就可以劃地主。我老丈人龍保文全家六口人，共三十挑田就當了地主。村裡的楊光群（音），平時淨是吃紅苕，也當個地主。土改時我老婆這個村劃了九戶地主，有楊光群、吳春三、龍保文等等，這些地主其實都很窮，把他們的財物收繳起來，根本沒什麼東西，分這種地主的「勝利果實」，有的就分個茶壺，有的就分個菜盆，哈哈哈，講起都好笑。那些貧雇農拼命鬥地主，就是為了多分財產。毛老頭（毛澤東）講階級，不講階級人家口袋的東西你拿得過來？在秀山培訓完後我分到石耶鄉餘慶村加入了農會，搞文教工作，同時還擔任巡查大隊長。巡查大隊長幹啥呢？一是到各處去捉地主、壞人，二是巡邏、清理場上的館子等。

在石耶，那天我看見劃成分張榜，我爸被劃成「二地主」，我直接去找土改團的劉團長。我對他說，我家是在那山溝溝裡被抓兵派款才逃到石耶來當長年。我們又沒有用胡家的錢來搞出租，又沒有用他家的田地來搞倒四六（即多收租，收佃戶六成），為什麼要把我家劃成二地主？他問：「那你覺得你家該劃啥成分？」我說：「佃中農。」他說：「好，同意你，佃中農。」

佃中農就是租佃別人的土地來耕種，人平有五挑穀子的農民，相當於下中農。

那時主要打擊五種人，地、富、反、壞和保長。

我們農會就住在國民黨的鄉公所裡，地主抓來就關在馬圈裡。那就整得苦喲，

像這種天氣，蚊子多得成群成片，有一個叫「矮子黃」的地主婆，把她衣服脫光了推到馬圈裡，那個蚊子咬起過得呀？哈哈哈。還有，我們這兒有一種叫「鐵梁角」的尖刺，有這麼長（一寸），鬥地主時把「鐵梁角」鋪在地上，要地主跪在上面。膝蓋硬，有的刺就斷在裡面，那個刺一扯出來鮮血直流。我爸爸當長年的東家（地主）老婆也抓來跪，我保了她，沒讓她跪下去。

「鐵梁角」刺

問：那時你怎麼敢同情地主？

我當時「官」比較大，而且我同工作隊的幹部關係很好，晚上都睡在一起。

石耶餘慶村分「勝利果實」時是我在負責。我們把所有收繳的地主的財產集中，分別標明了價格，按照「先無後有，填坑補缺」的標準來分。村裡有多少雇農、多少貧農、多少下中農，成分已經劃好了，「先無後有」就是先滿足「無」——貧窮的貧雇農。「填坑補缺」就是選自己缺少的東西。我們編了號，按照階級成分依次進屋選「果實」。5 個一批地進去選。先進去的人選擇度當然就大，看上什麼就拿什麼，但有個總量標準，比如他該拿 100 元錢的東西，多拿了就要退回去。他們拿了之後就到我這兒來登記，我是分「勝利果實」的委員。但是，我的成分是佃中農，名次排在後面，等輪到我，還有啥好東西？我想，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我先搞點了再說，我就悄悄給自己裝了一麻布口袋。那天搞了一整天，最後我去查看，咦，還有一個象牙煙桿居然沒人要。那些農民不識貨，那個煙桿要值 50 塊錢，我拿了，只登了個 5 塊錢。

可是，拿別人的東西不坐財（守不住財），我才分了果實，我老婆就大病一場，差點死了，我只得把「勝利果實」拿去賣了給她治病。

殺人我目睹了好幾批。第一批有一個保長，叫鄭雲，在糧站背後殺的。第二批在河壩，其中就有我爸當長年的東家胡傳宗。槍斃人，腦殼打得稀爛，腦漿灑了一壩。但胡傳宗是打在臉上，當時他還沒死，抬到公路上才死的。第三批殺了魯晉權、王仲清、陳進國、楊保珍、吳肇修、吳龍文等 12 個人，就在鴨子河壩，我還一個一個的去查看，個個的腦殼都是打爛了的。我發現，那些有些勢力有些本事的人，腦水的花紋和血絲條條特別多，彎過去拐過來的。但辛躍廷、王仲清、陳老謙（音）那些普通人，腦水就像豬腦子，稀垮垮的。其實這幾個人死得很冤，那時冤死的人多得很，比如石耶街上的辛躍廷，他掛個藥箱箱，給小娃看點小病，一個窮光卵蛋，說放（毒）藥組就是他發放藥；還有陳友健（音），他是個瓦匠；陳老謙窮得很，

說他是暗殺隊的隊長，都被抓來殺了。為啥？那時說有放藥組、暗殺隊，要攻打區公所。還有個田岩保也是說他放毒（藥）。那天，工作組的叫喊，快點，田岩保放藥了。其實那天他是去追他兒子。他兒子被抓去勞改，為啥事勞改我不知道，他聽說後就追去想看他兒子。他年齡大了，跑到河邊，跑不動了，躺在那兒。人是我去抓的，抓來押起往河壩走，還沒走到河壩，才下坎，一槍就把他打死了。那時有這種說法：現行反革命，立即槍決。立即槍決就是不用審，抓起來就槍斃。

喲，對了，還差點把我都說成是反革命！我操他娘！當時我沒吃的了，到民山（音）去買點糧，一個叫劉志風（音）的人去給工作組彙報，說我到民山去拉人了，要打區公所。幸好我在秀山土改培訓班的同學彭泰清（音）給我通風報信，我趕緊跑到團部去解釋，這才解脫了。你不曉得，毛主席用幹部呀，是歡迎你上臺，鬥爭你下臺。那個卵！今天你是幹部，明天就是敵人，一幹不好你就要倒楣。

我當長年的爸爸也死於土改，說他為地主隱藏財物，有三口箱子，一口裝的金子，一口是錢，還有一口是什麼喲。我爸爸不承認，不承認就關起來打，他被一個叫周長喜（音）的民兵連長活活打死了。

問：你沒有追究？

追究啥？土改時有個政策：錯辦（案）三、五百（件）不追究。這個政策就是讓人放手幹。比如，我到石耶農會去幹，心裡沒得底，有些怕，打了人，怕追究刑事責任。於是就給我們講政策：錯了就錯了，殺了就殺了，不追究你刑事責任，也不追究你錯殺，也不追究你犯法。

土改結束後，我本來是可以進入組織，當正式的國家幹部。我有文化，是秀山二中初中畢業，我的同班同學楊正樑後來就當了武漢軍區司令。可惜，我 1949 年匆匆娶了個姑娘，土改時她家又被劃成地主，也就是說，我娶了個地主女兒。為什麼是匆匆呢？當時秀山傳言，朱毛（朱德、毛澤東）來了，有大姑娘的，趕快嫁人。大姑娘要被共產黨抓去共產共妻。我們結婚一年多，就搞土改了。

當時宣布，有同地主開親的，有娶了地主子女的，趕快離婚。我沒離，我老婆又沒有做錯任何事。這樣，土改結束後，我就從石耶回到桂林我老婆的生產隊。這輩子呀，我要是晚結婚一年，我就出去了。

不過，我回來後，還是當了大隊幹部，後來又當了生產隊長。這輩子我只有文革時遭了兩年的罪。為啥？一是說我貪污了 3000 斤穀子，二是因為我老婆龍慈英是地主子女。

大躍進時搞浮誇風，栽秧要栽「雙龍出洞」（注：一是提前栽秧，二是多灑穀種），才正月十幾，還冷得見鬼，就要叫出穀種，出多少呢？ 3500 斤！我們隊裡那點田，只要 300 到 400 斤穀種就夠了。我是大隊幹部，我就對我那個生產隊的隊長

說，把穀子灑在路上，人走路的地方多灑點，讓人撿去吃。隊長照辦了，只灑了 500 斤在田裡，所以後來就說我貪污了 3000 斤穀子。

把我抓去戴高帽子遊街批鬥。那一天我們有 26 個人，五花大綁，一長排跪在不到一尺寬的長條凳上。合作社那個王祖營（音）宣讀每個人的罪行，讀完後就衝著跪在條凳上的人一腳踹去，人是反綁起的，被踹下去的人都是面部著地，一個個鼻青臉腫，鮮血直流。我排在第七個，第六個叫李光清（音），是個國民黨的連長，他生得人高馬大，他被踹下去後昏死在地，血流滿面。我不能讓他們踹，我聽到王祖營快讀完我的罪行時，自己身子一歪，倒在地上的李光清身上，躲過了那一劫。

文革整整鬥了我近兩年。

毛的功勞只是打下江山，在他手上整死好多人，操他娘的，一是餓死，二是計畫生育搞死好多。

我們隊有一家人，父母餓死了，剩下一對娃娃，哥哥十來歲，他把八、九歲的弟弟推到火坑裡燒死了。我們去時，他正坐在火坑邊啃他弟弟燒焦了的腳拇指，咬得嘣嘣嘣地響。但是，他也沒能活出來，後來還是餓死了。

吃了人肉，就有一股騷臭氣

還有一個吃人肉的叫李光華，他是生產隊的文書，當時 30 歲左右，他偷死人肉吃。吃了人肉的人，一走進他家，就有一股騷臭氣。人肉吃多了，那個臉是黃的。我們在他屋裡搜，搜出來的人骨頭都有一籮筐！我們把他抓到公社去關起，他在那兒跳樓死了。我們那個隊是九十多個人，死得只剩下四十多個人；裡面那個隊是 140 多個人，只剩下 70 個人。當時死了好多人，埋都沒人埋。

採訪時間：2017 年 7 月 8 日

地點：秀山縣岑溪鄉桂林村

採訪後記

年近 90 的楊通恩老人是參加了整個土改的農會幹部，後來又是經歷了毛時代農村全部風雲的大隊幹部。他不僅經歷豐富，而且還頭腦清醒，表述流暢。更重要的是，他根本無視對著他的攝像機，嘻笑怒罵，毫無顧忌，不像有些受訪者，一面對鏡頭就吞吞吐吐，言不由衷。

幾個小時的採訪，我錄下了不少珍貴的資料。唯一遺憾的是，老人的方言較重，加上他牙齒缺失，因此，聽起來很有些吃力。

鎮反、土改時的公審大會會場

十五、一個土改民兵隊長的述說

講述人：張志強

原重慶黃桷埡鎮全山村民兵大隊長

1930 年生

我當年雖然是民兵隊長，但我沒幹過那些壞事，所以我才有今天的福氣（注：張志強家現在是老廠的首富）。我連人都沒捆過。鬥地主趙克純（音），在太陽壩曬，我看他遭不住，就把他喊到陰涼地。他後來看到我，點頭哈腰，我說，你莫要給我打招呼，害我呀！階級鬥爭！那些年，我當隊長、當社長，做了很多好事，解救了好多人。比如有家人房子燒了，我叫他來挑包穀（玉米），盡他力氣挑，挑了不下 150 斤吧。

解放前，我老漢（父親）在城裡做生意，做棉紗生意，對顧客都很好，人們很尊敬他。解放前夕，我們家也有了些錢，本來也打算買 20 畝地，結果一筆貨款被拖欠，地就沒買成。嗨，幸虧沒買！買了就遭了，買了我家就是地主了！

解放後一次集中學習，填成分，我應當是小商出身，但小商不是共產黨依靠的物件（對象），共產黨可以用你，也可以打擊你，所以我就變，我填貧農。是嘛，我在解放前開荒，在老廠土生土長，大家都看到的。

從清匪反霸我就是頭，最初叫武裝隊，後來叫民兵，我們是長槍，上面來的工作隊配的是短槍。清匪反霸之後是減租退押。退押懂不懂？就是把租地租房的押金退出來。接著建立村民主政府。我們到黃桷埡去抬毛主席的油畫像，那個像大得很，我們去了好多人。接下來就是鎮反（鎮壓反革命）。鬥爭地主我都清楚，像唱戲搭個台子，地主戴高帽子站在台上。大會啟發臺下的農民揭發地主的罪惡。有人說了（揭發了），馬上給地主溝子（屁股）上一腳。那個鬥爭，搞無中生有，你沒逼死人，我說你逼死了，就可以殺你。如果要殺人的話，開完鬥爭會馬上翻牌子，鬥爭會就變成鎮壓反革命，會上宣布鎮壓。巴縣長生鎮的王海明（音）就是這樣打（殺）的，在上場口。

我們這兒分兩批打了 12 個人：邱宏安（音）、郭達旦（音）、楊世君（音）、邱必堅（音）、楊永青（音）、劉順清、肖方炳（音）、何光超、賴能中（音）、

張世春（音）、黃明禮（音）、范 XX。這當中地主楊世君不是被槍斃的，而是被他妻子邱必堅毒死的。為啥？楊世君被關起來後，他看到自己要被「敲沙罐」（槍斃，打頭），他想保一個全屍，因此求邱必堅在送飯時下毒藥。他妻子成全了他，結果邱必堅自己被抓來敲了「沙罐」。

其實好些人都不該打，比如地主郭達旦，人們叫他郭大爺，他是個好得很的人，一個善人。土改時說他在外面日嫖夜賭，殺死了人，這下他還活得成？是不是事實不管，討論，大家說他該殺，就殺了。殺他那天，他嚇癱了，我們是用籮筐把他抬到刑場上的。

還有肖方炳，他也很冤，他是開糧店的，股份還是我們很多人湊的。糧食漲價，人們排起長隊買米，就為這個事，說他是奸商，一起殺了。這些冤案共產黨今後肯定要重新搞過。

我們這兒窮，沒幾個地主，就是地主也是小地主。你有兩畝地，放出去，就是剝削。打這十多個人，只有楊世君、郭達旦兩、三個地主，邱宏安是鄉長、劉順清是保長、黃明禮是賭博、何光超、張世春等是特務。

趙純友：何光超我知道，她是文峰小學的音樂教師，教過我，很年輕，長得也很漂亮，死的時候大概才 20 來歲。

張志強：好多人都不該鎮壓（殺），那時你只要有名望，是頭面人物，就要殺。我妻子劉培蓮的爺爺和老漢就是大好人，他們免費給農民打針、種牛痘，燒開水送到坡上給農民喝。鬥爭會上啟發農民揭發鬥爭，農民說他們沒做任何壞事。但是因為他們在當地名氣大，就被殺了。真正的惡人、無賴，共產黨不動他，比如我們這兒有名的潑皮文景山（音），偷東西、到處打狗，壞得很，因為他窮，一點沒事。共產黨是整有名望的（人），不是整作惡的（人）。

趙純友：文景山我知道，是個遠近聞名的無賴。

張志強：你問起我妻子？是的，她是地主子女。怎麼敢娶她？是這樣的，1960 年，她從涪陵到我們這兒來投奔她的么姨媽，別人給我作媒。我看她遷移證上的出身是中農，這當然沒問題，就娶了她，她比我小 10 多歲。什麼時候發現的？好幾年後，都生了娃兒了。那天我在海棠溪過河，在輪渡上有個揹背篼的婦女坐在我旁邊，背篼上印得有涪陵的字。我問她是不是從涪陵來，她說是，又問在涪陵哪裡，她說馬武鎮——正是我妻子的老家。我問她認不認得一個叫劉繼直的人，她說認得，他曾經是她們學校的教導主任，還教過她。她說，她家成分不好，她爺爺和爸爸都被槍斃了。

我心裡明白了，劉培蓮在撒謊。

後來我瞭解到，妻子出身於涪陵的名門望族，爺爺、老漢都是大地主。怎麼辦？

我當然也只有隱瞞。我敢說？說了黨組織馬上要我離婚。什麼時候說的？那是地主富農都摘帽之後，我在會上說，她是地主子女，大家把我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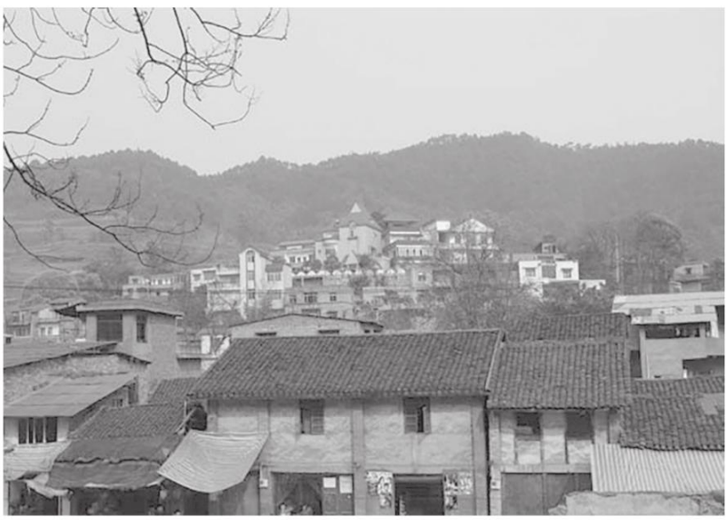
我幹事一向穩重，不偏差，人民政府叫幹啥就幹啥，共產黨說哪樣好我就跟著說好，否則要遭殃。每年三個運動都沒有打倒我。那些年我看得多，一句話不對頭，就要把你打下來，比如鄉長趙海全（音），他說了一句「大鬥小鬥沒得口口」——沒有配合統購統銷政策，馬上就遭撤職了。總之，上面說啷個就是啷個，你老百姓還敢說個「不」字？

採訪時間：2006 年 3 月 18 日

地點：重慶南岸區黃桷垭鎮老廠

採訪後記

張志強老人聽力很差，聲音也沙啞，是一次艱難的採訪。好在他沒什麼顧忌，只要聽清楚了，必作回答，在共產黨體制內幹了一輩子，還具有這種坦率，還能憑良心講真話，實在難得。



後面的新房子就是張志強的家

「我當年做了好多好事，所以我才有今天的福氣。」這句話採訪時張志強說了兩次。看來張老人相信善惡有報。

望著張志強修建的豪華氣派的別墅，當年的地主子女、陪同我採訪的趙純友老人笑著說：「你是老廠的首富，現在該我來鬥爭你，分你的財產了。」

張、趙兩位老人，一個當年的民兵隊長，一個當年的地主子女，如今親親熱熱坐在一起，稱兄道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還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補記：張志強老人於 2007 年去世

第四章
地主後代，一個龐大的受難群體

那時，他們還是少年、學生、甚至是不懂事的娃娃。但是，地主家庭的出身，讓他們的人生充滿了艱辛、悲苦、甚至斑斑血淚。

一、那些年遭的孽説不完

講述人： 劉培蓮

一〉、36 歲的父親，12 個彈孔

我是涪陵馬武鎮的人，家就在離街很近的新院子，那是一個很大的院子，門窗上到處都有雕刻，現在？基本上毀完了。

1950 年我 11 歲，七姊妹中我是老二，哥哥在外讀書，家中我就算老大。

我爸爸劉繼直當時在涪陵師範學校教書，他是學校的教導主任。家裡由我媽媽王澤厚操持。我們家的田土是祖上傳下來的，我爺爺有五弟兄，分家時每人分 20 石租的田土，後來有的敗了家，比如我么爺。但我們家搞得好，到「解放」時已有 100 石租。

搞減租退押時，我媽媽說：「招租收租都是我，不關劉繼直的事，你們不要找他，他一直都在外面教書。」本來，我爸爸應當沒得事，他是一個知識分子，當老師的人。就是在鄉裡，爸爸口碑也非常好，因為他做了許多善事。比如為了防止天花（病），他免費為周圍的農民種牛痘，就在我家裡，我媽負責消毒，爸爸在鄉民們胳膊上劃小十字，然後種痘苗。還有，他在外面的大路上置一口缸，擺上十來個碗，一個木瓢，每天請人挑兩挑開水倒在缸裡，免費供過路人喝。每到趕場天，他就在路邊放上紅藥水、紫藥水、十滴水和藥棉簽，供那些碰傷了或肚子痛的人使用。他還辦了一個私塾，免費讓佃戶的娃兒來讀書。現在共產黨的貪官們貪了那麼多錢，做點好事沒有？想做都不敢！怕別人問，你那些錢從哪來的？

我們家的佃戶和四周的農民，沒有一個人想整他。但是，我三爺爺家的一個佃戶一心要整我爸，他認為在他同我三爺爺鬧矛盾時，爸爸幫三爺爺說了話。此人是個土改積極分子，他堅持把我爸爸從學校抓了回來。

鬥我爸爸時，工作隊的幹部叫貧下中農上臺揭發他的罪行，沒人說得出來。他們就把我家的一個叫劉仁和（音）的佃戶推上臺去揭發。不料他在臺上說的都是好話，比如他說：「劉繼直這個人對人不錯，就說我們在他家吃飯吧，中午只要把肉

吃完了，他一定要叫家人晚上再煮幾塊臘肉……」工作隊的人見事不對，趕快打斷他：「你下去休息一會」。其實，地主同佃戶的關係哪裡是共產黨宣傳的那樣嘛。

我們同佃戶的關係一直都很好，就說剛才提到的劉仁和，土改後一直同我們往來，直到他 90 歲去世。他的孫子前幾年我還把他安排到了重慶。在我爸爸被關押期間，不斷有農民在背篼裡裝點肉和菜，悄悄送來，叫我二妹拿去給爸爸吃。

正在爸爸關押期間，媽媽生了我最小的一個弟弟。我在家照顧媽媽，洗尿布，每天給爸爸送飯的任務就交給我 9 歲的妹妹劉培芳。一天，給他送的飯沒有吃完，剩飯又讓妹妹送了回來，看押他的民兵比較同情爸爸，管得不嚴，也沒檢查。爸爸在剩飯裡埋了一張紙條，上面寫了媽媽和我們每一個子女的名字，還有這樣幾句話：「要信賴政府，依靠群眾，勞動改造，勿負我望。」最後寫的是，他很喜歡菜園壩那個地方。

菜園壩是我家對面的一個小山堡，不知爸爸提到它是啥子意思。我們一家子哭，爸爸寫這個紙條到底是為啥嘛？我們還不曉得他要遭槍斃，不曉得他是暗指死後把他埋在那兒。

他們找不到爸爸任何罪行，但那時正是共產黨大屠殺的時候，沒罪行就編造，說他參加過什麼九路軍，開過一個黑會。爸爸在牢中已經知道了他要被殺，他設法叫街上的何二嬸給他送一大盅冷米湯，何二嬸是馬武街上做糍粑生意的，同我家關係很好。

那天，我到坡上洗尿布，看到街上又在開公判大會，廣播也在吼，一問，說是又要槍斃人。我回到家，對媽說：「媽，今天街上又要槍斃人，熱鬧得很。」當時我們都沒想到會有我爹，我們都認為他不會被殺。記得剛「解放」時，有一個親戚叫爸爸到外地去，說他屬於共產黨的專政物件（對象）。爸爸覺得好笑，說：「我走啥子？我沒做過任何壞事！」

正在這時，有人跑來對我說：「培蓮，快點出去，妳爸爸已經押出去了，要遭槍斃。妳妹也被關起來了。」

劉培蓮淚流滿面

我趕快往外跑。

我妹為啥被關起來？她像往常一樣給爹送飯，正好爸爸同另外 11 個人一起被押往刑場，那 11 個人都是五花大綁，只有我爸爸沒遭綁。

妹妹跟著追，邊追邊哭喊：「爸爸呀——爸爸呀——」

爸爸轉過頭來說：「芳，妳回去，回去——」

妹妹還是緊追，一路哭喊。民兵們認為影響不好，把她關了起來。

（劉培蓮淚流滿面）

我正往街上跑，隔壁三爺屋裡的人攔住我，說：「妳跑去有啥子用？妳去找幾根竿竿，想法把屍體抬回來。」

我掉回頭，去砍了幾根竹子，找了篾繩，趕緊往刑場走。

馬武有一個以前跑馬的壩子，土改時用作刑場，我趕攏壩子時，正好槍響。民兵不准人靠攏。當時是三月份，胡豆有二尺多高，我趴在地上，從胡豆叢中往裡面爬。我爬進去，看見 12 個人東倒西歪倒在地上。殺完了人，民兵們就走了。我一邊哭一邊喊：「爸爸——爸爸——」我扛著竹竿，在屍體中轉來轉去，心中著急，淚水又蒙了眼，一時沒有找到。那時我還是個小女孩，不到 12 歲，沒找到爸爸，心裡竟一下高興起來，以為他沒被槍斃。這時，聽見有人問：「培蓮，看到妳爸爸沒有？」我說：「沒有。」「妳好生看！」我抹掉淚水，又找。這下看見了——看見他腳上穿的那雙布鞋，那是我媽給他做的。

爸爸穿的長衫子，臉朝下撲在地上，我想把他翻過來，力氣小，翻不動，幾個大人來幫我。其他人是打的頭，但我爸爸是打的身子。我看爸爸身上沒有血跡，胸前有 12 個小洞——他被打了 12 槍！為什麼打這麼多？刑前他喝了一大盅冷米湯，就沒流血，行刑的人見他不出血，就不斷地打。

我們用竹竿把他抬回來，媽媽抱著剛出生的嬰兒，帶著我們一群娃兒跪在地上哭。這個時候血水才從彈孔裡流出來，滴滴嗒嗒滴在地上。

是我們的佃戶來幫我們安埋。沒有棺材，只好把樓板撬下來釘成一口匣匣（薄棺材），草草安葬了爹。

我爸爸死時才 36 歲，他一輩子沒幹過一丁點壞事。

二〉、爺爺之死和二叔之死

爸爸死後一個月，我爺爺也被他們從涪陵縣城抓回來了。爺爺叫劉復亨，他生得儀表堂堂，以前是專區的禁煙總督，還同蔣介石合過影，相片就掛在縣城爺爺家的牆上。爺爺也同劉伯承關係很好，劉伯承曾經叫爺爺跟他走，爺爺沒有去。

爺爺是一個很正直的人，他當那麼大的官，從不貪污受賄，完全不像眼下這些共產黨官員。他生活很簡樸，只同婆婆、一個丫頭三個人過日子。

爺爺被抓回來後，先沒有關押。當時他 60 多歲了，沒生活來源，只得同婆婆一道糊火柴盒為生。沒多久，一天晚上，一幫人突然闖進來把他抓走了。

爺爺被押到涪陵縣中關起來，準備就在那兒槍殺他。

當時，我哥哥和表哥表姐都在縣中讀書。槍斃爺爺那天，哥哥和表哥表姐正要上臺演一個劇——《天堂和地獄》。哥哥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繪畫、樂器樣樣都行。在劇中哥哥扮演一個地主的兒子，表哥演一個員警，表姐演一個貧下中農的女兒。那天，哥哥的一個姓何的好朋友——他出身好——對哥哥說：「培生，今天要槍斃你爺爺，你要堅強點喲。你要是流淚，你的前途就全部毀了。」

哥哥正在臺上演出時，槍響了。哥哥一驚，馬上想，千萬要穩住，絕不能哭，要演好劇。

那天之後，學校給哥哥發了助學金，說他分清了階級路線，表現好。

後來哥哥對我說：「培蓮，當時那個滋味好難受啊！」他說，要是流了一滴眼淚就要付出一輩子的代價。他告訴我一件事，有一個地主被槍斃後，他妻子上去抱著丈夫的屍體痛哭，說：「共產黨為什麼要殺你呀？你一輩子沒有做一點壞事……」剛殺完人，正離開刑場的劊子手聽見她的哭訴，馬上返回來，「你敢說共產黨不該殺人？」一槍就把那個地主的妻子打死了。哥哥還說了那個地主的名字，但我忘記了。

爺爺死後，我二叔不敢去收屍（爺爺只有他和我爸爸兩個兒子）。他請了兩個人把爺爺抬了回來。我記得把爺爺擺在壩子裡，不敢抬進屋。有人說，拿床席子裹起埋了就是了，什麼都不要辦。我媽說：「抬進屋來，反正一貧如洗了，怕啥子！」一連串的打擊，媽沒有倒下去，她真是堅強。媽買來香蠟紙燭，為爺爺送終，又去撬樓板給爺爺釘了口匣匣。

再說我二叔。「解放」那年他剛好從上海復旦大學畢業，他本來要去北京，但他妻子堅決不同意，於是二叔回到了家鄉。他一回來就被弄去挨批鬥。其實我二叔什麼都沒做，他剛畢業的一個大學生，完全是一張白紙，僅僅因為出身不好就挨整。二叔後來被弄到馬武白塘裡面一個軍管煤礦去下苦力。饑荒年，我們接到他一封信，說他雙腳腫了。我媽一向很心痛他，長嫂當母，二叔對我母親也非常尊敬。

媽知道他是餓得不行了，叫我拿一升麥子炒熟後推成麵給二叔送去。還沒出發，又接到信，叫我們去領二叔的遺物，說有一件棉襖。

我同我二妹一邊問路一邊往煤礦走，那個時候雖然是大饑荒，但社會比現在安定，人沒現在這麼壞，否則兩個女孩怎麼敢放心外出。

我們趕到煤礦後，既沒有見到二叔的屍體，也沒有領到他的遺物，那件棉襖不知被哪個拿走了，我們白跑一趟。不過，管煤礦的解放軍給我們吃了一碗包穀飯。

回來時，天晚了，沒船，過不了河。我同二妹急得不得了，晚上怎麼辦？這時，有一個姓王的年輕男人——他也沒過到河——叫我們到他家去，將就吃點麥粥，住一

夜。我們不敢，陌生人，又是男人。他說：「小妹，不瞞妳說，我出身不好，做點工分東扣西扣生活很艱難……」聽了這話，我說我家成分也不好，於是我同妹妹到了他家。他一家人賢慧得很，對人好得很，看到我們去了，他媽說，今晚再去推兩碗麥子，做點粑粑來吃。在那個饑荒年，好讓人感動。

三〉、媽媽，遭遇土匪搶劫與「土改」搶劫

我媽媽是一個非常堅強的人，沒有她，我們這個家肯定四分五裂了。土改時，男地主被殺後，女的沒辦法，把娃兒東一個西一個送人，家庭散了。我媽不，她把我們六個子女都帶在身邊，一個不送。一連串突如其來的打擊，她沒有倒下去，真的不容易。

我媽是重慶江北治平中學畢業的，有文化。「解放」前爸爸一直在外教書，家業全部是她經管。記得剛剛「解放」時，我家遭遇了一次土匪打劫。20 多個土匪夜裡悄悄摸進我家，兩個人看守我們，其他人到各處搜尋金銀財寶。媽媽為了脫身，騙那兩個土匪說，樓上還有一些值錢的東西。兩個土匪一上樓，媽媽把一歲多的弟弟塞給女傭，從後門奪門而去。土匪發現後追出去，衝她開槍，一槍從耳邊擦過，一槍從頭頂飛過，媽膽子真大，要是我，絕不敢。媽跑到一個我們的佃戶家，叫他們鋸一節竹子吹竹筒號。竹筒號在深夜裡響起來，土匪們受了驚，飛快逃得無影無蹤。

那次土匪打劫，我們只損失了一些銀元細軟。

土匪搶劫之後不久就是土改運動。這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什麼東西都要：金銀、首飾、衣服、鋪蓋、桌子、床……全部家產被整收繳得乾乾淨淨。

這還不行，反正說你地主不老實，還有東西沒交完。他們把媽媽和婆婆抓去吊打，曬太陽。媽媽怕婆婆受不了，就欠過身子給婆婆遮擋一下，民兵一把把媽掀開，罵道：「妳還敢給老地主擋太陽？！」媽被反吊起來打，她被吊得死去活來，吊了下來十個指頭腫得分不開，我看見媽痛得在床上打滾。受刑不過，她只好招了：門檻後面埋藏有十多個銀元。

「那是我藏的最後一點救命錢啊，」媽說，「這麼大一群小娃兒，今後怎麼活！」但是，土改的「土匪」們仍不放過，認為我們還有金銀沒交出來，繼續給媽用刑。他們把媽衣服脫光，把一種叫「活辣子」的二寸多長的毒蟲放在背上爬。媽的背很快紅腫起來，生出一個個水泡……

媽白天被抓去受刑，晚上同我們幾個娃兒抱頭痛哭。她邊哭邊說：「這個日子啷個活得出來，沒得東西了呀，哪裡去找金銀呀……」

民兵在我們窗下偷聽，看我們這個樣子，估計我們真的一無所有了，這才鬆活了一點。

後來，又一次吊打，讓媽差點走了絕路。我們隊有一個叫田繼貴（音）的人，既當會計又當保管。他自己監守自盜，偷了隊裡的穀子，反誣陷是我媽偷的。地主嘛，反正可以亂整，好欺負。又抓去吊，這次，吊得媽整個手臂全部死血，發烏，又痛得在地上打滾。媽絕望了，不想活了，傷傷心心地哭：「我命怎麼這麼苦，家裡娃兒一大堆，支撐不了，外面又挨打受氣受冤枉……算了，不活了。」

我們家後面有一個大坑，以前是個豬圈拆後留下的，當時灌滿了水。媽走到那個水坑邊，打算跳下去。她突然想，她一尋死那些人更認為是她偷的，怎麼說得清。正在這時，隔壁的一個大叔看見媽站在水坑邊要跳塘，就吼：「妳幹啥子？是我，才不得去死，我要看偷去吃的那個人啷個死！」

媽說，這句話一下子讓她開了竅。對，要活下去。

不久，她還真看到了！

終於活出來了的劉母王澤厚

田繼貴隨後到水利工地上去當伙食團長，他又故伎重演，把糧票藏在屋頂上的瓦溝裡，然後謊稱被盜。這次公安局的來了，用警犬找出了糧票。田繼貴被撤職，下放到隧洞裡去打炮眼。一天，他同三個人走在一起，他走中間，一塊石頭飛來，一前一後兩個人都沒得事，偏偏打中他，而且正中頭部，把整個頭打飛了，只剩一個頸子樁樁。

我媽聽到這個消息，長歎一聲：「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媽活了 86 歲，記得當她聽見宣布摘掉所有地富分子帽子之後，倒在床上痛哭，

弟弟勸她：「媽，算了嘛，妳活出來了嘛。」媽想起這輩子的冤屈，整整哭了兩天！

四〉、我隱瞞了出身的婚姻

我本來考取了縣中，但唯讀了一個月就回家了。哥哥說，家裡媽拖不動，弟妹多，又小，你一走媽就沒幫手了。我很聽話，就不讀書回家務農。我和二妹都能歌善舞，在當地小有名氣，後來也有機會出去搞文藝，也是為了家放棄了。

剛才我說我們家一直沒散，其實我弟弟劉培良還是離家出走過。他十多歲時有

一天隊裡開社員大會，弟弟肚子餓了，跑回去喝點稀飯。主持會的人發現他不見了，找上門來，一看他在吃飯，張口就罵：「貧下中農都不怕餓，你一個地主崽還怕餓？去給毛主席請罪！」他們把弟弟抓到會場，強迫他向毛主席（的像）磕了 24 個響頭。

當晚弟弟傷傷心心哭了一夜，第二天他對媽說：「活不出來了，辛辛苦苦幹一年，工分東扣西扣，別人結算可以挑穀子走，我們一無所有，還不敢吭聲。我要走了，去找一條生路。」

我五叔家的一個妹妹嫁到了湖北，弟弟去投奔她，但又落不到戶，天天去割蘆葦曬乾了賣。弟弟從小特別喜歡讀書，成績非常好，情願餓飯都要讀書。後來他待不下去，那邊也說他成分不好，他只得又回來。我讀到他割蘆葦那段日子寫的日記，傷心得直掉淚。

我年齡一天天大起來，也有人來說媒。哥哥叫我不要忙考慮個人問題，把弟妹們帶大點再說。我很聽哥哥的話，隨便哪個來找我談，我都說不耍朋友。當然也有看上我後，聽說我是地主子女就退縮了的。我們院子徐婆婆有個侄兒來，看見我坐在院子裡繡花，他一下看上了我，對徐婆婆說，那個女娃好可以（漂亮）呀！徐婆婆說，她是地主子女。她侄子是軍人，說了聲「可惜」就不再提了。

1960 年我 21 歲，那年到重慶黃桷埡我么姨家，么姨給我介紹了一個對象，是同么姨爹共過事的一個社隊幹部，叫張志強。我一看就不同意，以前人家給我介紹的都長得不錯，而張志強彎腰駝背，我幾百里路走來找一個駝背呀？

我不幹，要回去。么姨把我拉住，說：「妳這個死女子，妳成分不好，啥子都不好，人家那麼好的政治條件！」我說：「政治條件好又怎樣嘛。」我還是不幹，么姨攔著我堅決不准走。當天就住在張家。

在張家，我看到他家很有教養，各方面有條有理，是個有家教的家庭。那一夜我通宵沒睡，什麼辦？雖然家教不錯，但人我確實看不上。第二天一早我就給媽寫信，然後等回信。等信期間我幫他家做事，他們發現我很能幹，都很喜歡我，於是更希望我嫁過去。這個時候快過春節了，我堅持要回去。那時，要開通行證才能上路，我去找張志強，他很老實，雖然不願我走，還是幫我去開了。

那天晚上，他的大姨又來勸我，她說，她有個老表，也是彎腰駝背，沒有人看得上，但舊社會可以拿人去「打樣」——就是相親的時候，找一個長得好的去見姑娘，把女方騙來結婚。婚禮後女的發現丈夫不是相親的那個男人，是個駝背，就哭。但是，後來那女人很有福氣，生了好多個兒，家裡搞得紅紅火火……

他大姨反反復復給我作工作，最後，我終於點了頭。

第二天是星期天，辦結婚登記的人不上班，但他們有關係，專門去把那個人找來給我們辦了證。

我當然沒有說我是地主子女。我舅舅叫我千萬不能說，只說我是中農出身，本人成分是學生。

本來繞不過遷戶口這一關，但我運氣好，我有一個高我幾年級的女同學，她同派出所辦戶口遷移的民警關係很好，於是打了一個假證明，說我的遷移戶口在路上被小偷摸走了，並證明我是中農成分。我把證明拿給張志強，他是主任，關係熟，很快就把戶口上了。沒人知道我的真實成分。

我在隊上搞保管和婦女工作，他們動員我入團，我堅決不幹，一入團就要調查出身，就要露馬腳。我當時有一張爸爸的照片，也藏起來，不要他們看見，照片上爸爸完全是個知識分子，一看就不是貧下中農。

張志強：那一年我們在區上學習半個多月，是黨員的，只要娶了地主老婆，馬上到區法院辦離婚。好幾對立馬就離了，不離的就開除黨籍。

劉培蓮：幾年後張志強意外地發現了我不是中農出身，過程你都曉得了。他回來問我：「妳爸爸這麼年輕就去世了，是啷個去世的？」我說：「他流鼻血。」張志強聽後沒有反駁我，從此一直不提這個事，他怕傷我的心。好多年後，直到宣布地富全部摘帽後我才曉得原來他早就清楚。

採訪時間：2006 年 6 月 4 日

地點：重慶南岸區黃桷垭鎮老廠

採訪後記

兩個多月前，採訪張志強時，意外地得知他妻子是地主子女，其父土改被殺。我當即就想找她，不巧她不在家。

兩個多月來，諸事繁忙，無暇抽身，但我一直念念不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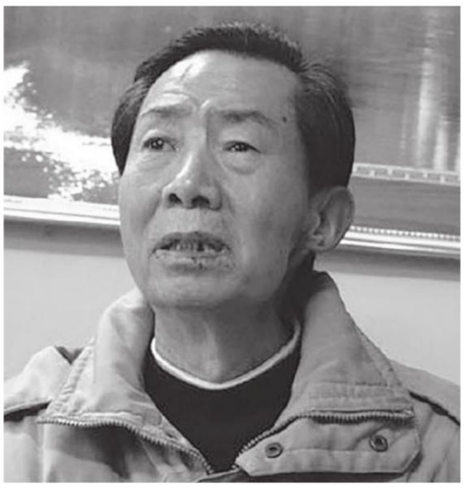
6 月 4 日是週末，我在這個特殊的日子過江、上山，又來到她家。

在張家豪華別墅的寬敞客廳裡，劉培蓮一口氣講起了往昔的苦難。條理清晰，講述流暢，顯然，過去的一切深深烙印在她心靈上。當講到父親被押赴刑場，妹妹追著呼喊時，劉培蓮滿面悲戚熱淚盈眶，整個身心飛越時空，回到半個多世紀前那血腥的年代。

共產黨當政的這半個多世紀來，有多少血腥的槍聲？土改的槍聲、文革的槍聲、「六四」的槍聲……從偏遠的鄉村直到天安門廣場，「共和國」殺人的槍聲此起彼伏。

在「六·四」17 周年紀念日裡，我記下 55 年前的槍聲，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民族苦難的記憶和對那些無辜亡靈永不忘卻的紀念。

二、何年昭雪這塵封的奇冤？



「何年昭雪這塵封的奇冤？！」

講述人：胡永安

土改是我所知道的最血腥的運動，它採用最下流最殘暴最野蠻的手段去侮辱與迫害一些沒有任何罪過也完全沒有反抗能力的人。一個普通的民兵可以任意剝奪別人的生命。在人類朝著文明社會前進的過程中，出現如此黑暗如此野蠻如此殘暴的迫害是不可思議的。——胡永安

一〉、我的家園和家人

我是忠縣官壩鄉人，祖祖輩輩耕讀傳家，與鄉親們相處十分和睦。經過祖宗幾代的辛勤經營，我家大院以及周圍的環境已經非常美麗。大院裡有一座高達七層的碉樓，氣勢很雄壯；大院內外是各種各樣的花果林木，一年四季花果飄香，鳥聲不斷；大門左右各有一株高大挺拔的白果（銀杏）樹，不知種了幾百年了，樹幹要三個人才能合抱，仰面看去，樹梢彷彿伸進雲裡。春天裡，白果樹一片蒼翠，充滿生機，到了秋天，樹葉變得金燦燦的，銀白的果實掛滿枝頭，秋風吹來，金黃色的樹葉灑落一地，院壩裡鋪滿了厚厚的落葉，我們在落葉堆裡尋覓一顆顆白果，拾來用柴火把白果燒得噴噴香，那簡直就是我們兒時的樂園。

胡家院子前的水塘（攝於 2016 年 8 月）

我父親叫胡耀英，先畢業於著名的燕京大學國文系，後畢業於輔仁大學法學院。他先後任過達縣法院書記官、安縣縣長、川康直接稅局副股長、貴州田

糧督導處長等職。我是他任安縣縣長時出生的，所以叫胡永安。解放後（「解放」這個名詞我很不喜歡，那不是任何意義上的解放，這裡只是為了方便敘述借用一下。）父親在成都市東城區文化館當館員，1956 年共產黨在河北辦榮譽軍人學校，父親調到那裡當老師，他要求回四川未被批准，由於家裡發生了一系列慘劇，他心情很不好，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送河北農場勞改。他死於三年大饑餓時，終年大約 50 歲。

我母親叫鍾季卿，忠縣官壩場人，是官石兩鄉（就是官壩石黃兩鄉）出名的才女，她琴棋書畫無一不精，而且繡花、縫衣、做鞋、製糖等等都非常出色，她甚至還會採草藥為人治病。我真不知道母親是從哪裡學到了這麼多的本領。

母親跟著父親在安縣住了一段時間，由於不願意依賴父親坐享其成，想回家來守住家業，就帶著我回到了忠縣老家。

二〉、我聰慧的母親

解放前我們雖然家境較好，但是母親從來不奢侈。我可以給你們說句知心話——在外面說別人會說我是掩蓋剝削——我這個地主的兒子日子其實過得很苦。我冬天沒穿過棉衣，這絕不是說的假話，冬天穿鞋的時候也很少，一般都是赤腳，習慣了，不怕冷。我那母親也是太節約了，像《儒林外史》裡寫的，點桐油燈，要是哪個把燈草多點了一根她就要批評，說：「點那麼亮做啥子，節約點錢多買點田地嘛。」她就是一心想買田地。我家平常是紅苕出來就吃紅苕，洋芋出來就吃洋芋，看見別人吃米飯我也想吃，母親就說：「兒啦，米飯吃了哪有錢買田地，光靠那點祖業怎麼行？沒有田地你們今後讀書哪有錢呢？」我一年四季都想過年，為的是過年能吃米飯吃肉。現在我還記得小時經常嗝食，就是因為每年過年我就猛吃，結果把肚子吃壞了。

胡家院子前的稻田

由於山鄉資訊不靈，就在共產黨快要奪取政權、外地不少人已經在拋售田地的時候，我家靠著省吃儉用，田地反而多了起來，成了大地主。有好多田地呢，也就是 100 石租的田地，大約 20 多畝，還不如毛澤東家的田地多，毛澤東家有 40 多畝田。所以後來人們都說，做一輩子人，鍾季卿最划不來，吃捨不得吃，穿捨不得穿，買田地來當大地主，

殘存的通往胡家大院的石階

招來殺身之禍。

母親自己很節儉，但是對人卻很慷慨，佃客遇到災難有求於她，她和佃客一起落淚，她招待他們吃飯，把舊衣服舊被蓋送給他們，還送幾升穀子，說：「先拿去吃吧，吃了又來。」

母親和鄉親們相處非常和諧，過年過節，母親都要去幫鄉親們做糖，她能做很多品種。我現在還記得她扯糖時的姿勢，把糖熬到一定火候，就雙手這樣扯，然後又吹，吹成各種形狀，像葫蘆啊，人物啊，蝴蝶啊，鴛鴦啊什麼的，活靈活現。她要是現在還在，就是賣糖都能致富。當地農民的閨女出嫁，都要請母親去為新娘開臉，說母親能帶來好運。哪裡像共產黨宣傳的那樣，地主一個個都是洪水猛獸十惡不赦？什麼黃世仁、楊白佬，都是人為臆造的，哪有那回事！有沒有黃世仁那樣的地主呢？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可能有個別地主是那樣，但是不能代表整個地主階層。總的來講，由於幾千年來受孔夫子仁義禮智信道德觀的影響，地主一般都是講仁講義不做壞事不作惡的。按照共產黨的教條主義理論，所有地主都是那麼壞，吃人不吐骨，殺人不眨眼，哪裡是那回事！

我一直記得，在一個月白風清的晚上，母親盤腳坐在床上彈揚琴，琴聲婉轉而淒涼，隨著清風飄出很遠，我依在母親膝下靜靜地傾聽，聽得如癡如醉。一曲終了，我問母親：「這是什麼曲子，這麼好聽，聽起好淒涼哦。」母親驚喜地撫摩著我的臉蛋說：「兒啦，你能聽出來這裡面的淒涼？好兒子，這是〈蘇武牧羊〉。」我又問：「蘇武是什麼人，怎麼回事？」母親就給我詳細地講了蘇武的故事：蘇武是漢代的大愛國者，出使匈奴被扣，流放北海，就是現在的貝加爾湖，渴了就飲雪，餓了就喝羊奶，冷了就擠在羊群裡取暖，不論多麼艱難，他都沒有忘記祖國，匈奴用了很多辦法來勸他投降，他都嚴詞拒絕，絕不背叛祖國，十九年後，他終於回到了祖國。

胡永安講述至此泣不成聲

母親就是這樣教育我的，這是母親給我的最早的薰陶———

（胡永安講至此突然泣不成聲。）

我就是受到母親的影響才愛上了音樂，後來音樂伴隨我幾十年。

三〉、我一家的噩夢

土改中，我們家的財產房屋全部被剝奪了，連一片瓦也沒留下，我們一家被趕進新墳壩灣一間被乞丐遺棄的破草棚裡，草棚的牆壁已經腐朽了，用手一摸就掉渣。

湖北孝感縣老屋鄉農民搬進地主的家《中南土地改革的偉大勝利》中南人民藝術出版社

冬天北風呼嘯，外面有好大的風，屋裡就有好大的風，下雨時屋裡到處都是濕的，像杜甫寫的「床頭屋漏無乾處」，母親半夜起來用一些爛盆盆缽缽接雨，一晚上莫想睡覺。那時我姐姐不到 20 歲、我 11 歲還在上小學、弟弟妹妹都還小，最小的妹妹才出生還沒滿月，嗷嗷待哺，沒有奶水，只有熬羹羹來餵，我天天晚上把妹妹揹起，聽著她淒厲的哭聲，沒有辦法。求生的欲望迫使我們要頑強地活下去，我們全家依偎在一起艱難度日。弟弟妹妹餓得整日啼哭，看樣子就要餓死了，母親不得已忍痛將他們先後都送給了農民。妹妹送給一家農民後，那家人不把她當人，頓頓都是給她吃剩的殘湯，像餵豬狗一樣，妹妹嚴重營養不足發育不良，一直到四歲時在外地的父親通過努力才把她接了回來，這時妹妹還不會說話走路，但是肚子卻大得嚇人，醫生說是寄生蟲，吃藥後打出一半盆蛔蟲。

大院外的兩棵白果樹做為勝利「果實」分給農民後被粗暴的砍掉，他們拿去僅僅賣了 100 元錢，從此我就再也沒有見過那麼美麗可愛的白果樹了。

胡家院子被 13 戶外來農民瓜分，現早已面目全非

與此同時，大院內外的所有花果林木幾乎全部被毀掉，昔日美麗的家園一下子變得傷痕累累滿目淒涼。

他們分了這又分那，什麼都給他們搶去分盡了，結果還是沒富起來，還是窮。

其實就是按照共產黨的政策，也要給地主留足必要的糧食衣物和房子，但是這種政策跟實際情況完全是兩回事，我從沒聽說過土改時有人給地主留下過什麼。連

命都不留下，還留什麼其他的物品喲。

像母親這樣深受鄰里愛戴的人，在土改運動中忽然成為鬥爭對象，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所以，在鬥爭她時沒有一個農民說她有罪惡。土改工作組只好另外想法子，去偏遠山區煽動一些流氓，說：「山區的田地貧瘠，沒有平壩的田地好，現在毛主席來了，你們翻身了，可以去分平壩的田地，還有房屋，隨便分。」這樣，那些做夢也沒想到憑空就可以得財產的農民們就下山分田分地分財產來了，我們一家的噩夢從此開始了。

四〉、我母親之死

我家大院裡的碉樓是祖父早年修建來防土匪的，七層樓，全是石木結構。我後來經常在想，這碉樓防到了土匪，卻沒有防到共匪。

揹著長槍的土改民兵們把村裡所有地主和一些子女——都是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的人——統統關進碉樓，施行各種毒刑。讀過歷史的人都知道，封建社會改朝換代後新的政權都要大赦天下釋放罪犯，並且追贈前朝忠烈，從來沒聽說過要把一些無罪的並且失去反抗能力的人往死裡整。

碉樓遺址

碉樓門口由揹著槍的民兵們日夜守著，我每天都聽到從碉樓裡傳出鬼哭狼嚎般的慘叫聲，有時慘叫聲徹夜不停，令人心悸。那些聲音直到現在還經常迴響在我耳邊，揮之不去，這也是我直到現在還經常夜裡在噩夢中驚叫的原因。

我把那座噩夢般的碉樓稱為「恐怖集中營」，在我看過的所有關於法西斯集中營的記載中，我還沒有看見比這個恐怖集中營更野蠻殘忍和下流的。

我母親和姐姐都被關進了恐怖集中營，由我每天給她們送飯。沒兩天，我就看見母親臉上滿是血污，腫起好高，眼睛周圍是青的，皮下到處出血。我把飯給她，她不吃，說吃不下。

母親受不了種種酷刑，又親眼看見她最疼愛的女兒受到非人折磨，她的一切都破滅了，活著沒意思了。

一天晚上，母親趁上廁所時，跳進了村裡的水井，那是一口很大的水井。民兵聽到撲通一聲，跑過來看，大叫：「哎呀，鍾季卿跳井了！鍾季卿跳井了！」他們

把母親撈了上來。民兵們來叫我們去看，母親渾身是水，雙目緊閉，像死了一樣臉色慘白，臉上被毒打的傷痕青一塊紫一塊清清楚楚。他們把母親提起來倒水，腹腔內的水倒出後，母親又慢慢活了過來。

沒過多久，一天早上民兵來喊我：「你媽找你，快去。」我跑去，母親輕聲叫我的小名:「安娃子，你把我扶去上廁所。」我當時只有 11 歲，還不能預料到要發生什麼，就扶著母親去廁所。所謂廁所，就是豬圈旁擱兩塊木板而已，這就是地主家的廁所。我把母親扶進去後就出來在外面等。過了一陣，我想，母親怎麼還不出來，就喊:「媽！」沒人答應。我從縫縫往裡看，沒人。我再往裡看，在豬圈盡頭的一根樑上，母親已經懸樑自盡了，我當時哇的一聲大哭起來。（胡永安講至此泣不成聲）

碉樓遺址
(左邊房子後面就是鍾季卿遇難之地)

民兵們聞訊趕來，我母親已經停止了心跳，民兵們大罵：「這種壞家伙死了當死個螞蟻！」又轉身對我么叔（他也是地主）說：「胡長生，把你大兒胡永康喊來，把她裹個篾席席拖到荒溝溝去，這種地主，遺臭萬年，不能埋在崖上院子周圍。」

我跟著去送母親，走過丘陵田壩，下到荒溝裡，在一個長滿荊棘野草的地方，么叔說，就在這裡吧。

就這樣草草埋了我母親。

五〉、我美麗的姐姐

我姐姐叫胡秀華，從縣女中畢業後考上了當時下川東的最高學府——著名的四川省萬縣師範學校。她成績優秀，學校還發匾獎勵過她。姐姐從師範畢業後不久就遇到忠縣「解放」，她被安排在石黃小學當老師。由於姐姐在外面接受了現代文明教育，加上她受過母親的良好薰陶，所以她秀外慧中，溫柔賢淑，有一種高雅的氣質。很多年後我在縣科委工作時，當年石黃小學的炊事員調到了縣政府，他聽說我也是石黃一帶的人，問:「胡秀華是你的姐姐？她當時好漂亮哦，穿著裙子從我們門前過，全村的人都追著看她。唉——」

姐姐每年寒暑假回家來，都要教我讀英語，教我唱歌，印象最深的是教我唱〈五月的風〉，這首歌表達的感情是人間的不平，歌詞是這樣的:「五月的風吹在天上——唉，我要唱起才曉得歌詞。」（胡永安隨即唱起了〈五月的風〉）

五月的風吹在花上，
朵朵的花兒吐露芬芳。
假如呀花兒確有知，
懂得人海的滄桑，
她該低下頭來哭斷了肝腸。
——
五月的風吹在天上，
朵朵的雲兒顏色金黃。
假如呀雲兒是有知，
懂得人間的興亡，
她該掉過頭去離開這地方。

1959 年，胡永安（右二）在演出中

現在想起來，這首歌好像就是為姐姐寫的，她後來真的是低下頭來哭斷了肝腸，也真的該掉過頭去離開這地方。她的歌聲好像已經預示了她將要遭遇的劫難。

姐姐最心疼我，我小時生病，姐姐揹著我去看病，我伏在姐姐的背上，聽她輕輕地唱著歌，走過一片片田野，那真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時候。姐姐在我心中是那麼的善良，那麼的美麗，她的歌聲是那麼的婉轉動聽，誰知道她後來的遭遇會那麼慘。

一天，姐姐正在給學生上課，忽然衝進來幾個彪形大漢，把栓牛用的很粗硬的竹索往姐姐身上一套，五花大綁押了出去。我姐姐驚嚇不已，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就被關進了鄉政府的臨時監獄。

原來，有人檢舉我姐姐解放前曾經參加了國民黨的復興社，是反革命。

這中間的原因非常荒唐，總之，絕對是誣陷，不久就查明姐姐不是復興社成員，但是教師職業已經沒有了。

「她總不是好東西，放回農村去！」就這麼一句話，就斷送了我姐姐的一生，姐姐的厄運開始了。

村裡的農協會主席成善天這時已經很威風了，他居然想我姐姐給他的傻瓜兒子當老婆。他兒子叫成世懷，長得莽粗粗（傻乎乎）的，沒有文化，比我姐姐大十多歲，因為又傻又醜一直找不到老婆。我記得很清楚，成善天三天兩頭跑到我家來坐起不走，要我母親把姐姐嫁給他兒子。我母親說：「我怎麼能做主，要看她自己。」成善天開始還客氣，後來就威脅：「你們看到沒得，地主馬上就要日子難過了喲，如果你們和我成了親戚，我幫你們撐起，可以幫你們過關，你們不同意這門親事，後果就不堪設想喲！」我姐姐堅決不同意，說：「我再嫁不到人也不會嫁給他呀。」

成善天懷恨在心，果然，在隨即開展的土改運動中他借機報復，把我母親和姐

姐雙雙關進了恐怖集中營。

六〉、我姐姐之死

那時我母親已經死了，姐姐在恐怖集中營裡痛不欲生，而且更加孤獨。一天深夜，民兵忽然大叫：「胡秀華，出來！出來！有人檢舉妳把金子藏在觀音廟的神龕後面，快帶路去找！」

——他們為什麼白天不去找？！他們把姐姐抓出來，推進荒山裡的那個觀音廟裡，關上大門，十多個彪形大漢一擁而上，輪姦！有了第一次，就不愁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之後他們天天這麼幹。沒多久，姐姐就完全不成人形了。但是還沒完，他們還沒盡興，又想方設法地發洩。

一個當年的翻身農民，也就是從山上下來分我們田地房屋的人，叫藍貴平，後來和我同在縣科委工作，一天他到我的辦公室來親自給我講的。下面是我們的對話：

藍貴平：「胡主任，有件事情我早就想告訴你，不好開口。」

我：「沒關係，我們是一個村的，又在一個單位工作，你說吧。」

藍貴平：「你知道你姐姐是怎麼死的嗎？」

我：「我知道一些，是被那些野獸活活輪姦死的。」

藍貴平：「輪姦倒是小事，還有一些做法你不知道喲。」

我：「還有什麼做法？你說。」

藍貴平：「那些參加過輪姦你姐姐的人親口給我講：藍貴平啦，那時你還是個崽崽（即娃兒），要是大一點還不是跟我們一樣過乾癮了。我問什麼過乾癮。他們說，地主的嫩女我們可以隨便糟蹋呢，那些糟蹋的方法你從來沒有看到過。我們把地主的嫩女衣服脫光了，把兩隻手用牛索子捆在四柱床兩邊，再把大腿分開，用竹籤子，鐵籤子，只要揀得到的東西，都往下身插。這邊在插，那邊在哈哈大笑：深不深？還有好深？哈哈哈，哈哈哈，這才好耍呢——」

（胡永安講至此悲憤難抑，淚流滿面。）

這些難道不該記錄下來嗎？要讓人們知道，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如此荒唐如此恐怖的一幕，不能讓後人忘記。以史為鑒，這就是歷史。

聽了藍貴平的講述，我才知道，怪不得我姐姐沒多久就被活活整死了，原來是這樣殘害的。

我記得，到了快折磨死的那一晚上，他們才命

令兩個地主婆把我姐姐揹來，深更半夜敲我家的門。我開門一看，姐姐披頭散髮面色慘白枯瘦如柴，褲子被鮮血染紅了，周身摸起冰冷。地主婆把姐姐放下後說：「安娃子，今晚上你要好好照顧你姐姐喲，看她今晚上扳（活）得過來不。」我那時小，不知道怎麼回事，就說：「曉得曉得。」

我把姐姐放在床上把她蓋好，我睡一頭她睡一頭，我腳伸過去挨到姐姐，她身上冰冷，沒有一點熱氣。起先還有微弱的呻吟，後來就沒有一點聲音了。我去端水給她，問她喝不喝，她說不出話，也不能伸手接水，我就只好算了。

小娃娃瞌睡多，等我早上睡醒時再去摸姐姐時，她不光是冷冰冰的，而且是硬邦邦的了。我大喊：「姐姐！」她不答應。我探她的鼻孔，沒有任何氣息了。我當時又是哇的一聲大哭，把弟弟也哭醒了。我說：「弟弟，快點起來，快點起來，姐姐死了！」

胡永安痛苦得敲打自己的頭

我們的哭聲驚動了那些強姦犯們，他們聽說人已經死了，又是那一句話：「這種壞傢伙死了當死個螞蟻，快丟到山溝溝去。」又派我么叔胡長生和他大兒胡永康兩個用個爛席子把姐姐拖到荒溝裡去，與前幾天埋在這裡的母親埋在一起。1958 年大煉鋼鐵，到處砍樹，母親和姐姐的屍骨被挖出來拋到荒溝裡，我現在就是想悼念她們都找不到地方了。

中國對於人權的摧殘有哪一朝哪一代做得這樣絕這樣徹底！

（胡永安講至此聲淚俱下，痛苦之極。他夫人張永芳為他拭淚，並說，他每次講起姐姐都傷心掉淚。認識他姐姐的人都說她長得漂亮，又能幹，又溫柔，死的時候她還沒滿二十歲。）

七〉、我的〈思鄉曲〉

我沒有辦法悼念我的母親和姐姐了，只有用詩歌來寄託我的哀思，我寫了一首〈思鄉曲〉，第一段是：

故鄉的山，故鄉的水，
故鄉留下我童年的血淚。
幾度山花紅，幾度清水湧。
以往的慘景依然在我胸中。

他鄉山雖明，他鄉水再清。

也難慰平我破碎的心。

第二段是：

故鄉的樹，故鄉的木，

魂牽夢縈那參天的白果樹。

（唸到這裡，胡永安說：我這一段主要是控訴當時的政權是怎樣破壞環境的，我們那個環境很美呀！）

破敗的胡家院子（2016 年 8 月）

幾度風雨驟，幾度冰雪酷。

以往的美景蕩然無復。

古樹有何罪，秀木有何辜？

也同主人一同慘遭荼毒。

（胡永安哽咽不已，唸不下去，他說：「以後我再也沒有看到過那麼可愛的白果樹了。白果樹？連人都要整死，莫說白果樹。」）

第三段是：

故鄉的泥，故鄉的土。

泥土容不下母女的冤骨。

冤骨拋荒野，冤魂夜夜哭。

淒厲慘烈，揪人肺腑。

蒼天你有眼啊，大地你作證。

何年昭雪這塵封的奇冤？！

（「希望渺茫，渺茫！」胡永安揮著手說。他停下來努力使自己平靜，過了一會才從極度的痛苦中慢慢喘過氣來。

注：胡永安講述時的悲苦可從我與丁然製作的紀錄片《血紅的土地》中第七集裡看到。

八〉、我老師的一家

我小學語文老師成正安和我同村，是北平大學畢業的才子。早年他在北大讀書時曾經參加過中共在北平的地下組織，不久他良心發現，覺得加入共產黨沒有意思，

他左思右想，覺得不大對，就在當時的——好像是什麼《北平晚報》——上登了一則退黨聲明，這件事過去了很久，也沒有人說什麼，解放後他被安排在石黃小學教書，當我們的語文老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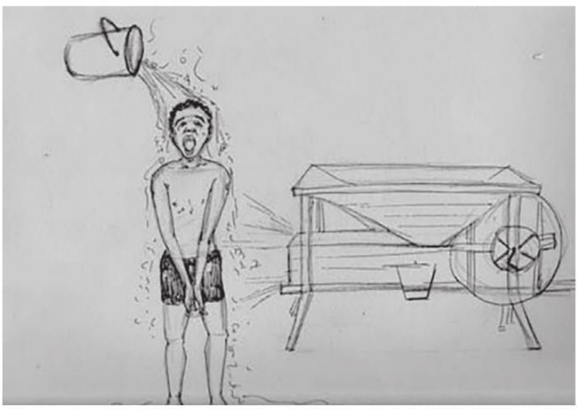
我現在還記得，有一天成正安老師正在給我們上課，忽然鄉長帶著一群民兵持槍衝進學校來，像殺牛匠一般的大叫：「成正安，出來！」

「我正在上課呀。」成正安老師說。

「你上啥子課喲，你這個壞東西！」鄉長怒喝。

鄉長回頭對民兵大叫：「給我捆起來！」立即有幾個彪形大漢撲上去用牛索子把成老師五花大綁起來從教室裡拉出去。

正在聽課的孩子們嚇得綠眉綠眼（目瞪口呆）的，一向講課講得非常好的老師怎麼成了壞傢伙呢？



土改酷刑之一：（冬天）「吹土電扇」

校長趙固國趕忙到教室裡來說：「同學們，安靜安靜。這課我繼續來上。你們不曉得，這個成正安，是個現行反革命，是共產黨的叛徒，叛徒格殺勿論，你們就不要同情他了。」不到一個星期，成老師就被槍斃了。槍斃他的地方特別選擇在我們學校的操場上，好讓他的學生都看見。

成老師被槍斃後，他的妻子也被抓來關進了碉樓恐怖集中營。經過反復吊打，她在一個深夜裡自殺了。

成老師的獨生兒子叫成守義，在豐都一所學校讀高中，因為解放，還沒有畢業就回到了老家。在很短的時間內，成守義先後失去了父母雙親，其痛苦可想而知。

誰知土改民兵們連他也不放過，把他也關進了恐怖集中營。把他關起後民兵們意外地發現，成守義竟然還有一個長得很不錯的妻子，叫鍾雲珍（官壩人，是我表姐，我母親是他們的媒人），他們就把鍾雲珍也抓來，同我姐姐、還有一個黃生蓮（我音樂老師的妻子），關在一起。

民兵們看見這些年輕女子相貌都漂亮，頓起歹心，天天晚上一個接一個地輪姦。我大伯母是恐怖集中營的倖存者，她目睹了那極其殘忍極其下流的一幕。她那次到我家來，一說起就痛哭流涕，直到現在還驚心動魄。大伯母說，那時還沒有電燈，到了晚上，碉樓裡搞土改的民兵們用火柴照，一個一個查看，哪些是年輕女子，哪些是老的。有一次，照到了我大伯母，一看是個老婦人，就「哐」、「哐」地甩了兩耳光，說：「滾到一邊去，不准出聲，出聲就把妳槍斃了！」哪個還敢出聲！就裝睡著了。睡在大伯母身邊的就是我表姐鍾雲珍，他們一看，很年輕，一招手，十

多個民兵一轟而上，輪姦！恐怖集中營裡就是幹的這種事！有人說重慶渣滓洞集中營裡很殘忍，但是國民黨政府還沒有把江竹筠和其他女人拿來輪姦嘛，最多就是肉體刑罰而已。土改這些罪行遠遠超過了渣滓洞集中營。

九〉、成守義之死

幾番輪姦後，民兵們認為鍾雲珍的老公成守義也關在碉樓裡，行事有所不便，就決定先把成守義折磨死，免得礙事。

怎麼折磨呢？這就是我親眼目睹的了——碉樓裡的事情我是聽講的，但是成守義被折磨死我是親眼所見。

一個三伏天的晚上，天氣非常炎熱，民兵們把成守義拖出來用柴火烤。把我柴屋裡的大柴搬出來架起猛燒，把成守義推到火堆前去烤。看到，成守義身上的汗水像洗澡落雨一樣，地下濕了一灘。烤了一陣，嘩的一瓢冷水給他一潑，又繼續烤。民兵們大喊：「推攏去些！推攏去些！」意思是推到離火焰更近一些的地方去。一會，成守義的鼻子尖尖起了燎泡，又一瓢冷水給他潑去，他就咚地一聲倒下地去暈死了。

這時不能再烤了，就喊兩個地主：「把他抬回碉樓去關起！」第二天晚上又想了新花樣來折磨，這也是我親眼看見的。

他們用牛索子把成守義反綁起來，牛索子是竹子做的用來套牛的索子，一旦捆了很可能終身殘疾。然後把他反吊到一棵很高的柚子樹上，成守義像鬼哭狼嚎一樣地慘叫。上半夜，成守義一直不停的地叫，後來聲音越來越微弱，最後就聽不到聲音了。第二天一早，民兵下來撒尿，看見吊在樹上的成守義垂著頭沒有聲音，去摸，還是沒有反應，就說：「你裝起哪個樣子，腦殼一啄起（頭朝下），裝死啊？」說著順手甩起槍托一衝，成守義被衝得像秋千一樣來回盪。呃，怎麼叫都不叫一聲？一摸鼻孔，沒氣了。

民兵隊長叫成世清，他聽說成守義沒氣了，從碉樓走出來不慌不忙地說：「是不是哦，年輕人哪裡這麼不經整，這樣整一下就死了，是不是裝死喲。」他去摸，才相信是真的死了，又是那句老話：「這種人，全家死盡死絕都沒有關係，當死個螞蟻。抬到溝裡去甩了。」成守義當時才二十歲，結婚不久，就這樣慘死了。

民兵羅成龍看到時機成熟了，就想霸占成守義的妻子，他晚上到碉樓去給鍾雲珍說：「妳嫁給我，妳老公已經死了喲，如果妳不幹，胡秀華就是妳的下場。」

鍾雲珍不答應，可能通過什麼方式託人給她哥哥鍾雲德帶了信。鍾雲德解放前在官壩小學教書，思想比較激進，加入了共產黨周邊組織新青社，後來當兵出去，這時已經在貴州當了個團長。鍾雲德聽說了妹妹的消息，火速請假回到老家。他知

胡家大院殘存的一個角落

道這件事搞不好自己的官帽子都要出脫，就很巧妙的去找官壩區的書記王某，說：「我妹妹是封建包辦婚姻，是地主鍾季卿做媒，強迫嫁給成守義的，她本人根本就不同意，我們怎麼會讓她去地主家受剝削壓迫呢。我強烈要求政府把我妹妹從地主的魔窟中解救出來。」王書記是個北方人，一聽，說：「怎麼還有這種事情，那我們要把這個貧下中農的子女解救出來。」其實鍾雲珍也不是貧下中農，她是小土地出租——小業主，我的舅舅中只有她家不是地主，其餘都是地主。

鍾雲德手持區委的公函到碉樓裡，民兵們乖乖的放了鍾雲珍。鍾雲珍後來嫁給一個供銷社的幹部遷到了縣城。有一次我到她家裡做客，談到往事，她諱莫如深，叫我不要談這些，說：「安娃子，過都過去了。」

大概是前年，鍾雲珍去世了。

成正安老師的一家就這樣完了。八十年代平反冤假錯案，發現成正安不是反革命，有關部門去官壩給成正安落實政策，發現他一家都死絕了，沒有一個人，落實政策給誰呢，也就算了。

十〉、恐怖集中營

恐怖集中營比希特勒的集中營還厲害，碉樓裡總共關了我家兩個、我大伯母一個、成正安家兩個、鍾雲珍一個、成從仁一個、黃生蓮一個，最多不超過十個，竟然被整死了五個，超過希特勒對猶太人屠殺的比例！

前面說到了我母親、姐姐、成正安妻子、成守義在恐怖集中營的慘死，還有一個是成從仁。

成從仁其實算不上什麼地主，只有一、二十畝田地出租，但是那時是想地主越多越好。一個鄰居以前與他有私人成見，土改時那個鄰居當了民兵，想霸占他的財產，就借機報復殺人。用什麼辦法殺呢，也是採用「找金子」的辦法。兩個民兵硬說成從仁把金子埋在岩腳下——他哪有什麼金子，不過是藉口而已——把成從仁押到一個懸崖邊上時，一個民兵從後面用槍托猛地一衝，就把成從仁衝到了懸崖下，當場摔死。

民兵回來交差說：「這個傢伙好反動，反動透頂，拒不交出金子，自己跳岩死

了。」後來民兵自己說出了真相：成從仁是被槍托打下岩去的。

土改是我所知道的最血腥的運動，它採用最下流最殘暴最野蠻的手段去侮辱與迫害一些沒有任何罪過也完全沒有反抗能力的人，一個普通的民兵可以任意剝奪別人的生命，在人類朝著文明社會前進的過程中，出現如此黑暗如此野蠻如此殘暴的迫害是不可思議的。臺灣也搞了土改，但實行的是贖買政策，促進了臺灣的經濟發展，而我們是政府教唆獸行氾濫無法無天，想槍斃就槍斃，想打死就打死，踐踏人權破壞環境。

既然是歷史，以史為鑒，就要如實地寫下來，就像司馬遷寫《史記》一樣。要讓後人知道，我們曾經走過一段極其黑暗極其悲慘的路。司馬遷當時寫《史記》時要記錄漢武帝的一些事情，漢武帝威脅說：「你要這樣寫，怕腦袋保不住哦。」司馬遷回答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他還是堅持寫了。

採訪時間：2006 年 1 月 14 日

地點：成都市新華社區

採訪後記

胡永安是地主子女中少有的有文化的人，因此他的講述很清晰，他的遺傳基因和所受的教育也讓他具有一種儒雅氣。但是，在講述他目睹的那些暴行時，他反復地用了「禽獸」、「野獸」的詞語。

在講到他姐姐之死時，他哭得透不過氣，他妻子安慰了他好一會他才平靜下來。「這麼多年了，只要一提到他姐姐，他就要情緒失控。」他妻子說。

（注：朋友陳先生為採訪胡永安出了不少力。）

補記：

2005 年 11 月，高智晟律師與焦國標先生一起，赴迫害法輪功的重災區吉林長春和遼寧大連進行個案調查。其調查報告披露了共產黨在迫害法輪功學員中使用的一些下流而殘暴的手段，如：被侮辱陰部且被折磨得昏死過去的項敏，被警察掐乳頭揪陰毛用刷子捅陰道的常學霞，被用繫上扣的繩子和折斷的拖把蹂躪陰部導致大出血的王麗君，被

「中國對人權的摧殘哪一朝哪一代做得這樣絕這樣徹底！」

反銬並把燃燒的煙頭強行插進鼻孔的魏純……高智晟律師說：「我用顫抖著的心、顫抖著的筆記述著那些被迫害者六年來的慘烈境遇，在這次令人難以置信的野蠻迫害真相中，在政府針對自己的人民毫無人性的殘暴記錄中，其最持久地震盪著我的靈魂的不道德行為記錄，即是610人員及員警的、完全程式化的幾無例外地針對我們女同胞女性生殖器攻擊的下流行徑！幾乎是百分百的女同胞的女性性生殖器、乳房及男性性生殖器，在被迫害過程中都遭到了極其下流的攻擊，幾乎所有的被迫害者，無論你是男性還是女性，行刑前的第一道程序那就是扒光你的所有衣服，任何語言、文字的功能都無法複述清或者再現我們的政府在這方面的下流和不道德！」

高智晟記錄的這種下流和殘暴手段，早在50多年前的土改時就廣泛地實施在地主、富農身上。只不過施暴者由當年的「土改工作組」、「翻身農民」、「民兵」、「土改積極分子」等改為了現在的「610人員」和身著制服的「人民警察」。

胡永安的家鄉

三、樹，砍光了；人，整死了

講述人：吳江法

現胡家院子的農民

原永安村四隊生產隊長

在川東三峽地區，有非常迷人的自然環境，那兒的鄉村田舍，曾有天人合一的寧靜秀美。轟轟烈烈的土改，不僅殺人掠財，也破壞了中國鄉村的自然美境。胡永安家的院壩裡，曾有兩棵參天的白果樹和兩棵巨大的桂花樹。

我們家是土改時從十多里外的復興寨遷來胡家衝的，這兒的地主多，有30多個，後來複查又補劃了三個漏劃地主：田朝元（音）、陳世值（音）、馮布三（音）。補劃後就沒收他們的財產，過年豬拿去賣了，房子給他沒收了。

我們一共有 13 戶 70 多口人分了胡家的房子和田地。我們家 5 口人，每人分兩擔穀的田，共分了 10 擔，當時每擔穀是 340 斤。

我家還分了胡家的豬圈，就在碉樓前面。

當時是有兩棵大白果樹，很高，這前面有一根，從這個坎坎過去，那房子外面有一根。白果樹一個人抱不了，後來被砍了。除了白果樹，還有兩棵很大的桂花樹，桂花樹也是一個人抱不了，有這麼大。

「白果樹以前就在那兒」

楊啟林（土改時分胡家財產的農民）

從外面梯子上來，外面一棵，這兒一棵，好看得很，八月間，桂花香，滿院子香得很。

吳江法

桂花樹我砍了一棵，另一棵本來也是在我分的房子前面的，但另一家說，那棵樹離他的房子近一些，於是他就把那棵樹砍了。

土改時胡家的碉樓做了永安村的辦公地，十多年後被拆了，政府把木料賣了 300 元，賣給了十幾家私人。碉樓的石料被幾個生產隊分了。

楊啟林：桂花樹好看得很

我們石黃鄉以前有三個有名的建築，一個是那個廟子，那裡面的菩薩比梁平縣雙桂堂裡的菩薩都還要多。第二是官壩的高牌樓，那牌樓很高，也有這個樓子這麼高。第三就是這個碉樓。現在一個都沒得了，都被拆了、毀了。

土改時胡家的這個碉樓用作永安村的辦公處。地主就關在碉樓裡，每天晚上抓出去鬥，就在後面那個大壩子裡開群眾大會，我當時十來歲了，跑去看，地主一個個捆起用棒棒打。

我親眼看到整死了四個人。一個叫成叔倫，他 80 歲了，整死了從樓子上推下來，腦殼都摔爛了。另一個叫成守義。當時我就住在碉樓外，聽見裡面砰砰嘭嘭打人的聲音。我進去看，成守義手這樣捆在柱子上。碉樓裡有四根柱子，中間是個天井。成義方和成世清兩個人，一人拿個斧頭棒，像打豬一樣，或是像砸麻繩子，砰砰砰你一棒我一棒地「鴛鴦」打。成守義還沒死，於是又把他弄出來吊起，吊在那棵桂花樹上，他的手吊得腫泡泡的。還是不死，於是又把他吊到那棵柑子樹上，最後吊死了才把他拖到碉樓溝溝裡。

楊啟林：這兒就是當年的碉樓

樓子裡我看到整死的四個中，胡永安家就占了兩娘母，他的媽鍾季卿和他姐姐胡秀華。鍾季卿被打得慘，說她家裡有金豆子，要她交金豆，交罰款，以這個為名，才打得下手。那天她去解手——就在分給我的這個豬圈裡——豬圈當時做為碉樓辦公處的廁所。民兵押她出來，在這個壩壩看守。她在豬圈裡用褲腰帶繫在脖子上，一隻腳還在地上，就這樣就斷了氣。

胡秀華也被整死了。貧協主席的兒子成世懷要她嫁給他，胡秀華很硬氣，她說：「我情願被打死不願意羞死。」鬥她的時候，成世懷專門踢她的下身，哈哈哈——那個時候鬥地主，哪個越下得了手，越積極，就是積極分子，入黨呀，哈哈哈——

採訪時間：2016 年 8 月 9 日

地點：忠縣石黃鄉胡家沖（胡家大院）

採訪後記

十年前，在成都採訪胡永安時，他的講述（哭述）給我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十年後，我決定把土改的採訪錄影做成紀錄片，為此，專程去胡永安的家鄉忠縣石黃鄉拍攝外景。

很費了一番周折，才找到胡家大院。

大院早已不是當年的樣子，胡家也早已沒有一個人住在這兒，只有在石壩（當年開批鬥大會的地方）的右上角落，還殘留著一點胡家當年的住房。

石壩右後方的那個碉樓（即胡永安說的土改時的「恐怖集中營」）也早已被拆毀了，原址上只殘留著一排當年的基石。

吳江法和楊啟林老人，指給我看當年白果樹的地方，又帶我到碉樓遺址前，講起碉樓的命運和故事。

採訪完吳江法老人後，我又走到碉樓遺址前。

遺址上，荒草萋萋，夏蟲唧唧。田野風來，一叢翠竹輕搖曼舞，伸向寂靜的天空。

六十多年前石壩上鬥爭大會的喧囂和火熱早已消失；六十多年前碉樓裡鮮活生命的慘叫和死亡早已遺忘。

六十多年過去了，沒有任何一個作惡者、殺人犯受到追究和懲罰；六十多年過去了，沒有任何一個受害者、遇難者受到賠償和祭奠。

那個宣稱自己偉大的，依然在偉大；正確的，還在正確……

「那個時候鬥地主，哪個越下得了手，越積極，就是積極分子，入黨呀，哈哈哈——」

原圖說明：廣東省中山縣土改後許多優秀的農民通過實際鬥爭的鍛煉，在黨的教育下提高了階級覺悟，具備了共產黨員的條件，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選自《中南土地改革的偉大勝利》

四、一個小心謹慎的翰林後代

講述人：施曾廉

1941 年生

我們施家在涪陵曾經是一個很顯赫的家族，爺爺是「湖廣填四川」來到涪陵的，落戶在珍溪鎮。爺爺發奮讀書，後來當了清朝的翰林。他的大兒子，即我的大伯，也當了翰林。小時候，我記得在我們施家大院的大朝門上，掛著皇帝賜予的匾額「父子翰林」。哪個皇帝我不曉得，爺爺和大伯的名字我都記不得了。

（注：我在 1985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涪陵市志》上查到了「父子翰林」的情況，詳見本文後面。）

我本人出生在重慶市市中區張家花園，即現在的中山醫院那個地方。日本飛機轟炸重慶，我們全家遷到鄉下珍溪老家居住。這時爺爺已經去世了，只有他的小老婆王德清同我們住在一起。

我父親施乳鶴在我很小時就病逝了，那時媽媽正懷著我的小弟弟。很不幸的是，媽媽又難產，母子二人都沒有保住。就這樣，不到一年，我失去雙親，我和弟弟施曾廣成了孤兒。那時，我們全家靠一個叫曾玉芳的女傭人操持。曾玉芳原來是四川銅梁的一個農民，她丈夫上了前線，戰死在抗日戰場上。曾玉芳流亡到重慶打工，我們家雇用了她，轟炸期間，她又隨我們來到涪陵鄉下。

在我 10 歲那年，共產黨來了，搞土改。我大伯的二兒施仲渝被抓起來打（槍殺）了。他哥哥施孟懷剛好在解放前夕被土匪殺了，否則也要被共產黨殺。施家總共被殺了多少人我不清楚，當時我太小，記得的有一個堂哥叫施倫（音），他是鎮長，被殺了。還有一個名字記不得了，只知道他兒子叫施祖光（音），他在國民黨軍隊中當了一個小官，部隊在瀘州起義投誠了共產黨，他不瞭解農村的情況，還回到鄉下來，結果送了命。當時，越是基層的小官越容易遭（殃），官當得越大越沒事。

（施曾廉見我追問姓名和詳情，趕緊說——）

一個政權建立，是要殺人來鞏固，不殺人上面要怪罪，殺錯了上面不追究。

那時，我們這房的人，除了我們兩兄弟，就是我婆婆王德清和女傭人曾玉芳。婆婆自然劃成地主，把她抓去鬥。但婆婆年歲大了，她在家也不管事，那些人於是又把曾玉芳抓起來，又鬥又打，要她交出金銀。曾玉芳（我們後來叫她「伯伯」）是個很不幸的女人，年輕守寡，又無子女，她把我們家當作自己的家，把我們兩兄

弟當作自己的孩子。土改我們被趕出來，衣食無著，她不離不棄，天天去揹煤炭，換一點包穀（玉米）來供養我們。

伯伯見情況危急，求人（她不識字）寫信給我當年在重慶的奶媽，求她來把我接走，救我一命。我奶媽姓況，是一個貧窮的勞動婦女。她窮得連到涪陵的路費都沒有。她餵養了幾頭豬，唯一的辦法只有賣豬。很奇怪，那幾天豬突然不吃食，不吃食的豬是賣不掉的，因為買豬的人要給豬餵食，以查驗豬是否健康。

奶媽把豬牽到市場上去，心想，要是豬賣不掉，就只好不來接我了。咦，你說怪不怪，買豬的人倒了兩瓢食，幾天不吃食的豬突然吃起來！

我的命運從此改變了！我這輩子兩個大恩人，一個是「伯伯」，一個是奶媽。

我進了城，成了城市人口。我弟弟被他在農村的奶媽接走，他從此一輩子在農村，日子當然十分艱辛。

我走後，婆婆很快就餓死了。她六十多歲的人了，又是一雙小腳，被迫出去討飯。她娘家也是窮苦人，她當初到施家是當丫環，被我爺爺收為小房（小老婆）。她沒吃的，出去討飯，沒有人敢給她，三親六戚都不敢給，她是地主婆，要劃清界限。她到她弟弟家去討飯，她弟弟的子女們還拿棍子打她。婆婆失去一切生活來源，只有死路一條了。

我進城後，有人對我奶媽說，叫我把名字改了，同她家姓。奶媽回答，他今後長大了要認我當媽，不改姓也要認；不認，改了姓也不會認。所以，我一直姓施。

我的出身成分也沒改，一直填的地主。在那些年，這個出身是很要命的，升學、就業都很難。不過，幸運又一次降臨到我頭上。我初中畢業時，正遇到 1958 年「大躍進」。辦學也要「大躍進」，能辦兩個班的，擴大一倍，辦四個！這樣招生量就猛增。我很幸運趕上了這個猛增。當然，也不完全是幸運，還有我的「聰明」——初中畢業前，學校（在化龍橋的市 2 中）發了一張調查表下來，問：你認為學校該為什麼人辦，標準是什麼等。我回答，應當為工農和他們的子女辦，以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為標準。我們班上有一個成績很好的同學，他回答應當以成績優良為標準。結果我升上了重慶機器學校，那個同學則下放長壽湖農場勞動。

你不要笑，我這輩子能平平安安活下來，全靠我萬分的小心謹慎，當縮頭烏龜，夾起尾巴做人。該說的話我不說，不該說的我更不說。那一年，我大哥施孟懷的女兒施祖珮（她解放前去了臺灣）從加拿大寫信回來，打聽她父親的情況。信經過層層審查後交到鄉下我弟弟手裡，弟弟來找我，叫我回封信，我堅決不幹。為啥？說不定有人就抓住這事定我一個裡通外國罪。那個年代抓人整人很隨便呀。我們水輪廠僅「文革」就打了 106 個「牛鬼蛇神」。

現在？現在我也不多說。前兩年報上刊登了我們施家祠堂，有人叫我找律師去把房產索要回來。算了，算了，說不定什麼時候打我一個「反攻倒算」罪。

算了，算了！

（注：「反攻倒算」是共產黨多年來強加給地主和其子女的一個罪名——只要你對被搶走的土地和財產表示一點異議，就是「反攻倒算」罪。）

施家最後的遺存——施家祠堂。現做為鎮政府幼稚園

施紀雲（1852—1929）字鶴笙。涪陵珍溪鎮人。光緒九年（1883）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曾任湖北無償、施南、襄陽、德安知府，施鶴、安襄、鄖荊兵備道道台，國史館總纂兼總複輯。光緒二十七年（1901）任涪州師範學堂總教習。宣統二年（1910）奉命督辦川漢鐵路。民國 14 年倡修涪陵文廟，受到進步人士反對，未果。同年應縣知事請求，負志書局之責並總纂《涪陵縣續修涪州志》。17 年任縣團練總辦，未久即卸任。病故。（《涪陵市志》1531 頁）

施愚（1875—1930），字鶴雛。涪陵珍溪鎮人。光緒二十四年（1898）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後遊學日本、法國、英國、美國、德國等地。光緒三十一年（1905）任考察憲政大臣顧問，嗣任山東巡撫顧問。光緒三十三年（1907）任清政府憲政編查館科員，後任度支部清理財政處總辦。宣統三年（1911），任奕劻內閣弼德院參議、法制院副使。民國成立，施愚任北京政府大總統府秘書、法制局局長。民國 3 年 3 月，任約法會議議員、副議長；5 月任政事堂法制局局長；6 月任參政院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主持起草天壇憲法，並任參議院參政。民國 8 年 2 月，施愚作為北方代表參加在上海舉行的南北談判。民國 14 年 8 月，被臨時選聘為國憲起草委員會委員。民國 16 年 1 月，任安國軍總司令部政治討論委員會委員。施愚晚年潦倒落魄還鄉，掛

名《涪陵縣續修涪州志》修纂。民國 19 年，病死於涪陵珍溪場老家。（《涪陵市志》1511 頁）

採訪時間：2006 年 3 月 18 日

地點：重慶市李家沱秦媽火鍋館

採訪後記

據介紹人趙純友老人說，施曾廉一輩子膽小，尤其是有（政治）運動來，更是心驚膽顫，因此，如果說是採訪，他肯定有顧慮。於是，我們以吃頓飯、聊聊天的方式坐在了一起。我不作任何筆記，也不照相，先以我母親是涪陵人的故鄉情同他套近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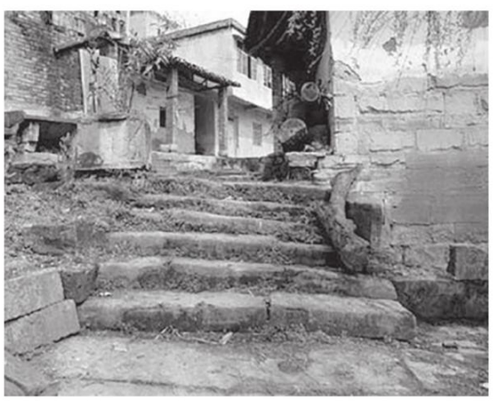
杯箸交錯、鄉情故土、小火熬火鍋、大口喝啤酒，總算慢慢瞭解了一段「不慍不火」的往事。

地富「摘帽」已 20 多年了，施曾廉仍然害怕那個「反攻倒算」的罪名。接受採訪，談過去的往事，會不會是「企圖反攻倒算」？

那些年，在報紙上、在廣播裡、在專政機關、在官員的講話中，常常有這些殺氣騰騰的語言：「地富分子和他們的子女，人還在，心不死，妄想奪回他們失去的天堂……對企圖反攻倒算的地富分子，我們要堅決鎮壓！」

一個強盜，如果不僅搶走別人的財產、不僅殺死財產的主人（殺人越貨），而且還能讓被搶者一想到去討還財產或者呼一聲冤枉，立馬就驚恐要「犯罪」，那麼，這個強盜的「匪功」的確登峰造極，算得上史無前例了。

注：因故隱去施曾廉的採訪照



施家公館大朝門前殘存的石階

施家大朝門公館最後的遺存

五、顯赫施家最後一個守墓人

講述人：施曾廣

重慶涪陵珍溪鎮方家村農民

1943 年生

「我從小就很聰明」

一〉、共產黨來了，拆公館、挖祖墳

我爺爺老翰林和我伯伯少翰林在我出生前都去世了。我聽說爺爺回鄉時很榮耀，還鋪了地毯，從碼頭一直鋪到我們施家公館。公館修得很是氣派，很大，書園、果園……門窗、屋樑到處雕花，還有各種各樣的匾額，幾十塊，有的還塗得有金粉。最顯眼的是皇帝賜予的「父子翰林」，那塊匾我記得，掛在大朝門上，文革「破四舊」時被砸了。鄉下嘛，不文明，你們城市裡要好些。公館在 1963 年被珍溪區糧站拆毀了，他們需要木料修倉庫。現在施家只剩下一個祀祖的祠堂，被鎮政府幼稚園占了。10 多年前，上面精神文明辦公室的幹部下來檢查工作，看到祠堂古色古香，問是誰修的，別人說是施家。又問施家還有沒有後人在，他們提到我。檢查的幹部說，按政策祠堂不能沒收，應當還給施家。我當然想要，但我不敢。我經歷過那個年代，那些運動，土改、三反五反、社教（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文革。我成分不好，地主子女要翻案？說個內心話，我怕。

土改時我還小，七、八歲。打（槍殺）人的場面我害怕，沒敢去看。印象最深的是敞（挖）我爺爺的墳。那天去了一大幫人。農會說（墳）裡面是個翰林，一定有很多金銀財寶。

墳修得非常堅固，石縫都是用糯米粘連的。叮叮噹噹打了一整天才打了一個洞。墳裡面是一個大大的陰沉木棺材。那個棺材我曉得，是武隆縣送來的。爺爺生前在武隆秉公斷了一個案子，當地人感激他，送了極其珍貴的陰沉木。接下來開棺材蓋子。嗨，就是打不開。叫石匠來用鏨子打，打不開，又用開山（斧頭）砍，最後又用撬槓，折騰了半天才打開。陰沉木棺材裡面又是一口小棺材，打開小棺材，才露出屍體。我從大人們的胯下鑽進去。爺爺睡在裡面，好好的。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

爺爺埋了幾十年，完好無損，臉上皮膚都是好好的，鬍子長長的一直垂到胸前。但是，沒有發現金子和其他財寶，手上、腳上都沒有。於是開始撕衣服，看他胸口上掛沒掛金片。衣服也是好好的，據他們說穿了 20 多套。他們撕了大半天才把衣服撕爛，還是沒找到金子。接下來撬嘴，用的鐮刀，看嘴裡含沒含金豆子。還是沒有。不過，發現了一顆金牙，農會的人把金牙撬下來拿走了。除此之外，爺爺身上還掛有兩串珠子，他們摘下來，拿出來一抖，繩子腐了，珠子滾落一地，這個（人）撿一顆，那個（人）撿一顆，算是分了（勝利果實）。

敞爺爺的墳，整整費了兩天功夫，沒得啥子搞頭（收穫），就這樣，保住了施家其他的墳，包括爺爺旁邊我婆婆的墳。

二〉、扶養了三代「地主子孫」的貧農婦女

曾玉芳是我們家解放前雇的一個女傭人。她以前是銅梁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到我們施家後當女傭，做長工。土改的時候，農會叫她站出來揭發檢舉我們。我記得區公所下來一個姓胡的女同志，反復動員她，說她是貧下中農，受壓迫受剝削，我們是地主，是剝削階級。要她同我們斷絕關係，不僅不要再管我們，還要積極鬥爭、揭發。

曾玉芳這個人很老實，是啷個就是啷個，從不亂說。她說：「施家從來沒有虐待過我，也沒有把我當下人看待。」農會的人說她包庇地主，把她抓來鬥打，要她說我們把金銀轉移到哪去了。其實，那時我們家因為抽鴉片已經敗落了，到了典當家什的地步。農會的人認為曾玉芳不老實，把她反捆起來吊「鴨兒鳧水」。那是很慘的呀，腳不沾地，把她的手都吊斷了。

儘管如此，曾玉芳還是照管我們。她曉得，她不管我們，我們就要餓死。那時我們被趕出來住到一個棚棚裡，我和哥哥還是娃兒，婆婆（她是爺爺的第四個老婆）60 多歲，沒有生存能力。曾玉芳去揹煤炭供養我們三口人。100 斤煤炭才 3 角錢，要走二、三十里路。她一次只能背 50 斤。掙 1 角 5 分錢。她看這樣下去活不出來，就請哥哥當年的奶媽來把哥哥接走，逃一條生路。我記得她一趟又一趟地去求農會開證明，又一

曾玉芬（中）與她精心扶養的施家三代人

不幸的施三

趟一趟地跑鄉政府，求他們辦遷移證。受了很多氣呀。最後送走哥哥時，要 5 塊錢船費，曾玉芳把身上的兩件衣服脫下來賣了，湊足了路費。

我最初跟了我鄉下的奶媽，她姓羅。但她家娃娃多，生活很困難。沒辦法，曾玉芳收養了我，從此同我生活了一輩子。後來我結婚生了娃兒，全部是她帶，她照料得精細呀，比自己親生的還好。我三個娃兒都是她帶大的，一個個洗得乾乾淨淨，穿得整整齊齊。

尤其是照顧我殘廢了的三兒施三，天天給他餵飯。他怎麼殘廢的？說來傷心。施三是我三個兒子中最聰明的一個。文革期間，他生病發燒，我把他送到珍溪鎮醫院。當時鎮醫院有一個大學畢業的醫生，姓羅，醫術高，但是，搞依成分論，羅醫生出身不好，把他下放到鄉下去搞結紮（絕育），另外把一個護士提起來當醫生，她叫湯國芬（音），她出身好，當了住院部醫生。我們把三兒送去，是湯國芬收的。她見施三又吐又拉，就說是中毒性消化不良，給他打針退燒。退了三天都退不下來。後來，羅醫生偶然回來看見了，悄悄說，這是典型的腦膜炎。但是，湯護士管的病人他不敢治。再說，這時也晚了。我們去求一個親戚，他是中醫，也是地主出身。他叫我們用苦蒿磨水加雞爪黃連給施三灌下去。當時施三牙齒咬得緊緊的，我們撬開嘴把藥灌下去。咦，慢慢他舌頭能動了。就這樣，三兒命保了下來，但變傻了，生活不能自理，手腳抖，吃飯要人餵。

再說曾玉芳，她帶大了我的幾個兒子，接著又帶我兒子的兒子，又是精心照料，一個個打扮得漂漂亮亮。她有點錢，全部用在娃兒身上，給他們買營養品。

唉，她這個人，說不出來那麼好。

當然，我也一心一意報答她。在饑荒年，我們快餓死了，曾玉芳已經水腫。這個時候鎮上一個幹部叫我去學木匠，學木匠有點糧吃。我千方百計節省，每天省個一兩糧，過兩天就帶回家給曾玉芳吃。那個年代，吃一頓飯就是大補藥。曾玉芳因此活了下來。

前兩年她去世了，活了 90 多歲。我隆重地給她辦了葬禮，又請風水先生來看地，選了塊好地方安葬了她。

採訪時間：2006 年 3 月 24 日

地點：重慶涪陵珍溪鎮方家村

採訪後記

從施曾廉口中得知他弟弟在珍溪鄉下後，我即前往採訪。

在鎮外的路邊，我向一個正在地裡幹活的老農打聽。

老農抬起頭：「我就是施曾廣。」

在我數百次採訪中，從沒這麼巧、這麼順利的。

更讓人高興的是，施曾廣熱情而健談。雖然完全是農民的衣著相貌，但他思緒清晰目光炯然——畢竟是大知識分子、赫赫翰林的後代。

他說，他從小就很精靈，心靈手巧，學什麼會什麼，招人喜愛，所以，雖是地主子女，但沒受什麼苦。

我與施增廣在曾玉芬墳前

他把我帶到他八、九年前修的一幢三層樓房裡，又一一帶我觀看了曾玉芳的墳、施家祖墳、施家祠堂，並指給我看施家公館舊址和和殘留的石階。

曾玉芳的墳在半山坡上，初春的陽光暖暖地灑在墳上，我在這位善良忠厚的勞動婦女面前深深鞠躬。

曾經顯赫一方的施家公館早已片瓦不存，舊址上七零八落地修建著一些農舍和豬圈。唯有祠堂還在，雖然裡面的碑文神龕和工藝雕刻蕩然無存。

施曾廣是施氏家族裡唯一留守在故土的後人。在他之後，還有那位文革時被「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醫治成呆癡的施三（施曾廣的兩個大兒已遷到涪陵城裡）。從滿腹經論、叱吒風雲的父子翰林，到老農施曾廣和呆癡施三，時代的風雲化神奇為腐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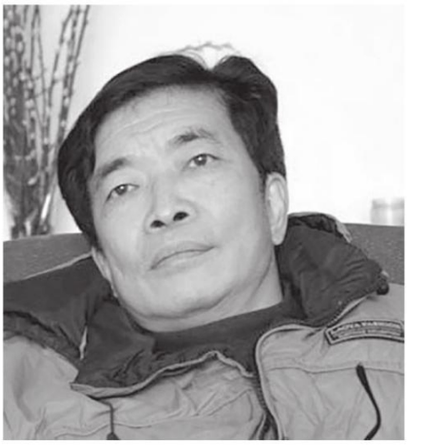
不知地下那位衣冠被撕裂、牙齒被撬爛的翰林大人，在另一個世界裡會寫出何等詩文。

施曾廣在他祖先的祠堂前

六、慘叫聲中的自刎

講述人：熊建成

1955 年生



「我一直懷念我奶奶」

我爺爺熊海林是開縣陳家的一個地主，也是一個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的鄉紳。解放前我家算是富甲一方，住房都是雕樑畫棟，充滿藝術和文化。爺爺娶了三個老婆，最小的叫熊李福，也是我奶奶。我奶奶是縣城裡的名門閨秀，讀過書，琴棋書畫樣樣都會，人也長得漂亮，特別是受傳統文化教育，溫文爾雅，知書達禮，在那個大家族裡奶奶深受人們的喜愛和尊重。

我爺爺最寵愛她，同她生了十六個子女。我爸爸熊朝剛排行老七。

爺爺解放前就去世了，所以1950年土改時就拿我奶奶開刀。工作組把她抓起來，發動農民上臺鬥打。不料我奶奶在當地人緣極好，沒有人願意上臺去對她下手。於是，工作組從外地找來一些流裡流氣的痞子（即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盛讚的人物），這些人下起手來狠毒。他們把我奶奶吊起來，打不說，最毒的是燃起火來燒奶奶的背，奶奶一聲聲慘叫，整個後背被燒爛！

我奶奶深得她所有子女的尊重，目睹母親受刑，可以想像他們的心情。在奶奶的子女中，她的第四個兒子即我的四伯伯熊朝剛性子最烈。母親的慘叫讓他發狂，但是他沒有辦法同強大的政權抗爭，他跑回家中，抓起菜刀往自己的脖子上一刀接一刀地猛砍，鮮血濺滿了牆壁。人們發現了，把刀奪下來，當天他沒死。兩天後，他仍然用刀砍脖子，這次，他成功了。

我奶奶當年沒被整死，不是她的十幾個子女救了她，而是當地的「貧苦農民」救了她。農民把她藏起來，從一家轉移到另一家。這樣，1955 年出身的我才有幸見到我奶奶（她 1979 年去世）。

我一直懷念我奶奶，我從沒見過她動怒罵人，那種寧靜、溫和、善良、嫻淑！現在很難見到像我奶奶那樣的女人了。

我們家除了四伯伯外，三伯伯熊朝統也很不幸。三伯伯上過朝鮮前線，因隻身炸坦克立過功。轉業後他在城裡當了一個幹部。1957 年他成了右派，但沒有開除他

公職。1964 年搞「四清」運動，突然把他打成「反革命」，開除公職，遣送回鄉。

三伯伯回到鄉下，覺得無臉見人，成天躲在家裡不出門，幾年後自殺身亡。

此外，熊建成的外婆（姓陳，開縣天河鎮人），因丈夫是地主，受到迫害，實在活不下去，於 1955 年自殺。

熊建成：外婆自殺時，我媽媽正懷著我，媽媽天天生氣，流淚。我可能因此受了（胎教的）影響，所以我脾氣很不好，容易動怒，一點沒繼承我奶奶的那種優雅和嫻靜。

採訪時間：2005 年 1 月 31 日

地點：重慶萬州區熊建成家

廣州郊區農民鬥地主。選自《中南土地改革的偉大勝利》

七、他吞下了他爹的腦水！

講述人：趙純友

原重慶水輪機廠退休工程師

1939 年生

我爺爺從湖南來到重慶，最初靠賣湯圓為生，後來又在南岸區四公里開磚瓦窯，慢慢發了家，在市中區買了房子，開了當鋪。你看過電視劇《九九歸一》沒有？我們家的情況同那裡面很相似。此外還開有一家旅館，就在現萬豪賓館那個位置，叫「衛渝旅館」，有六層樓，記得小時我去玩，裡面還有樂隊演奏。當然，家裡也在鄉下購置了房產和田地。房屋在黃桷樁鎮老廠，田土就在下面，當時叫王家灣、土廟子，即現在的工商大學和教育學院。我帶你到工商大學來談，就是想指給你看看我家當年的田地。

這兒真是一塊好地方啊！山青水秀，田土肥沃，山上一年四季有泉水來，從不天乾，收成好得很，我爺爺就埋在那兒。

日本飛機轟炸重慶，我家在市中區校場口米亭子的八間房子全部被炸毀，那房子是從清朝一個敗落了的大戶人家買來的，很漂亮，可惜了。為了躲避日本飛機，我們遷到了鄉下老廠，我在那兒生活、讀書，直到 1952 年。

老廠當年是川黔的交通要道，街上很熱鬧，給馬幫打鐵掌子的鐵匠鋪很多，成天叮叮噹噹。還有，那兒風景不錯，小時候我們到前面的中梁山上去玩，那真是個樂園，可惜現在環境破壞了。

我們家算得上老廠的首富吧，只是我們的田土沒買在老廠。土改時，我父親趙煥章在外面做生意，他沒受衝擊。家裡田土是大伯趙成章經管。工作隊的人把大伯抓到土廟子，捆起來鬥，隨後把他拉到海棠溪河壩槍斃了。那一批殺了二、三十個，大伯是其中之一。他們給大伯安了個罪名，說他有「血債」。這個「血債」是這樣的：有一次大伯坐滑竿（即人力抬的

「下面那一大坡地，當年就是我家的財產」

轎子），雇了一個抬滑竿的力夫，那天力夫出門之後，他老婆在家突然發作生小孩，不幸難產，大流血死了。這就是我大伯的「血債」。地主嘛，要殺你有沒有理由都要殺。

大伯死時，我婆婆還在，但年歲已高。大家沒把大伯的事告訴她。她天天坐在她那口大棺材旁，那口棺材做得非常好，土改的人來把它抬走了。別人說，趙老太婆多年來天天守著她那口棺材，快死了的時候棺材成了別人的。

殺我大伯我沒看見，但老廠殺人我親眼見到，印象最深的是打邱宏安。他的腦水被打出來滾在地上，還在跳。他十多歲的兒子——我們叫他邱大腦殼——撲上去一口把他爹的腦水吞了下去！

我至今都沒搞懂他為啥要吃他爹的腦水。

我的三嬸（即「一個地主孫女的自述」中的婆婆）、么嬸都劃成了地主。其實她們都是普通家庭婦女，只不過能夠有碗飯吃。么嬸當時還非常年輕，人也很漂亮，後來守廁所，挨鬥，一輩子孤苦零丁。按共產黨的標準，年滿 18 歲就可以劃成地主。我的堂哥趙純貴當時剛滿 18 歲，這一下有苦頭給他吃了——以後幾十年，每有運動必把他抓到臺上鬥。那些年大大小小運動又多，他整整挨了幾十年的鬥！大伯的兒子趙平忠畢業於黃埔軍校，解放後被抓入監牢，放出來時身體垮了，沒兩年就去世了。

土改時，我只有 10 來歲，我一下子覺得這個世界非常恐怖，晚上睡覺開始感到害怕。另外，不得不過早地幹繁重的體力活——抬磚。10 來歲的身子，壓多了，身體發育受到影響，所以我個子瘦小，而我父親和伯伯都是 1 米 8 的個頭，高高大大。

後來人生路上的坎坷就更多了，我讀書成績很好，在學校數一數二，考上了也讀不了好學校。我妹妹考上第三軍醫大學，政審一查，家族裡有地主被鎮壓，馬上取消……

1950 年 6 月，劉少奇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作報告。會議決定成立由劉少奇負責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員會，指導全國的土地改革工作。

共產黨硬說我們解放前剝削壓迫勞動人民，哪裡是那麼回事嘛！租我們田土的佃戶王海雲（音）家，同我們家的關係好得很。他們每次來，我家都留他們吃飯，王大嬸、王大嬸的喊得十分親熱。他們每次來，也總是給我們送南瓜、送蔬菜，彼此像走親戚。解放後王家對我三嬸（所謂地主

婆）還很關照。去年我去看望他們，他們說，當年的日子比現在好。現在？王家的土地全部被政府徵用了，他家「農轉非」（即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之後進入了一個小廠，沒幾年廠垮了，全部下崗（失業），一大家人，擠在 70 多平方米的房子裡。他們請我想法給他們找個工作，我為此跑了好些地方。你想去採訪？可以可以，只是不知他們是否還住在原地。我去年去時，他們說，再晚點來就找不到他們了，因為政府和開發商又要開發那塊地方，房子又要拆，他們又得遷，遷到哪兒還不知道。

採訪時間：2006 年 3 月 18 日

地點：重慶工商大學

採訪後記

趙純友老人是我高中同學趙綠茵的么爸，經趙綠茵的聯繫，他同意我前去採訪。

但是，他把採訪的地點定得十分特別——在重慶工商大學校園內的一個山坡上。

我們坐在泥地上，四周竹林圍繞。

「我想在這兒談，是因為這一帶以前都是我家的土地。」老人說。

這兒以前都是我家的土地

採訪結束後，我們爬到半山腰，老人望著山下那一大片早已被「占領」和「開發」的土地，詳細講給我它們當年的情景：哪兒曾有一股清泉，哪兒曾是一片農舍，哪兒是一片良田……講完，他久久佇立在那兒凝望。

趙純友回到他少年生活的地方——老廠，當年趙家的房屋早已蕩然無存，環境也被毀得慘不忍目睹。

八、一個地主孫女的自敘

講述人：趙綠茵

我來到婆婆和父親的墓前。

我為長眠於此的一對相依為命的親人，擺上鮮花和精心挑選的供果。隨著歲月的流逝，時間沖淡了悲傷，終於可以比較平靜地來到這裡。然而，當一小瓶白酒擺上父親的墓前時，思念和哀傷的淚水湧了出來……

婆婆曾經是那麼深地出現在我生命的軌跡中，我同她曾有過太多太深的複雜感情。

1964 年，我剛九歲。一天在選舉班幹部時，我被老師提名，同學們也通過了。突然一個聲音冒出來：「我不同意，她媽媽是地主！」

說話的是家住街上的一個潑辣小女孩，我頓時驚呆了。課堂上馬上發生騷亂，同學們好奇地問東問西，議論起來……

從這天起，我知道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究竟怎麼不好，我不清楚，我不會問父母，因為他們那些年代心情很不好，我知道應該自己承受這些痛苦，但我不相信我母親會是「萬惡的地主」，她還在教書。

後來得知，婆婆才是地主。

婆婆出生在一個城市平民的家庭，她母親是在朝天門給碼頭工人洗衣服的，不知她是怎麼嫁到那個隔山隔水的封建大家庭去的，想來這是一門高攀的親事。

婆婆長相並不漂亮，甚至還有幾分凶相，她脾氣不好，有時還要打我們，但我從不恨她，我知道她為照料這個家和我們幾姊妹，很不容易。後來母親告訴我，婆婆之所以有些凶，是因為她生活很難，丈夫在她 20 來歲、我父親只有兩歲時就去世了。她想離開，但那個大家庭要逼她留下兒子，她捨不得，於是守寡幾十年把父親拉扯大。媽媽說，一個人要在很艱難的環境裡獨自掙扎生存時，這種性格就會形成。

婆婆有雙小腳，那真是三寸金蓮，像粽子般，腳底有很深很深的一道溝。我常不由自主把小腳捧在手上把玩，此時婆婆不再煩躁，一個女人在對待自己時是寧靜

的。

就在那一年，1964 年，婆婆離開了我們家。她是地主成分，政策不允許她待在城裡，必須下農村勞動改造。我默默看著她離去，心裡發空。父親變得沉默寡言。

多年後聽母親說，當時父親想不通，拖了一點時間，結果遭到父母雙方領導的嚴厲批評，單位領導的「最後通牒」是：「再不走，把你們全家都趕下去！」

婆婆走後好長一段時間，我都生活在驚恐中。那個年代，父母除週末外每個晚上都要在單位學習政治到十點鐘，不知怎麼有那麼多沒完沒了的「政治」。每天夜裡，家裡就留下我們三姊妹。窗外不時有一個瘋子來騷擾，沒有了婆婆，我怕得要死，不敢睡，只好每晚捧著書就著昏暗的燈光，恐懼著窗外隨時可能出現的騷擾，等候父母夜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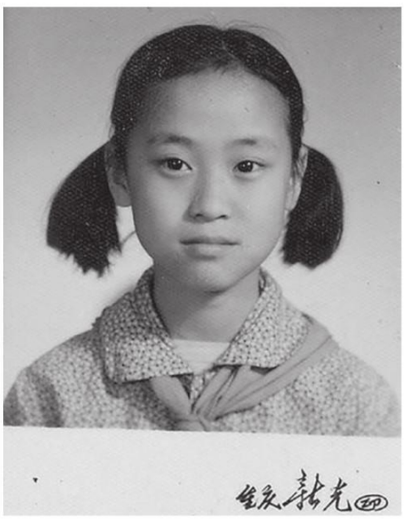
一天，父親叫我去給婆婆送生活費，她走後很久沒回家了。我從沒一個人出過遠門，更何況是到陌生的鄉下看一個地主。我暗自埋怨父親為什麼不自己去，或者把錢寄去。後來我自己遭遇「劃清界限」的逼迫，才知道為什麼父親不敢去。

我按著父親指引的路線，緊捂住錢包，轉了兩次車，還走了許多路，心一直咚咚地跳，緊張得要死。從此我就落下這個病根，一緊張心就狂跳不已。

我終於找到了婆婆勞動改造的地方——半山坡上一個用穀草搭成的簡陋小窩棚。沒有門窗，沒有床，沒有板凳，用了幾塊大石頭當凳子。婆婆在此為生產隊照看一個工廠的大廁所。空氣中瀰漫著工廠飄散出的濃濃的膠臭味和廁所發出的刺鼻的糞臭味。

條件雖然極差，卻是在那個年代對一個地主婆充滿人性化的照顧。因為，活很輕。

那個生產隊長是個好人。他曾是婆婆所在大家庭的佃戶，他清楚婆婆多年孤兒寡母寄人籬下，被當傭人指使多年的苦命。據說隊長的溫情也引起一些指責，在那個年代，同情地主是要受批判的。不過，婆婆當時已經 57 歲，又是小腳，站都站不穩，農村的土路坡坎多，走路都難，更不用說參加田間勞動了。



1964 年，我 9 歲

婆婆見到我非常高興，我們已有很長時間沒見面了。我發現婆婆溫和多了，她輕聲責怪我怎麼不在街上買點吃的來，我怯怯地說我不知道，那時我還不會花錢。

她帶我到了她居住的小屋，裡面一片漆黑，沒有窗，只有屋頂的幾片亮瓦透著光。

我第一次到農村，很不習慣，周圍骯髒不堪，一片泥濘。沒有一個鄰居關心我

的到來，我自覺地不出去同那些鄰居的小孩玩耍，我感到非常自卑和孤獨，恨不得儘快離開。我給婆婆帶了十元錢，那超出了當時規定的數額，我後來才明白為什麼父親不敢郵寄。

從此，為婆婆送生活費的事就由我承擔下來。

「文革」開始那年，我十一歲。那天，我去給婆婆送錢。我打著紅領巾，穿著紅地白點的背帶裙，那條裙子是我們小學校在區文藝匯演中用過的演出服，我非常喜歡它的漂亮和豔麗。突然，一幫和我年齡相仿的孩子竄出來，一邊嚷著「這是地主老太婆的孫女」，一邊圍過來，用磚頭、石塊向我砸來，我嚇得驚叫，抱頭落荒而逃。

我沒向婆婆提起這件事，怕她難過，回到家也沒提。第二個月，父親又叫我去，我終於忍不住了，拒絕前去。父親得知原因後，沉默不語，但他還是堅持要我去。我從不違抗父命，我尊重甚至崇拜父親，我不希望讓他對我失望，而父親也在生活中不停地將他的慈愛給我們。

我觀察了很久，發現除了走那條路外，還有兩個辦法，一是先到婆婆的窩棚，下班後再同婆婆一道回她住處，婆婆的住處與窩棚間有很長一段崎嶇的山路，途中雖然必遇上那幫小孩，但婆婆好歹是大人，兩個人一道走可以壯壯膽。後來我感覺這個方案更加不行，婆婆已是泥菩薩過河，我分明看見她在每次回住處的路上都要自覺去一間掛著毛主席像的小茅屋低頭認一會罪，我同她一起走只會給我帶來麻煩。再就是走另一條較遠的路，路上還有好幾家農戶的幾條惡狗，從小我就非常怕狗，但這條路可以繞開那幫孩子。思來想去，在人與狗之間，我覺得人給我的恐懼遠大過狗，於是我選擇了有狗的那條路。

我早就決定不再打紅領巾，不再穿那條紅背帶裙了，我覺得這與地主後代的身分很不相稱。我恍然覺得自己很傻，竟然認識不到自己不配這身打扮，於是我選了與身分相當的破舊衣服。

那天果然遭遇到狗。在田間小路上，一條惡狗衝我狂叫，我撒腿就跑，狗猛追不放，我感覺雙腿發軟邁不開步，一下子癱倒在田坎上，狗咬住我的褲角，我感到一陣絕望……緊要關頭，狗被主人吆喝住了。

後來我知道該怎樣對付狗，千萬不要跑，要站住。也知道怎麼對付那幫小孩，任憑他們吼叫和扔石塊，我只顧快步埋頭走自己的路，他們畢竟還沒有追上來打我。我有時也敢同婆婆一道回住處，並在她低頭認罪的時候在門外耐心等候。

（寫到這段經歷，猛然間一個從沒想過的問題冒了出來：婆婆每天通過那條埋伏著磚頭、石塊的小路，她有沒有受過傷？從精神到肉體？但我從未聽她提起過，從未想過她的感受。）

我沒被狗咬也沒被打傷，但，傷是在內心深處，從此我養成了膽小怕事，委曲求全、妄自菲薄的性格。另外，我開始迅速變得成熟。那年，我十一歲。

婆婆慢慢老了，病逐漸加重，背不知為何駝得跟蝦米一樣。她總是不停地喘著、咳著，隨時吐著總也吐不完的痰，活得比以往更卑微。她其實連看廁所的輕活都無法勝任了，尤其在寒冬，窩棚四處透風，是氣管炎患者的大忌，但她必須每天去，她的病因此反復發作，成了惡性循環。父母緊縮家裡的開支，給婆婆的錢不停地增加，以便讓婆婆請人幫她挑水運糧。本來婆婆是必須勞動改造的，不能花錢請人幫她，因為這仍是剝削的表現，不過她已喪失了勞動能力，一個孤老太婆，別人也就容忍了她的「剝削」。

我每次去都盡可能地幫她，如挑水、做飯、幹雜活，不過農村的柴灶我始終無法駕馭。有次還為她搬家，從快倒塌的危房裡暫時搬到一個搖搖欲墜的廢棄的糧倉裡。這個糧倉很小，沒有窗戶，只有一扇門，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晚上關門睡覺連我都感到悶得慌，只好將門開著。

現在是我為她刮背了，這是一副被生活徹底壓彎了的背。在她的指導下我知道怎樣用菜油塗在背上，緩緩用銅錢刮著背溝，直至背溝呈現出烏紅的深紫色，再用烤熱了的老土草紙貼在上面，這時一陣深深的滿足感滲透在我們之間，一種人間溫情瀰漫在簡陋的小屋。每次我都儘量在她那裡多住幾天，晚上早早就同她蜷縮在一間單人小床上腳對腳地睡覺，感到一陣童年的溫馨，享受著婆孫相依為命的感覺。

婆婆抱著一歲的我

同她在睡一起的時候我想過許多往事：三年大饑荒時，有次我和她到冷清的街上，她抑制不住饑餓，向街邊那個賣麥粑的人賒了一塊我們分了吃，我一直在想她後來去還這個帳沒有，卻始終沒好問她。後來聽父母說婆婆那兩年差點就餓死了。

我想，她會死嗎？會不會這樣睡下去第二天起來發現她已去世？像我聽到過的有些老人那樣。她以前逗妹妹玩時最常用的語言就是妳說我會不會死，什麼時候死？她其實很留戀人生，儘管她有太多的理由不留戀。

每次分別她都用哀求的眼光望著我，我知道她非常孤獨，想念親人，我是她和她兒子之間的一個紐帶。她渴望回到她心愛兒子溫暖的家，享受天倫之樂，讓孤苦的心得到安寧。

父親終於悄悄去看過一次母親，母子倆在窩棚相見，婆婆高興得發狂！父親是

婆婆家表姊妹們交口讚譽的大孝子，小時候就知道常到河邊去迎接為地主大家庭洗衣服的婆婆，為她揹東西。他對母親是絕對尊重，母子感情之深可以讓人「嫉妒」。

隨著文革的深入，「唯成分論」越來越深地影響著我們，我同婆婆間的關係有了一些微妙的變化，那血濃於水的親情，這時似乎有點支撐不住，我在下意識裡悄悄同她適當地「劃清界限」了。

記得那次過長江，長長的輪渡跳板晃晃悠悠，婆婆的小腳走在上面顫顫驚驚。我一路上一直默默與婆婆保持一段距離，看到她在跳板上那種艱危，我本能的要去攙扶她，但是，「地主」，這個在那個年代被徹底妖魔化了的形象無形中阻止著我，我在猶豫了一會後才上前扶住她。

還有一次，汽車半路拋錨，我們不得不步行幾個小時。這是一次很艱難的行程，路上幾乎沒有行人。婆婆喘著，咳著，拄著拐，如蝸牛般行進在一直是上坡的公路上，一路上不知歇了多少次，一車人早就走得沒有了蹤影。我清楚地看到她在掙扎，在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我等待著她，此時我希望她像過去那樣凶，那樣暴躁，於是可以不再可憐她。然而她現在那麼弱，簡直不堪一擊，幾年的鄉下勞動改造已徹底摧垮了她，從精神到肉體。我的心情非常矛盾，「理智」和感情在折磨著我，我好想非常親密地安慰她：不要緊，有我呢，我是你的親孫女，但另一方面有個無形的東西阻礙著我表達這種感情。所以，一路上我一言不發。婆婆一點沒有怨我，她知道她無法要求得到我更多的情感，她知道自己的卑微，她在我們面前已失去做婆婆的尊嚴。

隨著文革的進一步深入，「黑五類」越來越臭。我看見兩個出身不同的小孩打架被上升到「黑五類」打「紅五類」的高度上，幾個幼年時的好友間的關係也不像過去那樣單純，那緊隨每個大人的檔案裡的秘密被人捅漏給了不懂事的孩子，於是每個孩子父母的家庭出身便成了感興趣的話題，紅色的便覺幸運，高人一等，黑色的便覺灰心喪氣，低人許多。位於「黑五類」之首的地主更是臭不可聞，是罪大惡極、罪不可赦的代名詞，我已不願婆婆出現在我們的生活裡了。我覺得她一出現，那個「罪」的標記就威壓著我們。

1973 年，我申請入團時

每一個人的童年都有一些願望，我也是，我小時候的最大的願望就是婆婆不是地主。文革期間，每當看到婆婆提著包袱，拄著拐棍的身影，我馬上灰心喪氣，連同小夥伴們玩都沒興趣了，生怕大家指著說：看，地主婆！我希望那小腳挪得快點，悄悄地趕緊進

家門。每當婆婆離去時，我的心一陣輕鬆，也希望那小腳挪得快點，儘快離開，不要讓別人看見。

文革抄家展覽出了不少東西，我看我們家一貧如洗，沒有任何一點同地主生活掛得起號。父親說婆婆早在很多年前就摘了帽，有選舉權，屬於人民的範疇，還拿出她的選民證給我們看。我小小年紀就感覺到這個摘帽和戴帽沒什麼區別，但相信了父親的話，對婆婆一點不恨，還非常可憐她，不過總有那麼一個東西在心裡梗著，影響著同她發展如父親與她的那般感情，這使我善良純樸的心飽受煎熬。

婆婆終於倒下了，接到她病危的消息時，我在難受之餘暗暗有了一種解脫感，但很快覺得這個念頭太殘忍，強把它打消了。我和父親趕到婆婆的住處，看到那些生活用品以及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小搪瓷碗，忽然感到一種巨大的悲痛，我想到我曾經同她的相偎相依，想到她的可憐，想到我對她的微妙感情，想到她會永遠離去。

婆婆在住院問題上仍然面臨成分問題，幸虧婆婆的親妹夫，他是工人成分，他毫不猶豫地填了「小商」成分，若是由老實巴交的父親如實填寫「地主」，婆婆連住院的資格都沒有。

我非常後悔在婆婆重病期間沒有全心照料她，給她臨終關懷，在猶猶豫豫中放不開自己的情感，沒有用語言表達我內心對她的真實感情。我清楚地記得有一次婆婆在病痛中痛苦地呻吟，我卻猶豫不定是否要為她端水送藥。這是最不應該的事，為此幾十年來我一直譴責自己！

我被那個東西梗得太厲害！婆婆終於走了。

那晚父母不知為什麼發生了爭執，兩人吵得很凶，此時婆婆已轉回我家。我們感到害怕，婆婆一直哀求道，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不一會，婆婆沒有了聲音。父親慌忙揹起婆婆往醫院走，此時是夜裡十點左右。那個年代，夜裡很早就沒人了，臨近春節，街上正在戒嚴。不知文弱的父親哪來那麼大的力氣，一個近視眼，黑燈瞎火地揹著老母親一氣從山坡下到街上。

趙綠茵，1975 年

終於父親揹不動了，停了下來。一隊夜晚巡邏的民兵過來，問我們在幹什麼，父親回答到醫院看病，他們放了我們。父親忽然覺得不對勁，婆婆越來越沉，他意識到了，便返轉身揹婆婆回家。

我們幾個孩子從沒遇到過這麼重大的事，蜷縮在床上不敢下地。我看著婆婆靜靜躺在那裡，心裡一片空白和麻木。父親沒有流淚，默默不語。母親也默然。好不容易熬到天濛濛亮，父母派我過江到婆婆妹妹家。

在冷寂的長江邊，我悲痛的眼淚才流了下來。

這是 1971 年，婆婆 63 歲，我快滿 17 歲。

送別婆婆那一幕讓我難以忘懷。

清晨，前來抬她的兩個民工到了。除我們全家五口前往送行，沒有另外任何人，包括婆婆的親屬，父親不願連累別人。

沒有舉行任何告別儀式，甚至沒有準備黑紗。

一向謹小慎微的父親突然不顧一切地咆哮起來，那是極其壓抑後悲痛強烈的爆發。他堅持要為母親佩帶黑紗！他表示，無論發生什麼嚴重後果，背何種罪名（什麼「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等）他都要戴著黑紗為母親送行。我們默默看著他，誰也沒有去制止。他翻出一塊黑布做為黑紗戴在手臂上，但外面用棉襖罩上。

他沒有要求我們戴。

在前往送行的路上，山樑上清楚地映出那抬著婆婆的兩個民工的剪影，這條路正是我與她共同走過無數次的路，如今她不用再艱難地爬涉了，我深切地感到我與婆婆間從此永遠的距離……

婆婆的地主成分沒有隨著她肉體的消失而消失，它繼續影響著我，我入團時，這就成了我最大的一塊心病。當我面對班主任，那個左得可愛的人時，不知怎樣說才好。我要如實交代對婆婆的認識，要與她劃清界限……最後班主任說：「妳婆婆看來是個心狠手毒的女人，否則怎麼能在早年喪夫後將你父親養大成人？」

我無言以對，我發現所有的辯解都是多餘的。

婆婆走後，每年春節父親都安排我們同他一起去看她，那個年代對亡靈的追思早已列為要被破除的「四舊」，清明節之類的傳統節日已被人們橫掃一空，好歹留下了個春節。

1980 年春節，在看望婆婆從山路返家的路上，父親突然用非常鄭重的語氣告訴我們，以後每年春節都要來看婆婆。當時四周沒有旁人，只有長滿雜草的空曠山野和猙獰的山岩。我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這是父親在囑託我們，他為什麼要這樣囑託呢？四個月後，父親永遠離開了我們。父親終究是被婆婆離去的打擊傷了元氣，加之從小到大長期的精神壓抑，使他在人生的壯年倒下了。那一天他剛滿五十歲。

他終於可以無所顧忌地陪伴他所熱愛的母親了！我們把父親墓緊靠在婆婆旁，讓他們母子倆在陰間永遠相陪。在人世時他們被強行拆開，相互思念，相互掛牽。如今，沒有任何東西能打擾他們母子間的相依相伴了。

趙綠茵寫於 2005 年 10 月

採訪後記

趙綠茵與她么爸趙純友

趙綠茵是我的高中同學，但是，無論是在當年同窗時，還是在後來的交往中，我都不知道她是「一個地主的孫女」。

我只知道，當年她成績優秀，後來她工作出色，非常聰慧但十分低調，頗有才華但從不張揚。她性格溫柔心地善良，做事一貫認認真真勤勤懇懇，不過，卻總是顯得過於小心謹慎，甚至畏縮膽怯。

2005 年底，她無意中說到她寫了一些關於她家族的文字，準備留給她的女兒。她還說，她們趙家是個大家族，曾經很興旺……

我動了心，提出想借來看看。她同意了。以上這篇〈一個地主孫女的自述〉便是她文字中的一部分。趙綠茵最初不同意我收錄她的這部分經歷，也不願提供照片，她仍然擔心，她一輩子謹慎。

過了一段時間，她終於同意了，而且還約出了她的么爸趙純友。趙純友又提供了張志強、劉培蓮、施曾廉、施增廣，於是有了本書中的〈一個土改民兵隊長的述說〉、〈那些年遭的孽說不完〉、〈一個心驚膽顫的翰林後代〉、〈顯赫施家最後一個守墓人〉等篇章。

〈一個地主孫女的自述〉全部出自趙綠茵的手筆，從她的親筆記述中，我明白了她為什麼一輩子這麼低調，這麼謹慎，這麼膽小。

湖南岳陽縣永和鄉農民在鬥爭地主會上高呼：徹底打垮地主階級，農民當家作主。選自《中南土地改革的偉大勝利》

慶幸的是，她終於戰勝了膽怯和恐懼，於是，一些也許會永遠消沉的「土改史」被打撈出來。

九、漂亮的地主女兒——黃二妹

講述人：王宗笠

重慶大學數理學院教授

1969 年，我 21 歲，是一個高中畢業生。那年冬天，我和另外幾個知青下鄉到重慶酉陽縣（當時屬於四川省）新龍公社新明大隊四生產隊。

那是一個非常偏遠落後而又貧窮的地方，從重慶出發，坐船、乘車、走路，要整整四天才能到達。

那條慘不忍睹的破爛公路只通到區上，從區上到落戶的四隊還有 20 多公里山路。

四隊位於一條山溝裡，全隊只有 40 多人，後來得知，以前有 80 多人，六十年代初的那場大饑荒讓四隊的人口減少了一半，（19）69 年我們去時人口都沒有恢復。

初到四隊時正是隆冬，酉陽山上天寒地凍，農民們非常好奇地望著我們，但不敢靠得太近。他們一輩子封閉在偏遠山溝裡，對我們這些城裡來的人十分敬畏。我永遠忘不了初次見到他們時的情景：衣服破爛、單薄、骯髒，下身只有一條薄褲子，好些人赤著腳站在雪地裡，臉上隱隱泛出菜色，目光有些木訥……那一刻，不管你在城市裡多麼失意、多麼傷感、多麼自卑，你都要生出一種優越感。你裹著他們從來沒見過的大衣、毛衣，吃得飽穿得好，有知識、有文化……

四隊的幾十口人順著山溝居住，我們幾個知青被安排到溝中部的一戶人家。這家人只有兩兄妹，父母和其他親人都在饑荒年餓死了，所以有多的房子供給我們。村民們來來往往都要從我們門前經過。

很快，我們發現了一個年輕女人，確切地說，一個非常漂亮的年輕女人。雖然她也穿得破爛，但掩蓋不了她 S 型的美妙身材。她的臉型是那種秀美的瓜子型，眼睛水靈靈的，含有一種靈性的光。她同當地農民相比，有一很大的不同是：她很乾淨。儘管她衣著破舊，但收拾得整整潔潔清清爽爽。尤其不同的是牙齒，由於當地人沒有刷牙的習慣，所以個個都是滿口黃牙。但她的牙齒卻非常潔白，非常整齊。我記得第一次見面時她張口一笑，露出滿口潔白的牙齒，陽光灑下來，像珍珠一樣閃閃發光，令人生出眼前一派明亮燦爛之感。

我們幾個知青公認，她是那種屬於比較高雅、有些洋氣的城市美女型。

在這偏遠閉塞荒寒的山鄉裡，生長著這種「尤物」，令我們十分驚奇。

我們迅速得知，她叫黃二妹，是地主黃三爸的女兒。

黃三爸（人們都這樣叫他）是我們隊裡唯一的一個地主，解放前有 10 多畝地。聽他們說，由於當地很窮，黃三爸長年累月也同後來的「貧下中農」們一塊上坡下地勞動，所以，他其實也是地地道道的「勞動人民」。但是，他畢竟有 10 多畝地，因此被抓出來當了「階級敵人」。

土改時，黃三爸一家被攆出來，住到了溝頭上的一間破草房裡。

黃三爸也是隊裡少有的文化人，他曾到縣城裡讀過書。記得在坡上勞動時，他喜歡嘴裡念念有詞：「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黃二妹沒上過學，是她爸教她學會了讀寫。

黃二妹很喜歡同我們知青交往，我們也非常願意看到她。我們講起外面的世界，黃二妹聽得如癡如醉。當時，她走得最遠的地方是 20 公里外的新龍區，汽車也只見過兩次。我告訴她，城裡有很寬的公路，到處是電燈，半夜出去可以不打火把。二妹覺得難以想像。也難怪，山溝裡夜晚一片漆黑，沒有光亮會摔得頭破血流。我還告訴她，世界大得很，她走過的 20 公里是很短很短的距離。她目光癡癡的望著我，我於是說，我這兒有本地圖，借給妳，妳去看看，世界有多大。臨別時我開玩笑地說，地圖不是白看，看了要告訴我從英國坐船到中國怎麼走。

過了幾天，二妹來了，她音齒朗朗地向我背誦，船從英國啟程，經過了直布羅陀海峽、地中海、蘇伊士運河、紅海、可倫坡、馬六甲海峽……

那一個個遙遠的、充滿異域色彩和風情的地名，從一個幾乎足不出村的山鄉姑娘口裡吐出，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

還有一次，在坡上勞動歸來，我無聊中隨口讀了幾句英語，引起了二妹的極大興趣。她問，外國人就是這樣說話嗎？我說我也不知道，反正老師是這樣教的。她說，那你教教我。我順口讀了個「Thank you」，並告訴她，前面的發音舌尖要放在兩齒之間。

二妹馬上就學著說。

她又一次讓我驚訝。她的發音準確、清晰，而且非常悅耳動聽，真的是一開口就到位！還有，我喜歡畫畫，其他農民來看兩眼就走了，沒興趣。二妹不然，她可以在我身後一站一兩個小時，還不自禁地拿起筆在紙上畫，神情非常專注。

我屋裡有兩排書，二妹每次來，站在書前，癡癡凝視，用手輕輕地從書的一頭撫摸到另一頭，神態很動人。

我們幾個知青私下議論，一致的看法是：要在這窮山溝找個女人結婚，絕對不可能；但是，要是能娶黃二妹，絕對可能！

可是，我們下鄉時，大約 20 歲的黃二妹已經結婚了，而且還有了一個一歲的兒子。

她的丈夫叫涂德明，住在山溝的最裡面，是個孤兒，從小很窮，當然也就是響噹噹的「貧下中農」。涂德明有兩個特點，一是力氣大，掙工分是把好手，家裡一年四季不缺柴燒；二是有點傻乎乎的，話都說不清楚。我在四隊三年，幾乎沒聽見他表達出完整的句子。

你會想，黃二妹嫁給他是鮮花插在牛糞上？不，無論是二妹還是她父親，對這門親事都很滿意。為啥？你知道，那個年代，地主和地主子女是階級敵人，豬狗不如，好多地主子女根本無法談婚論嫁。二妹的哥哥是一個有文化的人，快 30 的人了一直打光棍，因為沒有哪個姑娘願意嫁給一個地主兒子。

而二妹，不僅嫁了人，而且嫁的是一個貧農，而且還是一個力氣很大能掙工分的貧農。

黃三爸對這門婚事尤其滿意，豈止滿意，簡直是巨大的幸福。只是，為了不影響女兒，他很自覺地不進女婿家門，也不同他們多說話，從女婿門前路過，他從不去抱他的小孫孫。最多在沒人的時候用手指頭衝著孫子勾一下，輕聲說：「叫外公。」

我觀察到，黃三爸每次從女兒女婿門前過，雖不言語，但腳步很輕快，面部的表情也是舒張愉悅的。

黃二妹的滿足表現在她全身心地操持這個家。她的聰明才智、心靈手巧在這個小家裡得到充分發揮。她自己設計了一個拐角的煙筒，排除滿屋的煙。這在我們那一帶是個創舉。她把家裡的每一個角落都收拾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走進她家，立馬感覺到與其他所有農民家的巨大區別，很能留住人。

涂德明對二妹心滿意足。他收工回來，最喜歡坐在門檻上，一手握煙桿，一手抱兒子，臉上那種幸福感、滿足感就像擁有了全世界的財富。

不過，這種貧農和地主女兒的「蜜月」，在那個年代很難一帆風順。二妹結婚大約兩年吧，風浪就來了。

我們隊的隊長也姓黃，30 多歲，是個很精明的、敢說敢幹的人。我們那兒有個傳說：老鴰會叼金條。因為老鴰把金閃閃的金條當上等的稻草，叼回去做窩。所以，老鴰窩裡可能會有金條。

沒人把這個傳說當真，除了黃隊長。

一天，黃隊長丟下生產隊的活不管，突然消失了。再過一天，大山上打柴的樵夫把頭破血流的黃隊長送回來——他爬到懸崖絕壁上去掏老鴰窩，金條沒掏到，摔得血光滿面。

對子虛烏有的金條，黃隊長都可以認真下手；對一個眼前實實在在的誘惑——漂亮聰慧的黃二妹——黃隊長怎能放過。

黃隊長是結過婚的人，有兩個孩子，但老婆去世了。作為隊長的他要再娶不難，但他一心想要的是黃二妹。

要得到，首先得讓黃二妹離婚。

黃隊長找到涂德明，對他說，你是貧苦孤兒出身，又是地地道道的貧農，像你這種身分，早就該當一個主任的官了。為什麼沒當上？是你娶了個地主女兒！現在城裡正在造反、奪權，城裡要來人選幹部，你是最合適的，只要離了婚，就有遠大前途。

涂德明原本是傻乎乎沒腦子的人，黃隊長三言兩語就把他打動了。正在這時，縣裡的宣傳隊下鄉演出，黃隊長抓住機會把涂德明帶去做為「候選主任」推薦給宣傳隊。黃隊長自導自演地介紹，說塗德明出身好，只是娶了個地主女兒，但很快會離婚。宣傳隊裡那個年輕人望著傻乎乎的涂德明，心裡好笑，開玩笑地說：「那就去離了婚再來。」

黃隊長趕緊把涂帶回來，催他快離。

農民們非常心痛燈油，天一黑就早早滅燈上床，非重大事件不會「浪費」寶貴的燈油。我喜歡看書，通常睡得很晚，山溝裡只有我的油燈亮到深夜。

但那天夜裡，涂德明家裡的油燈一直亮著。

我於是知道，黃二妹在作最後掙扎。

第二天，我看見二妹抱著兒子走在前面，塗德明走在後面，往區上去了。

顯然，黃二妹沒有能保住這個家。

回來時，涂德明抱著兒子走在前面，二妹走在後面。農民見狀說，他們離脫了，兒子歸了涂德明。

離婚，對黃三爸一家是一個極其沉重的打擊。黃三爸驚恐不安——同貧農聯姻的那根政治「保險繩」斷了！他臉上再沒有笑容。以前，他挑著滿滿一擔糞腳步都是輕快的，現在空著手步子都沉重異常，身體也迅速垮下來，明顯地一天不如一天，臉上罩著一層死沉沉的灰白。

黃二妹也沉默了。她搬回父親那間破草房。在當地，女人離了婚回到娘家是件丟人的事，況且母子分離，親生兒子歸了男方。

也許是由於父親埋怨、生活艱辛、精神壓力大，父女倆開始有了爭吵。

離婚後，二妹很少到我們這兒來玩了。偶爾來，也有些失魂落魄，臉上常常突然露出茫然無助的神情。

黃隊長開始了第二步，找機會接近黃二妹。他主動到她家幫著幹雜活，甚至幫他家修豬圈。

我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一天，黃隊長從我門前過時，我叫住他，突然說，你要得到二妹必須要做一件事。

黃隊長一怔：「你什麼意思？」我盯著他：「就這意思！」

黃隊長軟了，問我要做哪件事。我望著他的滿口黃牙，感到厭惡，於是惡作劇地說：「你必須要把牙齒刷乾淨。」

我知道黃二妹天天刷牙，沒有牙膏，用的是當地的一種青鹽。

黃隊長向我討要牙刷，我把另一個知青刷皮鞋的牙刷給他，他拿著那髒兮兮的「鞋刷」，高興地走了。

黃隊長看來會大功告成，因為黃三爸一家正走投無路，二妹能嫁給隊長大人也是福氣。

再說那個盼望「前程無量」的涂德明。

離婚後涂德明的日子一落千丈，他哪裡帶得動小孩，操持得好家務？一歲多的孩子還在吃奶，突然沒了娘自然又哭又鬧。短短的時間，家就敗落下來，整個屋子又髒又亂，一塌糊塗。拖了幾個月，涂在萬般無奈中把寶貝兒子送給他的一個親戚撫養，半個月後，兒子又被送回來，長了一身瘡，瘦得皮包骨，氣息奄奄。現在，人們再也看不到涂德明一手握煙桿，一手抱兒子，滿面幸福地坐在門檻上了。

至於縣裡來的那個宣傳隊，早在涂德明離婚三天後就消失了，無影無蹤。黃隊長自然不再提當主任的事。涂德明似乎一直都沒意識到被人耍了。黃隊長頻頻往二妹家跑，旁邊人看得明白，就他本人不能產生聯想。涂德明的弱智由此可見。

黃二妹每天上坡勞動，都要經過涂德明的家門，每次路過，她都低著頭匆匆而去，不往門裡看，也不看她兒子。

有一天，她從山坡上回來，肩上扛了一捆柴，路過曾經的家門時，兒子正在屋裡哭，黃二妹沒停步，依然低頭匆匆而過。

兒子在身後哭得撕心裂肺。

突然，黃二妹把肩上的柴往溝裡一扔，倏地旋身，像一頭母狼，發瘋般地衝進屋去……孩子的哭聲戛然而止。

聽他們講，當天晚上黃二妹沒有走。

第二天，第三天，她也沒有走。

村民們默認了她的這種行為，覺得理所當然。

（村民們自然的人性，抵禦了邪惡的「階級鬥爭」，這是黃二妹不幸中的大幸。）

家，馬上又變得井井有條，兒子身體一天天好起來。涂德明臉上有了笑容，人

們又看見他一手握煙桿，一手抱兒子，坐在門檻上，一臉富足相。

黃隊長功敗於垂成，一臉沮喪。掏鳥窩，摔得鼻青臉腫；追美人，竹籃打水一場空。

黃二妹同涂德明如此生活了半年。一天，我正坐在他們家等待二妹給我炒一種黃豆茶時，涂德明當兵的兄弟來了。他把涂德明和黃二妹叫到身前，板著臉說，你們這是非法同居，要坐牢的！一句話把涂德明嚇得半死，我見他臉都青了。二妹卻很鎮靜，看了我一眼，說：「我叫他到區上去辦，他一直不去。」

「不去？這是犯法！」當兵的兄弟嚴厲得像個法官。「不行，今天就去，馬上就走！」

於是，黃二妹抱起娃兒，涂德明跟著，「法官」走在最後，押著一對「犯人」，往區上而去……

就這樣，他們復婚了。折騰一大圈，又回到原點。

不久，城裡來招工，我便離開了那條山溝，離開了生活了三年的地方，也離開了黃二妹。

她後來怎樣了，是否還有折騰，我不得而知。離開那塊土地 33 年了，我從沒回去過。但是，我經常想起那條山溝，想起黃二妹，想起我們曾一起在地壩裡通宵守夜（照看糧食）。那月光，山風，夜色，青春的氣息……真的很美，有一種感動，有一種懷想，刻骨銘心……

採訪時間：2005 年 7 月 16 日

地點：重慶大學

採訪後記

早在 1997 年，就在一次閒聊中聽到王宗笠談起過黃二妹，正式採訪他，已是 7 年之後。

原本約定在我家見面，但待我到他家去接他時，他卻說，天氣太熱，不走了，就在他家談。

我什麼都沒帶，照相機、筆、筆記本都在家裡。只好憑腦子記，回家後立馬寫，雖然故事完整地記了下來，但缺失了王宗笠的採訪照。

十、死裡逃生的 11 歲小地主

「他們凶得很，像土匪」

講敘人：李宇熙

1940 年生

我們當地主，是中國幾千年封建制度造成的。那時，允許買賣土地，也允許擁有土地。正如現在允許私人經商，一些人又富起來了。比如我，我又擁有了一定家產。按當年的整法，我又是地主了。千千萬萬的人又是地主、資本家了。

但是，土改時把我們往死裡整，那年我才 11 歲……

1951 年我剛滿 11 歲，住在四川省墊江縣城西鄉松林村。那一年，村裡的土改搞得十分恐怖，每天把十多個地主、富農押到臺上鬥打。我親眼看見，拳頭腳尖，劈頭蓋腦，還用扁擔砍。白天鬥打，晚上關在農協會（即農民協會，共產黨土改時成立的握有生殺大權的農村基層組織）設立的牢房裡。

那 10 多個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叫曾四的老地主。他們夫妻倆都遭毒打，連續打了一個多星期，打得曾四的腦殼腫脹得像豬頭——豬八戒的頭。曾四回到牢房喝尿（民間認為喝尿可救急，治跌打損傷）。但是，他沒能挺過來，被活活打死了。

我們家也是地主，祖先叫李秀實，明洪武元年，朝廷把他從北京派到墊江縣當縣官。一代代傳下來，都是書香門弟。我父親李顯樓有很多書，也擁有收 100 多石穀子的田土。在他五兄弟中，父親最能幹。不過，他在 1946 年去世了。幸虧去世了，否則肯定被共產黨打死。

李顯樓

1950 年初，待在家鄉的有媽媽、大哥、三哥和我。

大哥李伯融是父親的大老婆生的，大我 30 多歲。他早年從軍，曾在楊森手下當過團長，後來離開軍隊，回鄉管理家產，並在城裡開了一家鹽店。他為人豪爽直率，鄉民們都很喜歡他。土改時大哥被抓起來，農協會的人拷打他，逼追金銀。大哥交不出，農會的人問：「交不出你說怎麼辦？」大哥是軍人出身，很乾脆，回答說：「你們給我一粒花生米。」（「花生米」指子彈）

農協會的人也很乾脆，把他拖出去就是一槍。

三哥李隆熙一直在外面讀書，畢業後在長壽縣政府當了一個秘書。1949 年共產黨來了，他害怕，跑回老家，以為在鄉下平安一些，不料照樣被抓起來，關押在縣城北門。媽媽編織一些雞腸帶，拿去賣了換米供三哥。他被關了半年時間，從 1950 年下半年到 1951 年初，由媽和我給他送飯。由於他一天地主都沒有當過，因此逃過了殺身之禍，但被關進了監獄。1959 年，三哥出獄，迎頭遇上大饑荒。

他沒吃的，到重慶求親友救助，可他是「階級敵人」，那個年代親友不敢幫他。

他只好獨自回鄉，在朝天門碼頭時，他撐不住了，倒下去再也起不來。三哥餓死時才 40 多歲。

殺了大哥、關了三哥之後，接著就輪到我媽（人們叫她李唐氏）。抓她時，媽估計她活不出來，對我說，家裡還有三塊錢，要我自己買點吃的。

當天晚上，媽沒有回來。我獨自跑到街上（我們村離縣城不遠）買了一塊糍粑。怕耗子吃，我把它放到一個竹凳上，用蓋子罩上。

第二天，農協會來了一大群人，「砰」地一聲一腳把門踢開，凶得很，像土匪。我看見媽媽被五花大綁押著。

農協會的人又一腳把竹凳踢翻，看見糍粑，衝我罵道：「狗日的小地主花樣多，還在屋裡整糍粑！」

他們把我家的地挖的挖、撬的撬，父親留下的幾百本藥書也抄遍了。找啥？找埋藏的金箍子（即金戒子）。

有人向農協會揭發，說解放前我媽手上戴得有金箍子。

這本來也是事實，但問題是一解放我大哥就把它拿去上繳給政府了，政府還打了一張發票。媽不懂那東西，把發票寄給我在重慶的哥哥了。

農協會的人不相信，咬定媽狡猾，天天鬥，天天打。我親眼看見，冬天裡，他們把她上衣脫光，奶子吊在外面，啪啪就是幾巴掌打去。

媽的身子腫脹起來，神智有些恍惚，開始亂咬，說金箍子在某處某處。農協會的人押著媽去找，找不到又是一陣打。有一次媽說是在柳家，找去後柳家的人勃然大怒，甩手就給媽幾個耳光……

他們把媽關押了幾個月，還是沒逼出金箍子，於是開始對我下手。農協會的彭玉祥和朱國全說，老地主狡猾，花樣多，我們整小地主。他倆把我抓起來，說：「你小娃兒要說老實話，金箍子在哪點？」我說我不曉得，真的不曉得。

他們冒火了，用細麻繩把我的兩個中指頭捆在一起，然後把我吊在半空。那個痛呀，鑽心！我幾十斤重的身子，就吊在兩根指頭上。我痛得爹呀媽呀的亂叫。他

們吊了我近 20 分鐘才把我放下來。這兩根指頭過了半年才恢復知覺。

還沒完，接下來我每次路過那個埡口，他們都要抓住我一陣痛打，罵我是小地主。那一年我才 11 歲，還是一個少年兒童。我沒有辦法反抗，每次都只有咬緊牙讓他們打。

當年鬥打地主那個恐怖，真的是法西斯！我聽媽媽講，墊江縣城裡把地主的小媳婦們脫光上衣，用麻繩捆紮乳頭，吊、拉，一些女人就這樣被折磨死了。

我們村那 10 來個地富的情況？我太小，除了親眼見到曾四被打死外，其他人的情況就不清楚了。我媽媽知道，但她已經去世。對了，我還知道一個叫楊增之的地主，他被抓來跪在煤炭渣上，同時強迫他嘴和鼻子對著尿壺口吹氣……

媽媽放出來不久，農協會就把我們房子收繳了，屋裡所有財產全部收光。我們母子倆被趕出來，全部東西是一口鍋和一把鍋鏟。我們爬到半山岩上農協會指定的一間破草房裡。那間草房四壁不全，搖搖欲倒，還有，沒水，每天必須下到坡下河邊去挑水，我媽 50 歲的人了，又是個尖尖腳（即舊時纏過的小腳），日子很難。

最難的是缺吃的。我們孤兒寡母，沒勞動力，那個餓呀。媽和我餓得抓老鼠吃，我們用棍子支一個篩子，裡面放點食，老鼠鑽進去，罩住之後燒來吃，香得很。

一天，一陣大風刮來，草房塌了，一根木頭正好砸在我後腦上，鮮血直流。幸好媽沒受傷。

媽帶著我，挨家挨戶去懇求——懇求住在別人豬圈裡。不行！我們又懇求，懇求睡在別人屋簷下，也不行。沒辦法，媽只好在野外用包穀桿搭了一個棚，再抱一些穀草當床。住在棚裡，一下雨我們全身濕透。一天，我們吊著一個罐子煮綠豆時，火星飛濺到穀草上，轉眼間，「家」就被燒得精光。

媽媽嚎啕大哭！幸虧這時天氣熱了，媽帶著我睡到村外稻田中的一條石板路上。蚊子咬顧不得了，氣人的是睡在這兒也挨罵。早上別人起來挑水，見我們睡在路上，劈頭就罵：「狗日的老地主的小地主，滾起來，莫擋我的路！」

媽和我只得趕緊爬起來躲開。

就這樣，媽還天天被喊去幹義務勞動，幹活不給一分錢，我們天天餓肚子。

我於是出去要飯，我那個樣子，早就是一副叫花子（乞丐）相，衣服又破又爛，身上又髒又臭。一天，在討飯時，一條狗竄出來咬在我腿上。傷口很快潰爛，一直爛到骨頭，周圍的肉都臭了。我痛得成天唉喲唉喲地叫。走不動，用兩個凳子支著在地上挪。還沒得吃的，就是在這時，我連續餓了四天。

我想，我活不出來了。

這時，有一個好心人，見我們實在可憐，給我媽講了一個藥方：把折耳根（即

魚腥草，一種可食用的野草）用南瓜葉裹起煨軟了包在傷口上。果然，包一次好一次。我這才活過來。

1952 年秋天，有一個山坡上的長工同情我們，讓我們住在他灶房的灰堆邊，我們這才結束了野外露宿。

這時，又發生了一件事，差點讓我又送了命。

縣城裡有一次開大會，我去看熱鬧，不知不覺在街上睡著了，醒來後發現身上蓋了兩件舊衣服。我不曉得是誰的，把衣服拿回了家。媽媽見衣服很髒，就洗了晾在外面。馬上有人彙報，說地主婆偷衣服。民兵隊長把媽抓去，媽說是我撿的。問我，我如實講了過程。隊長不依，把我關在崗樓裡，兩天不給我吃飯，我只吃了媽送來的一碗南瓜。

第二天，他們把我衣服褲子全扒了，腳尖拳頭，一邊打一邊罵：「狗日的小地主不老實！」

我除了哭還是哭。

晚上天黑後，他們去吃飯，罰我光溜溜地站在凳子上。

我決心逃跑。乘他們不注意，我飛步往外逃，黑暗中，只差一點就掉進一口井裡，驚出我一身冷汗！我在黑夜裡飛逃，一絲不掛。後來看共產黨宣傳的白毛女，她從黃世仁家裡逃出來，還穿了衣服，比我好。

其實，白毛女是虛構的，那是按照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意圖，定一個框框編造出來的。它挑起人們對地主的仇恨，讓農民拼命去給毛共打江山。

那天夜裡，我心驚膽顫，怕被抓回去打死。我跑著跑著，突然看見李家灣那所學校的操場，陡然大驚——那兒槍斃過幾個地主，血淋淋的！

我受了極度驚嚇，逃回家中後倒下一病不起。

這次病得沉重，我第二次認為我活不出來了。

的確，我同媽媽都已走到死亡的邊沿。這是 1952 年底。

我哥哥李甯熙這時已在重慶城裡參加了工作，村裡有個人在城裡遇見他，對他說：「李寧熙，你還不回去，你媽長胖了。」

「啥子長胖了？」「要死了！」但是，哥哥不敢回來。

他曾給我們寄了 10 元錢，被農協會收繳了。1952 年底又寄了 8 元錢到一個親戚家。親戚扣了 4 元去買豬，只給我們 4 元。這 4 元錢救了我們的命。媽開了路條上

李宇熙 15 歲攝於重慶

街去買了吃的。為什麼要開路條？當時，民兵在各條路上都設有崗卡，地主沒有村裡開的路條是不能隨便走動的，否則就定你個「逃亡地主」罪。

那段日子，我天天盼郵遞員，盼哥哥的信，盼寄點錢來。我給哥哥寫信，一個破折號，加三個字「哭」！「哭」！「哭」！

哥哥意識到不把我們弄出去，我們是死路一條。他反復找單位，單位終於開了證明，同意我們遷到重慶。

我們找到村裡，求村裡放我們。還好，村裡同意了。媽趕緊又去鄉裡。鄉裡不同意。那天下著大雨，媽絕望得很，幾十里路，淋著雨，一雙小腳，一路走一路哭。第二天，還得去，這次是個年輕人，他盤問了一番，看我們孤兒寡母的確難，終於把公章蓋了。

1953 年春節之後，我同媽從墊江走路到長壽，從長壽坐船到重慶。待到達哥哥家時，我們已腰無分文，只有滿身蝨子……

我們總算死裡逃生了。

（注：幾年後李寧熙被打成右派，下放長壽湖勞動改造，李宇熙又流落街頭，曾被抓入重慶楊家坪派出所。60 歲的老母李唐氏被迫出去打工，每月掙 6 元錢養活自己。1964 年李唐氏又被遣返農村，拖一雙小腳下地挑糞勞動，最後淒慘死去。這是後話。）

採訪時間：2005 年 5 月 30 日

地點：重慶市渝北區龍溪鎮

採訪後記

李宇熙是我曾採訪過的長壽湖右派李寧熙的親弟弟，在得知李甯熙是地主家庭出身時，我便請他講講他的家史。他說：「我弟弟更清楚那段歷史，你去找他吧。」

李宇熙講述時情緒十分激動，整個往事他一氣呵成，中間幾乎沒有任何停頓。可想那已過去了 50 多年的經歷在他心靈上是何等的刻骨銘心。

後來，我在長壽湖邊遇到他時，問他願不願意讓我把他的經歷錄製下來，他硬朗朗地說：「好，你來，你來我家！」

「地主」有什麼罪惡？

「地主」或者叫做「土地出租者」，出租自有土地，並從中收取地租，這種經營活動算不算、是不是一種罪惡？我認為這不是一種罪惡，而是一種正當的經營活動，就像把私有住房出租，從中收取房租是一樣的性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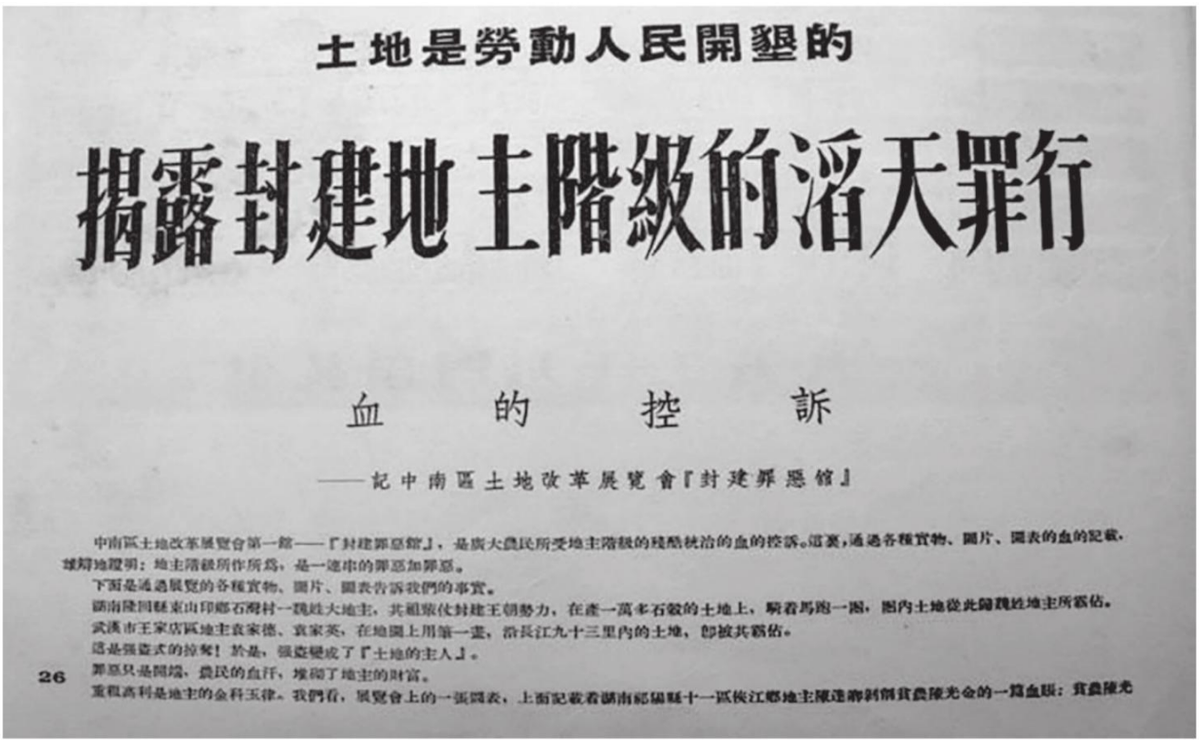
現在世界大多數發達國家包括美、英、法、德、日本等，和最近實行土地私有化的俄羅斯，他們的耕地基本上都是私有。

土地的主人，可以是自耕農，也可以雇傭農業工人。如果他們暫時不打算耕種土地，又不願意出賣土地，他們可轉租給別人耕種，收取一些租金。

這裡沒有什麼「剝削」「被剝削」的問題，更不應該是什麼犯罪行為。

如果收取地租，是剝削，那麼，把錢存在銀行裡，拿利息是不是剝削？

——孫文廣《北京之春》2004 年 7 月號


土地是勞動人民開墾的

揭露封建地主階級的滔天罪行

血的控訴

——記中南區土地改革展覽會『封建罪惡館』

中南區土地改革展覽會第一館——『封建罪惡館』，是廣大農民所受地主階級的殘酷統治的血的控訴。這裏，通過各種實物、圖片、圖表的血的記載，雄辯地證明：地主階級所作所爲，是一連串的罪惡加罪惡。

下面是通過展覽的各種實物、圖片、圖表告訴我們的事實。

湖南隆回縣東山印鄉石洞村一戶姓大地主，共租娘仗封建王朝勢力，在產一萬本石穀的土地上，騎着馬跑一圈，圈內土地從此歸戶姓地主所霸佔。

武漢市王家店區地主袁家德、袁家英，在地圖上用筆一畫，沿長江九十三里內的土地，即被其霸佔。

這是强盜式的掠奪！於是，强盜變成了『土地的主人』。

罪惡只是開端，農民的血汗，堆砌了地主的財富。

重租高利是地主的金科玉律。我們看，展覽會上的一張圖表，上面記載着湖南祁陽縣十一區俠江鄉地主陳連聘剝削貧農陳光金的一筆血賬：貧農陳光

26

中共土改的宣傳

十一、土改，我家五死一殘

講述人：馮光林

「一場土改，我們家死亡五個，殘廢一個。」

我老家在九蟒村，那是忠縣城西長江邊上的一個山村，山下長江裡有九道並列的長長的石樑，出沒在波濤之中，像九條飛動的巨蟒，九蟒村就是這樣得名的。

我父親叫馮國祺，母親叫何順賢。父親是幫熊實之「同聚福」坐櫃檯賣糖的店員，後來略有積蓄，就買了 5 石租的田，還在望水鄉開了一個造紙的小作坊，就是把竹子泡爛了製成那種很粗糙的草紙。後來家境慢慢富裕起來，發展到 30 多石租。就因為這樣，父親成了剝削階級。土改時鬥爭我父親，硬說他以前打殘了人家的腳——那個人姓楊，所有人都知道，他的腳是胎生的殘疾。他們還整了好多黑材料，不管是不是事實都要你承認。父親當然不服，不服就捆綁吊打。那些人不要天良啊，後來他們竟然把我父親槍斃了。槍斃他的那天，他和蘇達三、曹新煌等被捆綁在向家嘴的電桿上。一些過路的小孩子來看熱鬧，對他說：「你要遭槍斃喲！」他根本不相信自己會被槍斃，很坦然的地笑著對小孩子們說：「沒有那麼多槍斃的，我沒有罪，土地財產都已經交完了。」誰知過了一會，他就被押上了公審台，真的被判處了死刑，最大的罪行竟然是他說過的一句話：「你把我整死了我還有婦人，婦人死了還有四個兒，山不轉路轉，石頭不轉磨子轉。」公審員說這是反動言論，等於是說要向共產黨報仇！就這樣我父親成了冤死鬼，他死的時候只有 49 歲。忠縣很多人都說，如果馮國祺都要槍斃，那忠縣好多人都該槍斃了，他不過是個生意人。

父親死後，繼續整母親。六月間好毒的太陽哦，民兵們把我母親捆起來推到太陽下去暴曬，反復的摧殘，沒多久母親就被整死了，死時 47 歲。

我大哥一家三個都是那時死的，一個也沒活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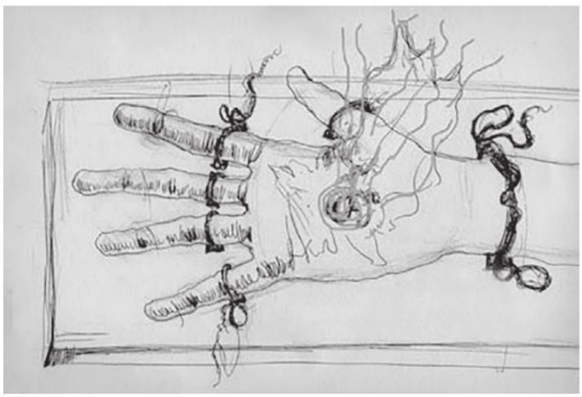
大哥叫馮光和，大嫂叫陳德珍，1948 年結婚。土改時把哥哥也捆到城裡準備治罪，結果發現他神經不做主（不正常），就放了。那時我們家全部財產已經被分完，我們沒法活下去了，大哥出去討飯，去了就沒回來，後來在望水鄉一個山溝裡發現

了他的屍體，早就餓死了。大嫂也被反復鬥爭，受盡凌辱，後來也是去討飯，在餓得不行的時候乞求一個好心人讓她吃一頓飽飯，然後就上吊自殺了。

大哥大嫂死的時候都才 20 多歲，他們留下一個兒子三歲，送給了別人，一個女兒不到半歲，還在吃奶，連名字都沒來得及取就餓死了。

鬥爭最激烈的時候，我姐姐馮光珍還在省立萬縣師範學校讀書，差一年就畢業，18 歲，她聽說土改搞得很厲害，以前每月都要收到家裡寄去的生活費，忽然沒收到錢，擔心家裡出事，就從萬縣趕回來。別人勸她不要回去，回去要遭殃，她還是要回來，這一回來就踏進了鬼門關。

姐姐還是一個在校學生，竟然也被評成地主分子。民兵們要姐姐拿金銀出來，對她使盡了各種酷刑，在夏天最炎熱的時候把她大綁起來和母親一起曝曬，一曬就是半天，繩子勒進肉裡很深，她才 18 歲，皮肉很嬌嫩，怎麼受得了，加上太陽像火一樣烤，後來繩子一解，手全是黑的。姐姐不願意給我講那些傷心事，縣裡的人都知道她被「點天燈」的事，但是她卻沒給我講過。「點天燈」就是雙手橫著捆在木板上，手心朝上，在兩邊手心裡倒上桐油點燈，等到燒乾了又再添油。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折磨，姐姐的雙手就給廢掉了。我記得，姐姐的雙手先是感染，後來慢慢化膿潰爛，蛆從裡面往外滾，老遠都聞得到臭，那時我們已經被洗劫一空，沒有錢給姐姐治傷，眼睜睜的看著姐姐的雙手一天天爛掉，先是皮肉掉盡，露出白森森的骨節，然後骨節一節節地脫掉，最後，姐姐的左手完全沒有了，只剩下手腕，右手手掌爛掉了大半，只剩下半個手心。整個過程至少有一年，要是有點錢治療，姐姐的雙手也許是可以保住的。她能活出來全靠一個鄉間的土醫生，他同情姐姐，做好事給她醫治，算是把命保住了。但是，姐姐永遠失去了雙手，成了一個殘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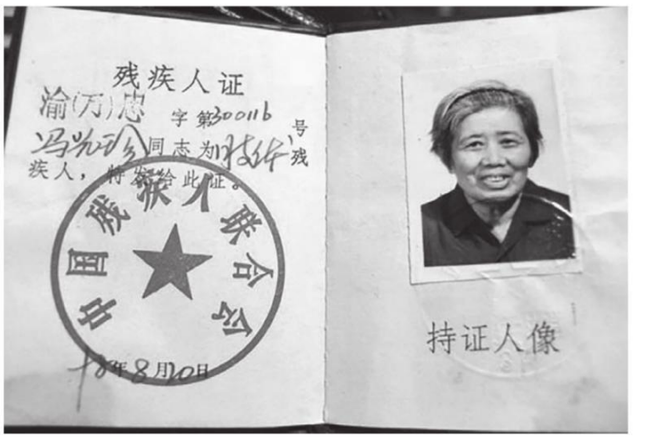
父親死了，母親死了，大哥大嫂都死了，我們被趕出來住在一個破爛的草棚裡，最要命的是沒有吃的。那時我哥哥光熙、光鈺在外面讀書，我和光惠、光林、光群都還小，我才 6 歲，姐姐成了家中最大的人。她帶著我們幾個弟妹去四處討飯，雙手傷口一直潰爛。她流著淚去乞討，要來了飯，我們就一口一口的餵給她吃，她沒有手啊，自己怎麼吃呢。那個場面，有許多好心人看了都偷偷流淚。

幸好我光熙和光鈺哥哥在外面讀書沒有回家，要是回來也就完了，也全靠他們

在外面，後來他們有了工作，每月給我們寄錢，這樣我們才慢慢度過了那段最艱難的日子。

六十年代初，我兩個在外的哥哥第一次回家來，看到姐姐的慘狀，淚水抹了一把又一把，說：「妳是怎麼過出來的喲？一家人只有妳最受罪呀。」兩個哥哥都流著眼淚對姐姐說，要把她供養到老。

那時正是天天高喊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時候，我二嫂是個畫家，回到老家也沒忘記畫畫，她在山坡上畫了幾幅速寫，竟被大隊書記認定是在畫反攻倒算圖，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他暗地裡向公社打了報告，公社正愁找不到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於是就整好了材料蓋上章寄到四川大學，要求把哥哥開除回家接受管制。那些人心好毒啊，把我們整夠了還要整我兩個哥哥。那段時間，生產隊就有人放出話來，說：「我們隊上過幾天就要回來兩個人了。」他們以為材料一去我兩個哥哥就要被送回農村了。還好，我哥哥的單位沒理睬這件事情，還讓他看了公社寄去的材料，上面有大隊書記和公社書記的名字，寫了好多條罪狀，說他們把哪塊田哪塊地都畫下來了，要「反攻倒算」。哥哥說，好危險，我再也不回去了。我兩個哥哥後來都有成就，光熙是四川大學教授，光鈺是中國音樂家協會常務書記、著名的民族音樂理論家，他們要是被弄回來也就完了。



1998 年，手殘了 48 年後的馮光珍
領到了一個殘疾證

姐姐失去雙手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都是弟妹們給她餵飯換衣，後來我們在她殘留的只有一寸多的右手掌上套一個布帶子，把勺子插在帶子裡，她就可以慢慢地自己吃飯了。姐姐本來是很靈巧的人，她堅持反復練習用殘留的右掌做事。右掌的大拇指和小拇指分別還殘留有小胡豆那麼一點，她經過無數次努力，竟然能做針線活，真是不容易。她覺得太連累我們，就儘量想法做事，有好幾年，她把毛筆綁在右手掌上，在縣城河壩最熱鬧的地方寫對子賣錢，人們都說她的字寫得好呢。

姐姐從 18 歲失去雙手，她的青春歲月也就毀了。由於她是地主，雖然已經嚴重殘疾，仍然要繼續接受永無休止的鬥爭，每逢政治運動來了，她就要受苦。

平常每月一次的訓話會她是非到場不可的。她註定一生不可能有婚姻了，因此從沒想過要結婚，直到她 49 歲那年，縣城裡一個叫朱良臣的老地主因為喪偶，託人

說媒，要娶姐姐為妻，姐姐心灰意冷，哪裡還有心思結婚，最後在別人的一再撮合下才嫁給了朱良臣。那時朱已經是風燭殘年之人，三年後朱就去世了，姐姐一生就經歷了這麼一次短暫的畸形的婚姻。

兩個哥哥非常心疼我姐姐，幾十年來一直給姐姐寄生活費，今年 2 月，光熙哥哥因中風突然去世，消息傳到忠縣時，姐姐正癱瘓在床，我說：「姐姐呀，那個供養你一輩子的光熙哥哥已經走了」，姐姐一聽就痛哭起來，說：「怎麼不死我呀。我要跟他去地下！」

僅僅一個星期後，姐姐也走了。

採訪時間：2006 年 5 月 5 日

地點：忠縣東坡路馮家住宅

採訪後記

馮光林不善言辭，甚至有些語無倫次，但是，他樸實的語言卻展示了一段血淋淋的真實歷史。

馮光林的父親，一個店員出身的人，靠自己多年的努力和勤奮積蓄了一份財產，結果，這份財產不僅讓他付出了生命，而且還給自己的整個家庭帶來滅頂之災。

馮光林家裡掛著馮光珍的遺像，她在我們到來前兩個月離開了人世。我們為沒來得及見上她一面而永遠遺憾，為未能傾聽到一個歷盡苦難女人的心路歷程而深深自責，尤其是，我們未能在她生命的最後時刻，帶給她一點心靈的撫慰。

馮光珍，1933—2006

補記：

馮光珍的弟弟馮光鈺（1935 年生）在 1949 年時因一個偶然的機會離開了家鄉（馮光珍則不幸返回了家鄉），這一走，他的一生就完全改變了。他讀了大學，後來成了音樂界的專家，著述頗豐。另外，他還擔任過中國民族音樂集成總編輯部主任及中國音協書記處書記、中國文聯黨委常委等官職。退休後，他將自己的一生寫成《歲月斷憶》一書（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下面是書中他回憶他父親及小時他父親教育他的部分文字：

家父國祺，字壽章，生於 1902 年 10 月。他成人後，在州城「同聚福」當店員。「同聚福」是一家以經營糖、油、酒、點心為主的大商號。由於父親為人忠厚

誠實、精明能幹，頗得老闆熊實之先生的賞識和信任，不久便升任商號的管事，負責掌管經銷業務。實之先生還做媒把他的外侄女何順賢許配給父親。父母成親後，母親便從城裡到九蟒嶺馮家操持家務，而父親仍每日清晨遠足縣城做生意，傍晚又步行返家。

這期間，父親因生財有道，生意越來越興盛。他除了在「同聚福」供職外，還買了些田地。開辦了「永順裕」糧油商號。此外，他還購置了一些竹林柴山，先後興辦了兩個造紙廠，生產土紙，除就地銷售外，主要運往下川東的雲陽、奉節一帶。由於品質好，在市場上頗有名氣。經過父親多年的發奮圖強，很快便把祖父衰敗的家境又逐漸發展了起來。

我童年時，父親以客家人（馮家祖籍是廣東興寧縣）勤勞刻苦的傳統對我們管教甚嚴。他將親筆書寫的清初名儒朱柏廬治家格言：「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的字幅懸掛在堂屋中央，要求我們從小就養成早起勤奮的習慣。

父親經商在州城，來回要走十餘里路，經常早出晚歸。但每日黎明即挨房呼喚我們兄弟起床，賡即盥洗和灑掃庭院。之後，便教我們到書房研墨習字，要求我們在書案前端坐如鐘，專心致志地臨帖一筆一劃地書寫。記得在我剛醒事之齡時，便臨摹《柳公權書玄秘塔》的字帖。那時我尚未啓蒙上學，並不認得幾個字，更不理解柳字帖的字文「唐故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的意思，但在父親的教導下，還是恭恭敬敬地依樣畫葫蘆。

馮光鈺 1958 年於
四川音樂學院

經過幾年的苦練，當我的習字有些起色，能把柳字的神韻模仿得大致相像的時候，父親若有所思地說，寫字像一個人的外表，古人說過「字如其人」的話，每個人寫字的體態形狀就能表現出一個人的品行來，人家看了你寫的字，即便是未見其人，也能對你的品行知其一二。他還進一步指點說，你今後要練習寫幾個很難寫好的字：如「凰、鼎」。接著就懸筆為我們一筆一畫地示範這幾個字。從此，我在臨寫柳字帖前，總要按父親的示範，練習連秀才都難得寫好的這幾個字。確實如父親所說，這幾個字真難寫好，不僅是每個字的筆劃繁多，尤其是字的間架框格也不均勻對稱，很難掌握好要領，寫出來總是不如意。父親也以此告誡說，就像做人一樣，字要寫到家不是那麼撇脫（指「容易」）的，只有扎實地練，日久才能見真功夫！他還經常用「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古訓教導我們，促使我們一定要珍惜時光，做出成績來。

十二、這是商紂的炮烙之刑啊

講述人：周康傑

原忠縣商業局職工學校教師

土改時我還是個四歲的小孩子，好多事情都沒有什麼印象，但是我親眼看到的我母親和祖母受難的情形卻記得非常清楚。那些場面太可怕了，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永遠不能磨滅的印象。

我家祖居忠縣甘井鄉芭蕉園，那是在離城二十多里的一個山村。由於家族的繁衍，老家日益擁擠，我父親就進城安了家，但是我們仍然經常回老家去，因為老祖母還在那裡。

我母親梁萬英是城裡人，1920 年生，畢業於縣女子中學，她是那個時代的知識女性，喜歡打籃球，現在我手裡還保存有她 1937 年在女中籃球場上的照片，從照片看，那時的母親青春煥發。

父親不幸患了直腸癌，為了給他治病，我們家耗盡了所有的積蓄，最後賣完了田產，但是父親還是在 1948 年去世了。那時母親只有 28 歲，她拒絕任何人給她介紹物件（對象），立志終身不改嫁，努力承擔起家庭的全部責任，贍養祖母，撫養年幼的姐姐和我。我母親如今還健在，已經 86 歲了，跟著姐姐住在雲南。

土改開始後，甘井芭蕉村姓黎的村長，叫黎幫 X（音），帶領民兵持槍進城來找到我母親，說要我母親回去分田地分財產。我外婆知道這是騙局，就不讓母親去。

黎村長反復勸母親回去分田地財產，我母親都不去。黎村長見軟的不行，就變了臉，說不去不行，是工作組叫的，然後不由分說把母親和我姐弟一起押走了。

我家已經沒有田產，不夠地主資格，工作組說：「你們曾經享受過地主生活。」地主劃不上，就劃成「破產地主」，同樣要我們交出金銀財寶。我母親據理力爭，說她不是地主，是學生。工作組說，你雖然是學生，但是你讀書的錢是剝削來的，也是地主。我母親還是不服，民兵們就開始用毒刑了。

那一天的悲慘情形幾十年來一直如同噩夢一樣纏繞著我！民兵們搬來乾柴，在我家大院的石壩裡燒起一堆大火。我們都不知道他們要幹些什麼，站在一旁驚恐地看著。我母親被推到火堆旁，民兵又一次要她交出金銀財寶，我母親還是說沒有。

這時大火已經將地壩的石頭燒得滾燙了。

民兵們失去了耐心，他們撲上來揪住我母親大叫：「梁萬英，把褲腳挽起來！」我母親不從，民兵們便如同虎狼般的將我母親的褲腳往上挽，直到露出膝蓋。

母親拼命掙扎，但是哪裡掙得脫他們的魔爪。那幾個民兵使足了勁，猛地一下將我母親強行按跪到燒紅的石板上。

只聽見「哧」的一聲，母親的兩隻膝蓋冒出陣陣青煙，一股皮肉被燒焦的臭味飄向空中。

工作組的人和民兵在一旁大喊：「梁萬英，向人民請罪！交出金銀財寶！」

母親因極度疼痛發出驚人的慘叫，臉色霎時變得慘白，當場昏倒。

我當時被大伯母抱著，被眼前的慘景嚇得哇哇大哭起來。一個民兵聽見我的哭聲，拿著槍衝過來大罵：「你這個地主崽！」邊說邊揮手猛抽我的耳光。我不知所措，嚇得像白癡一樣，哭得更厲害了。

我大伯母趕緊護住我，大喝那個民兵：「他才三、四歲的娃兒，有什麼罪，共產黨也不能打三、四歲的娃兒，你這是在犯法！」

（周康傑講至此淚水盈眶）

那個民兵還舉著槍大罵，一個工作組的人見狀把他叫住下了槍。

周康傑母親梁萬英（右）1937 年

民兵們看見我母親昏到了，就去地壩邊的水田裡提水來往我母親身上猛潑，母親居然沒有一點反應，就像死去了一樣。

潑了好久母親才漸漸蘇醒過來，這時我看見母親雙膝的皮肉已經燒掉，露出了白森森的骨頭。

這是商紂的炮烙之刑啊！母親遭毒刑，讓年幼的兒子在旁邊看，看母親的皮肉被火石燒焦，冒出青煙，發出焦臭，世上還有比這更殘忍的事情嗎？你有沒有聞過人肉被燒焦時發出的氣味？而且是你親生母親的肉！

我大伯母之所以敢於挺身而出保護我，是因為她是貧下中農，沒人敢把她怎麼樣。大伯母才二十多歲就和我大伯父離了婚，所以沒劃成地主。

我大伯父叫周成大，又叫周雨寰，年輕時先是讀黃埔軍校，後來又留學德國十年學軍事，與蔣緯國是同學，1949 年跟蔣介石去了臺灣，任海軍陸戰司令，很多軍事書上都有關於他的記載。好在大伯父早年和大伯媽離了婚，不然大伯媽就是地主，在劫難逃了。

注：周雨寰（1912 年－ 1955 年），1912 年生於四川省忠縣（今重慶市忠縣），1933 年畢業於黃埔軍校八期工兵科，1936 年入德國陸軍軍官學校受訓。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第二任司令（時任少將），身後葬於臺灣高雄澄清湖（舊稱「大貝湖」）風景區內，「國軍忠靈塔」處有周將軍墓。——《維基百科》

大伯母將我母親抬回家去，她天天去山上挖草藥搗碎給我母親敷傷口。很長時間內我母親都躺在床上呻吟，不能下床，稍微動一下就鑽心的痛。五十多年過去了，直到今天，我母親的雙膝依然是兩個大傷疤，下次我去雲南一定要去把她老人家的傷疤用相機照下來。

我老祖母也難逃厄運，那時她已經年過花甲，滿頭白髮衰老不堪。她是出身在清代的人，從小纏腳，腳只有三寸長，我們那裡叫「尖尖腳」，走路很費力。對她這樣一個老人，土改的民兵們也不放過，無數次的把她吊起來毒打，打得遍體鱗傷，還用槍逼著她在寒冬的夜裡去冬水田裡「摸夜螺螄」。摸夜螺螄只是個名目，目的是要她到冰冷的水田裡去受辱受凍。我看見祖母下身穿一條短褲，上身穿個布褂子，赤著腿下田。田裡結了一層薄冰，一踩就破了，祖母站不穩，倒在水田裡，民兵說她裝瘋，拖起來繼續摸，又倒下去，又拖起來，反復折磨。

祖母被打傷的傷口開始化膿，大伯母去山上挖草藥給我祖母敷傷口。但是祖母年事已高，恢復起來很難，而且還得繼續挨鬥。這樣，傷口就一天天潰爛了。隨著天氣轉熱，傷口往外流出黃水來，最後，潰爛的傷口裡長滿了蛆，蒼蠅、蟲子、螞蟻到處爬，老遠就聞得到一股惡臭。祖母漸漸不行了，人們把她抬到堂屋裡去停放——等死——按規矩應該是死後才可以停放在堂屋裡。那一天，我去堂屋看祖母，祖母一邊呻吟一邊對我說：「舀碗水來，我要喝水。」我舀了水送去，這是我最後一次近距離看祖母，我看見她手臂上的傷口裡流著膿水，一大堆蛆在傷口裡亂爬，她臉上凝固著一種永遠化不開的痛苦，用極其憂傷的眼神看著我，讓我感到害怕。

沒多久，老祖母就在極度痛苦中死去了。

我母親草草埋葬了祖母後，帶著我和姐姐艱難度日，後來又有許多人給她做媒，都被她婉言拒絕，其實她當時還很年輕。

我的外公是一個秀才，字寫得相當好，他幫人寫帳本。外公為人和善，口碑很好，人稱他為「梁善人」。外公沒住在鄉下，也沒有買過田土，他的那點田地是祖

上傳下來的。祖先做鹽生意，掙了點錢，那個時代認為買點田土穩當些，有碗飯吃。

當時買賣土地是合法的，國民政府的政策允許土地買賣，契約都是政府印製的，買賣還要給政府上稅，就像現在私人可以買賣房子，並給國家上稅。

但是，土改時共產黨非說地主從農民手中搶奪了土地，並且殘酷剝削農民。

工作組把外公評成地主，把他弄到他田土所在的李家岩去鬥。工作組的人啟發農民說：你們鬥倒地主，地主的田地就是你們的了，還有，把地主打倒了，他們那些東西，那些家產，全部分給你們。

就是這樣「啟發」，農民們還是有良心，鬥爭會上沒有人吭聲。於是就發展「積極分子」——主要是些年輕人。工作組的幹部對他們說：「你想要好的前途吧？那要積極鬥地主呀！你要加入共青團、加入共產黨，當幹部，到城裡去工作，就可以跳出農門……」就用這些方法來發動鬥爭。

但還是困難，尤其是那些年歲大一些的農民，他們都曉得，說：「他的田土是祖上傳給他的，他從來沒來逼過租，人都不來。我們交租全憑良心，交多少算多少，哪年我們說天乾收成不好，他就說，那就算了，不收了。還有，我們揹租去，每次他都請炊事員把酒席擺起請我們吃……」

所以，搞了好一陣，還是沒得人去鬥。工作組的人不鬥了，乾脆叫年輕人上去打，結果把外公的腳打爛了。當天那個打手回家，他父母衝著他一陣痛罵：「哪個叫你去打的！工作組？工作組啷個？！他們搞了就走了，你好孬都分不清……」

當時很多人還是講良心，沒聽工作組那一套。外公被關在倉房裡，佃戶們燒好菜，還有砣子肉，送去給外公吃。共產黨說什麼「階級壓迫」、「血海深仇」，屁！

沒人鬥外公，外公態度又好，說：「那些田土、穀子，你們拿去就是了。」於是外公被放了回來。

地主只要當時沒被整死，以後幾十年的活罪是受夠了的，沒完沒了的批鬥、改造……就說我外婆劉登芝吧。她長年累月傷心，雙目失明了，但還得寫「改造」報告，到派出所去交待：我這半年來的改造如何如何，等等。1969 年的一天，派出所的人發現有人燒了紙（祭神），一口咬定是我外婆燒的——因為只有階級敵人才搞「封建迷信活動」，而她是地主婆，典型的「階級敵人」。

外婆申辯：我眼睛都瞎了，走路都看不見，哪裡能外出燒紙嘛。派出所不由分說，認定是她，又要抓來鬥。外婆沒法，只得說是她燒的，並答應寫認罪書。外婆請了人來幫她寫。正在這時，真正燒紙的人站出來承認了。他們是彈棉花的張文強和做鞋底的吳賢慶夫婦，他們的娃兒病了，就在夜裡燒了點紙符敬神。他倆到派出所說明情況，並且叫我外婆不用寫了。嘿，你看我外婆怎麼說，她駭得顫顫驚驚的，

說：「開頭我不承認，後來派出所教育我，趙同志批評得對，我改造不好，我承認了，我要認罪，我要寫……」

你看看，我外婆被共產黨「改造」成什麼樣子了！至於土改時整地主的刑罰，那多得很。比如用篾條編個直徑兩尺多的筲箕，把幾十斤黃豆葉壓在裡面，中間挖個洞，然後逼問地主：「你還有哪些財產？」「沒得了。」「沒得了？不老實！」於是把壓滿黃豆葉的篾筲從頭上罩下去。人出不了氣，雙腳直抖，不一會就斷氣了。

收拾女的，則把褲子紮緊，將蛇或黃鱔放進去，蛇和黃鱔都是鑽洞的，從陰道鑽進去，子宮一咬破大出血人就沒命了。

總之，刑罰多，都是那個時候鬥地主時發明的，以前從來沒聽說過，也沒在書上見過。

這些事給你們說了也沒有用，出不了爐（發表不了），只是吹一吹，不吐不快。

時採訪間：2006 年 3 月 18 日

地點：重慶龍溪鎮

採訪後記

激昂之處彷彿是在怒吼

周康傑先生的耳朵有些聾，說話的聲音特別大，講到激昂之處彷彿是在怒吼。

對於那些發生在他四歲時的事情，周康傑先生一直記憶猶新。

周康傑先生從四歲起就被人叫「地主崽」並被人猛抽耳光，「地主崽」這一稱號伴隨了他很多年，直到他進入中年後，妻子和他吵架，居然還罵他是「地主崽」，他怒從心頭起，給了妻子一耳光。

當周康傑先生拿出他母親讀中學時在籃球場上的照片時，表情十分虔誠，他雙手小心翼翼地捧著照片，說：「這就是我母親。」他說，母親住在雲南姐姐那裡，不想回到老家來，因為這裡是她的傷心之地。

周康傑先生今年 60 歲，但看上去面容似乎比他的實際年齡更衰老，牙齒脫落，頭髮斑白，耳朵失聰，這也許與他在很多年裡過著「地主崽」的生活有關吧。

補記：

2006 年 4 月 26 日，我專程趕到雲南玉溪，想採訪周康傑 86 歲的母親，並攝下她膝蓋上的傷痕。

她最初答應了，但是，當我到達昆明時，周康傑來電叫我取消採訪，原因是她的女兒女婿得知此事後擔心害怕，他們還責怪周康傑，不該介紹我去給他們「惹麻煩」。

我實在不甘心——眼下還活著的「老地主」已寥若晨星，況且還是身受酷刑、九死一生的地主。還有，已經走了這麼遠了，只剩下幾小時的長途汽車。

我抱著「故鄉來客，或許能打動他們」的僥倖心理叩響了梁萬英女兒的家門。

梁萬英打開門，我剛開口說我是重慶來的，她立馬就關門。我慌忙伸過腳抵住門，並趕緊掏出她兒子的照片，說把照片給她後說幾句話就走。

我擠進門（她老了，沒我力氣大），很慶幸她女兒女婿不在家，但是，梁萬英像防賊一樣防著我。

我很狼狽地立在那兒，連聲說：「梁媽媽，我不是來給你們惹麻煩的，也不會打擾你們現在的安寧生活，做為家鄉人，擺幾句龍門陣……」

梁萬英埋頭吃飯，
不願交談（2006 年 4 月）

她說：「我沒有什麼好說的，我們解放後日子過得很好。」

說完她不再理我，自個去吃飯。

我不死心，想法套近乎，但毫無回應。最後她說了一句：「我們對共產黨沒有意見。」我長歎一聲，想到她女兒女婿回來後可能更加難堪，只得走了。

她女兒女婿是「體制內」的退休幹部，玉溪又是雲南經濟發達的富饒之地，因此，眼下她們一家日子過得不錯。

想到梁萬英遭受的不幸，覺得她更應當在晚年過上安寧幸福的日子，她和她女兒渴望這種安寧不被打擾也十分正常。他們同我都清楚，共產黨最怕也最恨有人去瞭解歷史真相，對「企圖反攻倒算」的「階級敵人」，無產階級專政絕不手軟。

我一無所獲地離開了，很理解他們，雖然覺得很遺憾。

補記：周康傑先生於 2015 年去世。

十三、從沒講過的家史

講述人：鍾定雲（莫益成）

莫益庭　嚴學珍

鍾定雲：

我本姓莫，叫莫益成，家住忠縣城內的莫家院子，父親莫樹堂，母親陳英。

父親同母親結婚前曾經有過一次婚姻，那位母親生下一個女兒——我的大姐莫益英後就去世了。我母親生了二子一女，哥哥莫益庭，我，還有妹妹莫益華。土改時我姐姐已經出嫁，哥哥 18 歲，在興隆鄉小學教書，我 8 歲，妹妹 4 歲。

這個家史我不敢講，講起來痛苦得很。

土改一開始我家就主動把財產全部交了，父親因此還被評為開明地主。但是後來還是整，總說我們還有財產沒交，還要我們交，我們拿什麼來交呢？那時候的陣仗凶（方言，即場面嚇人），天天都在吊打人，好多人被整死了。父親非常害怕，一天，他聽說民兵要來抓他，慌慌張張地把一個皮包交給我，要我放好，然後他就出門去了，去了就再也沒有回來。我幾個舅舅聞訊四處尋找，最後在長江邊上找到他的一雙鞋子，他投河自盡了。

我打開父親留下的皮包，裡面沒有錢，只有一些字據，那時我才幾歲，完全不明白父親這個皮包到底有什麼意義。這個皮包後來也被民兵拿走了。

父親死後他們就逼我母親交金銀財寶，把我母親抓到長丞河（今忠州鎮長河村）斑竹林關起來，用各種刑罰折磨。我母親受的刑就多啊，反復捆綁吊打，骨頭都爛出來露在外頭。吊鴨兒鳧水，吊起來身上還要壓一個磨礅。把兩個拇指用麻繩捆在一起，吊起打，全身都吊在兩個指頭上，母親的手指骨就是這樣吊斷的，硬是把骨頭活生生吊落了一截！他們還用麻繩把我母親的兩個乳頭捆起來吊，全身都吊在兩個乳頭上（陳英的妹妹後來看到，陳英的乳頭被扯掉）……還用豬脊毛刺進我母親的乳頭裡，乳頭全是血。還「燒油燈花」，把手燒糊了，還

殘存的莫家院子

有「吃砸酒」（把兩隻拇指捆在木頭上，再在木頭中間插木楔子）……

母親在長氹河受不了刑，哪個受得了嘛？只得說，金銀財寶在家裡，他們把母親押回家來尋找。就這樣，我最後一次見到了母親。我看到她已經完全沒有人形了，手腳都是爛的，骨頭露在外面（鍾定雲掩面流淚）。

我家已經像水洗了一樣，什麼財產都沒有了，民兵們拿不到東西，就把我母親又押到了長氹河，這一去，我就再也沒見過母親了。

沒多久我母親就被折磨死了，是哥哥去收的屍。

一〉、那段家史我不願對任何人講

莫益庭：

那段家史多年來我不願對任何人講。

解放的時候我是忠縣師範學校的學生，由於鄉下差教師，我只接受了短期的師資培訓就到忠縣官壩區興隆完小當了老師。1951 年正月初一，正是過年的時候，忽然來了幾個民兵，拿著大刀和紅纓槍走進興隆完小，我遠遠看到就知道不好了，果然，他們衝進來就抓人。那時抓人很隨便，不要任何手續。他們把我抓到忠縣東雲鄉長氹河。在那裡我見到了我母親，她像是癡呆了，見到我竟沒有任何反應，好像什麼都不曉得了，她的面色就像是從墳墓裡出來的死人，只有眼睛動一下才表示她還活著。我看見她手腳都是爛的，左手的大拇指短了一節，是被吊斷了的。

「媽媽左手指被吊斷了」

（莫益庭伸出左手大拇指比示著，聲音忽然哽咽）。

母親睡在一個破草房裡，床是簾子棍（竹棍）鋪的，只有一床又髒又爛的鋪蓋。我陪著母親住了幾天。她悄悄撩開衣服給我看，兩個乳房血跡斑斑，她說是被豬脊毛刺的，還被麻繩捆過，她又指著下身說，全被強盜們抓爛了。

正月初五那天，母親死了。當時是下半夜，我聽見她喉嚨裡呼嚕呼嚕響，像有痰，我問她：「媽媽，妳不好嗎？（方言：身體不適）」她沒有回答我，只是搖了搖頭。她握住我的手，又摸了摸我的頭，然後再次指了指自己的胸部和下身，這時她已經說不出話了，但是我知道她要對我說什麼。過了一會我再喊她，怎麼沒有聲音了？我伸手一摸，媽媽已經斷氣了。

第二天，我向民兵報告母親已經死了，怎麼辦？民兵說，你揹去埋了就是。那天下好大的雨喲，我用一個小背篼揹著母親去縣城籤子門埋，由於雨大路滑，母親好幾次從背篼上摔了下來，我流著淚又把母親揹起來，冒著雨繼續走。兩個民兵怕我跑了，一直拿槍押著我。在籤子門外，我挖了一個坑，用一床破席子把母親埋葬了（莫益庭老淚縱橫）。

莫益庭老淚縱橫

母親是民國元年（1911 年）生的，剛活了 40 歲。

母親畢業於縣女子中學，娘家是忠縣有名的書香世家，她為人淳樸正直。我們是個大家庭，我出生時家裡有祖祖、爺爺、奶奶、姑姑、叔爺、嬸娘、侄兒、侄女等，在這樣一個大家庭裡，母親從沒和誰鬥過氣吵過架，也從不搬弄是非，遇到小事就忍了，大事就交給我父親，她捨不得吃捨不得穿，一輩子勤勤懇懇，很是賢慧。解放後她對我說：「你要好好讀書，毛主席是很喜歡年輕人的，你會有前途的。」我現在還記得。

我父親的文化沒母親高，他是個生意人，從當學徒一步步走出來。我家在解放前被強盜偷過，已經沒有什麼財產了，但是對外還是硬撐起，不敢說家裡沒錢。其實我們家沒有多少田地，主要是靠父親做小生意，算不上什麼地主，土改時我們家僅有的錢財都交完了，還說沒交，有什麼辦法呢。父親和舅舅天天被弄到城關鎮去幹掃大街，埋死人之類的活。父親走投無路尋了短見，他出走那天是 1950 年農曆 8 月 13 號，為什麼我記得這樣清楚，因為他生日是 8 月 17 日，離他的生日僅有四天。他比母親大三歲。

我埋葬了母親後，那兩個民兵又把我押到了長丞河，關在母親住過的破草房裡，逼我交出金銀財寶，要我說出家裡有好多好多錢好多好多金銀，放在什麼地方。我家裡哪裡還有什麼金銀財寶，再說就是真有，我一個孩子也不知道啊。

那天晚上，他們開大會鬥爭我，院壩裡的馬燈很昏暗，可以說沒有什麼光亮，但是人很多，有的呼口號，有的喊打，有的叫把他升（即吊）起來。結果真的把我吊起來了，他們捆著我的腳趾頭和手指頭，一下吊到了空中，那個鑽心的痛啊，我身子單薄，受不了，痛得慘叫。周圍的人都在高喊口號，我記不清楚過了多久，放下地來我就昏死了，爬不起來。那個吊法厲害得很！

我的手指頭腳趾頭都吊爛了，左腳趾頭吊殘了，留下終生殘疾。我脫給你們

看……（莫益庭脫掉鞋襪，56 年前的傷痕清晰可見。）他們把我關到正月二十幾號，看我的確拿不出金銀財寶，才把我放了。我回到家中，家裡已經不像個家了，父母都沒有了，弟弟妹妹也不知去向，家裡一貧如洗，留給我們的是廁所旁的一間很小的房子，要垮要垮的。我無法生活，也無顏見親戚，只有出去討飯，最後實在沒有辦法，就去瞭望水鄉下的么姨家。在么姨家住了幾個月，覺得也不是辦法，就到忠縣師範學校去要求復讀，因為我在忠師尚未畢業。我向學校說明了自己的情況，學校竟然答應了。那時讀師範不要錢的，我的生活問題就得到了解決。三年後畢業，我被分到雲陽，從此離開了故鄉。我的弟弟妹妹是否還活著，我都不知道。

二〉、那一天，我的姨媽

嚴學珍（忠縣望水鄉農民）

陳英是我媽媽的親姐姐，我的姨媽。土改時有一天，民兵把她押到我們家來，他們說，陳英交代，金銀財寶放在我們家裡。那些民兵（都是當地的農民），在我們家翻箱倒櫃，連床下都挖了這麼深。哪兒有什麼金銀？

我媽說：「姐姐，妳怎麼說金銀藏在我這裡呢？」姨媽哭著說：「妹妹，我活不了多久了，我想見你最後一面，只有這樣我才能見妳。」

民兵沒有找到金銀，他們不敢打我媽，因為我媽是軍屬，我哥哥嚴學智剛當兵去抗美援朝了。於是他們就把姨媽往死裡打。我親眼看到，她已經走不走動了，是拖起走，拖到地壩跪起打，那些農民打人氣力好大。那一整夜姨媽都跪在地壩挨鬥打，要她交金銀。他們倒桐油燒她的手，叫「燒燈火」，在手心這兒點火燒，手這些地方都燒爛了。我媽說，姨媽的奶子頭都被吊扯落了，她後來向我的幾個舅舅說起就哭。

姨媽整死後民兵還把她兒子（莫益庭）抓到長氹河逼金銀。莫益庭也被關押了幾個月，他腳這些地方都是被桐油燒爛了的，他後來在我家休養了幾個月才走。

三〉、我在鍾家隱姓埋名幾十年

鍾定雲：

父母死後，哥哥下落不明，家裡只剩下 8 歲的我和 4 歲的妹妹。留給我們的那間小破房子裡連床都沒有，我和妹妹晚上就靠在牆角過夜，冷得牙齒打顫。妹妹雖

然小，可是很懂事，我把衣服脫給她，她又拿來蓋在我身上。白天我們兄妹就出去討飯，出去討飯更苦，狗咬，蚊子咬，心腸好的給一點飯，心腸不好的拿棍子打我們。寒冬臘月打霜下雪，我和妹妹只有一身單衣服，又破又爛，光著腳，又冷又餓，那個日子無法形容。而且我們怕得很，話都不敢說。討到一點飯，我妹妹都讓給我吃，哪怕是一點野菜，也讓我吃，她就有這麼好的心。我父親的一些朋友在街上見到我們兩兄妹，不敢接濟，怕受連累，那些日子硬是不敢回想，這麼多年來我也不敢對人說。

這是一張在網路上感動了無數人的照片。六十多年前，它真實地發生在鍾定雲兄妹身上。

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我想，我和妹妹不是餓死就是凍死。那天，我們在河壩鐵匠爐討飯，遇到一個中年女人，她仔細看了我妹妹很久，說願意收養她。妹妹卻捨不得我，不願去。

我說：「妹妹，妳去吧，沒辦法，要生活，一點吃的都沒有，活活餓死呀？」妹妹哭著跟那個女人走了，一路走一路回頭看我，走多遠都還望著我……（鍾定雲說不下去，淚水湧上來）走多遠都還望著我……

那個女人是往長江上游方向走的，她姓什麼，住哪裡，我都不知道。從那天分手後，我再也沒見過妹妹了，後來找也找不到了。我估計她活不出來，妹妹生下來就沒有過幾天好日子，她從城裡被帶到鄉下去，做不來活路（農活），她被帶走時只有四歲多，她要嘛是受虐待而死，要嘛是餓死，要嘛是病死，只可能是這三種。妹妹肯定是死了，我每年七月十五和正月初一都要為妹妹燒紙，我忘不了她。

妹妹走後，我們這個家只剩下了我一個人，社會壓力大，我怕得不得了，話都不敢說也不敢問，怕別人曉得我是地主子女。後來，一個挑軍糧進城的豐都縣董家場的農民把我帶走了，他把我交給一個姓胡的鐵匠餵養，因為鐵匠沒有兒子。

我是城裡的孩子，做不來農活，連放牛都不會，姓胡的鐵匠就又把我轉給了忠縣凌雲鄉岩坪村鍾家灣一個姓鍾的農民，我就是這時改名叫鍾定雲的。鍾家有三個女兒，沒有兒子。我在鍾家隱姓埋名幾十年，閉口不提以前的任何事情，鍾家的養父去年去世，活了 90 多歲，老人到死都不知道我的真實身分。我不敢講，怕暴露我地主子女的身分，那真的是恐怖。你們年輕不曉得喲，地主子女在農村，一句話不對頭，劈頭蓋腦就是一頓打，拉去鬥，所以我什麼話都不敢說，心裡是整怕了的。

養父挑米進城，曾經把我帶進城去，我走到下南門，就想起我的家，從下南門

往那條熟悉的巷子上去，就是我外婆家的「春華秋實」大院子，再往上，就是我們莫家院子，只要從下南門路過，我就禁不住站著往巷子上面望，但是我不敢說，那種心情啊。

養父很窮，講階級，脾氣也暴，畢竟我不是他親生的，但是，他還是讓我上了學，我很感激他。1961年，我進了三匯中學，有一天，我在學校裡看到一個人好面熟，經過我悄悄觀察，斷定她就是我離散十年的姐姐莫益英，當時我好激動，但是我馬上就害怕起來，我不敢和姐姐相認，我怕暴露了自己的地主子女身分，我恐懼得很。

姐姐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出嫁了，姐夫叫苟遠達，當時是三匯中學的老師，姐姐跟著住在學校裡。姐夫在眾多學生中發現了我，他回家對姐姐說，有個學生好像莫益庭的樣子，連動作神態都像得很，但是又姓鍾，不知是怎麼回事。姐姐聽說後也暗暗來觀察過我，也不敢貿然相認。

一直到初中畢業，我都沒有勇氣認我姐姐。十年了，我沒有親人的任何消息，忽然見到姐姐，而且在同一個學校裡，是多麼歡喜啊，可是我卻將歡喜壓在心裡，硬是嚇成那個樣子，怕！這種心情現在哪個還能理解？

畢業回家後我結了婚，但是心裡還是經常想著姐姐。我將這件事悄悄告訴了我的老婆，她對我么舅子說了，么舅子來勸我，要我去相認，我還是不敢，怕呀。

我終於鼓起勇氣去三匯中學認姐姐了，我們姐弟哭得說不出話來。姐姐這時才知道小妹妹在十多年前就沒有下落了。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姐姐告訴我，哥哥還活著，在雲陽縣教書。

我馬上給哥哥去信，很快就得到了哥哥的回信，我好高興。我又得知，外婆家還有人，么舅還在。

我藉口進城賣薑，去城裡找到了么舅，么舅喊了我一聲「莫二」（小時人們都叫我莫二），就眼淚直流。通過么舅我又找到了么姨家的人。就這樣慢慢找到了許多親戚。

這一切我都不敢讓鍾家知道，否則我貧下中農的身分就保不住了。

我恨不得馬上到雲陽去找哥哥。

我和老婆商量後，想法撒了個謊，就進城趕輪船到了雲陽。哥哥是在離城很遠的梅峰小學工作，我到了雲陽不知道怎麼走，正當我在車站抬頭看牆上的地圖時，旁邊有個人說他也是往那裡走，我就跟著他走，路上我把隨身帶的餅子給了他兩個，他很高興。記得爬上一個埡口還走了好久，在中午12點的時候才到了梅峰小學。哥哥見到我已經不認識了，分別時我才八歲呀。哥哥看見我提著一罐忠縣豆腐乳，猜出我是忠縣來的，仔細看，樣子和他相像。我們兄弟相見，那才是又悲又喜，雙雙都哭了起來。

莫益庭：

1963 年，我和弟弟聯繫上了，我寫信叫他來，弟弟最初還不敢，因為那是毛澤東時代，講階級鬥爭。後來他悄悄來了，當時我在梅峰小學教書，我們兩兄弟在小學見面，不敢在學校說話，那個時候不敢公開說家裡的事，我們躲到後面的山坡上抱頭痛哭。我說，我現在多一個親人了，但是我沒法幫助他，我一月只有 30 多元錢，還要供養妻子的家，我只得把我買的公債券給了弟弟。第二天我請假，帶弟弟到團壩鄉去見我家人，那時沒車，要走一天路，住一夜，又趕回梅峰小學。弟弟不敢久留，我們匆匆就分手了。

以前那些事難得說，剛解放時，忠縣有名的大老闆楊星五還舉個旗旗去歡呼遊行，說現在太平盛世來了，結果後來飯都不給他吃，還是把他整死了。忠縣整死的好多呀！

我本來寫了點東西，不敢郵寄，怕郵局檢查，我是怕呀，怕弄得不好，到這把年齡把飯碗整脫了。

採訪時間：2006 年 9 月 23 日 /5 月 5 日 /12 月 3 日

地點：忠縣拔山鎮 / 忠縣吊鐘壩 / 雲陽縣大雁路

採訪後記

這篇文字採訪的對象是三個，時間前後跨越三個月，空間跨越數百里，不過，講述的卻是同一個悲劇。

鍾定雲（莫益成）住在鍾家灣一個很偏僻的山林中，一路上荊棘叢生。到了鍾家灣，他卻不在家，幾經周折，找到他時已經是下午在 10 多公里外的地方。

從 8 歲抱養到鄉下後，鍾定雲已經在農村度過了 50 多年，他不善言辭，十分悲慘和感人的往事他簡簡單單幾句話就交待了，但是，他講到他同妹妹分別時流出的那一行老淚，卻讓人刻骨銘心。

鍾定雲家

鍾定雲說，他在雲陽的哥哥更清

楚母親慘死的經過，於是，兩個月後我們來到雲陽縣。

老人說到當年的經歷，老淚縱橫，但一看到照相機，他的面部神經忽然緊張——他害怕。

「我是怕呀，弄得不好，到這把年齡把飯碗整脫了。」

補記：鍾定雲已去世，時間不詳。朋友陳先生為此篇採訪出了不少力。

十四、父親還是被殺了

講述人：謝啟宣

1934 年生

我父親謝時寬，又叫謝輝，畢業於楊森部隊的軍校，1949 年前他是部隊裡的一個軍官，也當權，管好幾個區。在我們謝家灣，他買得有 100 多畝田土，因此也是地主。

共產黨快打來時，他的一個親戚專門回來叫他走，那個親戚是國民黨財政部的副部長，在漢口同董必武有關係。父親不走，他捨不得這個地方，他說，中國這麼多人都能活，哈哈哈，他就是這樣遭了的。共產黨的部隊來之前，他還帶人去接——把共產黨的部隊接到萬源來。

正因為如此，頭兩年沒整他，土改時他回來做莊稼。當時我初中快畢業了，還考起了土改工作組，我有文化，他們需要人搞查田評戶。父親不要我去，他說最好不要跳到政治舞臺上去，政治上雙方爭鬥，總有一方對你不滿，於是我就沒去。農民對他很好，因為他一直做善事，也肯幫助人，最初殺好幾批人都沒有他。

謝啟宣（50 年代）

土改搞得凶，有個叫馮立朝（音）的大地主被駭死了，我堂哥謝啟善自殺了，有一個姓熊的女地主被抓去鬥，冬天往她身上潑水……

沒收地主「五大財產」也整得徹底，什麼都收繳：房屋、土地、家具、衣物、鋪蓋、農具……一個銅茶壺也要拿走，連飯碗都收繳，全家按人頭一個人只留一個碗。那個工作組長是個文人，他叫我幫他寫土地證，他給我們家留得還算可以，他見我家有一套《古文觀止》（那是我父親的），還有《三國演義》，他沒要《三國演義》，把《古文觀止》拿走了。

我父親後來還是被殺了，那是 1952 年 2 月，在萬源城裡打的。我那時已經 17 歲了，親眼見到，那一批打了十多個，嚇死人了（頭一年臘月還打了八個）。打我父親安排在凌晨，我去收的屍，當時天還沒亮。為啥在那個時候？他們怕農民去保

謝時寬

他。父親為人很好，不僅沒得人鬥他，他被關押後，很多人，包括我們這條溝裡的農民，紛紛都要去保他。這些都是貧苦農民，當局不好說什麼，於是就在夜裡下了手。

那時打（殺）人隨便得很，吼你怎樣就怎樣，不由你分說，當了點權的都殺，一個保長都要槍斃，清匪反霸打了那麼多，土改又打了那麼多。農村裡惡一點的，推出去就打了，群眾一吼，喊殺就殺。當然，群眾要喊保（即「刀下留人」），也可能保下來。我有個老師，已經插了標牌，推進了殺場，群眾堅決要保他，於是就把他推到一邊，說，莫忙打，調查一下再打，先判他一個緩期執行，打下一個。

我老師運氣好，這一「調查」，就遇到上面政策變化，上面覺得人殺多了，要寬鬆一下，老師因此撿回一條命。

那個年代，一個階級要推翻另一個階級，要殺人，莫得辦法。

採訪時間：2007 年 12 月 1 日

地點：四川萬源縣太平鎮水窩子村

採訪後記

曾聽一位同事提起，說在她的老家有一個地主，具體情況不詳。想到還活著的地主已經極少，於是我專程去了四川萬源縣。

到縣城後，搭乘一輛摩托車，沿一條坑坑窪窪塵土飛揚的山路，顛顛簸簸來到了大巴山裡的謝家灣。

可惜，該「地主」已不是真資格的地主，而是地主的後代了。更可惜的是，謝「地主」不僅耳朵聾了，而且對那段苦難也淡忘了。說起他父親的冤死，他看不出一點痛苦，「哈哈哈」地笑幾聲，說：「那個年代，一個階級要推翻另一個階級，要殺人，莫得辦法。」

初中時的謝啟宣（前排左二）

兩個多小時採訪，謝「地主」要

嘛聽不見，要嘛答非所問，要嘛覺得沒什麼好說的。

大巴山的寒風，呵呵作聲，土屋裡的熱爐，溫暖怡人。過去的，早已過去，眼下的日子，還要熱乎乎地過。聽不見也好，淡忘了更佳。慶幸的是他居然還保存有一張他父親的照片，在經歷了那麼多殘酷的歲月，一個「階級敵人」的照片還能完好地保存下來，這在我對土改的採訪中還很少遇到。

謝啟宣的土房

河南省某縣桑莊區桑莊鄉農民分到了 105 頭牛。選自《中南土地改革的偉大勝利》

十五、我覺得最慘的就是……

講述人：謝啟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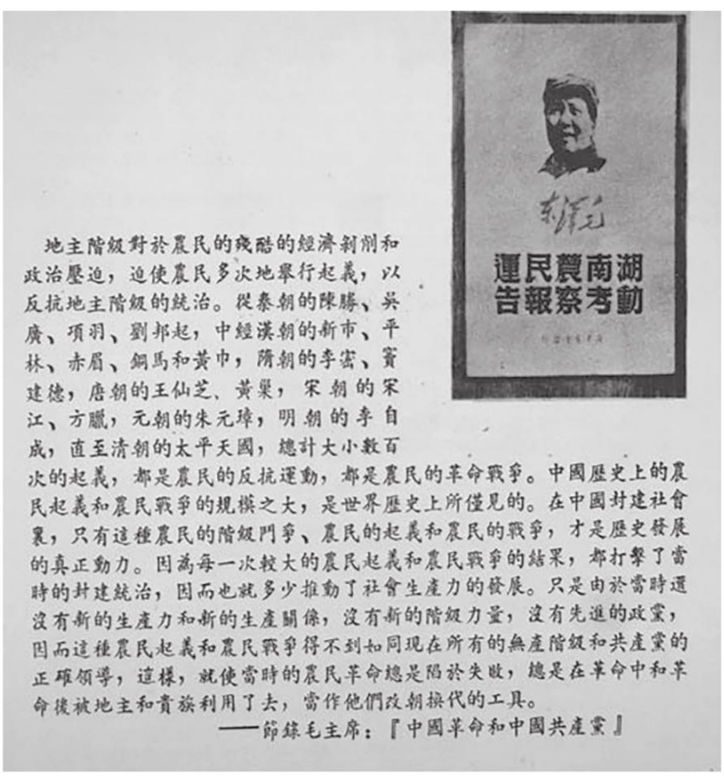
1946 年生

土改時我們謝家灣劃了兩個地主，一個是我大伯謝時寬，另一個就是我老漢（爸爸）謝時登。大伯 1952 年被鎮壓了。

大伯死時我才 7 歲，他是凌晨被打的，當時我們都曉得他要被打，我爸找木匠給他做了個棺材，安排了幾個人去把他弄回來。奶奶拉我去看，大伯當時大約 40 多歲，身材很魁梧，河壩的謝啟明正在給他掏嘴裡的沙子。

大伯這個人，對人非常好，村民有什麼事需要幫忙，都去找他，我們這一溝的人，哪家沒得吃的了，貧困了，他就叫他們去他家拿糧食。共產黨要殺他，村民都要去保，於是就在夜裡把他打了。共產黨要推翻國民黨，那沒得法，必須要那麼做（殺人）才行。

我老漢沒被鎮壓，但受了幾十年的活罪。他被打得慘，腳尖、耳光、烤火……



烤火就是跪下來，把衣服脫了，前面架起柴，烤。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他終於受不住了。

有一次他被打得鮮血淋淋的回來，決定不活了，要去跳井。我攔住他，我說，你這麼長時間都活過來了，現在活不下去了？你死了還不是白死了，我們還有這麼幾弟兄，怕啥子，你活不起了我們幾兄弟養你。我們守到他，不讓他尋短，他這才活下來。

那幾十年我們最慘的就是一年到頭辛辛苦苦掙的那點血汗錢全部被收繳。我們家有四弟兄，

還有個姐姐，我們全都很勤勞，尤其是我姐姐，沒日沒夜的幹。到年底，我們全家扣除糧食款，還有七、八十元錢。隊上幹部覺得，地主子女還有幾十塊錢的收入？不行！於是他們隨便找些理由把錢收回去。比如，說我爸爸出工不走前面，走在後面，拖了時間，影響了做莊稼，因此要賠多少錢。還有，說我們砍了山上的柴，要多少多少錢，這麼一算，遭了！一年的辛苦全沒了！那時一個勞動日才 2 角多錢，我們全家一年到頭才收入 70 多元。我們隊上那個主任心是爛完了的，他甚至說，你砍了二隊、三隊的柴，給他們繳錢去。我們地主子女，不敢吭聲，明知是冤枉，也得乖乖地送去。對方的幹部莫名其妙，問，這是啥子錢？我只好說，我好久好久把你們山上的柴砍來燒了。我記得他們都忍不住抿著嘴笑——有人平白無故送錢來！

「辛辛苦苦掙的那點血汗錢全部被收繳！」

我大伯家也是如此，收入被同樣的理由刮走。這種事不是一年、兩年，而是每年都這樣。不幹還不行，幹了又白幹，無論你幹多少，幹到年底，他三五下給你一算，編個理由一下子把你的血汗錢刮走。我覺得最慘的就是這點！說地主剝削、欺壓，這算什麼？其實，當年很多地主都是省吃儉用，辛辛苦苦多年才買了點地。我知道有一個姓傅的地主，他女人叫唐世珍（音），熬更守夜，天天一大早就起來上坡下田地勞動，省吃儉用掙了點錢，才買了點地。

我們家只有我奶奶寇向文（音）在 1960 年餓死了，我老漢都活到 1986 年。

我們能活下來全靠我們一家人都很勤勞，草草樹根都弄回來吃。

還有就是他們隨意整人，地主子女嘛，說你啷個就是啷個，是不是事實不管，沒得的事給你栽起，三天兩頭給你編一個。比如，問你是不是偷了什麼什麼東西，你說沒有，劈頭蓋臉就是一頓打，打得你鼻血敞起流。我的大舅也是地主，我親眼見他被打在地上起不來。有的地主精靈（聰明），說什麼立馬上就承認。我老漢不，沒得的事他就不承認，不承認馬上就打。

那時，不管你犯沒犯法，只要有人吼：「把地主拉來整！」「要得！」立馬就拉來跪起，腳尖耳光地一陣亂打。我們一聲都不敢吭，毛老頭（毛澤東）的政策把我們教乖了，只幹活，什麼話都不要說。

我今年 62 了，想起那些年，真不曉得是啷個過來的，那個時候的人呀，硬是（忍）受得，現在的人才過不下來那種日子，情願死都不那樣活。我說呀，我要是

會寫小說，我們那些年的遭遇，要寫這麼厚兩本！

採訪時間：2007 年 12 月 1 日
地點：四川萬源縣太平鎮水窩子村

採訪後記

謝啟軍老人是謝啟宣的堂弟，採訪他依然比較艱難，除了他的耳朵同樣比較聾之外，他對以往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還表示「不堪述說」。費了一番周折，他才斷斷續續說了一點片斷，距他說的「可以寫兩本書」的內容相去甚遠。

我坐在他家門口，房門大開，大巴山的冬風一陣陣刮來，山頭上雨意迷濛，四周籠罩著淡淡的淒冷。

萬源，是當年紅四方面軍的革命根據地，70 多年前那場著名的「萬源保衛戰」就發生在這兒。當時，僅有 20 萬人口的萬源就有 2 萬多人為「翻身解放」參加了紅軍，更有無數巴山兒女為「共產主義事業」獻出了生命。

這是土改時中共的宣傳。現在還可以這樣呼喊嗎？選自《中南土地改革的偉大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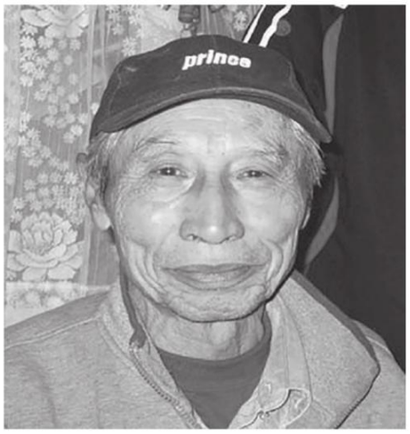
70 多年過去了，地主們早已被消滅乾淨，萬源卻依然是一個貧困縣。

在萬源的幾天裡，我聽當地的人說了一大堆萬源官場的腐敗、法院的黑暗、員警的專橫，以及房屋被強拆後上訪草民的悲慘。

從謝家灣返回縣城後，我在暮色中登上了馱子山公園，趕在那「萬源保衛戰博物館」關門前進去匆匆看了一眼。

出來時，山風陣陣，地暗天昏，腳下，萬源縣城在群山的環圍下幽幽地閃著淒寒的光……

十六、我們夫婦的母親都是自殺身亡



講述人：盧國柄

1933 年生

我父親盧邦定是盧漢（即盧邦漢，1945 年任雲南省主席、省保安司令兼軍事倡議院上將院長。1950 年後擔任過雲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等職）的弟弟。我爺爺奶奶生了 8 個兒子 3 個女兒共 11 人，11 人中的 7 個都在 20 多歲就去世了，其中包括我父親，他拉肚子拉死了，去世時才 26 歲。所以，1949 年共產黨打下天下時，我們盧家 11 個子女中只剩下老大盧漢、老三盧邦彥、老七盧邦基和盧漢的妹妹盧邦純。

我們老家是雲南昭通，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祖父去世時分了家，一人分一份產業，包括房產、地產、現金。我因父親去世得早，也分了一份，但我當時在昆明讀書，產業交給七伯父管理。

土改時我們盧家的人都沒在昭通，周保中（抗聯司令，雲南省軍政委員會副主任、省政府副主席和昆明市軍管會副主任）同盧漢有往來，他不便叫盧漢回去，於是把七伯父盧邦基找來，叫他代表大哥盧漢回去完成減租退押——他當時以為我們還沒分家。他問七伯父有什麼困難沒有，七伯父說，困難沒有，但若要把我抓去吊、打，我身體不好，受不了。周保中說：「這個你放心，你去了之後不要『二氣』（我們雲南話，不要傲氣的意思）就行了。你老老實實的，叫你怎樣就怎樣，吊打的事我會通知他們。」

七伯父回到昭通，農會到哪個村去開會鬥地主，就把他叫去一塊鬥。他們喊，盧邦基，你的剝削帳是多少多少，是不是這麼回事？七伯父連連點頭：「是是是，我回去就把錢給你們匯來。」反正說什麼都全部承認，老實接受批鬥。批鬥的人說：「好好好，你們看盧家表現好，你們就要像這個樣

盧國柄保存的盧漢的兩張照片

子。」接著鬥其他地主。七伯父果然沒被吊打。

我三伯父盧邦彥是工商業兼地主，他雖然有點地，但他從來沒去經營過，把他弄回去鬥，他連哪塊地是他的都認不得。他在前邊走，邊走後面的人邊用竹竿打他屁股。他穿的長衫子，竹竿打在衫子上也沒什麼，但是他氣得不得了，回來後好幾天飯都不吃，他從沒受過這種侮辱。後來文革時又抄他的家，又受辱，那是後話。

土改時只有我大姑媽盧邦純死了，她挨鬥，被折磨死了。

不過總的說來，因為盧漢起義，他們手下留了情，我們盧家沒有吃大虧。但是，我們盧氏家族除了我們這一支，其他都遭得慘，都槍斃了。我叫姑奶、么奶的，都被殺了。她們都是非常斯文的人，彬彬有禮，從沒作過惡，只不過收點租，吃口飯。

還有我妻子龍雲瑞的母親陳玉貞也是土改死的。解放前幾年，別人幫她在西山睡美人腳下買了塊地，準備在那兒修房子，結果還沒修，有家農民就租來種了莊稼。種了沒多久就解放了，租也沒收到什麼，大概幾斗米。土改一查，那塊地是她的，她膽子很小，以為算剝削帳，該多少賠了就算了。那天殺人，殺華庭寺的當家主持，他是個和尚。滇池邊西山半山腰上有個寺廟叫華庭寺，山腳那些土地全是華庭寺的廟產，寺廟主持就算是大地主。那天還殺了一個姓段的鄉長，都沒宣判，工作隊領著當地的農會，說殺就殺了。

殺人時，把陳玉貞也抓去跪在殺場上，她以為也要殺她，但殺了主持後沒殺她，她回來後嚇瘋了，第二天跳翠湖自殺了。她死時龍雲瑞才 18 歲，她本人還沒滿 40 歲。

前排左一為陳玉貞

盧漢當時也在昆明，但那個形勢誰也沒辦法，他掛了個雲南省軍政府副主任的名，自己都不一定保得了，管這事不是給自己找麻煩？

我母親楊瓊英也是地主，她逃過了土改，但沒逃過文革。文革時好像說要打仗，出身不好的，地主呀、反、壞、右呀，統統要遣送回老家。上面已經通知了，兩、三天就要走。我母親想不通，偷偷吃安眠藥自殺了。她死時才 49 歲，母親只比我大 16 歲。

在我們老家昭通，被打死的地主多得很，我知道的有一個叫李立綱的地主。李家發家大概是在清朝同治、咸豐年間。李家的祖先是一個叫李躍（音）的人，他最初幫人挑擔子，從

楊瓊英

四川宜賓挑一種蟲子（注：蠟蟲）到昭通。這種蟲子放在樹上可以生一種黃白黃白的蠟，這種蠟據說用在工業上，具體我就不懂了（注：白蠟）。當時從昭通到宜賓要走 12 天，李躍往往返返地跑，先幫人，後自己幹，慢慢發了家。

傳到第三代李立綱時，李家已是昭通的大富豪，當時昭通有整整兩條街的房產、鋪面都是李家的。昭通在解放前算不錯的，它是四川到雲南的交通要道，抗戰時特別繁華。

我們盧家同李家有交往，李立綱同七伯父常常往來。小時我到李家去玩，看見他家貢桌上有個玻璃箱箱，有這麼厚，這麼寬，裡面供著一根扁擔，扁擔上用紅綢紮著一個十字。供這根扁擔表示祖宗是靠這根扁擔發家的，後輩兒孫要記得勤勞致富，不要忘本。

土改時李立綱被槍斃了，他媳婦（妻子）被抓來鬥打，把手指甲都燒掉了。

李立綱的女兒曾經在我們體委打籃球，後來她嫁了一個華僑出國定居了。

在昭通還殺了龍雲（滇軍將領、雲南省政府主席。1950 年後曾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第二、三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的三兒龍繩曾。龍繩曾又叫龍三，他解放前作過一些惡。因為龍雲的原因，龍三反蔣。1949 年，龍繩曾起了義，起義後擔任了昭通警備區副司令。一天，解放軍突然把他家包圍起來，衝進去拖出龍三全家，包括保姆、丫頭、煮飯的、做雜工的，全部殺了，栽誣了他一罪名——「叛變」。

龍三家就在城裡，四周都是解放軍，他叛什麼變？後來龍雲回到昆明，周保中對他說：「龍繩曾叛變，被我們解決了。」龍雲半天沒說話，最後他說：「龍繩曾不服管教，你們把他解決了我沒得意見，但是他的老婆娃兒、他的家屬有什麼罪？」周保中一下子呆了，答覆不出來，只好說：「唉呀，這是我們下邊的人處理的，具體情況我們不清楚，我們回去查。」

為什麼要殺龍三？後來落實政策查檔案，查出什麼原因？要揭開昭通階級鬥爭的蓋子，必須要殺兩個人：一個是龍三，另一個是也起了義的國民黨昭通公署專員安純三。圍剿時安純三逃到昆明，他自首後進了監獄，後來死在獄中。

我認為，共產黨土改的做法過頭了。原因很簡單，現在動物都要保護，人怎麼隨隨便便就拿來槍斃、抓來殺？從人性上說這是沒得人性。如果一個人有罪，通過法律，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做為地主，把土地交了就完了嘛，不要侮辱人格，吊、打、跪、鬥、殺……這些都是不妥的。現在看來，土改，包括鎮反，都過頭了，殘酷！最近我看了一本書，《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看後我覺得它的內容是令

人信服的。老毛這個人，現在還有人崇拜他，其實這個人最沒得人性，是個殘暴的、不仁不義之徒！民主人士幫著共產黨說話，反對蔣介石，共產黨當權後把人家打成右派，這叫不叫不仁不義呢？對老百姓不施仁政，餓死幾千萬；國民黨舊政人員，殺的殺，關的關……我看，老毛是個歷史罪人。

盧漢1974年去世，他後半生那20多年裡，一聲不吭。他不敢吭聲。我們去看他，都住在他家裡，他什麼都不說。他能改變什麼？

這輩子，怎麼說呢？說難聽一點，我們心理上有陰影；說好聽一點，我們這些人都很堅強。堅強才能克服這麼多障礙，這麼多困難，活到今天。這幾十年的日子，緊緊張張，驚驚惶惶。不過，從某種角度上說，我們這一代人是最幸福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見多識廣，什麼事我們都親身經歷過了！哈哈哈——

採訪時間：2007 年 12 月 18 日
地點：雲南省體育局家屬宿舍

採訪後記

又一次失業一年半後，我到昆明尋找工作，在這兒偶然遇到了盧家的後代，51歲的盧堯生，並得知他外婆土改自殺、婆婆文革自殺。同時，也得知他父母還健在。於是，我第二天晚上便登門拜訪了兩位老人。

盧堯生的母親彬彬有禮地送上一杯茶後便退回臥室不再出來，我很失望，沒能聽到她的講述和感受。幸而他父親盧國柄老人很健談，一一講述了那逝去的一段歷史。

年輕時的盧國柄

本篇照片由盧國柄提供

十七、一張收條救了我爺爺

講述人：段 X

我是雲南滇西 XX 縣人，我爺爺段 XX 是當地的富豪，在 XX 縣有很大的產業。

1936 年 4 月，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率領紅軍二、六軍團來到 XX 縣，四下徵糧徵物。為保一方平安，我奶奶蘇 XX 代表縣婦女協會給賀龍的部隊送了一大批物資，有鞋子、布匹等等。為了回去對協會有個交待，奶奶要求紅軍打個收條。紅軍給了收條，據說賀龍還簽了字。收條是直接開給我奶奶的，上面寫著我奶奶的名字。

當時，她絕沒想到這收條十多年後會救我爺爺的命。

土改時，我爺爺和他弟弟都被抓起來。爺爺的弟弟（他叫段 XX）沒多久就被槍斃了。接下來就要輪到我爺爺，我奶奶急得要死，不知怎麼辦好，危急中，突然想到那張收條。她慌忙把收條翻出來，拿著收條找到土改工作隊，說當年我家就支援紅軍，有收條為證。工作隊的人看到收條，認為我家雖是剝削階級，但對革命有功，因此刀下留人，放了我爺爺。

我們家不算遭得慘的，在雲南，土改的血腥多得很，不要以為少數民族地區會好一些，其實，少數民族地區土改的血腥和荒誕一點不亞於你們內地漢族地區。

就說荒誕吧，我當年在工地上勞動時，認識一個「撿來的地主」。解放前這個人是一個幫人趕馬的苦力，有一次在趕馬途中遇到土匪，主人被打死了，他趕的馬隊有七匹馬僥倖逃出來，他將七匹馬和馬上馱的茶葉趕回了家。回來沒幾天就解放了。土改時，因為這七匹馬和茶葉，把他劃為地主。在工地上勞動改造時，他唉聲歎氣地說，解放前我一輩子受苦受累，無意中撿回幾匹馬，劃成地主，解放後又是一輩子受苦受累，還挨打受氣……

還有，我認識一個地主的後代，他們一家極其悲慘。土改時大人被殺了，留下七個娃兒，三年饑荒到來時，除了一個姐姐在城裡讀書，待在農村的六個娃兒中餓死五個。一個妹妹餓死後，親戚埋她時在她嘴裡放了一元錢——當地人迷信，含點錢到陰間去會好一些。剩下的最後的一個男孩感到自己也要餓死，要活下去只有逃。他身無分文，於是在半夜裡悄悄扒開妹妹的墳——那是「軟埋」的，只有一堆黃土。他從妹妹的嘴裡把那一元錢掏出來，用這一元錢作路費到城裡去找他姐姐求生。他

姐姐還是個學生，怎麼養他？後來，由於他營養極其不良，身體受到損害，人變得有些癡呆……現在他姐姐說起這事都要哭……

不多說了，你要是能留下來採訪，內容多得很。

採訪時間：2007 年 12 月 29 日

地點：雲南省昆明市正義路

採訪後記

段 X 先生是我十年前流浪到雲南大理時結識的朋友，當年就聽他講過他的家庭和他受家庭影響吃了很多苦頭的故事。十年後又在昆明見面，聊起了他的爺爺奶奶。

幾天後我又去找他，基於對他的瞭解——段 X 先生敢怒敢罵，是一個有覺悟，也有見識的人——我便直截了當地告訴他，我想將他的家史詳細整理出來，收入我採寫的土改真相一書中。

出乎我意料，他一口拒絕了。他找了個不是理由的理由：「我弟弟現在是 XX 縣的共產黨官員，目前仕途正順，我不想因為這件事影響他……」

在採訪中，我很少直接對講述人坦言我採訪的目的，因為我知道，一旦說明本意，採訪便會失敗。

我沒料到的是，對我自以為很有把握的段 X 也會失敗。

從段 X 處出來，是 2007 年 12 月 29 日深夜，我獨自走在掛有「歡慶元旦，喜迎奧運」紅幅的街頭，心中十分感歎：共產黨統治這幾十年，已經非常成功地將恐懼和明哲保身融入了國民的血液中，使之成了我們國民性的一個顯著特徵。

當謊言、恐懼、明哲保身、唯利是圖成為了我們的「民族性」時，舉辦一屆奧運會，獲得幾塊奧運獎牌又有什麼值得誇耀和驕傲的。

我不甘心把一段真實抹去（雖然只有短短的一段文字），又不想有違講述人的意願，於是，我只得把有關的人名、地名隱去，也去掉段 X 先生的採訪照片。

十八、「解放」幾年後，我就成了孤兒

講述人：張維源

1943 年生

我家這個地主成分很獨特，是「搶」了個地主來當。

我是四川崇慶縣（現崇州）城關鎮人，祖父張紹伯是個教書先生，一輩子在崇慶中學教書。我們家很窮，既沒有自己的住房，更沒有田地。不過祖父的大女兒，我的大姑媽長得非常漂亮，當時是崇慶縣的縣花，她被崇慶縣姓楊的商會會長看上了，非要娶她。商會會長比我姑媽大得多，他的兒子就同我姑媽一般大。

在他的一再威逼下，姑媽答應了，但她提了三個條件：一，婚後不在家當少奶奶，而要繼續讀書，上大學。二，不在崇慶縣住，而要住在成都她讀大學的地方。三，不信天主教（因商會會長家信天主教）。

商會會長一一答應了，於是我姑媽嫁給了他。

婚後楊家給了我家 45 畝田，並且讓我父親當了田糧管理處一個鄉的倉庫主任。

我家一直很窮，姑媽的婚姻才讓我家的日子好過一些了。但是，這個婚姻後來給我全家帶來了滅頂之災，因為這時離 1949 年「解放」不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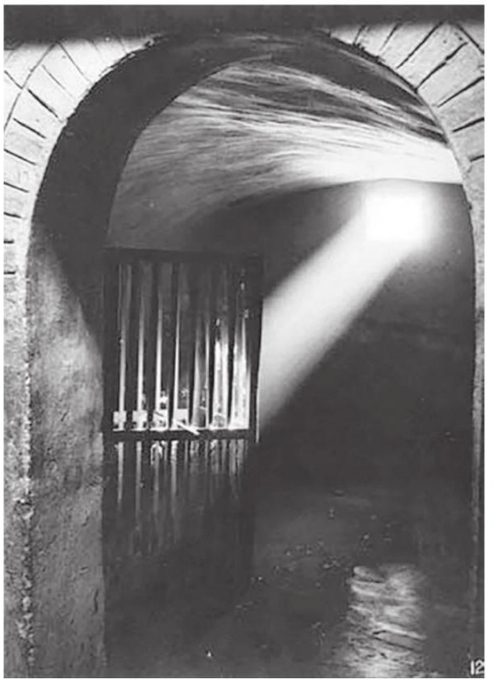
姑媽婚後我們才買了自己的房子——一棟舊房子。等裝修好搬進去住時已經是 1949 年了，你看看！剛「解放」我祖父就被抓來關起，說他加入了民社黨。1951 年，我記得那是油菜花開的時節，監獄來人通知我媽媽，叫第二天去把祖父接回來。當時家裡只我媽媽一個大人，父親也已經被關起來了。祖父回來時，只剩下一口氣了，那個樣子慘不忍睹！

他看到油菜花，長長地吸了口氣，說：「我終於呼吸到了新鮮空氣。」他沒見到我弟弟張維紹，就問他到哪去了。我弟弟非常聰明，人又長得很漂亮，祖父最喜歡他。媽媽說：「我把他送到外公家去了。」祖父歎口氣說：「好，去逃條生路。」其實，我弟弟在他出獄前三天就去世了。他拉肚子，脫水，沒錢醫治，走了。

祖父回家的第二天就死了，監獄裡知道他不行了，不想讓他死在牢裡，便讓我們把他接回來。

我祖父是個非常好的人，一輩子教書，人緣極好。舉個例子，他母親去世後，

崇慶中學的師生自發地來送葬，隊伍阻斷了三條街，幾乎所有的師生都來了。



中共編造的地主劉文彩莊園裡的「水牢」

我父親張森楷還走在祖父之前。父親因為當過倉庫主任，「解放」後便被抓到「自新人員訓練班」學習，在「訓練班」裡，他們讓父親搞伙食。父親是個膽子很小的人，他看到今天拉幾個出去殺頭，明天拖幾個出去槍斃，嚇得不得了，成天提心吊膽，不知哪天殺到他頭上，於是，他藉外出搞伙食採購的機會，逐步買了共 100 多顆安眠藥。一天，他打了杯酒，用酒將 100 多顆安眠藥全部灌下了肚。他偏偏倒倒走回家，滿面通紅。父親從不喝酒，母親一看他那個樣子，嚇壞了，趕緊去找醫生。醫生來看了，說是吃了安眠藥，於是撬開嘴，用鵝毛頭伸進去攪，但為時已晚，父親永遠睡過去了，那時他才三十多歲。他死前給我母親肖淑芸寫了首詩，我還記得其中的兩句：「寄語芸卿休愛憐，來日黃泉路上見。」

我祖母是個家庭婦女，她目睹了兒子和丈夫的死亡，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外面又轟轟烈烈地在搞土改，鬥地主、減租退押……

那天，祖母獨自出門，往那 45 畝田土的地方走去。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安樂鄉的李家巷子。我們在那兒有一間房子，祖母在裡面待了一會，然後走進旁邊一家農民的屋子。她在那兒找到一把鐮刀，把鐮刀磨亮，用它割自己的頸喉。血濺得到處都是。但祖母沒死，血流多了，她口乾，於是往外面的一條小河爬去，她爬到河邊，喝了幾口水，死在河邊了。

冷月英在講述坐「水牢」，受地主「迫害」的故事（中共的宣傳圖片）

她身後，留下了一條長長的血痕。

接下來是我的

四爸張庭楷，他是很聰明的一個人，大學畢業生，在崇慶縣銀行工作。他算盤打得極好，可以兩隻手同時打，只打一遍，絕不出分毫差錯。「解放」後他被抓起來同我祖父關在一起。因為他有文化，於是叫他在監獄裡給那些犯人掃盲。不料，一個妓女愛上了他，為這事他被加重懲罰，說他在監獄裡還不好好改造。四爸一氣之下投井自殺了。那是 1952 年。

還有，我媽媽的妹妹，即我的姨媽，叫肖淑玉，她的公公是國民黨的一個旅長，姓陳。「解放」後，她公公被槍斃了，家產也全部被沒收了。他的兩個女兒，一個讀高中，一個讀初中，在放假回家的半路上聽說家裡已經家破人亡，兩姐妹抱頭痛哭，然後擁抱著雙雙跳進了岷江。我姨父是重慶大學畢業，正在崇慶教書，他聽說兩個妹妹自殺，只說了一句話：「覆巢之下無完卵。」前兩年，我見到我姨媽的兒子陳出新，他在舊曆七月半燒紙祭祀父親時（我姨父已去世），也為他的兩個投江的小孃孃燒紙祭祀。

土改時我們家只剩下了媽媽、妹妹和我三口人，為那 45 畝地我們成了地主，農會把我們家抄了，抄得只剩下空空的四壁，床、被褥、衣服，什麼都沒有，我們母子三人，蜷成一團，睡在農民撻穀子的撻斗（川西叫「拌桶」）裡。媽媽每天還得出去勞動，幹什麼呢？把地主墳上的墓碑撬下來，用石磨把上面的字磨掉，然後運去修烈士陵園。媽媽一大早就得出門，晚上才回來，我和妹妹餓得哭。有一天，餓得實在不行，我揹起妹妹去找我姨媽討點吃的。走到衛生院時，我餓昏了，眼一黑，一頭栽倒在衛生院旁的一條臭水溝裡。妹妹一頭一臉的污泥，只剩兩隻眼眸是乾淨的——那張臉永遠留在我記憶中。

媽媽看這不是個辦法，決定把妹妹送人。送誰呢？妹妹是 1949 年初出生的，生下來後家裡請了一個姓陳的奶媽，她是個忠厚善良的女人。媽媽找到她，她滿口答應，於是妹妹去了陳奶媽家。我很捨不得妹妹，媽媽成天在外勞動，只我和妹妹相依為命，她一走就剩我一個人了。

可妹妹在陳奶媽家沒待多久。陳奶媽丈夫的弟弟是個土改民兵隊長，他揭發，說陳奶媽收了個地主子女來養。沒辦法，只得把她又接回來。路太遠，我揹不動，請了一個姓胡的鄰居幫我揹。妹妹回來後，我們又相依為命，一直到 1955 年。

那時，沒生活來源，媽媽只得出去幫我三爺爺守家，掙口飯吃。晚上就是我同妹妹睡。我夜裡睡著了把鋪蓋掀開，使妹妹受了涼，發燒，燒成肺炎。家裡一貧如洗，哪裡有錢看病？妹妹拖了兩個多月，那天夜裡，她不停地呻吟，我拿腳蹬她，慢慢沒有聲音了。我覺得不對勁，點起煤油燈一看，妹妹眼睛都定了！

我趕緊跑出去找一個認識的姓鄧的醫生。鄧醫生來看了看，說：「不行了，沒救了。」

我一聽，發瘋般地撲上去，抓住鄧醫生，叫喊著說：「你一定要救她！」鄧醫生留著長長的山羊鬍子，我在狂亂中把他的鬍子都揪下一綹！可是，與我相依為命的妹妹還是走了。她叫張維英，死時才 5 歲。

我三爺爺聽說妹妹死了，只說了一句話：「死了好！死了就解脫了。」家裡每死一個人，我們就下一扇門抬出去埋葬，家裡的六扇門都是下完了的。

妹妹去世後不久，媽媽就到重慶幫我孃孃帶小孩。可這時她的身體已經不行了，家裡親人一個接一個的死亡，給她造成了致命的打擊，驚恐、悲痛、勞累等等損傷了她的心臟。1958 年，她因心臟病猝然去世，那一年她剛剛 40 歲。

我們家只剩下我一個了，「解放」後幾年時間，我便成了孤兒。

幸好我孃孃和姑父對我很好，大饑荒那幾年，姑父自己餓得水腫，但每次送我上學，他都要請我吃碗陽春麵。我一輩子都忘不了那碗陽春麵，它比世上的什麼東西都珍貴。孃孃和姑父還堅持送我讀書。我成績一向很好，但由於是地主子女，小學畢業後便停學，後來費很大的力進了初中。畢業時我俄語 85 分、語文 93 分、歷史 97 分，但進不了高中，又停學一年，後來終於讀了高中，畢業時是 1963 年，我已經 20 歲了。

畢業後我下到長壽湖，養了十年的魚，後來進子弟校當老師，由於工作出色，又當了子弟校的校長。

今年端午節我回崇慶縣，表弟把我帶到人民醫院的四樓上，指著遠處的一片竹林說，你的老家就在那兒。

當年的住處早已被開發，成了密密麻麻的樓房，但那片竹林還在，那是因為一個「釘子戶」拒不搬遷留下的。

我望著那片竹林，心情十分悲痛——那兒埋葬著我的六位親人！要不是在醫院，四周有病人，我當場就要跪下去……

可我媽媽連一塊葬地都沒有了。

1964 年，我姑父被打成右傾分子，驚恐中，他們不敢再保存我媽媽的骨灰——一個地主分子的骨灰會給他們帶來更大的災難。無奈中，姑父在一個漆黑的夜晚，將媽媽的骨灰盒投入了長江。

採訪時間：2009 年 7 月 6 日

地點：重慶市九龍坡區西郊醫院

採訪後記

張維源老先生是唯一一個登門接受採訪的老人。

如此，我想當然地認為他一定心無恐懼，敢說敢言。於是，我第一次當面提出可不可以將他的講述錄製下來。不料，老人不同意，他說，他最大的心理障礙就是恐懼。

他給我講了一段往事：

1970 年我在長壽湖結婚，打算用伙食團的一間屋，於是便打掃了那間屋子。

不過後來我們沒用那間屋。

一天，軍代表突然把我抓去審問，問我在那間屋子裡幹了些什麼，有沒有現行反革命行為。他們勒令我老實回答，否則馬上把我抓走，後果將非常嚴重。

審訊從頭天下午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他們輪流逼問，不准我睡覺。

後來我才知道，在那間屋的一個窗子上，掛有一張毛主席的像。一天，有人發現毛主席的兩個眼珠發光了！仔細一看，原來兩個眼珠被戳了兩個洞，透光了。

我看來是逃不過一場災難了！地主子女嘛，階級敵人，他們認定是我幹的。

咦，說來算我運氣好，一個叫鄢樹雲的漁場青年承認這事是他幹的！鄢樹雲因為出身不好，一直沒討上老婆。一天，他在縫補衣服時說：「長到二十五，衣服沒人補……」他看到窗子上的毛主席的像，又說：「毛主席呀毛主席，你有眼無珠。」說著，他起身用縫衣針在毛像的眼珠上戳了兩個洞。

鄢樹雲被判了五年徒刑，押到位於大涼山區的雷波縣勞改。

「這幾十年來，真是如履薄冰，被整怕了呀。」老人說。

但是，親人的血淚堵在心頭多年，憋得難受，老人又時時刻刻渴望傾吐。否則他也不會找上門來。於是，在恐懼和渴望都極其強烈的兩股情緒的交織衝撞中，老人講述了他一家的遭遇。

可惜的是，他不時流露出的深深恐懼和擔憂讓我不便提出給他照像。因此，缺失了張維源的採訪照。

十九、我家是怎麼評為地主的

講述人：李乾定

涪陵李渡區大柏樹鄉人

1937 年生

我爺爺那一輩相當貧窮，日子苦得很，苦到什麼程度，我爸（他叫李庭方）很小就不得不到涪陵去撿垃圾來維持生活。他大一點後，去跟我的一個姑爺學做麵。後來又回大柏樹去一個麵館幫人，幫人就是現在說的打工。再後來他到貴州去做生意，掙了點錢，回來買了 15 擔穀的田。租子是四六開，佃戶得六，他得四，此外他還有一點土，土地的收成全部歸佃戶。15 擔穀的四成只有六擔多，一擔是三百斤，六擔不到兩千斤穀，而且上公糧是收租人上，佃戶不上。穀子只能打七成米，我們家是六口人：父母、我們三弟兄和一個姐姐，

這點收入根本不夠維持生活，因此我爸只好去做麵生意來支撐這個家。

這點土地和收入原本劃不上地主，就以當時的政策，按人均土地算，我們也不高。還有，在我爸買地之前，我們一直在租別人的地種，給別人當佃農。為什麼會這樣？因為爸爸買那個田地很偏遠，只好出租給人家種。像我家這種情況，根本不該劃地主。問題出在那個鄉長身上，他沒有文化，我爸一字不識，他也一字不識。他說，只要你出租了土地就是地主。他還說，給你評個地主掛個名，也不收你財產，也不鬥爭你。其實，當了地主就要收我們的財產，我們當時收了兩擔包穀，他們把包穀收繳了，我爸找到村上，當時我二哥抗美援朝參了軍，我們算是軍人家屬，村裡出了個條子，我們才把包穀保下來。那時我家很窮，沒什麼財產，有一個石磨子很好，被一個叫沈子玉（音）的人看上了，他想搬走。我去對他說，上面有指示，軍屬的財產不動。這樣才把石磨子保下來。

後來搞社教運動，工作組來的人瞭解了我家的情況後說：「你們家怎麼會評成地主？你怎麼不上訴？」我爸說：「我沒得文化，當時他們說不鬥我，不分我財產，我想，當就當吧，反正是這樣過日子。」

工作組的人按政策把我家劃成貧農。不料，其他人反對，說：「你這個工作組啷個一來就把成分變了！」這事就沒幹成，我們就一直當地主。

雖然我爸沒被鬥打，但是，這個地主帽子可怕。我去當兵，不准；我老婆本是婦女隊長，同我結婚，馬上就把她開除了，說她同「老虎」睡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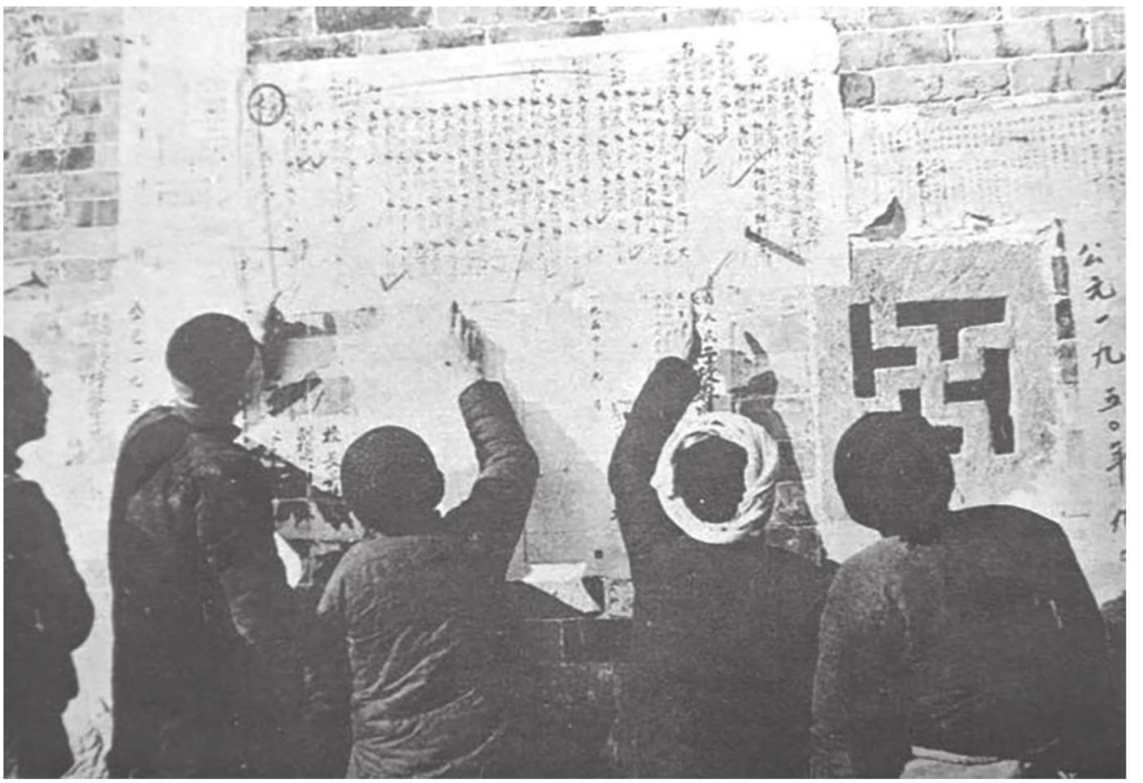
採訪時間：2014 年 2 月 6 日

地點：重慶棗子嵐垭

採訪後記

春節去鄔錫昌家時偶然遇到李乾定老人，窄小的客廳裡，擠了好些人。大家七嘴八舌，插話不斷，因此，影響了採訪完整地進行。

想來，老人還有很多「料」我未能挖掘出來，是個遺憾了。



湖南省岳陽縣麻塘鄉農民在看張榜公布的成分。選自《中南土地改革的偉大勝利》

二十、一無所有後的萬幸

講述人：胡友權

1938 年生

我媽媽龔肅英是長壽縣大洪河龔家岩的人，生於 1907 年。她很年輕時丈夫就去世了，她出生不久的孩子也夭折了。那時她的奶水特別好，有人就介紹她到重慶來當奶媽，她就是這樣到了重慶。她同東家處得很好，孩子奶大之後她仍留在那家當傭人。東家對她說，妳還年輕，最好找個人家，他們當真給她找了一個，這個人就是我的父親胡裕發。

我父親是合川人，少年時到重慶來求生存。他只讀過一年私塾，勉強認得幾個字。他每天提著籃子，走街串巷叫賣花生、瓜子、香煙。那時賣香煙不是一包一包地賣，更不是一條一條地賣，而是一支一支地賣，買的人大多是些苦力。

那時也沒打火機，火柴又很貴，怎麼辦？他在提籃上插一支香，人們買一支煙，對著香點燃，吸完又去幹活。他大一點後又到長江裡挑水賣，就在千廝門的水巷子那兒。後來他覺得這也不是個辦法，還是得學門手藝，於是他學了泥水匠。

他這個人很本分，人緣關係也好，不久就開始獨立接些活幹。他的發展在抗戰時期，那時重慶很多房子都被炸了，修建的量很大，捆綁房子他建，磚木房他也建，就這樣他慢慢地發展起來，成了個小包工頭。解放後給他評的成分是工商業主。

再說我媽，她比我爸小 20 多歲，結婚時我爸都快 50 了。婚後她生了我和我弟弟，不過我和弟弟都沒吃到我媽的奶，為了掙錢，她仍去給人當奶媽。對了，當年吃她奶長大的那個妹妹，現在我們都還有往來。

由於她同我爸年歲懸殊，她擔心我爸一旦有個三長兩短她沒有依靠，我鄉下的舅舅對她說，你還是到鄉下買點田穩當些，今後靠著田地生活有個依靠。

於是我媽把她當奶媽、當傭人掙的錢和我爸積蓄的錢拿到她鄉下去買了 20 多擔穀的田（注：川東一般不講畝，而講多少擔穀。一擔穀為 350 斤，有的地方為 300 斤）。那個時候已經快解放了，那是 1948 年吧，有些消息靈通的人已經在賣田地，我媽不知道，在這個時候還去買田。她買了田後共收了兩年的租子就「解放」了。這兩年租子只有頭一年的運到了重慶，給我爸工地上的工人吃。第二年的穀子還存在鄉下。

土改時媽慌了，她覺得這點田來得不容易，她想守住這份財產，於是她把我和我弟弟從城裡帶到鄉下。她心想，我們母子三人平攤那點田就評不上地主，最多算個小土地出租。她還想去解釋，那田是她當奶媽、當傭人和丈夫打工掙的錢買的。嗨，她太天真了，別人才不管那麼多，不管你買田的錢是怎麼來的，反正說那是剝削。他們不僅把她評成地主，還認為她是從重慶城裡來的，有金銀手鐲，要追繳浮財。她被抓到一個堂屋去鬥。怎麼鬥的我沒看見，我才十來歲，不要我們小孩去看，我只聽到從堂屋傳來吼叫聲。不過，我媽沒挨打，那兒是她的娘家，灣裡的人都沾親帶故，鬥她雖然口號喊得凶，但過後他們悄悄來給她道歉，說：「我們沒辦法，工作組在這兒，不這麼幹不行。」我媽也很理解，一點沒恨他們。

我印象最深的是抄家那天晚上，是半夜抄家。農村那時沒什麼立櫃，裝東西是一個大扁桶，東西先打成包袱，再一個個裝進去。我們的衣服都裝在裡面。抄家的人來後讓我們拿了一兩件衣服就把扁桶貼上了封條。當時我站在一邊，嚇得渾身發抖。

我記得那次土改搞的時間不長，從 1950 年的冬天到 1951 年的春天就把土改搞完了。（注，四川土改分為三個階段，胡提到的是第一個階段。）

開春後我媽對我說，你不要管家裡的事，他們怎麼鬥怎麼抄你都不要管，你自己該念書就念書。

我幸虧是去念書！

我到街上去讀了一年半的小學，1952 年就去考初中，鄉下沒有初中，只有長壽縣城和重慶才有。當時城裡人外出要派出所開一個探望證，城裡人憑探望證通過關卡和住店。農村沒有派出所，外出就憑村裡面開個路條，上面蓋一個村長的印章。其實那個章只有村裡人知道，出了村外面的人誰知道他是村長。我就拿了張蓋著村長印章的路條到重慶去考中學。我幸虧走得早，若到合作化時就出不來了。我要不出來就慘了，地主崽子，那個日子悲慘！

那時重慶所有學校都是自主招生，學校招不起生就垮。

在學校填出身成分，我填了「包工頭」，因為我爸就是幹這活的。老師說，哪有這個成分，你就填寫地主吧，於是我就填了地主。

1954 年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上面有文件，學生的戶口都要遷到學校。管生活的老師問我，你的戶口怎麼還沒遷來，

1961 年春節胡友權（後左一）
與父母、弟弟合影

我說我是農村的，要學校出證明才能遷，學校給我出了證明，也沒問我出身成分。這樣我跳出了農門。

我媽一直在農村種地，爸爸從城裡給她一點接濟，但她是地主，不敢出去買東西，都是我舅舅悄悄去幫她買。我媽炒菜，不敢放油，油在鍋裡一響，香味傳出來，不得了，別人說你一個地主還要吃香喝辣。後來，我爸爸叫她到城裡來，她來了。這個時候爸爸已經不能承包工程了，只能幹點泥水匠活。媽只得又去給人當傭人。當時市中區的安樂洞是個雇傭市場，我媽到那兒去求活。沙坪壩區（當時叫三區）法院的院長需要個保姆，他看我媽還可以，就雇用了她，也沒問她是什麼出身。幹了段時間，法院院長對我媽很滿意，就叫她把戶口轉來，那時一般是人在哪兒戶口就在哪兒，法院給她出了個手續。當時只有鄉上才有管戶口的人，碰巧我舅舅認識他，他見了法院出的手續，也沒問我媽的成分，就放行了。這樣，我媽的戶口順利地轉到了沙坪壩。不過，法院院長很快知道了我媽的身分，大概是他們內部相互有聯繫，一個地主到哪兒去了？！法院院長馬上辭退了我媽，但戶口沒有退回去，而是轉到了南岸區我爸爸那兒。這樣，只有我弟弟還在農村。

由於我們一家人都在城裡，弟弟的事就好辦了，不久，他的戶口也轉來了。

就這樣，為那點土地，我們母子三人從城裡下去，折騰幾年，一無所有地又回到重慶。不過，不幸中的萬幸！幸虧我們走得早，回來了，否則，我們活不出來！合作化、人民公社那些年就會餓死你。

可是，幾年後我爸餓死了，那是 1961 年。他死前全身浮腫。

採訪時間：2014 年 1 月 22

地點：重慶南岸區回龍灣社區

採訪後記

胡先生是在網上看到有關文章知道我的，他打聽到我的電話後同我聯繫。在電話上他就談到他的家史。正好是寒假期間，於是，我當即前往，在胡先生獨居的小屋裡，聽了他的講述。

要補充的是，雖然胡先生幸運地從農村逃了出來，但由於是地主出身，1964 年他在四川大學畢業後不得不遠走東北邊疆，他在伊春待了幾十年，晚年才回到故鄉。

二十一、土改複查——從中農到地主

講述人：張軒美

退休教師，長壽縣雙龍鄉人

1936 年生

土改時我十五歲，是個農村娃兒，在讀小學。那時我很活躍，扭秧歌、演劇。

打、鬥地主，分五大財產這些我都看到過，印象最深的是 1951 年 5 月 1 號勞動節在燕兒塘開的公審大會。我們學校也組織小學生去參加，我那時上小學六年級。那是個萬人大會，幾個鄉的人都來了，人多得很。會後就是槍斃人，我們雙龍鄉槍斃了 70 多個。被殺的人跪成一排，一個民兵打一個。由於沒有這麼多民兵，因此 70 多個人是分兩批打的。關在倉房裡的人聽見槍聲，在倉裡亂蹦亂叫，但他們都被捆著。打完後我走近去看過，全是打的腦殼，腦漿打得一地都是，腦殼打成個空殼殼。那一次我記得一共打了兩百來人，我們雙龍鄉最多，因為雙龍是最大的一個鄉。我上學要經過那個地壩，後來我路過時，尤其是晚上，怕得不得了。那時殺人隨便得很，民兵連長、村幹部，不經過審批，就可以殺人。舉個例子，就在我們學校門口，一個人押著另一個人，走到操場上，一槍就把他打死了，他們兩個以前還是朋友。還有，我後來在武隆縣工作時，聽說有一個民兵押著一個人去開公審大會，在路上他嫌麻煩，一槍就把他解押的人打死了。

在那個五一之前，經常都在槍斃人，但五一節那天規模最大，我記得名字的有我們村被槍斃的地主余曉放（音），他家有一百多擔穀，算大地主，還有我們雙龍鄉的鄉長韓樹凡。

那時打死的人很多都是冤死的。比如說我在長壽中學讀書時，我們那個校長黃雲成（音），他是個民主人士，他的父親曾經做了很多好事，可是，把他評成地主，就把他打死了。我現在看《炎黃春秋》，上面談到那時錯殺人，我覺得那是肯定的。

1951 年我讀小學時就知道，田土要解放前三年買的，出租土地好像是要占 70% 以上才算地主。我們家的土地是祖上傳下來的，在我祖祖那一輩，有一個地主吃鴉片敗了家，於是我祖祖從他手裡買了八十擔穀的田土，分給我爺爺那一輩——他們是兩兄弟——各四十擔，我爺爺又有兩個兒子，各分 20 擔穀，因此，到解放時，我家是 20 擔穀。川東地區不說你家有多少畝田土，而說你家有多少擔穀，湖南就是說有

多少挑。一擔穀是 350 斤，這我很清楚，因為我挑穀子去賣過。說是 20 擔穀，實際上打不了那麼多，我記得一年下來只能打 12 擔左右。我們家有十口人，我母親生了三個，後母生了四個，加上我婆婆，整整十口人吃飯。

農村的針線錢、燈油錢、讀書錢等都要靠賣點穀，比如我讀初中要交 16 元錢（後來叫 16 萬）就是用四頭騾子馱穀子去賣了換來的，記得那天把我爸賣心痛了，一擔六斗穀子推的八斗米才賣了 16 元。正因為 20 擔穀的田土不夠一家的生活，因此我們又去租了地主 10 擔穀的田。所以，解放前我們家既是自耕農也是佃農。

要說雇人，最多就是在農忙時比如栽秧割谷時請人幫個忙，那時你幫我我幫你，我們也去幫人家呀。我家沒有一分土地出租，反而租地主的地種，因此在土改劃分成分時，我家被劃為中農，我二爸也被評的中農。

我家的不幸發生在土改後的那個複查階段，那是 1952 年，當時我已經到長壽中學讀書去了。這個複查把我家由中農提成了地主（我們村裡另外還有一家）。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事，原因在於村裡那個農會主任（他姓胡）同我家在解放前有些矛盾，他就藉這個複查把我家劃成了地主。當時村裡人就說，你家算個哪門地主？所以，那時劃成分就亂來。我說呀，中國人的素質——忌妒、仇恨、鬥過去鬥過來——

中農成分和地主成分是有本質的差別呀！一劃成地主，就要被抄家，收田地、收五大財產。災難馬上就降臨到我家頭上。我爸叫張學忠，他有文化，字寫得很好，家裡還有不少藏書。他們來收繳五大財產，要房子、鋪蓋、家具等。他們把我家的藏書也用車子推走了，整整推了四、五車。他們對書畫沒有興趣，便把書畫堆在石壩上一把火燒了。其實那些書畫才有價值，裡面還有鄭板橋的真跡。

劃為地主後，我父親不僅被鬥，還經常挨打，他受不了，被迫外逃。當時我已經在武隆縣工作了，他還來找了我，他說在生產隊經常挨打，活不下去。後來他逃到哪兒去就不清楚了，聽人說他跑到重慶中梁山煤礦挖煤，1959 年下半年還是 1960 年，他死於瓦斯爆炸，據說那次事故死了三百多人。

張軒美 1959 年

我的後媽也是被逼死的，她姓姚，人們叫她張姚氏，我的母親在我五歲時就死了，我後母是個非常忠厚非常老實的人，她不識字，平時話都不說，可因為是地主婆，一直挨整。那些年，對地富反壞右的家屬他們可以隨便整。打她的人是個民兵連長，叫胡紹凡（音），另外還有個姓喬的。他們把她吊

起來打，她受不了刑，當天喝農藥自殺。那是文革後期，大概是 1976 年。

她的死導致她的小女兒，也是我么妹，神經受到很大刺激，她一個人在家，無父無母，精神失常了。我么妹叫張新，她現在還在，病情好些了，但說起這事就哭。

牆壁上的「五類分子監督台」，警告「五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五類「階級敵人」，到處都有監督的眼睛。（網路圖片」）

我算很幸運的，讀書離開了農村，雖然因為地主成分受了不少影響，但大體還算平安。

哦，對了，當年我們那個房子現在還在，我們被劃成地主後，那個姓胡的農會主任讓他姐姐搬進去住了。前些年我回去看，姓胡的把他們占的那部分賣了，有人叫我在舊地上重建，我說不，就讓它立在那兒，做一個歷史見證。

採訪時間：2014 年 1 月 23 日

地點：重慶南岸美堤雅城

採訪後記

張老先生從一個朋友那兒讀到我寫的《長壽湖》，很想同我見個面。兩天前相見時我偶然得知他也是地主子女，於是便表示想聽他聊聊。他很爽快地答應了。

23 日，在採訪胡友權先生後的第二天，我走進了他的家。

土改時，張先生和胡先生都只有十多歲，他們所見所聞不多，另外，他們後來都讀書離開了農村，沒有親眼見證農村那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不過，他們對當年發生在自己家中的那些事卻是記憶深刻，毫不含糊。記錄下來，仍是有價值的。

再過些年，連張先生胡先生這樣的見證人都不會有了。

張軒美 1961 年

補記：張軒美老人於 2015 年去世。

二十二、徐氏家族，人亡家破

講述人：徐瑗

一〉、孝悌大家庭

我的祖籍在湖南常德，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對我談起他的老家。後來，我從一些書籍中逐漸瞭解到，湖南是富饒而充滿傳奇的土地。「三湘四水」、八百里洞庭，自古以來就是「長江文明」的發祥和集散之地。在這塊神奇的大地上演繹過「湘妃淚竹」、「柳毅傳書」等美麗動人的故事。岳麓山下、湘江兩岸，古往今來湧現了多少英雄豪傑。我的家族就在這片沃土上世代繁衍生息。

我的爺爺徐少楷，是清光緒年間一名秀才。祖母伍氏粗通文墨，由她主持族中的事務。我的三位伯父 , 在爺爺和祖母嚴格的正統教育下，也像那個時代的讀書人一樣，「仁義禮智信」成為他們的行為規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他們人生的追求。滿清王朝被推翻後，他們仕途無望，家道隨之中落。爺爺無奈地放棄他引以為豪的儒業，屈尊他不齒的「商賈」。

一介寒儒半道出家，自然艱難，終年的勞作難以維繫一大家人的生活。每到年關就是爺爺最難過的日子，他為逃債東躲西藏。後來，隨著伯父們依次成人改學經商，家庭經濟才逐漸好轉。

爺爺和祖母是這個大家族的中心，具有至上的權威。他們向四個兒子兒媳灌輸傳統的忠孝、孝悌思想。在爺爺和祖母的教育下，三位伯父和我父親都具有超凡脫俗的風骨。那段時期是徐氏家族最歡快的日子，整個大家庭處在親情的溫馨中，弟兄之間相互關照，妯娌之間和睦友善，她們都是舊式的賢妻良母型婦女，相互間猶如姐妹，共同操持這個大家。

大伯、大伯娘是族中的長兄、長嫂，主持大家庭的日常生活，他們為大家做出了榜樣。大伯娘尤其賢慧，她上孝敬公婆，下照顧我幼小父親和侄兒們。她待我父親如母，我父親是吃伯娘的奶長大的。我從父親的自傳中，看到專門對大伯娘賢慧的描述，他從小對我們兄妹講得最多的也是大伯娘的賢慧善良。父親的話 , 植根在我心中，讓我懂得了什麼是賢慧，什麼是奉獻，什麼叫感恩。大伯的女兒徐錕後來告

訴我，父母們每天早晚都向祖父母問安，外出歸來必先至祖父母處請安稟報，整個家庭上慈下孝、兄友弟恭。歲末年關，是徐氏家族最繁忙的時候。

除夕祭祖，徐氏先祖的畫像高掛在大堂之上，堂中祭案上紅燭高照，陳列著三牲祭品，時辰一到，爺爺、叔爺（徐幼楷）便率族中的各房兄弟及兒孫，慎終追遠祭祀先人。

逢至清明，爺爺和叔爺率各房兒孫十幾口人，乘船到德山祭祖。瀟瀟春雨，聲聲杜鵑，在紙蝶紛飛中，爺爺兄弟倆和兩房的兒孫們都沉浸在默默的哀思中。

隨後，爺爺向晚輩們一一指點哪兒是高祖的墳墓，哪兒是世祖的墓地，並告訴我們，徐氏原籍係山西太原，唐末為避黃巢戰亂遷至江西南豐，明末清初 , 又為避戰亂而遷移到湖南常德。

之後，隨著時局的變遷，徐氏大家族解體了，然而徐門的許多優良傳統，仍然在我們各房的後代延承。徐家的橫扁木凳中刻印的「徐四教堂」至今仍保存在老家。

二〉、血紅新社會

1949 年，共產黨打下了江山，徹底破滅了爺爺心中殘留的「仕」夢。不過，爺爺及家族中的所有成員仍然選擇了留在大陸做一個守法順民。可是，政治和歷史並不是一本簡單的「三字經」、「千字文」，可以任由爺爺熟稔地指點解讀。

災難轉眼降臨到我家族中。

我簡單介紹一下我的三個伯父。

大伯徐伯文是個秉性寬仁敦厚的謙謙君子。做為族中長子 , 他承擔了家庭的重擔和責任，全身心地維護徐氏大家庭，渴求光耀徐氏門庭。為使書香延綿悠長，他毅然棄賈從文，創辦報業，從事相關的文化事業。

二伯父徐仲剛儒雅平和，博學多才 , 且多謀善斷。國內革命戰爭爆發後，他投筆從戎，投身到孫中山領導的北伐戰爭中，歷經戰事。當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昌之後，諸多現象預示中國的政局將有一場大風雨的降臨。於是，二伯父便離開了部隊，回到常德老家和大伯從事報刊出版事業，並與大伯共同承擔起大家庭的經濟責任。

三伯父徐叔安倜儻瀟灑，精明練達。他深受數千年中國以農為本的傳統思想影響，認為「土能生金」，「地」是立身之本。他極力購置田產，想以此振興家業，不料此舉日後給他帶來了殺身之禍。

共產黨在大陸打下了江山的同時，便奉行蘇聯的經驗，對舊政權的舊職人員進行徹底的剷除清算，以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土地改革，清匪反霸，湘西剿匪等等，均採取了非常手段，造成了一種恐怖氣氛，給人們帶來極為惶恐的心理壓力。這種

恐怖在農村更為突出，一個鄉政權，一個土改工作隊，甚至一個農會都有剝奪人命的大權，可以不經任何審判就將人打死。

那時的地主，富農，以及被認為的不良分子，生命如同豬狗。

我的大伯、三伯，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慘遭殺害的。

徐季正 1947 年

土改運動剛剛開始，三伯父就被劃為地主，家中的一位佃戶和地方上的一個痞子發生鬥毆，那痞子被佃戶失手致死。這就殃及到三伯，說他有命案，加上他曾在國民黨縣政府工作過，因此被判了死刑。

聞此噩耗全族五雷轟頂，大伯更是悲憤欲絕，他匆匆收拾行裝，要去頂換三伯。他哭著說，弟弟年輕，一家老小生計全靠他，懇求放他一條生路，自己願為他去償命。大伯是我父親最敬重的長兄，他為維護徐家家庭寧肯犧牲自己的生命。

大伯不僅沒有救到三伯的命，反而自己送了命。

全族的人都沒料到大伯會被槍斃。因為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他曾多次掩護中共地下黨員。他做為報人，對共產黨的政策有所瞭解。他認為共產黨要追求的是一個民主、自由、繁榮、富強的新中國，對此他很擁護，也很激動。他曾滿腔熱忱地投入到當時的革命洪流中。解放後，他被新生的政權授予「開明紳士」的稱號，每逢縣政府開重要的會議，均邀他坐在主席臺上。他將自己心愛的收音機也捐獻給政府。

三伯的案子牽連到他，他們說，大伯臨解放時曾穿過國民黨的軍裝送妻子出城，他們以此定他的罪，捐獻的那台收音機也被誣為收聽「敵臺」的罪證！

徐錕告訴我，在臨解放的兵荒馬亂時，大伯的新姨懷了身孕，兒女們又幼小，為保證他們的安全，大伯向曾在我家報社工作過、後又去國民黨暫編師任職的楊春借了兩套軍裝，混過當時警衛常德市的「暫編 XX 師」的關卡，將新姨母子護送出城安頓在鄉下前河楓林口。

但是，他們不由分說，將大伯投入大牢。

我二伯為救他的兩個兄弟，去找曾在我家《迅雷日報》與他共事的地下黨員、解放後成為常德市地委宣傳部長的方用，想請他出來證明我大伯是個正派好人。

但那時誰敢出來仗義執言。

在牢獄中，大伯百般申辯，換來的是難以承受的酷刑。折磨中，大伯肺病復發，大口吐血，看守卻不他准吐出，讓他憋氣咽下。在押赴刑場的途中，大伯大概還幻想著會有「包青天」「刀下留人」的奇蹟出現。在所有囚徒中，唯有他一個人悲憤

高呼：「我上有高堂，下有未成年兒女啊……」「我冤枉啊，冤枉啊！我太冤枉了呀！」

聽說他還向我們老屋的方向跪拜，為的是向高堂雙親辭行，謝罪。

行刑後，我小腳的姆媽跌跌撞撞奔赴刑場收殮大伯的遺體，在眾多的死者中，找來找去，只能憑大伯穿的駝絨袍子的一個角，才辨認出來，因為大伯的整個頭、臉連耳朵都傷腫得面目全非，無法辨認了。大伯送到鄉下的新姨即將臨產，她還挺著大肚子趕到刑場來看大伯！

兩位伯父死後，整個家庭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一輩子講究「忠孝仁義」的爺爺此時心如死灰，形同槁木。緊接著，居住數十年的老屋被強行「徵收」，一家老少 23 人從此沒有安身之地。1951 年冬天，爺爺在貧病交加中悲憤而死，死前他總是喊「追、追、追！」

追誰呢？追討？還是追隨他冤死的兒子？祖母為這事哭瞎了雙眼，她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去世了。

土改結束後，徐家四兄弟中只剩下二伯父和我父親了。二伯成天擔驚受怕，驚恐萬狀，過著生不如死的日子。他和二伯娘婉姨在極其艱難貧困中，既要扶養自己的兒女，又要扶養失去父親的子侄（孤兒寡母共 15 人）。婉姨為人寬容賢慧，同二伯在最艱難的日子中，相互幫撐，其中的艱辛，一言難盡！徐氏大家庭，淪為靠變賣祖上留下的文物字畫度日。然而，獨木難撐風雨飄搖的大家庭，族人只得各奔東西，自尋出路。

二伯父在精神和生活的雙重壓力下，不到 60 歲就去世了。

1957 年，徐家的第四個兒子，即我的父親徐孝正，不幸又中了毛澤東的「陽謀」，做為極右被抓到大涼山勞改，一年多後，他死在那兒，年僅 43 歲。

就這樣，我們徐家這個延綿百年的書香門第，在血紅的「新社會」裡迅速土崩瓦解了。

親人之間音訊渺茫，生死不知。

幾十年後——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千辛萬苦的尋找之後，我們徐家的後代才重新聚集。

1993 年 5 月 17 日，徐氏家門的後人四十多人齊聚湖南老家，為徐氏四兄弟舉行合葬大典。

死於「土改」、死於「反右」、死於饑荒年的徐氏四兄弟終於在故鄉的地底下團聚了。

那天，四兄弟遺下的妻子和兒女們，在合墓前長跪不起，悲痛欲絕。積壓心中幾十年的憤懣、屈辱、思念、愧悔、悲痛，如江河決堤一瀉千里……

2004 年 11 月 3 曰，我與徐錕到重慶南岸老君洞憑弔我父親。我們眼前出現當年被抄毀的那一張張發黃褪色的老相片——

——當年，他們或身著戎裝，英俊威武；或西裝革履，風流瀟灑，那麼富有活力，充滿自信。

「仁義禮智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然而，土改的槍聲響了，反右的「陽謀」來了，三年的大饑荒來了，他們朝氣蓬勃的生命，連同他們的才華、理想、抱負，統統灰飛煙滅。

我們情不自禁跪到在濕漉漉的地上，雙手合十，熱淚滾滾……

採訪後記

在採寫五七年右派期間，結識了徐瑗，並瞭解了他父親徐孝正的經歷（收集在《長壽湖》一書中）。後來，談到土改，她告訴我，她們徐家的親人也有死於土改的。我於是請她將有關情況寫出來。不久，徐瑗便傳來了她寫的文字和她堂姐徐錕寫的文章。以上這篇文章，便出自她們的手筆。

徐家後代在墳前

二十三、爸爸和四爸之死

講述人：張道高

西南師範大學醫院退休醫生

72 歲

我是重慶白市驛的人，土改時我剛初中畢業。我父親叫張繼騫，他畢業於武漢一所法學院。在武漢讀書時他認識了我母親，當時母親在武漢紡織專科學校讀書。在武漢時，父母都支持共產黨，參加了不少共產黨組織的活動。

土改時，父親在外工作，但我母親住在白市驛鄉下，他擔心母親，於是回到老家。他一回來就被抓來關起，關在一個穀倉裡，關了很長時間。後來，鄉裡接到通知，叫把我父親押到縣上去。當時巴縣縣府在魚洞，從白市驛到魚洞要走很遠的路。由於長期關押，父親身體已經很虛弱，出門陡然曝曬，他支持不住，在路上倒下去了。他究竟死在途中哪兒，誰埋的屍，或者說埋沒埋，我們一概不曉得，當時根本沒人通知我們，他死後好多天我們才得知此事。

父親去世後，母親繼續挨整，後來長年累月被當作地主分子批鬥，直到她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去世。

土改時，我四爸張立夫被槍殺了。四爸畢業於上海同濟醫科大學，解放前他有兩輛二手客車，跑白市驛到城裡的客運，此外在城裡還開了幾家旅社，當然也有點土地。共產黨來後把他評為工商業者兼地主。最初共產黨需要用有文化的人，還讓他當了白市驛鎮的鎮長。但是，一天，突然來人把他抓走，第二天開個公審會，會一完就把他槍殺了。

我四爸很喜歡我，開公審會時我想去看他，又害怕。猶豫了一陣，我還是去了。剛好遇上他被五花大綁押去槍斃，我不忍心看，用雙手捂住臉，但又想看他，於是從指縫裡看。四爸發現了我，他邊走邊轉過頭來看了我一眼——最後看了我一眼……

他們把他壓跪在地上，打的頭。

為什麼突然殺他？據說是有人反映，說他有一支手槍，搜查沒找到，四爸不承認，當然也交不出來，於是就把他殺了，殺了放心些。

土改的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苦痛的記憶。家裡被搜刮得一無所有，沒有吃

的，我和我哥哥（他大我一歲）天不亮就起身走十多里路到位於山洞的涼風埡去捶石子（修公路用），中午沒飯吃，要餓到晚上走回家才能喝點稀粥。後來又去挑磚挑瓦，從山洞挑到林園。冬天地上結霜凍，我們沒鞋，赤著腳走在結冰的地上。

不過，印象最深的還不是受凍受餓，而是恐怖！我們每天幹完活，天都黑了，在回家的路上，要經過一塊被做為刑場的空地。

當時，經常在那兒槍斃地主和其他什麼「分子」，一排排地殺。殺後好多屍體沒人收埋。為什麼沒人收埋？一是一些地主家屬不敢去收，二是一些人家裡已經死絕，三是有些是外面抓來殺的，沒人收屍。我父親就是死在外面，沒人收埋，至今我們都不知他的屍骨在哪兒。

那些屍體躺在那兒，血肉模糊，腦漿四濺，十分恐怖。野狗在屍體堆中撕咬，夜黑裡一雙雙眼睛發出綠森森的光，非常可怕。我和我哥哥都只有十多歲，每晚路過那兒時渾身打顫，怕吃紅了眼的狗，也怕死者的鬼魂。我們唯一能做的，只是雙手緊緊握著扁擔，把扁擔舉起扛在肩頭，隨時準備砸下去……

日子實在難過，我下決心要出去，否則活不出來。我白天幹活，晚上點菜油燈看書，複習功課。後來我考上了西南軍政委員會衛生部辦的衛生中級學校，學校吃飯不要錢，我總算可以吃飽飯了，一下子從地獄到了天堂。

我很珍惜這個學習和吃飯的「天堂」，十分刻苦，畢業時因為成績優秀，留下來進入了第七軍醫大，也就是現在的西南醫院。

在醫院工作時，看到了大量自殺的人和各種各樣自殺的方式。有吞針的，有割喉的……學校有一個體育教師，他爬到學生鍛煉用的木架上，身子猛然後仰，讓後腦著地而死。有些割頸子的人不懂方法，只把氣管割開了，頸動脈沒割斷，一時死不了，氣咕咕咕地往外冒。

張妻李涵芳補充：有一個地主叫劉元塘（音），他妻子被關在監獄裡，她只把氣管割斷了，沒人理她，蒼蠅圍著她的頸子和氣管叮，幾天之後她才死。

張道高：那幾年，我也搶救了一些自殺的人，比如一個割喉的叫汪正管（音）的教師就是我救活的。那些情景，一言難盡！我在七醫大只幹了四年就離開了。怎麼離開？有一天，我和一些人突然被集中起來，限制了行動自由。這期間他們組織人搜查我們的宿舍，我被查出了一張照片，是我外公的，他穿著國民黨的軍裝。他們要我交待我外公的情況，我說不出。外公在湖南，我只是很小時媽媽帶我去湖南見過他一面，對他的情況我一點不清楚。就為這張照片，我被迫離開了七醫大，調到了西南師範學院校醫院。

從此，我就待在這兒了。

採訪時間：2008 年 11 月 23 日
地點：西南師範大學四新村

採訪後記

半年前，在大邑縣安仁鎮採訪劉文彩孫子劉小飛時，他提到土改時一個叫李育滋的人的慘死。

劉小飛熱淚盈眶，泣不成聲，給我留下很深印象。

半年後，我專程前往北碚西南大學，找到了李育滋的侄女李涵芳。李涵芳說：「關於我們李氏家族的遭遇我都寫到《川康遺事——全軍覆沒》一書中了。我先生也是地主子女，他也有很多經歷。」

於是，我便採訪了李涵芳的丈夫張道高先生。

回家後，細細讀了李涵芳送我的《川康遺事——全軍覆沒》一書。

雖然這些年飽覽血腥與殘暴，但書中的記述仍然讓我心驚肉跳！下面是書中關於李育滋被他所救助的共產黨人迫害致死的片斷：

1950 年春節，曾受到二爸（李育滋）掩護的共產黨員們一同來給二爸拜年，感謝他當年的救命之恩。誰能想到這份救命之恩後來換得的卻是殺身之禍。

1950 年 3 月，中共大邑縣委在舉行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中，安排了愛國民主人士代表 28 人，二爸應邀出席了這次會議。

正當二爸滿懷熱情迎接新生活的時候，1950 年 10 月 3 日大邑縣宣布全縣開展減租、退押、清匪、反霸運動，11 月 4 日，通知安仁、唐場做為試點，大邑縣的土地改革運動開始了。二爸應退押金是 60 石米，（農民租種土地時，要交一定數目的抵押金，土地改革沒收了地主的土地，押金一定要退還農民）但他的錢早已交給地下黨做活動經費和用作長期掩護在家的眾多地下黨員的生活費了，家裡僅剩下 55 石米，尚差 5 石米。他一再向土改工作組解釋，卻沒有一點用。

1950 年 11 月中旬，二爸就被工作組關押起來。不久，二嬸也被抓走，十幾個婦女關在一間只有十平方的小屋裡，吃、喝、拉、撒全在裡面，白天大家蹲坐著，房裡還有一點空隙，晚上睡覺卻只能互相擠壓。冬天大家擠著還可以增加點暖氣；到了夏天，屋裡充滿了汗酸味和排瀉物的味道，臭氣熏天。蒼蠅也來趁火打劫，搶

占這小小的空間，在人的臉上亂撞，在吃飯的碗裡亂爬。晚上蚊子嗡嗡亂飛，肆無忌憚地叮咬已沒有幾滴血可吸的女人。她們個個灰頭土臉，身上蚊子咬的疙瘩和紅紅的痱子連成片，在皮膚上形成一層硬塊，苦不堪言。生了病也沒人過問，只能躺在地上呻吟。當局讓她們在裡面自生自滅，對她們比對豬狗都不如。

那時大邑縣的副縣長兼剿匪總司令就是二爸長期掩護在家裡的川西游擊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周鼎文，可以說他是從二爸家走出來就擔任了大邑縣的領導職務，其他受二爸掩護過的地下黨負責人，也在附近區縣擔任領導工作，他們都可以證明二爸近年來的所作所為，更可以證明二爸支援地下黨的錢早已不知是六十石米的多少倍。可是，看來是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說清楚事實真相，一年前二爸從成都趕回去救他們時他們說的話，大概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了，二爸一直被關押著，並為那五石米受了不少刑。

不知懷著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大邑縣的領導又把目光盯在我爹李光普身上。

他們知道，沒有任何理由到成都去抓我爹，於是略施小技，用一個「請」字，獵物就輕而易舉落到手裡。兄弟相見，抱頭痛哭，他們倆誰也弄不懂事情怎麼竟會變成這個樣子。爹說：「老二，哥錯了，哥是不是看錯人了？」二爸說：「哥，我們再等等，一個掌握了國家政權的政黨不可能說話不算數，他們至少應懂得取信於民的道理，說不定過幾天我們就能被放出去。」看來二爸說對了，1951 年下半年，二爸做為開明士紳被推舉為川西區各界人士代表，經軍代表兼縣委書記李天民同意，他被從牢中放出來，到成都參加川西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但是二爸終究還是錯了，大邑縣領導人的行為邏輯誰也無法用常規去推斷，從成都開完會回來，大邑縣政府又把二爸關回牢房。

大邑縣土改時整地主的方法很多：比如帶「披披帽」，就是把大約兩三百斤的餵豬石槽，一頭放在地上，另一頭蓋在跪在地上的地主頭上，過不了多久，戴「帽子」的人就受不住了，要嘛重傷殘廢，要嘛倒地吐血而亡。夏天叫地主穿上皮襖，用大糞往身上潑，烈日之下，大糞劈頭蓋臉潑來，又順著脖子流到身上，皮襖捂得全身不透氣，過不了多久，被潑者就昏倒了。冬天把冷水從衣領裡往身上倒，冰涼的水流遍全身，冷得人全身涼透、顫抖不停，牙齒碰得咯咯地響，還是以昏倒為結束。經過這些刑罰，沒人不病，最後大多數以死亡告終。其他，如用沾水的鞭子打人，吊鴨兒浮水、猴子抱樹、煽耳光、幾個人推來推去地拳打腳踢、抓著頭髮把頭往牆上撞，就只是小菜一碟了。受刑者痛苦不堪，所求的只是能被直接拉出去，當頭一槍結束痛苦。

爹和二爸在牢裡度日如年，開始，他們還懷著希望，日夜盼望曾向他們宣講過共產黨政策的人、他們曾冒死掩護過的人，能幫他們一把，可是，誰也沒有向他們

伸出援助之手。剛剛才過了一年的、生死悠關的大事，好像誰也不記得了，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似的。董國富曾拍著胸膛響噹噹地說過：「我就可以證明！」現在也是時過境遷，無需兑現了。那個經常到我爹那裡拿過錢的周鼎文，那個曾在二爸家裡躲過、吃過、領導過地下黨活動的周鼎文，國民黨懸賞四千大洋捉拿而二爸卻冒險掩護起來的周鼎文，當時任大邑縣副縣長和人民法院院長的周鼎文，卻對二爸和我爹的遭遇置若罔聞、見死不救。

在關押期間二爸常被拉出去鬥爭，工作組叫人用細麻繩把二爸的兩個大指頭反捆在背後，吊在樑上毒打，只聽到鞭打聲不斷，二爸痛苦的呻吟聲不斷，直到昏死過去，他們才把人放下來，兩個大指頭已腫得像個桃子。這樣的毒打是經常的事，直到有一天，兩臂被吊得脫位骨折，二爸的這種特殊「享受」才告結束。

父親看著二爸遭罪，心如刀絞，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盡心竭力照顧殘廢了的弟弟。

他現在什麼都不再想了，只求兄弟倆能夠活命就好。工作組的人看父親無微不至地照顧二爸，覺得很不滿意，他們斥責父親劃不清界限，遂把兩人分開關押，讓他們獨自去忍受身體上的痛苦、牢獄生活的寂寞和精神上的煎熬。

一年多過去了，1952 年 5 月，安仁鎮突然宣傳「殺個肥豬過端陽」，開始對二爸進行更殘酷鬥爭。

他們找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要二爸在烈日下挽起褲腳跪在碎瓦上，碎瓦戳進肉裡，二爸兩膝鮮血淋漓，疼痛難忍，稍微晃動一下，則被又踢又打。經常這樣跪，他的兩腿血肉模糊，已經站不起來了。這時，有人突然用步槍的槍條子狠狠地戳進他的左眼，二爸淒厲地一聲慘叫，昏死過去。眼珠隨著抽出的槍條流了出來，鮮血從眼眶裡汩汩地往外冒，沿著臉頰淌到地上，不一會兒，泥地上就積了一大灘血。昏迷中的他又被拖回牢房。

中共土改時的宣傳
選自《中南土地改革的偉大勝利》

一天，二爸被押回自家院子等著挨鬥，三個十歲多一點的孩子嚇得擠在一起看著他們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樣的爹，欲哭又不敢。他那原來炯炯有神的目光已經蕩然無存，現在，左眼已凹陷下去，無神的右眼裡顯出的只是木然。被跪壞、打壞的雙腿，無法支撐身體的重量，他無力地靠著木柱坐在地上，表示要二女兒（三個孩子中最大的一個，14 歲，我叫她四姐）為他剪指甲。孩子怯生生地走到他面前，拉起他的手。二爸全身震顫了一下，右眼裡顯露出一絲悲切。女兒小心翼翼地剪著已陷進肉裡的指甲，怕弄痛了自己的爹，她哪裡知道，她的爹早已傷痕累累、體無完膚

了。二爸要她來剪指甲，只因為被吊斷的雙手再也不能抬起來撫摸孩子，只能借剪指甲為由，讓孩子來靠近自己、挨挨自己，在兩個人的雙手接觸之際，把他的關心、疼愛和不捨傳達給孩子。

作個道別吧，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了。

很快，挨鬥的時間到了，二爸表情冷漠地跪在院子裡，任人痛打，打倒了，再跪好，再打倒，再跪好，直至昏迷。

三個孩子親眼目睹至愛的爹受刑的慘狀，不忍再看，他們深深地低下頭，心如刀絞，暗暗地抽泣著。

大邑縣早在 1951 年 1 月就成立了人民法院，周鼎文任法院院長，在他主持法院工作期間李育滋被判「反革命」罪並處以死刑，立即執行。

二爸表情冷漠，顯得出奇的平靜，他再也不叫冤、不分辯、不求饒，唯有深入骨髓的絕望。

1952 年 5 月 26 日，在文彩中學操場——這個二爸曾經主持召開大會歡迎解放軍、慶祝大邑解放的地方，他被宣布犯「反革命」罪立即處決。

他被拉到文彩中學操場斜對面的田裡，一聲槍響，二爸倒在散發著清香的稻田裡，倒在他熱愛的家鄉的土地上，年僅 46 歲！

二爸的屍體在示眾期間又被安仁街上的打更匠、人稱爛腳桿的李會廷挖去心、肝、生殖器，拿去賣給別人，據說吃了可以治病。

殺了二爸之後的下一個月，1952 年 6 月，大邑縣宣布土地改革勝利結束。

在李涵芳家採訪時，遇到李育滋之女李玉華（1938 年生），她告訴我：

父親被整時，我還只有十來歲，正在文彩中學讀書。中學的操場做為公審大會的會場，場面很大。學校的教導主任要我去發言，批鬥我父親。我說不出來，也不知道什麼。我想按照學校的要求寫批判稿，但批判不來。當時，那些豐富的階級鬥爭詞彙還沒學到，我沒有自己的語言，只好把剛學會的幾句話用上去，比如「剝削壓迫」、「男盜女娼」等等。

李玉華

前不久，他們要給父親平反，我看那上面寫的是：「李雖有歷史問題，但支助過共產黨。」我拒絕接受！共產黨對我父親的恩將仇報我很不理解，而且使用如此殘暴的手段！我這些年常常想，這段歷史，我怎麼向後人交待？

二十四、地主子女，打死就打死了

講述人：李先偉

1944 年生

土改時我還小，才七歲，但還是看到了一些事。一個是抄家、燒書，我們家裡的《左傳》、《古文觀止》，還有《康熙詞典》，這麼厚幾摞，抱出來燒了，他們說那些是封建的舊東西。還有就是整我的叔伯嫂嫂陳榮本。陳榮本的男人叫李先明，是我的叔伯哥哥，解放後被抓到新疆去勞改，土改民兵向陳榮本逼要金銀，洋錢（銀元），她哪兒有嘛。拿不出來？他們就把磚燒紅了，把她拉來，壓她跪在磚上，她的兩個膝蓋燒爛完了，她動也動不得，就上吊死了。她死前還給她在勞改的男人寫了一封信，她是奉節師範畢業的，有文憑，民兵看到後把信燒了。她就死在我們高坎子。她死後的四個娃娃無爹無娘，全部餓死了。

另外，我們這兒（高坎子）槍斃了好幾個，有李先約的父親李汶舟，還有李元舟。地主槍斃後，他們的娃兒餓死的多，僅我們高坎子就有幾十個，比如李元舟的子女，他三弟的幾個娃娃全部死完。為什麼呢？土改後，小的出去討不到吃的，大的又不准出去，五、六歲，六、七歲大多都是餓死了的。

我們家死了三個，但都是土改後死的。

我爸爸評為地主，沒有殺他，只是鬥打。他從不多言多語，只喜歡下象棋。他是搞大集體的時候餓死的。1959 年他被叫去修柏洋壩那個黑龍池，吃不飽，那是十月間，天氣冷，他披著件爛蓑衣，抱一床爛鋪蓋，走到李子坳那個埡口時，風一吹，他就倒了，再也沒有爬起來。

李家殘存的院落

我二哥李先佐，1956 年忍受不了上吊死了。第三個是我妹妹李先

貴。那些年，任何人都可以隨便欺壓我們。一個姓許的貧下中農說我家的雞刨了他家穀子，又說我妹妹沒有把雞趕走。我妹妹說她沒有看到。這個姓許的幾耳光打來，打得妹妹鼻血長流。我母親用水給她洗，洗了把她抱到板凳上，她一靠在板凳上就死了。

那是 1955 年，我妹妹才九歲。

問：打死了他承擔責任沒有？

李：那個時候承擔什麼責任？我們地主家庭嘛，沒得哪個敢吭聲，說了還要挨打。我們把妹妹揹出去埋了，板板都沒得一塊，挖個坑埋了就是。

採訪時間：2016 年 8 月 11 日

地點：湖北省利川市柏洋鎮水井鄉水井村

採訪後記

到洋沱壩拍攝外景時，我在殘存的李家地主大院的一個破爛平房裡，偶然遇到了 72 歲的李先偉，論輩數，他還是我採訪的老地主李曼的三爸。

也許是年代已經久遠，苦難的印痕已被歲月消磨，他在講述那段往事時十分平靜，彷彿那是一個他人的平常的故事。但是，在講到他妹妹李先貴之死時，他臉上露出了悲憤，聲音也沉重起來。

他說，地主子女嘛，打死就打死了，你要喊冤，還要挨打。雲陽縣彭氏莊園的地主子女彭義堯在講到他媽媽被整死時說：「我不敢問，地主嘛，要啷個整就啷個整。」

《土地革命如火如茶》一書中寫道：「地主階級有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特權，可以隨意打死或者處死農民。在這種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下，農民過著極端貧困的奴隸式生活。」我在紀錄片《血紅的土地》中寫道：「中共宣稱的這種現象的確發生了，那就是在土改和土改之後，只是物件（對象）剛好顛倒！」

二十五、我在幾十年的恐怖中成長

講述人：謝成陶

重慶交通大學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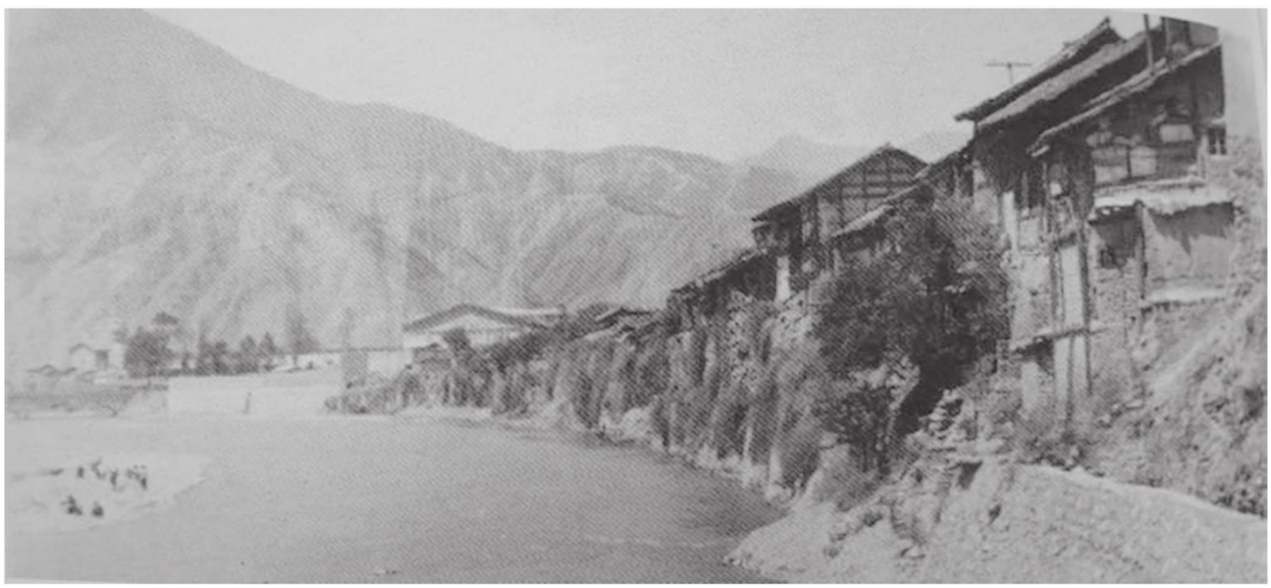
1937 年生

1950 年 3 月 27 日，我 12 歲，聽說 15 年前路過冕甯縣的紅軍又要回來了，我們幾個小夥伴好奇地到瀘沽鎮郊外朝西昌方向望去。大約上午 10 點左右，一大批解放軍荷槍實彈沿著公路兩邊匍匐而來。他們見到我們幾個小娃，十分著急地喊：「小朋友，快躲開，馬上要打仗了！」

其實，國民黨的軍隊早已潰不成軍，昨晚已逃向喜德那邊的少數民族地區，沒有一點抵抗。

約十分鐘，我的家鄉四川省冕寧縣瀘沽鎮便解放了。

大半年後，一場急風暴雨似的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運動洶湧撲來！



紅軍長征時的瀘沽鎮（謝成陶提供）

一〉、我一家的命運

1、父親之死

川滇交通要道——瀘沽鎮（網路圖片）

我父親謝文丹是國民黨中央軍校學土木建築的，是個工程師，後來當了瀘沽鎮的鎮長。我爺爺有房產和田地，分家時我伯伯分了房子，我父親分了田地，田雖不多，但也算是個地主了。

瀘沽鎮是冕寧縣一個比較大的鎮，是西昌進入冕寧的門戶，全鎮有十多個鄉，很多鄉長都是中共地下黨，所以，解放前瀘沽鎮是地下黨的窩子。

我父親同地下黨的關係很好，他很支持共產黨。冕甯縣的文史資料上都說我父親是個民主人士。舉個例子，有一次西昌國民黨警備團的團長邱純川到瀘沽鎮來抓地下黨，到瀘沽後邱純川來到我家，告訴我父親（他同我父親是同學），說今晚要把他們一網打盡。當時共產黨在滬沽辦了學習班，有100多人，他們得到情報就來抓。我父親藉解手的機會溜出來找到賣酒的陳鼎才，他是地下黨，對他說今晚後山開會的人要被抓，部隊馬上就要到了。陳當即跑去報信，100多人趕緊逃入山林——我們那個山林很大。邱撲了個空。

謝母與謝成陶（1939年）

1950年解放軍打來時邱純川逃往少數民族地區，他在那兒被殺了。

解放後地下黨給部隊介紹過我父親，部隊便把我父親叫來當了集中倉庫的主任。倉庫裝糧食——從有錢人那兒徵集來糧食，供部隊吃。他們叫我父親負責倉庫管理，等於是參加了工作。父親在倉庫幹到1950年的8月。一個叫邊紹雲的地下黨來接替了他的工作。幾天後，他們就把父親弄到學習班去學習，把他軟禁起來。我去看了他兩次。春節大年三十那天，父親被抓到監牢裡，他們把他棉衣扒掉，用條石把他壓住，一陣暴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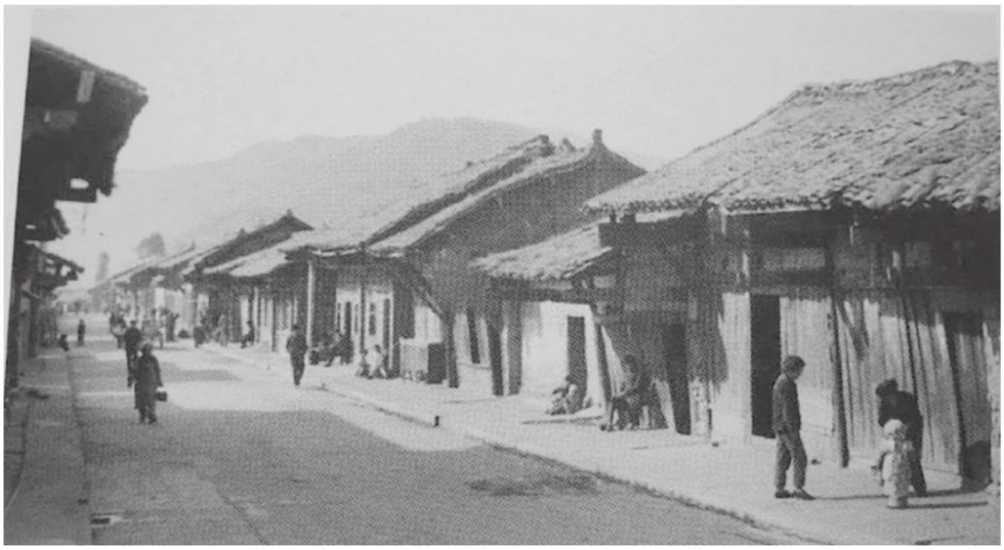
1951年4月，父親在離城70多里的地方被槍斃了。

殺他的罪狀是什麼呢？一是說他把廟裡的鐘拿來鑄成了鍋賣。當時鎮小學在廟裡，沒有桌椅，爸爸把鐘鑄成鍋賣後給學校添置了桌椅。那個桌椅我見過，做得很漂亮。

還有就是鎮上有一家人失火，把整條街都燒了，好多人流離失所。爸爸把這個人抓起來送到冕寧監獄，算是過失犯罪吧，

現在共產黨也會這樣做。後來那個人死在監牢裡，這也算作我爸爸的罪行。

1989 年我曾經去成都文殊院找到當年的地下黨負責人王月生，我說：「王叔叔，我是冕寧瀘沽鎮謝文丹的大兒子。你們當年經常在我家裡開會。」他說：「喲，進來！進來坐！」我問他，解放前你們共產黨對我父親也很好，為什麼解放後要把我爸殺了？王月生說，剛解放他們地下黨就走了，是部隊在管理。



昔日的冕寧縣街道（謝成陶提供）

2、繼母之死

父親死後，我們全家被掃地出門。我有三個弟弟兩個妹妹，最大的九歲最小的一歲。小的由農會出面委託他們的奶媽帶走撫養。我是最大的，自個跑出去流浪，父輩的親戚朋友們不敢接待我，我只有討飯吃，晚上就住在一個城隍廟裡。

我母親 1943 年就去世了，繼母叫胡從德，她生了三個娃娃，當時，她拖著一兒一女住在一個透風漏雨的爛棚子裡。他們沒得飯吃，又冷又餓。弟弟身上穿件毛線衣，還被兒童團扒下來拿走了。最慘的是，我繼母幾乎天天被抓去鬥打，捆綁，打得她痛不欲生。兩個娃兒在家裡沒吃的，餓得成天哭。一天，繼母把小弟弟留在家裡，獨自把小女兒揹到她姐姐家，然後跳河自殺了，屍體都沒找到。前些年我們給她立了一個衣冠塚，其實衣冠塚都說不上，因為她衣服都沒留下一件。

3、繼母的堂姊妹胡正馨之死

胡正馨同我繼母是堂姊妹關係，就住在我們對門。胡正馨長得非常漂亮，至今我都覺得她漂亮。她是西昌禮州人，禮州在西昌市和瀘沽之間。胡正馨出身平民，

但嫁給了一個叫鄧宇俊的地主。鄧宇俊是個麻子，當過國大代表。她結婚後只有幾年就解放了。土改時把她抓來關起，農會主席想占她的便宜，胡正馨給了他一巴掌。農會主席（我記得他是個染匠）受了處分。又換人來鬥她，但是，鬥不起來，因為她沒收過租，又沒得罪過任何人，出身也貧苦，只不過是地主家的一個花瓶。鬥爭會上只好拿她穿的衣服來批鬥。有人說：「妳看，妳穿一條花褲子！」胡正馨聽到這話，馬上把外面那條花褲子脫下來，當眾往空中一拋。

這下把鬥她的人惹惱了，胡正馨大難臨頭！第二天開大會，胡正馨被五花大綁押出來，當眾宣判死刑！宣判話音一落，擲下一根兩尺多長的竹標，上半部寫著「惡霸地主胡正馨」，下半部是削得很尖的竹片。行刑的人惡作劇，把那竹標使勁從胡正馨頸子裡插下去，結果竹尖插入她的肉中。在推往刑場的路上，胡正馨臉色慘白，根本走不動。於是，就在半路上，讓她倒在地上，槍伸進她嘴裡，一槍把她打死了。

行刑的人不是解放軍，而是土改民兵幹的，這個人叫楊雲，是我們瀘沽小學的炊事員，他的弟弟是土改工作組的組長，也是當天的審判長。

4、姑祖祖和姑姑之死

我有個親戚，是我姑祖祖，分家時，大老婆分了房子，她分了田，也沒多少。姑祖祖人長得漂亮，她家裡面全部是女的，沒有勞動力。姑祖祖就把那點田租出去，靠收點租過日子。姑祖祖住在縣城，我 10 歲時曾在她家住過，知道她家的情況。

土改時我在縣城讀中學，經常被組織起來去參加鬥爭大會。我們初中生安排坐在前面——盤腿坐在地上。後面的人一陣一陣地呼口號。拖出來的人一個個五花大綁。那個綁厲害得很，雙手反剪，頸子後面勒一根繩子，把人壓跪在地上使勁勒，繩索收緊，血脈就不通了，不一會，人就遭不住。最初，槍斃人後那個麻繩就不要了，家屬來收屍時把繩解開丟掉。後來殺人太多，繩子不夠用，於是把繩子從屍體上解下來在河裡洗去血跡後再拿去綁人。那天，在廣場開鬥爭會時，我看到了姑祖祖。她被抓起來吊在一根竿竿上。她長得很白，又胖，繩子一勒，

鎮反和土改時殺人（網路圖片）

把她手臂的肉勒爛了，唉呀，肉都翻出來，好慘！那天鬥爭會上，鬥完一個拖出去槍斃一個，就在廣場後面，「砰」地一聲。但是，那天沒有殺我姑祖祖，她後來死在監牢裡。她的屍體被丟出來，狗又撕又咬又吃，把她扯得稀爛。我姑祖祖有什麼錯嘛，她沒得勞動力，只有點田土，收點租吃飯，從來沒整過人害過人。她女兒，也就是我的姑姑謝雲芳，長得很漂亮的，受不了這個刺激，吞鴉片自殺了。謝雲芳只比我大幾歲，但已經結了婚，她十多歲就結婚了。

二〉、我的親眼目睹

土改時冕寧縣的縣委書記叫常志蘭，公安局長叫郝靈選，唉呀，一提起他們兩個人的名字，全縣人民都害怕。他們天天殺人，好像殺起癮了。

謝成陶（左一）小學時

1951 年 1 月起開始大規模殺人，那一年我 13 歲。我 1950 年到 1953 年在冕甯中學讀初中，經常看到公安押著一串一串的人，一個個繩捆索綁，幾十人上百人，各個鄉鎮都在殺。冕寧縣是個四方形的城，大概有一平方公里，城牆很高，冕寧中學就在城的西南角。我們一聽說殺人就咚咚咚地跑到城牆上去看。要被殺的人排成一排排的，槍就對著腦殼打，打後的模樣各不相同，有的打掉半邊、有的打開花、有的後面一個小洞前邊一個大洞。

我認識的好多熟人都被殺了。我有個同學叫鄧宇雄，他比我大三歲，16 歲，他被槍斃後我看見他的罪狀是：他父母開黑會時他在外面放哨。他死後我跑去看了他的屍體，他穿的是件羅漢衫。

還有我隔壁的李明善，他剛滿 18 歲。為啥被槍斃？據說一張反共救國軍的名單上有他的名字。反共救國軍是解放前夕國民黨想打游擊而組織的隊伍。沒人怎麼辦？湊！你只要湊足了100人你就是連長，就可以發金條，發槍。所以有些人就去搞這事，弄個連長、營長當，目的就是為了錢。有人把李明善的名字寫了上去。解放後查到這個名單，馬上把他抓來。他說，他根本不曉得有這回事。但不管，一槍就把他斃了。我當時想，如果我大個兩三歲，可能也活不成。

我還有個同學叫朱萬榮，他比我大兩歲，他家也是地主。那天民兵突然來學校把他抓走。第三天，他被夾在他爹媽中間被推上刑場，刑場就在城牆外的護城河邊，我們在城牆上看，唉喲，好緊張，大氣不敢出。只聽得「砰」「砰」兩槍，朱萬榮的爹媽被打死了。但是沒打朱萬榮，原來是把他抓來陪殺場，殺了他爹媽後把他拖

了回去。幾天之後，他被放回來繼續讀書。朱萬榮現在還在。前不久我們搞個冕甯的徵文集，他沒寫這件事，我問他為啥不寫，他說：「不敢寫，寫起來太難受。」

我們小學校長叫余顯道，他家裡很窮，他長年穿件藍布衫衫，窮得打叮噹。

解放前夕胡宗南的部隊從我們那兒過，夜裡慌慌張張掉了兩支卡賓槍。槍被余顯道撿到了。那時槍就是錢，余顯道於是把槍撿來藏在菩薩的座下（我們小學就在廟裡），打算賣幾個錢。不料這事被人知道了，余校長被抓起來判了死刑。我親眼看到了他的屍體，他長得高高大大，頭都打得沒有了。

頭被打掉的還有胡正馨的老公鄧宇俊，槍響後只剩一個頸子樁樁。

殺的熟人中我記得的還有一個曹叔叔，他叫曹曉天，是個鄉長，我也見到他的屍體——頭很完整。後面一個小眼，前面一個小眼。

我們那條街上有一個叫戶錦堂的人，他有點文化，喜歡讀點古書，於是國民黨的縣政府把他找來當了個縣參議員，相當於現在的政協委員。戶錦堂靠鑄鐵鍋賣為生，我叫他戶叔叔，經常看到他拉風箱鑄鍋，一張臉被煤煙熏得漆黑。那些日子，殺人殺瘋狂了，把戶叔叔抓來就殺了。他沒有一點罪行，只不過因為有點文化，被叫去當了幾天參議員。他兒子現在還在，在西昌師範教書。

謝成陶在會理師範學校（1955 年）

還有個起義軍官叫鄧佳（音），也被殺了，但後來給他平了反。

冕寧縣還殺了一個國民黨的少將軍官陳蘊山。他解放前回到家鄉，結果被殺。

我繼母的舅舅胡岳軍也是少將軍官。胡宗南從西昌起飛時是他護送胡到機場。曾經有中共地下黨給他作工做，說你把胡宗南抓起來就立大功了。他說：「不，胡宗南對我很好，胡這個人不嫖不賭不貪。我無論如何不能做這種事。」他把軍用棉被灑上汽油，將通往機場的 20 多里路照亮，直接送胡宗南起飛。胡宗南起飛後 20 多分鐘，解放軍就占領了機場。胡岳軍脫掉軍服躲了起來。後來他看到解放軍的布告說「坦白從寬」，於是就到西昌公安局去自首，說：「我就是胡岳軍。」對方驚叫了一聲，但當天還放他回了家。

兩天後，他被押到雅安，在那兒關了兩年，公安廳的人說，要殺你輕而易舉。胡岳軍回答：「軍人不怕死，要殺就殺。我知道我把胡宗南放走了，罪重。」

但是，他沒有被殺，而被押回家鄉判了 20 年徒刑。他現在還在，90 多歲了，我們經常通電話。

冕甯公安局長郝靈選因為殺人太多受到了西康省主席廖志高的批評，他把廖志

高的老表李少炎都殺了。

在我們冕甯還有個奇觀——叫花子（乞丐）搶屍體賣屍體。叫花子是窮人，共產黨喜歡窮人，任叫花子去搶屍體，搶來每具屍體要 30 萬元錢才讓家屬領去掩埋。

共產黨認為，叫花子為什麼窮，就是因為被地主剝削了才窮嘛。於是我們冕寧縣出現一個奇觀——屍體被一排排地吊著，叫花子坐在下面等著收「賣屍錢」。

我爸爸被槍斃後是我伯媽去收屍，叫花子不准，非要拿 30 萬。30 萬是舊幣，相當於現在的 30 元。當時 30 元是什麼概念呢？我在學校一個月的伙食費是 3 元，也就是說，30 元是我 10 個月的伙食費。我伯媽是個貧民，靠推豆花賣為生。我爸爸當鎮長，十分廉潔，他並沒為自己撈錢財，自己的親哥嫂都窮得很。伯媽實在拿不出 30 萬，不拿錢就不准收屍。我堂弟去把我爸的腦水收起來，用草紙包好放在那兒。他是 4 月份被槍斃的，天氣已經有些熱了，那幾個叫花子在那兒守了幾天，我伯媽還是沒錢。解放軍的一個團長覺得有礙衛生，他出面讓伯媽免了這筆「收屍錢」。

還有，聽說有個地主關起來了還在寫反動詩，我當時讀初中二年級了，好奇，跑去看。那首詩是這樣的：「昔日田為富字腳，今日田為累字頭。田在心上常思想，田在心中慮不休。當初只以田為福，誰知田落壘壘愁。」憂慮的「慮」繁體字是慮，中間有個田字，壘壘的「壘」繁體字是壘，有三個田字。

這首詩我當時就背下來，至今不忘。

那個時候自殺地主也很多，有一個叫鄭胄平的地主，他老婆跳井自殺，留下幾個娃兒。

三〉、我對地主的一點看法

地主收點租我覺得是很正常的，現在的種糧大戶、賣糧大戶，不是地主是什麼呀？有一次我們處級幹部去參觀左宗申（重慶的一個民營企業家）的工廠，回來座談時我說，按照以前的說法，左宗申雇了這麼多人幹活，他就是資本家了，但現在說他是功臣，解決了這麼多人就業。同樣的，種糧大戶？他一個人種呀？還不是雇人來種，他也就是地主了。

武漢郊惠濟區馬場鄉農民喜滋滋搬走地主的農具「中南土地改革的偉大勝利」中南人民藝術出版社 1953 年

但現在他是功臣，說他上稅多，對國家有貢獻，還獎勵他拖拉機，讓他加入政協……就我所知，以前的地主、資本家，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勤勞、智慧、節儉、善於經營的人，他們一點一點地聚集財富，也解決就業。但為什麼他們就要被關、被鬥、被打、被殺。特別是，讓他們的子子孫孫都不得翻身、不得昌盛。我當右派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父親的影響。

到底是當年錯了還是現在錯了？有人回答說，不同時期政策就不同。

我對此不認同！我在農村看到，很多人又懶又笨，所以就比較窮。

我在江北農場時，有個老農民給我講，我們農場下面一個資本家，餵 900 多頭奶牛，輕鬆得很。他介紹說，那個姓陳的資本家，把周圍的農民找來，問大家願不願意餵牛。願意的，參加一個培訓班，兩頭或三頭領回去，公司給牛定期配料，自己再割草餵，每三個月評比一次，餵得好的，除工資外再發個紅包，那些餵得不好，又在奶裡加水的，就把牛收回來。管理人員只有幾個人，一個獸醫、一個配料、一個下鄉巡視。結果公司掙了錢、四周農民富了，城裡人又有奶吃。

老農說，你們共產黨餵牛太累了，養 80 多條牛，那麼多人，還餵不好。

的確也是，我們農場為了這 80 多頭牛，專門組建一個車間，成立一個飼養班、一個擠奶班，還徵一個生產隊來供草。此外還建有黨支部、團支部，好大一批人。就算是非常低的工資，每年都虧本。有一年我們農場虧損了 50 萬元，我算了一下，全體職工一年就是坐著耍，只發工資也只虧 30 萬。

四〉、我的右派生涯

我家幾姊妹，我算運氣最好，剛解放時讀初中還需要硬考，很多人考不起。

我一向成績好，考上了。我們那個班上的同學大多都是地主子女，因為家裡都比較重視教育。後來讀書主要就講出身了。所以，我們幾姊妹只有我受了完整的教育，其他幾個不是文盲，就是唯讀了幾年小學。

文革時謝成陶回家鄉與五個弟妹合影

我 1956 年上了大學——在會理師範學校畢業後進入重慶師範專科學校。我的專業是數學，那時，我成績特別好。

1957 年，搞大鳴大放，共產黨叫我們鳴放，我不願意鳴放，自個到圖書館去看書。但不行，每個人必須發言，我們班 30 個人坐成一圈，一個一個地發言。我那時擁護共

當右派後謝成陶與另一名學生右派黃道機合影

產黨，沒有二心，我父親被鎮壓了我都沒管。班長一再啟發，每個人必須提意見，我挖空心思，提什麼意見呢？我想起 1956 年初，我在會理街上看到很多農民坐在那兒，樣子很悲戚，見到有吃剩的就去抓來吃。我上前詢問，他們說，糧食被國家統購了，統購得太多，沒有留足口糧，餓得遭不住。

我覺得這個意見可以提，供共產黨參考。於是我說，是不是統購多了，希望共產黨注意一下這個事情。當時我是真心關心黨，覺得黨改好了，中國就會更富強，根本沒想到這幾句話會給我帶來大難，因為共產黨、毛主席說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1957 年 6 月 30 日，還差一個月我就滿 20 歲時，反右鬥爭開始了。我第一個挨批鬥，黑板上用彩色粉筆寫著粗大的字「同右派分子謝成陶鬥爭到底」。我當時很氣憤，認為共產黨說話不算數，「言者無罪」是放屁！在鬥爭會上我說：「再隔 20 年看我是否是對人民、對祖國、對黨忠心耿耿的人。」班長立即起鬨說，這是右派分子認為共產黨 20 年後要垮臺，於是領呼口號：「打倒右派分子謝成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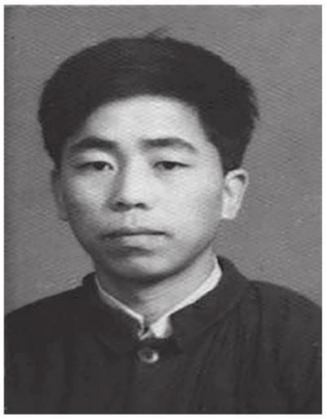
從此，人人都避開我。我當右派的罪名是「攻擊黨的統購政策」。當然，劃我右派有一個主要原因，我父親是地主，並且被共產黨鎮壓。

1958 年，學校通知我到重慶市 67 中學（原重慶大坪初級中學）報到。據說當時政策允許右派分子教數、理、化，但不能教語文、政治等。67 中的校長溫自強是一位剛滿 30 歲的女性，她外表漂亮心地善良，對學校管理很在行。在她的領導下，我受到了人的待遇，得到了人的尊嚴。

1960 年 5 月 8 日，大坪派出所突然把我抓到公安局辦的集改隊勞動改造。溫校長說我表現很好，竭力想保我，可是沒用。

後來得知，抓我的原因是中央有一個領導要來重慶，並且要住在大坪中學附近的潘家坪。於是，為了領導的安全，也為了執行公安部「政治上純潔城市」的指示，凡是沒有達到勞改、勞教的「五類分子」，都必須集中改造。從此，我走上了長達 20 年之久的勞動改造之路。

謝成陶在江北農場挑糞勞動



謝成陶 1965 年

我們被押到重慶公安局辦的東風農場，由公安押著我們「南征北戰」——到處下苦力為他們掙錢。

1960 年下半年，我被調到重慶水泥廠小南海採石場擔運礦石，每天從採石場擔礦石到兩里外的長江邊的木船上，日定額 60 挑，每挑 100 斤。當年重慶天氣氣溫很高（40℃左右），但這還不是主要的。要命的是吃不飽飯，又累又餓奄奄一息，除了難以完成的勞動定額，每天晚上還要學習，評查是否做到「七無、八好」，什麼無逃跑、無反動言論、無蝨子……表現不好動輒批鬥，觸及皮肉。

1960 年 7 月 1 日強迫我們加班「放高產」，為黨的生日獻禮，這種超強度的勞動當天就折磨死了五個集改（集中改造）人員。一個叫焦東山的人上床時還與我說了話，天亮時，我發現他一身冰冷死在我的側面。死去的人，拖到外面，等家屬收屍。有的家屬為了「劃清界限」，不來，或者來遲了，屍體不是發臭就是被野物啃了，那種情景慘不忍睹。我特地找陳隊長講，我沒有親人，要是死了請立即用我的被單裹上，深埋在附近山中，一定埋深點，否則被野物刨開要污染環境。

那樣的條件下，我仍拼命地幹活，以顯示對黨的忠誠。

不過，有一件事情我還是動搖過，使我在好長時間都感到不安和內疚。

那是 1960 年 10 月下旬的一天，下班時天已全黑。我拖著沉重的步子，歪歪倒倒地回住宿地。腳下忽然感覺一個像雞蛋大小的東西碰了一下便滾開了。出於好奇，我找到了它，原來是一個小紅苕！估計是伙食團搬運口糧時從麻布口袋裡漏出來的。我的心立刻一陣突突地跳，我生命的火花快熄滅了，有了它，或許我可以多苟延殘喘一夜。但又想，若是私吞了它，是對黨糧食政策的牴觸，與我對黨忠誠的堅定信念相矛盾。上交隊部吧，小紅苕的誘惑力又太大。思想鬥來鬥去，決定還是悄悄把它吃掉。

謝成陶與妻子在江北農場

我選擇蹲在廁所裡偷吃，但它是脆的，剛咬一口，被隔板蹲位的一個人聽到了，就問我在吃什麼。那個年代，除了在食堂吃定量供應的東西，私人不可能擁有吃的。要是被發現，必遭追查批鬥無疑。我不敢再吃了。上交吧，但這時紅苕已有了牙齒印，交上去反而會吃虧。晚上學習時，我心不在焉，總在想如何消滅罪證（丟掉是絕不可能的）。待熄燈就寢後，我終於想了一個好辦法：用口水將它舔濕，在被單上擦去泥土，再咬成花生米大小的小塊，像吞藥片那

樣完整吞下，不發出一點聲音，睡在我側面的人也不知道。大約半小時後，罪證消滅，大功告成。可是，我內心深處好多天不能平靜，覺得自己不忠誠不老實，又添新的罪行。

「我特別喜歡讀書」——謝成陶在江北農場時

1960 年年底，又把我調去修綦江的小羅鐵路。在長約五華里的工地上，有勞改隊、勞教隊和集改隊的各種勞改人員，公安戰士荷槍實彈監督著我們。工傷和死亡的事經常發生。有一次用幾十噸炸藥，炸一個山頭。整個山石和泥土全炸疏鬆了，然後叫我們把土石趕（推）下山，這是一個相當危險的工作，當天就傷亡了好幾個人。

有時，一瞬間一片沙石突然全面滾動，飛沙走石，造成傷亡。有一個人被飛起來的撬摃把睾丸打落了。好幾次，斗大的石頭像雨點似地從我頭上飛過，我差一點也就沒命了。那些日子，我成天籠罩在恐怖的氣氛中。

1962 年，集改隊中的右派被單獨集中到白公館、渣滓洞。我們就住在那些牢房裡，來參觀紅岩村的人認為我們是戰犯。有人指著我說：「你看那個人，他哪像個戰犯。」那時我才 20 多歲。

在白公館、渣滓洞時我遇到一位良師，他叫周同澤，比我大 20 歲，是解放前的大學生，曾當過美軍翻譯。當右派後他每月只有 20 元錢，除了吃飯吸煙外沒有剩餘，所以他穿得破破爛爛像個乞丐。他發現我讀書很用功便主動提出教我英語。在白公館、渣滓洞相處的三年裡，在周老師全力幫助下，我的英文得到極大的提高，十多年後我進入大學教書時，無論是評副教授的考試，還是參考或翻譯國外英文教材，白公館、渣滓洞裡的英文功底起了極大的作用。可惜，這時周同澤老師已經去世了。像他這樣一位憂國憂民、品德極其高尚的人被打成右派，關押勞改，實在是我們國家的不幸。

右派「改正」後謝成陶回冕寧家鄉與五個弟妹合影

在白公館、渣滓洞時我還交了個朋友叫劉家端，他是成都刃具廠的右派。

當右派後他被開除公職，回重慶打零工。

我們在白公館住同一間牢房。他比我大兩歲，1935 年生的。文革時劉家端在南岸區彈子石參加了造反派。後來理麻（清理）他，說他是階級敵人搗亂。

他理直氣壯地說：「中央文件都說摘帽右派可以參加造反派！」他同法官鬧，把法官惹惱了，判了他死刑。槍斃那天在解放碑遊街，他看到我了，他望著我，我望著他。他發不出聲——嘴上勒著繩子，勒得很緊，嘴角血都勒出來了。我看見他胸前掛著牌子，編號是 38。

遊街從解放碑遊到菜園壩，我一路跟著走，下了菜園壩就戒嚴了。槍斃之後我下去看，地上畫著 38 號的地方就是他。唉喲，好大一灘血！劉家端身體特別好，他的血最多。他遇難時大概是 1973 年。

1980 年我去他家，他妹妹告訴我，說劉家端已經平反了，政府承認是冤殺了，賠了 1400 元錢。太少？他還算賠得多的。我們教研室主任王竟渝（音）的父親是個起義人員，他被冤殺後只賠了 400 元。

這件事啟發了我，所以我後來去找王月生，說我父親對共產黨有功，雙手沒得任何血債，也是冤殺，並且害得我當了右派。

採訪時間：2009 年 12 月 28 日

地點：重慶枇杷山公園

採訪後記

2009 年歲末，在參加重慶江北農場的右派聚會上，我與謝成陶先生相遇。我原本已不打算再採訪右派，可謝右派無意中提到土改，這立馬吸引了我。第二天，我便打去電話，希望去他家面談，他把我約到了枇杷山公園——他們右派們要在那兒搞年終團聚。

我們找了公園餐館的一個房間，閉門談了兩個多小時。謝成陶先生當過多年教師，口述力很強，經歷也非常豐富，最讓我感慨的是，他在多年的恐怖和勞改中，一直勤奮地學習，正直地做人。1979 年，右派「改正」後，謝成陶先生登上了大學的講臺，因其勤奮、才華和正直，被評為重慶交通學院副教授，並兼任學院圖書館館長。此外，他還獲得「重慶市勞動模範」和「四川省職工勞動模範」的稱號以及「四川省高校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

一個地主的兒子，他的那些優良素質，是遺傳的呢，還是在艱難中煉就的，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二十六、古宅，強奪賤賣
書香，斷弦滅音

講述人，胡慶生

雅安天全縣始陽鎮興中村村民

1945 年生

元朝末年，朱元璋造反，天下大亂，我家祖先胡泰鵬為了避難，從重慶逃到天全縣來。那時很艱難，祖上好幾代人，窮得很，婚都結不起，只得去給人當上門女婿。後來，家族通過讀書、做官，慢慢發達起來。我曾祖父在重慶梁平縣（當時叫梁山）當了管教育的官員。我的伯祖父，也是很有學問的人，他在雅安的一所學校當終身教師。到 1949 年時，我們胡家已經是一個大戶人家，在始陽鎮有了一個占地 5000 多平方米的胡家大院。那時我們胡家沒人當官，無權無勢，但很受人尊重，沒人欺負我們，原因是我們胡家多年辦教育，子弟眾多，也就相當於有了一個保護網吧。

1950 年，共產黨、解放軍來到天全縣，第二年就開始搞土改。當時我們是兩房人，都住在大院裡，我們馬上被從大院裡趕出來。我們那樓上，有整整一屋的書，好多都是手寫本，因為我們好幾代人都是讀書人。我父親也是教師，但他在我兩歲時就去世了，那時他 45 歲。

一個地方，可以因一幢建築而出名。我們那個胡家大院，就是天全縣很有名的古建築，為這房子，土改時還殺了我一個堂叔！我們一看，保命還是保房？當然是保命！我們就被掃地出門了。

那些幾代人積下的整屋的書也從此消失。

大院被當局做為糧食倉庫，上世紀 80 年改為住糧食局的幹部。2005 年，糧食局的局長，把大院賣給了他的親兄弟。當時，外面有人出十幾萬都不賣，但賣給他兄弟，五萬！我們那個大院，是古建築，很有收藏價值，還有，光那塊地就有十多畝。

（注，關於胡家這個大院，媒體幾年前作過專訪，詳見後面節選一、二。）

土改時我才六、七歲，鬥打地主時他們不要我去看，但我還是看到了，他們把地主反捆起來吊到屋樑上打，把地主屎都吊出來了。

我家有個親戚叫高成武（乳名叫狗兒子），他有點文化，在地方上有些號召力，共產黨就要用這種人來幫他搞土改。於是他忙起來，幫共產黨搞劃成分、分田

分地……劃成分時，什麼地主貧農，他也搞不大懂。我們街上有個人被劃成地主，他兒子在雅安，傳回信息：劃成了地主很麻煩（要遭殃）。於是他找到高成武說：「你是瞭解我的，怎麼把我劃成地主？」你想不到我這個狗兒子大哥怎麼說？他說：「么爸，這個成分安逸（好），我（本人）都劃的地主。」

土改一忙完，共產黨卸磨殺驢，立馬就把他殺了。把他綁赴刑場時，他表現得還很英勇，對沿途圍觀的人說：「各位親朋好友，失陪了！」他看到人群中有他一個朋友，就衝他說：「我娃兒還小，請幫忙收屍。」他死後，果然是他朋友拖床席子掩埋的他。

高成武被殺是被報私仇。1949 年前，有一個地下黨，姓羅，裝扮成叫花子（乞丐），在我們始陽活動。解放軍打來時，他大叫：「老鄉們，不要去抵抗，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高成武給了他一耳光，意思是你懂什麼？這一耳光讓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死時不到 30 歲，留下五個娃娃，最小的剛生出生。

我們始陽土改時還同時殺了一對父子，父親叫徐福原，作為一貫道反動頭目槍殺。兒子徐和新是劉文輝 24 軍的起義人員，也被農會押來。在綁赴刑場時，父子倆表現得很英勇，沿途群眾高呼口號「打倒反革命」時，徐和新放聲大罵。

先打的父親，因為還是講究不讓白髮人送黑髮人。輪到兒子時，他大叫一聲：「爸，我來了！」徐和新後來平了反，他的另一個兒子叫徐和志，他有兩個老婆，小老婆大饑荒時餓死了，大老婆文革時投水而死。

我伯祖父的兒子叫胡祥（我叫他四爸），土改時被槍殺。他的兩個內弟，一個叫黃鏷（曾任滎經縣縣長），另一個叫黃鋰，是起義人員，從軍到朝鮮，但也沒逃脫，農會一個條子把他弄回來同他兄弟一起打死了。這兩人都有不少親屬在美國，1979 年三中全會後給他們平了反。

土改時，那些所謂「貧下中農」都是流氓無產者。我們鎮上那個農協會主席就是我們當地地方上好吃懶做的傢伙，她五短身材，挎一把盒子槍，吊在屁股下面，帶子很長，她不會收，槍在屁股下一甩一甩的，又滑稽又難看。土改時她威風得很，說誰是地主誰就是地主，說把誰抓出去打了（槍斃）就把誰抓去打了。

我們始陽有兩大廟子，一是城隍廟，二是大碑石，城隍廟是清朝雍正改土歸流後建的，大碑石建於南宋，有上千年的歷史。這位貧協主席帶人把這兩座古廟全砸了。

說是因果報應也罷，說我們農村人講迷信也罷，這個貧協主席後來一家人都遭了報應。大饑荒時，她男人偷殺生產隊的牛，被公安抓進監獄，餓死在牢房裡。

接下來這個貧協主席也餓死了。她1955年生的那個兒子，因他媽做的壞事太多，受到周圍人的白眼和譴責，他為了贖罪，到處去塑菩薩。但他壓力太大，神經錯亂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投河而死。

1949年後我們一直挨整，地富反壞是階級鬥爭的活靶子，隨時隨地被抓出來鬥打。生產沒搞好，怪「四類分子」，抓來鬥；要促進生產，先鬥地富分子；隊長的豬吃農藥死了，認定是地主富農投毒（後來真相大白，但把地主冤枉整了就整了。）……我母親胡鍾氏是1917年出生的，她是黃花閨女填房來到胡家。

1947年我爸去世，1949年「解放」後她就開始挨整。在她50歲那年，1967年，文革階級鬥爭非常殘酷，她終於經受不住了，投河自盡。她是在中秋節前投河的，中秋是一家人團圓的日子，但我們與母親已經陰陽相隔。

我媽是一個典型的克己待人的女人，自己不吃不穿都要照顧別人。

在大饑荒時，我們胡家餓死五個，一個堂弟（胡文生）、一個堂妹（胡瑞芬）、一個祖母、兩個叔叔（胡子鴻、胡子鶴）。

我們始陽鎮上有個貧下中農，文革時說的一句話，我覺得很有哲理。他說：「毛澤東發一把刀給你，再發一把刀給我，讓人們互相砍殺（階級鬥爭），這樣人們就不找他要飯吃。」

我小學畢業就不准我讀書了，我永遠記得把我趕出校門時說的那句話：「教育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這樣，我13歲就被趕去出工勞動，不去就不准吃飯——那時是吃公社食堂。不准吃飯，這個好可怕！所以，我很小就當了人民公社社員，

胡夫人（結婚時）

從此當了一輩子農民。

我這輩子沒受到什麼教育，但是，遺傳基因起作用，我一輩子都愛書，更喜歡讀書。文革時我沒有參加造反派，如果參加了，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偷書，其他什麼都不要。我也特別喜歡結交讀書人。

（注，關於胡慶生酷愛買書、讀書，媒體作過專訪，詳見後面節選三。）

那些年，我不敢結婚也結不起婚，哪個願意嫁給一個地主子女？我是在改革開放後才結的婚，那時我都四十多歲了。我有一個女兒，她大學畢業後當了一個教師，算是把土改後我們胡家中斷的書香續上了。

採訪時間：2015 年 7 月 22 日

地點：雅安天全縣始陽鎮

採訪後記

幾年前，在大邑縣劉文彩莊園採訪時，偶遇胡慶生，但一面之交，沒有深談。

後來，他在網上看到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作的關於川東土改的演講，便來電一再邀請我去始陽一聚。但我很「勢利」，直到得知他是地主子女後才專程前往。

本來，這本土改採訪錄早已排完版，已有不少案例，但不知何故，只要一聽說有人經歷了和瞭解那段歷史，我便有些身不由己，無力抗拒。

然而，胡先生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對那段歷史的講述，而是他對書的酷愛和他那間書房。

走進胡先生的家，已經見多識廣的我還是有些不適應，低矮、陰暗、狹窄、破舊；屋後的豬圈，樑上的蛛網……

然而，在幾間屋的中央，有一個整潔儒雅的書房！裡面，燈明玻淨，電腦屏光閃閃，書畫暗香幽幽，還有幾件樂器，胡先生竟捧起吹出一串悠長樂音！

胡慶生 1979 年

彷彿荒寒沙漠中陡然出現一泓清波漣漣的綠洲，讓人竟一時困惑這種反差。

當胡先生從電腦上調出《雅安日報》對他的專訪〈農民「書癡」，藏書三千〉一文時，我長歎一聲：被宰殺的豈止是肉體生命；被搶奪的哪只是金銀財物。

慶幸的是，遺傳基因還沒被剿滅。只讀過幾年小學，當了一輩子農民的胡慶生，在祖輩傳下的、暴政搶不去的基因驅使下，一輩子嗜書如命，一輩子苦讀不已！

胡家的那個著名大院，就在胡慶生破舊平房的對面，現在這大院已經又屬於私人財產。我很想進去看看，但院門緊閉，主人不在，我只得爬上院外的一幢樓房，探望了大院的一角。

下面是《雅安日報》刊登的關於大院和胡慶生藏書的報導（節選）

節選一

邊城舊事，家族興衰七百年

明太祖洪武六年 1373 年，胡泰鵬便帶著幼子西入天全避亂，從他開始，胡家的香火便開始在天全境內播撒。

第九代傳人胡國統本是一名醫生。他憑著精湛醫術積攢了些財富，遷徙到始陽買房置地。

到十九世紀初，胡氏分支已經廣布天全，其族眾興旺，財力殷實，成為當地最興盛的家族之一。

1807 年，胡氏集全族之力， 於始陽老街上興建大宅院，以聚合家族旺盛人氣。

這就是今天的胡氏舊居。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裡，做為胡氏家族的祖屋，這裡一直很熱鬧。

……

進了大宅門，楨楠樹生長在堆放茶葉庫存的前院。沿著寬闊主道往裡走，就到了雕花照壁。當年，這裡是胡家的「生活區」。

在一百多年前的遙遠秋天，黃透了的銀杏搖曳在花園，後院裡花草染金。

高大堂屋裡，供奉著家族先輩。香火繚繞間，成年男丁聚集在胡老爺身邊，聽一家之主分配經營任務，也發表自己的意見。

每天上午，大宅院裡都會響起琅琅書聲。

今年 69 歲的胡林生覺得，家族舊居裡埋藏著他的童年記憶。他是胡慶生的三哥，同為胡家第十七代傳人。他說，他小時候就在四合院裡唸《三字經》，背《唐詩三百首》。那時候的四合院很氣派，他長到十幾歲才搞清楚院子到底有多大。

胡家老宅一角

二十世紀初，龐大的胡氏家族家道不振。商業破產之後，私有土地也紛紛變賣。到民國時期，憑藉「耕讀傳家」家訓，通曉詩書文章的胡家人開始「靠文化吃飯」，在沒落宅院裡辦起了學堂。

胡慶生說，當時學堂就設在四合院的堂屋裡，老師全部是胡氏後人，始陽場上有錢人家的子弟都來這裡上學。靠著崇文家風，胡氏家族繼續在老宅院裡生活著。

上世紀四十年代，劉文輝發起「鏟煙」的禁毒運動，國民黨第二十四軍的一個營奉命來到天全「鏟煙」。這支部隊進入始陽後，沒有營房駐紮，便跑到胡家舊居裡歇腳。

胡慶生說，那麼多兵都能夠住進去，可以想像四合院規模有多大。

解放後，胡氏舊居收歸國有，成為「天全縣糧食局始陽供糧倉庫」。直到前幾年，被一位當地人買下，成為私有財產。

節選自《雅安日報》2008 年 11 月 30 日

節選二

胡氏舊居裡湮沒的百年傳奇

巷道深處，竟有雕樑畫棟，屋宇恢弘。儘管已兩易主人，一個龐大家族的顯赫昨天，卻依然埋藏其間。

一條長達三十多米的巷道，安靜地匍匐在天全縣始陽鎮的老街邊。巷道盡頭，一座規模宏大的古老宅院赫然入眼。

這是一座布局嚴謹的明清式四合院。半個多世紀來雖幾經易主，損壞和改建也時斷時續，但庭院的嚴謹布局尚在，規格猶存。其間尚有迴廊交錯，曲徑蜿蜒，殘存的房柱石墩上雕龍繡鳳，精美不輸當年。徜徉其間，仍能感受到宅院當年的恢弘闊綽。

進門處南牆上，一塊巨大的雕花照壁頗為惹眼。雕花上盡為神話人物和吉祥花鳥，雖飽經歲月磨礪，卻仍舊清晰。照壁上共有雕花二十一朵，圍繞著中央一塊碩大的吉祥雕花「合團歡抱」，隱隱透出胡家人當年的顯赫。

胡氏後人胡林生說，整個宅院占地約五千平方米。現在部分院落已經拆除改建，規模已不如前。

胡氏舊居現在的主人姓高，聽他的岳母講，他準備以後將這座古四合院復原。

天全縣文管所所長楊寒認為，規模如此宏大的民用四合院，在始陽當屬獨有，在天全亦為罕見。「對於明清時期南方四合院的研究而言，這座結構相對完好的四合院，具有『樣板房』意義。」

從牆外望胡家大院

在等級森嚴的古代中國，各種建築都帶上了深深的等級烙印，即「規制」或「規格」。

四合院中軸線上，廳堂和迴廊環繞而成的天井稱為「進」。「進」的多少，既體現了四合院的規模大小，也是其所有者身分和財富的象徵。

做為一所民居，它竟然有七個天井。建築中軸線橫穿過其中五個，另有兩個小天井對稱分布於廂房和堂屋之間，呈「七星抱月」之勢，形成了一座「五進」四合院。

正所謂「七進王府九進宮」，在古代，「五進」的規制已經是接近皇親貴戚住宅的「頂級設計」。著名的老北京四合院「文煜宅」，就是一座「五進」的高規格住宅。

能夠修建「五進」四合院的胡氏家族，當年究竟是什麼身分？

胡慶生是家族第十七代傳人。他的家和胡氏舊居僅隔一條老街。老人說，這座宅院大約於 1807 年開始興建，

工程斷斷續續地持續了五十多年，直到十九世紀中期才告完成。

「我們胡家先祖曾是高土司麾下親信，打過張獻忠。後來做起了邊茶生意，成為地方富賈。」胡慶生說。

而關於這個古老家族的疑問，都在胡慶生小小的書房裡煙消雲散。在這位花甲老農的書房，翻閱百年前的手書，輕薄的發黃書頁之間，厚重的家族史詩躍然眼前。

節選自《雅安日報》2008 年 11 月 30 日

節選三：

農民「書癡」藏書三千

一個普通農民，因為好讀書，30 年裡藏書超過 3000 冊，花在買書上的錢超過

了 15 萬元。

好讀書，翻爛字典

胡家曾經在始陽開過茶號，也是當地有名的大族，「耕讀傳家」是家族的傳統。胡慶生很小的時候便被大哥教育著讀書，進了自家辦的私塾。後來，胡慶生的大哥被打成右派。文革，他無書可讀，那是他人生中最枯燥灰色的一段歲月。

「當年手頭只有一本新華字典，硬是翻來覆去地看，把字典都翻爛完。」胡慶生從書櫃中拿出一本書頁已經破舊散落的字典。

為買書，沒錢過年

上世紀 80 年代初期，胡慶生在石棉縣打工，剛發了伙食費，他便立即去買了心儀已久的《隋唐演義》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正值年關，買了書，伙食費所剩無幾，只得買一根鹵豬蹄過年。「為了買書，我寧願餓著肚子！」他說。

1982 年，胡慶生到外地打工，領了 50 元工錢，他轉身就去買了一本厚厚的《辭海》。

三十年下來，胡慶生花在書上的錢超過了 15 萬元，「每一分錢都是血汗錢，這讓我的書變得更有價值。」他說。

悟人生，往事並不如煙

胡慶生買的第一本書是《葉評注聊齋志異選譯》，這本書的封面已經遺失，但他覺得「這本書給我開闢了一個新的世界。」

藏書三千，深深打動胡慶生的，是一本《往事並不如煙》。每次看這本書，他都會流淚。

「一讀這本書我就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我的大哥。」

讀《楊乃武與小白菜》，胡慶生說自己從中知道了什麼是人性，看到了一個社會的悲劇。讀史書，讓他知道，不管在什麼時代，都不能說假話，哪怕只能選擇沉默。

譚松與胡慶生合影於胡的書房

找回失落的書香傳統

俗話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對此，胡慶生覺得俗不可耐。他認為，人更應該在書中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

藏書幾十年，胡慶生的真正想法是，將

「耕讀傳家」的傳統傳承下去。

胡家先祖在天全曾任文官，世代藏書。至清末，胡家收藏的書籍堆滿了一層樓，其中不乏明清時期的孤本、珍本。而這些書籍已全部遺失了。

胡慶生一直想恢復祖先的傳統，藏書被他認為是最好的辦法。「胡家先祖一直有藏書的傳統，我就想到通過藏書來發揚祖先的傳統。」

對於他現在的收藏，胡慶生覺得有一些無法彌補的遺憾。「有些書一輩子就見過一次，可惜當時沒錢買。」

胡慶生說，他將窮盡一生之力來收藏書籍，在有生之年達到 5000 冊。

胡慶生想把藏書傳給女兒，他女兒是個教師，對父親的想法很認同。「書由女兒一代一代地傳下去。同時要求他們拿出一些錢來增添新書，經過幾代的積累，就能達到一定的規模。」胡慶生說。

節選自《雅安日報》2008 年 11 月 30 日

胡慶生曾花了大量時間，一個個落實當地在大饑荒時餓死的鄉親，下面是他列出的名單：

原天全縣始陽人民公社勞動管區第六食堂
「三年大饑荒」死亡人員名單

按：隨著歲月流逝，「三年大饑荒」（官方稱「三年自然災害」，百姓稱「糧食關」）離我們越來越遠。倖存者們或作古，或高齡，又因種種原因而少有著述，因此社會對該事件的記憶愈來愈淡漠。然而，做為該事件的親歷者和倖存者，我有責任把我所經歷的苦難如實地記錄下來並告訴後人。

現將我所在的天全縣始陽人民公社勞動管區第六食堂（或稱勞動管區第六連）即現在始陽鎮興中村 5、6、7 三個村民組死亡人員名單開列於後（憑筆者記憶和不完全的採訪）：

廖山氏（廖有雲之母，時年不足 50，1960 年春上山割草餓死在山上）
廖水華（廖有雲之胞兄）及其女兒（佚其名，死時年僅 3 歲）
王山氏（王永吉之母）
邱興楊（邱玉春之父）王國英（邱玉春之嫂）

夢 夢（音，王國英之女）
田宋氏（田素珍、田素林之伯母，人稱「扁三娘」）
張文榮之叔祖母
高成武之母（佚其姓氏，高啟智、高啟仁之祖母，此老嫗一生篤行善事，虔誠拜佛）
黃張氏（張孝雲之姑母，人稱其「悶三姑娘」）
劉品亨夫婦（劉嘉珍之父，妻高仕英乃續弦，劉嘉珍之繼母）
胡開文及其侄（佚其名，胡開武之子，因耳背，人稱「聾子」）
胡開貴（號曼生，胡開學之胞弟，胡「老砍」之父）
楊淑羣（胡開學之續弦，民國時期蘆山縣長楊方書之胞妹）
李樹芳（李鳳榮、李鳳梧之父）
李樹芬（李樹芳之胞兄，李鳳華之父）
李小牛（李樹芬之幼子，死年未及７歲）
打更匠老李（外地人，1949 年前徙入始陽，清道夫兼打更，時寄居高天德家）
官溪頭阿伯（佚其姓名，時人以此呼之）
古妙六（人稱候阿娘，有一養子，名王正全，後在本鄉蕩村安家）
高國珍（李進懷之髮妻，李長春之生母）
汪 雲（汪天文之父）
愛娃兒（汪雲之幼子，死時未及５歲）
陳秉潔（高文輝之妻，高美燕、高小燕之母）
韓召惠（又名韓沛棠，曾任民國區分部書記一度被勞改）
韓召惠家幫工（胡姓，佚其名，人稱胡阿伯）
張淑嫻（韓忠鑫之妻，韓沛全之母）
趙韓氏（無後裔，當時居於高文貴家）
高文榮夫妻（高文貴之胞兄，人稱「老本份」）
趙炳先夫妻（妻陶氏，趙登榮、趙登華之父母）
高聯方夫妻（其妻候氏，高崇儒、高崇光之父母）
高美珍（高崇儒、高崇光之胞姐，小名「珍蘭」）
黃 河（黃平之子，小名「水清」，死年未逋８歲）
高學海（高登雲、高淩雲之父）
* 高氏（佚其夫家姓氏，高學海之胞妹，死時年近耄耋）
高學華（高顯雲、高祥雲之父，「悶屁」之祖父）
高高氏（高學深之妻，高青雲、高孝雲之母）

劉文斗夫妻（妻賈氏，劉殿華、劉殿富、劉殿貴之生父母）
劉家五姑娘（劉文鬥之胞姐、牟鎮新村 5 組段啟惠之外祖母）
徐和志之岳母（佚其姓氏，夫家胡姓，胡開甲之母）
高學清（無後裔，其妻亢氏後為生產隊五保戶）
楊宗德（小名孟春，楊銀匠之子，60 年管區安排上山揹煤炭，餓死途中）
胡肇元（胡之潤之父）
蘆興順（雲陽縣人，政權更迭前來始陽，居於心街子口擺小攤維生。）
盧成基（黃宣仁之父）
呂高氏（呂祥順之妻，呂文皋之生母）
黃張氏（黃學榮之祖母）
魏懷興（人稱「魏錫匠」，魏洪雲之父）
彭懷安（彭興順之子，彭冬全之父，時年 30 餘歲）
羅山氏（羅祥雷、羅祥雪之母）
羅李氏（羅祥明之妻，羅八達之母）
程紹珍（羅祥倫之妻，羅文清、羅文遠之生母）
李＊氏（佚其姓氏，李春方之母）
胡光前夫婦（妻高文香，育有二女）
劉殿武（劉洪生之父）
楊銀春（楊王氏之夫，無後裔）
高秀英（高國啟之妾，有二女，長女素華嫁安樂鄉毛坪山，次女由其姑媽帶至陝西）
廖聾子（佚其名，耳背，人稱「聾子」，曾賣「缽缽雞」）
胡羅氏（筆者堂叔母，胡貴元之母）
廖廷蓮（廖有梁、廖季能之胞姐）
李光榮（李明全、李明貴之父）
汪樹萱（裁縫，汪天福之父）
張占魁（張正清之父）
全 香（李明珍之女，全福之胞姐，時年未滿 15 歲）
宋玉蓮（高慶忠之養母，人稱「宋家二姑娘」）
孫全興（人稱「孫染匠」，可能是邛崍一帶人，政權更迭前來始陽）
曹蘭英（筆者族兄胡明禮之續弦，胡光祺之繼母）
胡孝忠（筆者族兄，其親屬大部於政權更迭前相繼定居香港，致 60 年代初，不時有營養品諸如煉乳之類通過郵政寄回，然多被當局沒收，並冠以「投機倒把」

罪名將其收押，1962 雲初病瘐於天全縣公安局看守所）
段謝氏（段崇臬之妻，段啟文、段啟武之母，段克昌、段美昌之祖母）
胡清芬（筆者堂姐，死時 24 歲。其舅父黃鏷民國時期曾任滎經縣長）
史張氏（史國光之妻，史全珍、史全清之生母）
高瑞軒（曾任始陽聯合診所醫生，高永全之父）
楊明英（楊忠仁、楊忠義、楊忠康之父）
解婕春（無後裔，人稱「李阿娘」，當時居於楊明英家）

上列共計死亡 82 人

後記：

當時，筆者所在食堂總人口 512 人，死亡率達到 16%，「三年大饑荒」中，雅安地區的「重災區」並非天全，而是滎經和蘆山。始陽也不是天全的「重災區」，天全的「重災區」依次為永盛、大寨、永興……

（注：關於滎經縣在大饑荒時的死亡慘烈已有《大劫難》一書披露，作者：童梓平、阿寧）

始陽鎮

二十七、地主，槍殺；工商業者，綁票！

講述人：葉中仁

雅安市退休職工

我 1941 年 2 月出生，今年 74 歲了，土改時我還小，但那 10 歲時的印象現在都很深。

那是在雅安的一個鬥爭地主大會。

雅安有個地主叫畢光奎。以前劉文輝在雅安搞了一個西康省幹部訓練團，那兒有一個很大的壩子，批鬥畢光奎就在那個壩子。我去看熱鬧。會場上有一個老太太，用鞋底板打他的臉。

鬥爭會完後，畢光奎被押到城邊的飛機壩，那兒曾是個機場，抗戰時還停過飛機。我跟著跑去看，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打死人。打的腦殼，我感到很恐懼，口袋裡的花生米都感到厭惡，抓出來丟了。畢光奎被打死後，衣服都被人扒光——那時窮，死人的衣服都有人要。其實，畢光奎是個很善的人，他死時才 40 多歲。

我家不是地主，我堂妹的婆家是地主，她婆家在雅安蘆山縣，是當地的一個旺族，也是一個書香世家。這個書香世家裡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兒，叫唐和玉，是我堂妹夫的姐姐。她被抓來捆綁吊打，吊「鴨兒鳧水」。

焚燒地主田契（網路圖片）

她被打得沒法，跳到糞坑裡自殺了。為什麼跳糞坑？大概是她沒有選擇，連走到河邊投江的自由都沒有了，只得跳糞坑。唐和玉不是地主，僅僅是地主的子女。

我岳父是個知識

分子，自小在外讀書，但他家裡是地主。他的哥哥、嫂嫂受盡折磨。不過我岳父的二嫂承受力很強，無論怎麼打她，把她壓按在糞水裡，她都挺過來了。

我們家是個書香世家，1949 年前（我從來不說「解放前」、「解放後」），家裡開店賣書、賣文具、後來又賣百貨，屬於工商業者。

1953 年，搞「三反」、「五反」運動，說我們家偷稅漏稅，先把我伯父（他同我父親共同經營）抓來捆綁吊打。那些日子，天天傳來信，叫我們趕快交錢，賠！賠！賠！賠完了才放人。

要賠多少呢？我們進入「新社會」後才經營了兩三年，就算每年都偷稅漏稅，應該賠多少？

後來才明白，是要我們傾家蕩產！

我父親三弟兄，把家裡所有能賣錢的東西——貴重到狐皮長袍，便宜到一支水筆——全部擺攤賣，賣了馬上交錢。他們說：「還不夠！」我們最後只得把房子賣了。據說還不夠，但是看到我們已經一貧如洗，他們才「寬大」處理，放了人。

從此我們這個家族破敗四散，父親三弟兄、爺爺奶奶，各奔東西。

後來我爸爸的弟弟餓死了，留下三個女兒。我爺爺也餓死了，他去世時我站在他床邊，親眼看到他斷氣。

我父親一家子女多，吃了上頓沒下頓，全靠外婆家救濟，我們才活下來。只是，1957 年，父親又當了右派。1977 年，我又被冤打成現行反革命，判刑 20 年，與文革時重慶「八一五」造反派的頭頭周家渝關在一起，在南充四川省第一監獄。

不過我沒坐滿，6 年零三個月後平反釋放。

採訪時間：2015 年 7 月 23 日

地點：雅安天全縣始陽鎮

採訪後記

在天全縣採訪胡慶生先生時，他約了他的幾個朋友從雅安趕來相聚，葉先生是其中之一。交談中，感到葉先生胸中淤積了太多的悲憤，輕輕一觸碰，便是悲情淚光的閃爍。當提到身旁陳尚健女士一家 8 口人之死時，他竟熱淚滾滾。

可惜，由於下午匆匆離去，對葉先生的採訪淺嚐輒止。

二十八、我們徐家的興衰滄桑

講述人：蔣可煌

1949 年生

你來採訪這段歷史，我非常高興，中國這一百年的歷史，是最苦難的歷史！

一〉、我的家族

我的老家在江蘇宜興，曾是個顯赫的名門。

我奶奶叫徐玉梅，她父親叫徐致靖，是清朝翰林院的進士，在禮部任職，是正二品的禮部右侍郎。我們都知道「戊戌六君子」，1898 年 9 月 28 日，譚嗣同等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殺，史稱「戊戌六君子」。其實，當年本是七君子，而不是六君子。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後，徐致靖、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七個人一起被捕。這七個人中，徐致靖排第一，他不僅官位最高，還保薦了很多維新黨人，慈禧太后最恨他。因此，慈禧太后要處斬的不是六個人，而是七個人，這個第七位「君子」就是我太祖爺（曾祖父）徐致靖。後來為什麼說是六君子，就是因為我太祖爺沒有被問斬。慈禧太后要殺我太祖爺，除了他支持新政，上過許多變法改制的奏摺外，主要原因是他上〈密保人才摺〉，向光緒帝保薦了康有為、譚嗣同、張元濟、黃遵憲、梁啟超等人。慈禧太后要殺的人中，他排在第一個。

徐致靖

太祖爺為什麼沒被殺呢？這得說到他的父親徐偉侯。徐偉侯與李鴻章是密友，他們在 1847 年同時考取進士，私交很深。太祖爺下了大牢後，他的兒子徐仁鑄（他也是進士）去求李鴻章，李鴻章又去找王爺榮祿幫忙。榮祿去求慈禧太后，榮祿看到判罪名單，第一名就是徐致靖，判的是

「斬立決」，下面是譚嗣同等六人。榮祿說這個人不能斬，他是翰林院的一個書生，他的學生遍天下，如果殺了他，朝野會有震動。他沒有政治抱負，平時也不參與政治，當時皇上想要維新變法，他只是把這些年輕人推薦給皇上。西太后看在一個王爺、一個中堂的份上，把「斬立決」改為「斬監候」（相當於現在的死緩），這樣我太祖爺就把命保住了。他在獄中蹲了兩年後，八國聯軍打入北京，慈禧太后西逃，刑部大牢無人看管，家人把徐致靖接出來。後來慈禧回到北京，下詔赦免了太祖爺。他出獄後歸隱杭州姚園寺巷，自稱「僅叟」，意思是自己是唯一一個戊戌變法裡活下來的人，直到 1917 年病逝。對了，關於我太祖爺的事，網上有大量的報導，比如〈「戊戌第七君子」徐致靖何以能刀下留生〉、〈大難不死的戊戌第七君子〉等等，你可以上網查看。

二〉、我的父母

下面我再講講我的父母。

我父親蔣思豫 1914 年出生，1936 年復旦大學畢業，學的是新聞專業。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他在武漢第三戰區駐京辦事處工作，1938 年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三廳任宣傳幹事，當時，上呈的行文都是由他謄寫。

蔣可煌在台兒莊大戰紀念館父親的雕像前

他還身兼《中國青年》編輯和《中央日報》、《掃蕩報》記者。做為戰地記者他親歷並報導了台兒莊戰役和武漢保衛戰。台兒莊戰役打響一周後，他同《大公報》記者范長江、《新華日報》記者陸怡前往台兒莊前線採訪。

好幾個記者都在戰場上傷亡了。在武漢保衛戰時，他多次鑽進戰場的散兵坑裡採寫新聞，向外界介紹戰況。現在台兒莊大戰紀念館給我父親塑了一個雕像。

蔣思豫抗戰時為張靈甫（前左二）等將領拍的照

1949 年大陸淪陷前（我從來不說「解放」），我父親擔任貴州省黨部的主任秘書，屬於二把手，還擔任過中統西南區的代理主任，這時他已經是少將軍銜。抗戰期間，父親一直跟著蔣公（蔣介石）在重慶，他與蔣公同姓同宗。他很年輕時官位

就很高了，他的毛筆字寫得非常好。

1949 年時他沒去臺灣，因為當時我媽媽正懷著我，挺著一個大肚子。同時，他考慮到奶奶在江蘇守著那個徐家大院，我的外公外婆在寧波，他們都不願走。

更主要的是，他認為他為共產黨做了很多好事。比如，他在當中統代理主任時，接到梁漱溟、邵力子的親筆函，希望他救關押在貴州的息峰監獄的中共地下黨負責人，一個是西南聯大的黨委書記肖尚華（音），另一個是貴州省的地下黨省委書記劉建秋。父親救了這兩個人，所以後來他沒有被拉回貴州槍斃。

但是，1950 年 4 月 27 號，他在上海被抓捕了，關押在提籃橋監獄，副市長潘漢年和公安局長楊帆親自審問他。父親幸虧是在上海被抓，也幸虧他救過中共地下黨的負責人，當時楊帆說，如果我不把他抓起來，其他地方抓他，他十個腦袋都保不住。

父親沒被槍斃，但被關押了整整 26 年（先關在東北撫順，後關在安徽），直到 1975 年特赦國民黨縣團級人員他才回到家鄉。

同我太祖爺一樣，我父親的情況網上有大量的報導。

我母親徐敏蕾是滿清正黃旗的後代，她的爺爺是滿族鎮守武漢的大將軍的後代。媽媽兩歲時在武漢被送給了漢人，她是在 1964 年找到自己的兩個哥哥後才瞭解到自己的身世。可惜，她的兩個哥哥在文革時都死於非命，所以母親以前的身世就不太清楚了。

1941 年 4 月 8 日，蔣思豫與徐敏蕾在衡陽樂園大酒店結為伉儷，宋美齡作婚姻介紹人與證婚人。

我媽媽長得很漂亮，身材也非常好，比那些上海的電影演員還漂亮，號稱絕色的民國美女。當時上海中國照相館裡四十八寸的彩色大照片，都是掛的我媽媽的像。

1941 年，媽媽正在重慶的一所學校裡上學。有一次，蔣介石和宋美齡到學校視察，宋美齡見到了這個美麗的小姑娘，覺得她很可愛，就與她聊了起來。當瞭解到她與蔣介石是同鄉後，宋美齡就認她做了乾女兒。在重慶時宋美齡最喜歡她，宋美齡到昆明去時，帶了三個女孩子，其中就有我媽媽。

宋美齡還是我父母的婚姻介紹人與證婚人。

父親被抓捕關押時，我母親才 25 歲，她四處奔波，找人營救。她找到上海市的主要領導，還找了很多著名的民主人士，如上海的七君子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等人。當時也有很多人幫她，一是因為她長得漂亮，二是看她的確可憐。他們悄悄給她包裡塞點錢，接濟我們的生活。但這不是長久之計，他們於是介紹她去工作。最初去的是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際處，他們一看，不僅人長得漂亮，字也寫得非常漂亮。可是，當得知她丈夫去年被關押，交際處就不幹了，叫她離婚。

徐敏蕾

文革批鬥徐敏蕾現場

母親說，潘漢年親口給她講，父親最多三年就會放出來。她要等他。

她不知道，父親要被關押 26 年。

她後來到虹口區第四中心小學當了老師，獨自一人撫養我們三弟兄。

文革到來時她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罪名是抗戰時在宋美齡的航空委員會裡工作過。她被抓出來鬥打，說她是化妝成美女的毒蛇，混進了教育隊伍。她被開除出教師隊伍，關進了大牢。改革開放之後她才獲得平反。

文革時我也被抓來掛牌子批鬥，原因是他們要我改名字。他們說：「可煌？你還想你們蔣家輝煌？」

三〉，我的奶奶

奶奶的父親徐致靖在宜興老家有三百畝地和一個大院——徐家大院。戊戌變法後，她父親和她的兩個哥哥徐仁鑄和徐仁鏡都流亡外地，沒有再回鄉，所以徐家的地和大院都是奶奶來管理。當時，一個婦人來管家是很少見的。

我沒有在徐家大院生活過，我聽我父親和哥哥講，當年大院非常豪華，特別是很有文化氣息。父親告訴我，他小時在家裡看到，中堂的座椅上，有一張虎皮，中堂紅木椅後面掛的是北宋著名書畫家米芾的字。你說現在米芾的字價值多少？上次在香港他的一幅字拍出了一千多萬。還有徐悲鴻，他也是徐家的後代，我奶奶的小堂弟。抗戰勝利後奶奶慶大壽時，他親自畫了一幅畫〈貓蝴圖〉送給奶奶。

父親說，家裡還有很多明清時的畫，都非常名貴。這幾十幅字畫如能留下來，

現在我在美國別說一棟房子，就是一棟高樓大廈都能買下來。

可是，共產黨來了，土改工作隊立馬把我奶奶趕出徐家大院，土地全部沒收。那時她還不知道我父親已經被關押了，後來她知道後天天哭，哭得眼睛都看不清東西了。

她被趕到徐家大院後面一間柴屋裡，柴屋下面堆放柴，上面是個小閣樓，她住在閣樓上，每天爬上爬下。

徐家的所有財產全部被收繳，奶奶要求土改工作隊留一張床和梳粧檯給她，她說那是她陪嫁來的。工作隊答應了，我們徐家的全部家產在土改中就剩下這兩件東西。

你看到過我奶奶的照片，多麼慈祥的一個老太太。農會強迫她天天去掃地，奶奶 70 多歲了，一雙小腳。她出去走路不能走在路中間，要低著頭在路邊的屋簷下走。我哥哥一直跟著我奶奶，他天天目睹這一幕。

奶奶沒被槍殺是她在當地做了大量善事，日本人打來時，逃難的人她都收進大院，把所有的錢財都施給窮人，她在當地威望很高。

土改把徐家財產全部沒收了，沒吃的，我哥哥提個籃子，輪流到兩個姑媽家要點飯。奶奶長期餓飯，在 1956 年去世了。

奶奶是徐致靖的千金閨女，又有文化，就是這個結局！這段歷史講起來非常傷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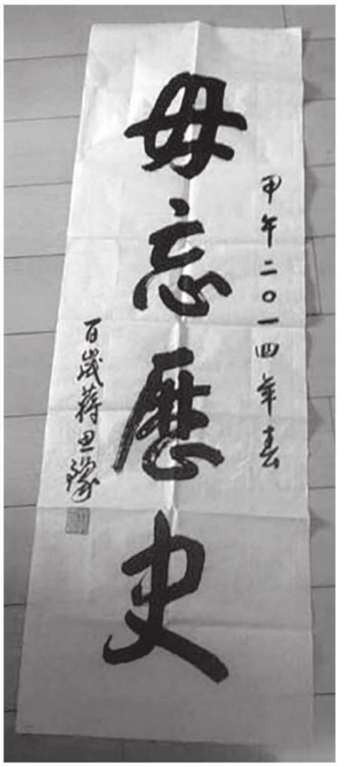
四〉、我的感歎

1949 年前，徐家大院經歷了時代的動盪和戰火的侵襲，但都毫髮無損。太祖爺遭遇牢獄之災，朝廷都沒有抄我們徐家。日本人打到宜興時，駐城軍司令部在大院貼上告示，明示這是前朝徐侍郎的家，所有軍人不准入內。所以，在戰火中徐家大院和裡面的財產全保存了下來。民國時期徐家沒有男人，一個孤老女人當家，家財都安然無損。

年輕時的蔣可煌

可是，中共的土改一來，搶的搶，分的分，毀的毀，徐家大院灰飛煙滅！那張黃花梨床和紅木梳粧檯在奶奶死後也不知去向。十年前我去老家尋找祖墳，什麼都沒有了！我去找統戰部的領導人，問是否給我太祖爺建個紀念館，他是這麼有名的歷史人物。可沒人理我。那位領導說，要建，就像你父親那樣，

自己發動親友集資建。



歷史就這樣抹去了，文化就這樣破壞了，如果徐家大院房子還在，那些字畫、古董、家具還保留，一代代傳下去該多好。我現在常常想，世界上哪有這樣的國家，把自己的文化掐斷了，祖宗也不要了。

還有，1950 年父親被抓時，抄了我們在上海的家，家裡的東西也全部被抄走，包括所有的字畫。很多字畫是很珍貴的，比如蔣介石、林森、于右任的題字。

父親出獄後，回到媽媽的祖籍寧波鎮海，他閉門隱居，專心致志研習書畫。父親受家庭薰陶自幼酷愛書畫，曾是國民黨元老于右任的弟子。在他百歲時，舉行了一次書法展，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吳伯雄，副主席蔣孝嚴為書法展題詞；抗日名將張靈甫之子張道宇與其母王玉玲女士、抗日名將張自忠之孫張紀祖、武昌首義鄧玉麟將軍之孫鄧中哲等從臺灣、美國等地前來祝賀。鄧中哲在開幕式上講話稱：「他是中國百年歷史的見證人 , 他的人生軌跡也是苦難中國百年的縮影。」

2016 年我爸爸去世，終年 102 歲。他是在大陸的最後一個國民黨將軍。

他去世前告訴我，你還是到美國去吧，那邊是自由的空氣、自由的政治狀態，中國的變化太大了，說不準什麼時候又來一場運動。

我 2016 年離開中國當然同父親去世有關，他在世我不會走，我很孝順他，覺得他這輩子太不幸。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共的做法越來越糟，現在又在搞獨裁，這樣下去，中國的老百姓又要遭殃，而我這個嘴又愛講，在政協和民主黨派裡一天到晚批評他們。2016 年我出來後又回去，原因是放不下母親，可回去一看，形勢不對，又出來，反復好幾次。母親叫我不要回去了，說共產黨早晚要找我算帳，因為我反共言論這麼多。我也害怕，中共早晚要收拾我。2016 年 12 月我才最後下決心出來。

晚年的蔣思豫與徐敏蕾

我媽媽已經是九十多歲的人了，她說，明年就是父親去世三周年，她守父親三年，然後來美國。

她說，她死也死在美國。

我很感歎，我們在這個年齡還不得不背井

離鄉！

採訪時間：2018 年 5 月 31 日

地點：美國洛杉磯

採訪後記

蔣先生是我在國外採訪的第一個人。

5 月 27 日，我們在拉斯維加斯的一次會上相遇，他提到土改，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當即同他約定，回到洛杉磯後去拜望他。

蔣可煌與張靈甫夫人王玉玲

幾天後，我們在他窄小的房間裡相見。面對攝像鏡頭，蔣先生侃侃而談，在美國自由的天地裡，再沒有在中國大陸的那種恐懼。

蔣先生本人沒有經歷過土改，可是，家族的命運、父兄的講述，都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讓他感歎萬千而又痛心不已。

我同他的遭遇相同，都是因為害怕被中共抓捕而被迫流亡海外。我到達他住處時，他告訴我，他幾乎通宵未眠，因為他賢慧的妻子被美國使館拒簽了，不知今後是否還能來美與他團聚。

看見他萬分沮喪一臉疲憊，我不知如何安慰他。他馬上到 70 歲了，同我一樣，現在都還沒有獲得留在美國的許可。

故土難歸，親人分離，異域他鄉苦苦求一張「居住證」的萬般無奈，獨居斗室裡品嚐的千種孤愁……

戊戌變法過去 120 年了，依然是追殺恐怖的天空；辛亥革命結束 100 多年了，仍舊是稱帝復辟的鬧劇！

這是我們個人的不幸，還是這個國家和民族的不幸？

二十九、一個敢怒敢罵的地主後代的講述

講述人：胡祖暖

1940 年生

一〉、「解放前」我胡家的家史

我祖先是從江西移民來的。聽長輩說，在清朝前，這裡只有極少數的苗民，到處一片荒涼。清政府實行移民政策，把這裡居住的苗民趕走，從江西省移民數萬來秀山，我祖父的祖父兩兄弟就是這樣來到秀山的。

他們來後一無所有，靠挑腳（下苦力）為生，後來炸油粑粑賣，然後又改行磨豆腐，由於豆腐做得好，生意紅火起來，慢慢就有了些積蓄。他們又用這份積蓄做烤煙生意，當時秀山是生產烤煙的產地。

以前民間有種說法：「家不分不發」。我祖父的父親，就是太祖父，秉承這句古訓，對他三個兒子說：「祖宗千辛萬苦才創下這份家業，現在分給你們，你們要好好珍惜，各自為業，為老祖宗爭光。」這樣，我祖父就帶著他分得的一份財產移居到現在的官橋小教場居住。

我祖父精明強幹，經過多年的打拼，胡家在我祖父那一輩達到了鼎盛。祖父有五個兒子三個女兒，我父親胡傳宗是最小的。那時我祖父非常注重教育，他看到國家衰弱，認為只有科學救國才是唯一的道路，因此，他培養幾個兒子發奮讀書。我大伯父胡光爵考上了北京大學，畢業後分到中央財政部工作；二伯父好像是武漢大學，他婚後生了三個女兒就去世了；三伯父胡光倫考上南京大學，畢業後回到秀山擔任了財政局長；四伯父胡光楣讀的天津大學，畢業後回鄉當了鄉長。

祖父的五個兒子中，只有他最小的兒子，也就是我的父親，沒有離開秀山。祖父把他留在身邊，讀的私塾。

民國初年，五兄弟都相繼結婚生子，每家都是兒女成群，三伯父多達 14 個子女。父輩們都秉承祖父的訓示，送兒女們去讀書，所以我們胡家的幾十個堂兄堂姐中有不少大學生，最低的都是初中文化。我因為遇到土改，只讀了小學。到 1949 年時，我們這幾家的人丁發展到 42 個。其中男的 20 人，女的 22 人。

我父親頭腦很靈，他覺得我家在那個偏僻山鄉不會有大的發展，要發展必須兼營商業，因此，他就搬到了我們現在這個地方石耶鎮。石耶當時雖然沒有公路，但有條梅江河，經流酉水、沅江、洞庭入長江。秀山當時也沒有公路，農村出產的桐籽、茶籽的銷售和加工很困難，而石耶正是這些物資的集散地。父親看到這一點，著手創建了一個集收購、加工、銷售為一體的商號「瑞發恒」。他建廠房，修碼頭，安裝榨油機（木製土榨），搞桐油加工。桐油加工就是從桐油中提煉一種叫鏽油的高純度油，用來油漆船舶和機器。油用船從門前的梅江河運出去，一直運到上海。我父親發了財，擔任了地方上的鄉長，還兼任石耶區的民團團長。

梅江河

在 1949 年前，我們胡家在秀山是一個旺族。

大伯在南京政府當了個副科長，他幹了一段時間，很想回鄉搞實業，那時也提倡鄉村經濟，於是他就回到秀山官橋。當時在國民政府幹事，走人時是沒有什麼退休金的，更沒有什麼子女接班，這種做法就是為了減少國家的負擔。我大伯回到鄉裡，並沒什麼錢，但是他有知識有文化，他和我三伯這種人，就是當時農村的精英分子。大伯帶回了不少種子，比如西紅柿、西瓜等等，交給農民種。還有，那時秀山的鹽很貴，要從外地運，有「斗米斤鹽」的說法，就是一百斤米才能換一斤鹽。我大伯從酉陽的龔灘運鹽回來，全部按成本賣，不賺一分錢，就是想減輕農民的負擔。

當時的人都喜歡購置田地，為什麼呢，金銀財寶可能被強盜偷，被土匪搶（我們這兒是四川、貴州和湖南的交界處，土匪多）。但是，田地搶不走，所以人們都願意保留田土，可以靠出租田土收益。當時一般是按四六分成，也有三七分成和五五分成的，一般由租戶和佃戶協商。我家與佃戶是兩種，一種是按四六，佃戶六成，我們四成，有些很貧窮的就是三七開。1948 年我曾經跟我哥哥去收過租，穀子一打了當場就分，假如是 10 挑的話，我們就得 4 挑。佃戶要把這 4 挑穀挑到我家。交租時家家都備有涼水和甜酒，佃戶挑一挑來就喝一碗甜酒。所以，打穀子之前要做幾大壇甜酒。記得那天中午我是在佃戶家吃的飯，當時地主和佃戶的關係是相當融洽和諧的。

二〉、土改來了！人，殺了；財產，分了。

土改來了，那就是暴風驟雨呀！

他們首先挑動地主和農民的矛盾。第一步是宣傳，開群眾大會。當時我 11 歲多，記得聽他們說：我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共產黨來實行土地改革。為什麼這時候要實行土地改革？因為我們是解放窮人的，是為了讓窮人不再受地主的剝削和壓迫，是把窮人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的政府。幾千年你們為什麼窮，為什麼受剝削，你們想過沒有？就是你們受三座大山的壓迫，你們的勞動果實被地主全部剝削走了。你們窮了，他們富裕了，這是一種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是一種吃人的社會。我們今天就是要幫助你們站起來，就是要鬥爭地主，要揭露地主的罪惡，要把他們的財產全部奪過來，因為這些東西原本就是你們的，是被他們剝削走了。以前，由於國民黨是支持地主打壓窮人的，所以你們不敢出聲，今天不同了，我們是來扶持你們解救你們、讓你們翻身做主人的，所以你們要起來，同地主階級作無情的鬥爭。只有把他們打倒了，你們才能翻身。

怎麼打倒呢？先開會訴苦，比如說，你們農民要種地，要出種子，可收成只得一半，地主不勞而獲，坐享其成，這合理嗎？這就叫剝削。我們要打倒地主，當槍斃的槍斃，當勞改的勞改，把他們的土地和財產全部奪回來，因為這原本就是你們自己的東西……

通過一系列的煽動挑撥，把農民的仇恨激發起來。

仇恨煽動起來了，好，把地主拉出來，批鬥！

土改幹部坐在臺子上，呼口號：「打倒地主階級，打倒封建勢力！」下面群眾也跟著喊。然後劃成分，哪些是地主，哪些是富農，當時只要家裡有五挑田就是地主。這個標準是相當低的，我們石耶有好幾家，那算個什麼地主嘛。有一家五口人才一、二十挑田，他們只能算是自耕農，維持生活都困難。比如孫興雄家，六口人，二、三十挑田，家裡很窮，平時還要做麵去賣才能維持生活，也把他家劃成地主。

為什麼要這樣劃？原因是劃的地主越多，他們分的土地和財產就越多，農民的積極性就越高，共黨也就越得人心。我們這個村，共劃了二十多家地主，其實夠地主標準的只有我們胡家、吳家和魯家等，充其量有十家，結果劃了二十多家，這還不包括富農，你說可笑不可笑，又可怕不可怕？

緊接著就是殺人，土改運動和鎮反運動是同時進行的，殺地主和殺反革命也是同時進行。那些天，三天兩頭開會，公審，一公審就拉出去槍斃。我們石耶的鎮志上寫得清清楚楚，我們石耶一個鄉就槍斃了 36 人。

我先說我家被槍斃的親人吧。

胡祖暖父親胡傳宗和堂兄胡署東遇難的河壩

我爸爸和我四伯的兒子胡署東是同一天槍斃的，那是 1950 年冬月初一，地點在石耶大橋下的河邊。胡署東以前是老師，他同他妻子陳翠雲都在石耶小學教書，他是校長，因為他有文化，就叫他來當了鄉長。他當鄉長沒幾年就被殺了。

我大伯、三伯、四伯同一天拉出去槍斃，就在我們餘慶村鴨子河壩。四伯父最慘，他的兩個兒子也被槍斃，一個就是剛才說的胡署東，另一個叫胡蒙源，曾是國民黨的一個少將師長。抗戰結束後，他到四川宜賓當了縣長，剛解放他就被槍斃了。

他是 1909 年出生的，我有他的一張照片，是他在劉湘辦的幹部訓練班照的。

我的祖父 1947 年死後埋在官橋，他們三弟兄被槍斃後抬回去已經沒有地方可埋了，因為土地已經分了，只有埋在我祖父的旁邊。當時一塊板板、一床蓆子都沒有，因為財產也全部被分完了。他們三弟兄埋在同一個坑裡。三中全會後，我去給他們立了碑，現在我每次去給爺爺上墳時，也給三個伯父掛青。我想，如果我爺爺地下有知，知道他的三個兒子睡在一起陪伴他，而且個個都是血淋淋的屍體，不知他會如何感想。

埋在同一個坑裡的三兄弟（胡祖暖多年後立）

我再講講我看到的一些殺人場面。

土改時我雖然只有十多歲，但膽子很大，只要聽說殺人，只要是在方圓 30 里之內，我都要跑去看，所以我目睹了一些驚心動魄的殺人場面。比如殺楊卓之，我親自到現場觀看，目睹了難忘的一幕。

1952 年的 3 月 2 號，秀山槍斃了一個叫楊卓之的名人。楊卓之是秀山民團的團長，共產黨來後，他進山當土匪，後來被抓住了。他當然是被殺的物件（對象）。不過，當年對秀山人民，他應當說是有功之臣，如果沒有他，秀山人吃鹽會很困難。

當年鹽要從自貢經長江進烏江，到酉陽的龔灘上岸。從龔灘到秀山有一百五十公里左右，一路上土匪多，但楊卓之在酉陽、秀山、甚至貴州的松桃一帶名聲很大，只要說是楊卓之押送的鹽，土匪就不敢動。

公審大會是在秀山飛機壩中山紀念堂開的，會完後把他押到現在糧食局那個地方槍斃了。在楊卓之的腳還在一抽一抽時，上去了三個人。一個手提一把菜刀，另一個拿了一個小鍋和一個菜板。他們把楊卓之翻過來，撕開衣服，用刀剖開他胸膛，一把將他的心臟拉出來。他們三人就在離屍體十多米的地方，把心子在菜板上切成片，放在鍋裡爆炒，然後拿出瓶酒，邊喝邊把楊卓之的心子吃了。另外幾個人，稱了幾斤米做的白泡粑，用泡粑沾楊卓之的血吃。

當時我還小，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我想，他們是不是特別恨他呢？因為我曾聽老百姓恨一個人時說：「我要喝你的血，挖你的心。」後來我長大了，才明白他們並不是恨他，而為了壯膽——練膽量！就是說，吃了被槍斃人的心子，尤其是像楊卓之這種人的心子，走到哪裡都不怕。

三〉、堂嫂一家「絕門」

到 1952 年底，土地分完了，財產也分了，土改結束了。但是，階級鬥爭仍然極其殘酷，對地主子女的打壓也非常可怕，造成了很多人間悲劇，老一輩基本消滅，下一輩深受其害。從土改到三中全會，我們胡家 42 口人只剩下 12 個，有的槍斃了，有的勞改死了，有的整死了，有的打死了，有的餓死了，有的自殺了。

我四伯家有個姐姐叫胡祖雲，高中畢業，當地的民兵看上了她，一天晚上，四五個民兵闖進她家，想要強暴她。我堂姐長得高大，她大聲叫喊，驚動了其他人，民兵們沒能得手。他們丟下一句話：「跑得脫初一跑不脫十五。」我堂姐見事不對，趕快嫁了人，她嫁給了現在野人洞一家姓彭的貧下中農。

民兵轉而把目標盯在陳翠雲身上。陳翠雲是我堂嫂，是個知識女性，秀山三大才女之一，解放前擔任石耶小學的校長，她丈夫就是我四伯的兒子、與我爸爸同一天被槍斃的胡署東，也是該校的前任校長。胡署東去當鄉長後，陳翠雲就接任了石耶小學的校長。在她任校長那幾年，石耶小學被縣裡評為模範小學。土改時，她丈夫、公公被槍斃，婆婆被吊打後神智不清，她本人也被從學校趕回家。

堂嫂長得一表人材，很豐滿，當時 30 歲。民兵中有一個叫「來寶癩子」的人，是個痞子，他四十多歲了還是個單身漢，家裡一貧如洗。他跑來想強暴我堂嫂，堂嫂堅決不幹。他說：「妳要是和老子（我）結了婚，妳才會平安，妳這兩個娃娃才保得住，否則老子把其他民兵叫來，把妳一家人都搞死。」在這個痞子多次的威脅下，堂嫂為了兩個娃娃，被迫答應了。那幾年，堂嫂都是以淚洗面。幾年後大饑荒到來，來寶癩子餓死，堂嫂的小兒子也餓死了。多年後，三中全會之後，我們去看她，她和大兒子胡遼洋住在一間搖搖欲倒的爛房子裡，真是家徒四壁。

胡遼洋以前非常聰明的呀，但幾十年後已經變得傻乎乎的了，連泡茶都不會。我擔任了華聯公司的經理後，把他招來幹打包的工作，每天五元工錢我給他十元。

他這個樣子，也沒法結婚。一天，他在門外路旁看到一個嬰孩，他把她抱回去，堂嫂打開看，裡面有十塊錢，兩包奶粉，幾件衣服。堂嫂也許是知道兒子成不了家，決定收養這個棄嬰。

堂嫂 2003 年去世，她那個傻兒子有什麼辦法，是我去給她辦的安葬。

堂嫂去世時，養女長到 12 歲了，堂嫂一死，胡遼洋就沒辦法了，是我去救濟的。

後來胡遼洋死在養老院，也是我去安葬的。那個養女也來給他送葬，當時她已經大了，在秀山賣服裝。對了，她的親生父母就在堂嫂家對面，當年拋棄她是因為計劃生育，他家已經生了好幾個娃娃了，見又生個女兒，又要罰款，因此就把她拋棄了。現在，他們見胡家的人死光了，就出來認女，主要目的是想要胡家那幾畝地和那間房子，房子雖然破爛但那塊地基還不小。

這樣，我堂嫂一家不僅人死絕了，身後連一片瓦都不存。

四〉、專門用地痞流氓

共產黨來到秀山後，很快建立起了農會，共產黨對當地情況不熟習，需要當地的人來建立基層組織，用哪些人呢？據我所知，我們石耶農會那些人，大都是些好吃懶做的地痞流氓。為什麼新政權需要這種人？因為這種人無產無業素質又差，幹起壞事來無所顧忌。

比如有一個外號叫「癩蛤蟆」的田維忠，當了農會會長後飛揚跋扈，無惡不作。他多次強姦地主子女魯世法的妻子，連月經期間都不放過。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闖進我家來，不准我們賣米豆腐。當時，我家財產全部被沒收後，我媽媽和姐姐只得做米豆腐晚上去賣，我在一旁幫著洗碗。田維忠衝著我們一陣臭罵：「誰讓你們賣的？你們還想剝削我們窮人嗎？告訴你，今天是我們窮人的天下，要你們死你們就得死！從今天起，不准再賣了，否則搞死你們！你們死了比一個螞蟻還不如！」罵完他走了。他邊走還邊唱：「解放軍的天，是明朗的天……」他把「解放區」唱成了「解放軍」，而且他下面不會唱了，只是「嘿呀，嘿呀呼嘿」地哼。

他也沒好報，在「糧食關」（大饑荒）時，他母親、老婆、兩個兒女都餓死。他自己也餓得受不了。一天晚上，他用菜刀將一頭集體耕牛的舌頭割來吃了。第二天，餘慶大隊大隊長發現了，把他綁在食堂前面的柱子上。我從河裡撈魚回來，他看見我魚筐裡的魚，有氣無力地說：「你送我幾條魚吃嘛。」我一下子想起他得意

洋洋唱「解放軍的天」的情景，便沒有理他。走了幾步之後，我又返回，問他：「老村長，你怎麼被綁在這兒？」他說了割牛舌頭的事。我心想，真是惡有惡報。他盯著我筐裡的魚，哀求說：「我以前做了對不起你們的事，很後悔，你大仁大義，不要記我小人的過，求你送我幾條魚……」他那個慘樣和那種哀求的聲音讓我心軟了。我說這魚是生的，怎麼吃？他說就生吃。於是我把小魚送到他嘴裡，他一條接一條地把魚生吃下去。

另一個素質極低的人姓黎，是我們鄉裡的特派員，那時還沒有派出所，特派員就是由公安局派一個人到鄉上行使公安工作的人。這個人五短身材，又黑又矮又瘦，而且還一臉的麻子，因此人們背地裡叫他黎麻子。他一開口說話就是「日媽」，比如他在逮捕周明山的大會上說：「日媽周明山抗糧就是破壞統購統銷，日媽破壞統購統銷就是反革命，日媽反革命就要抓起來槍斃，日媽你們不好好聽我講……」

這個人不僅殘暴，而且是個色鬼，他看到哪家的女人長得漂亮就要去追。共產黨就用素質如此低劣的人當幹部。

他見我家六姐長得漂亮，就來提親，那是土改結束後。我媽說，她還小，還在讀中學，一口拒絕了他。他又去找我姐姐，結果又被我姐姐罵了。他懷恨在心，1954 年，他借統購統銷和禁煙運動，派民兵來把我媽抓去，一頓暴打後，罰我媽站八天八夜，屎尿都拉在身上。後來民兵說太臭了，才通知我們拿衣服去換，我媽已經奄奄一息，渾身腫脹，兩個多月才恢復過來。

剛才我提到逮捕周明山，我說說是什麼回事。周明山是我們村的人，他老婆死了，留下一對兒女，另外，他上有一個六、七十歲的媽。1954 年搞統購統銷，鄉上叫大家賣餘糧。那一年蟲災，糧食減產，哪裡有什麼餘糧。統購任務完不成，鄉裡就派民兵來一家一戶地搜。搜到他家時，從櫃子裡搜出了那三百多斤穀子，周明山說：「我只打了這點穀子，自己吃都不夠。」民兵不由分說，強行把穀子挑走了。

第二天，周明山把他母親揹到區上，對區長和黎麻子說：「我家沒吃的了，只得出去討飯，但我母親年齡大了，走不動，我只得揹來交給你們，你們吃飯時給她一口飯吃就行了。」說完他把他母親放下就走了。

區上派民兵把他媽抬回去，同時就把周明山抓了。黎麻子說：「周明山，日媽你還敢鬧糧，綁起來！」

周明山被抓到縣裡，一個月後，突然通知我們到梅江鎮去開會。梅江鎮離我們這兒十五公里，我們心想怎麼通知到那兒去開會呢？南橋鄉、令木鄉、石耶鄉的都去。

審判台設在河壩，人山人海，到十點鐘時，公安和民兵就荷槍實彈把會場圍了。

審判長宣布，把破壞統購統銷的反革命分子押上來。說完押了兩個人上來。

那時我就在那個台前，我一看，喲！其中一個不就是我的鄰居周明山嗎！為什麼要公審他？公審就意味著要被槍斃呀。我那時才 14 歲，還想不明白。

周明山遇難地

審判長宣讀周明山的罪行是：破壞統購統銷政策，屬於現行反革命，宣判死刑，立即執行。周明山馬上就被拖到河壩。我跟著跑去看。

周明山跪在地上，一槍把他頭打爛了。他的屍體沒人收，他母親和兩個孫孫，幾十里路，怎麼去收嘛。

周明山死後他母親天天哭，沒多久也死了。周的女兒 11 歲，兒子 7 歲，只得出去討飯。他們兩姐弟睡在牛圈裡面，只有一點穀草，我聽見他們的哭聲，好淒慘！後來好像是岑溪那邊的一戶人家來把姐姐接走了。弟弟一個人一直住在牛棚，十七、八歲了都還住在裡面。

五〉、關押地主家屬的「集中營」

這個毛澤東呀，他地主不放過，連家屬子女都不放過，一個個非要整絕。

土改時，把我們父輩槍斃或關押後，又把我們地主家屬，大多是婦女兒童，集中關押在一個叫田家院的地方，為什麼要關我們呢？說是要保證土改順利進行，防止地主階級破壞，必須對我們嚴加管制。我們一共有七戶地主家屬被關在田家院吳龍文的院子裡。地主吳龍文已經被槍斃了，他有十幾間房子。

那個院子四周都是圍牆，前面只有一個八字龍門進出，後面小門旁邊住有一戶姓孫的貧農，農會就安排他監視我們。

監管我們的是個女人，一個土改的積極分子，她當了個婦女組長。這個人心腸很硬，「階級覺悟」很高，一見到我們這種出身不好的人，她就板著面孔，一臉凶相。我背地裡叫她「母夜叉」。

「母夜叉」掌管八字龍門的鑰匙，我們外出必須向她請假。

「集中營」每天開門兩個小時，早上七點到九點。這兩個小時放我們出去打水、撿柴、摘菜、挖野菜。那時我們什麼吃的都沒有，全靠這兩個小時找吃的。我們七家人，每天主要就靠吃青菜和野菜度日。我講講在「集中營」裡發生的幾件事。

（一）、吳文若一家的不幸

我有個表哥叫吳文若，黃埔軍校畢業後分到一個部隊當見習連長，抗戰爆發後，他在武漢保衛戰中身負重傷，傷癒後回到石耶。土改時，他家劃為地主成分，加上他又曾是國民黨軍官，因此他在 1950 年 10 月被判刑 20 年，送到四川阿壩勞改。

他被抓走後，他家有六口人被關到「集中營」：他母親、妻子和四個孩子。

她妻子叫楊淑華，她高度近視，無法去挖野菜，只能叫她 13 歲的大女兒吳蒲柳去挖。他家六口人，每天吃青菜、野菜至少要一背筐。吳蒲柳開始每天還能摘半背筐菜，後來她身體越來越差，目光呆滯，面色菜黃，走幾步就要停下來休息。

那個冬天，好容易出了太陽，「集中營」的人都出來曬太陽。太陽一曬，身上的蝨子滿身竄，大家便相互捉蝨子。這時，蒲柳站起來說要去解大便，她剛走了幾步，就蹲下去拉了一地稀糞。她媽趕快去扶她，可她身子直往下墜，她口裡發出很微弱的聲音：「媽，餓，餓得很……」不一會她就斷氣了。

楊淑華大哭，說：「我不該生下妳呀，你投錯了胎……」大家叫我去向「母夜叉」報告。因大門鎖著，我去找後門的老孫。老孫這人還有良心，聽說後很同情，與我一起去找她。「母夜叉」聽說後把雙眼一瞪，張口就罵：「死一個人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你們這些地主死光了都沒關係！」老孫說：「人死了總得抬出去埋，不能放在那兒爛呀。」「母夜叉」這才說：「就叫那些地主去埋，你要好好監督他們，防止他們搞破壞。」老孫又說：「到哪兒去拆幾塊板板，釘個匣子？」「母夜叉」說：「她還要匣子？就這樣拖出去埋！」

在返回的路上，老孫忍不住說：「太過分了！」回到「集中營」，老孫叫表嫂找床爛蓆子把女兒裹了，由「集中營」裡凡是還能走的人幫忙抬出去。大家都沒力氣抬到山坡上，於是就在河邊挖了個沙坑，把蒲柳草草埋葬了。

蒲柳死後不久，表嫂的婆婆和兒子也餓死了，他們一家六口只活出來三個。

（二）、陳淑清一家的遭遇

吳肇修是我的堂姐夫，我們關在集中營時他和他兒子吳光瑤都被抓走關押。他家關在「集中營」裡有六口人：我堂姐、她的婆婆和她的媳婦陳淑清。

在進「集中營」之前，堂姐就已經遍體鱗傷，她遭受了吊打「半邊豬」、跪玻璃渣、跪鐵梁角刺等刑罰，在「集中營」裡她已經行動困難。她的婆婆年已八十，堂姐的媳婦陳淑清下面有三個小孩，老大吳世和六歲，大女兒吳世林四歲，小女兒吳世奇兩歲。這六口之家的全部生活擔子都壓在陳淑清身上。

陳淑清是秀山美萃鄉陳家大院的人，出身名門閨秀，17 歲時在秀山女子中學畢業。畢業後她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了家，到 22 歲時，她已經為吳家生了一子二女。可惜，她的丈夫是個紈絝子弟，常在外面拈花惹草，陳淑清按中國傳統的逆來順受的婦道忍受了，從沒有大吵大鬧。

在集中營裡，她的負擔太重了，上面是兩個老人，下面是三個小孩，油鹽柴米全無，她公公（我們叫公爹）吳肇修當時又關在牢裡，還要給他送飯，由她大兒世和每天給他送一碗青菜去。

一天，世和送飯時，吳肇修對他說：「你回去給你媽說，就是青菜嘛也多送一點，我餓得很吶。」世和回來說了後，陳淑青哭起來，她實在沒辦法了。我媽安慰她，說現在大家都一樣，熬過這段日子就好了。

但是，陳淑清覺得她熬不過去了。

那天早上我從她門前過，突然聽她房間裡傳來「嘿哧」、「嘿哧」的聲音，就像殺豬殺了後喉嚨裡冒血泡子的聲音。我跑上去一看，她倒在地上，身旁是把菜刀，脖子上一道傷口直往外冒血泡。我趕快叫我媽，我媽跑來把她抱到床上。

沒有藥，大家束手無策。我突然想起，前段時間我在山上砍柴時，摘了幾枝叫「毛蠟燭」的草藥。我趕快拿來敷在她的傷口上，不一會血就止住了。我媽勸她說：「妳上有老，下有小，妳一死了他們怎麼辦，妳要為他們著想呀。妳要想開點，這種日子又不是妳一個人這麼過的。」

陳淑清躺著養傷的日子，這一家人就更慘了。我媽出了個主意，叫她的兩個大孩子吳世和與吳世林借外出挖野菜的機會到街上餐館裡去要飯。

這果然是個好辦法，他兩兄妹第一天出去就很有收穫。街上有店老闆以前受過吳肇修的幫助，見他的孫子來討飯，不僅悄悄給了米飯，還給了點肉。

那天這兩兄妹笑得好開心，半年了，都沒見他們笑過。我媽幫他們把飯和肉煮在一起。世和很懂事，叫我媽同他們一起吃。記得陳淑清接過兒子給她的飯後老是不吃，眼睛呆呆地盯在碗上，眼淚流下來。大家勸她，她還是不吃。吳世和說：「妳不吃我們就不去討飯了，大家一塊餓死。」我媽媽也勸她，她最後才吃了半碗。

我當時小，不太明白，現在想起，一定是她內心難受，讓自己的兒女出去討飯。

陳淑清傷好後，又開始出去摘野菜，兩個小孩繼續討飯，日子好一些了，關在牢房裡的吳肇修也吃上了他孫子討來的飯菜。

但是，吳肇修沒能活出來。

這兒我講講吳肇修這個人。

吳家就在我家的隔壁，吳肇修是個很善良的人，我們秀山二中就是他出資修建的，那是在抗戰時。他認為日本敢打我們，就是因為我們國家落後，要改變這種現狀，就要大辦教育，提高科學文化水準。他招的老師都是從淪陷區裡來的優秀教師。所以，那些年學校培養了很多優秀人才。他是一個為國家為民族著想的民主人士。

1949 年 9 月 7 日，解放軍打來，國民黨縣中隊要燒石耶梅江河上的大橋，他出面阻止，說，燒了橋也攔不住解放軍，只能給老百姓出行帶來不便，那個橋是他保下的。

解放後，吳肇修最初做為民主人士，但後來還是把他抓了，把我家做為監牢，關了幾十個人。

那天來通知，說吳肇修因剝削人民壓迫人民，被人民政府槍斃了，叫陳淑清去收她公爹的屍。

去收屍的全是幾個女人，有我母親、我姐姐和他們的伯娘。幾個女人用蓆子把他裹起，抬到現在水泥廠橋頭那個叫亂葬崗的地方。亂葬崗是以前留下來的，凡是沒得田土的人，包括過路的呀、叫花子呀都葬在這兒。吳家的土地都被沒收了，只有埋葬在這兒。

沒兩天，我出去時，看到一條狗拖了一條人腿，街上的人說，那就是吳肇修的腿。我當時很感歎：吳肇修呀，你生前做了那麼多好事，怎麼落得這個下場？

石耶街上殘存的標語

關了我們大約一年後，農會把我們放了。陳淑清一家被趕到全門溝的一個瓦窯去住。那個瓦窯四面透風，下雨天地上到處積水。不到一個月，我堂姐和她婆婆相繼去世。埋了她們之後，陳淑清變得失魂落魄，走路分不清方向，像是癡呆了一樣。

接下來發生的一件事讓她徹底崩潰了。

那天，世和因為饑餓，偷了瓦匠溝當六地裡的幾個紅苕。第二天溝當六找上門來，陳淑清連連賠不是，表示孩兒不懂事，一定賠償。溝當六抓起世和就是幾耳光，罵道：「狗日的地主崽，還想壓迫我們貧農？！」

關鍵是他走時惡狠狠地丟下了一句話：「老子去叫農會的人來打死你們！」這句話把陳淑清嚇慘了，農會在土改中的暴行陳淑清太清楚，她覺得大禍要臨頭。

當天，她對世和和世林說：「媽餓得很，我們到街上去討點吃的。」她同兩兄妹走出全門溝到了公路邊，她對兩兄妹說：「媽走不動了，就在這兒等你們。如果

你們回來萬一沒看見媽，就自己回去煮飯。記著要讓世奇吃飽，不要餓著她。你們兩個要團結，要勤快，不要吵架……

她目送兒女走了後，就轉身朝岩門檻的河邊走去，她在那兒投河自盡了，當時她還不到 30 歲。

又是我媽媽她們幾個女人去埋的，打撈她屍體時我也在場。女人下不了河，是用竹竿把她撈上來的。

那時槍斃人多，亂葬崗已經沒有地方了。埋她公爹的那個坑是空的，屍體不見了，於是她們就把她埋在她公爹的坑裡。

陳淑清死後，她的三個孩子靠討飯為生。一個七歲多的孩子要承擔撫養兩個妹妹的擔子，這個奇觀世界上可能難找。他們的衣服從來沒洗過，一身長滿蝨子。

沒多久，三歲的妹妹吳世奇就病了。世和把她送到街上萬壽宮我二伯家的偏房住下。那天我路過，看見她躺在幾塊木板上呻吟，身子骨瘦如柴，小被子上密密麻麻到處是蝨子。

不幾天，她就死了。

她死了是誰去埋？是她七歲多的哥哥！他把一根繩子套在他妹妹的脖子上，拖著妹妹往前移。拖到豬行壩那個地方時，正好遇到我，我幫他把世奇拖到河壩，用手扒了個沙坑埋了他妹妹。

當時這一幕有人看見，但沒人敢幫忙，因為要同地主階級劃清界限。

世和兩兄妹不久被他們媽媽娘屋的人接走了。幾年後大饑荒到來，也是地主家庭的陳家首當其衝，吳世和餓死，妹妹吳世林逃往貴州玉屏縣，嫁給了一個農民，當時她才十三歲。你來我這兒的前三天，她來看我，談起往事她痛哭流涕。

他們的父親吳光瑤活出來了，他坐了十年牢，出獄後留在勞改隊就業，上世紀八十年代才回來。那時我也回來了。

對了，吳家家破人亡，但他們的房子卻保存下來，原因是他們的大院做了區政府的辦公地，就是你前天去看到的那個地方。

現做為文物保護的吳家大院

（三）、「母夜叉」的結局

我還說說集中營裡那個「母夜叉」。

她正在得意洋洋收拾我們時，發生了一件事。一天早上，她的公爹路過我們「集中營」旁一口水井時，用手捧了幾口水喝。有人看見了，說他是在放毒，向農會彙報後，農會又向區裡彙報。區裡土改工作團的王團長指示，把他抓起來。

當天農會就把她公爹抓了，三天後他被拉到河壩槍斃了。母夜叉和她丈夫去收屍的時候，呼天搶地。

其實這完全是冤案，他哪裡放什麼毒？我們天天都喝那井裡的水。但那時正是鎮壓反革命的火熱時期，只要有人舉報，不是事實也是事實。

這一下「母夜叉」成了反屬（反革命家屬），組長也被撤了。她的威風一下子消失，路上遇見人，頭埋得低低的，說話聲音也像要斷氣。這還沒完，到「糧食關」（大饑荒）時，她老公和兒子都餓死，她隻身逃到貴州江口縣桃英區，嫁給了一個大她 20 多歲的老光棍。那個老光棍是個酒鬼，三天兩頭暴打她。後來我到江口路過那個寨子，在那兒住了一晚。我見到了她，才 40 多歲的人，頭髮已經花白，背也有些駝了。我問她還認識我不，她說不認識。我說我就是「集中營」裡的那個胡祖暖。她說：「不記得了。」我說：「妳不記得我記得！」

六〉、一個積善之家的「滅門」

我親眼目睹這一家全部死絕，他們本是一個積善之家。在石耶街旁梅江河邊，有一家地主，主人叫魯伯林。我家同魯家是同一個村，離得很近。魯家在當地做了不少善事，比如說，他家每年都要打十多二十口棺材，免費提供給那些貧寒人家，年年如此。

以前有種說法，「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但是，魯家做那麼多善事，是什麼結果呢？。

當年槍殺魯世義的地方

前面我說了，我從小膽子大，只要聽說殺人，都要跑去看。那次在石耶糧站下面槍斃三個人，一個叫楊興伯，一個叫楊欣然，一個叫魯世義，這三個人都是地主。那一天我就站在審判台的前面，三個地主看得很清楚，他們被五花大綁，工作隊的

人鼓動一些人上臺批鬥揭發，呼的口號是「打倒地主階級！」「打倒惡霸地主！」「勞動人民翻身作主！」

其中魯世義最年輕，只有 20 多歲，他就是魯伯林的大兒子。他被捆得受不了，大汗淋漓。他喊：「審判長，要殺要剮快一點！」

刑場在 319 國道旁邊，打魯世義時，槍沒響，魯世義還扭過頭，喊：「水子子，水子子。」就是說是啞火。行刑的人重新換子彈，「砰」地一槍把他頭打爛了，頭骨和腦水灑了一地。

他的弟媳叫劉桂華，她丈夫魯世法參軍到秀山，在文工團裡。劉桂華才 20 歲，她來收屍，穿的旗袍。她把魯世義的頭皮和腦水一點點收集起來，包在一張白帕子裡，放到魯世義的頸子邊。我聽她哭述說：「哥哥呀，我們魯家到底是做了哪些冤孽事嘛，遭到這種報應？」

沒兩天，就在魯家對面的鴨子河壩槍斃人，這一天槍斃 14 個，我大伯、三伯、四伯就是這一天被槍斃的。我記得的有吳肇修、吳龍文、魯慶全。另一個就是魯世義的父親魯伯林。

那天仍然是把頭打爛，又是劉桂華來收的屍。她把公公的頭皮腦水收集起來，仍然哭述說：「魯家到底是什麼回事嘛，人們都說你們淨做好事……」

接下來把魯伯林的老婆抓去逼要金銀，她已經是個快六十歲的人了，吊打，尤其是跪「鐵梁角」刺。

農會會長田維忠和周發友（音）把她婆婆衣服褲子脫了，強迫她在「鐵梁角」刺上滾。更惡劣的是，他們還把她提起來像打夯那樣往刺上扔，她婆婆痛得呼天喊地。（胡講述至此時抽泣）

還有一個叫「矮子黃」的女人，是地主孫老六的老婆，孫老六被槍斃後，農會的人把他老婆抓去，脫光衣服後扔在一堆鐵梁角刺上，還拿腳去踩她。她沒死，後來她在東北的女兒來把她接走了，從此她再沒回來。

（注：「鐵梁角」是當地一種有生一寸左右長硬刺的植物）

這兒又說到那個農會會長田維忠，他溜到劉桂華家裡，想強姦她。劉桂華不從，田維忠用槍抵著她的頭說：「老子今天來日妳，是看得起妳！妳他媽的還不幹？妳不幹老子一槍把妳斃了！」劉桂華沒辦法，被田維忠強姦了。

第二年，劉桂華的丈夫魯世法被部隊清洗回鄉，原因很簡單，地主子女。他回來後還是管制勞動，每次開會都要把他弄來批鬥。我在《難忘的歲月》裡記了他的一件事，有一次薅紅苕，他挖斷了幾根，說他是有意破壞，抓去就是一陣鬥打，唉呀，那個日子！

到了大饑荒時，有一天，在食堂吃飯（我們在同一個食堂），他們一家餓得床都起不了，他支一根棍子，來食堂想打點吃的，其實那個飯就是幾片紅苕加曬幹了餵牛的紅苕葉。大隊長楊通明（音）罵他：「你這幾天為什麼不出工？打飯你就來了！」他說：「隊長，我這幾天是病了，路都走不動。你鬆我一下，我媽、兒子都躺在床上，你松我一口氣。」楊通明說：「你還想討吃？你狗日的四類分子！滾！」

胡祖暖失聲痛哭

當時我在場，我看到他支著棍子，很艱難的一步一步地往回走。

（胡講述至止，失聲痛哭）

接下來的幾天，我沒有再看到他。那天我從他家門前過，他門是關著的，我推了一下，從門縫裡望進去，看見他母親、妻子和娃兒躺在床上，他是躺在一個櫃子上。

我去找隊長楊通明，他聽說後說：「餓死幾個人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何況是幾個地主！」他把我罵一通，我當時怒火一下子衝起來，恨不衝上去幾刀把他殺了！但是我忍了，我也有母親和妹妹。

去埋他們一家時，我也去了，就埋在河壩邊。我看見魯世法的耳朵，還有他母親的嘴唇，都被老鼠咬了，這一家死絕了。

我們用河沙掩埋的。不久漲大水，全部沖走。

地主魯柏林全家滅門

1，魯柏林　　（土改時槍殺於石耶餘慶村鴨子河壩）
2，魯世義　　（魯柏林大兒，土改時槍殺於石耶糧庫下面公路旁）
3，魯柏林之妻　（1960 年餓死）
4，魯世法　　（魯柏林二兒，1960 年餓死）
5，劉桂華　　（魯柏林二兒媳，1960 年餓死）
6，魯世法之子　（1960 年與祖母、父母餓死於家中）

當年殺人的刑場，鴨子河畔

被滅門的魯家殘屋

七〉、魯家大院的故事

這個四合院位於秀山縣石耶鎮，以前是地主魯晉權的住宅，它經歷六十多年的風雨，居然倖存了下來，雖然大院的一些廂房和糧倉已經消失，但與絕大多數屍骨不存的地主大院相比，它算是長命的。胡祖暖老人當年經常進出這個大院，他專門帶我到此，講了下面兩個故事。

（一）、鬥打 11 歲的地主子女

魯家大院的主人叫魯晉權，他同我是老表，他歲數比我大，但與我同輩份，魯家也是從江西來的，解放前，我們兩家經常走動。

1951 年，魯晉權被槍斃，家裡財產全部被沒收，他老婆上了吊，留下四個兒女。

魯澤黃是老大，11 歲，他下面還有三個妹妹。父母死了，財產被沒收，幾個娃兒沒有吃的，餓得受不了。他一個伯娘就說：「澤黃，現在你們只有救一個算一個了，兩個小的讓她們餓死算了，保兩個大的。」果然，後來兩個小的餓死了，就餓死在這個房子裡。

接著，農會把澤黃和他大妹妹趕出大院，趕到山上一個叫滾豬岩的茅草棚去住。有一次我上山打柴，無意中看到他們兄妹，我說：「你們怎麼住到這兒？」澤黃說，住這兒倒沒關係，害怕是每天晚上農會要叫他到魯家大院去接受批鬥，還要挨打。他雖然比我小一輩，但與我同年，土改時都是 11 歲。這樣一直鬥打他一個多月。

這時，又是他家的那個伯娘對他說：「你趕快帶你妹妹出去逃荒，否則你兩個都要死在這兒。」澤黃於是帶著妹妹往貴州逃，逃到松桃縣大路鄉時，兄妹兩被一個老漢收養。他隱瞞了自己的成分，那家人一直不知道他是地主子女，對他和妹妹還不錯。他和妹妹後來都在那兒結婚生子，從此一輩子留在那兒了。2010 年他回來參加族裡一位晚輩的婚禮，我們又見了面，他說起當年的往事，仍然非常痛苦。

（二）、張洪富一家的遭遇

張洪富住在離我家兩里路外一個叫蔡家溝的村子裡，抗戰時他參軍打過日本鬼子，在部隊上當了排長。抗戰結束後他回到家鄉，娶了魯氏的女兒魯澤英。

張洪富家不是地主，也不是富農，土改本來整不到他頭上。但是，由於他曾經是國民黨軍隊的排長，就給他劃了一個兵痞成分，抓起來判了幾年徒刑。在他被抓的當天，他妻子和兒子張寶也被抓來，關進了這個魯家大院的糧倉。

農會把魯澤英母子關在這個倉房裡，鎖上門就走了。這一走他們就把這事忘記了。半個月後，有人從這兒路過，聞到一股很濃的臭氣，開始以為是死老鼠，後來覺得不對，打開倉門一看，魯澤英和她兒子張寶已經餓死，身上已經生蛆了，母子倆還抱著。當時魯澤英還不到 30 歲，兒子才幾歲。

他們就餓死在這個大院的糧倉裡

八〉、土改之後的不幸

土改結束，地富和其家屬們的苦難並沒有結束，我自己的遭遇就不說了，那已經寫在我的兩本書中，我講兩個別人的故事。

（一）、一棵杉木和一棵梨樹

為下面這件事我走訪了好幾個人，都是這樣說的。

石耶公社寶塔大隊有個姓邱的貧農社員，家很窮，吃鹽都困難，因此，他有時便去砍集體的林木來賣。那天，他又砍了一棵杉樹，樹直徑大約有 5 寸，當時市場價可賣 2 元。第二天他去賣時，走到現在石耶檢查站那個地方被公社幹部查到了，說他盜竊集體財產。問他是什麼成分，他說是貧農。公社幹部聽說是貧農，就只把杉木沒收了，沒有抓人。但是，好像不整點什麼又說不過去，於是問他樹是哪個砍的，他說是他自己砍的。又問他，有沒有人看見，他說有個人看見，叫張鵬程。幹部又問張鵬程是什麼成分，邱社員說他是富農。

富農！這下就有戲了。

這個公社幹部，他姓王，一心想抓點階級鬥爭。他當天就到寶塔隊去開會。

他先召集隊長和積極分子開了個小會，然後開大會。他說：「你們中有地富分子，支持貧下中農破壞集體經濟，是誰？」隊長按事先的安排說：「是張鵬程！」王幹部說：「把他抓出來！」

張鵬程被抓來批鬥，他覺得很冤枉，說：「我只看到有個人扛一根棒棒，我不曉得他是幹啥。」但不由他分說，王幹部認定他這個四類分子在背後使壞，破壞集體經濟。

會場上有個積極分子揭發說：「張鵬程還把隊裡的一棵梨樹苗挖來栽在他屋前的院壩上。」

張鵬程說那是他在山上挖的一棵樹苗。王幹部說，山也是集體的，挖樹苗就是盜竊集體經濟。王幹部認為不僅要算政治賬還要算經濟賬，於是他問：「樹大概要幾年掛果？」

下面回答：「三年就可以掛果了。」「樹的壽命有好多年？」「大約五十年。」「一年收得到多少果子？」「平均兩百斤。」「現在梨子多少錢一斤？」「一般兩角錢一斤。」「五十年那就是兩千元錢。」

於是，王幹部要張鵬程照此退賠。張鵬程說，他沒錢，他去把樹苗挖出來栽回去。

「那不行，你挖都挖了，就像殺人，人殺了還得回去？」這時有一個人說，他豬圈裡還有一頭豬，有兩百多斤。張鵬程一聽大驚，哀求說，那條豬他餵了一年多，油鹽錢都要靠它。

但是，他的豬還是被強行拖走了。

（二）、死，也要吃頓飽飯

吳肇修的二哥叫吳正夫，他被抓去勞改，幸虧抓走了，晚一個月就會被槍斃。

但是他還是沒能活出來，大饑荒時，勞改人員大量餓死，他也餓死了。

吳正夫有幾個女兒一個兒子，兒子叫吳永祿。吳永祿是個非常有才學的人，1949 年時剛剛高中畢業。抗美援朝時他想參軍，因為是地主子女，沒要他，他只好回鄉種田。

大饑荒時，他的幾個妹妹都外逃了，只有他留在家裡。一個大雪天，他餓得受不了，出去在地裡偷幾個蘿蔔，結果被發現，民兵衝著他一陣暴打，把他打昏死過去。民兵以為他死了，就走了。

過了一陣，他醒過來，從雪地裡爬回了家。他覺得這個日子沒法再過下去，便想自殺。他老想起當時人們說的一句話：要死也要吃頓飽飯，不要做餓死鬼。

這個話我當年也經常聽到人說。

胡祖暖在吳家大院講述

他家徒四壁，只有一床舊棉絮還值點錢，他就把這床棉絮抱到石耶街上，向一個姓楊的人換了一隻鴨子。他回來把鴨燉了，吃得一乾二淨，連湯都喝完。

他用的什麼繩子上吊？用的批鬥他時捆他的那根繩子！民兵要他把那根繩子保存好，開鬥爭會時帶上好捆他。

據說他死前還寫了一首詩，但是我沒有看到。我去他那兒玩時看到他經常寫詩，都是古體詩，他很有才華，多年來，這個人的音容笑貌經常出現在我腦海裡。

九〉、一家貧下中農的「滅門」

土改時我們村有一個叫白老全的人，他當了多年的民兵隊長，因此我們一直叫他白隊長。我書上寫了他一家人的命運，有一兩萬字。

解放前，他們一家住在石耶一個叫豬行壩的地方，就是賣豬的地方。他父親去世得早，母親帶著他們四弟兄。這四弟兄相當懶，全靠大哥「賣兵」過日子。

「賣兵」就是有錢人家不願意自己的兒子去當兵，出錢讓他去。他每次收幾十個大洋，去了之後，一般走到湖南，最多走到吉首，就找個機會溜回來，下次又這樣幹。這個錢來得容易，他這樣幹了十幾年，但這點錢一家人過日子還是很難，幾兄弟吃了就睡，懶得不成樣，四兄弟都是光棍，住在茅草房裡。

共產黨來了，就需要這種窮人作土改積極分子和民兵。分勝利果實時他家分的是一等：田土是一塊旱澇保收的田，房子是吳家大院的好房，而且很寬敞。白老全一家高興得直喊：「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

最讓他們興奮的，是分的那一塊良田，他們甚至晚上都要走到田坎上去看。

他們一改懶惰，開始認真耕種這塊田。1953 年，豐收了，他們除了自己吃以外，還賣了餘糧，並且有了錢給每個人做了一套衣服。白老全的媽興奮得很，唯一的不足是四個兒子都沒有媳婦。她四處託人做媒，結果很不順。原因是他們一家的懶惰是出了名的，而且幾兄弟一個個長得一副豬相。因此，好事沒幹成。

第二年，1954 年，他們的收成就差了，為啥？原因是分到良田的那股興奮勁過了，根深柢固的懶勁又上來了，比如，田裡生草了也不去除。這一年他們不僅沒什麼餘糧賣，自己吃都困難。後來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分來的土地又歸公，他們的生活又困難了。

1958 年，他家的小兄弟白老高到一個礦山去幹活，他受不了苦，跑出來，結果被抓住做為流竄犯送去勞教，第二年就死在了勞改隊。接下來是 59 年、60 年大饑荒，白家真正的苦日子到來了。全家沒飯吃，大兒、二兒先後餓死，他們媽餓得站不起，她說：「解放前住的茅草房，但日子還過得去，春節還有地主像吳肇修、胡家給我們送吃的，有肉、有米、有麵條、有粑粑，現在連菜葉子都吃不上了，還不如舊社會。」

她是貧農，說這種話也沒把她怎樣，何況她很快也餓死了。

這樣，他家只剩下老三白老全一個人，他為什麼能活下來呢？因為他當民兵隊長。當時送犯人到秀山都是他負責解押，他背一把大砍刀，人們怕他。公共食堂打飯時他因此要占些便宜，這樣他才死裡逃生。

但是，由於他的懶惰遠近聞名，家裡又一貧如洗（以前分的房子又被政府收回去做了區委的辦公地），所以他也一直沒能討上媳婦。到文革時，他才找了一個殘疾人——她的腿殘得很厲害。

第二年，他老婆生小孩，那天晚上，他懶得不想自己操勞，去找隊長幫他解決。

隊長說：「你老婆生娃兒關我卵事！」

他說了一番話，很精彩。他說：「咦，不關你的事？我是貧下中農，貧下中農就是要依靠黨、依靠政府，你當隊長的怎麼不管？你曉得不：沒有貧農就沒有革命，若否定他們就是否定革命。這個話是毛主席說的。你不管，你就是否定毛主席！」

隊長沒辦法，只好向公社反映，公社打電話，縣裡還來了一輛吉普車，把他老婆接到縣裡生了個兒子。

他後來很得意，說：「石耶有哪個生娃兒到縣裡去過嘛？有哪個坐過吉普車？」三中全會後他又分了地，十年前他死了，今年他兒子又死了，都是村上埋的。

採訪時間：2017 年 7 月 9 日、10 日、1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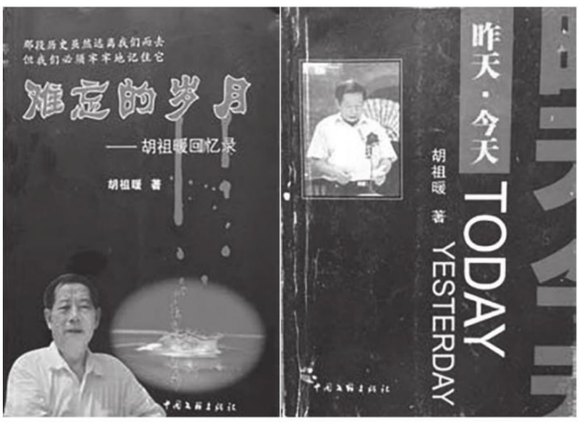
地點：秀山縣石耶溫泉山莊

採訪後記

胡祖暖老人從朋友那兒看到關於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講土改的報導，費了很大周折得到了我的電話。他非常熱情地邀請我去他開發的溫泉山莊，表示想同我好好聊聊，他說他是地主子女，快 80 歲了，親身經歷和耳聞目睹的事很多。

在這些年的採訪中，極少有人願意主動談土改的事，地主子女更是心有餘悸，胡祖暖是少有的幾個例外之一。

為了讓我瞭解他，他先寄來兩本他寫的書《難忘的歲月》和《昨天，今天》。



這兩本書我一口氣讀完，讀得我長吁短歎，甚至潸然淚下。

這些年，我聽到的悲苦和殘暴夠多了，對那個年代的荒唐和血腥更是瞭解深刻。但是，胡祖暖書中所記錄的那一幕幕驚心動魄和迴腸蕩氣仍然讓我掩卷長歎。

做為地主子女，胡祖暖只讀完了小學，但他卻寫出這般作品。我想，這除了他那九曲迴腸的經歷外，主要是他胡家注重教育的良好的遺傳基因使然。

我當即決定一放暑假就前去秀山，沒想到，在訂了火車票後的第三天，7 月 3 日，我就接到學校解聘我的通知。

我想，這主要是因為我在 6 月加入了因土改小說《軟埋》引起的論戰，在論戰中披露了中共土改血腥暴力，進一步引起了當局和學校惱怒的原因。

由於我這一年多做的「違禁品」不少，解聘更引起了我的不安。第二天我便匆匆逃離，換了一個地方上火車。到秀山后，為了不讓老人擔心，我隱瞞了我已經被開除的事。

胡祖暖老人這一輩子雖然九死一生，牢獄之災長達十九年，但仍然鐵骨錚錚，敢怒敢罵，對共黨極權毫無懼色。我心中大喜，便含蓄地對他說，我上月寫文章惹了些事，現在可能不安全。說完我便觀察他，如果他面露難色，我就提早離開。

沒料到他大包大攬地說：「放心住在我這兒，你就是一個逃犯我都不怕！」那

一刻，我的感動難以言喻！在看過了無數驚恐的面孔、經歷了無數膽怯的迴避、體會了無數明哲保身的精明，心裡已充滿了悲哀和絕望之後，我終於看到了一股浩然之氣——一種獨裁專制永遠無法徹底摧毀的民族男兒正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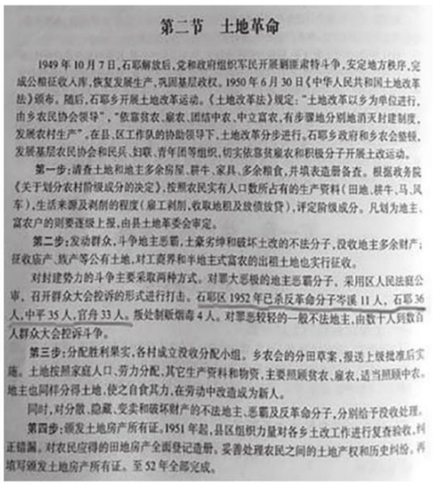
從那一刻起，我不再叫他「胡老師」，而稱改為「胡大哥」。

注：2017 年 9 月，我再次前往石耶，同胡祖暖老人一一走訪了他當年流亡和勞改的地方，隨後在美國同丁然製作成四集紀錄片《難忘的歲月》。

土改時石耶鄉被殺人員名單

據秀山縣石耶鎮志記載，石耶鎮土改時共槍斃 36 人。楊通思（土改時石耶鄉餘慶村農會幹事）和胡祖暖共同回憶了這 36 人中 32 的名字：

1，吳肇修（地主）；2，吳龍文（地主）；胡傳宗（地主）；4，胡光爵（地主）；5，胡光倫（地主）；6，胡光楣（地主）；7，胡署東（地主）；8，魯晉權（地主）；9，魯映輝（地主）；10，魯柏林（地主）；11，魯世義（地主子女，學生）；12，敖海門（地主）；13，敖朗然（地主）；14，敖傳祿（舊軍官）15，孫志祿（地主）；16，張裕龍（反革命）；17，陳進國（舊軍官）；18，田家樂（保長）；19，王仲清（説他投毒）；20，田岩保（説他投毒）；21，楊友琴（地主）；22，楊欣然（地主）；23，楊繼川（地主）；24，楊登雲（保長）；25，楊舉柏（舊軍官）；26，劉武祥（地主）；27，劉啓良（地主）；28，楊雲（保長）；29，黃存孝（舊軍官）；30，陳國芝（説他投毒）；31，辛躍廷（説他投毒）；32，吳可達（地主之子，説他為國民黨收税）；33，吳可達之父吳 XX（地主）；34，XXX；35，XXX；36，XXX



第二节　土地革命

1949 年 10 月 7 日，石耶解放后，党和政府组织军民开展剿匪肃特斗争，安定地方秩序，完成公粮征收入库，恢复发展生产，巩固基层政权。1950 年 6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随后，石耶乡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法》规定："土地改革以乡为单位进行，由乡农民协会领导"，"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村生产"，在县、区工作队的协助领导下，土地改革分步进行。石耶乡政府和乡农会整顿、发展基层农民协会和民兵、妇联、青年团等组织，切实依靠贫雇农和积极分子开展土改运动。

第一步：请查土地和地主多余房屋、耕牛、家具、多余粮食，并填表造册备查。根据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按照农民实有人口数所占有的生产资料（田地、耕牛、马、风车），生活来源及剥削的程度（雇工剥削、收取地租及放债放贷），评定阶级成分。凡划为地主、富农户的则要逐级上报，由县土地革委会审定。

第二步：发动群众，斗争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和破坏土改的不法分子，没收地主多余财产；征收庙产、族产等公有土地，对工商界和半地主式富农的出租土地也实行征收。

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对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分子，采用区人民法庭公审，召开群众大会控诉的形式进行打击。石耶区 1952 年已杀反革命分子岑溪 11 人，石耶 36 人，中平 35 人，官舟 33 人。叛处制贩烟毒 4 人。对罪恶较轻的一般不法地主，由数十人到数百人群众大会控诉斗争。

第三步：分配胜利果实，各村成立没收分配小组。乡农会的分田草案，报送上级批准后实施。土地按照家庭人口、劳力分配，其它生产资料和物资，主要照顾贫农、雇农，适当照顾中农。地主也同样分得土地，使之自食其力，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

同时，对分散、隐藏、变卖和破坏财产的不法地主、恶霸及反革命分子，分别给予没收处理。

第四步：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1951 年起，县区组织力量对各乡土改工作进行复查验收，纠正错漏，对农民应得的田地房产全面登记造册，妥善处理农民之间的土地产权和历史纠纷，再填写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至 52 年全部完成。

石耶鎮志第 86 頁記載的殺人數

石耶鎮

三十、也把我家關進「集中營」

講述人：魯澤慶

1936 年生

那天我趕到中寨是因為媽叫我去最後看一眼舅舅，結果那天沒有殺我舅，因為他只是吃鴉片，後來把他放了。

除了那天我看到殺的那 13 個人外，其他我曉得被殺了的有陳國之、魯澤鄉和楊習候。陳國之本是農會的人，土改時他很得意，又六親不認，結果別人整他，說他在河裡投毒，是反革命。他不承認，被整得慘，後來把他抓來槍斃了。魯澤鄉（音）是個保長，他被嚇倒了，往湖南跑，才跑到中寨坳，就被哨卡攔住，他沒有路條，問他是哪兒的，旁邊有認識的人說，是我們那兒的逃犯。就這一句話，就把他捆綁起來往秀山送。送到秀山，馬上就地槍決。楊習候是我大嫂的公公，他是中平鄉的大地主，他是在殺了那 13 個人之後才殺的。

土改時農會把我們魯氏家族全部評成地主。我伯伯家有個女兒嫁到外地，她好多年沒來過了，那天她來了，對我說：「你去打聽一下，看我到底是什麼成分，如果是破產地主，我就好作打算，我硬是沒得法了。他們一開會就要我砍柴給他們送去，我一個女人，沒得法，只有自殺了。」

我去找農會文書楊素珍，問她我們到底是什麼成分。她對我說，農會已經把我們那一族人全部劃成了地主，他們拿上去批，還有幾家沒有批，其中就有我家、我伯伯家和魯澤君家。

後來，魯氏家族裡就只有我們這幾家沒劃成地主。上面把我家改為「小土地出租」。但是，我家的財產全部被沒收了，收繳得一乾二淨！一丁點都不留！我們家養了十幾箱蜜蜂，農會的人用煙熏走蜜蜂，然後把蜂蜜拿走了。

我們沒挨鬥，房子也沒被收繳，但是，仍然把我們同地主一樣看待，比如，後來國家招工就不要我去。那些日子，晚上農會經常來敲門，砰砰砰！「開門開門開門！」農會的人闖進來，四處搜查，說是要搜壞人，哪兒有什麼壞人？！我嚇得發抖，根本睡不了覺。

還有，土改期間，男人大多被抓走了，判刑的判刑，槍斃的槍斃，地主家屬們就被集中關押在一起。我家沒評成地主，但也被關進去，那裡面地主娃娃很多。

「集中營」每天早上 7 點開門放人出去打水和摘菜，上午 9 點就關門。以前河對岸有很多大樹，他們砍來燒了，我父親在那兒挖荒，種了些菜，那個菜長得很好，有人這麼高，關押期間我們就吃那個青菜，也沒得油鹽。

關押的那大半年時間，很悲慘，沒吃的，真的是「晝無筐雞之米，夜無鼠耗之糧」，每家樹皮草根都吃。我們關在一起的有個三歲的女孩，是地主魯符文的女兒，魯符文被抓去勞改了。那天，她趴在門檻邊，連「餓」字都說不清楚了。

她叫:「媽呀，我羅（餓）得很呀。」說著她往右邊一倒，就在門檻邊，她爬起來，要倒要倒的。「媽呀，我羅（餓）得很呀。」又往左邊一倒。倒下後她叫了幾聲就死了。

在關押期間我家靠吃青菜沒餓死，但是，幾年後，1959 年，我父母（魯佩久和楊勝英）雙雙餓死了。

在「集中營」，還有件事我也忘不了。

有天早上，我媽叫我和哥哥出去摘菜，我們在挖地時被魯世剛看到了。魯世剛是我們魯氏家族的人，比我長一輩，我叫他叔叔。那時他是兒童團長，成天扛個棒棒，上面繫條紅布，雄喲，志氣昂昂的喲。他說我兩弟兄是去埋金銀，我們說：「你去看嘛，有沒有？」魯世剛不由分說，在地上劃個圈圈，強迫我們立正站在圈子裡，不准越線。我們頂著太陽，在圈圈裡面站了一整天。晚上他又把我們關在廟子裡，我們兩兄弟在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才放出來，現在 80 歲以上的人都知道這件事。

魯世剛他也遭了報應——也劃成了地主。怎麼回事呢？他有個舅娘，劃成地主後所有財產全部被收繳，全家還被趕出門。她來求魯世剛，希望送她幾個碗，一點衣服和鋪蓋。魯世剛當時正在炸油粑粑，他不僅不給，還指著她臉罵，叫她滾。他舅娘走到橋上，坐在那兒哭。

哭沒用，她要報復。

魯世剛家的二媽（他父親的小老婆）有 40 挑田隱藏在她的村裡，她把這事揭發了。於是那邊來個條子，說他家是漏劃地主，這一下，魯世剛也就成了地主。

一當地主，他立馬被掃地出門，全家被趕到桂陰溝那個深山老林裡去住了。

採訪時間：2017 年 7 月 6 日

地點：秀山縣石耶鎮青龍村半邊街

採訪後記

石耶鎮當年有一個著名的半邊街，街沿河而建，一條秀美的小河從街邊流過。

當年，這兒的人們開作坊、做買賣、銷桐油，搞運輸，生意紅紅火火。

有錢了，自然就要買田地，於是，這條街上的地主最多。

街沿河而建

土改來了，半邊街上的眾多地主們首當其衝，抓的抓、關的關、殺的殺。一條紅火的商業街在「關、管、殺」的「紅火」和「分勝利果實」的狂熱中暗淡下去了。

一位叫魯世連的老人帶著我沿街走去，他邊走邊講：這兒原來是個熱鬧的碼頭、那兒以前是一個繁華的大院……河對岸以前有一排排參天的大樹，風景很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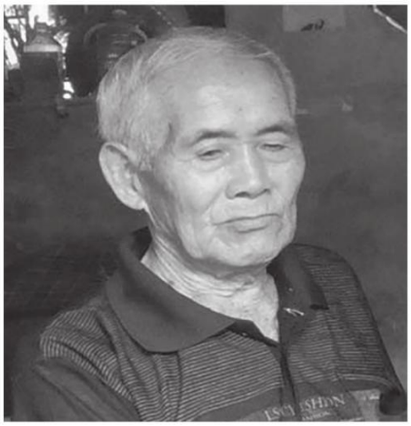
魯世連邊走邊講

最後，他把我帶到魯澤慶的家。「他知道一些土改的事。」他說。

半邊街現在已經很冷清，當年的地主們早已被掃地出門，他們的宅院沒被毀的也破敗不堪。81 歲的魯澤慶老人是少有的還住在這兒的魯家人。他之所以還能與半邊街共命運，是因為他家沒劃成地主，「小土地出租」這個成分等級讓他家保住了房子，使他沒像他的一族人那樣流落他鄉。

半邊街殘存的地主大院風火牆

三十一、從兒童團大隊長到地主子女



講述人：魯世剛

1932 年生

土改時，我家最初的成分是貧農，田土都分了，「果實」也分了好幾次。

我那時是兒童團大隊長，陳文映（音）是兒童團長，他已經過世了。那時，土改團的袁同志和陳同志最喜歡我，因為我工作積極。我們村兒童團有幾十個人，唱歌跳舞，騎「高腳馬」（土家、苗寨的民間體育活動），跳舞主要是扭秧歌，我們還到梅江去跳過。另外就是站崗放哨、查路條。那時走路任何人都要有路條才放行，沒路條的不准走。路條由農會開。有一個村長，沒路條，不把我們放在眼裡，他說：「我是村長，沒路條怎麼樣？」我們硬是把他抓來關了一天，兒童團也有權喲，雖然我們沒有刀槍，只有一根棍棒。

我們也要參加鬥地主，開會都是在黃家大屋。我們魯家的地主多，被鬥的都是我們魯氏家族的人，我不能不去，我是兒童團領導呀。鬥爭會上，我們要呼口號：「打倒地主！」不過，我從沒有吊過人打過人，我只看到吊起打喲，那打得慘，那些武裝隊的人，抓到什麼就用什麼打，棒棒呀，扁擔呀，那打得慘。

殺人我們兒童團也要去，在台下呼口號，如：「打倒反革命！」「執行槍決！」有一次殺人我記得很清楚，那天太陽很大，區長何習祿（音）坐在臺上，（地主）魯世義在臺上掙扎，何習祿把手一招，就把魯世義拖去槍斃了。接著把楊吉雲（音）抓來批鬥，他好像是個甲長。幾個老媽子上臺，說他強姦了她女兒喲、還強姦了她媳婦喲。只說了幾句話，何習祿又把手一招，楊吉雲就被拖去打了。打了後還用刺刀殺了他好多刀，我走攏去看了的。

可是沒多久，我家居然被補劃為地主！為什麼呢？我們有一家姓黃的親戚（遠房舅娘），揭發說我家在他們那個村裡還有黑田（隱瞞的田），我們隱藏不報。

這一下就把我家評成了地主！我根本不曉得我家在那兒有田。我只曉得我家五口人，共 21 挑半田。

這樣我們就當了地主，也被吊、被跪、被打。還有，這頂地主帽子，讓我們三兄弟都討不到老婆，所以，我們三兄弟都是單身漢。

採訪時間：2017 年 7 月 7 日
地點：秀山石耶鎮青龍村

採訪後記

在石耶當年著名的半邊街採訪時，偶然聽說了魯世剛是土改時的兒童團長（後來落實是大隊長），還聽說他當年「大義滅親」，毫不留情地關、管他們魯家的地主和其子女。

剛維修了的木板房

我當即趕到青龍村。

魯世剛是孤寡老人，長期獨自居住在一間破爛漏雨的木板房裡。我到來之前，村上剛出錢給他把破爛維修了一下，使它看上去不再像「萬惡的舊社會」。

土改時魯世剛已經 19 歲，又當了兒童團大隊長（本來可以當民兵了，不知為何入兒童團），他應當是親身經歷和親眼目睹了不少土改真相。還有，土改工作隊的人喜歡他「工作積極」應當是有「積極」的內容的。可惜，他說他記憶不好，記不得了。但是，他對他家只有 21 挑半田卻記得很清楚，甚至這 21 挑半分別位於哪個地方，每個地方是多少他都記得一清二楚。

整個採訪期間魯世剛都愁眉不展，看得出，這輩子他過得苦悶壓抑兼窮愁潦倒。他好幾次自言自語地說：「居然把我家評為地主！」「居然把我家評為地主！」

顯然，這是他一輩子耿耿於懷的心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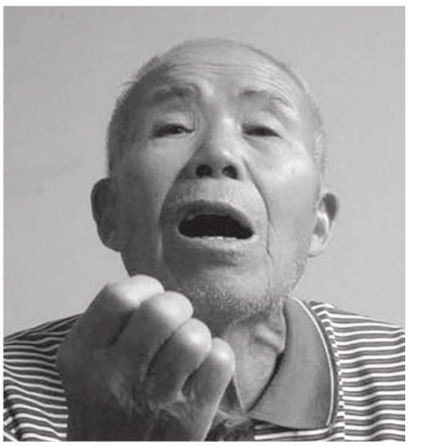
想來也是，土改如此積極批鬥地主，甚至不惜大義滅親，但主子居然翻臉不認人，「大義滅情」地把他家評成了地主。而這一頂地主帽子，讓他們魯家三兄弟全部成了孤寡老人（其中大哥已經去世，弟弟在養老院），使得他家的香火無以為繼了。

愁眉不展的魯世剛

可能，魯世剛這一輩子最輝煌、最幸福、最激情燃燒、最被人喜歡的日子，就是土改時當兒童團大隊長的那一段「工作積極」的歲月。

只是，他那一段「大義滅親」的激情燃燒，讓他魯家的親友們恨怨至今。

三十二、三哥的「狠毒」害了我一生



講述人：魯世純

1943 年生

我父親在 1948 年就死了，他娶過三個老婆，土改時大媽、二媽也死了，我二媽姓劉，是吳家溝的人。我是小媽生的。

1949 年時我家已經破產了，原因是我父親吃鴉片敗了家，因此，土改時我家被評為貧農，還分了勝利果實。

複查時我家突然被評為地主是因為一件事。

我二舅娘家被評為地主後，所有東西都沒收完了，她到我家來，想我們幫她一把。我三哥（魯世剛）當時是土改兒童團大隊長。她來時，我們正在炸油粑粑。

三哥衝著她一陣罵:「你這個地主婆！我家是貧農，你不要來害我們，趕快滾！」

二舅娘什麼都沒要到反而還挨一頓罵，我三哥太狠毒了。二舅娘只得走了。

當年我二媽嫁給我父親時有幾十挑私房田，做為陪嫁。田在她娘家那邊，每年請人種，穀子賣了後把錢交給我二媽，那就是她的私房錢。二媽死後我們根本就不清楚那個田是怎麼回事。

二舅娘挨了我三哥的罵後，實在咽不下這口氣，她就揭發，說我家還有幾十挑田隱藏不報，這幾十挑田就是我二媽當年的那個私房田。於是，那邊農會打了個條子來，這一下就把我家劃成地主。

一劃為地主，我們馬上就被趕到山溝一個茅草棚去住。

完了！成了地主，這一輩子就完了！我小學時成績很好，當時第一名在榜上是坐飛機，第二名是坐火車。我每學期都是坐飛機。我讀三冊班時因為成績好，準備把我提到五冊班，跳兩班，這時我家從貧農變為地主，我們被趕到那個山溝的茅草棚去，再也讀不了書了。

書讀不成，後來婚也結不成。

我們生產隊有個十七、八歲的姑娘小名叫玉唐（音），她愛上我，我們悄悄好了，她還懷了我的娃娃。她家人發現後，不僅堅決不准我們好，而且還要整我。

我是地主子女，她家是貧農。我害怕，趕快逃走了。

我在外面流亡了十多年，在貴州做磚瓦。毛澤東死後華國鋒上臺，抓綱治國，全國大戒嚴，我被抓了押送回來。我是這樣才回到家鄉的。

問：你逃走後玉唐姑娘怎樣了？

魯：她家裡的人打她，逼她嫁人。她跑到河邊投江，但是被撈了上來。她坐在河壩，堅決不回家，後來他們把我母親叫去，是我母親才把她勸回去的。當然後來她還是嫁人了，嫁到岑溪。嫁過去沒幾天，她懷上的那個娃娃就生下來了，是個兒子。但是，他是地主子女的骨血，不能讓他成活，他們把他掐死了。

問：你後來沒有再找物件（對象）了嗎？

魯：我曾經遇到一個叫潘學英的姑娘，我們相好了，她到我家（青龍村）來看我，住了幾天。結果一個叫劉光強（音）的人跑到我家來，對她說：「妳趕快走，不能待在他家，他是地主！」這一下她不敢再來了。

問：三中全會後地主摘帽，這時你可以找老婆了呀。

魯：我年齡比較大了，年輕的不願找我，年齡大的我又不願意。更主要的是我一貧如洗，連一間像樣的房子都沒有，心也冷了，算了，這輩子就單身了。

對了，玉唐她現在還在，我在街上還遇到過她，她看到我，很不好意思。

唉，沒得辦法，苦呀！

採訪時間：2017 年 9 月 28 日

地點：秀山縣石耶鎮養老院

採訪後記

第二次到秀山石耶後，為瞭解更多的關於魯世洋妻子的事，我到石耶養老院找到魯世洋的堂兄魯世純。到後才發現，他就是上次我採訪的那位土改積極分子、兒童團大隊長魯世剛的弟弟。他，和他一家人的命運，因他三哥魯世剛土改時的大義滅親而徹底改變。最顯著的，就是他們幾兄弟這輩子都沒能討上老婆，一輩子孤身。

我沒問他是否恨他三哥，但他在講述他三哥當年罵他二舅娘時，用了「狠毒」一詞。

我想，這可能也不完全是他三哥的錯，因為，土改本身就是狠毒，就需要狠毒，要培養狠毒，個體一旦投入其中，就必須狠毒。

三十三、殺千分之三

講述人：劉 XX

1946 年生

我出生在 XX 鄉一個很偏僻的土家山寨。XX 四面都是山，有一條小河從寨子中間流過，小河北邊屬於貴州，南邊屬於四川，那是一個極其封閉的山寨。

土改時我家劃成地主，當時我才 6 歲，很多事都是聽家人講的。

我祖父是清朝最後一屆科舉考試的秀才，叫劉炳乾。他愛好書法和詩詞，可惜都沒流傳下來，我只知道在清溪上面那個小河橋上題有他的一幅對子：「跨河可達黔三元，策馬隨歌蜀道難。」祖父一邊教書，一邊行醫。他為什麼還行醫呢？因為他目睹他母親病死。那個年代的人很講孝。他說，我讀那麼多書但對媽媽的病一無所知，所以他又學醫。祖父在 1936 年去世了，他的兒子劉 XX，也就是我父親，曾跟著祖父讀書，但他的功底不及我祖父，因此只能在貧窮落後的鄉下教書。

土改時據說我家裡有 93 挑田。我聽說，這份家業是我祖父的祖父掙下的。

當年他一邊挑鹽，一邊開荒，一點一滴掙下了這份家產。

大約在 1948 年，我在 XX 縣讀書的大哥劉 XX 得到消息，說共產黨來了後要分田分地，他叫我爹把田賣了。我爹說：「你亂說！這個田要是買來的，可以賣，但它是祖上一點點開荒開來的，我要是守不住業那是不忠不孝。」還有，我爹覺得，今後我們兩兄弟分家，要分田產，田賣了怎麼辦？我大哥說，他今後出去教書，不要田產。但我爹還是捨不得賣。

土改一來，驚天動地，父親嚇壞了。在我們那個偏僻山鄉，家裡有 93 挑田，而且還請得有長工，那是天經地義的地主了。

好像當時講剝削有三種：地租剝削、雇工剝削、債利剝削。家裡放沒放債我不曉得，但我們雇了一個長工，他是個單身漢，家裡有很多事都由他打點。父親雖然是地主，但他一生主要是教書，也沒得任何血債。可是，他看到土改那個陣式，看到好多他知道的地主都被殺了，他知道自己活不出來，為了保一個全屍，他上吊自殺了，那年他 49 歲。

我對爹的印象已經不深了，但他死前對我說的話我記得非常清楚。那年我 6 歲，還不時吃我媽的奶——吃著玩。那天他對我說：「你不要再吃你媽的奶了，從現在起，已經沒有我了。」我當時覺得很奇怪，你不是在同我說話嗎？怎麼沒有你了呢？

當天，他就上了吊。

爹死後我媽被抓到村上去逼要金銀。

我記得有一天晚上，一個人們叫他「龍同志」的人把我抱起，當時我覺得莫大的安慰，龍同志不僅不打我，還抱我。他抱著我問：「你看到你爹曾經揹了一個背篼出去了是不是？」我說：「是。」「從後面出去的是不是？」「是。」他又問：「你三姐抗了把鋤頭出去是不是？」我說：「是。」他又問：「他們是不是挖了坑把背篼裡的東西埋在裡面了？」我說：「是。」我其實什麼都不曉得，他誘導我，我都說「是」。

於是，第二天就去挖，問我，是不是這地方？我說「是」，挖不出來，又問是不是這個地方，我又說「是」，還是沒挖出金銀。這樣，我媽被吊起來打，他們說：「妳娃娃都說妳把金銀埋藏起來了。」同時，他們還把我三姐捆起吊打，打得一臉烏黑，還用火馬草來抽打她身子，當時我三姐才十五歲。

那時，各個村互相交流打人的手法，你學我的經驗，我又學你的刑罰，用各種花樣來折磨地主。

注：劉 XX 沒有詳談如何折磨他的母親，他說，那些手段 XXX 的書中有記錄。於是，我在該書中查到了劉母在被逼金銀時所遭受的刑罰：

一、「猴兒抱柱」——即本書中提到的「吃咂酒」；
二、「破頭尖」——用一寸長的竹簽從手指甲處打進去；
三、「蘇秦背劍」；
四、「釣美人魚」——將劉母的長髮扭成一股繩，用繩索打結後懸吊樑上；
五、用火馬草塞進劉母的下身，然後揉搓；
六、「坐木桶」——冬天裡將劉母抬入木桶中用冷水浸泡。
（該書 80—81 頁）
劉 XX 的母親鄒 XX 沒被折磨死，她於 1960 年大饑荒時餓死，終年 50 多歲。

劉：接下來我們被趕到一個茅草棚去住，我開始外出討飯。我在外面討飯，常常很晚都沒回家，我才六歲，走不動了，又餓，就在外面睡了。有時我三姐來找我，

找到後把我揹回去。記得有一天晚上，月亮很明亮，我坐在一個石板上，看著月亮從雲裡鑽進鑽出，不知不覺睡著了。我醒來時發現媽媽正抱著我，她怎麼找到我的也不知道。我只記得她的眼淚滴在我身上，很燙。

那些年我們受的屈辱實在是一言難盡！比如有一次生產隊一個民兵排長來我家挑糞，我說，由於漏水，糞坑裡大多都是水，沒多少糞了。他不聽，挑起就走。

結果當天晚上就把我叫去，說我在糞坑裡摻水要罰款。他們不由我分辯，罰我6元錢。6元錢，那是我一年幹到頭的所有收入！

那些年，我們這種人的婚姻是很困難的，為了傳宗接代，我找了個富農的女兒，她講起她媽被吊頭髮，把頭皮都撕掉了，共同的遭遇讓我們走到了一起。

對了，我是地主子女中極少數讀了初中的人。原因是，XX縣在三年大饑荒年中所有的學校停辦，初中不招生，1963年情況好轉後才招生。全縣招三個班共150人，由於當時生源不足，我也憑成績考上了，據說，那150人中共有18個像我這種所謂出身不好的子弟。

初中畢業後我去考師範，一問出身，就不要我了。但後來我一步步走出了農村，最後還成了公務員。

我退休後被請去寫縣誌、公安誌、法院誌等等，XX縣的好多部門誌都是我寫的。寫部門誌就要查資料，我在公安局就看到一些絕密資料。還有一些槍斃現場的照片，比如槍斃楊XX他們的照片我都看到的。公安局好幾間屋的檔案我全部翻看完，我是最有幸看到公安檔案的人。公安局長曾開玩笑地說：「你今後要是出國，會受到重點『保護』。」他的意思是我看到了太多的絕密資料，會因此受到監控。

想來也是，比如我看到一份絕密資料，是一份中央文件：必須要殺千分之三，要徹底摧毀國民黨的社會基礎。當時公安局的人說，這一條你就不要寫了。還有，我看到一張表，上面列有槍斃多少人，自殺多少人。由於我父親是自殺，所以我就關注自殺的名單，記得共有三百多人，但是上面沒有看到我父親的名字。槍斃了多少我就記不得了。

問：你接觸到這麼珍貴的資料，你都沒把它記錄下來？

劉：土改研究是禁區，我連說都不敢說。所以，這些年我一直搞民俗研究。

採訪時間：2016年X月X日

地點：XX縣XX鎮

採訪後記

劉先生是有覺悟、有認識也有很強表述力的文化人，做為地主後代，這樣的人並不多。

我下火車後，他專程來接我，並陪同了我兩天。他早在網上看到了關於我的介紹，知道我在作土改調查並為此受到監控，我認為，他仍然敢同我接觸應當是心無恐懼了。

可惜，當面對攝像鏡頭時，他顯得有些吞吞吐吐，甚至言不由衷。

我能理解，多年的恐懼是很難一下消除的。

這很正常，他能走到這一步，已經很不錯了。

（因故隱去劉的採訪照片和他的名字。）

補記：

1951 年，鎮壓反革命運動和土改運動同時進行，殺人也是同時進行。

毛澤東嫌殺人太少，一再指示各地要大殺幾批，他還給一些地方下達具體的殺人指標。 2 月間，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殺人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

如果當時全國人口按五億五千萬計算，千分之一就是五十五萬人。

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 1954 年 1 月在一份報告中說，共逮捕了 262 萬人，其中殺了 71 萬 2 千人，是全國人口的千分之 1.31。

按照這個說法，中共「鎮反」殺人的數量已經突破了定的指標。

劉 XX 在縣公安局看到的（檔）文件是殺千分之三，我看到的一份資料是殺了超過千分之三。該資料是「賈啓允及溫江地委給川西區黨委的報告」。賈啓允當時是四川省溫江地委書記，他在報告中寫道：「（我區）擅自超出原規定殺人數字，全區十二個縣，除彭縣、灌縣、崇慶、華陽四縣外，其餘八縣殺人均達總人口千分之三，有的多至千分之四。」

這個數字還不包括自殺的、被折磨死的。

鎮反和土改時究竟殺了多少人，眼下還看不到官方說法。民間學者們一般認為是兩百多萬。土改研究學者、《鄉村社會的毀滅》一書的作者謝幼田認為，「殺人數目至少是五百餘萬人。」（詳見該書「殺人比賽」一節，明鏡出版，2010 年

三十四、我兩個父親，同一天遇難

講述人：吳家坤

1941 年生

我是秀山溶溪鄉人，我媽媽叫馬玉珍，她年輕時長得很漂亮，人又能幹。她 16 歲時被一個叫吳成漢的人用搶婚的方式搶去當了小老婆。但是，沒多久，她還沒有生育時，吳成漢就被土匪殺了。接下來，我媽又被一個叫吳甫仁的地主看上了，吳甫仁家是溶溪鄉的首富，有幾百挑田。吳甫仁就是我的生父。可是，吳甫仁的母親堅決不同意他娶我媽做小老婆，我生父要講孝，因此，他一直沒有娶我媽，只劃了幾十挑田給我們母子做生活。

後來我媽媽嫁給了一個也是姓吳的人，也就是我的後父，叫吳承旦。這個人是個社會上的「滾籠子」（混混），還玩過槍。他一無所有，房子也賣了，所以後來劃成分，他被劃成貧農，我因此成了貧農的子女。

土改時我爸爸（後父）是農會的積極分子。那一天農會長、副農會長、村長，還有我爸爸等在街上開會，他們說，二村（緊鄰的一個村）的農會幹部把「勝利果實」（地主的財物）私分了，他們要去告。我爸爸是個「鬧麻雀」，說話一向高吼高鬧，他們覺得自己正大光明，也不怕，結果他們的話被人聽見並告訴了二村的農會。二村的農會先下手為強，搶先去向區長江德田（音）彙報（江德田是南下的幹部），他們誣告說我父親他們在開反革命會。當時各地正在大殺地主、反革命。上面不分青紅皂白，軍管會的人馬上把他們抓去秀山，幾天之後就押回溶溪槍殺了。其中只有副農會長沒被殺，他被判了管制。

記得那是 1951 年的 4 月份，天氣都有點熱了。當時我 12 歲，正在溶溪小學讀四年級。公審大會的會場就設在我們學校禮堂前的壩子裡，那天一共槍斃 12 個，我知道的有農會長易竹生（音）、村長王松茂、我爸爸，還有地主何勳臣。他們把我叫回家，怕我在現場哭鬧。前些日子，我們有個姓龔的同學，他比我大兩歲，槍斃他家人時，他一路哭鬧到審判臺上。

我回到家，同媽媽在灶台前傷傷心心地哭。下午才聽到槍聲，我是家裡最大的，下面還有兩個妹妹。我媽是小腳，我們找了兩個人，用一架梯子把父親的屍體抬回

來，在河邊把他埋了。

對了，那天還槍斃了我的生父吳甫仁，他是大地主，肯定跑不脫。所以，我的兩個父親同一天遇難。我生父的屍體是吳家去收埋的。

湖南省長沙縣譚公鄉農會沒收地主房屋
選自《中南土地改革的偉大勝利》

父親死後，我們三子妹就全靠我媽撫養。我媽這輩子命很苦，三個男人，三個男人都死於非命。但我媽很能幹，她揹個背篼出去做小生意，賣草鞋、落花生、瓜子，還釀甜酒賣。我們一家的全部擔子都在媽身上。那時一聽說媽病了，我就嚇得哭，悄悄地哭，媽媽如果有個三長兩短，我們幾姊妹怎麼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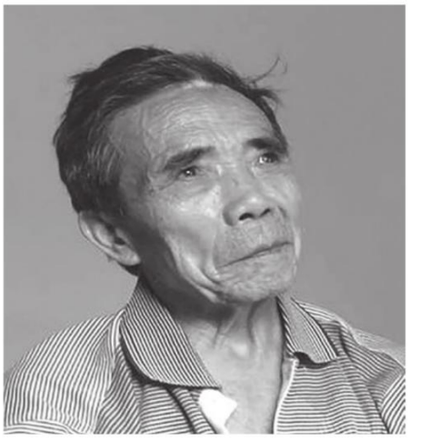
我沒得到過父愛，生父我幾乎沒有任何印象，後父只有短短的幾年，但是，我卻成了反革命家屬子女，同時，又把我認為是大地主吳甫仁的兒子，所以我身兼兩重身分——反屬子女和地主子女。我從小讀書很行，但小學一畢業就不准我讀書了。饑荒年時我妹妹吳曉容餓死，我跑到貴州當了個鄉村教師活了下來。

改革開放後，我們當年被殺的幾家人寫了申訴書，要求平反。那一批被殺的 12 個人中，何地主的大兒子在臺灣，他來秀山要求給他父親平反，當時正同台灣搞統戰，因此公安局接待了他。一查資料，公安局裡根本沒有那次殺人的檔案記載。當年隨隨便便就殺了。公安局把我們找去，對我們說，這事起不得頭（即不能著手平反），秀山錯殺的人太多了。現在能做的只是不再把你們當反革命家屬看待，你們也可以入黨、子女可以讀書，也可以工作。

幾十年了，我們就得這麼一個結果。

採訪時間：2017 年 7 月 7 日
地點：重慶秀山縣石耶鎮

三十五、打倒封建勢力 要憑良心！



講述人：吳興強

1937 年生

我家是鎮街上的人，媽媽做布生意，叔叔是個銀匠，在鎮上有個鋪子，生意很好，因為對面是貴州少數民族（苗族），他們經常要打銀飾。家裡富裕了，有了錢，給我大哥找媳婦就想高攀，結果對方瞧不起我們，說：「嫁到他家？他家有什麼？只是個銀匠，田土都沒有。」

那個年代人們覺得錢財放在口袋裡看不見，看得見的、實在的是田地。我家於是打算買田。那已經是 1947 年了，離「解放」（1949 年）只有一年多。當時，正好大地主王志純家破產，整個秀山就是王家田土多，他一下子就賣幾百挑田（一挑田約產 3 ～ 4 百斤穀子）。我家一口氣就買下了一百多挑田。買了田就要請人耕種，所以後來土改我家就算是「剝削」。

不過，在土改初期，我家評的是富裕中農，減租退押時只把我媽的布匹收走了，其他財產都沒動。

土改時我讀小學五年級，我參加了兒童團，當了個分隊長。那時各個村都要組織兒童團。我們這兒是個古城，有三道城門，每個城門我們都派幾個人去守，查路條，地主出門，走一步都要請假，還要「早請示，晚彙報」。地主的財產全部收繳光，最多給他留條爛棉絮。

解放軍在我們這兒駐了一個營，教我們唱歌、抓壞人。我們去抓來就交給他們。

那時每天晚上都有會。鬥地主整得最凶的還不是王志純家，而是田壩子的王老煥（音）家，王老煥的老爸被抓來吊起打，滾「鐵梁角」（一種長有一寸長硬刺的植物）。開會鬥地主時也叫我們兒童團去打地主，農會的大人們說：「去去去，去打！」我們就去用條子抽打地主，當時還覺得很好玩，現在想起來真是不像話。

槍斃人我們這兒多得很，殺得凶，可能殺了上百人，地主、土匪、投機倒把的、對社會不滿的，都殺。自殺的也多，地主天天被鬥打，遭不住了，就自殺。

賣給我們田地的王志純、王志武兩弟兄也都被槍斃了，是同一天，這是我親眼

目睹的。把王志純押出來時，他嚇癱了，是拖出去的。他兄弟王志武卻很硬氣，把他押赴刑場時，他還邊走邊大喊：「打倒封建勢力要憑良心！」

他這樣叫喊是有原因的。他們王家在當地做了不少好事，如果說是扶貧，他家就扶了不少貧。我們這下面以前有個大會館，那一年天乾，收成不好，不少人無法生活。王家馬上開倉送米，來一個人，就舀一碗或者半碗米。聞訊來的人太多，王家支撐不起，改為煮稀飯救濟。還有，我們有一個鄰居很窮，媽死了沒錢埋，也是王家地主出錢幫他家安葬的。人家做了不少好事，所以他臨死前大叫：「打倒封建勢力要憑良心！」

緊鄰貴州的秀山雅江鎮

土改複查時我家倒楣了。剛才說了，我家本來評的是富裕中農，但是，有人眼紅我們那一百多挑田，為了把田拿走，就藉複查把我家劃成了地主——小地主。不劃成地主田就拿不走，一劃地主，馬上就可以分我們的田了。

土改時淨用些啥都不懂的窮人，讓他們當鄉長、村長、隊長，狗屁不通！這樣國家怎麼搞得好？我家只是個手藝人，做點生意，非常善良，從不害人整人，淨做好事。可是，這個政權見一個好人就要把他搞死。對「右派」不就是這樣嗎？我家劃成地主後，我馬上被兒童團開除了。後來的歲月，一開鬥爭會我們就跑不脫，同地主們站成一排，標明是壞人、是壞傢伙。還有，戴了地主帽子，我小學畢業就不准升學了，參軍也不行，說我們有階級仇恨，那硬是六親不認，我操他娘的！

採訪時間：2017 年 7 月 9 日

地點：秀山縣雅江鎮

三十六、土改後，楊家唯一倖存者的遭遇

講述人：胡祖暖

楊桂芬的表親

採訪前，楊桂芬因恐懼而「臨陣脫逃」，不得不由她表叔胡祖暖代為講述。

一〉、暴風驟雨，家破人亡

楊桂芬是我的表親，土改後我們分離了幾十年，前些年我們重逢，她向我講了她和她一家的經歷，從頭到尾她都在哭。

楊桂芬是地主楊欣然的二女兒，土改（1951 年）時 7 歲，她姐姐楊梅秋 10 歲，下面還有個妹妹楊豔芬 2 歲。楊欣然同他的兩個兄弟楊友琴、楊舉柏在土改時都被槍斃了。

楊欣然被槍斃後的第三天，他父親跳河自殺，母親不久上了吊。

那些農會的幹部民兵們便衝著楊欣然的妻子洪老四下手。

楊家的老屋在我們餘慶村對面的西達（音）村，土改之前，楊家已經搬到石耶街上來住。西達村鬥打地主比我們村還要殘酷，追逼金銀用了各種刑罰。桂芬記得那是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民兵把她媽媽抓去，吊在樑上打「半邊豬」，把她打得昏死過去。第二天晚上鬥打兩個地主老婆，除她媽外，還有地主黃祝山的老婆。民兵們將兩個女人脫得只剩下一條短褲衩，然後把她們壓跪在地上的碎碗渣與鐵梁角刺上，壓下去提起來又壓……第三天下了大雪，兩個女人又被抓去受刑，這次的刑罰是「揹火背篼」。他們在一隻鐵桶裡裝上燒紅的木炭，把黃祝山的老婆衣服脫光，然後把鐵桶套在她身上，那個肉燒得滋滋著響。接下來就是洪老四……

那些農會的人折磨她們上了癮，用了「揹火背篼」刑後意猶未盡，有人提出「冰火兩重天」的「玩法」——「堆雪人」。於是，他們把洪老四推到外面雪地上，用鏟子把雪往她身上堆，用積雪把她全身包裹。「雪人」堆完後，農會會長命令她不准動，然後離去。

洪老四很快失去知覺。

有個人救了洪老四，這個人叫楊秀見，是個村裡一個忠厚的農民，他等人都走後，悄悄來把她從雪堆裡扒出，把她揹回家，囑咐桂芬她們燒點火，讓她起來。

洪老四醒來後，決定不再活下去，她對兩個大的女兒說：「媽媽要走了。」

她吩咐她們一定要照顧好才兩歲的妹妹。

當天夜裡，她就跳糞坑自殺了。

二〉、姐妹分離，乞討為生

洪老四自殺後不幾天，小妹妹豔芬就餓死了。家裡已經一貧如洗，兩姐妹只有出去討飯。她們商量，一個就在石耶街上討，另一個走遠點，到外地去。姐姐梅秋把近的讓給妹妹，自己走了，從此兩姐妹天各一方。

桂芬家原本就在石耶街上，以前大家關係都很好，可是，土改把人情、鄉情全部沖毀，人們的心腸變硬了。當然也有人同情她，但不敢公然救助，只能悄悄送她點吃的。山村的農民要好一些，大都要施捨一碗飯或者幾個紅苕。所以，桂芬也不時到外面去乞討。

晚上她就睡在石耶那個舊橋下面的河灘上，只有一些穀草。冬天，她手腳長滿凍瘡，而且大面積潰爛，她早上起來，從大橋下面到街上只能爬著走。記得有一天媽叫我到街上去買鹽時我看到了她，她手裡拿著一只破碗，在地上翻滾，一身都是泥灰，頭髮又髒又亂，臉上全是污垢，不像個人樣了。我回家對媽說起這事，媽臉色一下子就變了，連連搖頭、歎氣。

石耶鎮舊橋遺址，當年桂芳棲身處

不過她終於等來了好運氣。

石耶街上有一對靠縫紉為生的老人，男的姓栗。一天傍晚，栗師娘到橋下河邊洗衣，聽到哭聲，她走過去一看，是桂芬在哭。原來，她因為腳冷，就用沙來堆在腳上，沒想到這方法不僅避不了寒，反而更加冰冷。栗師娘心生同情，回家對丈夫表示了想救助桂芬。她說，以前她家也曾經幫過我們，現在他們的女兒落到這個地步，也應當幫幫她。栗師傅同意了，於是老兩口趕到橋下，把桂芬揹回了家。這樣，桂芬終於有了住處。

三〉、滿娘下毒，死裡逃生

這樣過了一年。

桂芬父親有個哥哥叫楊舉伯，解放前他去常德做生意時，贖了一個姓尹的妓女為妻，土改時楊舉伯被槍斃，他妻子，桂芬的伯娘（我們這兒叫滿娘），改嫁到岑溪鄉爛溪口一個楊姓人家。她走時來把桂芬接走，認作養女。當時，人們都認為她有良心，做了一件善事。

桂芬到養父家後，每天幹的事就是上山撿柴。慢慢地，滿娘開始嫌棄她了，她經常找岔子打罵桂芬，最後竟發展到想除掉她。

一天早上，桂芬起床時，滿娘已經將隔夜的剩飯炒好，叫她趕快吃了上山撿點柴來煮豬食。飯破例用油炒過，她覺得滿娘今天對她特別好。吃了幾口，她覺得飯裡有異味，本想不吃了，但覺得可惜，還辜負了滿娘的好意。

吃完飯她揹著背筐就上山了。

剛到山上，還沒來得及撿柴，她就覺得心裡不舒服，接著翻江倒海嘔吐起來。

之後，她感到頭昏眼花，口乾舌燥。她爬到溪邊喝水，然後倒在地上昏昏睡去，直到太陽偏西才醒來。

桂芬根本沒想到滿娘會害她，她以為是自己突然得病了。她能死裡逃生一是她很快把飯全部嘔吐了，二是當年的老鼠藥或六六粉毒性還不是很強。

石耶鎮，當年楊桂芳乞討的地方

第二次又來了。那是一個冬天，她吃了滿娘的早飯後，同樣的一幕又上演了。

但這一次比上次嚴重。她嘔吐得翻腸倒胃，一直昏睡到天黑盡了才醒來。她揹著空背筐回到家，不敢去見滿娘，便悄悄摸到柴屋躺下。她又饑又冷，翻來覆去睡不著。她滿娘聽到外面有響動，以為是強盜，便叫丈夫出去看看。她丈夫好像是個船老闆，他出來看見桂芬那副模樣，問她怎麼回事。聽了桂芬的講述後他心裡明白了。他不便說破，只是叫桂芬趕緊走，離開這個家。

桂芬這時也明白了，她急忙起身，連夜往石耶走，到石耶有四公里路。

多年後，桂芬給我講起這段經歷時，心裡仍然對她滿娘有恨怨。

她又回到討飯的日子。這時，暴風驟雨的土改已經結束了，社會平靜了些，人

性也有了復蘇，所以，這時她討飯容易些了，但她晚上仍然睡在大橋下。

1954 年，栗師傅老兩口又一次收留了她。社會壓力緩解後，其他人也敢幫助她了，有三家她們當年的鄰居商量，桂芬輪流給他們送水，每天給哪家送就在哪家吃一天飯。

四〉、美夢破碎，乞討回鄉

1955 年，石耶來了一個河南的馬戲團，在田家壩子演出，桂芬也隨街鄰去觀看。演出地被一道大布圍子團團圍住，只留一個出入口，一個姑娘在那兒賣票，一角錢一張。桂芬身上從來沒有一分錢，只好往回走。這時，裡面鑼鼓喧天，然後有人在講話，什麼千辛萬苦來到貴地，望眾鄉親伸出友誼之手給口飯錢，感恩不盡……

桂芬見圍布後面沒人看守，便決定從地面爬進去看看。她鑽進去後發現裡面還有一道圍布，在鑽這道圍布時被人一把抓住了。那人問她為什麼不買票，她說自己是孤兒，沒錢。那人聽說她是孤兒，又見她身材不錯，便動了心。他問她喜不喜歡馬戲，她說太喜歡了。那人問她願不願加入馬戲團，他說，馬戲團吃得好，工作又好耍，而且每月還發零花錢。桂芬高興極了，當即表示願意。

這個人就是馬戲團的團長。其實，馬戲團要招到一個合適的人並不容易，有父母的誰願意把小孩交給馬戲團滿世界跑？年齡大的身體已經定型，難以訓練。

像桂芬這樣的孤兒是最理想的對象。

團長讓她免費看了一場表演。

表演把桂芬深深吸引了。兩個姑娘在馬背上如騰雲駕霧般上下翻滾，另外兩個小姑娘表演「口含蓮花」……桂芬從來沒見過這般美麗和這般精彩，完全入迷了。演出後，她主動找到團長，表示了決心。團長約她三天後悄悄出發。

她猶豫要不要告訴栗師傅兩位老人。如果不同意怎麼辦？不告訴悄悄走了，讓他們擔心怎麼對得起人。最後她決定不告訴，因為她認定這次能改變命運，也會掙到錢，掙了錢再來孝敬兩位老人。

那天凌晨，她悄悄出門，來到田壩子。道具已經裝在幾架馬車上。團長見她到來，很高興，但怕人發現，便把她藏在馬車裡，往湖南方向走了。

學藝的日子非常苦，稍有差錯，團長不是打就是罵，甚至還把她捆綁起來示眾。這樣在外地的城鄉輾轉了一年多，他們回到了團長的家鄉河南商丘。本想休整一段時間再外出，不料市文化局的人以他們沒有演出手續為名強令馬戲團立即解散。

桂芬的夢破碎了，離開時，她向團長討點路費，團長不但不給，一年多的工錢

也分文不付，理由是，學徒期只供飯，不發工資。

桂芬只得徒步走回秀山，這一年她才 12 歲。從河南商丘到四川秀山，桂芬走了整整三個月。她給我講起這一路上的經歷時，泣不成聲。她沒有地圖，分不清方向，又身無分文。一路問，一路乞討。路上，有小孩子拿石頭把她當瘋子打，有狗追著她咬。沒討到飯時餓急了在土裡用手刨還沒有長大的紅苕吃。她還悄悄在別人的豬圈裡偷豬食吃。有一次，她昏倒在一個草堆裡，第二天被下地一個農民發現，給了她兩碗稀飯才救了她的命。

五〉、逃荒貴州，賣作人婦

回到石耶後她又到了栗家。一天，酉陽縣一個拉木炭的貨車司機聽人說了她的遭遇，心生同情，便把她帶到酉陽，介紹給一個姓陳的老師做養女。陳老師夫婦對她很好，她終於過上了好日子。

可惜，好景不長，一年多後反右運動來了，陳老師被打成右派，送到外地勞改去了。陳老師走前將她託付給一個蔣姓人家收養，又一年多後，1959 年，大饑荒又到來了。蔣家無力再供養她，只好叫她出去自尋活路。

當年胡祖暖

桂芬又一次回到石耶。

她這次回來我見到了她，當時我們正在栽秧，栽所謂的「雙龍出洞」（即大躍進時為了田產萬斤的一個「創舉」：提前季節栽秧和密植）。這時她已經 15 歲，少女的身材出來了。

四川是餓死人的重災區，秀山也是如此，我們石耶小街上，天天都在餓死人，全鎮都籠罩在死亡的恐懼中。很多人家都往貴州逃，貴州那邊山多人稀，生存要容易些。一天，桂芬的一個親戚，她的孃孃找到她，對她說，不逃出去只有死路一條，她願意帶她到一個能吃飯的地方。桂芬走投無路，第二天便跟她走了。

她們往貴州松桃縣的普覺方向走，一路上盡是逃難的人，在逃難人中，桂芬看到了好幾個當年毒打她媽媽的土改積極分子。現在他們一個個也面黃肌瘦，枯瘦如柴，十分狼狽。

當天她們在松桃縣孟溪的一個村子裡住宿，女主人是熟人，剛從秀山嫁過來，男主人已經有 50 多歲，是個老單身漢。女的才 20 多歲，據說是前夫餓死了，她逃到這兒來嫁給了這個單身漢。

第二天下午她們走到普覺崗家洞一個梁姓人家住下來，她孃孃同這家熟習。

第二天早上，孃孃告訴她，這家主人叫梁壽岡，是個單身漢，心地很善良，家裡存糧又多，年齡也不是很大，才 46 歲。孃孃的意思是讓桂芬嫁給她。桂芬一聽大驚，說她才 15 歲，那個男人比他死去的父親還大。孃孃一個勁地勸她，說他年齡雖然大點但跟著他不會餓死。

桂芬堅決不幹。當天晚上，桂芬飯也不吃，只是哭。

第二天早上，桂芬醒來，發現孃孃不見了。那單身漢告訴她，孃孃把她賣給他了，他給了她孃孃 20 斤紅苕乾。現在她已經是他的人了。

桂芬這時才明白孃孃帶她來逃難的目的。她哭著要往外跑，單身漢一把抱住她，把她關在屋裡。寨子裡來了幾個婦女，一邊看管她一邊勸說。她仍然不從。

單身漢對她說：「妳實在要走也可以，把我買妳的 20 斤紅苕乾還來就讓妳走。」

桂芬說今後有了一定還給他，單身漢不幹。

幾天後的一個半夜，他悄悄溜進來，把桂芬強姦了。

他們怕桂芬逃跑或尋短，家族的人對她嚴加看管，一直到她有了孩子她都沒能逃脫。

單身漢很高興，寨子裡的人很羨慕他，20 斤苕乾就得到一個年輕漂亮的四川姑娘。他也很得意，說：「要是沒有饑荒年，四川這些姑娘哪會逃到我們這裡來！」

桂芬同這個男人生活了 14 年，生了兩個孩子。

1973 年，一個熟人得知了她的情況，經過一番周折，終於又把她帶回了秀山。她的兩個孩子留在了貴州。

1973 年還是文革期間，社會上一片混亂，她住在一個親戚家。後來，親戚把她嫁給了新龍橋（音）的一個農民，那個親戚得了 60 元「介紹費」。

她同這個農民又生了兩個小孩。現在，她就是同孩子住在一起。

對了，她的姐姐梅秋在大饑荒時沒能活出來，所以，她全家現在只剩下她一個。

楊家唯一的倖存者，
終於活出來了楊桂芳

採訪時間：2017 年 7 月 11 日

地點：秀山縣石耶鎮

採訪後記

我到了秀山石耶鎮的當晚，楊桂芬已經在她表親胡祖暖的家裡等我，晚上一塊吃飯。席間，大家都說她的經歷很坎坷，她一提起就要哭。

我們約好第二天第一個就採訪她，她也同意了。

但是，第二天她沒有來，先找了個藉口，說家裡來了客人，走不開。接下來的幾天她都沒來，直到一周後我離開秀山，都沒再見到她的蹤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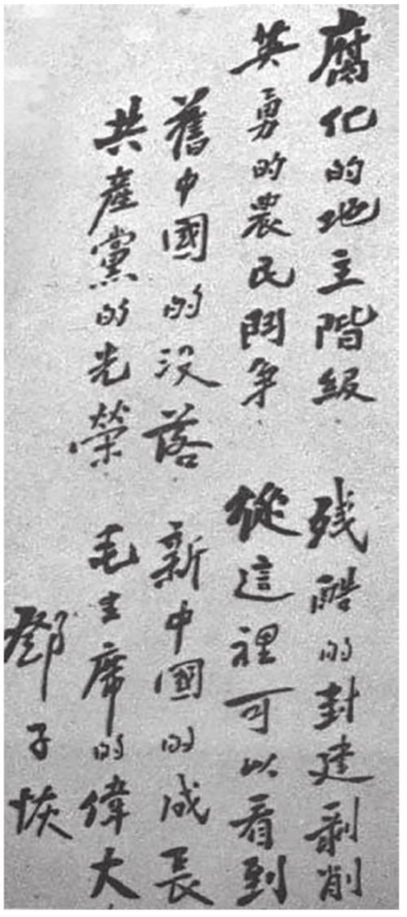
我清楚是什麼原因，這些年來，我太熟習這個原因了。

她表親胡祖暖感到很遺憾，也有些歉然。他說，是當晚有一個在場的女人對她說，接受我這種人的採訪、講土改的經歷很危險。她回去後對她子女說起這事，他們堅決反對她講土改的往事，她也害怕了，因此不再來見我。

好在胡祖暖一點不怕，他花了近兩個小時，把桂芬講給他的故事又原原本本講給我了。

這些年，採訪這麼多人，還從沒有過已經約好當事人，但卻不得不由其他人代講的「轉手」採訪。

所以，這篇採訪錄有些「另類」。



「腐化的地主階級，殘酷的封建剝削，英勇的農民鬥爭。從這裡可以看到舊中國的沒落，新中國的成長，共產黨的光榮，毛主席的偉大。」

選自《中南土地改革的偉大勝利》

三十七、無題

講述人：任 XX

1936 年生

……

採訪時間：2017 年 9 月 29 日

地點：貴州省石阡縣

2017 年 9 月 29 日石阡街頭

採訪後記

因為搞土改調查等原因，兩個月前我被學校開除，「獲得自由」的我乾脆出遊，同秀山的胡祖暖到貴州他當年的流亡、勞改地採訪。到了石阡縣時，遇到一位他的朋友，地主後代任 XX，我在石阡縣一家街頭飯館裡採訪了他。

任 XX 老人雖然年逾八十，但頭腦十分清晰，而且他有高中文化，口述力較強，採訪時，他侃侃而談，把他的家史和他本人的經歷講得清清楚楚。

可是，第二天，他打來電話，說當天夜裡他通宵未眠，很後悔給我講了土改的那一幕。他想到我又是錄影，又是記地名人名，非常擔心，非常後怕。他要求刪除所有的有關錄影。

一向敢作敢為的胡祖暖很是不屑，把他頂了回去。

可是，任 XX 老人不斷打來電話，一再要求，並說他不想給他兩個在「體制內」的子女帶來災禍。

我十分理解老人的擔憂和恐懼，老人自身在當年就因為一句話不僅失去了教師工作，還被關押了五年半。

於是，我答應了他的要求；於是，我只寫下這篇沒有採訪內容的採訪後記。

但是，為了不忘記那冤死的亡靈，我寫下他們的名字：

1，任福成，任 XX 的祖父，在農會關押時被打死，遇難時 61 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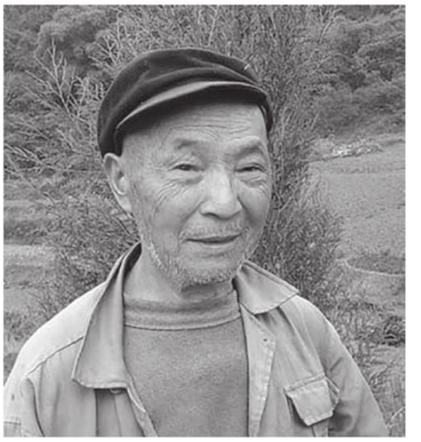
2，任達榮，任 XX 的父親，土改時被槍斃，遇難時 36 歲；

3，XXX，任 XX 的二嬸，在逼金銀時上吊自殺。

遇難地：貴州省石阡縣中壩區高塘鄉。

另外，任 XX 的三叔任達安，投身革命的大學生，1957 年在貴州江口中學被打成右派，文革時在勞改地貴陽青鎮（音）農場被槍殺。

三十八、他節儉持家，死於非命



講述人：毛金祿

1947 年生

我爸爸叫向單兵，當年開了個做鐵鍋的小廠，掙錢買了些田地，有多少我不清楚，因為我那時還很小。

我爸是個非常節儉的人，比如，如果中飯給他煮的洋芋（土豆）粥吃，他午睡就睡得呼呼的（睡得香），如果煮的白米飯吃，他就心痛，睡不著，吵罵家人：「像你們這樣這過日子，不多久就要把家敗了！」他一心要存錢買地，我二哥讀書他都捨不得拿錢，是我叔伯他們拿的學費。

劉寶祥（當年上壩村村民）：但是，他爸爸對工人非常好，工人吃白米飯，他自己吃土豆、南瓜或包穀粥，穿的也是雙爛鞋子，這事當地人都知道，他就是這樣節儉掙點錢。

毛金祿：土改的時候，農協會想要殺人，但我爸爸條件還不夠，用農村話說，就是豬還沒餵肥，啷個（怎麼）辦？農會主任就編材料，說我爸爸是地主加保長，這還跑得脫？非殺不可！

我爸爸哪兒當過什麼保長？！半天都沒當過。

善廣鄉上壩村

我二哥向燁（音）當年考上了武漢大學，後來參加了地下黨，土改時在公安局當了一個科長。局長對我二哥說，他同我哥沒得矛盾，但是農協會報上來材料，說向單兵是地主加保長，他兒子雖然參加革命，但他在家裡大肆造謠破壞（土改）。

我二哥看到那個材料很有情緒，結果把他下放到萬縣鄉下的一

個派出所去了，不久又把他抓了，在永川茶場勞教四年，當時差有文化的人，他在那個勞改農場還當了個犯人會計。

我爸爸因為「地主加保長」被槍斃了，他死時才 47 歲。

那個時候不講實事求是，如果講實事求是，我爸爸不會被殺。

我三叔向華齋（音）是鄉長，也是地下黨，但他同我哥哥各是一個（入黨）介紹人，土改時也把他槍斃了，但現在已經給他平了反。

我爸爸被打死後我無依無靠，只得抱給人家餵養，第一家是我們本村的人，我在他家吃了飯後就往自己家跑，就像狗一樣，只認自己家門，那家人只好放棄了。第二家在青龍那邊，也姓向，他家沒得兒子，就收養了我，但是，大半年後他家生了一個兒子，就不要我了，找了一個藉口，說我偷東西吃，又叫我姐姐把我領回去。第三家人姓毛，就是現在這個村的人，我就跟他家姓，改姓毛，從此在這兒生活了一輩子。

採訪時間：2017 年 11 月 4 日

地點：忠縣善廣鄉上壩村（原平壩村）

採訪後記

善廣鄉是忠縣最偏遠的一個鄉，從海拔近千公尺的天池森林公園出發，汽車都還要開近半個小時才到達，而且山路非常狹窄陡斜彎曲。

就在這偏僻的上壩村，曾出生了一個後來加入了中共，曾在重慶中共南方局「周辦」任機要員的美麗姑娘嚴炯濤（原名嚴琴貞），她的傳奇故事和悲涼人生已經被她的兒子（也是原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的兒子）劉寶祥寫在了《掙扎》一書中，這本書如果有一天問世，將會揭開一個被隱藏了大半個世紀的驚天秘密，撕下一個「偉大人物」道貌君子的面紗。

2017 年 11 月 4 日，我同幾個朋友，在劉寶祥的帶領下，來到他母親的出生地也是長眠之地上壩村。在劉寶祥母親墳前，我遇到了當地村民毛金祿，閒聊中，得知他家也是土改受難者，於是，就在劉母的墳前，我採訪了他。

採訪雖然短暫，但給我留下幾個很深的印象，其中之一就是：土改時才三歲多的毛金祿，六十七年後，一提到他父親之死，立馬在陌生人面前熱淚滾滾。

三十九、他死於「收買人心罪」

講述人：朱繁榮（王皎容）

1986 年生

1949 年前，在川東奉節縣，南北兩岸各有幾家顯赫的大家族。北岸是公平茅田的鄧家（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就出生於這個家族）；南岸是吐祥鎮梅魁鄉的大莊王家和柏楊壩鎮的大水井李家（柏楊壩鎮後來劃歸湖北利川）。

一〉、奶奶李家，人亡家破

我奶奶叫李宗芝（後來改為李宗宣）出生在大水井李氏家族中的梅子莊園。

川東土改時，大水井首當其衝，李氏家族的人，殺的殺，關的關。族人彭吉徵遭受燒烤酷刑之後，李家祠堂託人帶口信到李家各莊園報信：大難臨頭，族人各自想辦法，早作打算。奶奶說，這個「早作打算」有兩個意思，一是能逃的就逃，二是不能逃的人自行了斷，免得遭受像彭吉徵那樣的酷刑。

我奶奶的爺爺和奶奶就「自行了斷」了。

奶奶的爺爺叫李月秋，是李氏家族中梅子園的主人，他妻子李胡氏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每天自己提水沐浴後在自家佛堂拜佛念經。

李月秋聽到大水井族人遭受的酷刑後，料想梅子園也難逃厄運，為免受辱，他在自家碾米的石磨盤上懸樑自盡，李胡氏也緊隨其後，同日在自家床上上了吊。

奶奶的父親叫李先蒸，母親叫許靜秋，她的兄弟許柏均是中共地下黨，解放前後都擔任吐祥區區長。解放後，在許柏均的動員下，李家將梅子園的所有財產全部交給了農協會，全家人被趕到幾十里外的山洞棲身，奶奶兩個年幼的弟弟妹妹都餓死在那兒。

當了區長的許柏均在 1957 年反右時跳長江自殺，屍骨無存。他的妹夫，也就是我奶奶的父親李先蒸，在 1959 年大躍進時，做為地主分子，不堪受辱，拖著病體上吊自殺了。

李氏家族的各大莊園中，只有大水井莊園比較完整地保留下來，現在開發為旅

已做為旅遊熱點的大水井，也是彭吉徵被燒烤處。

遊熱點。

奶奶家的梅子園則被毀得乾乾淨淨，現在什麼都看不到了。

奶奶說，那曾是一座中西合璧樣式的莊園，非常美。

對了，我把你寫的那篇關於大水井的文章給奶奶看了，奶奶哭，我也哭。奶奶說，那裡面記錄的都是真實的，她與被燒烤的彭吉徵是親戚。

二〉、爺爺王家，灰飛煙滅

1949 年解放軍快打來時，人心惶惶，傳言地主的大姑娘們要被「共產」，因此大戶人家趕緊把女兒嫁出去。我奶奶就是這樣匆匆嫁到吐祥鎮梅魁鄉大莊王家的，那是 1949 年 10 月，當時她 17 歲。

我出生得晚，家裡的情況都是奶奶告訴我的，她現在還在，而且頭腦很清楚。

奶奶說，王家也是奉節縣的一個名門旺族，家大業大甚至超過李家。王家遠祖是山西三槐堂王家大院的一個支脈，明末清初從貴州入川隱居。在清代中期，王家與四川劉家、恩施康家一同進京面聖，王家被朝廷冊封，堂號大莊王。

我爺爺叫王祝豐，他父親王佛生（因與佛陀同一天生辰）是大莊王家最後一任族長，住在王家的陽和山莊。民國時期，王家和其他鄉紳捐資修建了奉節中學，後來王家又獨資創辦了龍山中學，成績優異的窮學生免費就讀，龍山中學現更名為甲高中學。王家還在當地做了不少好事，比如在梅魁修建力渡，免費供人渡河。

爺爺在奉節中學初中畢業後進入萬州二中，高二時他考上軍校，但王佛生不准他去，強行把他留了下來。

解放前夕，為躲避國民黨抓捕，川東地下黨的一個政委劉孟伉經常在李家，許家、王家之間躲避。王家為掩護劉孟伉，在國民黨軍隊來搜捕時，和國民黨軍官曾

營長打麻將，故意輸給他幾百大洋為賄賂，使劉孟伉得以安全逃脫。劉孟伉是個書法家，他住在我家時，我爺爺就跟他學書法。劉孟伉離開時，王佛生和他弟弟王哲生送他到碗廠溝，他對王佛生說：佛生啊，該出山了。王佛生笑笑，不願意。劉孟伉又對他說：佛生，再不出山，到時候莫說舅爺無情啊。

王家陽和山莊舊址，原為劉孟伉題寫。

劉孟伉顯然是知道共產黨來後要對地主下手的。

奶奶自從嫁到陽和山莊，就沒看見公公王佛生的臉色舒展過，他整天拿著大土煙桿眉頭緊鎖。很快，解放了，土改來了，王家的所有財產統統被沒收。

全家人分開關在陽和山莊，奶奶與大姑（王瓊芳）關在一起，王佛生和兒子王祝豐關在一起，奶奶的婆婆彭學道與她小女兒關在一起。關押期間，奶奶經常聽見外面叫喊：「把金銀交出來！」還有「哎喲喂，哎喲喂」的呻吟聲。她後來看見公公的手指潰爛，才知道他受了「猴兒搬樁」的刑法。

隨後，全家人被趕出陽和山莊，住在上廟的一座破廟裡（廟已被毀，只剩一點殘跡）。

因為所有財產被沒收，從解放初到 1952 年，王家都是靠以前的佃戶偷偷接濟和乞討為生。1951 年 4 月的一天，王佛生去以前的佃戶家借糧回來，奶奶剛接過他背上的一背簍玉米，農協會的人就來把他押走了。

殘存的大莊王家

奶奶說，王氏家族的人共被殺了 40 多個，都是這個大家族的精英，她親自看到的有七個，是同一天被槍殺的，地點就在梅魁鄉王家宗祠前。這七個人中，有一個就是她的公公王佛生。

奶奶說，王佛生在當地口碑非常好，是個大善人，農民們都說他的好話，可這一下反而害了他，工作隊專門要殺當地有影響的、有群眾支持的人。給他安了一個什麼罪名呢？罪名叫「收買人心

罪」。

誰來主持的宣判？就是前面提到的我奶奶的親舅舅吐祥區長許柏均！

許柏均就是王佛生的親戚，他一個個宣讀罪狀，其中，王佛生的罪狀是：會拉攏人心，不槍斃的話會引來暴動。

奶奶說，七個人中，只有王佛生的頭沒有打爛，算是一個全屍。這全靠他兒子，也就是我爺爺王祝豐。爺爺在被關押期間，同看守他的一個姓蒲的看守搞好了關係。當他聽說父親被農協會押走，料想大事不好，他馬上給蒲看守跪下，請求給父親一個全屍。於是，那天當念到槍斃王佛生時，蒲看守第一個站出來執行任務。

爺爺王祝豐與奶奶李宗宣

子彈直射心臟，王佛生終年 49 歲。

除了王佛生，其餘六人腦袋都被打爛，已經分不清誰是誰。其中一個學生最慘，他被打了七槍，原因是他拼命掙扎，一直大呼冤枉。土改時據說有規定，不殺學生，但不知為何殺了這個學生。（注：也是在奉節縣，去年我採訪到吐祥鎮殺了一個學生陳光武，詳見本書〈一個當年地主放牛娃的講述〉）人殺了之後，不准家屬去收屍，要曝屍示眾。奶奶當晚找到她大舅許柏均和農協主任周德武，請求將屍首還給王家。周德武說，可以晚上趁人不備時偷偷運走。

當天夜裡，奶奶同王瓊芳和王守常（王佛生的侄子）三人從大莊祠堂前拖著王佛生的屍首到上廟埋葬。王家以前的佃戶有一個是木匠，他偷偷用樓板木為王佛生釘了一個簡單的木棺以免軟埋。

奶奶的婆婆彭學道得知丈夫被槍斃後，喝鏹水（染布的染料）自盡，幸虧家人及時發現，用留種的土豆磨水灌下去，揀回一條命，但她後半生落下了嚴重的胃病。

採訪時間：2017 年 8 月 20 日

地點：重慶市九龍坡區楊家坪

採訪後記

朱繁榮（原名王皎容）的丈夫因對土改問題感興趣而找到我，交談中，朱繁榮反而成了主角，她因近年來「回歸」到她的王家而聽到了關於土改的一些事情。

她侃侃而談，那神情，不僅是講一段歷史，還有深沉的思考。

殘存的大莊王家

於是我鼓勵她再同她還健在的奶奶談談，瞭解更多的資訊。她這樣做了，十餘天後，她傳來了她採訪後的文字，以上這篇採訪錄中，就有一多半是她的手筆。

大莊王家曾是奉節縣赫赫有名的大家族，有人說：談奉節的歷史不能不提到大莊王家。可是，土改讓這個大家族土崩瓦解。當時沒整死的王家後人，則一直背負著「黑五類」的惡名，同千千萬萬地主家屬一樣，受到長達幾十年的歧視和迫害。

採訪時，朱繁榮說，以前她對王家的事不關心，原因是她 8 個月大的時候就被抱給朱家了（所以她一直姓朱）。她被抱出去是因為計畫生育。當時在農村，農民頭胎生了一個女兒後，滿了五年還可以生二胎。她是二胎，出生時差十幾天滿五年，鄉裡抓住這點（沒滿五年）對她家開出巨額罰款，她家根本繳不起。其他人家沒滿五年的，甚至只有一兩年的都不像對她家這樣。為什麼？因為她家是地主成分。她說，1986 年地主已經摘帽了，但是對地主和其子女的歧視與迫害並沒有因摘帽而中止。

朱繁榮是本書受訪者中年齡最小的，但我感到她對土改問題有思考更有關注，我真心希望她在這個領域裡探究下去，土改這段歷史，應當有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輕人來關注和探究。

本篇照片由朱繁榮夫婦提供

為了大水井旅遊掙錢，大莊王家一些殘存的雕樑畫棟又被拆去裝飾大水井。王家的這道圓門，無聲地注視著身邊的這場悲劇和鬧劇。

四十、「我們當年為什麼不跑？」

講述人：李懷慶

1966 年生

我沒有經歷土改，但對我家族的情況非常清楚，一是我父親（還有一些親戚）對我談了很多，二是我多次回老家作了廣泛調查。

土改中我們李氏家族遭到滅頂之災，可以說是家破人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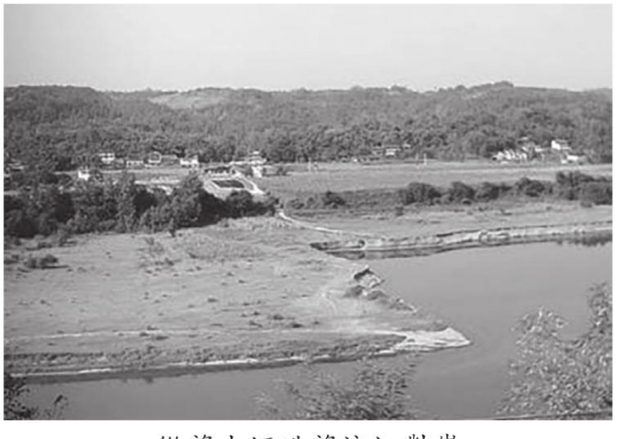
一〉、先輩艱苦創業

我老家在重慶潼南縣太和鎮，祖先是從湖廣填四川來的，是兩兄弟，他們來到太和鎮的望水垭。望水垭在涪江邊上，景色很秀美，水土肥沃。我們李家字輩是十個字：「開元成時秀，廷懷正大光」。我家在「開」字輩時創業，用一條小木船搞航運，後來慢慢發展到幾條船。

我聽老人講，當初創業時很艱苦，祖輩們在船上勞累了喝點酒，為省錢，下酒菜都捨不得買，幾顆花生米，一個皮蛋大家用筷子蘸一下，這樣來喝酒。

家業發展最快是在我高祖父李成林和曾祖父（我爺爺的父親）李時璋手裡。

當時，高祖父是個小老闆，在涪江上有幾條木船，主要為鹽商運鹽，鹽從四川射洪縣經水路運到潼南，有時也從宜賓運。曾祖父 14 歲就在船上幫高祖父，他很有商業頭腦。他對鹽商說，我家不收運費，以運費入股。這樣他們就加入了鹽商的行業。後來，有的鹽商因種種原因衰敗了，而我高祖父和曾祖父則逐漸發達起來。他們組建了自己的船隊，還在涪江、嘉陵江上購置了一些碼頭。船隊從涪江到嘉陵江一直到長江，成了當時涪江和嘉陵江上最大的船隊。那時船隊也沒有個名號，只在船上掛一件衣服，人們就知道是李大爺的



從望水垭眺望涪江對岸

船隊來了。

後來鹽生意逐漸蕭條，他們就專門做航運，運四川的土特產、中藥材等到上海。我家當時在上海也有自己的商行。到上海後，貨與木船一併賣了，因為木船要拖回四川成本太高。我們請的先生，現在叫職業經濟人，就揹著銀子，有些揹銀票，走一個多月時間回到重慶。

受洋務運動的影響，他們也辦了一些實業，比如在合川辦了重慶地區最大的絲綢廠——裕華絲綢廠，不是那個從上海遷來的裕華紗廠，而是後來公私合營後的合川絲綢廠。二、三十年代絲綢廠的產品就出口歐美。

同時，家裡還開了藥店「福壽堂」，並在成都、重慶等地設有分店，既賣藥，也做中藥材的批發和初加工，還把藥材運到上海，再轉銷到東南亞國家。

李懷慶在「福壽堂」藥房舊址前

著名的民生公司和盧作孚同我們李家也有深厚的關係。父親曾對我說，他每次從上海回來，盧作孚都要接他到七星崗他的盧園去吃飯。盧作孚早年貧寒，曾在李家打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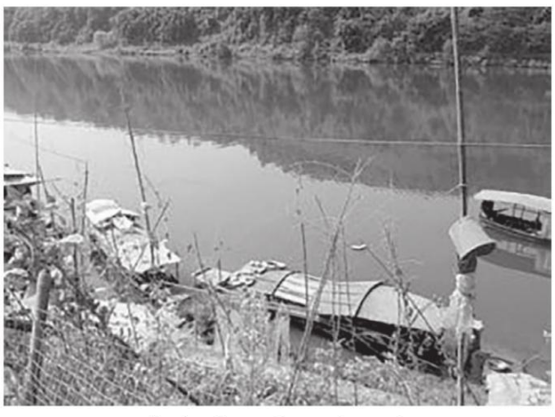
當時嘉陵江和長江有四、五家大的航運公司，常常相互殺價，後來引進了機器火輪，也引進了一些現代的管理經驗。我曾祖父提出大家坐下來談，提議合併為一個公司，他推薦了盧作孚來籌辦這件事。但是，在 1925 年公司即將開業時，我曾祖父就去世了。

我們李家能夠發達，同我們有嚴格的家規也有關係，比如，家族明確規定，不准納妾；又如，不搞借貸，自己有多大的資金就辦多大的事。還有，對所有男人有兩項要求，一是習武，強身健體；二是能雙手打算盤。

我們李家的「商業帝國」是在我曾祖父手中發展到極致的，我爺爺那一代只是守住了家業。

以前，只要有點積蓄的人都可以買地，人們也願意買田地，因為田地有幾種功能：儲蓄功能、投資功能、還有擔保功能等等。

那時人們覺得購買田地是最安全最保險的一種投資，也是為子孫留一份財富。


原李家花園舊址外的木船

我家在鹽業、航運和貿易上取得了巨大

成功後，就在家鄉太和鎮購買了大量的田地，還在重慶市區如現在的解放碑和成都的春熙路等地買了一些門面。

在抗戰時期，李家為國民政府作出過巨大貢獻。當時重慶市人口激增，好幾次出現糧食恐慌，市場上買不到糧，都是我爺爺發揮袍哥的作用，積極組織運糧。

另外，他還捐獻過大量的藥材、布皮、糧食，支援抗戰。

這後來成了我家的一個罪名：支持國民政府。

二〉、土改遭遇滅頂

土改來了。

我們李氏家族是當地的名門旺族，我爺爺李裕昆（字輩是秀先）是個鄉紳，大地主，劃的成分是地主兼工商業，土改工作隊自然不會放過他。

首先是發動農民佃戶們來批鬥。但工作隊沒料到，完全鬥不起來！先是沒人來鬥，經他們三番五次動員，農民和佃戶來了之後，不僅不批鬥我爺爺，反而把批鬥會開成了表彰會！有人說，我們生了病，東家親自來關心；到藥鋪拿藥，沒得錢，他說，免了；交不起租，他也說，免了嘛；缺錢用，他說，拿點小錢去用，今後還得起就還，還不起就算了。還有，無論是修橋補路、賑災扶貧等公益事業，他都是在第一線。

李家佃戶劉朝榮的講述

（太和鎮青龍村人，1935 年生）

他是個大好人，哪個去鬥他？那時我家賣自產的絞絲，趕場如果賣不掉，他看到了，就說，把絲放在我這兒，你們把錢拿去，下一場賣了再說。哪兒去找（像他）那麼好的人？到現在都找不到！

李懷慶：

爺爺是個有文化的鄉紳，溫良恭儉讓做得非常好。他對家人、鄉鄰、朋友、佃戶等都非常友善。我回鄉，當年的老人提到我爺爺，沒有一個人說他不好，還說當年人們叫他「李大善人」。我瞭解到這些之後，很感歎，說實在的，我們後人都不及他。

在批鬥會一次次失敗之後，工作隊惱羞成怒，怎麼辦？他們親自動手，打！當時工作隊由南下的解放軍組成，他們下手狠，把我爺爺手打斷了，睾丸也被踢破，而且把他趕到佃農家的豬圈去住。

劉清海（李家佃戶的後代）：

我聽我婆婆講，他爺爺的手被打斷後，吃飯都困難。我婆婆等管制他的人走後，悄悄去給他餵飯，婆婆 1999 年才去世，她對我說，那時東家和佃戶的關係非常好。

李懷慶：

我的姐姐生於 1948 年，由於我父親在外地，因此就把她留給我爺爺奶奶照看。

曾給李懷慶爺爺餵飯的佃戶丁英珍

那時我們的大院被工作隊占了，只留下一間小房。家裡大人被抓走後，姐姐沒吃的，餓得在地上亂撿東西吃。晚上，她又餓又怕，不停地哭。

一個工作隊員不耐煩了，用刺刀對著她，惡狠狠地說：「妳再哭我一刀殺死妳！」

我姐姐沒被殺死，她被嚇死了！為這事我專門問了我父親和其他親戚，以及一些在我家幹過活的人，她的確是被刺刀嚇死的，那一年她才 3 歲。

土改中，還死了一個人，這個人是我們的管家，也是我們的親戚。他性子剛烈，看到工作隊一系列的殺人越貨，他張口大罵：「土匪！共產黨都是些強盜！」他當然知道這是殺身之禍，他事先配了毒藥（我們家開得有藥房），他痛罵之後飲毒自殺。

曾被洪水淹過的金庫遺址

我姑姑叫李廷貞，她生於 1934 年，土改時她才 17 歲，是個大家閨秀，長得也非常漂亮。土改工作隊的人把她抓去追逼金銀，只一夜，就徹底毀了她一生！

在逼浮財時，我爺爺把商鋪的錢等等全部交了，但一直沒說一個大秘密——就是我家建有一個地下金庫，位於一個非常隱秘的地方，在地下五米深。無論怎麼追逼，怎麼吊打，我爺爺都守口如瓶，因為那是我們李家好幾代人打拼的積累，是我們好幾代人的血汗錢。我二爸李廷華也被抓去吊打，他是習武之人，人也年輕，扛過來了。於是，工作隊把

突破點放在了我姑姑身上。她被抓去全身脫光，吊起打，整整折磨了一夜！她怎麼經得住那種折磨？她被迫供出了那個金庫。

金庫被查抄一空，據我家的老年人說，裡面的金銀財寶整整運了兩卡車！

姑姑第二天放回來時，已經神經錯亂了，她從此瘋瘋癲癲。

那一夜，姑姑究竟受了什麼折磨我不知道，我為這事問長輩，他們都不詳說，只說「受盡凌辱」。

李家大院殘存的老屋

我再說說我的奶奶。我奶奶叫李曾氏，生於 1901 年，比我爺爺還大一歲。她當年是曾家的一個大美人。爺爺被打殘、我姐姐被嚇死已經給她巨大的打擊，現在不僅金庫被抄，女兒還被折磨瘋了，她終於精神崩潰。

她是在 1953 年土改結束後投的江，就在我家前面的涪江。

她自殺前的很長一段時間，一直喃喃自語：我對不起李家，對不起李家列祖列宗……奶奶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她有很強的負罪感。

這件事就要說到我爸爸身上。

1949 年前，我爸爸在上海交通大學讀書，在上海他接觸面廣，瞭解了共產黨的政策，因此他寫信來叫家裡把家產全部變賣了移民到東南亞國家。爺爺動心了，但奶奶故土難離，她娘家還有一大家子人。而且，她還很生氣，說：「這個廷芳，不孝之子，這麼大個家業叫我們變賣了？」她還罵他「敗家子」。所以，我爸爸寫信這件事鬧得人人皆知，我家的店員、佃戶都知道。

太和鎮外的涪江，李曾氏投江處

李家打算要走的事，也傳到了地下黨的耳裡，他們生怕這麼一個大富人家跑了，專門來找到我爺爺奶奶，對他們莊嚴承諾：你們是民族資本家，是工商業者，未來的新中國需要你們。奶奶聽到這些話，更拿定了主意。

在奶奶的勸說下，爺爺留下來了。

共產黨來了，整得李家家破人亡。她非常懊悔，認為是自己害了李家，她無法擺脫這種懊悔和自責，只有一死了之。

三〉、父親遺恨終身

李廷芳（右一）和他弟弟李廷華

奶奶投河後的第二年，1954 年，我爺爺、姑姑，二爸，還有我家另外一個姐姐，在一個夜晚，悄悄乘一條小船，沿涪江、嘉陵江，到重慶沙坪壩投奔我父親。

再說說我父親。

父親在上海時，已經瞭解到了共產黨的做法，也預料到了共產黨來了之後會採取的手段。那麼他為什麼沒走呢？因為他是個大孝子，爺爺奶奶不走，他也不便走。還有，他是長房長孫，覺得自己應當為這個大家族承擔責任。本來，當時留學德國的手續都已經辦好，他放棄了，回到了重慶，在重慶嘉陵機器廠做廠長秘書。

爺爺他們在走投無路時投奔了他。

可是，爺爺和姑姑都已經奄奄一息。看到姑姑瘋瘋癲癲，爸爸很是傷心，他非常喜歡這個小他 8 歲的妹妹。三年之後，1957 年，姑姑就去世了，終年 23 歲。她去世後，爸爸抱著她整整哭了一夜。

同一年，我爸爸被打成右派，罪名竟然是與當年同寢室同學的父親（他到了臺灣）合了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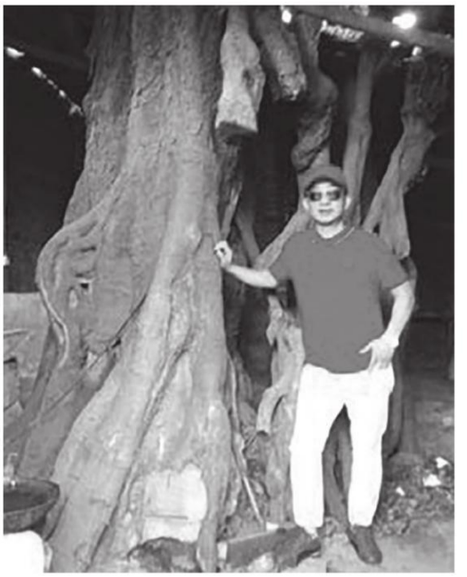
第二年，我爺爺去世，終年 56 歲。土改時爺爺因為口碑很好僥倖保了條命，但工作隊的拳打腳踢，給他身體造成了嚴重損傷。

父親這輩子給我深刻印象的，一是他每次提起他妹妹都非常痛苦；二是他一輩子念念不忘：「我們當年為什麼不跑嘛！」

採訪時間：2017 年 7 月 27 日；8 月 15 日

地點：潼南縣太和鎮；重慶市南岸區南濱路

採訪後記


當年爸爸最喜歡在這樹下讀書

李懷慶生於文革爆發那一年，他說，他爺爺是地主，父親是右派，母親是反革命，這獨特的家庭背景，加上文革的瘋狂，給他童年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後來長大，他瞭解了他家族當年的輝煌和土改的「滅門」之後，更是心潮起伏。因此，一談起他家族的命運，他便悲憤難抑。

在他的邀請下，我們在重慶 40 度高溫裡來到他的老家太和鎮。他一一指給我看他家當年的遺址，包括已經被五馬分屍的李家花園、面目全非的沿河商街、衰敗殘破的老宅舊院等等。

他在一棵巨大的黃桷樹前說，以前這棵樹就在我們李家花園裡，緊鄰涪江，風光秀美，我爸爸最喜歡在樹下讀書，讓江風吹拂。好多年他都不時回憶起那種滋潤身心的環境。但是，你看看現在是什麼樣子了！

他還說，我每次回鄉心情都很波動，想到祖先在這兒艱苦創業，打造了一個美好的家園；又在這兒家破人亡，不得不流亡他鄉。還有，共產黨你把李家這麼美麗的家園搶去了，保存下來也好嘛，不！給你毀得乾乾淨淨，四周的環境也一同毀得一塌糊塗！

一切都已經無法恢復了，李懷慶唯一能做的，是將位於村鎮外山坡上的李家祖墳精心維修，以寄託他做為長房長孫和新一代族長對先輩的追思和敬重。

另外，也許是遺傳基因使然，李懷慶在商界也打拼成功，創下了一份赫然家業，每天，他都站在他那位於南濱路的豪華會館裡，透過巨大的落地玻窗，眺望兩江匯合的朝天門——當年，他們李家從涪江開來的浩蕩船隊，就從這兒乘風破浪，駛向外面的世界。

他站在位於南濱路的豪華會館裡 .....

補記：

2018 年 1 月 30 日，李懷慶突然被以「嫌疑犯」的罪名抓捕，是犯了什麼罪的「嫌疑犯」不知道。當時中共剛公布了要進行「打黑除惡」專項運動，朋友們認為，

李懷慶在微信上傳播了大量批評中共的文章，還有不少對中共當局表示不滿的言論，而他又是一個企業老闆，頗有資產，因此，當局便藉運動對他下手。一方面消除異議分子，一方面收繳他的財產，一箭雙雕！

「打土豪，分田地」已經是中共過去的歷史了嗎？

幾個月後，由於實在找不到他「黑社會」的證據，於是，當局又按「顛覆國家政權罪」的路子尋找「罪證」。他的朋友一個個被找去訊問，瞭解他反黨的「罪行」。

他幾十年拼打下來的家產全部被凍結了！李懷慶什麼時候能被釋放，釋放後還能否保住他的財產，都是一個未知數。

此時，我已經流亡到了美國，每天，在加利福利亞的海邊遙望大洋的那邊，心中一聲聲長歎：**懷慶兄，你為什麼不跑嘛？！**

四十一、我祖母之死

劉文彩孫子的講述

講述人：劉小飛

1946 年生

這麼多年來，我心裡實在是堵得慌，憋得難受，我好想把我所知道的真相全部寫出來。

我爺爺結過五次婚，大老婆呂氏沒幾年就病故了，估計是死於肺結核病，當時肺結核病在中國是很常見的病。呂氏生了一男一女，也夭折了，可能是呂氏在哺乳期間把肺病傳給了他們。我聽家裡人講，爺爺年輕時身體非常強壯，個子也高大，他後來死於肺病，估計也同呂氏有關。

呂氏去世幾年後，爺爺又娶了大邑縣三岔鄉的一個姑娘，她比他小 17 歲。

這個姑娘便是我祖母楊仲華。

我祖母是個很有主見的人，在持家、發家上有自己獨立的見解，辦事也風風火火。我爺爺敬重她，生活中讓她三分，甚至七分。兩人在一起生活也算和諧，因為共同的目標就是把家業搞好。

爺爺最小的弟弟劉文輝在宜賓發跡後，需要一個人給他管經濟、稅收。1922 年爺爺便去了宜賓，隨後又把祖母接去了。

1929 年，爺爺在宜賓遇到了一個叫凌君如的女人，是個風情女子。爺爺決定把她娶作三房太太。祖母為此同爺爺吵了一架，然後到成都文廟後街 52 號公館裡獨居，後來十多年兩人很少見面。

爺爺隨後還娶了凌君如的表妹梁惠靈，即四太太，在她倆離去後又娶了一個比他小 25 歲的貧苦人家的姑娘王玉清。

爺爺雖然有好幾房太太，但他的七個子女（四男三女）全部是我祖母楊仲華所生。所以，祖母在劉家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爺爺去世後，祖母便成了一家之主。我是祖母二兒子劉元華唯一的兒子，從小家裡便十分寵愛我，其他孩子都請保姆帶，但我例外。在孫輩中，我是唯一由祖母、媽媽、姑姑親自帶大的孩子，也是最小的一個孫兒。爺爺在世時有三個孫兒三個孫女，他去世後他的後人就再沒生出孫兒了。

正是由於我成天在她們身邊，所以看到、聽到了不少事。

爺爺是 1949 年 10 月去世的，那時正是兵荒馬亂的動盪時期。祖母不懂政治，為了避戰亂，她準備變賣財產帶著子孫到海外去。她把此事告訴劉文輝，劉文輝勸她不要走，準備一起去投共產黨，並要她裝得像沒事一樣，不要讓蔣介石方面看出異樣，到時他會通知她撤離。我爺爺同劉文輝關係最好，祖母也是，她當然聽從劉文輝的勸告和安排，劉文輝一句話就讓她留了下來。

劉文輝在棄蔣投共的當天派人來通知祖母撤離。祖母當即跑到打金街姜親家的家裡躲藏。第二天蔣介石的部隊就查抄了劉氏家族在成都的所有公館，並四處追捕劉氏家族成員。祖母嚇壞了，第二天天未亮，她就帶著兒媳倉皇出逃。她們在田間小路上走了 120 里，深夜才到達娘家大邑三岔鄉——當時那裡是很僻靜的地方。祖母是半小腳，一路上的狼狽可想而知。

劉文彩莊園正門

四川解放後，祖母回到成都。但是，我們的房子已經被解放軍占了，守門的士兵不准我們進去。四川剛解放時，被沒收的只有國民黨的黨產、政產，其他軍閥、官僚、地主、資本家的財產都沒動，沒收他們的財產是土改之後的事。但是對我們，當時就下手了。我們只得回到安仁鎮的莊園去。

緊接著土改。當時，所有地主都要被押回原籍去退押（金），接受農民批鬥。可是，唯獨不要我們劉家的人回去。為什麼？因為我爺爺是家鄉公認的劉善人，在家鄉做了很多好事，家鄉的老百姓，包括很多窮人，任何人向我爺爺求助，沒有哪個是空手而歸。即使是在文革高壓時期，當地老百姓也說，劉文彩在時我們都有飯吃，都是吃飽了的。所以，把我們弄回家鄉去鬥有很大的阻力。土改期間，我們一家是在成都城裡挨的整。

策劃整我們的人，就是我爺爺當年救助和保護過的中共地下黨人周鼎文。

家裡人不讓我看到土改那一幕血腥，但是，我還是看到一些。

祖母被抓走兩天後的一個深夜，幾個揹著槍的民兵打上門來，他們把我爸爸和我小姑姑從床上抓起來，押走了。後來得知，是抓他們去看我祖母受刑！祖母半夜裡還被反吊在樑上，痛苦萬分，那群人很得意，專門把她的子女叫來觀看。他們在

一旁查看我爸爸和姑姑的表情，看他們是否流露出不滿、悲痛。

如果他們敢，下場就是同他們的母親一樣。我爸爸和姑姑竭力控制，不敢露出悲傷。多年來，我一直在想，如果是我，我一定控制不住，一定受不了！我難以想像，要折磨一個人，為什麼一定要把他的子女抓到現場觀看，我不知他們的意圖是什麼？在大邑縣捆綁吊打時，也喜歡這樣搞。後來他們在「劉文彩莊園」搞階級鬥爭展覽時，還專門布置了一間刑室，說是當年劉文彩折磨貧下中農的地方。

其實，本地的貧下中農都說，劉文彩從來不打人。那間刑室和那些折磨人的手法，倒是運用在了我們劉家人的身上。

父母們不要我看，他們把我藏起來，但我還是看到一些，因為這種事不是偶爾發生。比如，我親眼見到了祖母回來時的模樣——臉色慘白，披頭散髮，頭垂得很低，走路十分吃力。我祖母是個有身分、十分愛整潔的人，我第一次看見她那種模樣。祖母如何受刑我不清楚，但我知道，如果不是受到非人的折磨，她絕不會是那種樣子！

劉文彩莊園一角

我還記得，在土改快結束時，我小姑姑的保姆專門從鄉下來，當時我在場，看見她幾乎要給小姑姑跪下了。她說：「對不起呀，三小姐，是上面工作組逼我說的呀。你們對我這麼好，我怎麼會忘恩負義？」

她說了什麼我不曉得，我只記得小姑姑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她走後小姑姑也一動不動。保姆看見我們住的房子，當場就哭了：「唉呀，三小姐，妳們咋住在這麼破爛的地方？」

她是一邊哭一邊走的，如果她對我們沒得感情，她不會從大邑步行到成都來給我小姑姑賠禮道歉。我想，是政治壓力強加在她良心上，逼得她沒辦法。

土改把我們家收繳得一無所有，祖母最後一枚藏在她髮鬆裡的金箍子（即金戒指）也被收走了。

大概是在土改剛結束時，祖母又被抓去吊打。當時我已經在重慶——家裡人不要我看到那一幕，把我送到重慶劉文輝家裡。那時土改已經結束了，其他地主都沒有再鬥打，為什麼突然又整我們呢？

劉文輝在重慶時，劉伯承、鄧小平對他說，只要你把金銀珠寶和所有錢財交出來就沒事了。劉文輝就將財產全部交了出來。劉伯承、鄧小平後來返還了一些金條給劉文輝做為獎勵。就是這些金條，給劉家的人帶來了災難！

四川省當局在得知劉文輝手中有這些金條後，不好直接找他索要，就在成都把劉文輝的親人（哥哥、嫂嫂、侄兒侄女們）抓起來逼要「罰款」。他們動用酷刑，逼迫受刑的劉家的人給劉文輝寫信，要他交出那些金條來作為贖金。信就是在吊打現場逼著寫的。

劉文輝懂得起，把那筆錢交了出來，這下他的親人們才得以解脫。

土改後，我們是一無所有了，劉文輝的財產也沒有了，他住的是公房，每月靠共產黨發給他的 400 元錢生活，一直到他死都是這樣。一個家財萬貫的大軍閥、大官僚、大地主，轉眼就被土改整成了徹底的無產階級。

我們全靠劉文輝每月寄生活費來，一家人才活出來。

但是，祖母沒能活出來。土改結束後不久她就死了。家裡人不想談她的死因，後來媽媽告訴我，祖母在土改期間被打成內傷，這要了她的命。

我祖母是個很有志氣很有尊嚴的女人，當受到侮辱時，她不願低聲下氣。不低頭就要付出代價，祖母付出的代價就是她的生命。她死時還不到 50 歲。

採訪時間：2008 年 7 月 19-20 日

地點：重慶市渝北區

採訪後記

第二次到地震災區採訪時，同行的朋友劉紹坤告訴我，他同劉文彩的孫子劉小飛聯繫上了，對方很願意接受採訪。

劉文彩的孫子？我有些驚喜；他還敢談？我有些不信。

劉文彩的大名從小如雷貫耳，沒想到有一天會見到他的孫子。

我所採訪的地主後代大多仍生活在驚恐中，劉文彩的後代還敢暢所欲言？結果，他不僅敢談，而且還敢專門進入莊園去公開給參觀者講解！他說，劉家的後人大多嚇怕了，包括他還健在的父親劉元華。「他們連家鄉都不敢回。我不，我要談！我要把真相告訴世人，這些年來，我憋得好難受！」

在安仁鎮採訪時，他好幾次悲憤難抑，泣不成聲。

我們約好，待我寫完地震採訪稿後就同劉紹坤去他的住地（四川隆昌）作進一

步的採訪。

回到重慶後，他好幾次打來電話，催我早點去。

正在這時，同我一起採訪劉小飛和地震災區的朋友劉紹紳被中共公安抓捕了，罪名是「煽動（地震死亡）學生家長上訪」。

「煽動」一事同我也有關聯，我算是「同案犯」。還有，抄他家時肯定也抄出了我的一些「材料」，加上我已有被抓捕的「前科」，因此，心中惶惶不安。

我不敢住在家裡，跑出去東躲西藏了好些天。

……後來，劉小飛親自來到重慶，我們在重慶渝北區一個隱蔽的地點見了面，在一起又談了兩天。

以上這篇採訪錄，是他講述的一小部分（其他部分收集在筆者《驚天動地「收租院」》一書中）。

劉小飛說，劉氏家族是一部厚重歷史，他所講的這一點遠遠不夠。

說來也是。想當年，共產黨為「塑造」劉文彩是前後花了幾十年時間，並動用了強大的國家機器和國家資源。

不過，眼下只能如此了。這一小點文字，還是東躲西藏，在幾個不同的地點完成的。

最後，我要向仍在獄中、前途未卜的朋友劉紹坤表示深深的關切和敬意。

是他的介紹，有了這一系列採訪。

是他的正義和良心，讓他身陷囹圄。

（記於 2008 年 7 月 25 日劉紹坤被抓捕一個月之時）

劉小飛一輩子單身，他說，那些年政治壓力太大，他青春時代正是階級鬥爭狂熱時期，他於是選擇了獨身。

音樂是他的「情人」，也是他的「終身伴侶」。

2008 年 6 月，他在他爺爺 64 年前修建的大禮堂裡彈奏鋼琴。該禮堂與學校裡當年修建的所有校舍房一樣，在大地震中完好無損。

四十二、我為啥終身獨身

講述人，劉小飛

在人世間，做為一個正常的人，哪個不想要愛情？哪個不想要婚姻？哪個不想要家庭？我又不是殘疾，又不是五官不正。但是，我不敢！

我媽媽有一個很好的朋友郭阿姨，她有一個女兒叫李婉英，長得非常漂亮，小時很像美國那個小明星鄧波兒（秀蘭．鄧波兒，美國傳奇童星，第一位獲奧斯卡獎的童星）。她比我小六、七歲。她們也是成都人，暑假時，郭阿姨就把李婉英送到我家來，讓我帶著她。

小時的李婉英

那個年代，劉文彩已經被當局塑造成一個人間惡魔，劉家的人被整死不少。所以，郭阿姨很為我和我家擔心，不知我們會遭到什麼迫害。那時，到處都能看到這種迫害。一般的地主和地主家庭，都往死裡整，何況像我們這種被宣傳得如此可惡的地主。

記得是在 1979 年，李婉英給她家裡提出，要嫁給我。她為什麼要嫁給像我這種人？有幾個原因：一是我以前帶過她，從小青梅竹馬；二是我長得還不錯；三是我們兩家關係很好，我母親與她母親像姐妹一般。

可是在那個年代，我連起碼的人身安全感都沒有，我怎麼敢走出這一步？對我來說，社會上所有的門都關閉了，我能活到什麼時候時候都不知道，我還敢去奢望愛情，奢望一個家庭？我敢嗎？！

我對她說，我不敢結婚建立家庭，我說我沒有起碼的安全感，我能活到哪一天都不知道。

你知道湖南道縣大屠殺、北京大興縣大屠殺吧？大殺地主和地主家屬！我們當時要是在那個地方，我會是首先被拖出來殺的人，我們全家會被斬盡殺絕！這種事情在中國發生了多少？有多少沒被揭露出來？現在很多人對這種事無所謂，漠不關心，但我們不一樣，幾十年來，刀口一直是對著我們的。當局動用整個國家機器來妖魔化劉文彩，來迫害劉家，這些年我們怎麼活過來的只有我們自己最清楚。

我那時沒得安全感，我到現在都沒得安全感！

年輕時的劉小飛

可能很多人不清楚，由於我堅持要揭露「收租院」的真相，恢復我們劉家的清白，有人便對我下手——誘使我前去安仁鎮，給我下了毒。我如果不是逃得快（凌晨出逃），後果不堪設想。

（注：2014 年 8 月，有幾個人打著調查劉文彩莊園真相的幌子，將劉小飛誘騙到大邑縣安仁鎮，以他失眠為由，給他了一種「特效安眠藥」，劉小飛服此藥後，頭痛欲裂，嗓音啞澀，通宵失眠。）

所以，現在我都是這種感覺：每一步都充滿危險！我為啥終身獨身，我劉小飛又不是殘疾，又不是五官不正。可是，我不敢！

愛情婚姻家庭，我再想要都不敢要。

本來，我同婉英從小青梅竹馬，有兄妹感情，她母親同我母親也親如姐妹。

這種親上加親，再好不過了。但我多年一直膽戰心驚……

當時，我對她說了這個情況，我說，我不敢結婚。沒想到她堅決得很，她說：「我非小飛哥不嫁！」

我拒絕她以後，就不敢再到她家去了。

沒想到她真是「非小飛哥不嫁」。這事對她打擊很大，她一直不嫁人，大約七、八年後，她在抑鬱中去世了。

在抑鬱中去世的李婉英

她媽媽最疼愛的就是這個女兒，婉英的離去，給她打擊很大，造成她未老就癡呆了。

李婉英真的是一個美人兒，我記得她暑假到我們家來，在食堂排隊打飯時，人人都要看她，逗她。

是我害了她，還是這個社會、這個時代害了她？

採訪時間：2014 年 11 月 22 日

地點：重慶市渝北區

採訪後記

為採寫《收租院》（中共當局塑造的反映大地主劉文彩罪惡的泥塑）的真相，我七次前往大邑縣安仁鎮。在那兒我結識了劉文彩的孫子劉小飛。我們相交七年，交談多次，他極少談到他的個人生活。

2014 年 8 月，劉小飛被一夥來歷不明的人下了毒之後，主動在電話上對我談起了他的「愛情故事」，並傳來了李婉英的兩張照片。

我表示希望面談。

幾個月後，他來到重慶，我錄下了他的講述。

他最後的話是：「我後來也有走進婚姻的機會，但我都放棄了，除了我沒有安全感以外，走不出李婉英的影子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我永遠記得她三歲時第一次走進我們家門時的情景……」

當年中共當局動用國家機器，鋪天蓋地宣傳地主劉文彩
殘酷剝削農民。
（關於其真相可參見筆者的調查採訪錄
《驚天動地「收租院」》一書）

劉家幾個後代的遭遇

一、劉文彩的二孫子劉世偉，被官方從原籍發配他鄉，他被迫遠逃到四千公里外的新疆庫爾勒上游公社獨立大隊落户。劉世偉為人友善，從不與他人結怨。

由於《收租院》的宣傳，説劉文彩迫害農民，那裡農民便把劉世偉全家殺了。他的老婆和兩個小孩（大的兩歲，小的還在吃奶。）被斧頭劈死，劉世偉則被用繩索勒死。

二、劉文彩的小兒子劉元貴被成都鐵路局弄去勞改，死在外地。

三、劉文輝住在成都的夫人李助幹也未能倖免。1965 年，四川當局把年逾六旬的李助幹強行押解到農村監督勞動，據說還把她弄去遊街批鬥。劉文輝的長女劉元愷去找四川省委統戰部，但沒人理睬，直到劉文輝找了中央統戰部後才把她放回來。身心受到傷害的李助幹於數月後鬱鬱死去。

四、劉文輝的長女婿，起義將領伍培英在 1966 年被逼自殺。

五、起義將領劉元瑄的四妹劉元瑜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自殺，當晚 9 歲的小女失蹤，至今音訊全無。

六、抗日將領劉湘的侄子劉世海自學英語，當局怕他向外國來賓用外語揭露劉文彩的真相，便把他抓到高山勞教所關押，鄧小平上臺後才放出來，但劉世海已被逼瘋。一天夜裡，一輛公安的車把他拉走，至今下落不明。（劉小飛提供）

中共塑造的地主劉文彩殘酷剝削農民的大型泥塑「收租院」

四十三、一個被打殘的地主孫兒

講述人：陳德章

1949 年生

1943 年，劉文彩修建中學時需要土地，為此，他以三倍的土地（大約 40 多畝）換取了小地主陳紹鳳位於現在安仁中學的 10 多畝地。1949 年共產黨來後，陳紹鳳理所當然地被劃成地主。如今，陳家所有的人都已死去，只剩下一個 1949 年出生的孫子陳德章。

1955 年，尚未滿 6 歲的陳德章被打成終身殘疾。

土改時我還很小，只記得當時打鑼，叫大人去開會，就是鬥爭會。後來聽說，會上他們逼爺爺奶奶交金銀，有人說他們把銀元埋在河壩的某個地方了。爺爺奶奶交不出，他們就用大糞從他們嘴裡灌進去。

不過，他們當時沒被整死，爺爺死於 1958 年，那些年他傷心得很，得了肺病，沒得錢醫，1958 吃的也開始困難了。我記得他吐泡泡痰，一吐一大盆。他死的時候 52 歲。

奶奶是 1959 年餓死的，她的死我記得最清楚。當時我們吃人民公社集體伙食，越吃越沒得吃的，到後來吃糠。奶奶死那天她煮了一鍋胡蘿蔔纓，當時我已經殘了，我一拐一拐地走過去爬上去看鍋，裡面全是蘿蔔纓纓，一顆米都沒有，比現在豬吃的都差，也沒多少，那點葉子，我一個人吃都不夠。當時我不懂事，現在回想起來好淒慘！

我奶奶一口沒吃就死了。（陳德章滿眼含淚）

我爸爸？他 1954 年就被抓走了。我爸爸叫陳啟賢，生我時他才 19 歲。他是地主子女，經常被拉去幹義務勞動，又受氣。爸爸脾氣倔，他不服，不服有什麼好處？貧下中農不收拾他收拾哪個？大概是 1954 年，我都懂事了，他被抓去勞改，去的新疆，從此再沒回來，1969 年，他死在新疆勞改隊，那一年他剛剛 40 歲。

我記事時就記得爸爸過得很苦，爺爺挨打受苦我沒見到，爸爸我記得。他們叫他去推煤，煉鋼用的焦煤。他天不亮就走，很晚很晚才回來，一天在路上就要走 100

多里，他說給我買東西回來，但從來都沒買過，每次他晚上回來我們都睡了。後來他在新疆勞改隊給我寄過 10 元錢，那時我腳痛，他寄錢給我醫。當時 10 元錢要當現在的 100 元錢。

我媽媽在他去勞改前就同他離婚了。爸爸性子比較剛烈，他在家裡發牢騷，說：「地主子女就是壞人？真的是『老子反動兒混蛋』？」媽媽在學校教書，思想先進，她把爸爸的話彙報了，一下子矛盾激化，於是他們離了婚。

爸爸不把我給媽媽，後來媽媽再也沒管過我，大饑荒那幾年我孤零零一個人，餓得要死她都沒管，我對她沒得感情。

陳德章在他的白鐵鋪裡

我是怎麼殘的？那是 1955 年，當時我還沒滿 6 歲，同一群娃兒在外面耍，想不起為什麼事爭鬧了幾句，一個大娃兒，他有十多歲了，他罵我：「你一個地主娃兒還敢翻天？」他操起一根扁擔狠狠打來，我腰桿上一陣巨痛，從此我就殘廢了。

（注：從那一天起，陳德章就再沒有長高，他的身高永遠停留在 1955 年 6 歲時。）

我們哪裡敢去找對方？地主子女嘛，打殘就打殘了，沒得辦法，沒得人敢為我們說話。那些年，只要說你是地主，是反革命，周圍的人只有喊打的，沒得哪個敢幫你撐腰。我奶奶實在想不過，去找了楊志清（音），當時他是村長，但是一點用都沒有。

最初我腳還不痛，後來痛得慘，走路一瘸一拐的。我上小學，要走長長一段路，痛苦得很，不想去回想。我只讀了幾年小學，地主子女，一律不准讀初中，當時都是這樣。

我最慘的就是奶奶死後那些年，孤零零一個人，身子殘廢，又正是三年大饑荒。

我被送進孤兒院，那兒每天吃 6 兩米——16 兩秤的 6 兩，不到現在 10 兩秤的 4 兩，煮飯的再剋扣一點，實際吃到嘴裡的只有三兩，每天一團飯幾口就沒有了。我出去找胡豆葉、蘿蔔纓吃，還到河裡去抓小魚、螃蟹燒來吃。也沒得穿的，冬天打赤腳，冷得發抖，去撿了一雙別人扔掉的爛襪子套在腳上，生了一腳的凍瘡……當時在孤兒院的還有劉文彩一個管家的孫女，叫薛本清（音），那個管家勞改死了。

1968 年，我從孤兒院出來，孤零零的一個人，什麼都沒有，沒有家，沒有吃的，生產隊挖洋芋（土豆）就扔給我點洋芋，挖紅苕就給我點紅苕。四周的人還要指指點點，說這是個地主崽子。

我咬緊牙自己掙生活，能幹的我全部都幹。沒勞動力我就編筐、編背篼賣，不找生產隊。從那時起，我一直自力更生，自己勞動養活自己。後來分了七分田，我也下田幹活。現在有人說，你是殘廢，找政府吃低保，我不，我開個白鐵鋪，幹手上活，每天能掙個二、三十元。

40 多歲時我找了個女人，她帶了個娃兒來。老婆很勤快，我也亡命幹，別看我殘，我能夠挑七、八十斤。從此我們三口人在一起生活，算是有了個家。

採訪地點：大邑縣安仁鎮迎賓路

時間：2008 年 6 月 7 日

採訪後記

在 5.12 地震災區採訪時，聽說劉文彩當年修的中學完好無損，我便前去查看。

果然，校園裡除了前幾年當局修的兩棟房子成了危樓之外，劉文彩在 1943 年修的所有房屋都安然挺立。在那兒，聽人說，校門對面那間白鐵鋪子裡的殘疾人，是一個地主的後代，安仁中學原來的十多畝地，就是他爺爺的。

我走進白鐵鋪，找到了身高只有六、七十公分的陳德章。

他一搖一擺地走著，從屋裡給我們拖出椅子，然後坐下同我們交談。

他一坐下來，只看上半身，一點沒有殘疾的模樣。相反，他看上去五官端正，目光有神，眉宇間有一種浩然的大家之氣。

可惜，那一扁擔，讓他的疼痛伴隨了他終身，而身子，則永遠停留在了 6 歲的高度。

辭別時，他起身一搖一擺地走到門邊送我。我望著他低矮殘疾的身軀，突然想到：「收租院」裡那些雕像，是泥巴的塑造，而眼前白鐵鋪裡的他，是血肉的真實。

中共塑造的地主迫害農民的泥塑「收租院」

四十四、抗日將領劉湘侄孫的悲喜人生

講述人：吳世躍

1949 年生

一〉、我的家史和父母們的遭遇

我叫吳世躍，現年 61 歲，住在大邑縣安仁鎮吉祥街，距劉湘老公館幾步之遙。

我母親叫劉秀容，是劉湘大弟弟劉成章的女兒。

當年，我母親嫁給了邛崍縣冉義鄉的吳家。冉義鄉距安仁 10 公里，據說母親出嫁時，送親的隊伍有三、四里路長。

母親嫁過去只有幾年時間，就遇上了 1949 年的「解放」。本來，劉湘的夫人一再叫我母親全家同她一起去臺灣，但母親放不下家裡這份產業，還有，她對共產黨和即將到來的「解放」是咋回事完全搞不懂。

不到一年，「解放」就來了，鎮壓、搞土改、追金銀、評地主……吳家是當地的一個豪門大族，有田土上千畝，建有學校、糧站。我曾祖父吳天宇（音），外號「吳叫花子」，因為他愛跟窮人打交道，每當有叫花子（乞丐）上門乞討，他都吩咐煮飯給他們吃。最特別的是，他還要把自己的飯端到門口同叫花子們一塊吃，長期如此。「吳叫花子」的名聲傳得很遠，周圍幾個縣都知道，就是現在到冉義場上去都打聽得到。

劉湘上將（網路圖片）

他的兒子，即我爺爺吳仁安，外號叫「吳歡喜」，他最喜歡去給人家調解糾紛，成天笑嘻嘻的，所以人們叫他「吳歡喜」。

我爸爸叫吳慶華，解放前是大學生，1949 年時還沒畢業。但是，我爺爺非要他回鄉當鄉長，爺爺把他的名字填上去，他還沒正式去上任就「解放」了。

吳家的很多人都被抓來關起，其中有我爺爺、我爸爸、我媽媽、我么爸吳純一等等。

爺爺、爸爸、么爸三個人是同一天被槍斃的，爸爸死得最慘。那是一個冬天，在冉義河壩開批鬥大會，爸爸他們跪在地上。工作組的人事先給一個叫龔玉華（音）的人做了工作，叫他來批鬥我爸爸。龔玉華來了，提了一個我們這兒叫「火提子」的烤火筲筲。批鬥完後，準備槍斃人了。龔玉華把「火提子」上面的灰扒開，把裡面的炭火吹得通紅，然後一把將我爸爸的後領子扯開，把通紅的炭火從他頸子倒下去。炭火把爸爸的後背燒得吱吱吱的，他痛得滾倒在地上。他們把他一把提起來又跪下，爸爸受不了，拼命掙扎，又翻滾在地，又被提起來，如此幾次。有人看不過了，開了槍，點的心——打心臟。這樣才結束了他的痛苦。

接下來打我么爸，他是打的頭。槍響後，頭炸開了，骨頭、腦水爆得到處都是。

他妻子在場，看到這一幕，把圍裙解下來，將么爸的頭骨、腦水包裹在一起。

政府出了點錢，叫當地一個瘋子把我爸爸和么爸從河壩拖到坡上埋了。這個瘋子姓鄭，還活著，前幾年他帶我去指了埋我爸爸和么爸的那個坑坑，我這才開始上墳。

土改中，吳叫花子的後人共有 11 個被槍殺。他們是：吳澤芝、吳志誠、吳福田、吳三素、吳世昌、吳必成、吳炳生、吳作成、吳仁安、吳慶華、吳純一。

我七爸吳俊成的妻子吳楊氏土改時被關在鄉公所，逼要金銀財寶。看守她的人見七伯娘長得漂亮，就把她強姦了。七伯娘被放出來後，覺得沒臉回去見人，跳井自殺了。

強姦她的人叫李清銀（音），是冉義九大隊六隊的人。七爸吳俊成在饑荒年餓死。

我媽媽也被關押，同七伯娘關在一起。她被整整關了一年，天天逼要金銀財寶。能交的都交了，還是逼，她交不出，又吊又打，受不盡的刑。她頭髮又髒又亂，身上長滿蝨子，一身臭氣，像個乞丐。

一天下午，她突然回來了，對帶我的保姆說，她是請假回來看娃兒的，還得再回去。當天晚上她並沒有住在家裡，她走了。走前她對保姆說，如果第二天早上她沒回來，就請保姆把我帶走，當自己的娃娃把我撫養成人。

當晚，媽媽去了一個叫金三躍（音）的家，金三躍全家都曾在我們家當過長工，工作隊把金三躍提起來當了武裝隊長，還發了槍。媽媽當晚同他們擺了一陣龍門陣（聊天），半夜裡，等他們睡沉了之後，她用揹我的一根背帶，吊死在金三躍的床欄上。

第二天一早金家的人發現後，趕緊把媽媽放下來，另找一根繩子，把媽媽吊到豬圈的茅廁上，然後去找村長蘇吉武。「村長，村長，劉秀容吊死在我家的豬圈裡

了！」

村長來後，說：「死都死了，喊人來把她埋了就是了。」我的父母就這樣走了。據我們吳家的老人，80 歲的吳繼成（也是地主）說，我爸爸死時 25 歲，么爸只有 22 歲，我媽媽死時具體年齡不詳，但肯定也只有 20 幾歲。

二〉、我被收養和被遺棄的經歷

保姆聽說我媽媽吊死，嚇壞了。這個時候，吳家的人被槍殺的槍殺、關押的關押，長工們也早走了，她一個人，十分害怕。於是，她收拾起東西，甩下我，獨自走了。

那時我還不會走路，餓得在家哭，哭得昏天黑地，沒人理，不知過了多久，一天還是兩天，我從屋裡往外爬。是從後門爬出去的，記得翻過了一個門檻。

我在門外的路上爬了一陣，不知怎麼就滾到路邊的一個溝裡去了，全身糊滿了爛泥。

那天是趕場，瞿家有一個叫王素芳的女人趕場時從我家院子前路過，她聽見有娃兒的哭聲，伸頭一看，看見了我。她說：「這娃兒滾得這麼髒，可憐。」她把我抱起來。

王素芳正被培養當婦女主任，曾經到我家來看守過我們，因此她認得我是劉秀容的娃兒。

王素芳有個嫂嫂，結婚五、六年了都沒生娃娃，她把我抱起時就打算把我給她嫂嫂。她先把我抱回家，把我洗乾淨，然後給我吃飯。她先把吃剩的半碗肉端上來，我迫不及待伸手就抓，飯還沒來我就把肉抓來吃完了，可想我餓到什麼程度。

吃完飯，她把衣服給我穿得巴巴適適的（整整潔潔的），抱我去找她嫂嫂。

她嫂嫂聽說我是地主的娃娃，爸爸又是遭槍斃了的，不敢要。怎麼辦呢？不能把我又丟掉，王素芳看我長得很乖，也捨不得。於是她去找村長蘇吉武，問他怎麼辦。蘇吉武說：「大人有罪娃娃沒得罪，他才這麼大點，也沒享到什麼福。這樣吧，

吳世躍在他當年被收養的瞿家舊屋前（2009 年 8 月）

明天上午 8 點鐘開大會，我在會上說說這事，妳把娃兒抱來。」

第二天在會上，蘇村長當眾說：「王素芳抱了個娃兒，是吳慶華和劉秀容的兒子，現在吳慶華槍斃了，劉秀容自殺了，娃娃沒了父母。王素芳有個女兒，沒有兒子，乾脆就把這個娃兒給她當兒子，同意的舉手。」

所有的人都舉了手。

王素芳好高興，這麼順當就抱了個兒子。這時，她嫂嫂瞿楊氏後悔了，想要得很。但是王素芳不幹了，她自己想要。

就這樣，我成了瞿家的人（王素芳嫁給瞿家），我的名字改為瞿炳良。

王媽媽領養了我之後，接二連三地生孩子，我九歲多時，她又生了六個，加上以前的一個女兒和我，共有八個娃兒。這個時候遇到了「糧食關」（即三年大饑荒），家裡吃飯困難，王媽媽拖不起了，決定把我送走。她對我說：「你有個姑姑嫁在冉義黃福聯（音）家，你到她那兒去。」當時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姑姑，我小時候憨乎乎的，什麼都不懂，沒有任何人指點我。為什麼呢？因為瞿家的人不願意其他人同我說話，怕別人告訴我我的真實出身，吳家的人更是不敢接近我。所以，我只知道王素芳是我的親媽媽，其他什麼都不曉得。

那天我被帶到姑姑家，姑姑獨自一人躺在一間爛茅草房裡，床是一塊木板搭的，被蓋都沒有。姑姑已經病得起不了床，她拉著我的手哭著說：「我不曉得你還活著。」

王媽媽走後，姑姑說：「那個角落裡有個小罐罐，裝米的，你去看一下，裡面還有沒得米，有米的話就打點來煮飯。」

我去把米全部挖出來，只有半碗。我把米煮稀飯，煮好後有三碗多。當天就吃了這點稀飯。

第二天，一點米都沒有了，早上我去地裡找了點牛皮菜回來，煮來吃了，就再沒辦法了。姑姑病得重，我看這兒待不下去，獨自一人離家出走了。

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我姑姑。好多年後，我才弄清楚，姑姑是我爸爸的妹妹，叫吳素華，排行第四。土改時她也被劃成地主，關押起來受了很多刑罰。土改的人把她捆綁在樹上，逼要金銀財寶。他們算帳說，姑姑有多少田，請了多少長工，剝削了多少年，該交出多少金銀。土改工作組的人發動農民去鬥打。他們把姑姑衣服脫了，用豬背上的鬃毛穿入她的乳頭。有人還從茅坑裡舀來屎尿，撬開她的嘴，硬給她灌下去。

姑姑當年是嫁給冉義黃家的，姑父在土改後不久就死了，姑姑沒有小孩，無依無靠。我流浪幾年回來後，王媽媽告訴我，我走後姑姑被送到人民公社辦的「幸福院」，在那兒姑姑只住了兩三天就死了。姑姑的全部家產就是那兩間爛草房，她死

後隊上把它拆了做柴燒。

三〉、外出乞討，九死一生

我從姑姑家跑出來後，不曉得往哪兒走，心想，沿著大路走，也許找得到吃的。

一路上我餓得心慌，只撿到一點蘿蔔根根吃。我走到高橋場，到飯館門前去守候，果然守到別人吃剩的一點菜湯湯。我去端來喝，唉呀！那個味道我從來沒吃過，安逸（爽）！

從此，我開始了舔盤子的乞討生活。

我在高橋討了幾天飯，飯館的服務員趕我走，不准我在那兒要飯。我只得又走，往邛崍縣城走。

邛崍城裡也不准我要飯，我只得又走，沿著大路往雅安走。

流浪路上，我吃水溝裡的水蔥子、路邊的馬邊草、芫須草（芫荽）。聽人說，一種叫豬鼻拱（即「折耳根」）的草草可以吃，我挖來吃，咦，清香清香的，還好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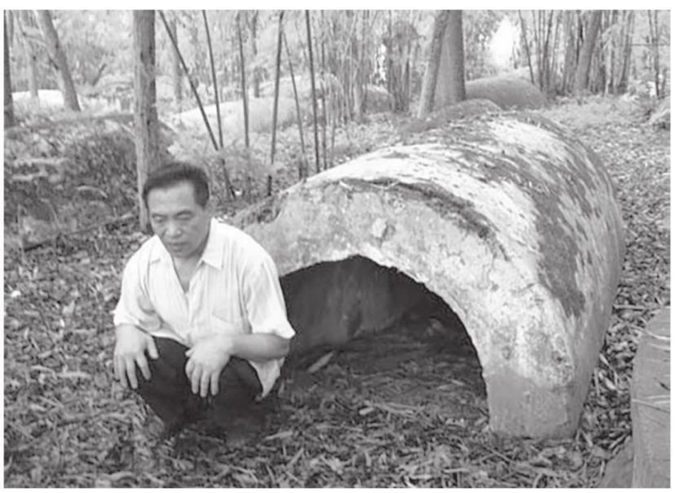
一路上，我只要聽說哪種植物可以吃我就挖來吃。水溝裡的水蔥子、田裡的烏瓜子、路邊的野草草、山上的野果子野花花、水苔蘚，還有樹皮，我都剝來吃過。

到了雅安，咦，不錯，這兒飯館多，也不趕我走，我在雅安待了一段時間。

我東混西混，晚上什麼辦？夏天，我跑到撻了穀子的穀草堆裡去睡，蚊子咬不到。冬天，我鑽到別人燒灰窯的窯子裡。有時在別人屋簷下的草堆裡過夜，但這種時候不多，因為主人發現了要打，把我當小偷。（我第二次出來流浪時還把我當特務抓來關起）

下雨的日子最苦，沒找到過夜的地方只有頂著淋。

後來我發現了一個避難處，就是墳墓。



吳世躍在他當年睡過的墳前

川西荒棄的墳一頭有一個敞口，可以鑽進去睡。有一段時間，大概有三個多月吧，我天天鑽到墳墓裡睡。我要等天黑了，往往是等群眾睡了才摸到墳地裡去，因為讓群眾發現了的話會把我當盜賊打。我永遠記得第一次鑽進去的情景。

我躺下後，四周漆黑，我想看點光亮，心裡安穩些。我抻手亂摸，抓

到一塊石頭，我把石頭墊到後腦，這樣，頭高一點，可以從敞口看到外面的一點光。第二天早上醒來，我把墊到後腦的石頭搬過來，一看，「石頭」原來是一個死人的頭骨！我那時小，才十來歲，也不曉得害怕，第二天晚上照樣爬進去。只是，這次我先用草草把墳裡面的塊塊渣渣掃出來了之後再睡下去。

在流浪討飯的那幾年裡，我好多次昏死過去。有時是餓昏了，有時是淋了雨感冒發燒，有時是又餓又病。有一次我昏倒在地上，不知過了多久，迷迷糊糊聽見有人說：「這個叫花子要死了，已經在這兒睡了兩、三天了。」嘿，我沒死，幾天之後我又慢慢醒過來。我爬到溝溝邊，喝了點水，有了點精神，又爬到田邊扯草草吃。那時田裡麥子正在灌漿，我爬過去扯下一把麥穗，用手搓，吹一吹，一口吃下去。那個漿漿清香清香的，好吃！

我還在田裡扯「烏瓜子」剝米米吃。嫩的就直接吃，老的就扯草草來燒起吃，這樣要香一些。

野草草野果子吃多了，經常拉肚子，糞水從肛門流出來，我一點知覺都沒有，褲子打濕後，覺得冷，才發覺。我的腸胃病、風濕病就是流浪生活落下的。

那些日子，我瘦得皮包骨，衣服破破爛爛，一身又髒又臭，過路的人看見我，遠遠地捂著鼻子繞開走。我自己也覺得自己太髒，於是，有河，或者有水溝的地方，我就脫了洗。衣服洗後曬在地上，我光著身子找個地方躲起來，直到衣服曬乾。

有一次我看到河裡有人撲通撲通遊得很歡快，我不會游泳，但憨乎乎地跟著跳下去，結果一下子就沉了下去。旁邊的人見我半天不起來，曉得出了事，一個人鑽下水把我撈起來，扛到岸上壓我肚子，我吐了好多水才活過來。

這次流浪，到底是幾年我記不清了，大概有五、六年吧。但我記得流浪的路線：邛崍——百丈——銘山——雅安——天全——瀘定——康定——爐霍。

當時，我不知道我劉家的身分，更不知道劉文輝有個兒子就在爐霍縣，而且是供銷社的主任，否則，我一定要去找他，人生的命運也許就是另一回事了。

後來外面不准流浪了，要遣返，我便回到生產隊。

四〉、地主子女，生存這麼艱難

我回到生產隊勞動時，大約十五、六歲。那時，一切靠工分吃飯，一天的滿分是 10 分。同我一樣年歲的人，貧下中農子弟評 8 分，我是地主子女，只評 4 分，最多 5 分。我幹的活比他們（貧下中農子弟）重，比他們多。為啥呢？因為地主子女不敢有絲毫的偷懶，更不敢講價錢，重活累活我都得去幹，否則就要挨批鬥。

每年冬月間或臘月間年終結算，算工分，我一年到頭幹得比他們多，但工分少一半。工分少，分糧就少，根本不夠吃。每年都是如此。我一分了糧就計算，多少斤穀子，一年有多少天，一天可以吃幾兩，一頓又吃多少。算下來，一頓只能吃一兩多穀子。因此，回到生產隊幹活，仍然挨餓，我幹活時，常常餓得虛汗直流。這樣幹了幾年，實在拖不下去，於是我第二次出去流浪。

我仍然沿著上次的路線走。翻越二郎山時，我鑽到山洞裡過夜，一天夜裡，一個黑乎乎的東西朝洞口走來，我聽見呼哧呼哧的氣息聲。我想可能是頭熊，聞到我的氣味了。我嚇得跳起來，一把抓住洞口的一根樹枝，拼命地上下左右亂舞！那黑乎乎的東西退走了，我還在亂舞，根本沒看清是不是熊。那一夜我不敢睡，緊緊握著樹枝，睜大眼睛一直坐到天亮。

我這次流浪時間不長，只有一年多，原因是我被抓了。

那一天我流浪到瀘定，餓慌了，我身上還有討口時別人給的一點錢。我找到一戶人家，對他們說，能不能給點吃的，玉米饃饃、稀飯羹羹都行，我可以付點錢。

他們給我了吃的，我坐下來享用。

正吃著，幾個民兵突然衝進來把我捆綁起來。原來，這戶人家認為我是偽裝成叫花子的特務，他們在給我飯吃時就向公社彙報了。

我被押到公社，又押到瀘定縣城，他們讓我老實交待，我如實說了，但他們高低不相信，認定我是偽裝了的特務。我被押到雅安專區，雅安打電話到邛崍，最後落實了我的身分——一個沒有家的、無人照管的孤兒。

雅安把我放了，我沒有馬上回來，雅安是個要飯的好地方，飯館多，剩的菜菜湯湯也多，我吃了這家吃那家，甚至抱著潲水（餿水）桶一陣猛喝，潲水桶裡有油水，味道也不錯，回想起來比現在的肉還好吃。這樣，回生產隊之前，我吃得臉上還長了點肉。

回到生產隊後，生活仍然十分艱難。這時，我聽人家說，在成都，雞蛋可以換糧票和布票。我決定試一試。第一次我身上只有 10 多元錢，我買了點雞蛋到成都去，果然換到了糧票、布票。我把糧票拿回來賣，嘿，還掙了幾個小錢。我來了勁，開始學做生意。後來，我花 20 多元錢，買了一輛舊自行車，這樣就更方便了。我開始掙了一些錢。可惜，一次在路上，我被工商所的人抓住了，所有錢和東西全部被收繳。他們說，想要回錢和東西，必須開來「三級證明」。「三級證明」指的是生產隊、大隊和公社的證明。我怎麼敢去開？我出身又不好。

所以，我第一次「下海」就輸得精光。

莫法，我又出去流浪，這是我第三次流浪。這次時間更短，沒多久就被國家抓起來關押在成都多寶寺。我被關押了近三個月，放出來時我頭髮長得很，一身骯髒。

從多寶寺釋放回到生產隊後，人們不敢同我說話，我在生產隊抬不起頭，只得去跟一個木匠師傅學手藝，主要是拉鋸子改木板。我幹了一年多，只吃飯，沒有工錢。後來，國家不准「五匠」人員（木匠、鐵匠、泥瓦匠等）「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又被清理回來。

還是得做生意才能生存，我又買了輛自行車。

我白天勞動，晚上悄悄去買一些蔬菜，等別人睡了再把菜馱回來，天不亮就趕到雅安去賣，同時把雅安的煙酒帶回來賣，比如 8 分錢的經濟煙、4 角錢的芒果煙、2 角 4 分一包的飛燕、5 角錢一包的大前門。買煙要排隊，一次只能買 5 包，我就一次一次地排隊買。煙買回來後我不敢公開賣，只能打給販子，價格可以翻一倍。

在偷偷摸摸做生意的過程中，在眉山、雅安、彭山的路上，我先先後後被工商所收繳了四輛自行車和好幾千元錢，辛辛苦苦掙的一點財產轉眼就沒有了。不過，人還沒有被抓、被打。

真正把我整傷心的還是生產隊。

「文革」中「一打三反」運動時，大隊書記龔年笙和生產隊長王良清說我投機倒把，把我抓去「學習班」批鬥。同時，他們抄了我的家，把我的幾十斤麥子、一百多斤穀子和一輛新自行車全部抄走了（自行車從此成了大隊幹部的公車）。

採訪時吳世躍專程來到冷家

我被捆綁起來批鬥，那天晚上，鬥爭會結束後，他們用一個拌桶把我蓋起來，關在保管室。我雙手反捆在身後，悶在拌桶裡，夜裡，屎尿都拉在褲襠裡。第二天，保管員瞿留生來掀開拌桶，把我放出來。

我又一次一無所有，家裡連一粒糧食都沒有。我跑到一戶姓冷的夫婦家，他們給我煮了飯吃，看我實在沒法，兩口子商量後又給了我一升米。多年來，我一直對他們心懷感激。

我把那升米吃完後，沒辦法了，不得不又一次外出流浪。

地主子女，生存得好艱難！

五〉、捆綁吊打，逼我走上絕路

當年吳世躍在這兒受刑

1976 年，是我終身難忘的一年。

一天，幾個公安人員突然把我抓起來，銬到安仁鎮付安鄉一幢房子裡。這幢房子是當年劉湘手下一個叫劉麻子的連長修的私宅，現在還在。

在那兒，我遭受了我一生中最慘痛的吊打！天天皮鞭暴打，還用扁擔砍，一身打得稀爛。

他們為什麼下狠勁打？因為我不承認偷了供銷社的布。

在付安街上有一個供銷社，1976 年 7 月 28 日，供銷社的布被偷了。他們想當然地認為是我偷的，因為我曾到處流浪，又是地主子女。那個年代，地主子女，人人都可以欺負。

我們問我 7 月 28 日在哪兒，在幹什麼。我想不起了。我一輩子沒讀過一天書，日子過得稀裡糊塗，某天某日真是記不起。

說不出來，又不承認，幾天幾夜連續吊，暴打！打得我屎尿失禁，拉在褲子裡，右膀和右手腕也被吊脫臼了（後來是赤腳醫生給我接好的）。下手最狠的有兩個人，其中一個是公社的武裝部長史國強，我永遠記得。

六、七天後，他們突然說：「地震那天晚上你在哪兒？」這一下我猛然想起了，1976 年 7 月 28 日是唐山大地震，那天我印象深，當時我正住在雅安車站後面的一個招待所，地震發生時，那門格吱格吱地響。

我趕緊把「不在現場」的證據告訴他們。第二天他們去調查了，我所說的是事實。

吳世躍在當年吊打他的公館前（2009 年 8 月）

但是，他們仍然不放我，仍然把我銬起，只是沒有再吊打了。

那天中午送飯時，他們把我手銬打開一隻，另一隻仍然銬在樓梯的欄杆上。吃飯時我發現地上有顆鐵釘子，我悄悄把它撿起來。當天夜裡，我用釘子挖磚縫的石灰，然後取下一塊磚。接著又挖，總共挖下六、七塊磚，人可以鑽出去了。

但一隻手還銬著。為了活命，我拼

命往外拉，手磨得鮮血直流，我還拿釘子戳，最後終於掙脫了手銬，但手上留下了終身的傷痕。

我逃出去之後，不知往哪兒走，絕望得很，我萌生了死的念頭。

我回到家，買了 20 多粒「敵百蟲」，晚上關上門，一口氣全部吞下去。

我們瞿家有個嫂嫂，她每次到民安村時都要來找我擺擺龍門陣。也是我命不該絕，第二天她剛好來了，她看快中午了我門裡面還是關著的，她從門縫看，看見鋪蓋好像裹著人。她拍門，又喊，都沒應答。她估計出事了，趕緊去把大隊赤腳醫生吳世龍叫來。吳世龍來把門砸開，見我牙齒咬得緊緊的，於是撬開我的嘴，灌水，不知又灌了什麼藥，半天後，我又活過來。

六〉、艱辛的尋親之路

在我走投無路時，有人告訴我，我有一個哥哥，在峨邊茶廠工作，我非常高興，當即決定去投奔他。

我沒錢乘車，但我知道青龍場有火車，以前我在那兒賣過菜。我到青龍場爬上一列火車，是貨車。到樂山附近時，我被車站派出所發現了，又被關起來。幾天之後，落實了我的身分，要遣返。我不幹，說我的哥哥叫吳世倫，在峨邊茶廠工作，我要去找他。派出所果然又查到了我哥哥，但是不准我去找他。為啥？因為他正在峨邊勞教，是個勞教分子。

派出所給我買張車票，非要我回來。

我上了車後又溜下來，爬上開往峨邊的車。

這次是列客車，查票查得緊，第一次我在廁所裡躲過了，第二次躲不過，眼看又要被抓，被關，押回去又要被當成小偷、扒手。那種絕望的感覺又湧上來，不活了！跳車，摔死就算了！

我從車窗跳了下去。

嘿，不知過了多久，我又醒過來，身上除了腳上的傷（傷痕至今還在），其他都完好。

但是，去找哥哥的夢破滅了，我不得不又回到了家鄉。

回來後仍然莫法，這時，又有人給我說，安仁鎮是我外婆的老家，王玉清是我外婆的親戚。

王玉清！她的名字響得很哪，劉文彩的五姨太，到處都在批鬥她，她還是我的親戚？我反正無路可走，去找找她。我從冉場步行，一路走一路問，最後打聽到王玉清在蔡場 5 大隊 3 隊。

王玉清住在一間矮小房子裡，雖然貧窮，但打掃得乾乾淨淨。我們見面，彼此都不認識。我把我的情況說給她聽，但是，那時我對我媽媽家的情況也不太清楚。我告訴她，我只聽說劉湘是我的外爺爺（我外公的哥哥），我不知道我該叫她祖祖呢還是婆婆，還是其他什麼。我說，我搞不清楚，要妳才搞得清楚。王玉清問：「劉湘是你外爺爺？那你媽媽叫什麼名字？」我回答：「她叫劉秀容。」王玉清一聽就拉著我的手說：「噢，劉秀容是劉湘的親侄女嘛，是劉湘大弟弟劉成章的女兒。那你該叫我祖祖。」

我於是就叫她祖祖。我告訴她我的經歷：流浪呀、舔盤子呀……她一直抓著我的手，眼淚直流，說：「唉呀，你這娃娃，你是我們劉家的么孫子，你 100 根頭髮裡就有 50 根是我們劉家的……」

她煮飯給我吃，吃了中飯也不讓我走，又留我吃晚飯。

她有兩個雞在生蛋，她把全部雞蛋煮給我，共有 10 個。接著把晚上沒吃完的飯捏成兩個飯團，在火上烤黃後塞給我帶走。

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親戚的款待，聽到這麼和藹溫柔的聲音，我一個長期流浪，看慣了冷眼、飽受了喝斥的孤兒，心裡覺得好溫暖！

王玉清對其他人也很和氣，群眾都說她好。後來她從蔡場搬到安仁，每個月都要到我這兒來耍，我也經常送些東西給她。我有親戚去看她，她把供的東西拿下來，非要招待我們吃了才准走。

每年年關，她覺得她是個老輩子，還要給我們發壓歲錢。改革開放後，我做生意已經在掙錢了，她還要給我發錢，50、100 地發。她還教我，說共產黨好。我說：「對，好，好。」

青年時的吳世躍

那天分手時，她叫我到安仁去找劉世孝。「他是你親么舅，你大舅還在不在就不清楚了，他叫劉世澤。」她還告訴我，我還有一個哥哥，全名不知道，只知道叫「昭昭」，她曾經在劉家公館裡逗過他。

我好高興，找到親人了！

我趕到安仁，打聽昭昭和劉世孝。我先問劉世孝。別人說，他在紅旗壩（就是現在的十字口）。我趕到那兒一看，正在開批鬥大會。我問劉世孝，別人說：「站在那高板凳上的就是。」

我第一次見到么舅，他正站在高板凳上挨鬥，有人正用刷條子鞭打他。

我不敢認他，也不敢說我是他侄兒。

我就問昭昭，得知他叫吳世昭。我找到他的家，二十多年了，我們兩兄弟第一次見面！

二哥本來也出生在冉義，但還不到一歲時就到了安仁外婆家，從此再沒回去，也不敢回去，冉義的家在哪兒他都不曉得。外婆姓鄭，1960 年時餓死了。

二哥同大舅的一對兒女劉忠民和劉鳳鳴住在一起。大舅和大舅媽在饑荒年時雙雙餓死。他們為了救兒女，把僅有的一點糧食留給兒女吃。大舅和舅媽是地主分子，不敢去開點荒地種點蔬菜，更不敢出去偷點瓜果小菜，只有活活餓死。我後來聽說，他們被從劉湘公館裡趕出來後，長期沒有住處，日子非常淒涼。在外教書的二舅劉世清（早已去世）回來看到這種狀況，把手錶賣了，買了幾間破草房，他們才有了個住處。

我媽媽的幾個兄弟姐妹都出生在劉湘公館裡，我媽媽是老二，解放後他們幾乎都被打成地主。

位於安仁鎮的劉湘公館

二哥的家空蕩蕩的，什麼家具都沒有。我那表妹蓋的是一床破棉絮，到處是洞，那張板板床也破破爛爛。

當天，二哥湊了點錢，去買了半斤米，再弄了些紅蘿蔔煮在飯裡招待我。飯煮得還乾，他們自己吃的都是清湯湯。

我無路可走，想投奔親人，但看到這個樣子，知道沒法了。吃了那碗紅蘿蔔飯後，我又走了。

七〉、山上遇險和大哥之死

離開二哥家後，我去找以前我跟過的木匠師傅，求他帶我出去幹活，這樣我又混口飯吃。

但這次我差點又丟了命。

那天我們去天全青龍山上改木板，走在懸崖邊上，我腳下一滑，從懸崖上摔下去，下面有十多丈深，我雙手抱著頭，翻滾得昏天黑地，然後人事不醒。師傅認為我沒救了，他爬下懸崖，把我翻過來，一看，還有氣，趕緊揹我下山。

街上，有人出了個土辦法，把山上的茨麻草割一大把來，脫光我衣服，全身用茨麻草抽打。嘿，過了一會，腫就有些消了，我人開始動彈。但是，臉和頭還是腫脹。又想一個辦法：把挖了麝香後的空殼殼（獐子的肚臍眼）切開，放在大蒜裡磨，磨成漿後抹在頭上、臉上。果然，兩、三個小時後，我醒過來，又一次從鬼門關折回來。

我回到生產隊後，遇到國家要在邛崍五面山修玉溪河，每生產隊派 5 個勞動力。我被派到工地上擔泥巴。

這個時候，我大哥吳世倫從勞教隊裡釋放回家，他來找我。

我這才知道大哥的身世。

大哥比我大 4 歲，土改媽媽被關押時，帶哥哥的保姆胡大嬸嬸便把哥哥領走了。後來，他獨自一人住在一個叫紅廟子的破廟裡。饑荒年，哥哥餓得沒法，跑出去偷了點蔬菜吃，因此被抓去峨邊勞教。勞教回來後，紅廟子已經被拆了，他沒住的地方，去投奔二哥，發現那兒沒法安身。他來找我，見我也是一貧如洗，他很絕望，把勞改隊發的一件衣服送給我就走了。那是一種牛皮紙衣服，現在還沒得這種衣服。

離開我後，大哥去邛崍找三姑姑，三姑姑家也很窮，大哥把身上僅有的幾十元錢用完後，在新津南河跳河自殺了。

工地上有個姓吳的冉義人，人們叫他吳連長，他有一定的權，我於是壯起膽子去找他。我對他說，我父親也姓吳，點名時叫我瞿炳良是因為我是瞿家撿回去的。我父親叫吳慶華，是吳大院子裡吳叫花子的後人。吳連長一聽，說：「唉喲，我同你爸爸還一個包包裡用過錢！」

第二天，吳連長就把我提起來搞後勤。我先煮了三天飯，他見我還老實，便安排我去當採購，這是個美差，我高興得很。可惜，又是因為地主子女這個老問題，我失去了這份美差。

一個姓汪的營長，聽別人反映，一個地主子女在搞後勤，他便找個理由撤我的職，他說我偷了菜板。我沒偷，不承認。一天晚上，一個叫吳子明（音）的老鄉來叫我走，我說我不走，我沒偷。他說，你還不明白，沒偷也要整你。我一下子想起上次「偷布」的事，馬上軟了。當天夜裡，吳子明把我送下了山。

八〉、我的婚姻和「翻身」的日子

從玉溪河工地回來後，有人來給我介紹個女人，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我以前也談過幾個女朋友，女方對我的人品、相貌、辦事能力等都沒有意見，但是，一說到成親，女方所有的親戚朋友都反對，說嫁給了我就是地主婆，將來要吃虧，要挨批鬥。最長的一個我談了一年，她很想嫁給我，可最後她還是放棄了。

這次，當介紹人把她帶來時，我已經 30 歲了。

她來相親，一件好點的衣服都沒有，褲子爛成刷刷，鞋子是個爛筒靴，到處是破洞。衣服補疤重補疤。她沒有媽，只有一個爸爸，爸爸爛酒（酗酒），成天叫她做事，做不完就打。我這兒有吃的，她一來，就不願走了。

我說：「妳不回去怎麼行，我們剛見面，手續都沒辦，連妳爸爸都還沒見過。」我叫介紹人帶她回去。介紹人有點怕她爸，不敢。

我決定冒起膽子上門去見她爸。我先買了 8 斤半肉，我聽人說，「8」是吉利數字，「半」表示「伴」（老婆）。還有，雙數也吉利。我到醫院去找了兩個瓶子，打了兩斤酒，買了 40 個雞蛋，20 把掛麵，都是雙數。

我見到她爸，送上這些禮物，他一下子就滿意了，留我吃了中午飯。就這樣，我有了老婆，有了一個完整的家。

吳世躍夫婦和他們的孫子

幾年後，老丈人去世，我回到安仁找我么舅，從此住在了安仁。

這個時候，已經是鄧小平說「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年代了，做生意不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要被抓、要被收繳。我以前流浪時走過很多地方，清楚哪些地方有什麼特產，價格怎樣。我們這兒 1 斤米換 3 斤土豆，每斤還要補 5 分錢差價。在天全 1 斤米可以換 8 斤。我把米拿到天全去換土豆，把土豆拉回來換米，我不要差價，土豆又好，很多人都找我換。

接下來我又做水果生意，我跑瀘定、康定、石棉（石棉出核桃），又跑阿壩州的小金縣，小金縣的水果又好吃又便宜，我賺了不少錢。

做生意的人多了，產地的水果價格漲起來，我於是轉到雲南，把雲南的鳳梨、香蕉、芒果等等，一車一車地拉回來，又賺不少錢。後來，聽說越南的水果便宜，我辦一張出境證，到越南去採購。越南的水果果然比雲南便宜，還可以到樹上去選摘。我選了一些長長大大的香蕉，拉回來我自己給它取個名字叫「香蕉王」。

我們這兒從來沒見過這種香蕉，稀奇得很，也好賣得很。我批發兼零售，又賺了大錢。

我水果生意做大了，人手不夠，便把老婆娘家那邊的人雇來當幫工，我成了一個小老闆。老婆回娘家，穿的都是時髦貨，我每次去，都提著好酒好肉。她娘屋的親友們高興得很，也羨慕得很，連連說：「她嫁好了，嫁好了！沒成地主婆，成了老闆娘！」

就這樣，我一步步掙下了眼下這筆家業，包括在安仁鎮中心地帶（也是與我媽媽出生地——劉湘公館——一街之隔）的三個旺鋪和住房。

採訪時間：2009 年 8 月 18 日、19 日、20 日

地點：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吉祥街 16 號 / 四川省邛崍縣冉義鄉

採訪後記

這是一次除秀山胡祖暖外最長的個人採訪——前後跨越了三天，地點分為室內、街上、和野外（墳地）。

吳世躍沒有讀過一天書，地名和人名都只知道音。但是，同他接觸，分明感到他的聰明和靈氣——這是不是那斬不斷的遺傳基因的緣故？

吳世躍個子比較矮小，這自然是多年「爬雪山、過草地」，吃樹皮啃草根的「長征」所致。他說，他能活下來已經是萬幸了。

想來也是。

不過，細細端詳，你能看到他眉宇間有一種端莊、一種穩沉和一種大氣，這不是一般的流浪兒所能具有的。雖然，不時有一種彷彿根深柢固的悲苦，烏雲般籠罩在他臉龐。

「吳老闆」在他的一個門面前。（2009 年 8 月）

不管怎麼說，他活下來了，並且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老闆。他的店鋪，與他母親的出生地——豪華的劉湘公館——僅一街之隔。

有人說，吳世躍的創業，比他外爺爺劉湘（國民黨上將，曾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赫赫偉業更加顯赫，更值得書寫。

看看他的一生，此話似乎不無道理。

第五章
幾個殘存的地主莊園及其人物命運

1949 年之前，在中國的鄉村，可以見到不少大大小小的地主莊園。這些莊園，集建築藝術、手工雕刻、儒家文化、傳統民俗等於一身，再與四周的自然環境巧妙融合，構成「天人合一」的寧靜與優雅。人們置身其中，可以感受到千百年來那一脈相承的文化內涵。

1949 年，中共奪得天下，暴力革命劈天而降，打斷了千百年來的那種和諧，那種「一脈相承」。

房子分了、家具搬了、樹木砍了、藝術毀了、書籍燒了……土改未毀的，大煉鋼鐵毀了；大煉鋼鐵未毀的，「文革」毀了；「文革」未毀的，「經濟開發」毀了。

大大小小的地主莊園，終於一步步玉殞香消灰飛煙滅。

莊園的主人——地主們，命運不如他們的家園。他們大多在土改時就一步到位地「玉殞香消」，未能目睹其家園的一步步衰敗，子孫的一掬掬血淚。

由於種種原因，本章所展示的這幾個莊園我都未能深入採訪，連究竟被殺了多少人都沒有統計到。眼下，只能提供這麼一點皮毛，但願能引起幾分聯想。

彭家大院殘存的一道側門

一、血紅的彭氏古祠

2003 年 3 月，三峽大壩蓄水在即，無數古鎮古蹟、奇石美景將永沉水底，我隻身穿越整個峽江，帶著一種「執手相看淚眼」的惜別悲情，按動快門，做一點掛一漏萬的存留。行到雲陽縣，聽說在江南岸，距那著名的張飛廟約十多公里的山中，有一座雕欄玉砌的古老祠樓，其建築藝術、其雕刻水準、其人文內涵，居整個川東地區之首。我當即渡江，沿彎彎曲曲坑坑窪窪的土路，找到了那藏匿在山中的百年古祠。在那兒，我看到了一樓殘敗的民間工藝，也聽到了一段血紅的人間悲劇。返渝後，這段「血紅」堵在心頭，不思量，自難忘。一個月之後，我又重返彭氏古祠，用相機和筆記下了這即將被歲月的江水永遠淹沒的「古蹟」。（這也是我作土改調查的開始。）

一〉、西風殘照　彭氏古祠

1760 年，一個叫彭自圭的人千里迢迢從湖北大冶來到四川。他先在萬縣龍駒壩賣燒餅，後又為別人當「扁擔」（苦力），挑棉花販運到湖北利川。數十年風雨，一輩子辛勞，到他 60 歲那年（1800 年），已是「萬元戶」的彭自圭開始建造宅院。這一造，整整造了 60 年，歷經嘉慶、道光、咸豐三朝，到同治三年（1864 年），一座川東地區首屈一指的祠樓和一座擁有 15 個天井的大宅院巍然聳立在長江南岸的群山之中。

60 年，幾代人！當地流傳：建造時石匠帶的十幾歲徒弟，完工時白了頭，徒弟

的徒弟又帶了徒弟。

彭氏宗祠建在四面環山、三面絕壁的山丘上，山下有瓦琢溪潺潺流過，四周竹木簇擁，人文與自然景觀巧妙地融為一體。祠樓建築面積 2651 平方米，由前門廳、正門廳、享殿、戲樓、天井、城牆、圍牆、廂房、箭樓及四角炮樓構成。祠樓屬石木結構九級樓閣式，三重簷四角攢尖頂，下六層為石砌牆底，全樓高 37 米。

彭氏宗祠裡殘存的戲樓

邁進厚厚的石門檻，左右廊下簷椽間，是一塊塊雲紋形墊木，兩面雕刻著各種栩栩如生的花鳥蟲魚。中心主樓下六層是重達噸餘的方石壘砌，二、三、四層，每層四面八扇石窗。底樓四面牆壁上鑲嵌著一方方青石，上有當時川東著名書法篆刻家彭聚星、劉貞安等撰文鐫刻的梅蘭竹石，此外還刻有「勤創業」、「正心術」、「和鄰里」、「慎交遊」的長篇家訓。現在，鐫文雖然殘缺，雕刻儘管破敗，但卻讓人感到極強的儒家文化氣息和濃郁的民間藝術美感。

彭氏古祠樓，包含了多少民間藝人、手工匠人的智慧和心血！可惜，它雖然巍然挺立在天地山川，一眼望去還頗有氣勢，但卻「病入膏肓」了：戲樓部分坍塌，簷下的匾不知去向，後牆上那塊九平方米的金粉精繪百壽篆被人毀損，雕花玉砌被「紅衛兵」砸爛，層層上好的樓板前幾年被拆去作了它用，四角炮樓現存一座……

彭氏古祠裡刻有「戒驕奢」戒文的石碑

村長陳大貴說：「1987 年，祠樓被列為縣文物保護單位，縣上撥了 2000 元來補了個漏，1997 年立為四川省保護文物，2000 年立為重慶市保護文物，保護級別增高了，來參觀的人也多了，常有官員的小車開來，但是，再沒來一分錢。」

不過，古祠樓還算幸運的，雖然病病懨懨，總還「活著」。（1985 年，鳳鳴區有些領導想要用祠樓的石料和木料修學校，準備將祠樓全部拆毀，幸虧區委書記戴修強力排眾議，「刀下留樓」。）

與祠樓一箭之遙的彭家座堂（住宅大院）就沒有這般的幸運了。這座占地 2000 多平方米、擁有 15 個天井、三道豪門、無數藝術雕刻的宅院土改時被「五馬分屍」，然後被分而食之。如今，僅有一道側門還比較完整地立在天地間。

住在院內的鄒新久老人是土改時分「勝利果實」者之一。他分了左廂的幾間房，

殘存的石雕藝術用作修豬圈灶台

彭之林的祖奶奶想生個兒子 專門做了這張床，這是整個彭氏家族倖存的唯一的一件古家具。

上世紀七十年代又花 800 元從政府手裡買了幾間。他把那些拱門、雕欄、石刻通通拆了，修了一個經濟實用的大豬圈。我在他的「新居」裡看到牆角屋簷到處都是殘存破碎的「石刻藝術品」。

宅院沒分完的中間部分屬於區財政所，上世紀八十年代，財政所一股腦兒把它變成了銀子，買方把那些雕花藝術一股腦兒變成了兩幢灰白色的磚房。陳氏的百年老宅和「民間工藝」終於灰飛煙滅。

地主子女彭義堯說：「我小時候，那些簷、樑、柱都有雕刻，還塗有金粉，印象最深的是晚上月亮出來，照在飛簷樑柱上，金晃晃的，美得很……」

座堂宅院裡，以前還有無數的雕花木椅，龍鳳古床，都是精美的手工藝術品。

彭義堯的妻子賈紹英說，她記得有一張大床，渾身都是雕刻，床前還建有三道雕有人物和花鳥蟲魚的門。這些地主財產要嘛做為「勝利果實」分給了「翻身農民」，要嘛做為「封資修」的黑貨被紅衛兵砸得一乾二淨。不過，我在半山腰一個叫彭林之老人的家裡，見到了倖存的唯一的一架古床，該床已有 180 年歷史，是彭林之祖奶奶留下的。彭林之說，文革時他把床拆散了一塊塊藏起來，古床因此得以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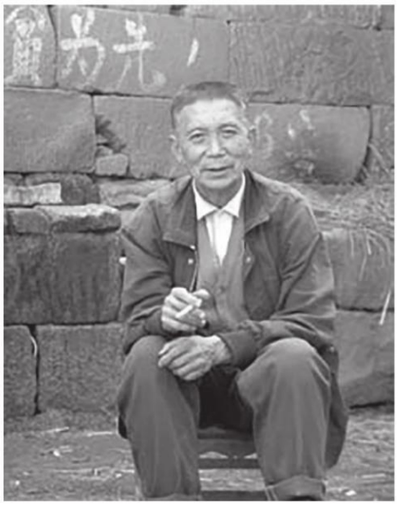
二〉、烈日高懸玉殞香消

1949 年，共產黨來了，彭氏家族的 30 多條生命驟然消殞。

在彭氏古祠下、在殘破的宅院裡、在農家小壩上，我逐一採訪了彭氏第六代子孫彭義堯、彭兆民、賈紹英、陳邦英（彭定國之妻）；當年民兵李朝富、邱德才；

土改時分「勝利果實」的貧下中農鄒新久、村長陳大貴等。下面是採訪到的被打死（整死）的 30 多人中的一部分。

彭義堯的父親叫彭達楠，共五兄弟：彭達楠、彭達杞、彭達桑、彭達渠、彭達操。1950 年，五兄弟同時被抓，幾個月後被槍殺於雲陽縣鳳鳴鎮李市鄉。彭達楠的二兒子，現年 67 歲的彭兆民老人講述了 50 多年前的那一幕：


彭兆民在他家門前

彭兆民：解放不久就開始打（殺）人，第一次打了四個，其中有我老漢（爹）的叔伯兄弟彭紹文。彭紹文是鄉長，肯定要被打。但他沒幹任何壞事，他有文化，不准打架鬥嘴，我記得他最恨吃鴉片，同後來政府提倡的差不多。他遭打時 30 多歲。

我老漢他們關在鳳鳴，有 15 里，我天天去送飯，同那個 99 團搞熟了。我最喜歡打籃球，那個團長也喜歡打籃球，我們經常在一起耍。後來他們部隊要走，專門拿兵來喊我去耍最後一回。他說，他很想把我帶走，但是莫法子（沒辦法）。他告訴我，你不要承認你是地主，你老漢剝削人，你是讀書娃兒，沒剝削。

我老漢那一批打了十個，除了老漢五兄弟，還有一個縣長，記得姓薛，一個科長，也姓薛，一個叫張志幫（音）的國民黨軍官，還有一個不認得。我親眼目睹了那個場面，打完一喊散會，我就上去了。

我老漢的（槍）眼子打得好，後頭一個眼，前面額眉處一個眼，臉沒爛。有的打得只剩半邊（臉），有的腦殼蓋蓋都沒得了。那個縣長頭打爛了，全是血，他太太上來，哭得傷心，認不出哪個是她男人。我說我來幫你認。她哭得站不住，扶倒我的肩頭，問：「你是哪戶的？你認得？」我說你男人到我們院子來打過麻將，我認得。

據說那個縣長救過劉伯承的命，他把劉伯承藏在自己家裡，躲過大難。分手的時候他們兩個約定，今後你有難我要保你，我有難你要保我。縣長被抓後給劉伯承寫信求救，但是沒有救到他的命。

我還記得那個 50 多歲的李老大，是個下力人。他走上來，掏出一大把草紙給我老漢他們擦血，民兵不准。李老大跳起來說：「不說別的，我一個下力人，每回進他們彭家大院，至少都給我泡了杯濃茶，這就對，對得起人。我買點草紙給他擦擦血，我相信你把我也打了？！」

我老漢他們五兄弟都是我找人拖去埋了的。怕不怕？不怕不怕，有啥怕的！現在啷個想？有個莫子（什麼）話說！那個政策來了，你啷個做？你還反抗得了？

採訪後記

彭兆民的家緊靠在彭氏古祠的高牆外，是一個陰暗、潮濕、低矮的偏棚，他沒有兒女，老婆多病，家裡幾乎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夜深沉，孤燈昏暗、靜寂，彭兆民顯得比較興奮，難得有人在冷冷清清的夜晚，走進他冷冷清清的偏棚，陪他悠悠閑閑地抽煙聊天。

聊的是那一幕家族的血腥，但我看不到一點沉重和悲憤，老人彷彿是在講一個別人的毫無新奇的故事。

三〉、「毛主席來了，好哇，分東西！」

80 歲的邱德才老漢是我偶然在古祠的大門外遇上的。他告訴我，他們邱家同彭家一樣，都是從湖北來四川的。下面是我們的對話：

邱德才

邱德才：「解放了，毛主席來了，好哇，分東西！那個大院、田土，都分給我們，翻身嘛，過幸福日子。」

「你覺得該不該分？」

「該呀，他剝削嘛。他們彭家釀酒，不喝酒，我們邱家的人喜歡喝酒，被彭家剝削，窮了嘛。」

「除了剝削，他們彭家是不是幹了很多壞事？」

「壞事倒沒得，老爺還和氣。這座樓子（即彭氏宗祠）他們拿來辦了個小學，叫私立育才小學，都可以讀，不要學費，但書本費要個人出。」

「那你認為殺他們全族冤不冤？」

「有啥子冤嘛。他們彭家的運到頭了，該家破人亡。彭家到解放那年是『達』字輩，『彭』遇『達』肯定要遭殃（注：「彭」與「盆」同音，而「達」在四川方言中的意思是「摔」。「盆」一「摔」就破），那個時候，分東西，高興得很哪，積極。殺人嘛，上面的政策。我是民兵，彭達楠他們五兄弟就是我親自押到刑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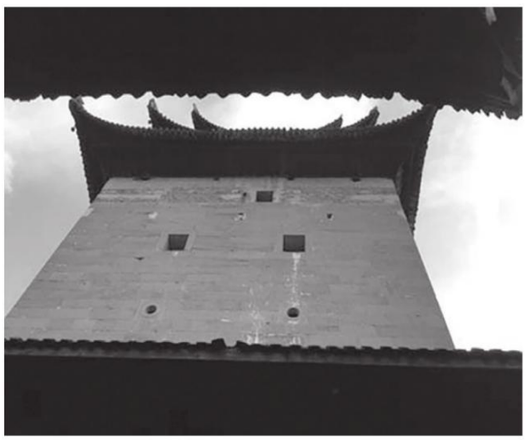
四〉、「黃姑娘」遇難記

第一次採訪時，我聽說了一個叫「黃姑娘」的故事，正是這個故事，促使我又來到彭家樓子，從此開始了對土改的調查。

這一次，我從彭義堯（「黃姑娘」的大兒子）、賈紹英（彭義堯之妻）、陳邦英（「黃姑娘」的三兒媳婦）、陳大貴（村長）、李朝富（當年的民兵）等人的口中詳細瞭解到了「黃姑娘」的一生。

「黃姑娘」叫黃世英，出生在一個貧苦農家，5 歲那年，她被賣到彭家大院當丫頭。十多年後，黃姑娘出落成一個漂亮而豐滿的大姑娘。老爺彭達楠悄悄對黃姑娘施以「恩愛」，黃姑娘懷上了身孕。

懷孕被發現後，黃姑娘被拖到天井跪下，她不得不招出了老爺彭達楠。既然是老爺，人們便不好多說。家族經過協商，同意把黃姑娘做為彭達楠的小老婆，但仍需繼續幹丫頭的活。


把她抓到彭氏古祠的高牆內

1949 年，黃姑娘已經有了彭義堯、彭兆民、彭定國三個兒子。

土改時，男人被槍斃了，黃姑娘全家被掃地出門，住到了大院對面一個山壁下的凹洞裡。幾個月後的一個傍晚，黃姑娘勞動回來，幾個民兵說她偷了紅苕根，把她抓到彭氏古祠的高牆內。在遭受了整整一夜的折磨後，黃姑娘走完了她 30 多歲的人生。下面是黃姑娘大兒子彭義堯的講述：

彭義堯（1936 年生）：媽一夜都沒回來，我們也不敢問，地主嘛，要啷個整就啷個整。我們沒得吃的，最餓飯就是剛解放那幾年，比後來的饑荒年都凶（可怕）。那時我們小，求不到食，天天吃野蔥、折耳根、黃豆葉、豇豆葉、四季豆葉。媽哪裡敢偷紅苕？不整死你？

彭義堯：「地主嘛，要啷個整就啷個整」

那天早上，李朝富他們在樓子上喊，叫我去把媽揹回去，說她得了病。我跑去看，媽好像沒氣了，但身子還是軟的，人還沒有冷，還揹得，硬了就揹不起了。我才 15 歲多，又餓飯，她搭在我肩上，我半揹半拖地把她弄回到壁洞。她沒吭一聲，也沒睜眼，我想她當時可能已經死了。

是我埋的她，就埋在壁洞下面的河溝邊，只有一床蓆子裹我媽。

啷個弄死的？那幾個民兵不懂事，用鋼條捅她的下身，小腹來血，遭捅死了。

幾個民兵？那天晚上有四個，譚善富、李朝富、譚遠餘、還有一個忘了名字。現在只有李朝富還在，就住在對面山坡上。找過他沒有？找他有莫子用？

五〉、狗雞巴你不懂階級鬥爭嗦！

第二天一早，我下到埋過黃姑娘的河溝邊。默默站了一會，然後從她住過的那個岩洞處攀岩上去，尋找山上李朝富的家。在半山坡上的一家農舍前，我找到了李朝富。

黃姑娘一家在土改時住的岩洞

李朝富：解放後我在共產黨裡頭幹了二、三十年，土改分果實，清匪反霸當民兵，發了步槍。那個時候積極得很，又不評工分，自覺自願鬧革命。地主解放前享福，我們受好多年的壓，他那個日媽的，該殺！我們打了（彭家）幾十個。我們武裝隊那個白（音）隊長，抓的地主有個光身子，白隊長說他冷，還給他衣服穿。我說，狗雞巴你不懂階級鬥爭嗦！你是個莫子武裝隊長？政策都不懂，腦筋不活動，他是階級敵人，是嘛？他剝削你，是嘛？白隊長後來受處分……

我打斷他，問起黃姑娘的事。李朝富高亢的聲音一下子低下來，有些吞吞吐吐，幾乎聽不清。

李朝富：「她是害病死的，幾個娃兒拖起，沒得吃的……」

問：「她死在哪裡？」

李：「死在樓子頭倉房裡。我說把她放了，喊她娃兒來把她媽弄回去。」

問：「樓子裡有幾個民兵？」

李：「四個。胡雲松（音）是隊長，我是副隊長，他們幾個都死了。」

問：「你們打沒打黃姑娘？」

李：「沒打。黃姑娘不討厭，她是個當丫頭的人，罪惡不大。她當不到家，是大媽當家。」

（我追問沒打怎麼就死人了，李朝富避而不答。）

李朝富

六〉、就是這樣整死的

2016 年 8 月 10 日，我第三次來到彭氏宗祠，在樓子裡，遇到了村裡 70 多歲的邱河法老人

我們邱家入川比彭家還早。彭家釀酒，賣酒，買土地。那時收成彭家收租 40%，佃戶得 60%。

土改時我還小，只有幾歲，大人帶我去看過鬥地主的大會。具體怎麼整地主我不清楚，只是聽說整得狠毒。黃姑娘挨了好多鬥，搞「猴兒搬樁」，整得慘。

問：聽說黃姑娘就是在這個樓子裡整死的。

邱：是的，不僅把她強姦了，還用鋼條從她下身穿進去。

問：當時有四個民兵參與，其中有李朝富你知道吧？

邱：嗯，那時有李朝富。這些歷史你怎麼清楚？

問：我第一次來時就聽說，說用鋼條捅她下身，捅出血了，是吧？

邱：嗯，就是這樣整死的嘛。

問：李朝富他們把黃姑娘整死後受處分沒有？

邱：那受什麼處分？整死地主反而還有功。李朝富後來當了隊長、社長。

彭氏大院的進門

彭氏宗祠殘存的圍牆

七〉、算了，莫說了

陳邦英（72 歲）是黃姑娘的三兒媳婦。13 年後我再見到她時，她已經白髮蒼蒼。此時，黃姑娘的大兒彭義堯、二兒彭兆民、民兵邱德才、李朝富等都已不在人世。

陳：這個院子和那個樓子，是我公公的爸爸他們修的，他們三弟兄，彭伯海，彭伯英，彭伯涵共同修建的。以前這兒很大，有 15 個天井，一直修到後面山坡上。

問：黃姑娘是你婆婆吧？

陳：是的，她是小媽，大媽姓涂，土改向她要金子，她嚇得上吊死了。

問：聽說黃姑娘死在那個樓子裡了。

陳：莫說，算了，說起心裡難過。不想說，那個時候時代不同，沒得辦法。

問：黃姑娘長得可以吧？

陳：我嫁來的時候她已經死了，他們說，黃媽人材不錯喲，高高大大的。

問：是不是用鋼條捅她？

陳：是的。她兒子把她揹回來，血淋淋的，揹到那個溝下面來埋的，裹了床爛席子埋的……算了，莫說了，人走都走了。

問：她的墳後來遷到一個石壁裡了？

陳：遷墳是我去的，他們成分不好，不敢去，我是貧農出身，我敢。我在土裡撿她的骨頭時，光著手刨，膠手套都沒有。現在他們三弟兄都不在了，上墳都是我去，給黃姑娘上墳，也給大媽上墳。

陳邦英在殘破的彭家大院前講述

問：李朝富呢？

陳：李朝富也死了，長瘡爛死的，全身到處都爛。做人吶，不要去害人、整人，要講良心。我們良心好，我的後人都可以，我的孫孫高考考了 683 分。

陳邦英的家就在那道唯一倖存的「豪華」側門下。她最初不要我進去，說屋裡又破又髒。她提起丈夫彭定國時很傷心，說他是個好人，又心靈手巧。但由於是地主子女，被迫去山裡井下挖煤，吸了大量煤塵，肺爛了，死得很痛苦。

1976 年，葬黃姑娘的那塊河溝地要開發種莊稼。彭義堯幾兄弟怕挨鬥，不敢去遷母親的遺骨，黃姑娘的三兒媳婦陳邦英仗著是貧下中農出身，扛一把鋤頭，挖出了黃姑娘的遺骨。彭義堯選了一處人不容易去的陡斜岩坡，在石縫裡重新葬下了母親。他說：「這個蕩子（地方）要得，妨礙不到別人，不會有人來挖地。」2003 年 4 月 15 日，老人帶我一步一步下到了岩坡，拍下了這張照片。

採訪時間：2003 年 3 月 10 日，
2003 年 4 月 15、16 日
2016 年 8 月 10 日
地點：雲陽縣裡市鄉黎明村彭氏莊園

採訪後記

雲陽著名的水下石林在三峽蓄水前被切割了；雲陽刻有歷代古人詩詞的龍脊石被江水永遠埋葬了；彭氏古祠和發生在它裡面的故事呢？

十三年前，2003 年 3 月，我第一次到彭氏莊園，偶然聽說了黃姑娘的死因，當天我就決定馬上進行土改調查。但是，當時有其他人在場，而我還處在「取保候審」

時期，因此只得返回。

一個月後，我獨自悄悄來到彭氏莊園，開始了前後長達十餘年的調查走訪。可以說，是黃姑娘「促使了」這部土改採訪調查錄的開始。

十三年後，調查錄早已完成，我開始著手製作土改紀錄片，為拍攝外景，我第三次來到彭氏莊園。

十三年前，樓子裡的上好木板被鄉政府拆去做了他用，百年古祠在風雨中艱難地支撐；十三年後，旅遊業是個來錢的行業，為此，當局派來一個施工隊，要把古祠變成築巢引鳳的梧桐。

十三年前，我曾在樓子外的破房前同黃姑娘的二兒彭兆民屈膝夜談；十三年後，彭兆民老人已然作古，他的破房前散亂著河沙水泥。

十三年前，在古祠前偶然聽一個農民說起了死在裡面的黃姑娘，十三年後，又在這兒偶遇邱河法老人。不出所料，老人也知道黃姑娘在樓子裡的遭遇。

十三年前，我曾問彭義堯：「你們都知道是誰害死了你母親，後來雙方又在同一個生產隊，天天見面，有什麼感覺。」彭義堯回答：「那個時代是這樣嘛，沒得辦法。」

十三年後，我向陳邦英問起黃姑娘的死，她反復說：「算了，莫說了，那個時候時代不同，沒得辦法。」

我第一次離開古祠的當晚，雲陽大雨傾盆，第二次離開時烈日如火，第三次離開時，夜色蒼茫。

陳邦英送我到大路邊，我望著她和她身後寂靜的田野，不由心生感想：這片古老的土地，多麼利於罪惡的生長和生存。

補記

據彭家後代和村民們說，彭氏家族五十年代被打死（含自殺）的有 30 多人，但是，我沒能一一採訪到詳情，村長帶我跑了好幾家去找彭氏宗譜，都沒找到。

有些遇害者的名字，彭義堯、彭兆民老人也記不清了，以下是他們記得起的幾位：

彭壽柏，與彭紹文同時被殺，死時 20 多歲。

彭河生，單獨一個人被槍殺，年齡不詳。

彭叔康，死在勞改隊，死時年齡不詳。

涂延桂，彭達楠的大老婆。民兵逼她交金銀，她交不出，恐懼中上吊自殺。

此外，連同已知的彭達楠、彭達杞、彭達桑、彭達渠、彭達操、彭紹文、黃世英（黃姑娘）共十一人死於土改運動。

二、陳氏莊園，殘照悲烈

——重慶市涪陵青羊鎮陳氏大莊園的藝術雕刻及人物命運

在烏江與長江交匯的涪陵，有一個青羊鎮，該鎮曾有十個大地主莊園——統稱「陳萬寶莊園」。

以前有一個說法：川西劉文彩，川東陳萬寶。

1949 年，共產黨來了……幾十年風雨掠過，血紅殘照裡，默然回首——

人，殺了；

財產，搶了；

墳，「敞」了；

文化，毀了；

……

一切幹得「偉大、光榮、正確」！

陳氏莊園裡的殘墓前，豎立的石柱雕名為「華表」，是地位、身分的象徵。

一〉、陳氏家族唯一殘存的莊園

在烏江與長江交匯的涪陵，有一個青羊鎮，1720 年，一個姓陳的人（族譜上稱他為「我仁公」），攜妻帶子，一人一個鹽蛋作菜，由貴州思南安化縣入川。

石龍井莊園殘存的戲樓

他們風餐露宿，一路坎坷，來到青羊鄉安鎮壩的古墓台、黑箐子等處。

山川秀麗，風和雲祥，我仁公一下子愛上了這片土地，於是停止漂泊，紮根耕耘。

歲月悠悠，陳氏傳到了第五代「萬」字輩。數十個同輩人中，出了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陳萬寶（1807～1876）。此君頭腦精明，視野開闊，善經商，有文化，經過數十年辛勤經營，他將整個家族和產業推到一個嶄新的高峰。

錢財、田土、糧食、連同傳統文化、建築藝術，齊頭並進，陳氏莊園在烏江東岸光彩四射。

到 1949 年，陳家已發展到擁有 10 個大莊園，田地 40 餘萬畝，年收租穀 40 多萬石，金銀財寶不計其數，子孫遍布海內外的繁華境地。

當地有個說法：川東陳萬寶，川西劉文彩。

十大莊園之一的大路片莊園殘跡

這一年，共產黨來了，槍聲爆響，殺聲四起！陳家的人，死的死，抓的抓，逃的逃，散的散……地主陳一村、陳德寬、陳德厚、陳德宣、陳世屏等人倒在血泊中；地主陳德宗、陳希頤、陳淵明等人被抓入大牢……

十所豪宅大院，無

殘存的石壩莊園一角

論是分給農民的「果實」，還是收繳為國家的「財產」，或者是把「果實」又收回來做為國家的「財產」，沒有一個完整的保存下來。土改後，「國家」和農民沒有認識到這些「果實」是珍貴的文物和精美的手工藝品，有的被火燒，有的被變賣，有的被拆毀。如新屋嘴等宅子被燒毀了；如陳昌應的宅子被糧店拆了，木料賣成了錢，守門的石像又被酒廠拆了一對……古老的家具更是被農民廉價出賣，一張雕了八仙過海的木床，20 塊錢就賣掉了。還有的人把做工複雜、雕刻精美、大得像一座小房似的床劈了當柴燒，說放在那裡占地方，礙手礙腳……

現在，屍骨最全的是石龍井莊園，但也只剩下殘破的半壁河山。

我曾先後三次進入石龍井莊園，用目光和心靈觸摸這唯一倖存的「半壁河山」。

石龍井（現稱為「陳萬寶莊園」）修建於 1862 ～ 1874 年。據記載，為修建這座莊園，300 多個木石工匠用了 12 年時間，共耗費白銀 10 萬餘兩。它以前占地 11 畝，有房間 120 間，建築總面積 1 萬餘平方米。莊園內，戲樓、天井、花園、水池、倉庫、碾場、槽坊、圈舍等一應俱全，其工藝水準、藝術手法堪稱我國清代川東民居建築的典範之作。

石龍井的整體布局充分展示了中國傳統建築講求對稱平衡的特徵。不僅房屋呈對稱分布，就是每一間房屋的一垛垛牆、一道道門、一扇扇窗，甚至房頂的一根根樑柱，窗前的一幅幅窗花，也都呈對稱分布。天井和花園也如此，左邊是牡丹園，右邊是芍藥園；左邊是荷花天井，右邊就是菊花天井；左邊有櫻花園，右邊就有蘭桂園。陳萬寶還在園子裡栽種了兩棵棗樹和兩棵枇杷樹，取枇杷結子多和棗與「早」的諧音，希望自己的後輩子子孫孫早生貴子，多子多福。

倖存的「半壁河山」

莊園後邊的石壁上開鑿出的兩眼水井，一年四季泉水長流，旱季不枯，雨季不溢。任憑怎樣取用，水位都不會降低半分。當地流行一種傳說：這井底藏著兩條石龍，常年累月向外吐水。這也就是「石龍井」名字的由來。

石龍井莊園的雕刻藝術十分精湛。

戲樓上的殘雕

院壩前面的戲樓上，前後的屋簷上、挑樑上，四周的木柵欄上，隨處都雕刻著精美的花紋圖案。尤其是戲臺前的橫樑上，雕鏤著一齣完整的戲劇故事和熱鬧的飲宴場景。幾十個人物各具情態，人物衣飾折皺歷歷在目，神態動作栩栩如生。

雖然歲月的風吹雨打褪去色彩，露出木頭本色，但卻更顯古樸。

可惜，這些雕刻損毀嚴重，已經殘破不堪。兩重的八字門上，本來有著木雕的門神，文革時被人用刀削去，只剩一片凌亂的刀痕。門神常見，但多是張貼的木版年畫，直接刻在門上的門神浮雕就很少見。院內的石雕也支離破碎，缺胳膊少腿，抱著小猴的母猴大多母子離散，石獅子見首不見尾，戲臺上的木雕人物大半沒有保住腦袋。

可它殘存的雕刻依然是那麼美！

天井裡有幾口保存相對完好的石缸，它們有的淺雕、有的浮雕、有的圓雕、有的鏤空，手法不同，風格各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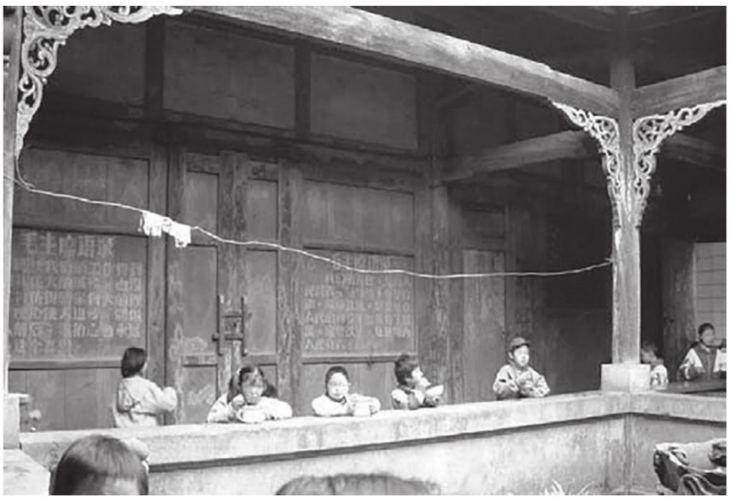
芍藥園天井中的雲浪朵石花缸，缸沿內雕刻的獅子和犀牛，皆作盤臥之狀；缸身上雕刻的六幅人物故事，都採用浮雕手法。蘭桂園天井中由 6 個花瓶組成的石缸，則採用陰刻手法，雕刻有蘭草、菊花等圖案。牡丹圖還刻有劉禹錫的名句：「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戲臺兩旁邊各有一個長方形魚缸，上面雕著蝙蝠、荷、桃等，即使布滿青苔，也仍可看出雕功的細緻精湛。尤其令人驚歎的是後院一個天

後院天井中的石雕荷花缸

井裡的石雕荷葉花缸，花葉千姿百態：正面、反面、側面、盛放的、含苞的、半開的，無不刻得細緻入微。花缸裡面還雕有青蛙、龜等小動物。四周還有一些石柱圍繞著花缸，聽說以前上面放著石花盆，雕得也非常美麗，後來東一個西一個被人抱走，現在上面放一些盛土的搪瓷盆子，胡亂種著一些花花草草。

花缸所在的天井有一個入口，兩旁由兩個石獅把守。和傳統中兇惡的守護石獅不同，這兩個獅子充滿母性的溫柔，它們伸著舌頭，胸前都有著一個小石獅，正仰著頭舔食它們舌上的食物。以這樣的形式守護花缸，動物植物都非常和諧寧靜。

院壩和天井的石欄上，雕刻著兩兩相對的石獅、石猴、石麒麟，以及蟠桃、佛手、石榴等仙界珍果。它們都是在石欄上面直接雕刻出來的，與石欄組成一個珠聯璧合的整體。


寫滿了毛主席語錄的莊園得以在文革中倖存

莊園樑柱縱橫、檁椽密集，大小木作結構均採用當地盛產的優質柏木。加之做工精巧、工藝考究，榫縫結合緊密牢固，雖經歷百年風雨滄桑，卻沒有一根房樑和柱子歪斜、坍塌。

莊園內每一間屋子的窗花圖案也豐富生動：有的是彩蝶、玉兔、飛鳥、奔馬等動物；有的是荷花、牡丹、蘭草、紫藤等植物；有的則展現春、夏、秋、冬四季意境。這些裝飾，與房屋外邊的大自然和諧統一。

莊園的牆基、天井、欄杆、院壩，幾乎全部用青砂條石鋪就，最大的石頭重達10多噸。這麼巨大的石頭，在沒有汽車和起重機的140多年前，是用什麼工具運來，無人得知。

石龍井之所以逃過了文革的劫難，全靠有人在它的四壁上寫滿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語錄。如今，這些語錄尚殘留在莊園褐紅色的木牆和灰白的石壁上。

由此，這個集古代建築工藝和文化藝術於一體的古老莊園得以倖存下來，並於1987年被列為涪陵縣「文物保護單位」。

但是，1995年，涪陵一位分管文化與教育的共產黨官員一聲令下，這個逃過了文革浩劫的「文物保護單位」被活生生拆毀了一半！

（「文物保護」在權勢面前不過是一個聽人使喚的丫環。人都可以隨便殺，莊園又算什麼？）

陳氏家族氣勢不凡的十大莊園，終於只剩下了石龍井一個殘破的「半壁河山」。

陳家曾有數十座大大小小的墳塋。那是一部集儒、道、釋為一體的「陰宅文化」。現在，絕大多數墳墓已被毀，其中包括巨大的陳萬寶本人的墳墓。（它在「農業學大寨」時被農科所拆毀，石料等做了他用。據說，該墓巨大，僅墓前的石壩就占地幾畝，墓上的雕刻更是精美絕倫。）

這是陳氏十大莊園最後的一點遺存，還被高樓毀掉一半

殘存的墓塋也沒有一個是完整的，它們全部被「打開」過。（當地人叫「敞」墳——即把墓挖開，或炸開，搜尋裡面的財寶。）

好在當時人們對墓上的石刻藝術和文化不感興趣，沒想到那也可以拆下來賣錢，另外，如果它碰巧又躲過了大破「四舊」的瘋狂，那麼，就還能看到一點祖先「陰宅文化」的文化遺痕。

很幸運，我看到了。

陳氏莊園殘存的墳塋，它孤零零立在鄉間雜草亂藤中，夕陽如血，孤光自照……

二〉、二聲槍響，一道奇冤

——記陳氏「止廬」院主陳一村

陳一村（世哲），早年外出讀書，曾就讀於上海黃埔軍校，後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專攻法律。

在一次返鄉途中，陳一村所乘坐的船被土匪搶劫，此事對他刺激很大，逐決定歸隱鄉間，遠離塵世。他將自己居住的「朝門」莊園改名為「止廬」，並題寫了一副對聯和一段文言鐫刻在石門上。該石門尚存，只是字跡很有些不清，全文如下：

入望皆智水仁山好誦韓公磐谷序
所載是剛經柔史堪稱董子讀書堂

題詞（主人自題）：

廬以止名，言其靜也。夫今日何日？滔滔之日也；今世何世，擾擾之世也。此而不務其靜，胡以自愛？此地「止廬」建此廬，以遂？澗之思。身靜則不勞，心靜則不爭。林泉自適，息交絕遊。雖非桃源，亦無殊於栗里。淵明詩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其所情景此乎。

陳一村在家鄉辦了一所小學「華楠學校」（抗戰時期），親自編寫教材並任教，為鄉村教育出錢又出力。

1951 年，土改工作組將陳一村抓起來，匆匆忙忙槍殺。下面是一位當年曾當過共產黨某官員警衛員的唐炳合老人的口述（青羊鎮文化廣播站記錄）：

「……工作組的劉雲戶、X 炳全等 10 餘人，就令將陳一村押到四合頭莊園參加了 1000 多人的批鬥地主大會……鬥後將陳關押在四合頭，第二天早上七點，先槍斃，後開（批鬥）會。是石大開打第一槍，熊一開填槍。（憑此次「英勇」，熊一開當上鄉長。）

……接著去陳一村家抄家，砸爛立櫃，第一層是共產黨的書，第二層是共產黨的黨旗，第三層全是共產黨的書和檔資料。另外，在樓房的牆上，發現陳一村特地嵌入了幾塊刻有五角星的石塊。工作組進一步瞭解，發現陳原來一直都向著共產黨，嚮往共產主義美好明天……

講述和資料提供者：熊中聖（44 歲，青羊鎮文化廣播站幹部）；
陳昌齡（83 歲，陳氏莊園最後一個老地主）

三〉、一張年曆，四條人命

——記陳萬寶莊園最後一個老地主

講敘人：陳昌齡

「四十多年了，我一想起就傷心。」

在涪陵青羊鎮外約一公里的地方，從公路下去，沿一條田間小路，拐幾道山彎，來到一個小村子。

村子很小，只有三、四戶人家。經人指點，我在村另一頭的一間平房裡看到了他。

不需詢問，一眼便認定是他了。

老人戴著一副眼鏡，穿一件乾乾淨淨的白襯衣，從裡間的灶房走出來。

四周一切都是地道的農村特色：柴火、豬圈、糞池、菜地，但老人斯文清秀，一副老年學者的儒雅像，與四周環境形成反差。

陡然見到陌生人，老人一怔，隨即很禮貌地把我們請進屋。

屋子很小，分裡外兩間，裡面是灶房，外面是臥室，屋子沒有天花板，也沒有窗戶，抬頭便見到屋瓦。

有人來看他，老人很興奮，連忙給我們端凳子。問起往事，老人一下子變得很沉重，但終於斷斷續續講出了他和他一家的遭遇。

我不想提以前的事，前不久，鎮上的幹部叫我寫點回憶（陳萬寶莊園現在有些名氣，當地領導想搞旅遊開發）。我不寫，想起過去的事就傷心。人老了，不願太傷心。

我給你說說，有些話你不要記。

我們陳家是個大家族，你看看這兩本族譜就清楚了。家族很重視教育，子女都要送去讀書。解放前一年，我在成都光華大學讀書，學的是經濟。1948 年 12 月 28 日，我在重慶同董筱蘭（1927.6.4 ～ 1960.1）結了婚，她是成都雙流縣人，高中畢業。結婚時我 26 歲，她 21 歲。

婚後我同妻子回老家拜見母親，本想下半年返回成都繼續學業，不料家裡出了一些事，母親要我留下來處理。這一耽誤就遇到解放。共產黨、解放軍來了，我被劃為地主。他們把我抓去關了七天，但沒有殺我。這可能同我一直在外讀書有關。後來，1956 年到 1959 年，還讓我當了三年小學代課教師。

1959 年，突然給我加了三條罪名，一是砍伐森林，二是大鳴大放攻擊黨，三是……你看，想不起來了。總之，三條都是不實之詞，很荒唐的。比如砍樹是隊裡批了派我去砍的。他們把我捆綁起來，押到龍潭去批鬥，並根據這三條，判了我二年管制。

緊接著就是那場大饑荒了！那個餓呀……我們當地主的就更慘，全家 10 個月沒吃一粒米……我人餓變了形，皮包骨，路都走不動仍然強迫我出工勞動，我說我沒得力，那個武裝（即民兵）抓起耙子劈頭蓋腦就是一頓打。我看那陣勢，不逃肯定要死在這兒。於是，一個漆黑的夜晚，我同我的一個親戚，他身體還比較強壯，連夜往涪陵逃。

那一路上刻骨銘心！到處都是死人！那些死人都沒有衣服，衣服被活人扒走了。當時我就想起孟子見梁惠王時說的話「民有饑色，路有餓殍」。

啷個不死人嘛，那些年，從生產隊起，大隊、公社、區、縣，層層往上虛報產量，不多報不行，要挨整。

天要亮時我們逃到蒲江，那兒有我一個親戚，他給我吃了兩個紅苕。第二天到涪陵，從涪陵乘船到重慶。

陳昌齡的臥室、廚房以及門外一個沒有養豬的豬圈，
這便是這個陳氏大莊園最後一個老地主的全部家產。

重慶的親戚看到我那副模樣，很是吃驚，他們聽宣傳，以為農村好得很，我去了，是個樣板。親戚給了我一塊錢，我坐車去了井口，我有個親戚在那兒當農場的場長。他收留了我，給我一口飯吃。大約半年後，我接到信，說我妻子董筱蘭餓死了。我慌忙往家趕，但還沒到家，就被抓起來，說我是盲流，抓去幹義務勞動。

我一邊幹活一邊申請，請求回家照看三個孩子。後來，終於批准我回家。

我走到上面那個坎子邊時，遇到隊裡的一個人，他衝我說：「陳昌齡，你還回

來啥子嘛，你一屋人都死完了。」

我身子一軟，一屁股坐在地上起不來……

（老人哽咽，說不下去。）

鄰居說，她們餓得受不了，撿溝溝裡的菜葉子吃。先是三歲的么女餓死，她媽媽埋的她。接下來就是妻子餓死，鄰居埋的她。再接下來是二女餓死，她姐姐扛著鋤頭去埋她，大女還不到十歲，她去埋六歲的妹妹……

（老人再一次說不下去）

最後輪到我大女了，我叫她么么，她讀書成績最好，非常聰明。那時辦了醫院，他們把么么送到醫院，她死在那兒。

四十多年過去了，我一想起就傷心，不想提。我當年寫了幾句話，幾十年了我還背得，背給你聽聽：

五九年，災禍臨
瘟疫禍及各家門
妻埋女，甚傷情
從此永別幼女生
鄰葬妻，歎可惜
兩女哀哀無母依
次女死，長女葬
荷鋤埋妹盡胞情
長女逝，整 10 齡
鄰里皆歎這家人
妻女逝，我倖存
人亡家破何欲生
人亡家破何欲生

我想死了，不活了。

老人背到最後一句時，聲音異常沉重地補充說：「我都想死了，不活了。那時無所謂，死就死。我們那個集體食堂，120 多人吃飯，餓死了 80 多人。」

但是老人活下來了，孤身一人到現在。問起他後來為什麼不找個伴，老人回答說：有人給我介紹了黃家的一個女人。黃家是一個大家，有 18 口人，饑荒年之後只剩下 4 口，黃亞香（音）、XXX、XXX、XXX（未能記下名字）。那個女人的丈夫進了勞改隊，死在裡面。我沒有同意，主要是她沒文化，我希望妻子有文化。

改革開放後，給我摘掉了地主的帽子，但沒給我安排工作，本來我是大學生，

「解放」五十多年來，黨的光輝第一次照到了陳昌齡的家——一張2005年的年曆。五十多年來，「一張年曆，四條人命」。

最適合搞教育，但他們說我58歲了，幹不了幾年，就要成為國家的包袱。這樣，我只好在家裡養雞。60歲那年，我外出打工，到重慶一個親戚辦的小廠裡搞財會。沒幹多久，廠效益不好，辦不下去，我又回來了。現在我是村裡的「五保戶」（即無依無靠的孤寡老人），區裡每月只發給我80元錢。這點錢很緊，因為我連柴火都得花錢請人搬。現在眼睛又出了毛病，白內障，看不清東西，去年7月1日摔了一跤，現在都沒好……

對了，今年2月1日春節前，鎮裡面有幾位領導來看了我，給我送了張日曆來，這是幾十年來破天荒的第一次……

採訪時間；2005年4月27日

地點：重慶市涪陵區青羊鎮安鎮四社

採訪後記

去尋陳昌齡的路上，我慌慌張張，躲躲閃閃。兩年前，我主編的《中華手工》雜誌上刊登過一篇關於陳萬寶莊園的文章，那上面對當地鄉政府頗有不恭之詞。這次又來，自然是「不受歡迎的人」。在鎮上，我為求資料同個別人有了接觸，消息傳出，有關部門的領導反應強烈，「個別人」叫我趕快走人，於是我落荒而逃。

不幸的是，我因此失去了採訪被槍斃地主陳世哲兒子陳立群的機會；幸運的是，有關部門和人員沒有追上來，使我得以在鎮外幾里路的鄉下採訪到了陳氏莊園最後一個老地主。

譚松在陳氏莊園採訪

離開陳昌齡時我心神不定渾身無力，那條通往公路的山道顯得十分漫長。腦海裡幽靈般地浮現出母親埋葬三歲女兒，姐姐埋葬六歲妹妹的情景。萬般無奈中，突發奇想——把這幾個名字鐫刻在「偉大領袖」毛澤東的紀念堂上吧，她們是：

董筱蘭，母，餓死，1960年，33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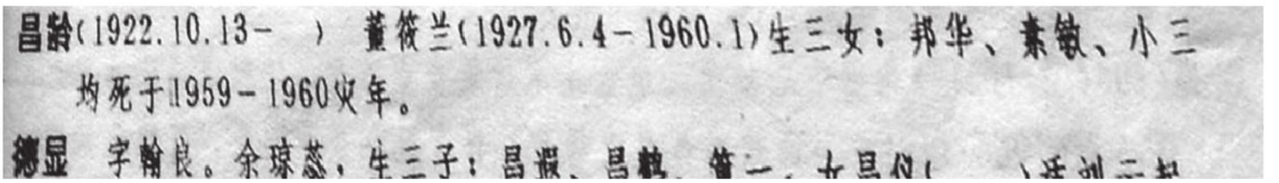
陳小三，女，餓死，1959 年，3 歲

陳素敏，女，餓死，1960 年，6 歲

陳邦華，女，餓死，1960 年，10 歲

地點是重慶市涪陵區青羊鎮安鎮四社。

並且，請陳邦華在另一個世界裡，告訴那位「中國人民的大救星」，她埋葬她妹妹時的心情，以及目睹母親餓死時的感受……


昌齡(1922.10.13-) 董筱兰(1927.6.4-1960.1)生三女：邦华、素敏、小三
均死于1959-1960灾年。

此為陳氏族譜第 43 頁上關於陳昌齡妻女死亡的記載

補記：

採訪了陳昌齡後，我便同他保持了聯繫，並每月給他寄一筆生活費。可惜，一年多後我又一次失業，又一次漂泊在外，因此失去了同他的聯繫也沒再去看他。

2016 年 8 月，為製作紀錄片《血紅的土地》，我到青羊鎮拍外景，我專程去了陳昌齡的村子，期望他還活著。

可是，他已經在七年前（2009 年）去世了。

我站在八月的烈日下，心中一陣陣的悲涼。

這位孤寡老人，是怎樣度過他人生最後的日子的呢？

我更感到內疚！

當年一別，便是永別

他每次收到我寄的錢，都要走到街上去給我打電話表示感謝，後來我突然不寄了，也沒給他說原因，自己就默默地消失了。還有，我感覺到他在孤寂中，特別想同我交談，可是，我採訪後再沒去看過他。

很多事，一旦過去，就永遠過去，再也無法彌補了。

我站在他遭受苦難和他妻女遇難的山坡上，心中暗暗發誓：我一定要讓千千萬萬的人，看到他的講述。

陳昌齡家門前的田地，遠處，就是陳萬寶莊園

四〉、共產黨，你看不清楚

講述人：陳德孚

陳萬寶第四代子孫，84 歲

我是陳萬寶的第四代子孫。陳家的輩數是 20 個字：我章興宇萬、榮華世德昌、邦國安定遠、朝庭文字光。

陳萬寶是萬字輩，他入川後，第一輩分了兩房，第二輩分了三房，我爺爺就是第三房，也是么房。共產黨搞土改前，我們這一房算得上陳氏家族的首富，新屋嘴就是我們家的莊園。

只剩下大門處這一坡石階

我們家族共有十大莊園，分別叫戴家堰、石龍井、四合頭、李家灣、老寨、唐坎、朝門、新屋嘴、石壩、大路片。

我爸爸這一房在新屋嘴莊園。

新屋嘴莊園以前氣派得很，大門兩邊建了兩個亭子，中間是一條龍，兩邊有兩個老頭在釣魚，還有很多雕塑，現在全部毀完了，只剩下大門處這一坡石階。以前我們這兒環境美得很，青山綠水，到處是樹木，那邊一片全部是柏樹，我們新屋嘴這一片全部是松林，朝門那邊全部是杪樹。鳥也多，到處是白鷺，像這個季節，各種各樣的鳥，天空中密密麻麻的，還有鵰從天上衝下來抓小鳥，觀看起來精彩得很。如果環境不毀，莊園不毀，現在搞旅遊是個好地方。

殘存的李家莊園

土改來了，我爸爸陳建侯是大地主，他先被關押，保釋出來後又被抓走，最後被槍斃，他死時才 39 歲。當時我也嚇倒了，我跑出去躲了，否則——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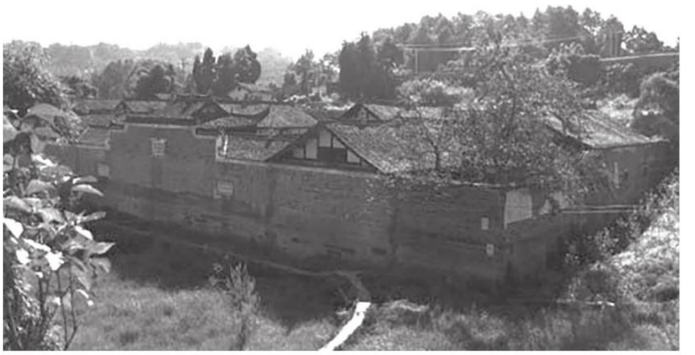
我媽被抓到太平、新龍等地去鬥了幾十天，但她沒有吃太大的苦，一是她歷來就是個行善的人，周圍

群眾都清楚，對她沒得一點恨，也正因為如此，沒把我們趕到爛草棚去住。二是我們家的金銀早在土改之前就被駐在我們這兒的解放軍搜去了，這事大家都知道，所以土改時沒有追逼她金銀。

除了我爸，我記得還殺了陳克益（音）、陳文昭、陳德厚。對了，還有陳一村。

陳一村是我么爸，他從黃埔軍校畢業，這次我到廣州專門去查了，黃埔軍校有他的名字。抗戰時期他領頭創辦了華楠學園，第一年就在我們新屋嘴莊園辦學，後來把廟子裡的菩薩搬出來，就在廟子裡辦學。當年我就在華楠學園讀書。

那時拿得起學費就拿，拿不起就免費，不擇貧富，任何人的子女都能入學。



石龍井莊園

除了地主，我們這兒還殺了一個叫楊茂青的人。

楊茂青是個穿「半截鞋」（痞子型）的人，共產黨利用他，給他封一個「剿匪主任」。他要抽鴉片，就拿鴉片給他抽。等把土匪收拾完了，就輪到他了。那天開會，他還在主席臺上坐著。主持會的劉 XX 說：「我們這裡面還有沒有壞人？」其他人說：「有！」「哪一個？」「楊茂青！」這一切都是事先定好了的，馬上就把他抓起來，好像是在第三天就把他槍斃了。他的兒子也被槍斃了。

共產黨，你看不清楚。

採訪時間：2016 年 8 月 14 日

地點：涪陵青羊鎮陳氏新屋嘴、李家灣

採訪後記

這是我第四次到陳氏莊園，距第一次採訪已經過去了 13 年，當年把石龍井（陳氏家族最後一個完整的莊園）拆了一半來修建的那所學校，現在又拆了。空地上，荒草萋萋。

據說，當地政府想搞旅遊，投了鉅資，要重新修建石龍井莊園。

我走訪了幾個殘存的莊園：戴家院、李家灣、朝門、新屋嘴、石壩、大路片。

在新屋嘴時，一位當年分地主房子的楊姓農民很熱情地給我介紹他當年搬來時新屋嘴的氣派和布局。然後，他又帶我去看莊園殘存的碉樓。

我們沿著一條石板路往山坡上走。

在碉樓破敗的底樓裡，偶然遇到了 84 歲的陳德孚老人——土改時他們一家被「恩典」地趕到這兒居住——直到現在。

一直住在破敗底樓裡的陳德孚

老人同那位楊姓農民一樣，很熱情，不僅頂著烈日去給我指看莊園殘跡，還專門帶我去看李家灣莊園殘存的木雕。

土改時，老人已近 20 歲，看到和聽到的事不少，但是，當我問起當年怎麼整地主時，他把頭扭到一邊，說：「不說那些事了，沒得意思。」

為了旅遊，現在又把學校拆了

五〉、陳萬寶後裔座談會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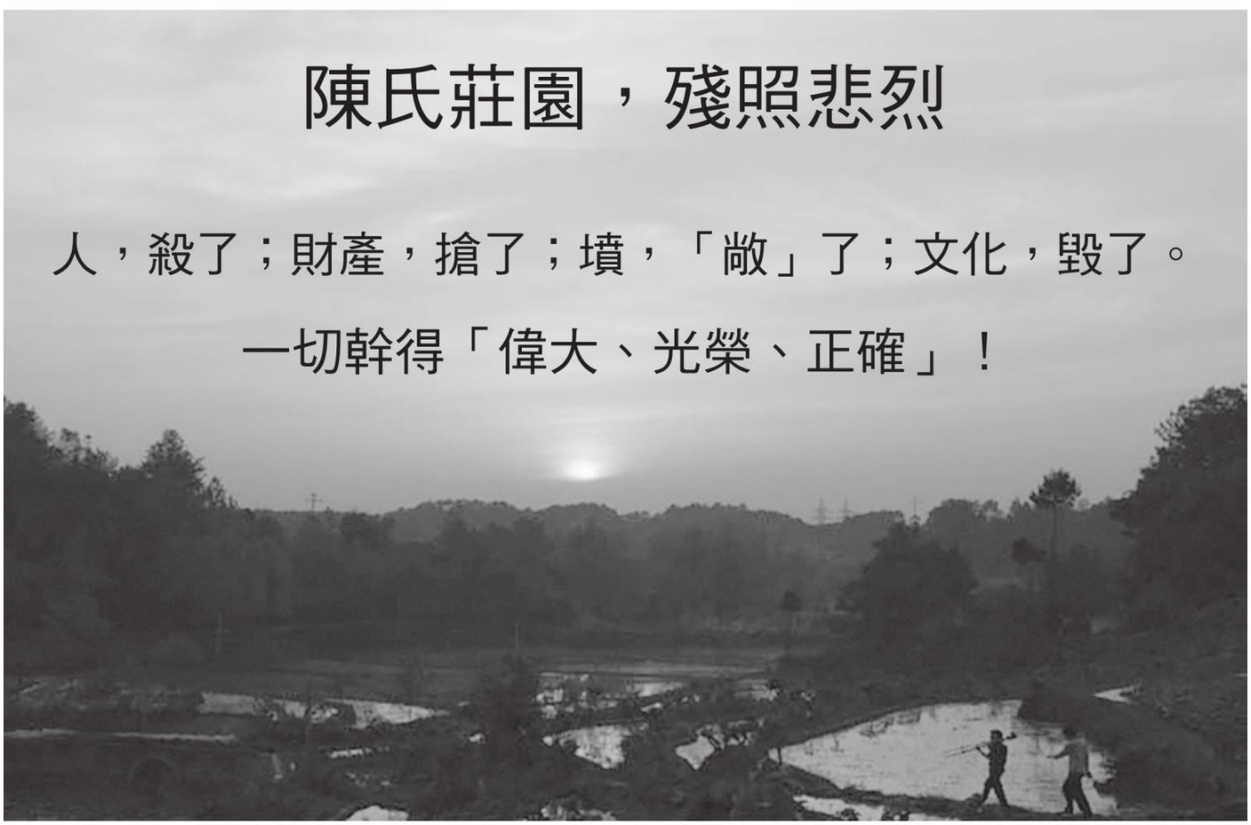
2004 年 11 月 2 日上午，青羊鎮文化廣播站召集了由陳萬寶後裔陳德樹（陳萬寶五世孫）、陳德鈞（陳萬寶五世孫）、陳昌裕（陳萬寶六世孫）和陳多群等人參加的座談會，內容是關於陳萬寶莊園的開發利用與保護的意義。但在會上，其中一人講到他祖父時有這麼一段話：

「此公（他）將陳家勤儉持家，耕讀為本，寬厚待人的傳統傳承下來，從一起吃飯不能浪費一粒飯，（到）對人講究禮貌。此公講話，其子孫伺立一邊，學習上雖然請了家教，但還親自考核。主要是（讀）「四書五經」。對長工不打罵，不喝斥，平時省吃儉用，喝老蔭茶，不抽大煙，不喝酒，不打牌，只會骨九。每年的冬臘月，

討飯的乞丐坐在馬樁壩，每天施捨 200 ～ 300 斤大米給這些人，做到有求必應。稍有欠收，對佃户均作讓步，每年應收租 2000 多擔，實收 1000 多擔，同佃户基本平分。」

下面是調查到的陳氏莊園 1949 年後部分被槍殺和抓入監牢者的名單（陳昌齡提供）：

陳一村（字世哲）——1951 年被槍殺於青羊道班。
陳德寬——與陳一村同時遇難。
陳德厚（字澤環）——1950 年被槍殺
陳德宣（字問照）——1950 年被槍殺
陳世屏（字建候）——1951 年 4 月 5 日被槍殺。
陳德宗（字秉衡）——判無期徒刑，抓入新疆勞改，後音信全無。遺有一女。
陳希頤——就讀於成都光華大學，在雲南昆明當過編輯，死於青海勞改地。
陳淵明——入獄勞改後再無音訊。老婆改嫁了。
陳德如——在青羊鎮陪殺場，但倖免於死，幾年前去世。
陳開明——陪殺場



攝於 2005 年 4 月陳氏莊園外

三、「焚火」之後的大水井地主莊園

在湖北省利川市柏楊壩鎮的莽莽群山之中，有一個建於清道光和光緒年間的古建築群——著名的大水井古建築群。

2006 年 7 月 15 日，我來到這個已闢為旅遊景點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目睹了一群傷痕累累的古建築，聽到了一段血淚斑斑的土改史。

一〉、傷痕累累的古建築

清乾隆 26 年（西元 1761 年），湖南岳州府（現岳陽縣）人李廷龍、李廷鳳兄弟由湘入川，落業在川東、鄂西交界的大水井。兄弟倆艱苦創業，發家致富；其後代讀書耕田，人才輩出。到清末取消科舉制度時，李氏前後五輩人共考取秀才七十多人，廩生十餘人，舉人一人，進士一人。這在一個偏僻的土家山鄉，堪稱空前壯舉。至 1949 年，李氏家族歷經了廷、祖、永、遠、勝、先、宗七代人，建成了以李氏宗祠為中心，外加八個莊園的龐大建築群，成為一方豪強。

莊園殘屋

大水井古建築群由李氏宗祠、李亮清莊園、李蓋吾莊園三

部分組成。它占地 2 萬餘平方米，有房屋近 300 間。據說它當年「規模龐大、氣勢宏偉、工藝精湛、環境秀麗，為鄂渝邊境古建築之明珠。」

我先來到建築群中的李亮清莊園。

李亮清莊園

站在公路邊望去，一個中西合璧的大院落靜臥在農田和蒼翠的山巒之間，古舊的木板樓牆與白色的西式壁牆反差強烈，也算頗有特色，但沒有想像中的那種「宏偉氣勢」。

從懸有「青蓮美蔭」仿石匾額的朝門進入莊園，眼前是一個青石鋪就的 200 平方米的院壩，一條歐式柱廊橫貫左右，連接兩邊的土家族吊腳樓。莊園共有 24 個天井，174 間房屋，多為二層或三層樓房，設有大廳、套房、客廳、小姐房、帳房、倉房、縫紉房、工匠房、磨坊等。據說，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走馬轉角樓」、「一柱六樑」、「一柱九樑」的建築格局，所有建築沒用一顆鐵釘，全部採用的木骨架，按「風水」、「八卦」及地理條件，環環相扣，互相依托。

然而此刻，這顆「明珠」已破敗不堪，以致毫無「明珠」的感覺。乳白如玉的仿石匾額「青蓮美蔭」在 1949 年後受到破壞，被刷上石灰，周圍的裝飾全部被毀。當年小姐的繡樓歪歪斜斜，爬上去，已有樓板塌陷之憂；170 多間房屋，大多殘敗破損。一間門窗均有雕花的「雅間」不知被何人長期用作廚房，那曾經精美的木雕工藝被濃濃的黑煙和油煙熏染得不忍卒睹。莊園前的牌坊被拆除，屋內家具、古玩無一倖存，李廷龍的墓碑被打碎成三段，「魁山堂記」匾額被鋸成幾塊，用來墊糧店的磅秤……莊園「精雕細刻的柱礎，玲瓏剔透的窗櫺，造型奇異的廊柱，曲徑通幽的走廊，精致豪華的陳設」如果不是為招徠遊客的華美之詞，則一定是莊園往日的輝煌。

李亮清莊園大門

在莊園的主殿裡，擺放著一些老式桌椅、床、窗櫺、門扇、楹聯、牌匾，其中大多破損殘缺。據介紹，這是為了「發展旅遊經濟」，從四周農民家裡收購來的。半個世紀前，「翻身的農

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攆走了，或者殺死了（詳見後面「血淚斑斑的土改史」）莊園的主人——地主，住進了這座豪宅，他們只住不修，又隨地取材，莊園日漸衰敗。待「文革」的革命烈火熊熊燒來，大量精美的石雕、木雕被剷除，牌坊、涼亭被拆除，書籍字畫被焚毀，這顆從清朝中期就開始打造的「明珠」終於氣息奄奄，神韻盡失。

李氏宗祠距李亮清莊園 200 米，建於 1846 年，這是一個小城堡式的建築，城牆長約 400 米，高 8 米，厚 3 米，牆梯依山勢逐級升高，角梯皆為整塊巨石建成，依次布設槍炮孔 108 個，嚴密地封鎖著所有的通道，可謂壁壘森嚴。祠堂正面東側有口小井，周圍也用巨石砌起了高高的圍牆，圍牆正面刻有「大水井」三字，這也正是大水井名字的來歷。

李氏宗祠大殿

宗祠的建築模式模仿成都文殊院，主體是三個大殿（前殿、拜殿、正殿——即「祖宗殿」），四排廂房，有 6 個天井、60 多間房屋。

三大殿是教化族人、祭祀祖先，商討族務的活動中心。

同李亮清莊園一樣，宗祠也是滿目殘敗破損，正門旁還殘留著文革時的狂熱詩句——「四海翻騰雲水怒」。步入三大殿，空空蕩蕩唯有柱樑兀立，往日各殿擁有的許多朱底金字楹聯、匾額，大多不見蹤影。唯拜殿中堂的一副木刻楹聯雖被歲月洗得慘白，但字跡還依稀可辨：「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還有，拜殿的屏風牆上分別墨書著斗大的「忍」、「耐」二字，下面分別設置了「廉泉井」和「讓水池」，喻示家族的清廉禮讓。與祠堂內其他破敗不堪的建築相比，三大殿還保存了一個頗有氣勢的大架子，可以讓人想像它當年的風韻和氣派，尤其是殘留在簷柱間的十餘個扇形穿插枋，其雕刻十分精美，透射出濃郁的文化和藝術美感。廂房的破損更為嚴重，看上去也更淒荒，那一個個沉於房基之下的天井十分獨特，配上兩頭的雕花窗櫺和頭頂上的屋簷，別有一番韻味，可惜天井裡荒草萋萋野藤蔓蔓，消解了它應有的儒雅靈秀。

為了開發旅遊，一個修復李家宗祠的工程隊已經進駐祠堂，一群民工正在大殿裡敲打攪拌。地上，堆著一排排十分粗糙的石木雕刻——一看就是那種缺少文化更缺少敬虔的「批量產品」。

為「旅遊經濟」而修復的古建築還會有那種傳統文化的古韻和玲瓏剔透的工藝嗎？

李蓋五是李氏家族最後一任族長，他的莊園座落在群山環抱的高仰台，由於距離較遠且天色已晚，因此未去探望。據說他的莊園占地2000餘平方米，有房屋40餘間，其建築特色，雕刻工藝絲毫不亞於與之遙相對應的大水井。

殘留在簷柱間的扇形木雕

二〉、血淚斑斑的土改史

1949年，共產黨來了！

李氏家族的輝煌轟然崩塌，滿箱的契約焚毀了；所有的財產收繳了；整屋的書籍燒成了肥田的紙灰；偌大的莊園被分而食之，住進了新的主人……最不幸的是那些大小地主們，他們或被殺、或被餓死、或被鬥打、或被燒烤……

50多年後（2006年7月），我在利川市找到了當年的土改民兵、《大水井李氏宗祠及莊園歷史寫真》一書的作者向賢早老先生，聆聽了一段血淚斑斑的家族史。

講述人：向賢早

土改時大水井農會幹事和民兵

李亮清家佃戶，1933年生

我的曾祖父曾經擔任過大水井李氏家族的帳房，他給我講了不少關於李氏家族的事，我自小與李亮清家的小姐少爺很熟悉。土改時我在農會做幹事，也是民兵，做了一些工作，如在龍門沒收大小地主的五大財產，參加鬥地主等。

（一）李亮清後人的命運

李亮清是個能幹人，家業在他手裡一步步發達，擁有了4000多畝田地，還在奉節城買了一個綢緞鋪，在雲陽買了兩個鹽井。當時，李亮清莊園裡每天有近百人進餐。李亮清活得不長，只活了56歲，在解放前一年，1948年去世了。（幸虧去世了！）

說一下解放後他子女的遭遇吧。

李亮清共有三個兒子，九個女兒。他的大兒叫李蔚廷，他是挨的第一炮（槍），就在大水井操壩打的。問他有沒得金銀，他說沒得了，我修房子，用完了。罰他的款，他交不出來，就把他槍斃了。

打李亮清的大兒媳婦劉溫賢（也就是李蔚廷的老婆）我也是親眼見到的。先是呼口號：「打倒劉溫賢」、「劉溫賢老妖精」、「砍倒大樹有柴燒」等等。然後把她拉出來，把衣服褲子全部扒光，一絲不掛，人們湧上去一陣痛打，就在李家祠堂前打的，打得慘，但是沒有打死，好半天她還睡在地上「呼嚕」「呼嚕」地哼。後來劉溫賢被槍斃了。

李亮清的二兒叫李次候，解放後他逃走了，他2000年才去世。但是他留在鄉下的老婆彭吉徵受了很多罪，待會我給你講。

（注：田赤、方國劍、孫孺著的《大水井古建築群》一書中說，李次候畢業於國民黨中央大學，曾在重慶渣滓洞主管無線電通信，解放後坐過一段時間的監牢，出獄後到新疆的一個電臺工作。李次候的兒子李宗農講了他父親的經歷，見後面「大水井，我所知道的故事」一文。）

夕陽下的李亮清莊園

李亮清的三兒李詢蕘還是個學生，他被吊起來逼問金銀，他受不了刑，就說有金銀，埋在哪兒哪兒，明天一早帶他們去挖。實際上他沒有金銀，第二天過不了關。夜裡他翻牆逃跑，民兵發現了在後面緊追，李詢蕘從樓上摔下去，頭摔在石板上，當場摔死了。

李亮清的女兒也被弄來鬥。八小姐李先信被吊在中樑上追問金銀，正在這時奉節縣的楊縣長來了，他說：「你們不鬥當家的鬥學生？（八小姐）這種人應當把

她瓦解過來。」這下才免了他女兒們的罪。

李亮清的墳被挖開，他衣服還是好的，頭上有個頂子，外面抹了點金，剖開裡面是木渣渣。

農民鬥地主還是積極，一是想當幹部，二是想分地主的財產，三是鬥倒地主不交租。當時還有一個「焚約大會」，所有地主、農民都來，那真是熱火朝天。

會場上掛著標語：「要回農民的血汗」。地主裝文約（契約）的箱子全部端來，農會主席一個一個地問：「你是不是地主？」他問到楊田壩的地主李銀州（音）時，李很有禮節，他雙膝跪下說：「我家有500石租，算個老大地主。」農會主席說：「那就把你的文約拿出來。」

李從箱中取出文約，有一尺多厚。

李亮清的文約有三箱子，是他家小姐拿出來的。當天當眾燒毀地主所有的文約，燒得滿壩子都是香味！為啥？文約上蓋得有政府的印章，那印泥裡摻得有銀珠和香片，所以燒起來香味撲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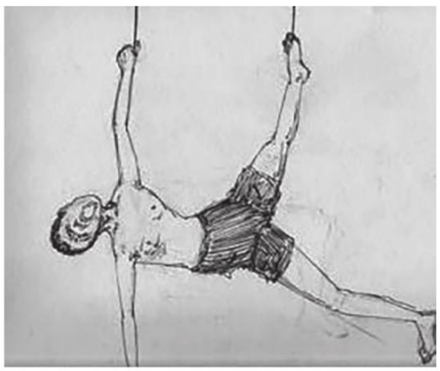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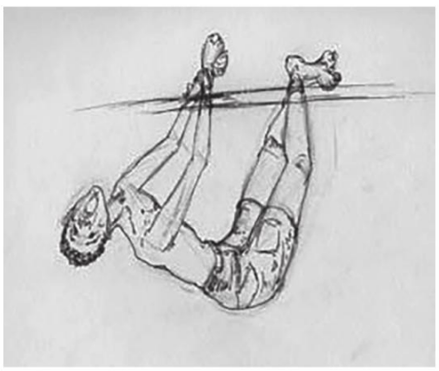
土改時折磨地主的刑罰多得很，我親眼見到的有這些：

一、**吊半邊豬**——把一隻手和一隻腳捆在一起吊起來。

二、**抬穿心槓子**——把手腳捆起來，用槓子從中間穿過去，抬起來搖晃。

三、**騎洋馬兒**——用兩個長板凳一正一反重疊，將受刑人的兩個大拇指夾在兩個板凳中間，受刑者坐在板凳上壓自己的拇指。

四、**吊鴨兒鳧水**——將人反捆起來懸空吊。

五、**猴兒扳樁**——將兩個大拇指用麻繩緊緊捆在一根木棍上，木棍中間破開，強行嵌入一個木楔子，然後用錘子將木楔往下砸。

六、**掛尿桶加紙木灰**——把半桶尿掛在受刑人頸子上懸在胸前，受刑人頭啄（垂）下來臉衝著尿桶，然後把一大堆燒過的紙木灰猛地一下傾入尿桶中，紙木灰「轟」地一聲衝起來撲得地主滿嘴滿臉。

七、**餵羊屎**——羊屎乾了看上去就像鴉片顆粒，把羊屎塞入地主嘴裡，強迫地主吃下去——專門整吃過鴉片的地主。

但是，我見過的最慘的刑罰我叫不出名字。

吊鴨兒鳧水

那一天逼地主李亮清的二兒媳婦彭吉徵交出金銀，彭吉徵交不出來，那個民兵把四塊磚頭燒紅了，把彭吉徵衣服扒了，強迫她雙膝跪在兩塊燙磚上，雙手撐在兩塊磚頭上，像狗一樣趴跪著。然後把一盆火籠——裡面燒的炭火——放到彭吉徵的乳房和肚皮下。我在旁邊親眼見到，烤得那個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

人人都是父母所生。我不是地主，我不怕人說我包庇她，我轉身就出去找李金斗，他是區長。我對他說：「糟了也，今天有個地主恐怕要死在那個火坑上，已經烤得滴油了。」

李金斗走進彭吉徵受刑的屋子，叫民兵都出去，然後把彭吉徵拉起來，問她：「妳到底還有沒有金銀？」彭吉徵說：「沒得了呀，修了房子，又買了地，沒得了呀。」李金斗給她一家人開了一擔穀子的條子，把她們弄到李子坳去勞動，彭吉徵這才撿了條命。今年三月她家八妹還對我說：「傷透了心喲，晚上跟她睡覺，她喔火連天地慘叫，一個肚子爛得糊了了（血肉模糊）的，奶子都爛落完了。」

烤彭吉征

彭吉徵幾年前在奉節去世了，烤她的那個民兵還在，叫許定勝（音）。

（二）李氏家族最後一任族長的命運

李氏家族裡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叫李蓋五，他是李氏家族最後一任族長。

民國時期，連年戰亂，各種各樣的武裝、土匪興風作浪，到處燒、殺、搶、掠，老百姓苦不堪言。（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川、鄂兩省邊境上就有勢力較大的匪幫賀國祥和利川境內的「神兵」等。

這些兵匪們殺人放火，為非作歹，老百姓深惡痛絕。

李蓋五出生於望族書香門第，很有才華，他能言善辯，生性膽大。他同賀國祥、同「神兵」交戰，也打其他土匪，打出了威風，土匪們一般不敢騷擾大水井，因此，可以說李蓋五保了一方平安。李蓋五 1930 年當了奉節四區區長，1935 年當了奉節縣團務委員長。（注：當時大水井所在的柏楊鎮屬於奉節縣，1953 年才劃歸湖北利川。）

（《大水井古建築群》書中說：末代族長李蓋五是那個時代的風雲人物，其經

歷之曲折，是小說家也難於想像的。由於李蓋五是開明紳士，解放後又主動交出財產，因此進駐大水井的工作隊領導汪華源、李金斗很快與李蓋五交上朋友。）

十年後，2016 年，我重返大水井，拍下李蓋五莊園大門

解放後，李蓋五很為共產黨做了幾件大事。

1950 年 2 月 10 日，奉節縣甲高鄉的大地主王學初聯絡奉節江南各鄉，還有雲陽、利川各鄉的反動頭目，策劃反革命暴亂。3 月 12 日，甲高鄉倒龍灣最先暴亂，僅僅 4 天就蔓延到江南的 19 個鄉，人數達到 3000 多人，他們殺了奉節縣副縣長韓廣民等幹部 6 人。3 月 16 日，他們與李氏家族的李汶州等取得聯繫，指使李汶州去給李蓋五做工作，邀請李蓋五出來領頭。李蓋五深明大義，大罵李汶州：「胡鬧！蔣介石幾百萬軍隊都被打垮嗒，你這幾個人，幾條土槍成得了事？」

李汶州等人走後，李蓋五將他們的陰謀報告了中共柏楊區委書記王書琴。區委先下手為強，立即調動部隊，將準備暴亂的分子一網打盡，使當地又避免了一場劫難。

後來江南暴亂的土匪也被肅清，王學初被抓住後槍斃。

李蓋五還救過共產黨的韓副縣長。那是 1950 年，韓副縣長、李蓋五一行四人由吐祥鄉去奉節開會。

走到亮風台時，突然從山上衝下來一群土匪，為首的大叫：「誰是韓副縣長？」韓說：「我是。」李蓋五趕緊向前，高聲說：「我是！」只見土匪大刀一揮砍來，李蓋五舉刀相迎，同時大聲吼道：「你們是豬的槽頭血作癢，想找死？！蔣介石幾百萬軍隊都被打垮。你們趕快回去搞生產。不要胡鬧。這是共產黨的幹部，給你們窮人辦好事的幹部。」

庇護了李氏家族的堅固城牆，沒擋住土改的腥風血雨

土匪們聽了他的話，一個一個的溜了。

為發展旅遊，花了幾百萬人民幣修復的李蓋五莊園

李蓋五不僅幫共產黨，還同共產黨的土改幹部聯姻。他做媒把他叔伯兄弟李汶州的女兒李先興嫁給李金斗。李金斗是從山東來的幹部，在我們那兒當區長，他來了之後，把他老婆離了，另娶了李汶州的女兒。

李蓋五為什麼要做這個媒？他想結交共產黨的區長，保大水井的清甯平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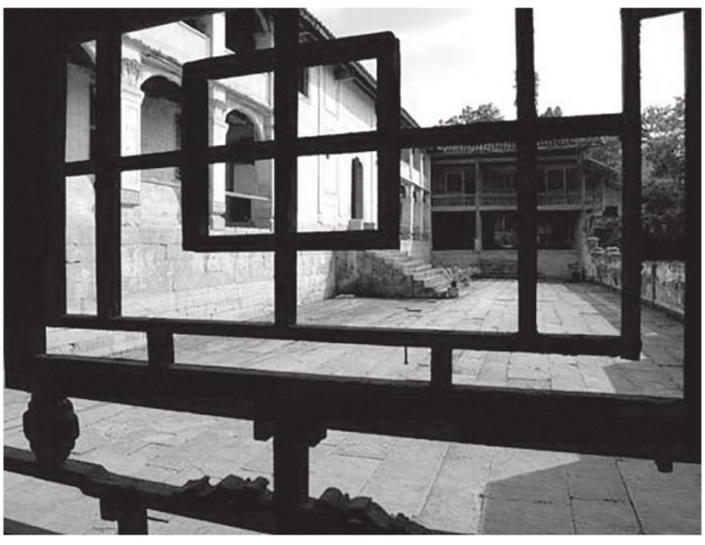
由於李蓋五有功於共產黨，所以共產黨打算免他的死，於是把他弄到奉節的安坪鄉去幫助搞土改，算是躲起來，避開家鄉的清匪反霸鬥地主。但是，李蓋五名聲太大，大水井農會（主席叫王道玉）說李蓋五是大地主，非要把他弄回來鬥。他們三次向奉節縣政府要人。共產黨雖然想免他的死，但又不願受到群眾反對，於是就把他交了出來。不過他們要求：一、不得捆綁吊打；二、不准槍斃。

李蓋五被押回來後，關在他家的一個糧倉裡，沒有槍斃他，但是，七天七夜不給他飯吃！他餓得把殘留在碓子（一種舂米的用具）裡的一點生包穀米都摳出來吃光了，沒水喝，渴得喝自己的尿。

在臨死的那天凌晨，他悄悄把倉板拆下來，探出去拖看押他的民兵的槍。民兵驚醒了，問他：「你拖槍幹啥？」

李說：「我……我拖槍打人。」

「你打哪個？」「我……我看得起哪個打哪個。你們這……這些傢伙，不是老子保一方平安，要攆得你們雞飛狗走。老子死……死了之後，也要在鬼門關等……等你們。」



陽光灑在已作為旅遊景點的李亮清莊園

李蓋五說完就死了。

民兵彙報上去，農會中有信迷信的，感到害怕，於是決定焚屍。他們用桐油、菜油，就在他莊院門口，架起乾柴燒，最後整個人燒得只剩下碗大一塊，丟在莊院後的水溝裡。所以後來他兒子李先偉（音）清明回來掃墓，只有在水溝邊掛青

（即祭祀）。

（三）共產黨區長李金斗的命運

李金斗是區長，權力很大，審判地主他當庭長坐在前頭，兩邊各坐一個陪審員，地主跪成一排，要殺哪一個就喊某某人入庭，入庭後只有幾句話就完事。槍斃李蔚廷時，李金斗就是這麼幾句話：「農民弟兄們，大鬥、小鬥、加緊鬥、使勁鬥。鬥不出來，交給我們法庭，判他的罪，殺他的頭！」接著把李蔚廷抓來問：「你當鄉長，抓了多少壯丁？掀了多少人下龍橋河？」我記得李蔚廷還答了兩句：「我沒有掀人下龍橋河呀。」

李亮清莊園，

後來要槍斃李汶州，也就是他的岳父，專門叫李金斗去執行。政府要觀察他，看他是不是同地主睡一頭。那時，哪怕你是區長縣長，只要同情地主就要遭撤職。審判槍斃李汶州那天我在場，李金斗問：「你當鄉長，派款子、抓壯丁，殺害了多少農民？」李汶州回答：「區長（他還是喊的區長，沒有提女婿），我沒有殺農民。」我記得他還說：「區長，我（死後）要求弄回去埋。」

槍斃打的李汶州的腦殼，打得腦花到處散起。

印象最深的是李汶州的女兒李先興，也就是李金斗的新婚妻子，當時也在場，她眼淚雙雙直往下滾。

不過最後還是同意把李汶州弄回去埋，就埋在洋沱壩。

那天只打（殺）了李汶州一個。牢裡頭關滿了地主，就關在大院裡，有幾十個，要殺那個拖出來殺就是。我們這一帶有 48 戶大小地主，光收繳的鋪蓋就是 200 多床。

李沛東是龍門鄉公所的調解委員，李蓋五的弟弟，他沒得一點罪惡，但是，那時是只准錯殺一千，不准放走一個，於是把他也抓來殺了，就在大水井槍斃的。

李家土改被打死的地主有李鴻鈞、李沛東、李汶州、李蔚廷、李沛誠等，大概近 10 個吧。

李氏宗祠

李汶州的兒子李煉梧（音）被抓來用烙鐵在他臉上烙些疤子，第二天他滿臉流膿地被抓到刑場上去陪殺場，不過沒有殺他，因為他還是一個十多歲的學生，記得當時有政策，學生娃不殺。

李金斗大義滅了親，但並沒有保住他的官職，因為他畢竟娶了地主的女兒。

他老婆剛生了第一個娃兒，上面就責令他好好反省，於是他給娃兒取名「李反省」。

後來又生了第二個娃，上面把他撤了職，弄到山腳坎去當工人。他乾脆給第二個娃取名「李撤職」。

補記：由於向老先生馬上要動手術，八點半便開始輸液，只得匆匆結束採訪，李氏家庭族中一個重要人物李孟洋未能詳盡瞭解。

採訪時間：2006 年 7 月 16 日

地點：湖北省利川市人民醫院住院部

採訪後記

2003 年 3 月，我在三峽庫區採訪時就聽說湖北利川有一個叫「大水井」的大地主莊園。根據經驗，有地主莊園的地方，一定有土改的血腥，心裡，便暗暗埋下了前去採訪的願望。但是，直到三年後我才動身前往。

可惜，我來晚了，遭受燒烤酷刑的彭吉徵老人幾年前去世了，再也無法傾聽一個苦難女人的經歷。慶幸的是，我在利川人民醫院找到了向賢早老人，並趕在他動手術前採訪了他。

李氏宗祠

向賢早老人記憶清晰，他不僅小時經常同莊園裡的小姐少爺們一塊玩耍、不僅當過土改民兵，親身經歷了整個土改，而且前些年還專程到李氏的八大莊園考查，走訪了當地的老農和李氏後裔（正因為如此，他寫出了《大水井——李氏宗祠及莊園歷史寫真》一書）。遺憾的是，時間太短，對大水井如此複雜而厚重的歷史，我沒能長夜暢談、多方瞭解，這肯定會遺漏許多重要情節。還有，向先生收集的不少有關李氏家族的老照片我一張也未能目睹。

眼下，也只有暫時如此了。

返回的路上，我在橫跨渝鄂的七曜山上停下來。回眸望去，利川大地，山巒起伏，蒼翠滿目，風光十分秀美——多麼讓人難以離去的土地！

補記：向賢早老人於 2009 年去世

三〉、大水井，我所知道的故事

講述人：李宗農

1946 年生

（一）我們李家的家史

我們的家史是我偶然聽我爸說的。

他從勞改農場回來後什麼都不說，從不講他過去的經歷，我媽也不講，他們不想講過去的傷心事。1987 年，有一個姓羅的人從利川來奉節找到他，說他是利川農業局的，奉命修縣誌，請父親提供李氏家族的情況。那天我農活都沒去幹，在一旁聽他講了一整天。

我們老家在湖南岳陽一個叫洗腳河的地方，清乾隆年間，李家生活困難，聽說川東一帶地廣人稀，幾兄弟便想到川東來謀生。李家的字輩是二十個字：正世光廷祖，永遠勝先宗，興隆昌萬代，國泰定英雄。進川來的是第四輩「廷」字輩。

三弟兄李廷龍、李廷虎、李廷鳳在來川的路上，老二李廷虎因病去世了。李廷龍和李廷鳳在奉節上岸，但那時奉節縣城附近已經有不少人了，兩兄弟便一路討飯，往偏僻的大水井方向走。

大水井取水處

走到離大水井有二、三里路的龍橋時，兩兄弟餓昏過去了。龍橋兩邊是絕壁，中間一條狹窄的山樑，那是奉節到利川的必經之道。

大水井那兒有個姓黃的小地主，那天他從那兒路過，看到兩個外鄉人倒在地上。他摸了一下，還有氣，於是他從路邊的一個小店裡要來兩大碗米湯，分別給他們灌下去，把

兩兄弟救過來。問了他們的情況後，黃地主表示願意收留他們，讓兩兄弟在他家幹長工。龍鳳二公當然願意。他們在黃家幹活，非常勤快，除了幹農活，還每天一早做豆腐到路上去賣。黃地主很喜歡他們兄弟兩，黃地主夫妻沒有後人，一生做善事。他說，他有一塊荒地，就是現在我們李氏宗祠後那塊坡地，他讓兩兄弟去開墾出來，歸他們自己所有。兩兄弟花了一年的時間把地開墾出來，還打了幾十挑糧食，日子開始好起來。黃地主看兩兄弟這麼勤快，乾脆把豆腐生意也給他們了。兩兄弟幹農活、做豆腐、餵豬，有了家產，各自娶了老婆，又各自生了四個兒子。龍鳳二公的八個兒子，搞農業、考科舉，經營、做官，把家業一步步做大，八大房分家時，李氏家產已經達到 2000 多課糧食，一課是多少呢，包穀一課是五百斤，米也是五百斤、穀子是四百斤，2000 多課糧食，你說當年他們好厲害！當然，李家的恩人就是那個黃地主，李家給他夫妻立了碑，後代每年都要祭拜。

大水井外的田地

李廷龍生的四個兒子是李祖德、李祖澤、李祖盛、李祖茂。其中李祖盛又生了兩個兒子李永綏和李永廷，大兒李永綏就是我爺爺李亮清的爺爺。李亮清是大水井莊園 1949 年前最後的主人。

著名的李氏宗祠就是李廷龍的三兒李祖盛修建的。李祖盛年輕時考取了進士，在宜賓當知縣，後來他辭官回鄉，在成都看到文殊院，很感興趣，就把那個建築的草圖畫下來，回來就照那個結構修了李氏祠堂。他也是第一任族長。

我生活過的大水井莊園有 172 間房子，占地面積 10000 平方米，建築面積 6000 千平方米；旁邊的李氏祠堂占地 15000 平方米，建築面積 3800 平方米。這兩個著名的建築群土改後沒有像其他地主莊園被毀掉的原因是它們被做為鄉政府、供銷社、糧站，糧庫。我們那個李氏宗祠就是做為糧庫。現在它們是重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著名的旅遊景點。（注：現在門票 50 元）

（二）我父親的經歷

我父親叫李次候，生於 1917 年，是李亮清的二兒。他考入國民黨的軍校，學的無線電專業，畢業後在國民黨國防部第二廳搞電報工作。第二廳屬於軍統系統，所

以解放後就把我父親當作軍統特務。1948 年，我父親在武漢華中剿匪總司令部白崇禧手下工作，也是搞電報工作。當年下半年，我爺爺李亮清去世了，那時國民黨有個規定，公務人員的父母去世可以請長假一年，父親便請假回來安葬我爺爺，同時料理我們這個大家族的家務，一直到 1949 年下半年，他都沒回去。

這時解放軍打來了，他看到解放軍的布告，要國民黨的舊政人員主動去投誠，布告上說，主動投誠者既往不咎。當時我們大水井莊園裡就有駐軍，連指導員叫李金斗，他後來就是我們那個區的區長。我父親把他的所有證件交給李金斗，交待了自己在國民黨部隊中幹什麼工作，是什麼軍銜（他是少校），表示自己主動投誠了。李金斗說：「好嘛，現在缺少有文化的人，你來幫著徵糧。」父親於是幫共產黨徵了幾個月的糧。當時徵糧也從地主手中「徵」了不少金銀，李金斗就叫我父親把金銀交到奉節縣銀行去，那時大水井屬於奉節縣。我父親把金銀交去，銀行說金銀的純度不足，不收。什麼辦？只有帶信回柏楊壩，那時交通不便，往來要好些日子，我父親便到李先覺家住下。李先覺是他的一個遠房大伯，是我們李氏家族八大房之一洋沱壩莊園的人，他從四川大學畢業後在奉節縣中學教書。

在勞改期間的李次候

一天，突然來了兩個公安局的便衣，把他押到縣公安局，局長氣勢洶洶地責問他為什麼不到公安局投誠。我爸說，他已經向區長李金斗投誠了，證件也全部交給他了。局長一時沒話說，接著他把嘴一翹，對兩個便衣說：「把他帶去學習幾天。」

父親這一去就再沒回來，直到 33 年後——1983 年特赦國民黨縣團級人員——他才回到奉節縣（注：特赦國民黨縣團級人員是 1975 年，也許，當局通知李次候家屬又晚了幾年）。

1983 年，那天，縣公安局突然把我叫去，局長親自找我談話。他說，現在中央下了特赦令，特赦國民黨縣團級人員，你父親可以回來了，你願不願意接受。

我說，自己的父親，怎麼不願意，但他回來怎麼安置？局長說：「你在農村他就回到農村。」我想到我們在農村又苦又窮，父親已經在勞改農場就業，雖然沒自由但還有工資，因此有些猶豫。局長說，放你父親回來，是讓你一家人團聚，這是黨中央的關懷。我同意後叫我填了表，寄到勞改農場，這樣我父親才回來了。

他同我和我媽在奉節農村生活了十七年，但是，他從不對我講他那 33 年的經歷，我後來勉強瞭解到一點。

1950 年父親被「帶去學習」後就關進了奉節縣看守所，在看守所，同他關在一個牢房的是大莊王家的一個鄉長。那天晚上，看守所用火把將四周照得通亮，刺刀明晃晃的，每個牢房喊一個出來一個，一共有十多個。一出牢房他們就被捆綁起來，在身上插塊牌子後押走了。這些人被押到奉節縣老縣城那個河壩，一會就傳來槍聲，全部槍斃了。我父親想，下一次就輪到他了。十多天後，這一幕又上演，但是沒有我爸爸，這批人也沒被當場槍斃，而是被押到萬縣，是在萬縣宣判後槍斃的。

父親在看守所一個多月後被判刑五年，押到重慶原國民黨中央銀行的一個金庫裡關押。那裡關押了兩百多人，全是國民黨的軍政人員，有國民黨的縣長、縣參議長等等。關押期間，他們每天要被押到六十里外的地方去挑鹽，挑一百斤。父親說，只一個多月，他們兩百多人中就只剩下六十多個了。他說，那些人挑不動了，走慢了，士兵一槍托打來，人倒下去就起不來了。當時我父親 33 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而且他從小堅持鍛煉，身強力壯，因此他活下來了。

晚年的李次候

五年刑滿後，仍然不放他回家，又把他弄去修寶（雞）成（都）鐵路。33 年，父親一直被看管，雖然在勞改隊就業，但沒有自由，更不准回家。

（三）我和媽媽的經歷

我媽媽叫彭吉徵，生於 1918 年，是雲陽縣彭氏莊園的人。彭家 1949 年前比李家還要興旺。媽媽在北京讀的女子中學，為什麼在北京讀呢，因為她的爺爺在北京做官，她就在北京生活了八年。爺爺的外號叫「彭金娃娃」，因為慈禧太后六十大壽時他給慈禧送了一個金娃娃。媽媽家的彭氏莊園現在是重慶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目前正在整修。彭氏莊園當年被分給農民了，已經被拆得支離破碎。

我是 1946 年在重慶沙坪壩出生的，是我父母唯一的孩子。當時我母親在沙坪壩法院當記錄員，相當於現在的書記員。

爺爺李亮清去世後，父母帶著我一塊回到大水井莊園，我們就在那兒經歷了土改運動。

我媽是個非常善良忠厚的人，我們那個大家族，無論男女老少，沒人對她有任何怨言。土改時為什麼她遭受那樣的酷刑？為了逼金銀！最先不是抓的我媽，而是我大伯的妻子劉溫賢，她受刑不過，就亂咬，說我爸爸他們幾弟兄，帶著我媽他們

在龍橋下面埋藏了好幾桶洋錢。工作隊就派人下到龍橋下面去挖。那地方很不好下去，他們是用繩子吊下去的，結果掘地三尺一無所獲。接下來他們就把我媽抓去追逼，我媽受的刑就是炭烤活人，燒烤她的胸脯、膝蓋，就在大水井莊園裡。後來向賢早告訴我，當時他看到我媽的胸脯上燒烤出一個個大水泡，他趕緊去把區長李金斗叫來，這才救了她一命。燒烤媽媽時我也在莊園裡，但是我沒有親眼看到，後來媽媽也不願給我說這件事，我只是看到她胸脯和膝蓋上的傷疤。

（注：我兩次問起李宗農看到他媽傷疤的情況和他的感受，侃侃而談的老人一下子聲音低沉下來，不願多說。）

我大伯夫婦被槍斃、我三伯自殺後，大水井我們李家還剩下八口人：我和我媽、大伯的四個兒女（三兒一女），兩個孃孃（即我爸爸的七妹和八妹），都是婦女和兒童。我們全部被趕出門，遷到一個叫施家槽的地方去住。施家槽離大水井有十多里，是高山上，條件很差。我們八口人，只給我們一床鋪蓋，冬天屋簷上結冰，晚上我們只得擠抱在一起。最痛苦是沒得吃的！我們能活下來，全靠以前我們的佃戶救濟，他們白天不敢來，怕農會說他們同情地主，只有夜裡悄悄來，把包穀、米、甚至臘肉放在屋門口，然後悄悄拍一下窗戶，表示送吃的來了，讓我們出來拿。

佃戶為什麼要救我們，因為我爺爺李亮清當年對他們很好，如果天乾了，佃戶說交租困難，我爺爺馬上就免了。佃戶感恩，在最困難的日子救了我們。我媽媽也是大戶人家出身，沒幹過農活，但她會繡花，當時農村喜歡在鞋子、圍裙上繡花，我媽媽就給人繡花，換人家幫她幹點農活。

特赦後，分離幾十年的夫妻團聚

1957 年，爸爸刑滿就業，寫信來叫我同媽媽去看他，媽媽帶著我離開了大水井，翻過七曜山，走了 360 多里路到萬縣，從萬縣我們到陝西同父親相見，可是，僅僅過了幾個月，父親那個築路隊就要到阿壩州去修路，不准我們跟著去。沒辦法，我同媽媽只好回來。但是，不能再回大水井了，爸爸說，他的兩個妹妹，即我的七孃和八孃已經嫁到奉節，爸爸讓我們到奉節，說有親人好照顧。這樣，我同媽媽來到奉節，無法在城市落戶，只好託一個親戚幫忙在農村上了戶口，這個地方就是我媽媽後來生活了一輩子的地方——奉節縣新城鄉（公社）長嶺大隊六生產隊。

我們母子在長嶺的日子非常艱難。1958 年我才 12 歲，沒勞力，我媽是大小姐

出身，沒幹過農活，在田地裡幹活都是偏偏倒倒。好在我媽為人很好，非常善良，生產隊照顧她，給她評（工分）五分。五分算高的了，婦女最高才六分。接下來的大饑荒，是我們這一生最苦的日子，我和媽餓得吃泡桐樹葉和棉花葉，我硬是吃不下去，這些葉子豬都不吃。我的腳一直腫到大腿根，如果腫到肚子就要死，非常危險了。是八孃救了我們，當時她在新城供銷社，聽說我們不行了，就把我們接去吃了一頓豬肉，又給我們一些糖果。接著我考到縣城初中，每月可以吃 28 斤糧。但可惜只讀了不到一年，我就被迫回農村了，原因是大饑荒沒糧食，初中六個班砍掉四個，還有我媽五個工分，自己都養不活，根本沒錢供我讀書，我只有回到家幹農活。由於人小，只給我評兩個半工分。那時，生產隊一個工分多少錢？年終結算，我記得非常清楚，最低一個工分才 2 分 3 厘錢，有一年最高，一個工分也才 4 分 9 厘。

1983 年爸爸回來後土地已經承包下戶，但他幾乎足不出戶，成天找了很多舊報紙看，然後練書法，他後來成了我們奉節縣很有知名度的書法家。

我父母同一年去世，2000 年，父親是 1 月 7 號，母親是 8 月 20 號，都埋在長嶺農村。

（四）我大伯、三伯和族長之死

我爺爺死後，他長子李蔚廷就成了大水井一家之主，他也是我們那個鄉的鄉長。土改殺地主和鄉、保長他原本就跑不脫，況且他還得罪了區長李金斗。李金斗一來就住在大水井莊園。最初還沒有鬥地主，他看上了李蔚廷最小的妹妹，即我的八孃李冶平，八孃當時在萬縣讀中學，年輕，又有文化。這事被我大伯知道了，他說：「嫁給他那個棒老二？！」（注：「棒老二」是四川土語，即「土匪」。）這話傳到李金斗耳裡，大伯怎麼不死嘛？李金斗是區長，當時區長一句話就可以槍斃人，不需要上級批准。大伯夫婦都被槍斃了。李金斗後來還是娶了我們李家的一個姑娘李先興，李先興也是讀過書的。李金斗在山東的原配還找來了的，李金斗給了她點錢把她打發走了。

大水井莊園裡的繡樓（小姐樓）

我三伯李詢蕘是南京大學法律系的學生，1948 年他從南京回來，土改時也抓他去逼金銀。他們強迫三伯和他嫂嫂（我大伯娘）兩人面對面跪在一個獨凳

上，他們兩人必須緊緊相互抱著才不會摔下來。三伯覺得這是當眾侮辱他，他是有文化的大學生，感到人格受辱。當時三伯被關在大水井的那個小姐樓上，小姐樓是孃孃們繡花的地方，那天晚上他乘民兵不注意，從窗口跳下去自殺了。

後來有人說他是夜裡逃跑從樓上摔下去死的，那不是事實，我媽明確告訴我，三伯是自殺的。

李蓋五是我們李家最後一任族長，關於他的死都說是餓死的。餓他飯是事實，但最後他是被燒死的。這是 1987 年那位修縣誌的人來我家瞭解情況時我聽我母親講的。那位姓羅的人一直問到下午五點鐘，他說，他還要到梁平去找李蓋五的兒子，瞭解李蓋五的死因。這時我媽在旁邊說，他怎麼死的我清楚，他最後是被放火燒死的。

1949 年共產黨打來時，李蓋五不僅是族長，還是鄉長、民團的團總，手下有一百多團丁。他主動同共產黨交好，還救過工作隊。

奉節吐祥鎮甲高鄉有個大莊王家，是奉節縣的顯赫家族，大莊王家有 2800 擔包穀課，我們才 1000 多擔，大莊王家還出過五個武舉人，五個文舉人。1950 年，大莊王家組織了大刀會，有兩千多人，把吐祥工作隊的幾十個人殺了，其中還包括奉節縣的韓副縣長。大刀會接著就來攻打大水井的工作隊。李金斗的工作隊當時只有十多個人，十幾條槍，據說李金斗嚇得抖。大莊王家本是李家的老親，王、李兩家相互通婚，但李蓋五站到了共產黨一邊。他對李金斗說，不怕，我這兒有百多條槍，還有三挺機槍，把人和槍布置到龍橋口上去，莫說兩千人，就是兩萬人也過不來。大刀會果然被李蓋五阻攔了，他救了李金斗十多個人的命。當然，大莊王家的暴動被鎮壓了，聽說平暴後大莊王家連小孩都被殺了。

李蓋五莊園

李蓋五因為救工作隊有功，成了共產黨的朋友，李金斗給他請功，他就到奉節縣當了人民代表會議副主席。

可是，有一個人一心要整他，這個人就是李蓋五當年的馬僮。有一次李蓋五騎馬時，馬僮大概是沒有把馬弄好，他用馬鞭抽了他兩鞭子。土改時這位馬僮當了農協會主席，他一心要整李蓋五。要整他必須把他弄回大水井。他跑到奉節縣去要人，

縣政協不給，說需要縣長批，當時奉節的縣長叫楊正祿。這位農協會主席又去找他。楊縣長說，回去解決問題可以，但要保證他的安全，不准鬥打，身上有傷我就要找你，他是民主人士，是共產黨的朋友，不是敵人。

李蓋五被弄回來，沒有打他，把他關在大水井我爺爺修的糧倉裡，七天七夜不給他吃喝。糧倉很高，根本跑不出去。李蓋五喝自己的尿，把身上棉衣裡的棉花都撕來吃完了。七天了，李蓋五還沒有斷氣，那個農會主席有些慌了，他乾脆把我們李家的煤油搬來，在夜裡把煤油淋在糧倉的木板上。火燒起來後，他假裝叫喊：「唉呀，失火了，失火了。」等到人們趕來，李蓋五已經被燒死了。當時我媽就住在附近，他們都聞到煤油的氣味。這是那天我親自聽我媽說的。

採訪時間：2017 年 11 月 5 日

地點：奉節縣龍船街

採訪後記

在 2006 年採訪了向賢早先生後十一年，2017 年，我遇到了利川出生的土家野夫，他告訴我，他有渠道找到向賢早提到的那個「八妹」。果然，他不僅得到她的聯繫方式，還告訴了我李宗農的住址。

我當即趕到奉節縣李宗農的家。

李宗農不幸雙目失明了，但他記憶極好，講述也非常清晰流暢，感覺得到，那些往事都深深印在他腦海中。

他講的有些情節，同向賢早有出入，比如，他三伯李詢蔦之死，族長李蓋五之死。李詢蔦到底是跳樓自殺還是逃跑時摔死？李蓋五究竟是餓死還是燒死？我不想去苦苦求證，因為不管怎樣，他們都的確是在那場運動中死於非命。當然，李亮清二兒李次候的命運應當以李宗農的講述為準，因為他是李次候的兒子，最瞭解情況。

我是在採訪中才得知李宗農就是彭吉徵的兒子，彭吉徵在我心中已經是一個苦難的象徵和同義詞，她同她家族（雲陽彭氏莊園）另一個受難女性黃姑娘一樣，成為我一想到或提到那段歷史心中就湧現的血紅形象。

李宗農不願多談她母親胸脯上的傷疤，也不願談他目睹傷疤的感受。他只是幾次提到他母親是個非常善良忠厚的人。我相信他的話，因為在四個小時的採訪交談中，在他四處摸索給我找照片的舉動中，我感到了老人的善良和忠厚。

四、「世外桃源」魚木寨

在鄂西與渝東交界的崇山峻嶺中，有一個四周皆絕壁，僅一條窄道與外界相連的土家族山寨——魚木寨。

魚木寨位於湖北省利川市大興鄉內，占地6平方公里，居住著100多戶土家山民。山寨地勢險峻，四周絕壁。清嘉慶四年，在進寨僅1米寬的咽喉部建成寨樓一座，它聳立在絕壁的脊背上，兩面是垂直高度達500米的懸崖。寨樓一樓把關，萬夫莫開，將寨內寨外幾乎完全隔成了兩個世界。相傳當年土司交戰，魚木寨的險要地勢令對方久攻不下。數月後守寨的馬土司扔下活魚掛在前來攻寨的譚土司帳前樹上，譚土司歎道：「要攻克此寨猶如緣木求魚。」魚木寨因此而得名。

一〉、「世外桃源」內的藝術遺存

魚木寨的險峻地勢，不僅使它成了一個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也使它成為富豪、地主們聚財藏富，躲避戰亂的一塊寶地。到1949年時，這兒最大的地主是成家和向家。

在如此偏僻的山寨裡，在這樣一個懸崖之巔，居然遺存有精美的雕刻藝術和豐富的傳統文化，很讓人驚奇，但想到曾經有那麼多有文化的富豪、地主居住於此，又覺得十分自然。

魚木寨的文化是刻在石碑上的。寨上雕刻墓碑始於明末，現存大型墓葬共9座。

最早建成於道光十五年（1853 年），多數建成於清同治、光緒年間。

殘留的墓地石雕

地主成永高夫婦的墓是現存古墓中保存得最完整的。該墓建於清同治 5 年（1866 年），三門二院，占地近 100 平方米，儼然一座宮殿。左右開側門進入墓院，左名「自在宮」，門楣浮雕「迎親圖」，右門與左門對稱，外額刻「五龍棒聖」匾額，匾中陰刻「逍遙亭」，匾下是浮雕「榮歸圖」。正碑「寧穸宮」有 4 柱 3 層，高 5.2 米，底層鏤空，墓主姓名、碑序、詩詞等文字，掩於鏤空纏枝花卉之後。碑上二層或刻忠孝故事，或刻本地風物，總數多達 100 餘件。細看這些雕刻精緻的圖飾，除了上述的「迎親圖」、「榮歸圖」之外，還有「三國故事」、「征戰」、「對奕」、「娛樂」、「仲由負米養親」等寄託古老倫理道德的圖畫以及八仙人物。

為我講解的向富之老人說，該墓之所以能躲過土改和文革的浩劫，全靠成永高的後人吸鴉片。到 1949 年時，成家已經敗落，土地被賣光，成家的後人因此沒被評為地主。既然成家現在已經屬於貧下中農，就不好去毀人家祖墳。這樣，整個魚木寨保留下來了一座比較完整的墓地。

大地主向梓的墓也在同治五年落成，共修建了三年。向梓生前喜愛隱居之樂。其妻閻氏相夫教子，體恤貧苦，鄉民們交口稱賢。年逾古稀時，朝廷賜贈向梓九品封典，官雖小而名聲顯赫。向梓碑墓 4 柱 3 層，碑頂高托印綬，中嵌「皇恩寵賜」五龍捧聖匾額。碑上雕刻豐富，楹聯多出川東文人之手，如：

「千秋功名承雨露，一身嘯傲寄煙霞。」、「數聲蛙鼓傳江岸，萬點螢燈繞夜台。」

因禍得福得以保全的成永高夫婦墓

在魚木寨墓碑千姿百態的石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陽刻於向梓墓碑抱廈頂板上的圓形草書「福」字。該「福」字直徑 1 米，由鳳首龍身交尾物組成。鳳首張嘴揚冠，相對啼鳴，龍身相應繞動至尾部輕盈交合，其情融融。遠觀是畫，細看是字，亦字亦畫，構圖立意極為巧妙。

但是，魚木寨最大最美的石碑和墓葬藝術已經被徹底毀滅了。

那就是地主向光松和地主向光柏的墓。

刻在向梓墓碑上的「福」字

向富之詳細地向我描述了兩座墓的情況。

在一個空蕩蕩的平臺上，向富之指著嵌在石板中的 X 型石基座說，這就是被毀掉了的向光松墓舊址。向光松的墓雕刻最精美，他是六吉堂的族長，身分顯赫，故而墓室墓碑格外講究。

這座大墳整整修了十年時間，最初的石雕師傅帶著徒弟來雕刻，到墓修成時，徒弟帶出的徒弟已有一大幫了。整個地面全是青石砌成，嚴絲合縫，墓碑兩丈多高，碑前有笑羅漢，四根立柱上蹲石獅，碑面上刻有二十四孝、武松打虎等圖案。墓頂從兩面環形向墓碑聚攏，層層增高，頗有威嚴氣勢。「我們小時候經常順著立柱，沿碑頂一層層往上爬，爬到碑頂的平臺上，看石雕的獅子和海螺，好看得很。」

被魚木寨人稱為「罐兒」的向光柏墓，則是魚木寨墓葬藝術的頂峰。墓塚隱於地下，巨石雕砌。最獨特的是建有兩扇可以滑動的石門，石門以機關控制，在石槽上滑動，沉重的石門竟可像現代的鋁合金門一樣開合自如。整個墓室浮雕精美，金漆塗飾，一片輝煌，像一座地下宮殿。向富之老人說：「小時候，『罐兒』是整個寨子的驕傲，誰家來了遠客，一定要帶去觀賞。看過的人，沒有不稱奇的。」

魚木寨內殘存的將軍墓

文革時間，魚木大隊黨支部書記蒲志權一聲令下，「轟隆隆」，石倒碑裂，那些飛龍、鳳凰、石獅、蝙蝠、凡人、神仙通通被打倒，那些絕美的石雕藝術連同它們所蘊含的文化連同川東民間藝人的絕技統統灰飛煙滅！

「真的是可惜呀！」向富之非常痛心地說。「拆墓的時候我在場，那麼美的東西說毀就毀，每一塊青石，都要用鐵鍊子拴住，十幾個年輕小夥子使勁拉才拉得動。墓頂上一塊石頭掉下來，把地上砸了兩尺多深的一

個洞……唉，要是它還在，魚木寨怕是連世界文化遺產都申報成功了。現在魚木寨要發展旅遊，申報文化遺產，但缺少了最有價值的東西。現在老百姓提起蒲志權就罵。他一點文化意識都沒有。」

魚木寨內殘存的地主院子

（而最有文化、學貫中西的才子、向光柏墓主的後代向全恕當時正天天挨批鬥，寫檢討。他不僅無力保護自家的祖墳，連自身都難保——詳見後面〈世外桃源內的人物命運〉。）

魚木寨在 1949 年共產黨到來時，尚存清代墓葬 60 餘座，眼下僅剩六分之一。

許多雕刻精緻的古墓、石碑、牌樓，或形單影隻，或支離破碎，或墊了農舍的牆腳，或成了豬圈的圍欄，或做了洗衣的衣槽……

它們的主人們——那些戰功赫赫的將軍、自尊自榮的二品誥命、身家萬貫的名商大賈，修橋補路的地主善人——當年躲進深山，指望魚木寨的萬丈絕壁能保「世外桃源」的安寧，誰會想到，有「土改風暴」劈天而降。

魚木寨絕壁

二〉、「世外桃源」內的人物命運

講述人：向富之

魚木寨村民，1953 年生

我們村的向全恕雖然劃成地主，但他實際上並沒有收過一天租。他畢業於南京國立中央政治大學，後又到美國留學幾年。解放前，他在國民黨政府中任職，據說官還不小。（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有個姓黃的國民黨老兵從臺灣回來，帶了好多錢，說起當年，得知他是一個少尉。人們轉過來問向全恕，問他當年是個什麼官。他笑了笑說：「比他大得多。」對了，向全恕在村裡幾十年，極少談起他當年的情況，人們只知道他與蔣經國先後同學，並且同蔣經國關係很好，蔣經國曾要他去給他當秘書。（後來我採訪向的女兒向書馥，她證實了這一點，但究竟是要去當秘書還是已經是蔣經國的秘書，向書馥也不清楚。）

國民黨撤離大陸時，要向全恕到臺灣，但他選擇留下來。我曾經問過他為什麼不走，我與他是同輩，我叫他全恕哥。他說：「當時我想，共產黨把這麼大個中國都打下來了，小小一個臺灣打不下來？」

正好在那個時候他奶奶去世了，他就對上司說要回鄉奔喪，安葬了奶奶後再去臺灣。他回到家鄉後不再走了，共產黨來後，他主動去交待了自己的情況，應當說算是投誠吧。但是，土改時還是把他劃為地主，沒有殺他，把他抓進監牢關了七年。

向全恕家雖然家大業大田土多，但向全恕並沒有在家當地主，家裡全部是他妻子劉達梅（音）操持。劉達梅是個非常賢慧善良的女人，佃戶到她家，不管為什麼事，她都招待吃飯。她家還開了一個藥鋪，村民生了病，只要家境貧困，一律免費抓藥。至於一些傷風感冒的小病，全部免費為村民醫治。向全恕每次回鄉，都要叮囑劉達梅，要善待佃戶，善待鄉民。我當時雖然還沒出生，但我後來聽長輩和村民說起，都說劉達梅是個大善人。對了，忘了說，我是地道的貧農

唯一還留在魚木寨的向家後代向書馥

魚木寨地主院子中殘留的夫子訓

後代，當年我們家窮得房子都沒有，一家人住在岩洞裡。

土改時把劉達梅弄來鬥，鬥不起來，農民們對她沒得一點仇恨。土改工作隊發動一些不懂事的年輕娃上去打她耳光，結果那些年輕娃被他們父母一頓臭罵：「她是個莫子（什麼）人你不曉得？一個大善人！上面來政策要鬥地主，做個樣子就是了嘛，你好孬不分就去打？」

其實我們這兒的民風是很淳樸的，很少有打架鬥毆的事發生。聽老人們講，當年地主和佃戶的關係也很融洽，交不起租就算了，從來不逼。雖然土改發動農民鬥地主，但村民都很溫和，搞得不火，我們村也沒有槍斃一個地主，劉達梅後來是病死的。

再說向全恕，他勞改回來後就待在家裡，堅決不下地勞動。他以他有痔瘡為理由，拒絕出工。隨便怎麼說，就是不去。向全恕這個人生得高大威武，個頭接近一米八，雙肩寬闊，顴骨突出，雙目有神，看上去很有氣度。我經常想，他要是穿上軍服，戴上軍帽，肯定更威武。他靠什麼生活？他懂醫，給村民看病，抓點藥。大多數時間他在家抄藥書。還有，他的英文相當好，他自己寫東西全部用英文，沒得一個人看得懂。那時我們家沒得石磨，他家有，所以我常到他家去磨麵，擺談間，覺得他很有知識，比如講起長江這一帶的地理、歷史，他清楚得很。

還有，他說話的方式、神態，與眾不同，不緊不慢，溫溫和和，對，就是你說的「儒雅」。（他女兒後來告訴我，她父親一直讀書讀到 30 來歲。）

也許是書讀多了，他變得很倔強，除了前面說的堅決不下地勞動，他還堅決不喊「共產黨萬歲」和「毛主席萬歲」。

魚木寨地主院子門上的標語

文革時把他抓來鬥，強迫他喊。他說：「哪裡有『萬歲』？政權還是個人？秦始皇想萬歲，也想他的王朝傳萬代，做到了？歷史上哪朝哪代哪個人生存了萬歲？」

鬥他的人強迫他彎腰 90 度，成直角，他個子高大，受不了，我親眼看見，那個汗水大滴大滴從臉上滾下來……後來又強迫他寫檢討認罪，他寫了交上去，過不了

關，他們說那不是檢討，又寫，還是過不了關，這事折騰了好久，後來怎麼解決的我就不清楚了。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地富全部摘帽後向全恕總算走出家門做了點事————到5里外的大興鄉中學教英語。是上面來人找的他，當時恢復了高考，要學英語，我們這一帶英語教師奇缺，所以找到他。這一次他倒是答應得爽快，可惜已經是60多歲的老人了，只教了幾年就又回了家。

向書馥：爸爸是1995年大年初一那天去世的，早上他還吃了幾個湯圓。他活了78歲。

採訪時間：2006年7月14日

地點：湖北省利川市大興鄉魚木寨

採訪後記

沿一條慘不忍睹的山間土路，彎彎拐拐，顛顛簸簸趕到魚木寨，已是夕陽西沉時分。聽說寨裡的向富之比較瞭解魚木寨的文化和歷史，我便住到了他家。

看完幾個墓地歸來，夜幕已降臨。晚飯後，同向富之坐在涼風習習的院壩裡，頭頂滿天星光，聽一個貧下中農講「那過去的事情」。

我原本是在聽唱一首控訴地主罪惡的歌中長大的，那首歌叫〈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

譚松、向富之合影於魚木寨

「月亮在白蓮花般的雲朵裡穿行，晚風吹來一陣陣歡樂的歌聲，我們坐在高高的穀堆旁邊，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那時候，媽媽沒有土地，全部生活都在兩隻手上。汗水流在地主火熱的田野裡……」歌聲淒涼、哀怨、悲涼，把「媽媽」的悲苦和地主的兇殘渲染得淋漓盡致。

歌唱之後，「革命群眾」（包括我們這些接受階級教育和階級仇恨的中小學生）一邊熱淚滾滾，一邊振臂高呼:「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打倒萬惡的地主階級」、「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歌唱和口號之後，押上來幾個面色慘白，魂不附體的地主（或地主子女）。被歌聲和口號點燃的仇恨轉化為暴力，劈頭蓋腦砸向那幾個「落水狗」。

我親眼目睹過歌聲之後的斑斑鮮血！

我親耳聽見過口號之後的聲聲慘叫！

絕壁上的石梯

幾十年後，我坐在山鄉高高的岩頂上，聽一個貧下中農講那過去的事情。

「地主劉達梅是個大善人」、「地主向全恕溫和儒雅」、「免費為農民治病」、「對佃戶很和善，交不起租就算了」……

向富之的故事與「媽媽的事情」哪一個是真實的呢？

向富之沒有必要向一個匆匆的過客撒謊，而「黨媽媽」則有太多的需要向它統治下的順民（愚民）撒謊。

況且，「媽媽的事情」中至少有兩點讓人困惑：一是「晚風吹來一陣陣歡樂的歌聲」。這幾十年「社會主義農村」有多少「一陣陣歡樂的歌聲」？是餓死幾千萬農民的日子、是被捆在鄉下動彈不得的歲月、還是在「三農」問題一直嚴重的年代？二是「那時候，媽媽沒有土地」（因此只得去給地主種地，受剝削，過悲苦的日子）。那麼，「媽媽」現在有土地了嗎？我們那首歌一唱多年，「媽媽」的土地在哪兒呢？

聽向富之講完，已是下半夜。月亮升起來，清光無語，蛙鳴更靜，徐徐的夜風越過萬丈絕壁，吹來滿懷的惆悵和淡淡的憂傷。

魚木寨外的崇山峻嶺

血紅的土地

——從土地革命到土地改革到土地財政

譚松

這是一塊養育了一個古老民族，承載了一部悠遠文明的土地！它遼闊浩瀚、豐潤厚重。

山巒、江河、荒漠、高原；森林、牧場、草原、田野……千百年來，土地和人民，相依相存，相爭相鬥。

天蒼野茫，鐵血刀槍，演繹了多少亂石崩雲驚濤裂岸的千古大戲！

1921 年，一個幽靈——一個外來的幽靈——悄然降臨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

九十多年前，沒有人預計到，弱小的它含蓄著一種中國五千年之未有的巨大能量——一種高超地利用、駕馭、強暴土地和人民的巨大能量。

幾十年後，它成功了，它君臨天下，成了這塊土地的唯一地主和絕對主宰。

只是——不到一百年，從打出一個「新中國」的土地革命，到「一舉改變兩千年土地制度」的土地改革，再到賣地、「強拆」的土地財政，一波又一波血雨腥風，使這塊古老的土地，浸透了華夏五千年未有之血紅。

一〉、土地革命，奪得天下的法寶

1927 年，國共分裂，兩黨刀槍相見。弱小的中共靠什麼來招兵買馬、搶奪天下？

馬恩的理論太崇高太高深，一般百姓聽不懂，他們看得清楚的，是土地、是財物。

那就從「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財」下手，以富人的錢糧，農民的生命，做為拼殺的力量，打天下的資源。

中共的土地革命最早發生在廣東省海陸豐根據地。1927 年 11 月 13 日，陸豐蘇維埃政權通過《沒收土地案》，決定沒收一切土地，統一分配，實現「耕者有其田」。一時間，燒田契、鬥土豪，殺地富……火煙滾滾，打殺聲聲。到 1928 年 1 月 14 日止，僅海豐縣即燒毀地主田契 47118 張，租簿 58027 本。到 2 月，海豐縣沒收和分配的

土地占全縣土地總數的 80%，陸豐縣占 40%。(《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2 年版)

接下來便是井岡山土地革命了。1928 年 12 月，毛澤東主持制定了井岡山《土地法》，該法依然決定沒收一切土地。1931 年，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該法改「沒收一切土地」為：所有封建地主、豪紳、軍閥、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一概無任何代價地實行沒收。

從《沒收土地案》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理由一直都很神聖很崇高：消滅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使貧苦農民翻身成為土地的主人，讓「耕者有其田」。

中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真的到來了：天上突然掉下一個大餡餅——憑空得到了別人的田地和財物。

該感謝誰？當然是「大救星」共產黨。

那麼，既出於感激，更出於要保住「餡餅」，當然得跟共產黨走：參加紅軍並支援前線。

《土地革命如火如荼——中國共產黨輝煌 90 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年）中寫道：「土地革命使農村的階級關係發生劇烈變動，被壓迫的貧苦農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成為獨立的主人。廣大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翻身，極大地激發了他們的革命積極性，他們親身感受到共產黨和紅軍是為他們謀取利益的，因此積極地從事各項工作，參加紅軍並支援前線。……比如，在湘鄂贛根據地，從 1930 年 9 月到 1931 年 3 月，參加紅軍的翻身農民達三萬多人，翻身農民以實物上繳的土地稅，解決了紅軍的軍糧問題，農民還經常以糧、肉、雞、鴨、布、草鞋、香煙等慰勞紅軍。」（第 80 頁）

把別人的土地財物搶過來，分給他人（也包括給自己），再讓他人既為自己賣命拼殺，又為自己提供後勤供給，同時自己又博得殺富濟貧、解放民眾的美譽——土地革命，一箭數雕！

於是，弱小的「幽靈」四兩撥千斤，由此獲得了強大的能量，正如毛澤東所說：「紅軍雖小卻有強大的戰鬥力，因為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人員是從土地革命中產生的，為著自己的利益戰鬥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190 頁，人民出版社）

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合作，據共產黨說，民族矛盾壓倒了階級矛盾。於是，在這特殊時期，共產黨把激進的沒收土地，改為了相對溫和的減租減息。1942 年 1 月 28 日 , 中共通過了《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實行地主減租減息，農民

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

這種權宜之計的「溫和」，絕非暴力革命的共產黨的本性。果然，當抗戰結束，國共爭鬥又起之時，「打土豪，分田地」這個「土地革命」法寶立馬又被啟用。

戰爭動員需要仇恨，為了挑起仇恨和階級仇殺，把農民栓在中共的戰車上，中共發起了「土地改革」運動。這一次來勢更猛，地域更廣，涉及的人口更多（近億人）。從 1946 年 5 月 4 日的「五四指示」到 1947 年 10 月 10 日的《中國土地法大綱》，中共不僅重返「沒收地主所有土地」的老路，而且鬥、打、鬮、殺更為慘烈。在解放區「明朗朗的天空」下，一時暴風驟雨兼腥風血雨。中國社科院中國革命史研究室主任楊奎松說：「1947 年春天開始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激烈鬥爭中，不僅劃階級標準不清，而且亂打亂殺極其嚴重，幾個月時間就造成了 25 萬人被殺。」（大學論壇第 53 期：中共土改的若干問題，2011-06-03）

（中共搞土改為什麼要大開殺戒，這種暴力手段對中共奪權之前的徵兵、建政之後的立威等起什麼作用，我將在下一章講述。）

在 1947 年血流成河的土改中，雙手沾血、分得土地的農民，被捆在中共的戰車上，為其出生入死打天下。

1947 年 8 月 29 日，《新華社》〈在學習晉緩日報的自我批評〉社論中指出：現在我們是處在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內戰之中，中國人民要以自己的力量戰勝強大的敵人，「最重要的保證之一，就是土地問題的徹底解決，首先是解放區土地問題的徹底解決。」

這個「徹底解決」就是通過殺人徹底奪取地主的土地和平分土地。

中共把土地從地主手中搶來，一邊分給貧農，一邊發動他們打、殺地主。幹了這種殺人越貨的事之後，共產黨告訴農民：要阻止地主們報復，要保住分到手的田地，必須徹底打倒地主階級的總後台蔣介石和他的軍隊。當時解放區流行的一個口號就是「保田參軍」。

一九四六年十月，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中說：「三個月的經驗證明：凡堅決和迅速地執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徹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的地方，農民即和我黨我軍站在一道反對蔣軍進攻，凡執行得不堅決……農民即站在觀望地位。各地必須在今後幾個月內，不論戰爭如何忙，都要堅決地領導農民解決土地問題。」

在 1947 年的全國土地會議上，劉少奇直截了當地說：「搞土地改革，就是為了打勝仗，打倒蔣介石。」（《劉少奇年譜》第 84 頁）所以，共產黨要疾風暴雨般地搞土改，把土地分給農民，讓得到土地的農民「保田參軍」，成為共產黨源源不斷的兵源。

共產黨能在短短的三年裡，打敗強大的國民黨，自然有多種原因（對此，不少學者已經有成熟的研究），在這些原因中，調動（或者說綁架）千千萬萬農民參軍打仗、踴躍支前的土地革命，是共產黨奪得江山的重要原因（法寶）。

重慶市五一技校的李恩章，是當年參加了「解放區」土改運動的工作隊員，他說：「在解放戰爭期間，共產黨把土地從地主手裡奪來分給農民，告訴他們，你們之所以貧窮，就是因為受地主的剝削和壓迫。你們要保住分到手的土地，必須徹底打倒剝削階級和他們的代表蔣介石。農民是很講實際的呀，土地是命根子，拚死也要保。那個參軍、支前才叫踴躍！打起仗來一個個奮不顧身。……共產黨能打敗國民黨，同那些無數要保衛土地、不怕犧牲的農民士兵有極大的關係。」（見筆者《長壽湖》一書第 87 頁）

在三年內戰期間，僅在東北，參加共軍的農民就有 160 萬人，在淮海戰役中，僅支前的民工就有 543 萬人。共產黨之所以能在內戰中鼓動如此眾多的民眾為他賣命，血流成河的土地革命是其「阿拉丁神燈」。

1936 年，毛澤東在延安回答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關於革命、農民及土地等問題的提問時說：「誰贏得了農民，誰就贏得了中國，誰解決了土地問題，誰就贏得了農民。」（《斯諾眼中的中國》）第 47 頁，中國學術出版社）

毛澤東贏得了中國，因為他和他的黨用暴力的「土地革命」贏得（綁架）了農民。

二〉、土地改革，坐穩天下的絕招

1949 年，共產黨以千千萬萬農民的生命為代價，奪得了天下。按理，天下已經是自己的了，暴風驟雨兼腥風血雨的土地革命可以休了。

不，一場更大範圍更多殘暴更多血腥的土地革命開始了！只是，這時不叫「土地革命」，而是把幾年前「解放區」用的名稱搬來，叫做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字面上很好理解，中國的土地制度不合理，要進行改革。

一、中共的「土改理論」，欺騙天下的謊言

1922 年，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蘇共在會上指示中共，要將土地從不勞而食的人們手中收歸，將權力握在自己手中。

智效民在《劉少奇與晉綏土改》一書中寫道：「這次會議對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是非常新鮮的，會議之後，中國共產黨人開始瞭解到，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社會，而反對封建主義的主要內容，就是要打倒軍閥，消滅封建的土地制度。這次會議是中共關注土地問題的開始，而後來所謂的毛澤東思想，不過是脫胎於此罷了。」

從中國的本土文化和傳統中，是很難產生如階級鬥爭、剝削壓迫、無產階級專政、解放全人類等等一大套理論的，但有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有了蘇共這個老師，有了禍害人類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華大地上，一種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就在所難免了。

中共借馬列這個外來的幽靈，在中國古老的土地上「遊蕩」，它石破天驚地診斷出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源——中國有一個殘酷剝削壓迫農民的地主階級和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中國共產黨土地改革史》（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3 年）前言中寫道：「封建土地制度的存在，使廣大農民長期受地主階級的殘害、剝削和壓迫，生活極端貧困和處於破產的境遇，這正是中國被侵略、被壓迫、貧窮落後的根源……」

「反動的封建社會」、「殘暴的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的土地制度」、「地主剝削是農民貧困的根源」、「消滅剝削壓迫」……這些話語，既是中共宣講了一輩子的「革命理論」，更是其拉大旗鬧革命的「合法性」所在。

《中國土地改革史》（人民出版社）前言和緒論中說：從 1921 年算起到 1953 年為止，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農民為廢除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奮鬥了 32 年。

終於，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從而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這樣，中共宣稱他同中國歷史上打江山坐江山的農民造反不同——他站在一個道義高度——消滅剝削壓迫，救民於水火。

這兒，姑且不論其「宣稱」是否是其真實目的，只談其「理論」的錯誤。

1，中國存在中共所說的那個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嗎？

馬克思以西方社會的發展為參考，劃分了人類社會的五種類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中共照搬這種劃分，說中國也經歷這五個階段，為了同西方保持一致，秦至清的兩千多年被稱為「封建社會」。

著名歷史學家馮天瑜教授指出，這種劃分法對中國而言「有名實不符、削足適履之弊。」（詳見馮天瑜《「封建」考論》一書，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6 年）

所謂封建，就是分封建制（建藩），指國王把爵位和土地（包括這塊土地上的農民）封賜給他的臣屬。它由「宗主」或「領主」與「封臣」之間層層分封的金字

塔形結構所組成。封臣又可以再往下分封，政權、土地逐級承包，形成大貴族——小貴族——騎士——農奴的封建結構。在這種封建關係中，封建領主既是貴族又是地主，在封邑中擁有絕對的權力——政治、經濟和司法權。但這些賜封的土地只能繼承不能買賣。封邑中的老百姓（農奴）沒有土地所有權，不能自由遷徙，對封建領主有依附關係。貴族地主對他們則有隨意處置的權力（甚至有「初夜權」）。在歐洲的封建社會中，如果國王侵犯封臣的權利，封臣可以用包括軍事在內的各種手段反抗。

中國從秦到清的社會結構，顯然不是這樣的「封建制度」。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建立了郡縣制，從此以後，中國政體的主要形態是中央集權的皇朝專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帝一言九鼎，「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這同西方完全不同，毫無「封建」可言。還有，中共常說的一個詞是「封建專制」。其實，封建和專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階段，在歐洲的社會發展中，恰好就是用專制來克服了封建（先是英國，後是德國）。「因此，把這兩個合在一塊說很滑稽。」（趙林，武漢大學哲學教授）

從秦到清的兩千年間，中國經濟上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為主體，這與西歐封建社會的采邑或莊園經濟有著本質的不同。中國的自耕農則擁有土地和人身自由，不必依附別人，除了向國家納稅 (包括徭役)，再無其他義務。

馮天瑜教授提出，將先秦至清朝兩千多年統稱為「封建社會」「名」、「實」相離。因為，這個階段的顯著特徵是，土地可以買賣、轉讓，地主——自耕農經濟佔據主導；專制主義的君主集權制覆蓋全社會。馮教授說，中、西的根本差別在於西歐的土地不可買賣，而中國的土地則可以自由出售。因而「地主階級不是封建產物」（見「封建社會再認識」武漢大學學術研討會，2006 年 10 月 14 日）。著名民國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在《我認識了共產黨》（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一文中說：「中國的情形（同西方）迥乎不同，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買賣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約行為，地主也不是世襲的貴族，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階級及任何貧苦人户出身的。說這樣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實在太與事實不相符合。」

中共硬搬馬克思的社會劃分，發展出了一個錯誤的封建社會和荒謬的封建地主剝削理論。於是，從 1931 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到 1947 年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再到 1950 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中共都強調，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中國同封建社會存在了兩千多年，這是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源。

因此，中共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內容便是要沒收地主土地，廢除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

2，農民與地主是這個「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嗎？

抗戰時期，毛澤東發表有關文章，說「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

《土地革命如火如荼——中國共產黨輝煌 90 年》一書寫道：「地主階級有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特權，可以隨意打死或者處死農民。在這種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下，農民過著極端貧困的奴隸式生活。他們曾被迫舉行過大小數百次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見該書「舊中國的封建土地制度」一章）

這是又一個同劃分「封建社會」一樣荒謬的理論。

丁弘教授在《中國地主經濟問題》一文中指出：地主與佃農的關係是租賃關係。農民和地主的關係，是在私有制基礎上自由結合的租賃關係、合同關係、契約關係，而不是什麼強制性的封建關係。

山東大學孫文廣教授在「地主有什麼罪惡？」一文中說：「地主」或者叫做「土地出租者」，出租自有土地，並從中收取地租，這不是一種罪惡，而是一種正當的經營活動。就像把私有住房出租，從中收取房租是一樣的性質。

董時進在〈共產黨的封建和反封建〉一文中說：「中國的封建制度在兩千年前就已經崩潰了，然而到現時中共卻狂熱地喊出一個『反封建』的口號，把它當作他們革命的三大目的之一。這本來是等於無的放矢，但是他們卻創造出了一些假想的敵人。他們第一號的封建標幟便插在地主和富農的頭上。他們說中國的土地制度是封建的，可中國的土地制度與任何民主國家的土地制度沒有區別，而且中國的土地是很零碎地分散在極多數的貧富不等的人們手中。」他指出：中國的土地是私有的，可以自由買賣、自由租佃，無論什麼人，只要有錢並願意買地，同時又有人願意賣地，就可以進行交易。買主有了土地以後，自己願意耕種就耕種，自己不願意耕種就租給別人經營，收取一定的租金或實物。這種租佃關係完全建立在雙方自願的基礎之上，任何人不能向對方提出強制性要求。因此，這種關係是一種正常的自由契約關係，而不是剝削被剝削關係。他還進一步指出：這種制度與其他物品的買賣、占有、租佃，基本上沒有什麼區別，與所謂「封建」也完全沒有關係。

中國以前自由買賣和出租土地，同現在自由買賣和出租房屋在性質上是相同的，現在是房產證，以前是田地契，都由政府收稅蓋章。以前出租土地也同現在出租房屋性質一樣，哪裡來的「殘酷的剝削和壓迫」？

當然，地主群體中也有貪婪、殘暴和為富不仁之人，但這占多大的比例？是不是這個階層的主體？難道貧下中農、工人、商人、共產黨人的群體中就沒有這種人？

可是，中共編造了妖魔般的四大地主——周扒皮、黃世仁、劉文彩、南霸天，

說他們就是整個地主階級的形像，或者說，地主個個都像這種妖魔。

還有，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都是由於「地主的剝削壓迫」造成的嗎？從陳勝吳廣到黃巾起義，從黃巢造反到太平天國，幾十次農民起義是因為土地制度不合理和地主剝削嗎？

學者蔣祖權在〈地主——歷史的冤大頭〉一文中說：中國歷朝歷代的農民暴動，沒有一次是地主剝削直接導致的。沒有一次是因為在土地問題上和地主的矛盾激化導致的。他說，中國農民運動的三大直接誘因是：

1. 天災、瘟疫導致衣食無著。

2. 官府的橫徵暴斂，貪官污吏的巧取豪奪。

3. 宗教組織的趁機煽動。

蔣祖權強調：歷史一再證明，最後激化矛盾導致農民暴動的導火索，是官府的橫徵暴斂和官員的胡作非為！

謝幼田在《鄉村社會的毀滅》一書中說：「許多農民暴動都有紳士參加，他們聯合反對暴政，相依共存，指向政府，主要問題是政府官史對老百姓的壓迫問題，他們都是暴政的被壓迫對象。」（第 116 頁，明鏡出版社，2010 年）

還有，在中共劃分的「二千年封建社會」裡，地主犯法與農民一樣要被告官受審，這原本是歷史的常識，可是，中共非要說，地主比官府還厲害，「可以隨意打死或者處死農民」。（這種現象倒是在中共發動的血腥土改中出現了，只是對象被顛倒——本書中對此有記載。）

在「封建社會」裡，一個人今天買了田地，成了地主（階級），他便因此擁有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特權，可以隨意打死或者處死農民」了嗎？明天他因為種種原因把田地賣了，轉而租地耕種，他便因此要「在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下，過著極端貧困的奴隸式生活」？還有，今天他因為掙錢買了幾畝地，成了地主，於是就成了十惡不赦的壞人（黑五類），明天他因為種種原因把地賣了，成了貧農，於是他就成了革命所依靠的好人（紅五類）？如果今天有人對一個房東說，你因此擁有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特權，可以隨意打死或者處死租戶。」人們一定覺得他瘋了。如果他對有房產的人說，你（因此）是一個壞人，對一個無房的人說，你（因此）是一個好人。人們也會覺得他瘋了。

一個人擁有了土地，無論多少，也無論這個土地是怎麼來的，便成了罪人，將土地出租，便被認定是剝削壓迫，這就是中共的革命邏輯。

不幸的是，這種極其荒謬的「地主剝削壓迫」「理論」，成為中共革命起家的「合法性」，更成為他們暴力鎮壓地主（包括其子女）的理由。

3，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源是「地主剝削農民的封建土地制度」嗎？

中共搞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或者說「革命理論」），那就是：中國的土地制度極不合理，大部分土地集中在極少數的地主富農手上，他們殘酷地剝削農民，這便是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源。

「極不合理」按中共的說法，體現在「占農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占有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貧農、雇農，卻總共只占有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這也就是說，絕大部分土地集中在了極少數人手中。中共頒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政協會會議演講中，都引用這兩個百分比的「理論」做為「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的根據和理由。

這個百分比，據說是「根據廣泛調查和統計資料」的結果。農業經濟專家董時進對這「兩個百分比」提出質疑。他說：根據他研究農業問題三十多年的經驗，他從來沒有聽說有人做過這方面的調查統計。他在《共區的土改與反土改》一文中說：這是完全憑空臆造。因為「這樣的所謂『廣泛的調查和統計資料』，在中國是絕對沒有的。」原因是：這種調查是極其煩雜的工作，就連歐美發達國家也不容易做到。他在《中國土地分配狀況一斑》中寫道：中國土地所有權的分配情形，從無普遍和精確的調查。比較規模稍大的抽查，當推國民政府土地委員會就 16 省 163 縣 175 萬餘戶所舉行的一次，茲示其結果如下：

每戶所有畝數	戶數百分率	畝數百分率
5 畝以下	35.61	6.21
5 畝至不滿 10 畝	23.99	11.42
10 畝至不滿 15 畝	13.17	10.63
15 至不滿 20 畝	7.99	9.17
20 至不滿 30 畝	8.22	13.17
30 至不滿 50 畝	6.20	15.54
50 至不滿 70 畝	2.17	8.83
70 至不滿 100 畝	1.31	7.16
100 至不滿 150 畝	0.72	5.71
150 至不滿 200 畝	0.24	2.76
200 至不滿 300 畝	0.20	3.17
300 至不滿 500 畝	0.11	2.63
500 至不滿 1000 畝	0.05	2.30
1000 畝以上	0.02	1.57

從此表可以看出，五十畝以下占了農户的 95.18%，占了土地的 66.14%；一百畝以下

占了農户的 98.66%，占了土地的 82.13%。而一百畝以上只占了農户的 1.34%，土地的 17.87%，千畝以上之户數只占 0.02%，其地面則只占土地的 1.57%。

董時進說：「本表所示與共產黨人所説的土地集中情形，迥乎不同。共產黨不能亦不肯説出確實畝數，而只用一些『地主』、『富農』等空泛模糊的名詞，以淆惑聽聞。照此表，則一千畝以上者可勉稱為大地主，即使將他們的土地全部分出來，亦何濟於事。」

梁漱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北方進行鄉村調查，他指出，在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的情況下，有土地的人占多數。他寫道：「北方情形，就是大多數人都有土地……（鄒平）全縣 90% 以上的人都有土地，不過有些人的地很少罷了。這情形正與河北定縣——另一鄉村工作地區——情形完全相似。定縣則有《定縣社會調查》一巨冊，此中有關此問題之報告，據其報告，分別在不同之三個鄉作調查：……結論如下：一，90% 以上人家有地。二，無地者（包含不以耕種為業者）占 10%。有一百畝以上者占 2%，三百畝以上者占千分之一、二。」（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第 151-152 頁，香港集成圖書公司出版，1963 年）

1980 年代末期，幾位學者在進行農村社會文化調查時，在浙江省北部找到了一些土改時期的寶貴資料，其中就有 1951 年 5 月村民張榜公布的各戶田地占有情況的原始表格。例如，在海寧縣，土改前在全縣範圍內，有 76% 的土地分散在構成農村戶數總數 86.4% 的中農和貧農手中，僅有 11.6% 的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他們調查的陳家場行政村，68% 的土地分散在占總數 83% 的中農和貧農手中，而僅有 10% 的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曹綿清、張樂天、陳中亞《當代浙江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第 25-26 頁，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 年）

這份真實的土地占有分布表格，可以讓我們管中窺豹：土改前中國的土地，並不是如中共所說的「大部分土地集中在極少數的地主富農手上。」

《中國土地制度與土地改革》（中國檔案出版社，1994 年）一書中說：「民國時期中國耕地若以 14 億畝計算，人口以 4.5 億人計算，那麼人均擁有的耕地則為 3.11 畝……中國人均耕地面積與其他國家相比屬於很低的一類。」（第 10—11 頁）。作者列舉了歐美南美等 21 個國家，其平均人均耕地為 11.37 畝。

本書主要採寫的是川東土改，那麼，川東的地主平均有多少土地呢？《中共成都市委黨校學報》2003 年第 1 期在《解放初四川土地改革及其意義》一文中披露：「土改結束後，地主每人平均從 14.59 畝下降為 1.47 畝。」，這就是說，那些被說成「極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下的「剝削階級」——地主們，平均只有十幾畝土地。而這個 14.59 畝的平均數，是全四川省的，川東地區大多是貧瘠山區，地主們的平均畝

數，應當更低。

正因為中國人多地少，絕大多數地主們也沒有多少地，於是，在劃地主和分土地時就亂來，把擁有土地比該村平均數多一點的中農的土地也拿來分，成漢昌說：「例如在晉緩解放區老區，在被平分的土地總量中，40% 是抽動中農的，河曲、保德、興縣三縣抽動中農土地的比重 45% 以上，還有的地區竟有高達 80% 以上的。」（《中國土地制度與土地改革》第 607 頁）

中共在虛構了一個「極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的同時，又指出了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源——擁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殘酷剝削農民，不勞而獲。

在中共造反鬧革命時，中國的確存在著貧窮，也的確落後。但，這是由於「擁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殘酷剝削」造成的嗎？

《中國土地制度與土地改革》一書說：「近代以來中國的耕地面積不僅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需要，相反還表現出了停滯式下降的趨勢。從 1873 年到 1933 年的 60 年中，中國人口增加了 31%，而同一時期全國的耕地總面積僅增加了 1%，從 1893 年到 1933 年的 40 年間，中國人口增加了 23% 而耕地面積卻沒有任何增加（第 11 頁）。

中國的人口，從秦漢到明清 2000 年間，增長了約 20 倍，其中從漢到明一千五六百年間，中國人口無大變化，歷朝人口最多時只有五、六千萬，中國人口猛增始於清朝前期，前清近百年間，人口翻了一番多。乾隆五十年期間，再翻一番。以後 45 年間，又淨增一個億。

下面是我國古代幾次重要的人口統計數字：

西元 2 年 (西漢平帝元始二年)，	59594978 人。
754 年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	52880488 人。
1066 年 (宋仁宗治平三年)，	2909 萬人（不包括邊地政權人口）。
1281 年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	5883 萬人。
1578 年 (明神宗萬曆六年)，	60692856 人。
1741 年 (清高宗乾隆六年)，	143411559 人。
1790 年 (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	301487115 人。
1835 年 (清宣宗道光十五年)，	401767053 人。

（注，此數字來自筆者講授《中外文化交流史》課程時借來的一本參考書，寫此文時一時未找到該書。）

學者趙文林等在《中國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 年）中以研究的數字表明，在清代兩百餘年間，人口從明代的不足一億猛增到四億多（405.484，單位：百萬），激增的速度前所未有。

正是由於清朝人口猛增，導致了人均土地和人均口糧大減。吳慧先生對中國歷代糧食產量進行了深入和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在《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農業出版社，1985 年）中，列出了兩張表。其中一張表如下：

西漢末	人均原糧 993 斤	成品糧 597 斤
唐	人均原糧 1256 斤	成品糧 665 斤
宋	人均原糧 1159 斤	成品糧 605 斤
明	人均原糧 1118 斤	成品糧 626 斤
清中葉	人均原糧 628 斤	成品糧 350 斤

這張表說明一個重要問題：到清中葉，人均占有糧食數量降到了歷史最低點。這是什麼原因呢？原因就是：人口迅猛增長。由於人口數量猛增，耕地面積的增加跟不上人口的增長，人地關係越來越緊張，農村危機的情勢也越發明顯了。

所以，成漢昌在《中國土地制度與土地改革》中說：「人口與耕地數量之間日益突出的矛盾及農業產量的減少，是造成中國近代農村危機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第 18 頁）另外，他還指出，民國時期，農村的一個矛盾「主要是農業生產關係嚴重束縛生產力的結果。」（第 12 頁）

從學者們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國當時的矛盾不是中共說的地主與農民的階級矛盾，而是人多地少的矛盾和生產力落後的問題，其貧窮落後的原因主要也在於此，而不是「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當然也有對內對外戰爭、社會動盪等原因。）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用董時進先生的一句話來概括：**「共黨基本理論的謬誤，事實的虛假和共黨的真實意圖，這是共黨最大的錯誤和罪惡所在。」**

二、中共的土改暴行，震驚天下的血腥

中共在 1949 年奪得整個江山後，一下接收了全國三分之二的土地和三億多民眾。面對如此遼闊的國土和龐大的民眾，如何儘快地立威、立權、立意（意識形態）俘獲和控制人心？

很簡單，一手殺人，一手分地。

1950 年底，一場疾風暴雨更兼腥風血雨的土改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展開。

「中共所謂的土地改革，無論是收繳財產，殘殺人民還是製造恐怖，都是無比空前的。」（董時進《論共產黨的土地改革》序言）

本書所記錄的，就是這一時期無比空前的殘暴和血腥。

2013 年 7 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作了《川東地區土地改革運動》的學術演講，在講到逼地主財產所用的酷刑時，在座的一位中大女教授受不了，當場退場。

其實，我在採訪和寫作時，同這位女教授的感受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不能退場，正如我在回答那位女教授「不要再講了」時說的：「**如果我們不去正視苦難和殘酷的真相，這樣的歷史就會重演。**」。

下面是我在演講中談到的部分內容：

1、川東地區地主土地和財富的來源

1949 年之前，川東地區地主的土地和財富，大體有以下三種來源：

1、祖傳家業；

2、在外地做官、經商發財後回鄉購買田土；

3、勤勞儉樸，聰明好學，善於經營（這幾點與陳沅森在「土改，中國傳統道德崩潰的開始」一文中提到的完全一樣。）。

川東地區，由於種種原因，如地理的原因、析產制（子孫分家產）的原因等，少有良田千畝的大地主。這三種來源中，占大多數的是第三種（如本書中胡永安家）。這一點正如董時進在 1949 年 12 月致毛澤東信中所說：「他們大都是一些勤儉的、安分守己的分子，他們的財產多半是由辛苦經營和節省積蓄而來。」「地主富農之所以成為地主富農，除少數特殊情形而外，大多是因為他們的能力較強，工作較勤，花費較省。」

2，川東地區地主階層在農村中的作用

在民國時期，政府的職權沒有像中共當政那樣，黨管到村組。當時鄉村的管理，很多都是由地主鄉紳來操辦。他們主要起以下作用：

（1）**興辦教育**。

地主們青少年時期大都受過相當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深受「孔孟之道」的影響。

（2）**興辦公益慈善事業**。

當年政府縣級以下比較軟弱，因此，大量地方事務便落在本鄉本土有聲望的富紳、地主的肩上，如憐貧恤老、救濟鰥寡、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興修水利、宣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都是由他們帶頭發起。

（3）**調解糾紛，主持公道。**

孟子說：有恆產者，始有恒心。——有相當財產的人，做事才有責任心。因此，當年地主擔負了政府職能缺失部分的職責，在農村中起著穩定社會的作用。

3，中共的土改步驟

整個過程由中共派出土改工作隊，領導土改運動。

（1）發動群眾。

工作隊到農村訪貧問苦，培養積極分子，發動群眾。這有幾個步驟：第一，理論教育：剝削壓迫，誰養活誰；第二，建立以貧雇農為核心的農民協會，做為土改執行機關；第三，訴苦會、批鬥會。（過程中伴隨打、殺人）

前面我們談了，中國的土地制度是自由買賣和自由租賃承包的，如果哪個地主收租高了，佃農可以選擇不幹；如果哪個地主對人刻薄，佃農也可以選擇離去。

因為當時的農民不像後來的人民公社共產農奴，有很大的自由度。千百年來，地主與佃農基本上是平和相處相依相存的，大體上維繫了社會的平衡和平穩。如果它真的如中共宣傳的（像劉文彩逼租）那樣殘酷血腥，它還能等到中共這個「救世主」來改變它嗎？因此，千百年來，在中國廣大農村，人們並沒有什麼剝削壓迫的概念。中共要在農村進行階級鬥爭和暴力土改，首先就要撕裂這種平和與穩定，用建立在謊言上的剝削理論和建立在刺刀上的血腥殺戮，雙管齊下，煽起仇恨，屠殺無辜。筆者採訪的當年土改工作隊員戴廷珍說：「批鬥完後就是槍斃，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都要殺人，我記得最少殺了 3 個，最多的有 20 多個。殺完人後就上場演劇，永遠只演一部劇——《窮人恨》。劇的內容有些像《白毛女》，講地主、地主婆如何兇殘，如何剝削壓榨農民。」（注：中共發動土改的程序一般是先「發動群眾」，灌輸「剝削壓迫」理論，挑起農民對地主的仇恨，然後才鬥打和殺害地主。但是，也有一登場就大開殺戒的，如本書中記述的「先轟開，後深入」手法。所謂「先轟開」，就是一入村就把當地的地主和鄉紳們抓來亂槍打死，在製造恐懼，殺人立威之後，再來「後深入」—— 發動群眾搞土改）

（2）劃分階級成分。

土改根據中共 1950 年 8 月 20 日政務院《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劃分階級成分，共分為五種：

a，地主（二地主：其他成分兼地主，或地主兼其他成分）；

b，富農（半地主式的富農）；

c，中農；

d，貧農；

e，雇農、雇工。

（過程中伴隨打、殺人）

劃分階級成分有幾個特點：

一是隨意性：如果沒有地主，便矮子中選高子，把比大多數人富一點的劃成地主（在很窮的巫溪縣，曾把有兩個以上煮飯鼎罐的人家劃為地主）。甚至有小學教師（如本書中的冉德瑜和李曼）因為「教書就是不勞動，是剝削階級」被農會劃成地主。二是報復性：得罪過農會的人，被劃為地主（或富農）。三是可怕性：被劃為地富的人，除本人外，子子孫孫要遭受長達幾十年的迫害。四是荒誕性：人為地製造等級，製造人間的不公。

關於劃分階級成分，《中國土地制度與土地改革》在「錯劃階級成分」一章中寫道：

a. 把占有土地量超過本地平均數量定為地主、富農。

b. 用查三代、查歷史的辦法，把應定為中、貧農的定為地主、「破產地主」、「下坡地主」等。

c. 把政治態度和思想列為劃分成分的標準。（如曾是國民黨員的，對新政權態度不好的就提升為地主、富農。）

d. 亂打亂殺的極端現象十分嚴重。

e. 破壞工商業。

（第 608 頁）

（注：筆者在實地調查中，發現土改劃成分不僅隨意性很強，而且十分混亂，成分多達十幾種，比如：地主就有惡霸地主、大地主、二地主、破產地主、漏網地主、工商業兼地主、地主兼工商業等；富農有自耕富農、佃富農等；中農有富裕中農、佃中農等；還有小土地出租、小土地經營、自耕貧農，小商小販等等。）

（3）沒收和分配地主土地財產

由農民協會沒收地主的土地和財產，分配給農民，發土地證。（過程中伴隨打、

殺人。同時還動員參軍「抗美援朝」，川東忠縣因此死亡 527 人，豐都縣死亡 443 人——見該縣縣誌。）

1950 年 6 月 30 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第二條規定「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餘的糧食及其在農村中多餘的房屋（即「五大財產」）。但地主的其他財產不予沒收。」但是，在土改中，地主的糧食和房屋幾乎全部被沒收，而不是「多餘」（詳見本書）。更可怕的是用極其殘暴血腥的手段把「其他財產全部沒收」（即所謂「浮財」——金銀財寶）。整個土改中，最血腥、最殘暴、最恐怖、最下流的現象就發生在這個階段。土改也是一場有組織有計畫有部署的酷刑運動，僅川東地區我所瞭解到的酷刑種類即多達數十種。

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第三十二條規定：「為保證土地改革的實行，在土地改革期間，各縣應組織人民法庭，用巡迴審判方法，對於罪大惡極為廣大人民群眾所痛恨並要求懲辦的惡霸分子及一切違抗或破壞土地改革法令的犯罪，依法予以審判及處分。嚴禁亂捕、亂打、亂殺及各種肉刑和變相肉刑。」

縱觀中共在中國幾十年的所作所為，能夠看到它執政的一個大特點，那就是：他所說的同他所做的可以是剛好相反。（比如，它說它是人民的公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等。）土改中，為了給大開殺戒創造方便，中共將殺人的審批權下放到區鄉，最草菅人命的現象就發生在下放殺人權的「人民法庭」；最充分執行的就是「亂捕、亂打、亂殺及各種肉刑。」

（4）健全政權等

土改後期，一是土改積極分子入黨、建立基層政權；二是進行複查（所謂複查就是又補劃一些地主分子）。

（5）土改的成果（官方說法）

到 1952 年底，除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外，全國實行了土地改革。

a，徹底摧毀了封建剝削土地制度，改變了農村的生產關係；

b，使全國 3 億多農民無償分得了約 7 億畝土地、近 300 萬頭耕畜、近 4000 萬件農具，以及 3800 萬間房屋和 105 億斤糧食；（僅第三期土改中，川東從地主的賠罰果實中每戶貧雇農平均分得米 224 斤。）

c，廣大農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在政治上經濟上翻了身；

d，農村生產力得到解放，為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國家工業化開闢了道路；

e，進一步鞏固了工農聯盟和人民民主專政；

f，摧毀了美蔣反動集團的社會基礎。

4，土改為什麼非要殺人？

「土改殺人，沒得道理呀！土地要收就收吧，如果地主不幹，要反抗，你再鎮壓、再殺人。不！不僅把土地、財產全部收繳，還要殺人！不僅殺地主，還要整他們的子孫後代，一整幾十年。世上沒得這個道理。」——這是本書中一個被整了幾十年的地主後代的「困惑」。

這也曾經是我的「困惑」。

和平手段本可以達到分田地、均貧富的目的（如臺灣土改），但中共棄而不用，非要殺人，為什麼呢？我們來看劉少奇在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上做的政治報告（1956 年 9 月）：「我們黨沒有採取單純依靠行政命令、『恩賜』農民土地的辦法去進行土地改革……用徹底發動農民群眾的群眾路線的方法，充分地啓發農民特別是貧農的階級覺悟，經過農民自己的鬥爭，完成了這一任務……由於我們採取了這樣的方法，廣大的農民就站立起來，組織起來，緊緊地跟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鄉村的政權和武裝。」

從劉的政治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共非要搞血腥土改是有其「錦囊妙計」或者說「偉大韜略」的。

這個「偉大韜略」就是，中共希望借助土改達到其秘而不宣的目的。

有人說，唐吉訶德臆想了一個風車敵人與之作戰，共產黨也臆想了一個地富敵人與之作戰。這話不準確。地富究竟是不是兇惡魔鬼和仇敵，中共高層心裡有數。

以毛為首的中共元老們有不少自身就出身於地富。社科院楊奎松說：「地主都像我們書裡寫的那麼壞嗎？為什麼我婆婆一點也不壞呢？……後來再看毛澤東、劉少奇，包括後來鄧小平女兒等等談自己地主富農家庭的回憶，發現他們多半也都對自己的父輩或祖輩沒有惡感，而且都直言不諱地認為他們都是勤勞致富的。」（《大學論壇》第 53 期：中共土改的若干問題。）因此，中共非要把地富樹為惡魔和仇敵打殺是另有原因。

中共在奪權後，讓前國統區人民對新政權儘快臣服和畏懼的「高招」是什麼呢？

是殺人！

他們啟動了打天下的法寶——暴力土改。

土改運動是與鎮反運動同時進行的，殺人也是同時進行。毛澤東嫌殺人太少，1950 年 10 月，他親自主持通過了新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一再督促各地要「大殺幾批」。在毛澤東的強力推動下，殺人的槍聲響徹了神州大地的城鎮和山鄉。

暴力土改，一箭三雕：

（1）殺人立威。

陳沅森在〈談談「土改」「殺地主」〉一文中寫道：「殺地主，沒有任何標準。每個村子都要殺，不殺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規定：『村村流血，户户鬥爭』。假設那個村子裡沒有人夠資格評上地主，就將富農提升為地主；假設連富農都沒有，就『矮子裡面拔將軍』，把某位倒楣的富裕中農提上去……當年殺地主是用槍頂著後腦勺，從背後斜著向上開槍。一聲槍響，天靈蓋便被打飛了，紅色的鮮血、白色的腦髓，撒滿一地……殺多了，嚇怕了，反抗者都縮頭了，新生的紅色政權便鞏固了。」（《大參考》2005.03.17）

本書中對此的講述不少。如受訪者關德仁說：「槍斃李鎮宇前有 600 多人聯名來保他，説他不該殺。區土改工作團説，解放後他還有這麼大的勢力，解放前不知有多大的勢力呀，殺！」

中共一來，把多年來在鄉村中的頭面和受尊重的人物一番鬥打之後再一槍打死，這樣便在很短的時間裡，顛覆和改造了農村中傳統的人際關係，讓人害怕，從而樹立起新政權的威風。

（在這一場殺人權下放到區鄉的狂風暴雨式殺人運動中，大量無辜生命被祭獻在土改血腥的祭壇上。中國兩千多年的土地制度，在極短的時間裡被徹底改變。在這場天翻地覆的變革中，暴風驟雨的槍聲和腥風血雨的虐殺是它的顯著特色。）

（2）讓農民雙手沾血，從而緊跟黨走。

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大讚暴力流血的群眾運動。中共通過這種發動群眾用暴力搶奪土地的辦法，讓農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對立。雙手沾血的農民就只能跟著共產黨走。毛澤東明確講，要讓農民「與地主撕破臉」。毛澤東曾親自指示說：「每到一處，先必製造恐懼，以鞏固基層政權。」

製造恐怖，有利於建立和鞏固黨的基層政權，讓老百姓目睹恐怖和參與「恐怖活動」，使他們不得不同共產黨站在一起。否則，他們也可能會成為被鎮壓和被專政的對象。所以，土改不僅讓分得了土地的農民感恩，而且也害怕。

由此可見，這個「偉大韜略」其實很簡單，就像黑社會為了脅迫人入夥，最直接的辦法就是讓他去殺人。身負人命，雙手沾血之後，「入夥人」沒有了退路，只得死心塌地跟他幹。正如學者秦暉在〈土改為什麼要搞得那麼血腥？〉一文中所說：「要讓大家拋頭顱灑熱血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讓你沒有退路。」「如果共產黨的

勝利他們可以得到好處，共產黨的失敗他們就會有生命危險，那當然他們就容易被高度地動員起來。因此，一定要搞流血土改。」劉少奇曾多次談到為什麼要搞血腥土改，如 1947 年 4 月，劉少奇到晉察冀中央分局講：「要以複查（土地）為中心，動員黨政軍民的力量搞個徹底，所謂搞徹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徹底了，負擔重些，農民也甘心，擴兵也容易。」秦暉說，這種再三複查的意義並不在於再找一點土地，而是再流點血，要形成一種你死我活的氛圍，只有這樣，高強度的動員擴兵才可以實現。

（3）消滅中國傳統文化的承載者，讓外來的馬列主義登堂入室。

地主鄉紳們大多是中國農村中有文化的人，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承載者和傳承者。謝幼田在《鄉村社會的毀滅》一書中說：「他們是中國精英文化的代表者，他們主導了中國社會以和諧、平衡、統一為基本特點的文化價值系統……他們根據儒家的文化精神遏制對財富的貪婪欲求，改進土地制度，使得中國社會能夠基本保持穩定，使得鄉村社會成為密不可分的整體……」（書第 228 頁）中共要在中國廣大農村一下子徹底剷除中國傳承了幾千年的道德觀、是非觀和價值觀，遠非易事。面對這個「難以解開的節」，中共採取了「快刀斬亂麻」——殺人！直接從肉體上消滅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承載者和傳承者——地主鄉紳，從而讓那外來的「階級鬥爭、暴力專政、消滅私有製」的「馬列文化」佔領中國的農村大地。

一方面殺人立威，一方面讓你雙手血淋淋地拿到土地，從而死心塌地「加幫入夥」，同時，把代表中國精英文化的地主士紳從肉體上斬草除根（城市裡則是強迫「思想改造」），從而盡快讓外來的馬列主義登堂入室。這就是中共非要搞暴力土改（也就是「殺人土改」）的全部奧秘。

共產黨成功了，他在僅僅兩年的時間裡（有的地方還沒有兩年），不僅一舉廢除了中國兩千年的土地制度、消滅了中國農村的精英階層、顛覆和改造了農村中傳統的人際關係和價值觀、是非觀和道德觀，而且迅速在廣大的農村土地上建立起了他的基層政權。

5，中共的土地改革後果

不過，中共這種為控制和坐穩天下所使用的反天理反人性手段，雖一時得逞，但卻產生了惡劣的後果和嚴重的後遺症。我在演講中列舉了十大惡果：

（1）摧毀了中國農村的精英階層。

土改在政治上、經濟上、肉體上摧毀了中國農村的精英階層，這個階層的人大

多是有經營頭腦，勤勞能幹而又深受傳統文化薰陶的鄉紳。

第一，地主大多都是文化的傳承者，他們就是當時鄉村的文化精英。

第二，地主大多具有較好的道德素養，這是因為他們一直受儒家忠孝仁愛禮義廉恥的薰陶。

第三，地主大多是農村中最有經濟頭腦而且善於經營的人。

第四，地主大多都是省吃儉用不事奢華的人。

（2）破壞了中國鄉村的和諧，使殘暴和血腥在中國鄉村大行其道。

土改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國家暴力，在廣大農村煽起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仇恨和虐殺。中共為了自己打下天下坐天下的真實目的，以消滅剝削制度，解救勞苦大眾為幌子，人為地製造仇恨，把人性中的惡瘋狂地激發出來，中國鄉村的和諧被破壞，維繫人際關係的基本準則被徹底顛覆。恐怖開始像瘟疫一樣四處氾濫，中國農村從此失去了田園牧歌式的寧靜。土改所使用的那些暴力手段在隨後的反「瞞產」、「四清」、「文革」等運動中反復出現。文革中湖南道縣殺人的理由之一就是「土改補課」。土改之後的殺人風和種種殘暴血腥，無論是指導思想，還是操作方式，都是暴力土改的繼續和重演。（包括後來殘酷虐待法輪功學員的那些下流手段。）

（3）改變了農村貧富價值觀——以窮為榮，以富為惡。

土改前，農民以富為榮。土改後，富就是壞，是不仁，窮則成了一種資本（出身好）。這種價值觀念的改變，破壞了農村的經濟發展，人們不再（也不敢）辛勤耕耘，發家致富。

（4）培養灌輸了恩人和救星意識。

土改使貧苦農民不僅分得了土地和別人的財物（「勝利果實」），還被新政權當作依靠物對象，因而使農民產生了強烈的「翻身感」，他們對新政權、對黨和領袖充滿感激。這就為樹立起共產黨尤其是毛澤東本人在農民中大救星、大恩人的權威，為中共和毛澤東後來隨意整治農民、折騰農村奠定了基礎。（一個強大到可以隨意給你一切的政權，也可以強大到隨意奪走你的一切。所以後來合作社、人民公社，農民們不僅乖乖地把土地交出來，連私人的物品和自由耕種的權利也交了出來。因此可以說，土改形成了新的國家與農民的關係，中共通過土改，強化了對農民的控制力。）

（5）把不勞而獲、搶劫瓜分別人財物的土匪行為，當作反剝削反壓迫的革命行

動。

農民們對本鄉本土的地主是怎麼發家的，他們是怎麼掙得那些財產的，心裡十分清楚。平白無故地去搶奪別人的財產只能是土匪。可是，中共卻用謊言、暴力和利益引誘，發動農民去幹這種傷天害理的土匪行徑。中共的這種做法，既敗壞了人心和道德，又為社會亂象埋下了隱患。

（6）建立了惡質的鄉村政權。

中共通過土改，摧毀了幾千年來的傳統社會基礎，建立起一個由他嚴密控制的社會。土改利用一些「積極分子」——流氓無產者（大多是地痞、流氓、惡棍、懶漢等）——做為「革命的依靠對象」衝殺在前。土改要造成一種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和階級對立，但中國農村原本沒有這種對立，大家鄉裡鄉親，不少地主與農民還沾親帶故，或者同宗同姓，要鬥殺地主，農民們「革命積極性」不高，怎麼辦？毛澤東當年在《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中就發現並大加讚揚了一種「革命先鋒」，這就是：地痞流氓。這種流氓無產者都是土改中的「積極分子」。他們衝殺在前，敢鬥敢打敢殺，成為「革命的依靠對象」。在土改結束後，這批「積極分子」紛紛入黨做官進入政權，成為了中共農村的基層幹部。以前中國廣大鄉村沒有黨團組織和龐大的行政機構，中共藉土改建立和建全了農村的黨政組織，培養了一大批集權統治的支持者和追隨者，從而把黨的神經伸到了每一個偏僻山鄉。而這個組織系統中的成員很多就是土改中湧現的這種「積極分子」。中國的鄉村政權便落在這樣一幫沒有文化、品質低劣的人手裡。

（7）摧毀了鄉村的文化藝術。

一是燒書。

當年，中國長期是個以農業為主的社會，知識精英大多出自鄉村（而且還往往「告老還鄉」回歸鄉里），因此，中國鄉村也是文化藝術的聚集之地。不少地主家裡都有多少不等的藏書和字畫。土改時，這些書畫也被抄繳。

但是，農民協會和分「勝利果實」的「翻身農民」們，一心想要的是金銀財寶，他們對詩書字畫不感興趣。另外，中共當局教育農民，地主之所以壞，就是因為讀了這些封建毒物。因此，大量民間藏書被焚毀。比如忠縣花橋鄉土改農民將書畫當柴燒，整整兩月，將舉人沈氏世代藏書燒完。又如利川大水井著名學士李孟洋的書畫（包括不少珍本）被 10 個人專門焚燒，燒了半年才燒完。焚燒後的書灰被做為肥田的上等肥料。

二是毀物。

1949 年之前，在中國鄉村，有不少規模龐大而又古色古香的地主莊園。這些莊園往往集建築藝術、手工雕刻、傳統民俗、儒家文化於一身。

1949 年土改之後，這些莊園不是灰飛煙滅就是被五馬分屍。（見本書第五章的記載）

（8）人為製造等級，造成不公與欺壓。

首先是不公：土改把人分成了地主、二地主、富農、中農、下中農、小土地出租、貧農、雇農等不同的等級。不同等級的人享受不同的政治、文化教育、招工就業等待遇。這種劃分不僅缺乏合理性，而且隨意性極大。第二是欺壓：被劃為貧、雇農的等級，被做為革命的依靠對象，不僅有優先享受政治待遇、文化教育、招工就業的權利，更有欺壓（甚至虐殺——如文革時期）地富等級的特權。

（9）造成了一個龐大的不幸群體。

土改劃分了階級成分，被劃為地主、富農的人和他們的子女，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肉體上遭受了長達幾十年的歧視和迫害。階級成分論影響了幾代人的命運。（本書對此有詳盡的記述）

（10）把「殺人越貨」賦予一種「崇高的革命性」。

如：a、土改廢除了反動的中國封建土地制；消滅了剝削制度；實現了「耕者有其田」。

b、土改消除了貧富不均，讓貧苦農民翻身做了主人。

c、消除了民族被侵略、被壓迫、窮困及落後的根源，解放了生產力。

d、進一步鞏固了工農聯盟和人民民主專政；摧毀了美蔣反動集團的社會基礎……

殺人越貨如果已經不是一種犯罪而是一種由國家和政黨推動的崇高的革命行動，那麼，它一旦轟轟烈烈展開，其範圍之廣，程度之深，破壞之烈，遠在一般的犯罪之上。實施者毫無心理障礙，受害者無法申冤叫屈。文革中紅衛兵滿懷激情地打砸搶抄（家），湖南道縣貧下中農義憤填膺地屠殺地富反壞，都是這種把殺人越貨當作崇高革命的惡果。

中共這個「幽靈」誕生以來的許多惡行現在都已經多少得到了揭露和批判（如反右、大饑荒、文革等），但土改的「鐵幕」還遠遠沒有掀開，其「合法性」還「偉

大、光榮、正確」地巍然挺立。今天，我們回頭看去，中共的這種「崇高的革命性」全是一派謊言。如：中國農民現在「耕者有其田」了嗎？中國農民現在翻身作了主人了嗎？土改之後，農村的生產力得到解放了嗎？中國的貧富不均現在消除了嗎？中國老百姓現在不再被欺壓了嗎？

6、土改殺了多少人？

1950 年底到 1952 年的土改運動是同鎮反運動同時進行的，殺人也是同時進行。對地主和所謂的反革命分子實行「關（押）、管（制）、殺」。關於這期間「關、管、殺」的總數，官方直到 1989 年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何理主編，北京檔案出版社）中第一次公布：殲滅土匪 240 餘萬、關押種各類反革命分子 129 萬、管制 123 萬，殺 71 萬。

不少學者不認同這個數字。

土改研究學者、《鄉村社會的毀滅》一書的作者謝幼田認為，這是大大縮減的數字，他經過研究，認為「殺人數目至少是五百餘萬人」。（詳見該書「殺人比賽」一節，明鏡出版，2010 年）

曹長青在〈中共殺人記錄不能忘記，不能饒恕〉（2013 年 7 月 3 日）中寫道：「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在《中國的民主》一書中的數字：50 年代初期，中國有二千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分子。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 年 7 月 17 和 18 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為 100 萬至 400 萬之間。」

學者胡平在 2005 年 1 月寫道：土改中一共殺了多少地主富農？保守的估計也在 200 萬以上。

學者、歷史學家辛灝年在演講中提到，土改殺了 260 萬地主。

中國社科院的學者楊奎松說：「全國許多省份出現亂打亂殺的情況。後來毛澤東有過一個說法，他說中國有 3600 萬地主，其中有 400 萬地主是壞的，因此在土改中殺了 100 萬，關了 100 萬，管制了 200 萬。但實際上，整個土改以後，地主、富農連同其家屬基本上都被管制了……當年被管制的農村人口之多，恐怕也是 200 萬的幾倍吧。」（《大學論壇》第 53 期：中共土改的若干問題）

我認為，中共在土改中究竟殺了多少地主和所謂的反革命，在中共各地的檔案公開之前是很難有較準確的估計的。其實，即使有一天相關檔案公開（如果不被有意銷毀的話），也不是實際準確的數字，因為，當時有些殺人根本就沒有記載（自

殺的更是不被公安關注），比如本書中《我兩個父親，同一天遇難》一文講述的那次殺人（殺了 12 人），公安檔案中就沒有任何記載。

中共為了自己穩坐天下，據一切財富、資源於自己一身，不惜冤殺數百萬生靈，迫害數千萬他們的子孫，並且至今還讓他們背負著「殘酷剝削壓迫農民」的罪名，與此同時，他把自己打扮成「解放」眾生的救世主。它一方面編造地主剝削壓迫的理論、編造劉文彩《收租院》之類的罪惡，一方面實施剝削壓迫的統治，在謊言的欺騙和暴政的淫威下進行瘋狂的掠奪，這，就是中共統治幾十年的歷史真相。

三〉、土地財政，享樂天下的盛宴

一、「耕者有其田」，一個世紀的大騙局

多年來，中共把「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喊得震天響，把自己抬到一個「普救眾生」的道義高峰，在這個高峰，他君臨天下、指點江山，氣吞萬里如虎！

他的確曾把從地主那兒搶來的田地分給了農民，農民也的確喜滋滋地領到了印有「大救星」毛澤東頭像的土地證。可是，幾十年過去了，中國農民現在「耕者有其田」了嗎？那一張珍貴的「根據共同綱領第二十七條：保障農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權」的土地證又在哪兒呢？

農民不會知道，就在他們領得土地證（甚至尚未領到手）時，當局已經在制定收回全部土地的「社會主義宏偉藍圖」。1951 年 9 月 9 日，在土改僅僅進行了大半年時，中共中央就召開了由毛澤東主持的全國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準備收回土地。他們更想不到，短短幾年後，他們不僅將失去土地，而且將失去自家的耕牛、農具，失去遷徙、打工的自由，成為「人民公社」牢籠裡的「共產農奴」。（當然，還有一個絕對想不到：他們中的幾千萬人將會從「共產農奴」變為冤死餓殍。）他們的命運，其實早就注定了。因為，由蘇共一手扶大的中共，它一定要重蹈蘇共這個「奶媽」的覆轍。

蘇共在 1930 年初實行了強制合作化，農民在蘇共的威脅下不得不加入集體農莊。「許多州提出這樣的口號：『誰不加入集體農莊，誰就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許多地方建立的不是集體農莊，而是公社，用強制辦法把農民的全部小牲畜，家禽和自留地公有化了。」（《讓歷史來審判》羅維奇.麥德維傑夫著，第 148 頁）

蘇共和中共的革命目標之一是要消滅私有制，因此，他注定不可能讓農民擁有

土地，「耕者有其田」只是他打天下的手段（正如他當年高喊「民主」、「自由」一樣），一旦大功告成，所有財產就要「歸公」——歸到自己手中。

蘇共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莊，中共強迫農民加入人民公社；蘇聯農民在集體化後兩年裡（1932 ～ 1933 年），餓死上千萬，中國農民在公社化後三年裡（1959 ～ 1961 年），餓死幾千萬；蘇共在大饑荒後大搞「階級鬥爭尖銳化」，抓、關、打、殺，腥風血雨，中共在大饑荒後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抓、關、打、殺，血雨腥風；蘇共要犧牲農民，榨取農民的血汗聚積發展工業（尤其是國防工業）的資源，中共要殘酷剝削農民，以「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來聚積發展工業（尤其是國防工業）的資源……

1951 年離開中國的農業經濟專家董時進是個天才預言家，當中國農民歡天喜地分田分地時，他就在《論共產黨的土地改革》一書中預言了中國農民在土改以後的悲慘命運。他指出，共產黨搞土地改革的真正目的，並不是要耕者有其田，而是要把土地收歸國有，從而使它的政府變成獨占全國土地的大地主。因此他在該書中寫道：

> 共產黨慷他人之慨，
> 聰明無比；
> 它把別人的田地和耕牛分配給農人，
> 博得他們一場歡喜；
> ……
> 分來分去，最後把一切都歸了自己；
> 田地和耕牛收為國有，
> 農場變為集體，
> 農人都做了共產黨的奴隸；
> 共產黨聰明無比。

中國農民的命運，在中共誕生的那一刻起，已經被注定了。

二、城市私有地，一夜變為國產

1958 年，中國農村「人民公社化」後，土地便全部「集體化」了，農民手中的土地證成了一張廢紙。那麼城市的土地呢？ 1956 年中央批轉的《關於目前城市私有房產基本情況及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意見》中，已經有「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

街基等地產，經過適當的辦法，一律收歸國有」的條款。但是，以巍巍憲法明文搶劫土地是西元 1982 年。當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規定：「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就這麼短短的十一個字，一勞永逸地將城市的私有土地一夜間變為所謂的國有，而沒有給公民的財產損失任何補償。

如此石破天驚的掠奪在任何國家和任何社會都會引發巨大的社會動盪，但在中國大地上，微波不興，一片安寧。（也許，剛從文革血泊中走出來的民眾覺得能活下來已經是萬幸。）

既然城市土地都是國有，那麼，就想法把農民們「城鎮化」，讓他們徹底失去土地。過去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在毛澤東時代還可以算作是生產隊這個集體所有。鄧小平時代搞「承包制」，把集體所有權剝奪了，改成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接下來，通過「城鎮化」，中共又把使用權剝奪了。因為一旦「城鎮化」，土地就國有化了，農民連土地使用權也沒有了。中共熱衷「城鎮化」，就是要讓土地成為黨產，然後不斷地賣土地。2010 年，重慶市所有高校用行政手段強迫農村學生把戶口轉為城市戶口，就是為了這種掠奪。另一方面，即使還未「城鎮化」的土地，農民們也只有使用權，而一旦擁有所有權的黨國要徵用、倒賣土地時，其強徵強拆便「合法」。學者東夫先生說：「這種掠奪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連前蘇聯都沒做到。」

經過一次次的巧取豪奪，這樣，當中共大搞讓他們和他們的子弟們「先富起來」的經濟改革時，中國的土地，無論城鄉，已經是「普天之下莫非黨土」了！

三、賣田賣地，財源廣進

學者熊飛俊在《中國在這裡反思》一書中寫道：「特色中國的極端貧富懸殊是什麼因素造成的？是『公有制』！因為『公有制』的本質就是『官有制』。公有制中國最大的富豪群體是官僚。當今中國最容易發大財的機會是『圈地炒地』。

而『國有土地』的管理權、處置權和利益分配權掌握在『公有制』國家的各級官僚手中，所以，名義上的『國有土地』就演變成事實上的『官有土地』」。

這些新時代的擁有對土地管理權、處置權和利益分配權的「地主」們，雖然官職大小不一，但他們都有一個共性（姓），那就是，他們都姓「黨」。

在一黨獨裁、國產等於黨產的「黨國」裡，中共成了廣袤土地上的唯一地主！他手中有地，心中不慌，轟轟烈烈啟動了一場全國範圍的「土地開發」。

「開發」——賣地——財源滾滾的「土地財政」！

這幾十年來，「黨國」通過賣地收入了多少銀子？

經濟學家吳敬璉 2013 年 3 月 23 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說：過去幾十年來，

政府賺取土地差價至少 30 萬億。筆者所居住的重慶市，據市長黃奇帆披露，重慶賣地獲利頗豐。2012 年重慶市全年的賣地收入為 897.5 億元，「土地收入一般占地方財政收入的 1/3，是重要的第二財政。」（詳見「重慶土地生意」《時代週報》2013 年 3 月 22 日）「黨國」以極低的價格，支付只有使用權的老百姓（你不幹就強拆甚至關押、打死），然後以極高的天價再把土地賣出去。這個「天價」曾達到什麼高度呢？看最新的資料：2013 年 9 月 4 日，北京賣東三環農展館地塊，收入 43.24 億元，每平方米土地賣了逾 7.3 萬元！經濟學家何清漣在〈當中國經濟只剩下房地產時〉（2013 年 9 月 16 日）一文中說：「北京上半年賣地收入已超千億，比去年全年的 600 多億還多好幾百億。」

由此可見，「30 萬億」的價差正是「黨國」賣地的一本萬利。這個巨額價差的背後，是對農民以及城市拆遷居民的殘酷掠奪。正如清華大學社會學者李楯所說，巨大的收益和低廉的土地成本對比，顯示出政府對公眾的一種掠奪。

「黨國」在賣地之外，還有巨額的稅收。《今日財富》2013 年 3 月 20 日報導：據統計，僅針對房地產業徵收的五大稅種，其總收入從 2003 年的 900 多億元，暴漲至 2012 年的 1.01 萬億元，增幅高達十倍有餘。土地與稅負成本占房價的 60% 左右。另據《第一財經日報》2013 年 10 月 12 日報導，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魯桂華計算，房價中 61.33％被中共政府以地價、稅費的方式拿走了，13.03％被銀行以利息的方式拿走了，兩者合計 74.36％，即政府和銀行拿走了房價中的近 3/4。中共地方政府是高房價最大的受益者。

由此可見，老百姓掙得的血汗錢，大部分都流入「黨國」這個中國唯一的大地主口袋中了。這是不是中共所宣揚多年的「地主的殘酷剝削」？

用暴力將私有財產變為所謂的公有，然後又用權力將公有變為權貴們的私有，這兩件傷天害理的絕活，都被號稱要「解放勞苦大眾」的「幽靈」幹了。

「大地主」賣地暴發，於是，他寶馬香車、錦衣玉食、小密二奶、兒孫移民……他不僅創造了世界一流的「三公消費」（公費出國、公費購車、公費吃喝），而且創造了世界一流的「維穩經費」（鎮壓百姓）。

一方面有錢享樂，一方面有錢維護這種享樂——土地財政，享樂天下的盛宴！

遠沒結束的結束語

在賣地的銀子嘩嘩入囊之時，強拆的悲嚎聲聲入耳。巨大的利潤（差價）加上土地「黨國所有」，中華大地上，強拆強徵不容分辯！一方面，土地財政通過出賣

土地養活龐大的地方政府官員；一方面，中共各級官員在賣地中大肆私飽中囊。（土地賣給誰，賣多少錢，完全由中共官員說了算。）原《百姓雜誌》主編黃良天說，中共官員腐敗，60% 以上都與土地有關。

土地，這個中共權貴集團眼中的巨大搖錢樹和聚寶盆，註定是中共層層官員們拼命要搶奪的資源。

巨大的利益讓中共不惜與土地上的「主人」（「耕者有其田」）激烈對抗。

中共官方雜誌《半月談》2013 年 10 月 14 日刊文稱，每年因徵地拆遷引發的糾紛達 400 萬件左右。群體性上訪事件 60% 與土地有關，土地糾紛上訪占社會上訪總量的 40%。

被剝奪了土地和一切權利的老百姓唯有上訪、自殺和被殺了。

不堪剝削無力抗爭的唐福珍自焚跳樓了；

不堪壓迫起而維權的錢雲會「被車禍」了；

……

行文至此，看窗外強拆強徵正風腥雨烈，一如當年分田分地雨烈風腥。

這片承載了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土地，正經受著五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幾十年的「開發」後，資源耗盡、江河斷流，草原枯萎、沙塵瀰漫……

幾十年的「豪賣」後，大地母親已經被賣得所剩無幾（「大地主」也因此吃得腦滿腸肥，撈得缽滿盆溢）。

今後又賣什麼？

不要緊，「黨國」這個大地主早已未雨綢繆。

他賣出的土地只有七十年的使用權！

也就是說，七十年後（大多已經沒有七十年了），賣了的這塊土地又將回歸黨的懷抱！

「紅二代」、「紅三代」、「紅四代」的「革命接班人」們，到時手中有地，心中不慌，子子孫孫不愁吃喝。

我從小飽受「要保證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的教育，這一刻，我理解了這句話的深刻含意。

只是，幾十年後，會不會又是一次暴風驟雨兼腥風血雨？

——這一片血紅的土地啊！

2013 年 10 月

無聲的冤魂

——本書記述的死難者名單

我不知道全國究竟有多少人在1949年中共當權後「非正常死亡」；我也不知道全國有多少人死於土改「有組織的虐殺」。不過，透過本書所採訪的受害者和親歷者，我知道，就在很小很小的範圍內，當年就有以下有名有姓的人遇害（包括朋友撤走篇章中的遇難名單）：

彭達楠（槍殺）　彭達杞（槍殺）　彭達桑（槍殺）　彭達渠（槍殺）
彭達操（槍殺）　彭紹文（槍殺）　彭壽柏（槍殺）　黃世英（整死）
彭河生（槍殺）　彭叔康（整死）　塗延桂（自殺）　陳一村（槍殺）
陳德寬（槍殺）　陳德厚（槍殺）　陳德宣（槍殺）　陳世屏（槍殺）
陳希頤（整死）　李蔚廷（槍殺）　劉溫賢（槍殺）　李詢薨（自殺）
李蓋五（燒死）　李汶舟（槍殺）　李鴻鈞（槍殺）　李沛東（槍殺）
李沛誠（槍殺）　李孟洋（鬥死）　王石泉（槍殺）　王萬木（槍殺）
王在新（槍殺）　陳俊峰（槍殺）　周定芬（槍殺）　顏桂軒（卡死）
韓茂生（槍殺）　張仁強親戚（槍殺）　朱耀庭（自殺）　陶華軒（槍殺）
顏恩統之父（打死）　陶馥軒（槍殺）　陶華軒侄子（槍殺）　倪　氏（自殺）
範　氏（自殺）　熊德超（自殺）　熊實之（烤死）　熊昌明（自殺）
吳澤山（槍殺）　熊德國（自殺）　傅良臣（槍殺）　傅良臣之女（自殺）
彭善慶之妻（自殺）　李鎮宇（槍殺）　李鎮宇（槍殺）　楊天香（槍殺）
馮國翠（整死）　熊異能（打死）　熊異能之母（打死）　楊澤勳（槍殺）
冉德瑜之女（餓死）　謝錫九（自殺）　黃本立（自殺）　李淑蘭（自殺）
黎定鎬（槍殺）　何　瓚（槍殺）　鄭度之（槍殺）　盧增輝（槍殺）
陳子明（槍殺）　黎定武（槍殺）　黎瓊瑤（整死）　黎華舉（自殺）
黎心安（槍殺）　黎華敬（槍殺）　劉玉章（嚇死）　劉玉雙（槍殺）
劉玉雙之妻（槍殺）　甘世伯（槍殺）　劉仁山（槍殺）　王潤民（自殺）
劉丹貴（槍殺）　劉丹陽（槍殺）　周相鄉（餓死）　魏廉周（槍殺）
魏律民（整死）　魏律民之妻（自殺）　朱化成（整死）　柳啟厚之母（打死）
柳直武（整死）　王漢章（自殺）　王漢章之妻（自殺）　梁露仙（槍殺）
梁露仙之女（整死）　伯永梁（槍殺）　朱惠卿（槍殺）　梁文華（輪姦致死）

羅廣瀛（槍殺）
梁樹棻（槍殺）
楊星五（打死）
孫達 X（槍殺）
秦月浦（自殺）
石大軍（槍殺）
江遠璋（槍殺）
吳持恒（槍殺）
劉昂然（槍殺）
譚克昌（槍殺）
吳廉生（槍殺）
張民用（槍殺）
胡益業（自殺）
楊光寶（槍殺）
譚　堯（槍殺）
陳太侯（槍殺）
顏海清（自殺）
駱雲峰（槍殺）
郭達旦（槍殺）
劉順清（槍殺）
張世春（槍殺）
胡耀英（餓死）
成正安之妻（自殺）
施　倫（槍殺）
熊建成外婆（自殺）
羅玉池之妻（整死）
馮國祺（槍殺）
陳德珍（自殺）
冉崇惠（打死）
吳慶蓉（餓死）
莫樹堂（自殺）
謝啟善（自殺）
楊瓊英（自殺）

劉春長之父（自殺）
馬仁庵之妻（自殺）
楊星五之妻（自殺）
周德浩（自殺）
趙西千（槍殺）
趙洪儒（槍殺）
胡德武（槍殺）
鄧必夏（槍殺）
劉集雲（槍殺）
吳善之（槍殺）
張二老薦（槍殺）
吳際才（槍殺）
曹盡成（槍殺）
肖達輝（槍殺）
馮宗山（自殺）
雷夏電（槍殺）
周德益（槍殺）
陳俊峰（槍殺）
楊世君（自殺）
肖方炳（槍殺）
黃明禮（槍殺）
鍾季卿（自殺）
成守義（吊死）
施祖光之父（槍殺）
趙成章（槍殺）
曾　四（打死）
何順賢（整死）
蘇達三（槍殺）
沈士騮（整死）
梁文熙外婆（餓死）
陳　英（打死）
馮立朝（駭死）
盧邦純（整死）

劉祖宣（槍殺）
吳澤山（槍殺）
楊　鶴（自殺）
張國錦（槍殺）
馮啟全（槍殺）
趙洪烈（槍殺）
曾長天之妻（打死）
甯惠溥（槍殺）
汪金文（槍殺）
趙澤之（槍殺）
張書毓（槍殺）
吳宇輝（自殺）
張盡如（槍殺）
王永濤（整死）
賀啟坤（整死）
「魏到」（自殺）
韓孟生（槍殺）
王海明（槍殺）
邱必堅（槍殺）
何光超（槍殺）
劉繼直（槍殺）
胡秀華（強姦致死）
成從仁（打死）
王德清（餓死）
劉自然（槍殺）
李伯融（槍殺）
馮光和（餓死）
曹新煌（槍殺）
沈聯峙（餓死）
梁大剛（整死）
謝時寬（打死）
李立綱（槍殺）
段 X X（槍殺）

劉雨濤之母（自殺）
吳澤山之妻（打死）
張大柱（槍殺）
馬劍秋（槍殺）
高化東（槍殺）
賈欲雄（槍殺）
曾朝定（打死）
寧子敬（槍殺）
張其山（槍殺）
廖代興（槍殺）
羅精益（槍殺）
徐衡山（自殺）
高占田（槍殺）
譚迅如（槍殺）
劉志齊（槍殺）
陳月軒（槍殺）
黃仲舉（槍殺）
邱宏安（槍殺）
楊永青（槍殺）
賴能中（槍殺）
劉複亨（槍殺）
成正安（槍殺）
施仲渝（槍殺）
熊朝剛（自殺）
羅玉池（槍殺）
李隆熙（餓死）
馮光和之女（餓死）
周康傑祖母（打死）
沈聯軍（打死）
秦士淮（餓死）
寇向文（餓死）
陳玉貞（自殺）
肖正靜（自殺）

黎大雪（自殺）　吳之陽（槍殺）　何克強（槍殺）　羅連山（自殺）
羅連山之妻（自殺）　譚 X 寬（槍殺）　羅建陽（槍殺）　劉管事（自殺）
劉管事之子（自殺）　石大英（槍殺）　傅光忠之父（自殺）　「疤三」（槍殺）
譚宜勝（槍殺）　陳大腳板（槍殺）　陳華軒（槍殺）　周有烈（槍殺）
楊仲華（整死）　劉世倫 (迫害致死)　陳貴偉 (迫害致死)　陳啟賢（整死）
劉元明（餓死）　柳興忠之妹 1（餓死)　柳興忠之妹 2（餓死）張繼騫（整死）
張立夫（槍殺）　李育滋（槍殺）　張紹伯（自殺）　張紹伯之妻（自殺）
張森楷（自殺）　張庭楷（自殺）　陳出新小孃 (自殺)　吳仁安（槍殺）
吳慶華（槍殺）　吳純一（槍殺）　吳澤芝（槍殺）　吳志誠（槍殺）
吳福田（槍殺）　吳三素（槍殺）　吳世昌（槍殺）　吳必成（槍殺）
吳炳生（槍殺）　吳作成（槍殺）　劉秀容（自殺）　吳楊氏（自殺）
吳素華（整死）　吳俊成（餓死)　劉世澤（餓死)　劉世澤之妻（餓死)
吳世倫（自殺）　龔澤浦（槍殺）　張伯函（槍殺）　吳華廷（槍殺）
曾道成（槍殺）　江聚原（槍殺）　丁爾康（槍殺）　唐紹林（槍殺）
唐紹林之子（槍殺）　戴紀奎（槍殺）　戴廷珍岳父（自殺）　謝文丹（槍殺）
胡從德（自殺）　胡正馨（槍殺）　謝成陶的姑祖（整死）　謝雲芳（自殺）
鄧宇雄（槍殺）　李明善（槍殺）　餘選道（槍殺）　曹曉亭（槍殺）
鄧宇俊（槍殺）　戶錦堂（槍殺）　陳蘊山（槍殺）　鄧　佳（槍殺）
鄭冑平之妻（自殺）　焦東山（餓死）　劉家銳（槍殺）　胡裕發（餓死）
餘曉放（槍殺）　韓樹凡（槍殺）　黃雲成（槍殺）　張學忠（逃亡遇難）
張姚氏（自殺）　么太太（打死）　二太太（迫害致死）　陳德木的媽（自殺）
陳林表（自殺）　陳胡氏（自殺）　夏雲方（餓死）　鄔筱藩（槍殺）
鄔錫榮（槍殺）　鄔柏氏（打死）　鄔百僚（槍殺）　鄔月丹（槍殺）
鄔秉文（槍殺）　鄔仲明（槍殺）　鄔錫雅（槍殺）　鄔子赤（槍殺）
鄔孟生（槍殺）　鄔輯光（槍殺）　鄔河光（槍殺）　鄔錫純（槍殺）
劉元貴（勞改而死）　劉世偉（繩索勒死）　劉世偉之妻（斧頭劈死）
劉世偉之子（兩人，斧頭劈死）高成武（槍殺）　徐福原（槍殺）
胡鐘氏（自殺）　李載承（整死）　李先昭的三個女兒　徐和新（槍殺）
畢光奎（槍殺）　李先昭（整死）　（輪姦迫害而死）　胡　祥（槍殺）
唐和玉（自殺）　李懷清（燒死）　李先 X（輪姦致死）　黃　鋰（槍殺）
李斗寅（整死）　柏　聯（整死）　李先藩（槍殺）　李伯清（整死）
王大湜（整死）　陳文昭（槍殺）　陳叔倫（整死）　沈聯福（餓死）
鄭少鼎（槍殺）　彭氏母子（整死）　李元舟（槍殺）　沈聯平（餓死）

李鴻鈞（槍殺）　李宗列（整死）　李先佐（自殺）　王必輝（整死）
沈聯泰（餓死）　李盛槲妻（整死）　陳克益（槍殺）　李先貴（打死）
陳光武（槍殺）　楊希伯（槍殺）　任篤青（槍殺）　吳肇修（槍殺）
楊正秋的兩個舅公（自殺）　吳龍文（槍殺）　胡光楣（槍殺）
魯柏林（槍殺）　敖傳祿（槍殺）　田家樂（槍殺）　楊友琴（槍殺）
楊登雲（槍殺）　胡傳宗（槍殺）　胡署東（槍殺）　魯世義（槍殺）
孫志祿（槍殺）　王仲清（槍殺）　楊欣然（槍殺）　胡光爵（槍殺）
魯晉權（槍殺）　敖海門（槍殺）　張裕龍（槍殺）　田岩保（槍殺）
楊欣然父母（自殺）　胡光倫（槍殺）　魯映輝（槍殺）　敖朗然（槍殺）
陳進國（槍殺）　楊友琴（槍殺）　楊繼川（槍殺）　楊舉柏（槍殺）
劉武祥（槍殺）　劉啟良（槍殺）　楊　雲（槍殺）　黃存孝（槍殺）
陳國芝（槍殺）　辛躍廷（槍殺）　吳可達（槍殺）　吳可達之父（槍殺）
何勳臣 (槍殺）　吳甫仁（槍殺）　鄭　雲（槍殺）　楊保珍（槍殺）
陳老謙（槍殺）　王志純（槍殺）　王志武（槍殺）　胡蒙元（槍殺）
魯世洋（槍殺）　魯世俊（槍殺）　魯世蒸（槍殺）　魯世蔭（槍殺）
魯世全（槍殺）　魯澤鄉（槍殺）　楊習候（槍殺）　楊吉雲（槍殺）
王佛生（槍殺）　李月秋（自殺）　李胡氏（自殺）　洪老四（自殺）
陳淑清（自殺）　吳蒲柳（餓死）　吳世奇（餓死）　楊正安（打死）
劉克雄（自殺）　魯晉權妻子（自殺）　魯符文之女（餓死）　李曾氏（自殺）
魯晉權之女（兩人，餓死）　李懷慶大姐（嚇死）　李裕昆管家（自殺）
任福成（打死)　任達榮 (槍殺）　任明俊二嬸（自殺）　向單兵（槍殺）
向華齋（槍殺）　胡喜賢 (槍殺）　劉元塘之妻（自殺）　張少清（砍頭）
張書行（鬥死）　徐國武（槍殺）

以上共計 448 人

其中槍殺 258 人；自殺 77 人；餓死 26 人（不包括大饑荒餓死的）；其他 87 人（包括打死、整死、卡死、烤死、摔死、駭死、鬥死、吊死、強姦致死、 迫害致死等）。

此外，下列 17 人被整殘、逼瘋或失蹤：

馮光珍（燒烤致殘）　彭吉徵（燒烤致殘）　何代群（打殘）　周則林（整殘）
周武燦（打殘）　李　曼（整殘）　李春容（打殘）　陳德宗（入獄失蹤）
陳德章（打殘）　陳淵明（入獄失蹤）　楊天清（死因不詳）　白 X 秀（打殘）
梁文熙妹妹（失蹤）　梁文熙的弟弟（失蹤）　莫益華（失蹤）　李廷貞（逼瘋）

劉世海（逼瘋、失蹤）

注：由於土改已經過去了60多年，講述者又大多是70多歲甚至80歲以上的老年人，他們提供的姓名中也許有拼寫或記憶的失誤，但這並不影響我寫下這句話——

——讓這些無聲的名字，在民族苦難的記憶裡燃燒！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血紅的土地：中共土改採訪錄 / 譚松著. -- 臺北市：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 2019.02
面；　公分

ISBN 978-986-96921-1-3(平裝)

1.土地改革 2.中國大陸研究
554.25　　107023645

血紅的土地——中共土改採訪錄

作　　者：譚松
文字編輯：克萊頓

出 版 者：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發 行 人：陶延生
地　　址：105-97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5 段 48 號 7 樓
電　　話：（02）2747-0599
傳　　真：（02）2747-0389
E - m a i l：appp5399@yahoo.com.tw
booksway@gmail.com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apppc.tw/
郵政劃撥：帳號：50265671
戶名：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總 代 理：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23586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880 號 14 樓
電　　話：（02）8227-5988
網　　址：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2019 年 2 月
定　　價：新台幣 620 元

（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有著作權 • 侵害必究
ISBN-13：978-986-96921-1-3

1950年底到1952年底，川東和中國的其他地區均展開了土地改革運動。中國的農村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地主和富農遭到了殺害、嚴刑等處置。中國官方認為土改是中共建政之初的功績，而除了官方敘述外，極少有學者觸碰這段歷史。

耗費14年 的時間，採訪了大量的土改親歷者，遠非官方的「洗腦」式敘述，譚松最終寫下近４０萬字的口述史書稿《血紅的土地》，記錄了川東土改時發生的歷史……聞所未聞的一些現象、一些場景，一些即將被歲月淹沒的個體不幸與歷史真相……

要搶救歷史，拒絕讓血腥的歷史真實被吞噬和淹沒；譚松說，如果我們不去正視苦難和殘酷的真相，這樣的歷史就會重演；**中國現在對土改真相的研究還是禁區中的禁區，但一定要有人來做！**

希望這部採訪錄，既為人們展示當年那真實的一幕，也為有關專家學者們的研究提供一部血肉文本和相關資料。

這本書正是在感性認知和理性認識的高度結合中，還原了土改血史和認識了土改血史，並因感性和理性二者兼備而達到了很高的「審美」境界。雖然，這一由鮮血凝結而成的「美」（指認識的真切

多年來，中國人從來沒有用自己的頭腦去想過地主究竟是怎麼一個群體，更沒有想過去了解一下土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任由歷史的真相、殷紅的鮮血、民族的不幸掩埋在統治者層層疊疊的謊言、標語、口號和文學家、藝術家們編造的各類作品中。

當年的「土地改革」運動，實際上是一場最野蠻、最殘酷、最血腥、甚至最下流的土匪搶劫。在這個搶劫過程中，有大規模的殺人；有暗地的強姦；有公開的輪姦；更有千奇百怪的種種酷刑。

在這些聞所未聞、難以想像的酷刑面前……譚松是怎麼去做這部採訪錄的呢？

Mod.PO E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02-8227-5988 www.namode.com

Mod.PO E
ISBN 978-986-96921-1-3
00620
9 789869 692113
定價：620元